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大全

主编 / [英] 阿诺德·托因比

大战和中立国



出版说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原为英国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又译皇家国际事务学会，通称查塔姆大厦）负责编纂的《国际事务概览·战时编》（1939—1946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主编为英国史学界权威阿诺德·托因比，主要编写人员均为英美著名学者。战时编共十一卷，按专题编写：《1939年3月的世界》，《大战前夕，1939年》，《轴心国的初期胜利》，《希特勒的欧洲》，《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战时中东》，《大战和中立国》，《1942—1946年的远东》，《欧洲的重组》，《四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管制，1945—1946年》和《1945—1950年的中东》。

这套二战史大全的特点是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注释详尽，文字流畅，叙事生动。书内引用了大量政府文件、会议记录、档案材料以及当年国际政坛上的国家首脑、重要人物的私人笔记、个人回忆录等第一手资料，立论皆有根据。丛书不仅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两大军事营垒的军事态势、实力消长、战争进展的情况，还详细叙述了战争期间、战前和战后一段时间内各主要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涉及当时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情况。全书堪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百科全书，是各军政机关、大专院校、学术机构和有关研究人员了解、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必备参考书。

这套丛书的中译本自1978年起由我社组织翻译陆续出版，到1990年出齐。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1945—1995年），我社特以精装本形式重印全书，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

1995年4月

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于 1920 年，是一个非官方的和非政治性的团体，旨在鼓励和促进国际问题的科学研究。按照皇家特许状的规定，本研究所不得就国际事务的任何方面发表意见。因此，本书所发表的见解并非研究所的见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

第一编 经济战 W·N·梅德利科特

第一章英国的努力

(1939—1941年)

第一节 1939年的形势和前景

1939年以前重整军备期间，英国和德国的领导人都深信，在战争条件下，德国的经济是很脆弱的。德国方面，就它的四年计划大肆吹嘘，要保证达到一种自给自足的程度，使德国人民和战争机器都不再依赖外国的供应；而英国方面则正确地认为，德国要能这样摆脱依赖将是由于物资的储存，而不是由于使用代用品；严密的封锁将会逐步破坏它的经济资源。内维尔·张伯伦在1938年4月的伦敦几次讨论中告诉法国代表，在不久将来的德国战争中，封锁将成为英国最有效的武器。另一方面，希特勒在1938年的党代表大会上说，他已完全成功地使德国不依赖他国，“封锁德国的这种主意，现在可当作一件完全无效的武器把它埋葬了”。

1939年9月至1941年12月之间经济战的进程，并没有使双方较乐观的预言家感到满意，有时专家们因此受到指责。事实的真相是，由于经常受到政治和军事事件的无端干扰，这个战场上德国的防卫计划与盟国的进攻计划都未能完全实现。究竟是不是误解了还是仅仅忽视了这个问题中的一些必要条件，这就很难说了。战争头二年，这一形势多半有利于德国。然而，英国尽管屡遭挫折，仍然继续深信经济封锁能起作用；虽然法国人通过封锁部同英国进行合作一直到1940年6月，但他们把主动权和具体执行权基本上交给了他们的英国盟友，而且他们似乎始终都认为英国是过于乐观了。德国政府竭力设法从他们毗邻的中立国那里取得经济援助，但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他们对盟国的经济反攻，主要局限于用潜艇和水面攻击舰来袭击商船。法国沦陷后，美国的支持使经济攻势范围更大，效力更高，但在珍珠港被袭以前这种经济攻势一直主要是由英国策动和负责的。1921年后，帝国防务委员会在伦敦经常考虑未来战争中的封锁问题，但在二十年代里（主要由于美国的态度），对于封锁在欧洲未来战争中的效用，还存在着相当大的怀疑。从三十年代初起，德斯蒙德·莫顿少校（后来成为爵士）领导下的工业情报中心一直在为未来的战争奠定经济情报的基础。1936年下半年，这些相当一般性的研究工作就集中用以专门准备应付可能同德国进行的一场战争。“经济战”这个名词已在1937年被英国计划制定者们所采用，并于1938年2月成为政府的部门名称的一部分。这个政府部门将在未来战争中对德国施加经济压力。选用这一名称而不沿用“封锁”这一惯用的词，是有双重用意的。“封锁”一词有着某些别扭的涵义：国际法中“封锁”至今仍是指按十八世纪战争形式对敌方海岸、港口所设置的紧密包围圈，但在布雷、潜艇攻击与空战的二十世纪条件下，它早已成为不切实际的东西了。因此认为有必要另找某

具体谈话内容见 E.L.伍德沃德和罗汉·巴特勒合编：《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年》（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_1939, ed, E.L. Woodward and Rohan Butler），第3辑（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9年版），第1卷，第197—234页。

《概览，1938年》（Survey for 1938），第1卷，第35页；该卷整个第一编完全是对战前德国重整军备的各种看法的一份有趣的概述。

本章有关英、法、美经济战政策的参考资料，主要根据英国政府战时部门——经济作战部（已于1945年6月撤销）——的档案材料。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封锁政策各方面更为全面的论述，请参阅 W.N.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The Economic Blockade），第1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52年版）。

一新名词来表述能够切断敌人供应的那些复杂方法。同时也希望那个名词能表明，并促使人们对这个问题采取一种新的更积极的办法：即经济压力会成为而且也会被认为是一种进攻性的战斗行动，并将充分利用从敌后发动进攻的各种新手段，这些手段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没有使用过。总之，经济战的目的就是，使用一切方法来瓦解敌人的经济，使之不能继续作战。慕尼黑时期，经济作战部曾作过一次预备性的动员；在随后的十二个月中，它的计划经过修订和精心的制作，并于1939年9月3日正式成立该部，它有一个经过仔细挑选的工作班子，有一个明确阐明的纲领，还有大量收集米的德国经济情报研究资料。

大战的第一个冬天，在还不能指望其他盟国的军队取得早期胜利的时候，伦敦确实有一种夸大经济战潜力的倾向。出于同样的、但却更为深思熟虑的宣传上的原因，德国也夸大地报道了击沉盟国商船的事件。在整个“假战争”时期，人们曾设想德国经济由于封锁而正在受到沉重的打击，而且在法国陷落后，英国三军参谋长们似乎过分地指望德国即将出现石油短缺和其他的物资匮乏，从而得到一些慰藉。但如果说这些希望毫无根据，那也是把问题看得过分简单化了。英国专家们认为，德国以其不足的资源来对付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它的经济情况是岌岌可危的，这种想法并不算怎么大错。他们的希望之所以成为画饼，是因为直到德国进攻苏联之前，还没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

德国在1933年至1939年所作的准备足以发动1939年9月和1940年4—6月期间短促的“闪电战”。在这两个短暂阶段的激战中所取得的快速胜利，意味着德国的储备并没有受到严重的压力。战斗中得到的战利品，以及从毗邻的罗马尼亚、瑞典和瑞士这样一些小的中立国所得到的越来越多的供应，足可抵偿它的消耗而有余。但其结果却使德国人有些自满，而且令人惊奇的是，在以后几年里由于重新装备不力而使作战处于不利地位的是德国，而不是它的敌国。

这种情况应该这样来解释：希特勒并不曾想让自己卷入总体战，而且在1939年前，他相信只要能迅速地在军备方面超过法国和英国。他就可以不经过持久战而达到目的。他希望通过巧妙地利用共产党对西方大国的猜疑似及英法对苏联的不信任，来避免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从后来德国进攻俄国的失败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一定是受了他自己关于苏联政权根本不中用这种宣传的欺骗。无论如何他似乎感到满意的是，只要德国一旦获得了军备上的优势，西欧各国的和平主义情绪和革命失败主义就会阻止他们去赶上德国，而且，只要在1936—1939年之间取得军备优势，他就能设法使他们采取默认态度（如在1938年）或者使他们在军事上遭到失败（如在1940年）。德国并没有准备好打世界大战；但希特勒也并没有打算要打一场世界大战。

另一个观点是：由于仍然有可能要进行持久而激烈的作战，德国只有经过长期周密准备，说不定要拖到1945年或更晚些时候，才可能冒战争的危险。战后对前德国参谋总部人员，包括对国防经济军备局局长托马斯将军（1933—1942年）所作的审讯表明：这个观点确实是强烈地向希特勒提出过，而且1937年11月8日希特勒对武装部队高级将领的讲话所具有的戏剧

性（正如《霍斯巴赫回忆录》所记载的），好象并不是由于他决定要冒战争的风险；而是由于他决定要提早发动进攻。这个决定使之有必要在现存的基础工业的结构范围内尽快地成倍增加机器、军需品和武器的生产。它使全国钢铁总生产最无法有任何巨大的发展，以适应以后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可能会出现的大量长期的需要。也许部分是由于过分自信，但主要是出于国内的各种政治上的考虑，直到大战爆发，德国钢铁消耗量中约有百分之三十，一直是供民用的。发电量和合成油生产的发展，以及为供应德国许多合成产品所需的原料和对新煤矿的开发，也同样受到限制。在 1939 年 9 月德国已无疑作了很好的安排足以对付它所面临的紧迫任务。它的战争物资，同它的敌国相比较为充裕，而且就绝大部分而言，也更为现代化。德国采取了一些步骤，来疏散靠近边界的易受攻击的工业区，并开始将军火工业集中在较近中部的地区，同时在储存与增加国内重要的战争物资的生产方面也作出一些努力。但它的力量让宣传给夸大了（1939 年初，希特勒声称，在重整军备方面，德国早已花费了九百亿马克，他这句话好象是站不住脚的），德国根本无法打一场长期战争。而在这场长期战争中，盟国军备工业将由于美苏两国的军备工业而得到增强。

英同对经济战所抱的成功希望，主要是根据对德国储存情况所作的估计，而且又设想到德国的军火工业虽然足以对付摆在他们眼前的任务，但是扩展机会却不大。国社党政府继 1932 年的小小复苏之后，所制定从 1933 年至 1936 年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经济恢复到危机前的生产水平。到 1936 年或多或少达到了这一预期的目标，接着又开展了详尽的工业普查，为重整军备规划打下基础。当时德国工业的转向重整军备，达到了保持“充分就业”和多少满足了国民愿望这个重要的附带目的。与此同时，为解决有关财政问题采取了一些措施，通过诸如冻结工资水平、红利等方法，每年可获一笔储金，主要用于迅速发展军火生产方面的投资。对于主要原材料供应在 1936 年也已做到自给自足。要在（四年计划）内实现这一目的的公开宣传，当然骗不过英国的计划制定者，德国仅是在很少几种基本材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在这些基本材料方面加快了代用品的生产。比较重要的缺门材料，也有了不同规模的储存。前一种情况，主要的注意力是放在生产进口物资的代用品上。这些进口物资是矿物油类、橡胶、铁矿石（靠开发本国低级资源）和纺织品（使用合成纤维）。但在 1939 年 9 月，国内自产的这前三种物资仍不到百分之三十，虽然被服供应是充足的。战时，德国可以依靠其自身取得至少和它平时产量相等的煤、氮和电力供应。到 1939 年 9 月，德国在粮食上对外国的依赖已降低到只有百分之十一。然而德国在铁矿石、有色金属、铁合金以及液体燃料供应方面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1938 年，德国铁矿石总进口量达二千一百九十二万八千吨，其中包括来自瑞典的八百九十九万二千吨，来自法国的五百十万吨。自 1919 年以来，德国在高级钢材生产方面主要

见《德国外交部档案处：德国外交政策文件，1918-1945 年》（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45 年,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German Foreign Ministry），第一线辑（1937-1945 年），第 1 卷，第 19 号（英国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联合出版）。[该文件集以后简称《德国外交政策文件》。]必须指出，希特勒宣战的理由是合乎逻辑的，基于他不相信有可能通过自给自足来满足德国对空间的需求（同上书，第 30 页）。有关《霍斯巴赫回忆录》，见《概览，1938 年》，第 2 卷，第 2-3 节；《概览，1939-1946 年：1939 年 3 月的世界》（The World in March 1939），第 336-337 页，第 334 页，第 353 页，第 367 页。

依赖瑞典北方的矿石，而在战时条件下，依靠瑞典的数量较少的进口就无法维持了。那时德国国内也没有开采铝土矿，而且在铁合金中，国内也不生产钼、铬、锰、钨或钛。但是，大约二分之一的铅，大部分的锌，以及三分之二的钴，则是由国内的资源供应的。

战前，英国估计在大战开始的头十五个月内，德国不需要进口大量有色金属，并预料首先发生严重短缺的将是铜与铅。根据德国的资料，现在知道这些估计基本上是正确的；大战爆发时，德国的储存量为：能供应七点二个月的铜（按照1939年和平时期的消耗率），十三点六个月的锡与三十个月的钴。就矿物油类来说，情况看来很紧张，以致盟国专家们怀疑他们自己的数字出了差错。1938年，德国从欧洲以外的产地就进口了大约四百四十万吨石油，所有来源的总供应量达七百十万吨。到大战爆发时，国内生产已增至三百万吨，并正在从罗马尼亚运进四十五万吨。但即使实行最严格的节约措施，德国也会发现，战争一开始，封锁就会使它失去正常供应量的一半左右。再说，德国只有二百五十万吨那样少的储备（英国人口较少，1938年进口一千二百万吨，1939年9月还有六百五十万吨的储备）。短暂的波兰之战以后，在1939—1940年冬季，德国经济还没出现额外的紧张现象。没有激烈的战争意味着德国在其已制成的武器装备或库存方面还没有出现急剧的枯竭现象，它也没有作认真的努力去增加（或准备以后增加）军备生产的总数量。看来毫无疑问的是，它在波兰势如破竹的胜利证实了下面这种假设，即以现有的工业基地和经受过考验的军事力量，来对付随之而来的任何战事都是绰绰有余的，况且，巧妙的外交还将防止额外的负担。当时“照常营业”的口号已被普遍接受，而且德国领导人在1939年10月和11月还作过一些颇为得意的声明，说是没有必要转向更严格的经济制度。盟国原先估计，敌人在经济上曾作过全面的努力，现在自然被这种事态给弄糊涂了；为切断德国进口所采取的那些强硬措施，看来没有获得应有的成效，因为它们所设想的那个德国国内消耗率实际上并没有出现。在这个期间，盟国不曾轰炸工业目标；破坏计划没有起什么重要作用。法德边境的战争，倒产生了某些经济上的结果，它导致萨尔工厂区实际上陷于停产。因此，德国钢产量从1939年1月至8月每月平均刚刚超过二百万吨，到10月、11月和12月下降至一百八十万吨。另一方面，萨尔和亚琛地区原煤的大量减产，则由于取得波兰—西里西亚的供应而得到了充分的补偿。

第二节 1939年9月—1940年

6月盟国的封锁

这个时期盟国对德国所施加的经济压力，由于当时环境的限制，几乎完全采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封锁方式。不管怎样，这一模式，既然到那次大战快结束时还在起作用，那就是一个好办法。部分是由于在这场新的大战头几个月里或多或少地采用了1917—1918年的整套封锁方案，这才使人们相信封锁确是十分有效。封锁的目的在于控制三类货物的通过：德国来自海外产地的进口货，德国从毗邻的中立国进口的当地土产品或制成品，还有德国的出口货。来自海外的货物，要么直接通过德国港口，要么间接假道一个毗邻中立国，才能到达德国。战争一爆发，禁运品（实际上指交战国所宣布的、可被敌人用于战争的任何物资）即处在盟国海军的控制之下。实际上，直接

这个数字包括每月从上西里西亚东部得到的十万吨在内。

由海路运往德国北部各港口的全部供应物资，立时被切断了。通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波罗的海的北方航线，由设在柯克沃尔的禁运品控制基地和北方巡逻舰队所控制；途经英吉利海峡的南方航线，则被设在拉姆斯盖特的基地和在韦默思的补充基地所扼制。地中海上交通，被设在直布罗陀、海法和稍后设在马耳他的诸基地所控制。盟国在战争爆发时所颁布的禁运品清单，涉及范围极广，除了医疗用品、某些制成品和烟草以外，几乎包括德国所有的进口货。在“绝对”禁运品和“有条件的”禁运品之间，理论上仍然保留着区别。有条件的禁运品，主要包括诸如食品、粮食、衣服等物品，这类物品可兼作民用和军用。但是，英、法两国政府沿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作法，规定“连续航行”的原则也适用于这两类禁运品（因而使敌人运输的最终目的地成为没收这两类物品的依据），并实行勒令有嫌疑的中立国船只转驶到盟国检查禁运品的各控制基地的办法，以保证进行全面检查。这些做法使得昔日的论争（至今仍未失去其全部意义）又重新抬头了。从盟国的观点看来，按照二十世纪的战争条件和公认的先例这些做法是有道理的；但中立国多次正式提出的抗议，其目的是既想保留一种地位，又想向本国和德国舆论界表明中立国举动的不偏不倚的立场。这样讲一般或许是公道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立国对盟国实施封锁的抗议，如果说背后有什么真正反感的话，更多的是出于民族尊严（如意大利和日本），或生怕引起德国的报复（象挪威和荷兰），而不是专门注重于技术性的法律问题上面。不管怎样，英国的做法是以交战国控制禁运品这一普遍公认的权力作为基础的：并没有宣布过正式的封锁。

盟国政府除了在上海实地拦截货物以外，还采用了其他各种控制手段。按照在 1939—1940 年间的冬天所制订的计划，联合王国、自治领、印度和其他英帝国属地的出口都实行了出口许可证制度加以控制。战争一爆发，“对敌贸易”法令就禁止英国商行和个人同设立在或派驻在敌国境内的敌方商行和代理机构接触。这一禁令并不一定适用于住在中立国的人（仅仅因为他们是敌国侨民）。但是另一方面，它却可适用于那些资敌的中立国国民。商务部经常公布在中立国内通敌的人员名单，不准英国商行和英国人同这些人做生意。各中立国从来对这种“法定名单”（俗称黑名单）没有很大的好感。而且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它也不能列出美国商行的名单；但是，禁止英国人同外国商行接触，显然是属于联合王国本国权力范围之内。列出名单的方法，除了用以防止英国人资敌的眼前目的之外，还进一步起到使许多中立国商行不敢贸然同德国做买卖的效果。而且基于同样理由，对其他各种同中立国商行交往的形式也可加以切断。对“法定名单”上的中立国商行，可以停止向其提供信贷、保险、修理、干船坞设备、船用补给品以及其他服务设施。此外，某些中立国家如果以借款、信贷或在结帐时允许大量拖欠的方式资敌的话，英国银行就可以向他们撤回信贷。从大战一开始英国财政部所执行的外汇管制法，通过规定一些严格的条件，为英国出口收益的使用提供了另一项保护措施：所有国外的支付必须表明是用于合法的用途和目的地，这种在大不列颠和英镑区实行有条不紊的外汇管制，其本身就是国际事务中的一件大事，并在经济战以外的其他领域中也产生了影响。

在 C.J.科洛博斯的《有关战利品法的论文》（C.J.Colombos:A Treatise on the Law of Prize），第二版（伦敦，格罗修斯协会，1940 年），第五章中，对这一时期国际法上这些问题的看法作过适当的讨论。

战争开始数周以后，直接运往德国港口的货运量自然减少到了很小的数量。此后控制禁运品的主要问题，就是要防止运交毗邻的中立国家的货物再出口到德国。最初是进行有组织的拦截与货物和船证的检查，但是由此造成的盟国检查基地拥塞，中立国船期稽延，以及同中立国政府和轮船公司之间发生摩擦等情况不久也就变成很大的难题。这些困难直到同这些商行和中立国政府签订了同意遵守封锁国的要求的广泛协议之后才获得解决。这一系列复杂的谈判，就是英国政府在“假战争”期间对经济战（或许还得加上对外交战）所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此外附加在主要协定上附加支付协定，也给英国财政部提供了一种将“外汇管制”应用于有关贸易方面的方法。

同毗邻中立国政府签署的战时贸易协定有两个主要目的：（1）同中立国取得合作，以控制向德国提供禁运品；（2）对盟国同有关中立国政府之间的贸易，作出任何必要的调整。第二个目的仅仅是英国经济作故部和（法国）封锁部附带关心的问题。但是由于盟国都需要从毗邻中立国取得供应品，这双方势必相互掣肘，每一方都会利用他方对供应品的兴趣作为一种讨价还价的武器。在货物通过盟国基地到达中立国的港口时，通常是可能要坚持不让他们把这些货物或同等数量的物品出口给德国。可是，若要盟国说服一个中立国政府停止将其本国产品供给德国，则是格外困难得多。中立国通常坚持它的“正常贸易”的立场，且满有道理地辩护说这是一种最为妥善的方针，借以避免人们对于非中立行为的指控及避免对它和平时期的贸易水平的干扰。按照上述原则，盟国同瑞典、挪威、丹麦、荷兰、冰岛、比利时、瑞士以及希腊达成了协议。盟国同另一些国家（诸如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西班牙），也都签署了规模较小的协定。这些协定为一场事实上打不起来的经济战——一场 1914—1918 年式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欧洲大多数中立小国都保持了独立——作好了准备。

后来，法国一陷落，留存下来的协定没有一个不是经过修改的，而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协定存在了。因此这里只能指出它们的几个比较持久的特点。最重要的也许就是大不列颠于 1939 年 12 月 7 日与瑞典商订的那个协定。

该协定自 12 月 20 日开始生效，28 日正式公布。1939 年 12 月 11 日，英国和比利时订立了一项协定，1940 年 1 月 26 日，同希腊签署了一项协定。但是，大多数协定都是恰恰在 1940 年 4 月德国发动进攻前才达成的。

直到德国战败，瑞典的协定一直是有效的，只作过一些修改以适应战争形势的变化。铁矿砂始终是盟国最为关注的物资，盟国认为，对德国来说无论如何瑞典的供应品是决不可少的。存在着很多伪有效干涉的计划和希望。古瑞典铁矿砂出口价值的大约百分之七十二点六的矿砂运往德国，同时德国还从瑞典进口大量有用的铜、铁合金、木材以及木材制品。盟国掌握着某些讨价还价的武器；他们是比德国更为理想的主顾（1937 年，盟国的进口占瑞典总出口量的百分之三十二点四，相比之下，德国占百分之十五点八）；盟国能控制瑞典诸如液体燃料等重要的短缺进口商品，并相信瑞典出于财政上的原因，对保持向盟国出口有着浓厚的兴趣。可是，瑞典在 1939 年 9 月 13

全部谈判所根据的一般指令和协定草本，载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 1 卷，附录一，第 663—665 页。尼尔斯·厄尔维克：《成为注意中心的挪威（Nils Orvik：Norgei Brennpunktet）》，系 1939—1940 年挪威对外政策的官方历史，其第一卷详细论述了战时贸易和海运谈判，并刊有 1940 年 3 月 11 日英—挪威战时贸易协定全文（奥斯陆，J-G·培努姆，1953 年版，第 353—379 页）。

日明确地制定了它的政策。这就是一项恪守中立的政策。在同其他大国的经济关系方面，瑞典将对那些并不限制向它正常出口的国家保持正常的出口水平，并以出口许可证制度来保证，它对交俄国的出口量将不超过正常份额。盟国想要迫使瑞典采取更为迁就态度的希望由于下列事实而受挫：瑞典已通过储存物资作好应付危机的准备，特别是食品的储存，足以便它在十八个月或更长时间内不发生困难，而最重要的是瑞典决心要避免招惹德国进行报复或使其有理由这样做的任何事态出现。况且，盟国还需要瑞典的原料供应（如铬铁合金、木炭生铁），他们急欲同瑞典缔结一项海运协定，他们知道瑞典是没有理由担心盟国会象德国那样施加报复的。因此 1939 年 12 月 7 日的英瑞协定承认瑞典有权出口数量不超过 1938 年水平的本国产品，并不出口来自除了波罗的海以外的所有海外商品。联合王国同意输入合理数量的这类商品。英国政府获得了一项有利的海运协定，并对瑞典所表现的同情竟至保证协定无论在文字上或精神上都将得到尊重这一点感到满意。

这两项基本条款——其一，应当允许中立国通过盟国管制禁运品当局进口合理数量的货物，条件是不得再出口这些货物或相等物的商品。其二，土产品的出口不得超过 1938 年的数量——也构成了盟国同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以及瑞士达成协议的基础。不过还有许多修改、让步和特殊条款。盟国对各中立国政府不止一次的报复能力还记忆犹新。在战时贸易谈判结束之前，瑞典就不准备签署海运协定；荷兰实行了“反封锁”的措施，对运往联合王国的谷粉和糊精、可可脂、植物油、油菜籽以及炼乳拒绝或拖延签发出出口许可证；12 月，瑞士限制对法国国防所需物资的出口。同时，“加工问题”引起了巨大困难，而且成了英荷谈判中所遇到的最严重的问题。荷兰所进口的各种原料（如橡胶、纺织品、皮革和各种金属品）都是要送往德国进行加工，然后再把制成品运回荷兰。瑞典以及别的国家也产生同样的问题。盟国之所以反对这种作法，与其说是因为德国将会占有这些原料（倘若德国真的占有了，那么今后供应就会被切断），毋宁说是因为德国将从这些交易中获得外汇。当时荷兰拥有一种有效的讨价还价武器，因为它正在给英国空军部加工 100- 辛烷油；最后双方同意，为了获得这种油，必须准许荷兰的货物在德国进行一部分加工。在同丹麦的谈判当中也遇到过多少类似的互惠问题；要保持丹麦的出口，就得依赖海外供应的饲料和肥料，而英国政府却不愿看到这些进口货被用来便利丹麦对德国的出口。但是，丹麦也在向英国出口粮食，据有人指出，同样一头猪，既可以为德国生产碎肉，也可以为英国制作火腿。丹麦的煤和焦炭有百分之七十六是从英国进口的，而德国只向丹麦提供百分之十九。由于丹麦贸易是明显的出超，因此就有相当大量的英镑结余可被联合王国冻结。在战术上有利于英国的背景下，还必须安排这样一个难对付的事实，即丹麦肯定不想去激怒德国，并可能按比例减少对德英两国的出口量来应付对它施加的压力。

尽管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讨价还价，英国政府还是觉得他们可以相信这些国家在德国的压力下会继续履行战时贸易协定。在巴尔干半岛，形势却不同了：德国在政治上与经济上的控制力量非常强大，以致盟国的威迫利诱都动摇不了它。德国的经济不仅大部分与巴尔干各国的经济相互补充，而且它自 1933 年以来所实行的汇划结算政策，已使其在同这些国家物物交换中更处于

关于同瑞士的协定，见下文，原著第 209 页。

一种优势地位，而英法两国对于这种影响也无意进行对抗。不过，经济作战部希望用一项有力的采购政策来夙德国的优势地位抗衡。罗马尼亚的石油供应和瑞典的钢材一起被认为在经济斗争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1939年9月12日，英国战时内阁授权立即采购罗马尼亚所有石油库存，租用所有可用的油驳，并在现有的契约期满后获取一项购买石油供应品的特权。于是，通过英国各石油公司进行了大量的采购，可是到了12月份，罗马尼亚政府决定管制并限制石油出口。英国经过几个月的捉摸不定之后才知道罗马尼亚已向德国保证每年提供一百五十六万吨石油。经济作战部打算通过为此目的专门建立的格兰德公司，去购买拖船、油船和驳船，但是所购到的船只还不到多瑙河上各石油船队总数的百分之十。等到法国沦陷后，就连调动或箝制这些船只中的一小部分也都不行了。同样，已采购的大批石油也都无法运走。1941年1月11日，英国政府与南斯拉夫缔结了一项极为满意的矿产品协定。这项协定所起的作用至少可以将南斯拉夫对德国的出口限制在现有的南德协议的水平上，不过，德国对此（对于铬或许是例外）是否十分关切似乎是值得怀疑的。盟国在保加利亚采购了小批玉米和油菜籽，但是德国的竞争力很强，加上1940年4月发现保加利亚在容许德国假道从俄国输入石油，因而使英国政府拒绝作出相应的让步。希腊是一个希望较大的活动场所；1939年9月7日，英国与希腊拟订了战时贸易协议草案，并于1940年1月26日正式签订协定。虽然当时情况必须根据1939年8月23日的希德协议来考虑，但是，英国同意采购多达五万五千吨铬以及至少价值五十万英镑的希腊烟草，而希腊出口到德国的铬则被限制在一千吨以内。

这一期间主要在巴尔干半岛有机会试行的先买权政策，并没有遭到完全失败；但是，由于缺乏外汇，由于德国在势力和市场经验方面处于大大优越的地位，同时又缺少直属于经济作战部管辖的采购组织，所有这一切都使先买权政策在这一阶段不能充分发挥效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商业公司，即联合王国商业公司，它是由财政部提供原始资本五十万英镑，于1940年4月11日组成的。这个公司在战争后期阶段将发挥主导作用。

但是，由于1940—1941年间的冬天战局发生了变化，致使它未能在巴尔干半岛取得重大成就。

意大利的地理位置和它同轴心国的牵连，本来很可能给封锁造成一个最大的缺口；然而，在大战头几个月里，意大利在外交上却出人意料地小心翼翼，从而增强了伦敦的希望，以为意大利可能保持中立，或甚至可能成为西方大国的一个盟友。墨索里尼的调子始终是明确的，今天看来很清楚，他在任何阶段确实没有与德国打仗的意思，但作为最后一着他也准备踢开所有那些以意大利经济极端虚弱为理由主张不能参战的论点。1940年2月12日，当他的货币与外汇部长里卡尔迪在直言不讳地说到意大利的货币储备、库存以及军备的不足时，墨索里尼把他形容为一个爱哭的小孩；他说，六年来，意大利一直被人说成是处于濒临破产的境地，然而它却过得很不错。但是，

财政部还提供了人员班子。它设有一个商务董事会，遵照经济作战部（管采购）和商务部（管出口）的指示工作。

加里亚佐·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Galeazzo Ciano：Diario 1939（—43）〕，共二卷，第4版（米兰，里佐利出版公司，1947年版）；马尔科姆·马格里奇编：《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Ciano's Diary 1939—43，ed Malcolm Muggeridge），伦敦，海涅曼出版公司，1947年版，1940年

他在 1939 年并不打算参战；部分因为对德国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部分似乎是由于意大利还没有准备就绪，因之虽然要想让一个赌棍在最后—着不孤注一掷是不大可能的，但很明显至少在初期必须小心从事。意大利的煤、铁、石油以及几乎所有其他原料，都依赖国外进口；1939 年 9 月，这些原料和已制成的军火的储存量是微乎其微的。在经济作战部内有一些人善于鼓吹这种观点，即意大利作为一个自己承认的非交战国，已使它有义务全面执行某种形式的封锁，这种形式将阻止意大利援助轴心国，甚至还会阻止它最终参战。不管意大利的资源状况如何，这些考虑看来未必能阻止墨索里尼在时机一旦成熟时进行干涉，而盟国政府则宁愿将意大利作为一个真正中立国对待，并探求与其达成一项协议的可能性。

因此，对意大利仅仅采用了通常的封锁措施。这就是说，尽管盟国禁运品管制当局竭力侦察和扣留运往德国的物资，意大利还是能为其本国工业不受约束地继续进口。最初，意大利人以惊人的心平气和的态度忍受了因封锁而引起的不可避免的迟延和麻烦，但是到 1939 年 10 月后批评之声就与日俱增了。报刊上时断时续，有时很激烈的宣传，煽起了人们的不满情绪，并且正如当时报道的那样，几乎使墨索里尼暴跳如雷。英国人作了一些让步，允许意大利人广泛使用“退还”保证，意大利第一流的班船“雷克斯”号和“萨沃亚伯爵”号，只需停留几小时就被允许通过直布罗陀海峡。1939 年 12 月底，经济 14 作战部作为一种“庆祝圣诞节姿态”，同意只要意大利进口商保证不将这些货物重新出口，就可发还依据退还保证被扣的意大利货物。这样一来暂时缓和了紧张局势，齐亚诺似乎在一个短暂的时期中对意大利应“自己管制禁运品”（即签署一项战时贸易协定）这种想法发生过兴趣。然而这种解决办法被墨索里尼否定了，争论一直继续下去。可是，英国竭力想讨好意大利政府，于是就两国间签订一项一般性的贸易协定进行广泛的磋商。直到 1940 年 2 月，意大利官员和实业家热情采纳了这些建议，这使英国削弱轴心国的希望又活跃起来。12 月，意大利政府得到通知说，英国愿意在 1940 年期间向意大利花费二千万英镑；翌年 1 月，英国内阁同意，必要的话，这个数字可提高到二千五百万英镑，虽则这项决定并未通知意大利。意大利人似乎准备向英国提供飞机引擎和材料、粮食、大麻、汞以及其他物品。作为交换，他们要求输入范围甚广的产品，其中包括煤、现有定额的纽芬兰鱼、橡胶、铜、镍、锡、黄麻、矿物油和谷物。这些物资对意大利重整军备显然用处很大。只要意大利乐意提供飞机、火炮以及其他装备，英国政府是愿意作成此笔交易的。里卡尔迪在 2 月 3 日说，意大利的经济状况是如此糟糕，以致不得不硬着头皮接受英国的条件；但在日，墨索里尼却拒绝了这些条件。从英国人的观点来看，拒绝出售武器和装备是对诚意的一种考验；由此看来，似乎无可置疑墨索里尼到一定时候就会投向德国。运往意大利的德国煤直至那时为止都是允许从鹿特丹启运，但到 3 月初就被制止了；尽管英国人在 5 月份为重新打开谈判僵局还作出了最后一分钟的努力，但是使意大利摆脱德国控制的希望在 2 月就已成为泡影。就在 2 月 7 日墨索里尼的决定发表后不

1939 年 9 月和 1940 年 4 月之间，中立国船主经常向经济作战部提出这种为他们所接受的保证。中立国被允许将可疑的货物运往中立国目的港，但须保证，如果这些货物经禁运品管制委员会考虑决定，应作为禁运品处理时，即必须将其运回到盟国港口。

英国专家严重地低估了德国能够通过瑞士向意大利提供的煤量。

久，齐亚诺向英国大使承认，这个决定是一个政治性的决定，并且税，不管报界如何宣传，对于禁运品管制问题，实际上意大利没有理由表示严重不满。经济作战部对通过意大利运到德国的供应品不多感到满意；不过，意大利确实能够在某种限度上将物资储存起来，特别是石油。可是直到1940年6月，意大利对应付一场大战还没有准备。

要完成对德国的经济包围，必须把苏联拉进来与盟国积极合作；而在这方面直到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以前，英国的政策是完全失败的。但是决不能十分肯定地说，就不能达成某种有助于盟国政策的经济协定。经济作战部对这一点从未抱有奢望，但由于盟国在政治和军事上压倒一切的需要，必须作出这种努力。当这种努力的结果证明是失望时，就出现了对苏联施加各方面的压力。然而苏联并不完全依赖海外的供应，所以一般的封锁方法对它的经济并没有产生什么明显的影响。战争爆发后，英国对运往苏联的商品，即拒绝或拖延签发出口许可证，但这是出于供应上的而不是经济战方面的原因。当苏联当局进行报复时，英国战时内阁授权同苏联进行谈判，并不失时机地于1939年10月11日签订了一项易货协定。根据这项协定，苏联获得了八千九百吨橡胶和六百吨锡，并同意提供约值一百万英镑的木材（这是在冬季冻港前能交运的全部木材）。战时内阁准备冒这些橡胶和锡可能流入到德国的风险，11—12月期间，在伦敦继续与苏联大使馆商谈另一项易货协定，包括用俄国谷物来换取英国的工作母机和铜。事实上，直到1941年6月为止，10月11日签订的协议一直鼓舞着英国人对进行类似贸易抱有希望，但结果都未能如愿。

苏联政府始终坚持他们不能和联合王国签订属于战时贸易协定性质的任何协议，因为这将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接受盟国的封锁政策。苏联政府在1939年10月25日的照会中正式抗议英法政府实行禁运品管制。另一方面，他们继续声明愿意同交战国双方进行贸易，并对有可能进一步签署易货协议保留了余地。1939年秋，苏联并没有按他们对盟国封锁措施的观点行事；而仅仅将他们的船只从那些可能受到禁运品管制的海域撤出，大半海运限于太平洋航线。实际上，苏芬战争爆发后，英国对苏出口就全部停止了，暂时也未进一步商谈有关经济协定的事宜；相反，英国采取了控制所谓“符拉迪沃斯托克缺口”（货物横越西伯利亚铁路流入德国）的措施；1940年1月和2月，两艘苏联船只“色楞格”号和“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号遭到了拦截，后者载有一批运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港的铜。

伴随着采取经济压力政策，盟国还讨论了干涉苏芬战争和抵制苏联在中东争夺石油的长远计划，俄国与盟国之间看来正在出现鸿沟，并且由于有关订立苏德经济16协定的报道而进一步加深了。经过长期困难的谈判，这项协定终于在1940年2月11日签词“。它规定苏联在头十二个月里要向德国及其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运交价值六亿五千万马克的原料，包括矿物油（九十万吨）、磷酸盐（五十万吨）、铁矿砂（五十万吨）、废铁和生铁（三十万吨）、棉花（十万吨）、铁砂（十万吨）、畜用豆类和谷物（一百万吨）、

即海参崴。——译者

关于此项协定的谈判见《概览，1939—1946年：轴心国的初期胜利》（Survey for 1939—46：The Initial Triumph of the Axis），第6编，第1章，附录。

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均系捷克斯洛伐克所属的地区。——译者

白金（二千四百公斤），以及许多其他原料。协定并为德国从阿富汗、波斯、罗马尼亚和远东各国进口及对他们出口货物作好了安排，确定了运输费用，并就苏联“慷慨”协助德国在国外采购原料事宜也作出了规定。据估计，在头十二个月内苏联交付的货物和服务价值为八亿马克。德国首席谈判代表施努雷博士认为，如果这些进口物资能如数获得的话，“英国的封锁作用肯定是会受到削弱的”。德国的烦恼主要倒不是苏联是否愿意运交这些原料，而是德国不情愿并且实在无力提供苏联作为交换所要求的一些工业产品、制造方法、设备和军用物资。有一段时间盟国还无法获知此项协议的具体细节，可是数月后，经过凑集各方面的资料，情况也就摸得相当准确了。1940年3月14日，英国战时内阁决定加紧对苏联施加压力，并谋求第一步先同日本就限制协俄国和德国的供应问题达成协议。3月28日，最高作战会议批准了此项决议，但是，苏联政府表示无意扩大这种裂痕。几天后，德国入侵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盟国的注意力一下子就转移到更近国门的战役上去了。

当时所有这些行动，都是旨在限制禁运品从毗邻中立国或通过它们运往德国，经济作战部和封锁部的主要注意力全部倾注在这些行动上。到目前为止，先买权还不算很重要。1939年11月以后，英法两国政府的公开目标，就是要破坏德国的出口贸易，但由于主要是中立国的反对，这方面的进展也很缓慢。封锁德国海上航道，就意味着德国的出口货通常就得用中立国船只运往海外市场。英法两国政府承认1856年的巴黎宣言条款仍然有效，根据该项宣言，中立国船只所载运私人的非禁运品敌17方货物得免于没收；可是，正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盟国对此类货物所采取的行动，可以看作是对德国某项相应的破坏国际法行为的一种报复。贸易作为一种外汇来源或一种易货手段，对德国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盟国认为，德国投入战争时仅拥有价值四千一百万英镑的黄金和价值大约为一千五百万英镑的外汇储备，在1939年9、10、11这三个月中，德国大力推动它的出口。有些情况是，德国商品的所有权在启运前就转让给中立国了；但有许多情况则是美洲的各中立国和日本在大战以前（或在这些德国货物因禁运品管制而落入英、法手中以前）就已经为这些德国货物付过款，或者声称已付过款，因此他们是不愿失去这些货物的。1939年11月27日，英国政府咨询枢密院发布了一项敕令，规定对在敌国港口装船的所有货物和来自敌国或属于敌国所有的一切货物实行禁运；法国政府也作了同样的声明。该敕令定于1939年12月4日起开始生效。公布此令是作为对德国的一种报复，因为德国日益无视在1936年的“潜艇议定书”中所规定的潜艇战规则以及海牙公约所规定的布雷规则。但是，为了应付中立国家的反对，凡在1939年11月27日前签订合同的，在1939年12月11日前付过款的，以及在1940年1月1日前装运的货物都不加究问。后来在12月，英政府同意把航运日期放宽；还拟订了一张很长的“特殊情况”的清单，其中包括医用、救济或用于人道主义目的的物品，同输入国的经济命脉有关的货物以及在1939年11月27日前定货而为公共事业计划所需的物品。此外，日本和美国一直在使用压力，迫使英国当局在敕令发表后的十二个月内，不断发还许多重要的私人货物。但是，随着确系在实行报复敕令前

关于协定和机密议定书的全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607号；特别是施努雷在1940年2月26日的备忘录（同上书，第636号）。

见《概览，1936年》，第88页注；《概览，1930年》，第63—64页，第69页。

向德国商行订购的货物陆续交付以后，要求豁免和抗议的呼声也就渐渐平息了。据估计，到 1940 年 4 月中旬，德国对国外主顾的出口贸易已下降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八十。

1940 年春大的形势是，盟国关于禁运品管制的措施正有效地阻止供应品通过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荷兰、比利时、瑞士、巴尔干各国或许还有意大利从海外运往德国；另一方面，盟国却未能阻止这些国家和俄国向德国正常供应其土产品。盟国也未能阻止那个影响深远的苏德协定的签订，或阻止来自美洲和远东的供应品（至今还是微乎其微）通过太平洋和西伯利亚途径运往德国。到目前为止，战争并没有加重德国的负担，德国对目前军火生产的速度感到满意，从而缓和了对平民的压力，这使经济作战部过分乐观的宣传家们显得颇为愚蠢。随后，1940 年 4 月德国在挪威和丹麦以及 5 月和 6 月在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快速胜利改变了局势。德国国防军可用较少的人力和物力取得胜利的能力再一次显示出来了。胜利产生了其他的附带后果，例如获得大量战利品，侵吞瑞士，使得巴尔干半岛各国的抵抗意志崩溃，以及敌国（意大利 这时已参战）对较大一部分西欧和中欧海岸线的控制，这些都意味着德国已有效地粉碎了自 1939 年以来盟国采取的经济压力计划。经济战虽然继续进行着，但必须重新制订计划，以考虑新的条件，并在某些方面考虑新的机会。

第三节美国的作用

就是在这个时期，英国的经济战政策开始迅速摆脱它以前依靠 1914 年至 1917 年的模式的那种做法，并开始在美国国家中寻求建立一种以“管制货源”原则为基础的更牢固和全面的制度。迄今为止，欧洲大规模封锁的正统形式一直是由英国舰队在货源与市场之间进行干涉。1812 年的战争总使人们想起，中立的美洲出口商可能象欧洲的敌人那样猛烈地同封锁进行斗争。如今则有可能考虑（象在 1917 至 1918 年短时间出现的情况那样）采用那么一种管制战时禁运品的制度，按照这种制度生产国政府将对运往欧洲大陆的供应品加以管理，而海上管制在它仍在实施的情况下，将对这项精心制订的管理制度只起到批准和进一步核对的深入作用。

当时，英国从已变化了的欧洲局势中，获得了既对眼前有利，又最终具有重要意义的好处，即美国在经济封锁方面已增多的和正在日益增多的合作。迄今对战时禁运品的管制主要是在欧洲海域沿用对货物和证件实行检查的传统做法，而这种管制却引起了一些美国人依据传统方式对封锁提出抗议。1940 年 1 月，英美关系就在这一问题上发生一段短时期的严重危机。1939 年 12 月，美国 19 国务院对管制敌方出口货和检查美国邮件，提出了几次正式抗议，并在英国大使馆未及答复之前于 1940 年 1 月 19 日公布了备忘录，抱怨美国在地中海上的船舶遭到了不合理的耽搁和歧视。但是，美国公众却似乎只感到迷惑不解而不是愤怒。由 F·T·A·艾什顿-格沃特金和查尔斯·里斯特教授率领的英法代表团到达华盛顿后，气氛顿时好转。1 月 29 日，英国政府同意在北面水域暂停检查美国船只有无战时禁运品，并讨论了英国在新

见下文，原著第 42—44 页，以及《概览，1939—1946 年：轴心国的初期胜利》，第 6 编，第 1 章：附录 和第 8 编，第 1 章，第 4 节。

见 1940 年 1 月 6 日的《国务院公报》（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第 3—5 页和 1940 年 1 月 27 日的公报，第 93—94 页。

不伦瑞克建立管制战时禁运品基地的计划。这个本来就差不多是行不通的计划，幸亏由于德国入侵挪威而告吹了，但是它却具体说明了美国所处地位的复杂性。美国受到了中立的三个定义的约束：

(1) 1939年9月5日的总宣

言，宣言根据国际法确定美国公民享有的正常的中立国国民的权利与义务；(2) 由总统在1939年11月4日签署的中立法案；以及(3) 1939年10月3日对所有美洲共和国具有约束力的巴拿马会议宣言。根据中立法案的规定，任何开往南至加那利群岛的欧洲或非洲交战国港口的美国船只都是非法的，但是美国船只可以允许开往俄国港口，包括卑尔根以北的挪威港口以及地中海。

因此就无法防止禁运品通过这些中立国的港口流入德国，而如果要让美国船只改变航向开往英法控制的基地接受检查的话，那就有不幸遭到德国水雷和潜艇破坏的可能。巴拿马“安全区”是设在加拿大以南的美洲大陆海岸外面宽300到1,000英里不等的区域，在这个区域里是不准进行交战的；这就有效地阻止了英法从加勒比海的基地行使禁运品管制权，而这是能够拦截从滨临大西洋的拉丁美洲港口经过巴拿马运河，再经西伯利亚运往德国目的地的禁运品的唯一地区。但是英国当局已预料到这许多困难，从而建立了一个航行证制度，似乎为之提供了一种解决办法。根据这一制度商请美国、阿根廷、乌拉圭和巴西的出口商自1939年12月1日起，按照英国相应使团的要求行事，即凡是打算运往欧洲的货物都不运往德国；据此发给一张航行证或商业护照；凡是持有这种航行证的船只，所装载的全部货物，今后一般都不再受干涉。如果这项制度被普遍接受的话，原可不致发生什么枝节。但是，美国财政部却在1939年12月2日要美国出口商注意一项法律，限定他们要接受他们的船只适宜装运的货物，因而使这项制度没有得到普遍接受。

在里斯特—艾什顿-格沃特金使团访问之后，美国当局在对英国的封锁措施问题上表现出了大为友好的妥协精神。到了1940年夏，美国政府显然已不再反对英国将所有的货主和美国出口商纳入实施航行证计划的企图了。所有的英联邦政府都已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在战争开始的日子里，整个英殖民帝国都实行了用颁发出口许可证的办法来管制出口。整个冬季，印度和各自治领也都实行了出口许可证的办法，并密切配合了经济作战部的计划。为使管制有效起见，对“收货人”和“定量”都必须加以管制。这就是说，不仅必须确保中立国的进口商不同敌人做生意，而且必须使中立国的进口物资总数不超过正常的需要量。因此，经济作战部必须严格注意个别的收货人的贸易情况。在同各英联邦政府磋商后，他们在冬季期间制订了由帝国输往欧洲中立国家的出口限额计划。到1940年春，已为锡、锰、铬、云母、黄麻、橡胶、

见世界和平基金会：《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39—1940年》，S·谢泼德·琼斯和丹尼斯·P·迈尔斯编（WorldPeaceFoundation：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1939—1940，ed.S.Shepard Jones and Denys P. Myers），波士顿，世界和平基金会，1940年版，第629—638页。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39—1940年》，第656—671页。又见《概览，1939—1946年：轴心国的初期胜利》，第7编，第1章，第1节（2）。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39—1940年》，第115—117页；《概览，1939—1946年：轴心国的初期胜利》，第7编，第1章，第1节（1）。

石棉、西沙尔麻、棉花、各种皮革、油菜籽和可可等规定了限额的数字。由这个限额制度连带产生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帝国的不同地区之间公平地分摊盈亏。

因此，在法国沦陷前，就已经实行了相当程度的管制货源的措施，主要是为了减少与出口商的摩擦，减轻经济作战部和海军巡逻艇队所负担的压力。可是，这种管制没有完全落实；美国在这一阶段反对对毗邻的中立国实行强制定量供应的航行证制度，而经济作战部这时也尚在精心编制定量的基本统计。此外，某些重要的原料产地象荷兰的东印度群岛、日本和拉丁美洲国家都尚未能被纳入这些部署之中。

法国失陷后的局势使扩大管制货源制度的范围成为 21 当务之急了。这时，德国已控制了从北角到西班牙边境的整个西欧海岸线，在地中海意大利也参加了战争，英国的经济战政策在多玻河流域和巴尔干半岛诸国大都破了产。皇家海军现在要担负起对付敌人的侵略企图和对付袭击商船的敌舰的责任，已不大可能为了封锁而在敌占海岸线上巡逻了，即使对可疑的突破封锁的船只实行截击和迫使它们改变航向也只有在特殊的环境下才能送行。再者，随着大部分“毗邻中立国”的消失，早些时候根据同这些国家的政府和商人所商定实施的管制方法，也大都不再适用了。

为了使货源管制取得效果，必须获得海外国家的政府和商人的默许或合作，并必须找到一种制裁办法以代替拦截。因此，1940 年夏，设计了一个新的机构，并于 8 月 1 日开始工作。该新机构有三个主要特点：（1）航行证现已成为“强制性”的了，意思是在颁发航行证的国家中的出口商，对于凡是属于输往封锁区国家的列入禁运品的全部货物都要申请航行证。由于美国政府此时准备默认这一要求，因此就有可能假定：凡是没有航行证的货物便是驶往敌区的。英联邦国家所颁发的帝国出口许可证也具有强制性航行证的同等作用。当所有的货物具备了航行证、帝国出口许可证或如果是敌国出口货具备了产地证明时，在最后一个装货港口的英国领事便发给一张“船只航行证”。任何一艘因未持有船只的航行证而在驶往欧洲的途中被拦截的船只都可能被当作战利品而加以没收。普遍实行这种航行证制度，使得有可能在货源产地就实施禁运品管制而远远地摆脱德国的干扰。但是，它仍不能防止突破封锁的船只将贵重的货物运往德占区海岸，因为海军巡逻艇太少，无法进行严密监视。但是一种发给船只许可证的方法却提供了另一可供选择的制裁手段。（2）这种船只许可证乃是一项发给每艘遵守英国规章的船只的文件，它使这类船只享有使用世界各地在英国控制下的重要航运设施的权利，例如保险，进入干船坞和修理，供应燃料、淡水、补给品等等。如果某一船主试图偷运哪怕是一件没有航行证的货物，这家轮船公司的所有船只就都可能享受不到上述种种便利。（3）对其余的毗邻的中立国实行定量配给制是对强制实行航行证制度的一种必要的补充。它不仅必须确保私人的进口货不会运往敌方，而且必须做到每一个毗邻中立国的全部进口不致积累到招致德国侵略的程度。因此，发给航行证的范围只限于以中立国的进口量足敷国内需要为度。定量配给计划是以每季度进口限额为基础的。起初，不得不多少有些武断地做出规定，但是随后通过谈判，经济作战部得以对这些计划作了一些调整，以适应中立国的真正需要。同时，还必须在各个出口国中间公平地分配这项全球的限额。

虽然美国政府在 1940 年夏已准备协助推行这些措施，但他们还是不能很

快行动，一直等到日本在 1941 年 12 月袭击珍珠港后，这项管制货源的制度才最终得到实现。它所以这样，有下列几个原因：国内的政治局势，使它必须避免任何指责，说政府是在向德国或日本寻衅；华盛顿没有一个政府机构来执行经济战的政策；政府对供应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战时禁运品问题的兴趣。由于上述这些原因，经济战对美国人说来意味着经济防卫，而货源管制则主要和公开地被视为是一种替美国重整军备保存供应物资的手段，而不是一种剥夺德国和日本的侵略武器的手段。当然，这两个目的一般是不矛盾的，而且英国对物资供应的需要也由于美国的资源保护与物资储存计划而得到满足。但是，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即美国的供应丰富的商品（如石油、棉花）恰恰是轴心国所大大需要的；碰到这种情况，美国政府起先并不准备拒发出口许可证以禁止出口，虽然它也不反对驻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拒发航行证。因此，经济作战部（1940—1941 年冬季）很想使美国发放出口证的安排能同作战部自己正在通过颁发航行证来执行的管理制度完全取得一致，并说服美国国务院对美国其他各种可能仍对敌人有用的经济资源实行直接和全面的管制。

1940 年 7 月 2 日，美国国防法案授权总统禁止或削减下列各项物资的出口：军事装备、军需品、机器、工具以及“为它们的制造，维修和操作”所需的材料。发布了一张列有必须领取出口许可证的物品的长长的单子，但这张单子仍有一些重要物资例外（如棉花、一切石油产 23 品、铜、镍、锌和废金属）。自然也不能因此而认为凡列入单子的货物便拒不发出口许可证了。国务院立刻强烈地意识到控制对欧洲的石油供应的重要性，而且它能够通过限制挂有美国国旗的租用油船，按照英国的定量计划来管理对伊比利亚半岛的供应。7 月 26 日，出口许可证的单子上又增加了航空汽油、铁和废钢，但是，由于美国不准备在这个阶段保证荷属东印度群岛不会遭到日本的侵略或保证禁止对日本的石油出口（除了航空汽油），因此美国不能在太平洋施行任何有效的管制。有关远东方面的这些问题将在下面作更详细的讨论。10 月 16 日，又禁止了铁和废钢的出口，并在以后的六个月中，直到 1941 年 4 月 15 日止，出口许可证的货单又逐渐有所扩大。此时，又有五十一个项目被列入管制范围，只有小麦、棉花、鞣皮原料和石油等（润滑油和航空汽油除外），在英国禁运单上的重要项目中，仍不在管制之列。到了这个阶段，情况似乎很清楚，在美国出口许可证货单上，有许多项目并不是因为供应短缺，而是为了经济战的目的被加上去了。然而，美国政府在支援英国上所奉行的政策，确实还是出于防务和供应方面的考虑（最终导致 1941 年 3 月的租借法案），而只不过附带地符合了封锁的利益。这在同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直到珍珠港被袭击为止的整个时期内，国务院一直反对英国海军在加勒比海拦截战时禁运品，并且在一些事件中，特别是 1940 年 11 月的“西克拉·坎波斯”号事件中，美国支持巴西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政府对英国试图阻止德国向它们输入军火和机器所提的抗议。这并不是由于对德国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0—1941 年》，第 474 页。

同上书，第 475—476 页。

同上书，第 477 页。

见下文：原著第 41—52 页。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0—1941 年》，第 479—480 页。

出口商有何感情，而是由于坚信封锁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本半球的友谊和防务的利益。但是，这样一个时刻正在到来：美国充分动员一切防务上所需的资源，将自动地保证对货源的全面管制，并消除美国对英国的经济战计划所设置的种种障碍。1941年2月17日，国务院探询了阿根廷、乌拉圭、巴西、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政府的意见，是否愿意参与共同制订一些范围广泛的措施，以防止出现可能损害英国的作战努力的任何禁运品的走漏。它还要求这五国政府提供运往非洲、日本和日本控制的港口及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所有禁运品和半禁运品的具体情况，并在假定他们完全支持美国的尽一切可能帮助英国的计划的前提下要求他们对有关商品的出口进行管制。为了不使他们在财政上蒙受损失，美国政府将收购由此而造成的所有剩余物资。他们的答复一般是赞同的。于是，在1941年余下的日子里美国开始从事一项庞大的采购计划，这个计划按它最后完成的形式来看，就是要通过先买权的办法解决不让供应品运往轴心国和日本的问题。1941年3月，英国政府委派N·F·霍尔以大臣级身份驻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负责处理经济战问题。接着在4月份，英美两国官员就经济战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1941年初夏，美国政府已在精心筹划设立一个新的政府机构来掌管经济战政策。1941年5月14日签订的美巴协定，就是关于在拉丁美洲进行预防性（即先买权）采购所签订的一系列协定的一个样板。6月20日，所有石油产品终于都必须领取出口许可证了。6月14日总统下令，冻结了所有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的资产。虽然大部分敌人的资金都已流出美国，但是，这一新措施有助于英国用来作为加紧他们自己的财政封锁的一种手段，而且，这也公开显示了美国当局对管制外国资金作为货源管制的进一步手段的重视。美国政府在7月17日公布一份黑名单——“经宣布的一些被冻结资金侨民名单”。7月25日，对日本人资产的冻结，大大地扩展了这项政策。7月31日建立了迄今未有的经济保卫局，这是一个负责主管所有经济战问题的政府部门。

这种用开列名单方法管制外国资金的制度，证明了它是美国在1941年12月参战前后所进行的经济战中（按这个词在英国方面的意义）的一项主要武器。1941年秋，在同日本打交道的过程中，它的效用充分显示出来了。此项制度在日本袭击珍珠港后由于在国外采取预防性采购和在国内实施出口许可证制而得到了加强。前者构成控制稀有金属在非轴心国世界销售的一项广泛的措施。“经济战”（或者珍珠港被袭击前所称的“经济防卫”）比之英国官方的用法有着广泛得多的意义；新设的保卫局奉命负责一切战时的特殊经济活动，因此它包括封锁和供应两种职能，而这些职能在伦敦是由不同部门分别负责的。由于保卫局同拉丁美洲和欧洲在地理和政治环境上的关系，使得这种计划便于执行，甚至是必要的。再从封锁的角度看来，这项制度还有另外的好处，它无需进行拦截和海上搜索就可建立一项管制禁运品的广泛措施。而拦截和搜索，对美国说来，仍是一个微妙的政治问题。许多美国官员认为美国已找到了进行经济战的一项新技术，它解决了在传统的封锁和制裁机构中的许多老毛病。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来确系事实；英国政府本身把货源管制看作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在欧洲海域上的禁运品管制。但是，美国官员们往往忘记了英国皇家海军仍掌握着海上控制的最后制裁权，因而中立国继续向英国当局表示对于封锁的不满。

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1—1942年》，第752—756页。

第四节 欧洲的经济战

(1940年6月—1941年12月)

当时，这个斗争仍在欧洲继续进行。英国改进了货源管制的安排，使它得以加紧其定量配给计划，但是还必须在封锁区内减少补给品流向德国战争机器，而且必须发现并利用敌人当前的、特殊的经济匮乏情况。1940年秋，伦敦政界有人怀疑是否真正存在这种匮乏情况。一些经济作战部的批评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德国最近取得的胜利难道还没有加强它的经济地位足以使得盟国整个经济攻势付诸东流了吗？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经济战仍然以这样一种主要的设想为依据而进行着，即德国最近的胜利仅使它在十二个月里摆脱了据信它在1940年春就陷入的严重困境。1940年4月到6月势如破竹的胜利，使得德国方面愈加过分自信，并产生了一种依然满足于大伐第一年较低的军备产量的倾向。这使英国对德国资源的估计有些被弄糊涂了。法国战役后，占德国整个军需品产值百分之四十的弹药生产下降了，虽然在其他方面（如坦克和潜艇制造方面）略有增长，但是，1940年的军需品总产量与1939年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增长。德国仍不打算扩大基础工业，以保证装备和军需品的大量生产，在几种军火的产量上——如飞机与坦克，德国的产量在1940年、1941年和1942年都比英国要低一些。因此，英国很容易对此产生误解，认为德国的生产与储存数字较低的现象，并不是德国的自满，而是封锁日益见效的标志。实际上，英国仍然想象德国正与他们自己一样，在同样加紧堆武装军队。

然而，在德国人看来，他们有许多值得乐观的理由：现有的德国军队肯定能轻而易举地击退英国的登陆，他们也相信再发动一次声势浩大的突然袭击就可以很快地摧毁俄国军队，只要届时实行这样一种进攻是有必要的话。德国已经控制了被征服国家中有价值的物资储备，并且使用了外国的劳动力、工业和自然资源。它在波兰和法国的迅速的胜利已使其补给品供应不致受到严重的侵扰。1939年9月到1940年6月，德国陆军和空军在战斗中所消耗的石油量总计仅约六十五万五千吨（十五万五千吨用于波兰战役）。但是，1940年新掳获的库存石油则在一百五十万到二百万吨之间。其他的战利品包括大量的废铜烂铁。在挪威的胜利更挫败了盟国对瑞典向德国供应矿砂进行任何干扰的机会。这样，随着控制了卢森堡和洛林的矿藏，德国现在可以全力开动其钢铁工业了。法国和比利时的煤矿及矿工将会解决煤的任何不足问题（这一点无论如何英国人是估计过高了）。锡、铜以及橡胶方面的短缺似乎由于新掳获的储存而有所缓和。德国在利用巴尔干半岛的资源——罗马尼亚的石油，南斯拉夫的银、铜和锡，以及希腊的铬和橄榄油方面也处于有利的地位。但是经济作战部相信德国在解决它在钨、铬、镍、铝等合金方面将告匮乏的问题方面只掌握了临时补救的办法。要是德国采取怀柔政策，供养与控制大批被征服的人民，就会耗尽它的资源；要是它采用镇压手段，那就会让军队背上日益加重的负担。而如果能够阻止它通过地中海运输石油，它就不能充分利用罗马尼亚的资源；飞机轰炸工业周标也可能使德国在生产、士气与运输方面所受的压力有增无已。预计不出一年，棉花、羊毛、天然橡胶、某些保健食品和有色金属等这些在封锁区以内得不到供应的商品便会出现严重的匮乏现象。根据这种明显的情况，尽管德国取得了胜利，一般认为继续进行封锁还是有益的。虽然新的禁运品管制措施足以对付海外物资流入对方，但在欧洲的主要斗争则是要阻止土产品从现存的“毗邻中立

国”和不再是交战国的法国流进意大利和德国。总的说来这场斗争是失败了。最后到 1941 年春，在巴尔干占有的地位也丧失了，几乎无法制止苏俄和维希法国的出口，而瑞典、葡萄牙和瑞士都增加了他们的对德输出，西班牙之所以未能这样做，只是因为它国内的需要非常紧迫。尽管如此，货源管制这种努力是值得的，它至少为在以后战争中进行更有效的控制打下了基础。

德国和英国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影响差不多是势均力敌的，因此这里经历了经济战中一些最尖锐的斗争。法国陷落后，伊比利亚半岛为英国在欧洲实行禁运品管制提供了剩下的最好机会，然而也为德国物资从此处进出口提供了最方便的渠道。结果不得不对西班牙和葡萄牙实行严格的定量配给，有几种商品往往要经过持久的，有时是很激烈的讨论，才能就每一国家可被允许保有的储存量和进口限额的问题达成协议。1940 年 9 月 7 日和 1941 年 2 月 7 日分别与西班牙和葡萄牙商定了石油的进口数量。但是，当英国人在 1941 年 1 月试图对西班牙进口食用植物油实行禁运借以制止它向德国、意大利出口橄榄油时，他们失败了；因为西班牙人继续在出口，而且在 1941 年春，由于伤寒病流行，只得允许进口植物油以充制造肥皂与油漆的原料。在葡萄牙，出现了一个持久的僵局，因为葡方坚持主张里斯本这个自由港的存货以及葡属殖民地的产品进口不应受英国的定额限制：1941 年 1 月，就这一问题所签订的一项“君子协定”证明是漏洞百出的，葡萄牙逾量出口导致英国在整个战争期间不时地削减某些商品伪定额，以资报复。

但是，在 1940 年到 1941 年间的冬天，英国政府最明显的特征是它的“有条件援助”西班牙经济的计划。虽然它不时利用这个计划来限制西班牙对德出口的某些特定商品，但它的真正意义却在于要使西班牙放弃依赖轴心国经济的一种长期打算。1939 年 4 月，西班牙在内战结束后，在经济上已消耗殆尽；那时轴心国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他们迫不及待地把西班牙的物资匮乏全部归罪于封锁。德国准备按它自己规定的条件来供应西班牙的需要。英国的政策是以 1940 年 3 月 18 日所签订的一组协定为基础的，这些协定规定西班牙要为同英镑区贸易筹措资金以及偿还积欠联合正国的债务。西班牙政府得到了一笔二百万英镑的贷款，以供其在英镑区的花费，并保证凡是西班牙进口的较重要物资不再出口。由于马德里存在着敌对势力，这些协定有好几个月无法落实。但是，到了 1940 年 8 月底以后西班牙动用了那笔贷款，实际上到 10 月底，已经把它用光了。10 月 23 日，佛朗哥同希特勒在昂代举行会谈，这时，英国驻马德里大使馆向西班牙当局就他们今后六个月的需要提出了估计。结果，西班牙在 11 月 13 日紧急请求英国至少再提供二百五十万英镑的贷款。这些贷款英国在 12 月 1 日都答应了，经济作战部还答应在以后十二个月里为西班牙进口达一百万吨的小麦签发航行证。尽管西班牙商业部长卡塞列尔谋求充分利用英国的援助，可是外交部长塞拉诺·苏内却竭力从中作梗，一再拖延，一直到 1941 年 4 月 7 日才签署该项借款协定，他并以

见下文，原著第 288 页。

见下文，原著第 290 页。

见下文，原著第 64 页。

见下文，原著第 265 页。

见英国外交部：《联合王国政府与西班牙政府之间的补充贷款协定，马德里，1941 年 7 月》（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Supplementary Loan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一种乖戾的态度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阻挠了美国的援助。但是英国不顾长枪党徒的恶意拒绝，仍继续帮助供应西班牙之所需，后者不仅在小麦方面，而且在棉花、煤和橡胶方面无不紧张万分。看来英国经济援助的现实毫无疑问地进一步使佛朗哥将军倾向于抵制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种种要求。1941年春天以后，英国当局一直在购买愈来愈多的西班牙铁矿砂、黄铁、汞、钾碱和其他物资，西班牙因而积累了大量英镑，没有必要再向英国要求贷款。因此今后的问题是如何获得与西班牙可能需要的“短缺”商品同样有用的西班牙产品。

葡萄牙的地位显然很微妙：亲盟国的感情是强烈的，在战时情况下，它更加依赖英国这个供应它所需进口物资的主要来源地，但是同西班牙保持密切关系也是萨拉查博士的主要目的。在战争的第一个冬天里，他不准备与盟国签订战时贸易协定，甚至也不准备建立出口许可证制度。但是，他能够并且也愿意促成英国对西班牙实施有控制的援助政策，并相互合作于1940年7月24日缔结了一项协定。根据这项协定，葡属殖民地的产品供应西班牙，以换取可从英西汇划结算中得到信贷的好处。接着在1940年10月缔结了英葡支付协定，根据该协定，葡方同意在战争期间将埃斯库多交由英国按照英镑的比价处理。这里不妨提一下，瑞典与瑞士只愿以黄金作比价出售他们的货币，而黄金正是这个阶段中英国迅速在下降的资产。到战争结束时，葡萄牙的结余已积累约达八千万英镑，而它手头并没有德国或意大利的货币。这项有利的协定，在战争的其余时期里，对英国筹措资金用以优先购买葡萄牙的货物说来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瑞士处于轴心国与维希法国的领土包围之中，完全可以看作是毫无希望的了：但是英国人在1940年9月作了决定，只要瑞士政府保持任何程度的中立，就应鼓励他们同西方保持接触。这时瑞士的一个专家凯勒教授来到伦敦，那年冬季协商制定了瑞士的进口定额。为了防止囤积大量润滑油、纺织品、粮食、铝、锌、锡、汞以及铁合金原料，对其进口货作了调整；用于制造炸药的原料，特殊合金钢、皮革和鞣皮用料，以及其他用于德国战争机器的货物，都一概禁止进口。同时答应瑞士，英国会尽一切努力使它能收到根据商定的定额允许给它的东西；然而，由于航运上的困难，未能始终做到这点。

1940年到1941年间的冬季里，德国使英国在巴尔干地区的经济计划终止了。英国想尽办法把七十五艘船从多瑙河撤到了伊斯坦布尔，并在保加利亚以先买权买到了一些东西，而且安全地运出。直到1941年4月，南斯拉夫的矿产供应，主要是铬铁和铬精，继续根据英南矿产议定书从萨洛尼卡用船运出。现在巴尔干国家中只剩希腊被看作有希望进行经济战的战场了；它的地理位置以及它的庞大商船队容易获得海外资源供应，这些条件加强了这样一种希望：它将会有决心，而英国也将向它提供经济上的援助，来使它能够顶住德国的经济压力。因此，在1940年8月到9月间，希腊处于两面夹攻之中。英国人在8月20日提出购买希腊的铬和镁产品，及其大部分的葡萄干、淡黄色无核小葡萄干和橄榄油作物；9月他们提出愿在战时贸易协定以外再

Spanish Government Madrid, April 7, 1941), 敕令第 6267 号 (伦敦, 英王陛下文书局, 1941 年版)。

葡萄牙货币名称。——译者

见下文, 原著第 217—218 页。

购买价值一百五十万英镑的希腊烟草，假若他们限制对德国销售的话。与此同 30 时，希德谈判正在柏林进行；按照 9 月 20 日达成的一个协定，希腊答应供应德国数量较多的橄榄油与铬（一万七千五百吨而不是以前的两千吨）。但是，由于意大利在 1940 年 10 月 28 日的进攻，形势改变了；希腊作为一个参战的盟国，那么无论它需要什么作战物资就得供应它什么，虽然一般认为，让它囤积超过其眼前形势所应有的主要原料库存是不妥当的。

土耳其也处于两面的很大压力之下，如果说英国人坚持住了，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是受到一些震惊的。由于巴尔干半岛已在德国人的统治之下，所以，作为联合王国的非交战盟国的土耳其，完全有理由感到恐惧的。到了 1941 年 5 月，希腊人停止了抵抗，德国军队兵临土耳其的欧洲边境。而在战争的第一个冬天里，来自德国和意大利的威胁还比较远，当时，土耳其政府采取了一个重大的步骤，企图使自己摆脱对德国的依赖，可是德国早在三十年代就已对土耳其的经济具有巨大的影响。土耳其拒绝签订那个在 1931 年 8 月 31 日期满的土德贸易条约，而且似乎情愿赞成英国经济作战部的要求，包括限制对德国供应土耳其产品。然而，作为交换条件，土耳其当局希望法国和英国购买它的剩余商品，并供给它迄今一直由德国供应或答应供应的武器。结果是进行了一段时期的激烈的讨价还价，因为土耳其方面明白表示，如果从盟国那里得不到满意的条件，就要同德国恢复贸易。1941 年 1 月 8 日，在巴黎签订了一批协定。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协定是盟国有权按当时伦敦五金交易所的定价购买土耳其所有的铬出口品，为期两年。另外还签订了一项在战争时间购买“干果”的协定。企图进一步控制对德国有用的土耳其商品（鞣革用的壳斗、橄榄油、羊毛、棉花和山羊毛）的努力在后来的六个月中几乎毫无进展。与此同时，土耳其在 7 月 25 日同德国议订了一项新的贸易和支付协定。这项协定的确效期为一年；土耳其对德国与德国对土耳其的出口值都定为二千一百四十万土耳其镑，此外土耳其还作了一些附带的让步，出口数值据信因此提高到三千一百万土耳其镑以上（即超过六百万英镑）。另外订有一些复杂的条款，保证双方的出口都按特定的等量商品进行交换，但是，一般说来，土耳其的出口商品包括大麦、橄榄油、油菜籽、山羊毛、棉花、壳斗、烟草、干果、葡萄干和无花果；德国则供应土耳其三十九节火车头、铁路货车、浮桥、工厂设备、备件和装置、卷烟纸和药品。铬铁矿石没有包括在这项贸易之内，但是，情况已经很清楚，各盟国政府把 1940 年 1 月签订的铬协定限期二年，应该说是目光短浅了。象西班牙和希腊一样，土耳其显然是英国进行“有条件援助”的一个适当场所。1940 年 7 月，英国又向土耳其政府提出一个广泛的计划来购买土耳其的产品，并向土耳其供应产品。为了抵制德国的经济影响，还在 1940 年 11 月 22 日同土耳其缔结了一项新的金融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土耳其在英国的采购中至少可以得到百分之十的黄金付款；此外，虽然给土耳其制订了其定量限额，但是，这些限额将不予严格执行。在这年冬季土耳其大大提高了铬的卖价（铬正是德国需要的，以此作为向土耳其提供其极需的军备的交换条件）。双方还在其他物品上进行了长期的谈判。到了 1941 年夏天，当土耳其停止发布官方的进出口数字时，人们便有了可能对英国所作的努力的成效作出估计。1940 年 7 月到 1941 年 6 月这十二个月期间，联合王国已取代了德国而成为土耳其的最大市场和供应者。德国在土耳其的贸易中所占比重已从战前的约百分之五十下降到约百分之十。但是，它同德国近邻的瑞士、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国的贸易却有了可

疑的增加。在 1941 年 10 月 9 月签订的克洛迪乌斯协定中，德国和土耳其同意双方在今后十八个月中相互交付价值一亿里拉的各种商品，并在 1943 年与 1944 年交换铬和军需物资。然而，土耳其想从德国得到大量供应品的希望，到该年年底便开始渐趋渺茫了。但是，虽然英国可以声称它的政策在限制德国经济向地中海国家渗透的斗争中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它还是不得不承认，它在堵塞封锁的两个最大漏洞（通过维希法国和苏俄的运输渠道）方面几乎是完全失败的。被征服的法国经历了两个政府的统治。为了封锁的目的，毫无疑问在德国直接管辖下的哪一部分应该被认为是敌方领土；但在贝当元帅为首的维希政府统治下的未被占领的法国地区，其确切地位如何，在某些方面就有人怀疑了。这种地位是很微妙的，原因不止一端。维希政府仍旧控制着一支相当大的海军和西北“非洲帝国”（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法属摩洛哥和法属西非），而这正是在皇家海军抽不出舰只去截断法属北非一些港口和马赛港之间的交通的时候；再者，法国的情况又给美国运送粮食“救济”³² 欧洲的宣传运动提供了素材。这种救济运动虽然表现了其支持者的真正人道主义精神，但是，如果要取得成功的话，就难免也要在物质上充实轴心国的经济资源。

1940 年 8 月 26 日，丘吉尔对下院的一项声明阐明了英国政府对救济问题的政策。丘吉尔在指出德国官方一再声称他们拥有充分的粮食储备能够养活它控制下的人民等活之后，他辩驳说，在现时和即将来临的冬季中，可能在欧洲任何地方造成饥荒的仅有的因素只能是德国的压榨勒索，或者是德国不将它所掌握的生活必需品分配出去。何况还有许多宝贵的食品是制造重要的作战物资所必不可少的。脂肪用来制造炸药，土豆用于提炼汽油用的酒精，大量用于制造飞机的塑料都是用牛奶做出来的。希特勒必须对此承担全部的责任。因此，决不应该让救济这些人民的粮食通过封锁线。但是，英国政府为了迅速向已经重新获得自由的任何国家的人民（包括那些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在内）供给粮食，将尽最大努力事先作好安排。这个声明不仅为英国在战争后期实行定量限额的政策（虽然还得作出一些让步）提供基础，而且它还要求中立国和盟国积累生活必需品。这项政策还有更为直接的目的，即为了平息因封锁而受损害的出口商的不满，以及为将由联总在战后进行的救济工作做好准备。至今只在波兰试行过这项救济工作，在那儿有两个美国组织（美国红十字会和赫伯特·胡佛的“波兰救济委员会”）输入了一些必需品。可是美国人这些努力，到 1940 年 6 月初就告停止，因为德国政府不肯再为这项工作提供各种方便。随着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国以及稍后的巴尔干诸国相继沦于轴心国的统治之下，要求通过封锁线运送食品的呼吁又重新提出来了，并有所扩大。美国政府大体上接受了英国的这种观点，即应由德国和意大利承担养活被征服的人民的义务，但是它又明确地认为，对于维希法国应当多少作为例外看待。

美国政府的上述观点，逻辑上是由于它相信贝当元帅的政府还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真正独立，而这种独立可以由美国表示同情而加以促进。同时英国政府也得到维希的暗示：法国最后可能重新参战。于是华盛顿和伦敦不久就与维希政府进行了多次秘密的商讨和谈判，这些³³ 谈判一直持续到美国参

下院辩论（H.C.Deb.），第 5 辑，第 364 卷，第 1162 栏。

战。有关他们在政治方面的讨论不属于本章叙述的范围。但是必须指出，谈判中自始至终多少都有过这样迫切的要求，即把经济援助作为增强和维持法国未被占领区人民士气的一种手段，因此也作为最后在政治上援助盟国的一种报酬。1940年8月底，罗斯福总统对洛西恩勋爵（当时英国驻华盛顿的大使）表示完全反对向被占领区运送救济品，但他坚决赞成在美国监督下组织美国的力量向未被占领区的法国的儿童提供药品和牛奶。但是，9月1日美国盖洛普民意测验作出了一次决定性的表决，62%反对用美国船只运送粮食给法国、荷兰和比利时。总统答应不经同英国政府磋商，不采取行动。

在伦敦，反对运送美国供应品给法国未被占领区的主张，似乎是强有力的，政府并不相信为儿童象征性地进口少量牛奶会使维希摆脱对轴心国的依赖。1940年12月31日丘吉尔曾向贝当提出一个秘密建议，表示如果法国政府决定到法属北非去继续战争的话，英国就将向那里派去一支强大的盟国军队相助，但这始终没有得到答复。对法国未被占领区的封锁，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因皇家海军既不能向地中海调遣舰只，也不愿在地中海以外惹事生非。1940年7月至12月，有七十万吨货物经直布罗陀海峡驶往法国本土各港口，约三十二万五千吨的法国出口物资经海峡运出。确实，法国政府似乎感激英国，因为他们以为英国在对法国进行封锁时是有意从宽的。多方面的报告使经济作战部确信，输入马赛的粮食中有很大部分（通常的数字为百分之八十）都流入了德国和意大利。封锁的漏洞如此之大，以致德国能够动用所有可用的法国船只，从法属西非获得足够的油菜籽，以解除德国严重缺油的困境。总之，由于法国未被占领区³⁴非得要从占领区进口。维希政府就不得不听命于巴黎的德国经济参谋部作出的决定。

然而，美国政府经过在国务院长时间的讨论后，于1941年1月决定增加对法国的援助。对法国未被占领区的物品供应将维持在一个小规模的水平上。但是，将对法属北非提出一个限量供应的协议，根据这个协议，在法国保证不再重新出口的条件下，向它提供石油、食糖和其他主要商品。英国政府几个星期来一直坚持要实行一个限制严得多的计划，把维持居民生活同维持当时已成为德国供应来源的法属北非的基本生产率区别开来。来自法国未

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Survey for 1939—1946: Hitler's Europe*），第361—364页，第461—463页。

见温斯顿·S·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Winston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伦敦，卡斯尔，1949年版，第2卷，第550—551页；波士顿，霍顿，米夫林，1949年版，第2卷，第624—625页。（这部著作以后引用时简称丘吉尔，第1卷，第2卷等，并注明英美两种版本的页码。）

威廉·L·兰格：《我们对维希的孤注一掷》（*William L. Langer: Our Vichy Gamble*），第127—128页，纽约，诺夫，1947年版，简略提到美国供应法国未被占领区的情况，而在以后几页中比较详细地谈到供应法属北非的情况。卡尔·布兰特等著的《法国占领区及其他欧洲要塞地区的农业与粮食管理》（*Karl Bramdt and Others: Management of Agriculture and Food in the German-occupied and Other Areas of Fortress Europe*，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一书中几乎只是（第26章）提到法国本土而不知道还有美国的救济计划。乙砂二·

格札维埃·德·波旁亲王：《1940年12月法英的秘密协议》（*Prince Xavier de Bourbon: Les Accords secrets franco-anglais de décembre 1940*），巴黎，普隆，1949年版。兰格（前引书，第89页）和科德尔·赫尔（《回忆录》，共二卷，纽约，麦克米伦，1948年版；伦敦，霍顿—斯托顿，1948年版，第1卷，第885页）似乎还不知道英国已无力实行封锁。

被占领区的报告说，严重的粮食危机迫在眉睫，接着在 1941 年 1 月，法国请求给从南北美洲运来六十万吨小麦和二十万吨玉米发放航行证。1941 年 1 月初，罗斯福总统决定供给维希法国药品，浓缩维生素和牛奶，并在 2 月底送去了两船小麦。就在这时，英国估计，1940 年 10 月 1 日以来已有一百七十五万吨货物在马赛起卸，包括足以供应德国和奥地利制造六个月定量的人造奶油的花生。1941 年 2 月 26 日美国代表罗伯特·墨菲同法国的北非总代表魏刚将军签订了一项协议，法方保证不将从美国进口的物资在北非重新出口。鉴于美国政府态度确实诚恳，英国就让步了，并于 1941 年 4 月开始在华盛顿就 1941 年到 1942 年中供应北非有价值的物资的一项定量限额协议进行了谈判。但是，不重新出口的保证并未得到遵守。偶尔有一些货物（包括小麦）运往法国，但由于德国在 1941 年 8 月发放了已征用的小麦，法国所需要的主要物品得到了供应。

从苏联和通过苏联领土运往德国的补给品，形成了一个甚至更大的“封锁漏洞”。盟国在 1940 年 4 月到 6 月的军事惨败，一方面勾销了他们对苏联施加有效压力以减少这种经济援助的希望，但另一方面也增强了他们的这种希望，认为苏联也许会感到必须加强对德国的抵抗。因此，英国政府很愿意对苏联大使迈斯基在 1940 年 3 月 17 日的暗示作出反应，苏联大使说他的政府现在准备考虑上一年秋天英国提出订立一个贸易协定的建议。英国起先打算只派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去莫斯科商谈 35 这个协定，但是因为苏联政府对英国大使威廉·西兹爵士长期离任（他从 1 月份开始一直留在伦敦）表示反感，所以决定让克里普斯爵士继任英国驻苏大使。4、5 月份的初步谈判表明，苏联当局并不准备签订一项超过物物交换范围的协议，他们继续争辩说任何具有战争贸易协定性质的东西，都将有背中文原则。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准备在任何方面变更他们同德国所签订的经济协议。不过，他们愿意答应不将英国输入的物资重新出口。这些条款于 5 月 21 日向全世界作了广播，克里普斯爵士的任命在 1940 年 6 月 4 日得到了苏联的同意。

英国政府并不认为根据这样一个协议，来自苏联的任何供应品会对他们本身的经济起任何重大的作用，他们只是希望，通过贸易商谈将有助于使两国政府保持一种友好的、或者至少是正常的接触这一有益的目的，从而可能最终导致达成一个政治性的协议。他们还希望至少可以稍微牵制住苏联的有价值原材料，使其不致流入德国。但谈判毫无结果。6 月 14 日和 7 月 6 日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先后都好象是要准备谈判，但是，7 月份过去了，对克里普斯爵士的建议仍没有作出任何进一步的反应。8 月份，苏联发言人指出，英国当局禁止苏联接管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他们在 7 月 2 日已在表面上投票加入苏联）的黄金和船舶这一行动，是对谈判设置了障碍。8 月 23 日，苏联的《消息报》和其他报纸说，德国将继续得到它由于英国的封锁而需要的大量经济援助。在前一天，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 A·I·米高扬恰巧对英国大使提出订立一个有限的易货交易的建议（五千吨亚麻换橡胶）。10 月 16 日，他人提出订立一个更加扩大的“成批易货”的协议，包括用亚麻、润滑油、木材、铬铁矿石以及或许俄制的步枪交换英镑地区的橡胶、黄麻、

见《文件（皇家国际事务学会），1939—1946 年，第 2 卷，希特勒的欧洲》〔Documents (R.I.I.A.) for 1939—46〕，第 130—131 页。

见《概览，1939—1946 年：轴心国的初期胜利》，第 2 编，第 2 章。

羊毛和锡。在伦敦进行的讨论，早已明确了英国政府愿意缔结一个协议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要求苏联供应五万吨铬铁矿石以及英国所供应的货物不得重新出口。苏联的建议好象为大量购买铬铁矿石和润滑油展开了前景，虽然伦敦方面对于这些大量商品不改道运往德国并不抱任何真正的希望。尽管如此，英国还是于10月20日向米高扬提出了综合性的建议，但是没有得到答复。一再试图重开谈判的努力终告失败后，英国外交部授权克里普斯于1941年2月21日撤销这些建议。到了这时，克里普斯认识到若再一味“跟在苏联后面跑”，只能被看成是软弱。

苏联对英国的态度这样若即若离地冷淡下去，无疑部分是由于俄国人希望把苏英关系保持在一定限度而不再恶化下去，而且还可以利用这种关系同德国讨价还价。

波罗的海的问题看起来并没有构成真正的障碍；美国政府采取了同英国政府相似的行动，然而，苏联当局却愿意按对美国有利的条件，续订现有的苏—美商业协定。因为该协定使苏联可以得到铜和工作母机等主要供应品。事实上，英国政府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提供不出什么可以诱使俄国同德国决裂的东西。另一方面，苏—美协定却为苏联提供了价值六千万美元的货物。

此外，苏联政府也在十分慎重地考虑用经济援助的方法来安抚德国。苏联之所以在经济协定的各项细节上同德国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无疑地多少出之于官僚政治的传统，但也多少因为要故示强硬，其目的是要证明，即使斯大林是友好的，他也不是怯懦的；但是苏联不想帮助英国推行它的经济战计划，因为经济战计划本是英国前进的最终目标，所以俄国人不能不随声附和，就不足为奇了。苏联根据协定对德国交货无不是足数和及时的，虽然苏联是根据德国的交货情况而相应地交货，但苏联当局对德方的拖欠也决无视若无睹之意。在签订协定以前的谈判中，苏联坚持要定期结算双方交货帐目，并坚持要德国供应军火，已使德国人大为不满。总的协议是，苏联应在十八个月内交货，而德国则相应地在二十七个月内完成交货，但是，在一定的时间内（每隔六个月）将根据一定比例结算双方所交的货物。德国在每六个月结算时都发现自己有困难。双方在第一期结束时（1940年8月24日—9月21日）的谈判表明，德国拖欠了大约七千三百万马克应交的货；而俄国却已供应了价值三亿多马克的原料，包括价值大约一亿马克的谷物。这时，德国考虑到两种为难的选择。要么运交可能影响它自己的军火合同的货品，要么就得丧失俄国谷物、石油、棉花、有色金属和磷酸盐等的大量交货，于是不得不暂停谈判。戈林不久前又发布了一项禁止向苏联装运将会直接或间接增强苏联战争潜力的货物的新指令而使问题愈加复杂化了。因此，当谈判于

有关苏德经济谈判最完善的材料是德国外交部贸易政策司的卡尔·施努雷博士所作的一系列报告：见美国国务院：《德苏关系，1939-1941年：德国外交部档案文件》[Nazi-Soviet Relations, 1939-1941年：Documents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German Foreign Office]，以后简称为《德苏关系》，R.J.桑塔格(R. J. Sontag)与J.S.贝迪(J.S. Beddie)合编，国务院出版物第3023号（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8年版），主要是第119-120页，第131-134页，第153页，第197页，第199-201页，第339-341页。《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中也有施努雷在1939年9月4日至1940年3月15日这段时期的报告，以及这段时期内同谈判有关的其他文件。在《概览，1939-1946年：轴心国的初期胜利》，第6编，第1章，附录1中，有苏德经济谈判方面的记述。

1940年9月12日中断时，俄国人也就按照条约的规定暂停装运他们的货物。

看来在苏德重新恢复谈判后，出现过一段相当紧张的时期；11月2日，米高扬向施努雷抗议说，德国一方面不准备向苏联运送战争物资，一方面却在向芬兰运送战争物资。直到1941年1月10日才就第二期双方交货达成协议。德国所短交的货物部分以黄金偿付，部分（根据一份秘密协议）则以割让立陶宛来补偿，作价七百支十万元金元，其中八分之七的款子要由苏联政府从德国根据1941年1月10日经济协定应付苏联的黄金付款总额中扣除。施努雷曾在4月5日指出，起先苏方在执行这个协定的第三期（即1941年2月11日以后）条款时表现了明显的审慎态度，他认为这是由于苏联和德国政治关系逐渐趋于冷淡的缘故。但是，1941年3月的交货数量却又突飞猛进地上升了。德国并且获得了一项新的谷物契约，根据这个契约，到1941年9月苏联应运交一百四十万吨谷物；施努雷在4月5日满意地说，3月份已交付了十一万吨，5月15日又说，4月份已交付二十万八千吨，自年初以来一共支付六十三万二千吨。根据1941年7月英国大使馆所获悉的数字，在苏联保持中立时期，苏联交给德国的货物，有下表所列的各种项目。这些项目加上一系列次要商品，总计十四万六千一百零六吨（1939年9—12月），三百零三万二千八百三十吨（1940年）和一百三十六万二千二百六十九吨（1941年1—6月）。虽然经济作战部对苏联本国产品输入德国的数量的情报极其灵通，但它对之束手无策。同时，也有货物从中东和远东取道苏联国土运入德国，在这方面可以设法加以拦截，可是不很成功。1940年11月13日，克里普斯建议经济作战部停止和拒绝给那些申请运往表面目的地是苏联，而其实是德国所需要的商品签发航行证。1941年上半年这种政策是付诸实施的，但由于英国的禁运管制在太平洋不起作用，加上美国的反对使加勒比海地区又不受这种管制，所以英国简直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申请航行证都是出于自愿而且也不常有人申请。美国政府起先并不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大量的重要商品正经过苏联输往德国，不过，到了1941年5月，他们开始更加主动地合作了，对某些货物拒不发给出口许可证。战争以来德国公布的文件表明，横越西伯利亚的这条路线对德国输入价值高而体积较小的货物具有很大的价值。运往德国的货物经过大连进入满洲国，再从满洲国运到赤塔附近的干线；至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作为通往德国的运输线，并不象当时人们想象的利用得那么多。英国当局对这条路线的可能用途与其所受限制是作过正确估计的；它的运载量虽然有限，但是足以应付急迫的需要。据英国的估计，1940年运往德国的商品吨数，在十五万到二十万吨之间，实际是十六万六千二百四十二吨。但是，由于这条路线的总运载量可能超过六百万吨，因此，如果苏联愿意承受最后造成的货运拥塞，那么，他们是可以大大地增加调拨的数量；事实上根据苏联后来所发表的官方统计数字，在1941年头五个月里，就有二十一万二千三百六十六吨货物经过这条通道运往德国。下表列出一些主要项目：施努雷在5月15日满意地指出，德国在1941年4月由这条路线进

见《概览，1939—1946年：轴心国的初期胜利》，第6编，第1章，第3节。

原文见《德苏关系》，第267—268页。

同上书，第318—319页。

应为我东北三省，下同。——译者

见《德苏关系》，第340页。

口了四千吨生橡胶，其中二千吨是用专车，二千吨是用西伯利亚班车装运的。

德国于 1940 年 12 月 18 日把进攻苏联的日子订在 1941 年 5 月 15 日，而最终是在 6 月 22 日发动进攻，这从苏德经济交易的情形来看也许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按照 1940 年 2 月 11 日的协定，到 1941 年 5 月 15 日俄国的货物交付期限只剩下三个月了，而德国从 1941 年 8 月 11 日起却还有十五个月的交货期——假如照约履行的话——到那个时候俄国便将无货可交，这对德国说来遵守信用就不值一顾了。当然，德国进攻苏联还有其他更重大的理由。然而，看来很清楚德国不想再交货了；⁴⁰ 虽然很明显苏联政府不会因为德国不属行协定而就投入战争，但是可以设想俄国会拒绝再向德国交货。德国只得忍痛忍受丧失这些虽然并非不可少但是很有用的俄国货物，要不然，德国就得进行一场战争，试图用武力夺取这些货物。

第五节 远东的经济战

德国进攻苏联，对英国和德国的经济命运说来，可以说是同对他们的军事和政治命运几乎一样重要。当然，德国早日获得胜利，是会大大增强德国的经济的，但是，这点并没有做到；而且这一进攻给英国带来的直接利益，很快就表明决不是昙花一现的。最显著的利益是堵塞了封锁中存在于俄国的那个漏洞；第二，现在德国的军火工业和它所积存的物资在这次战争中第一次处于真正严重而持续的紧张状态；第三，德国这次的进攻，及其在远东的影响，终于使美国的政策逐渐演变为与英国的经济战斗计划进行全面的合作。这些有利的情势都是德国方面的错误所促成的。值得注意的有两点错误，这两点揭示了德国对他们的对俄政策的经济影响的错误认识。第一，德国严重地低估了在俄国战役中对军备生产的需求。1941 年德国的产量比 1940 年提高大约百分之一，1941 年秋，希特勒甚至感到有理由批准开始恢复原状，并随之减少军火的生产，因为他认为战争实际上已经取得了胜利。到了 1941 年 12 月德国人才开始持有一种比较悲观的看法。1942 年 2 月，任命阿尔伯特·施佩尔为军备军火部长，这标志着加强军备生产的开始。但是，在一些军火工业部门里，甚至花了一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才恢复到 1940—1941 年的水平；与此同时，在俄国战役中的需求却消耗了库存量的三分之二。第二个错误估计是在衣着方面。从理论上说来，德国大量生产的合成纤维是能够满足它全部衣着的需要的；但是，这些人造织物不暖和，不适宜于俄国酷寒的冬季。结果在 1941—1942 年的秋季和初冬，德国赶紧千方百计搜罗到一些供应品，这种狂热的努力由于羊毛和棉花的供应不足而加紧了。德国想在毗邻的中立国购买适宜的材料，可又碰上了盟国的竞购。翌年为了准备 1942—1943 年俄国冬季的到来，这种疯狂抢先购买的活动又重新开始了。

然而，1941 年下半年太平洋地区形势的发展，乃是德国进攻所引起的最显著的直接结果。由于 1940 年荷兰和法国的陷落，以及 1940 年春季苏德间的外交活动，日本得以腾出力量大举南下。这里不妨概述一下 1939 年 9 月

1941 年 5 月 15 日施努雷写道：“我们将不能遵守规定的较远的交货日期。但是既然俄国要到 8 月才解除其交货的义务，因此只有在 1941 年 8 月之后，德国方面不履行其约定条款才会被俄国发觉，因为直到那时为止，俄国有预先交货的义务”（《德苏关系》，第 340 页）。

见戴维·J·达林：《苏维埃俄国的外交政策，1939—1942 年》，（David J. Dallin: Soviet Russia's Foreign Policy, 1939—1942），利昂·登南（Leon Dennen）译，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42 年版，第 343—347 页，亦见《概览，1939—1946 年：轴心国的初期胜利》，第 8 编，第 3 章。

到袭击珍珠港之日，远东方面的经济战情况。

在 1937—1938 年的冬季，一度似乎有可能是日本，而不是德国或意大利将成为英国在不久将来的战争中的对手。1937 年 11 月的布鲁塞尔会议，未能就支持中国问题制定出集体安全的有力措施。12 月份，当日本军队在中国境内的进展已经严重地威胁到将与英国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帝国防务委员会发出指示，应该暂停制定对德经济战的计划，而制定出一个对付日本的类似计划来。由于苏台德危机，以及美国政府为避免卷入一场战争的危险而没有能力采取任何措施对日本施加经济压力，英国不敢采取任何大胆的行动；等到对德战争爆发后，显而易见，英国不应该再无缘无故地卷入远东的第二场战争。可是，日本却引起了两个只是部分有关联的问题：日本也许会趁此机会攻击英、法在远东的脆弱的经济利益和领土利益；它也许会寻求各种办法去帮助德国。凑巧在 1939 年 8 月 23 日签订了苏德条约，这使日本对德情绪发生突变。毫无疑问，因害怕加剧同苏俄的纠纷，日本人在中国继续作战的同时，似乎愿暂时避免同英、法、美发生麻烦，并且或许还希望能获得同两个欧洲交战国进行贸易的好处。英国政府非常乐意促成这一缓和，虽则它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对德禁运措施以及日本继续敌视英法在远东的利益，将阻碍任何真正友谊的建立。

再说，英日间的任何真正和解，都将是美国所不乐意接受的。整个三十年代，美国政府一直奉行一种审慎约束的反对日本在亚洲推进的政策，这项政策显然旨在迎合一部分美国舆论，而这种舆论既谴责日本的侵略，又反对为制止侵略所必须采取的积极措施。1937 年 9 月美国禁止官方船只运送武器或军火给中国和日本，但允许其他船只这样做。在 1939 年 7 月 1 日一封信中所阐明的道义上的禁运政策，似乎是阻止了那些可能有助于轰炸平民的飞机和航空设备的出口。但是，除此以外，美国的出口物资仍源源不断地涌进日本，而公众却很少有人支持采取其他施加经济压力的形式，而其中禁止日本生丝进口（日本生丝的百分之八十三输入美国），本来可以是最有效的一种。

从这时起到袭击珍珠港为止，摆在美国和英联邦成员国面前的基本问题是要决定能不能全面禁止这些国家向日本出口，而又不至于引起战争。在遏制日本的经济行动中，英国政府准备采取同美国一致的步调，但不超前。日本继续大部分靠英联邦和美国供应其出口和军火工业所需的原料，其中包括铁矿、有色金属、橡胶、原棉、羊毛、黄麻、石油和纸浆。日本的铜和石油，主要来自美国，其他有色金属、橡胶和纺织品则来自英联邦。它所需要的废铁大量依赖于美国供应；据了解它已经储备了数量可观的有色金属。

1938 年，德国曾从一些远东国家获得大量的重要物资。荷属东印度群岛为它提供油菜籽、干果、果仁（十四万六千五百十五吨），棕榈油（一万一千一百四十三吨，占德国总进口量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五）。西沙尔麻（一万三千一百八十七吨，占百分之二十七点六），镍（一方六千五百七十一吨，占百分之四十八点四），橡胶（三万五千九百零八吨，约占百分之三十一），

对美国 and 战前形势的最好的论述，通常要算赫伯特·菲斯所著的《通向珍珠港之路》（Herbert Feis：The Road to Pearl Harbor，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0 年版）一书中的第 1—6 章。

国务院给注册过的飞机制造商和出口商的一封信（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38—1939 年》，第 209—210 页）。

铁矾土（十九万二千八百二十九吨，占百分之十六点三），石油（十五万零八百十五吨，占百分之十点六）。它从中国获得花生油（一万八千七百七十七吨，占百分之九十四），桐油（七千二百九十三吨，占百分之九十九点七），钨（八千九百六十二吨，约占百分之六十三），锑，包括废料（二千六百二十三吨，约占百分之六十八），以及占百分比比较小的其他产品。但是，德国从日本的进口是无足轻重的——主要是一万一千吨菜豆和一万吨鱼油。另一方面，德国从满洲国进口的物资则多得多：大豆（三十五万吨是直接装运的，八十四万七千吨是经由埃及转运的），六万七千吨猪鬃，一万五千吨豆油，五千吨菱镁矿，以及其他产品。在战争爆发时，盟国判定，由于运到德国的物资绝大多数是从远东海运的，以通常的禁运办法就足以管制这些进口品；因而，暂时也不必与日本和有关各国就战时贸易协定进行谈判。盟国当时没有料到，许多物资将会由铁路经过西伯利亚运抵德国。可是，在1939年10月底以前，关于苏德协定的报道增加了这种可能性。即中国、日本和满洲国的货物，将会经过陆路一线运到德国。于是，关闭这条路线就成了英国接下来要同日本进行贸易会谈的主要目标了。

因此，同日本达成某种协议似乎是英国所希望的。但是，在这方面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日本既已在1939年7月同德国缔结了一项商业协定，那就很可能不愿地限制其对德国的供应，除非因此而能从英国换取它自己在战争中所需的大量物资。可是任何这样一种交易都将遭到美国的强烈抨击。英国外交部就象在和意大利同时进行的谈判中那样，急想达成一种正常的商业往来，以便缓和政治上的紧张局势，而且，英国外交部希望也能把经济战的目标塞进去，作为这一协定的附带好处。但是，这是异想天开而办不到的事，一个足够广泛、能博得日本人欢心的协定，会给美国人造成极其恶劣的印象，而一个不会引起美国惊慌的无害的协定，又一定不会使日本人满意。再者，美国政府在1939年12月好象准备执行一项更为坚决的政策。7月26日，他们宣布废除1911年与日本签订的贸易条约；这个条约需经过六个月后才失效。11月份，日本人暗示，他们打算在沿长江直至南京的国际贸易问题上作出一些让步，显然是想为续订这一条约铺平道路。但是，美国政府反而在12月份宣布扩大道义禁运政策，并邀请英国政府在钨、镍和其他某些金属问题上，同美国采取一致行动。翌年在华盛顿随之进行的英美谈判表明，美国政府还不准备与英国实行任何普遍或公开的合作来反对日本。但是，一个全面的英日贸易协定无疑将是美国所极不愿意接受的。44然而，1940年春，为了限制供应品经大连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输送到德国，曾作过有限的努力。这是发生在1940年3月中旬，盟国对俄国的态度一度强硬起来之后，并且也是因为受到下述这种猜测的影响，即认为2月11日俄德贸易协定是广泛利用横贯西伯利亚铁路向德国输入体积较小的重要物资（橡胶、铅、钨等等）的前奏。1940年3月14日，英国战时内阁同意把控制英联邦向日本供应产品作为一种手段，劝使日本政府限制向俄、德供应物资，并同意在远东水域拦截有装运违禁品嫌疑的任何船只。详细的商讨于5月14日在伦敦开始。6月17日以后，商讨就中止了；因为德国在6月份的胜利，在日本激起了极大的民族主义热潮，把按照大抵相等的条件签订贸易协定的一切可能性都一扫

又见《概览，1939-1946年：轴心国的初期胜利》，第8编，第2章，第1节。

同上书，第8编，第1章。

而光。关于要在太平洋上用海军拦截的办法来管制违禁品的计划，也一无结果；英国驻东京大使和英帝国各自治领政府都一致建议在对待日本船只的问题上要极端慎重。

关于购买中国钨所进行的一系列复杂的谈判也因为法国沦陷而停止了。大战前，中国曾向德国和俄国出售过钨，虽然在欧洲爆发战争后，中国向德国的出口已停止了，但是仍然存在着中国对俄国的出口物品可能再出口到德国的危险。这些出口品系经过法属印度支那、香港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运到俄国的。因此，法国就可以将其拦截下来，事实上法国确在 1939 年 12 月没收了三千吨锑和四千吨钨供自己用，这些矿产本来储存在印度支那，是打算运往俄国、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但是，英国和法国政府不希望剥夺中国一向用钨和其他出口品换取来自俄国的武器和军需品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要使反德政策和反日政策协调起来显然是困难的。但是，在 1939 年 12 月 14 日把俄国从国联中开除出去后，英国和法国一致同意（英国方面多少有点勉强）应设法切断运往俄德两国的钨的供应，而且对这些产品盟国应享有先买权。接着在 1940 年上半年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在这期间，中国政府对法国提出的金融条款及物物交换的建议显得并不热心，而法国则主要关心这项讨价还价。法国陷落后，英国政府就停止了谈判，因为他们的钨的供应已绰绰有余了。从经济观点来看，法国的沦陷使远东的局势发生了 45 一些重大的变化。这时，关于签订一项英日条约的一切希望都告吹了；一则因为英国不能再为日本进口那些可能会很快被用来反对同盟帝国的物资提供方便，二则也因为日本这方面认为没有理由要束缚自己的手脚。荷兰王国和它的资源现在已与英帝国联合起来反对德国了；另一方面，法兰西帝国只在暮气沉沉的维希政府中保留了一个独立主权的影子。从前所未见的危险中惊醒的美国政府，正处于一个调整的困难局面中，因而对“姑息”的谴责还没有改变成“对侵略的抵抗”；然而现在已很清楚，早期道义上的禁运政策对日本所造成的暂时的心理上的压力，已在美国重整军备的口实下成为对日本日益增长的经济抵制的压力，这种抵制活动只因为考虑到不应使它惹得日本人投入战争才有所节制。在欧洲的新形势下，唯独苏联政府在远东的关系方面似乎还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中国则还能顶得住。所以，在英国同意关闭滇缅公路三个月，从而使日本的民族主义激情平息下来之后，日本政府在试图利用这种新形势方面，表现出了相当的谨慎。日本政府只限于提出一些多少带有威胁的要求，要求在荷属东印度和法属印度支那给他们一些经济特权，这使得英美两国在限制对日本进口应达到何种程度才会对日本军国主义者起一种平息作用抑或反而起刺激作用这个问题上感到为难。英国的政策象以往一样，有双重目的，即既要限制对德国的供应，又要剥夺日本的侵略手段。荷兰和美国也赞同这种目的，虽然前者并不准备在没有英美的担保情况下暴露自己以致遭到日本的攻击，而后者则怀疑，或者表示怀疑是否真正存在着货物运往德国的严重漏洞。结果，直到 1941 年 6 月俄国参战，在反日政策上始终没有取得有效的协作。英国和荷兰政府的合作开始于 1940 年 5 月 10 日，也就是在德国进犯荷兰的那一天。驻伦敦的那些荷兰大臣接受了同盟帝国签发出口许可证的协作总方针。然 46 而，广泛的决定权却赋予了巴达维亚当局。为了管制出口，

H.J.范穆克[《荷属东印度和日本：它们的关系，1940—1941年》(H.J.vanMook:The Netherlands Indies and Japan:Their Relations, 1940—1941)，伦敦，艾伦-昂温，1944年版]就对这时起到 1941 年 12 月在巴达维

它只决定使用另一种销售登记的制度，而且无论如何也不打算在这时拒绝对日本的出口。日本方面在 1940 年 2 月 2 日曾建议签订一项新协定，以扩大同荷属东印度的贸易，但是，由于这个协定虽为荷兰进口货提供了市场，其结果却有助于扩大日本在东印度群岛的企业，因此，荷兰方面不急于作出答复。5 月 20 日，日本给在东京的荷兰公使递交了一份照会，要求荷属东印度每年向日本出口大量货物，其中包括锡（三千吨）、橡胶（二万吨）、矿物油（一百万吨）、铁矾土（二十万吨）、废铁（十万吨）、镍、矿砂、锰矿石、钨、铬矿石、盐类和钼。其中许多数字远远超过了可能达到的产量：例如，铝就很少发现。而且是从不出口的。据信其中一些货物之所以列入货单，只是为了阻止荷兰政府参加美国的道义禁运。荷兰的答复十分谨慎，并不拒绝讨论；因此一个由小林率领的声势浩大的日本代表团乘船到达巴达维亚，接着就从 9 月 16 日到 10 月 18 日同荷兰当局进行讨论。日本显然希望把荷属东印度变成它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属地。荷兰官员，特别是经济部长 H·J·范穆克博士采取耐心而坚定的态度，挫败了这个企图。于是缔结了一个石油新协定，日本只好暂时满足于此了。新签订的石油合同具有某种同 6 月签订的关闭滇缅公路的决定相同的特点；这些合同是有限的让步，目的是推迟更为苛刻的要求。美国政府起先不赞成这些合同，但是最后还是不得不勉强同意了。7 月，国务院认识到，由于美国物资充足，不可能根据国防法案禁止向日本出口石油，而且还认为，由于日本拥有相当可观的储备（据美国海军部估计有六千九百万桶石油，足够供日本舰队使用一年以上），即使英国、荷兰和美国的供应商对日本实施全面禁运也不会奏效。对英国政府和荷兰政府说来，这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在日本还有足够的物资从事一场战争，美国政府还不准备为英、荷提供军事援助的时候，全面禁止对日出口石油将不会使它陷于瘫痪，而相反更有可能引起它提前进攻几乎毫无防卫的英国和荷兰领地。7 月 31 日，根据国防法案，航空汽油及废钢铁（一 7 号重熔质）的输出只限于供给西半球国家。但是，日本有着相当充裕的废钢铁供应，而且它还能很自由地购买钢锭和轧制产品，这些产品的价格它确实发现比 1939 年以来最高级的废钢铁还要便宜。日本的航空用汽油，有三分之二依赖美国，禁运的结果只是增加了它对荷属东印度供应的要求。而一些美国公司正以国外（包括荷属东印度）的资源供应日本，这一事实使国务院的处境越发错综复杂了。

因此，荷兰政府最后同意大量增加对日本的石油输出，尽管最终的数目大大少于原来日本所提出的要求。日本在 1940 年 10 月 18 日接受的石油合同，规定年供应总量为一百九十五万六千公吨，而原来日本所要求的数目是三百七十五万公吨。小林特别使团没有取得另外什么重大的收获；12 月底，由芳泽谦吉率领的第二个特别使团的商谈不久也破裂了，直到 1941 年 2 月底才告恢复。此后，讨论一直持续到 1941 年 6 月 10 日，到这时，日本只得到了它原来计划中的很小一部分石油。

亚进行的谈判作了一番概述，但没有具体地提及在伦敦政府间的关系问题。

巴达维亚即现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译者

范穆克；前引书，第 29—63 页。

一桶（美制）等于 31.5 加仑。

范穆克，前引书，第 66—69 页。

荷兰政府主持了后来的谈判，这些谈判仍然是一项谨慎的全球禁运政策的组成部分，这是英内阁自 1949 年 10 月以来一直在追求的目标。9 月 26 日签订的三国公约，10 月 16 日美国对出口废钢铁的更广泛的禁运，滇缅公路的重新开放，日荷谈判的开始和不列颠之战的胜利结束，这一系列事件使英内阁得以着手进行一项更为果断的、但依然是审慎的政策。10 月 2 日，战时内阁一致认为，在现阶段美国如果卷入太平洋战争，对英国是不利的；但是如果美国终于卷入对日作战的话，那么，英国就将对日宣战。任命了以 R·A·巴特勒为主席的一个内阁委员会来贯彻执行中阁关于制订措施以便于抵抗日本和削弱日本战争潜力的政策。该委员会经济方面的工作主要由弗雷德里克·李滋-罗斯爵士主持的小组委员会负责，受命制定一项统一的控制对日贸易的帝国政策，并使其同美国和荷兰政府的政策协调起来。

上述各项计划均于 1940 年 10 月 19 日电告英帝国自治领和美国政府。不过，在这一阶段，还不可能把英联邦和美国的体制结合在一起，因为美国国务院虽已经完全禁止出口废钢铁和航空汽油，并对一些其他商品实行了道义禁运，但国务院暂时不准备走得更远，部分是因为总统竞选在即，部分是因为总统迄今尚未就赞成采取一项全面向日本施加经济压力的政策作出决定。英国的建议设想分两个阶段实施经济压力。第一阶段是把整个英帝国全部必需品包括一切原料的出口都置于出口许可证管制之下，并限制那些日本和轴心国短缺的必需品的出口，数量最多不得超过其正常贸易水平。英联邦国家已经把对旧出口的一些主要商品限制在战前的正常数字内，在这方面，它们都走在美国的前头，而美国似乎还在允许许多商品（如铜）不受限制地出口。第二阶段就是要更严厉地限制更重要的战略物资，但是，在这方面在没有取得美国的合作之前，英国和自治领政府不准备采取任何步骤。1940 年 11 月 4 日，科德尔·赫尔对英国驻华盛顿代办讲明：他的政府现阶段认为，英国应避免采取将会增加对日战争危险的任何政策。因此，尽管在以后的三个月里，英国计划的第一阶段措施在整个英联邦得到了贯彻，但是，并没有全面和迅速地实施各种禁运，因之就不能吓住日本，并不可能阻止其储存物资。另一方面，美国和英联邦国家对日本这种保留和不赞成的态度，使日本毫不怀疑它们对于它的对华政策和轴心国的友好本质上是抱敌视态度的。双方都面临着一种相同的困境：在技术上说来，中国战争与欧洲战争是不相干的，无论日本也好，英美两国集团也好，它们都宁可先结束一场战争然后再卷入另一场战争；但是双方都在争夺同样的原料供应，双方也都知道要在一个战场上取得胜利，需要集中经济力量，以破坏在另一战场上的交战国的胜利。日本不能不担心，万一轴心国在欧洲垮台了，日本最后得同英美两大国决一雌雄。因此谨慎地加强对日供应的经济限制与其说是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不如说是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就象以后的战争过程中所表明的那样，这项政策还不足以削弱日本战斗力，而在英美资源还是比较缺乏的时候，这项政策可能会起到促使日本决心干涉的一部分作用。到了 1941 年 3 月，美国逐渐扩大出口许可证的范围已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可是，完全禁止对日输出的也只是很少的几种。英国、自治领及荷兰政府，除了少数情况外，仍然在

关于美国的态度，见赫伯特·菲斯：《通向珍珠港之路》，第 135—144 页；威廉·L·兰格和 S·埃弗雷特·格利森：《不宣之战，1940—1941 年》（The Undeclared War, 1940—1941），纽约，哈珀对外关系委员会出版；伦敦，皇家国际事务学会，1953 年版，第 305 页。

执行着“正常贸易”的原则。但是，到了这时，正如松冈与希特勒会谈中所表明的那样，这位日本外相已经决定一有机会就进攻新加坡了。

在1941年4月到6月的第二阶段期间，国务院同英国和日本同时进行了商谈。虽然英国政府毫不怀疑美国政策的最终目的，但是，他们还是流露出一些不安情绪，唯恐日美对话会引起人们对“姑息”的责难。这些会谈开始于3月8日，会谈中日本大使野村曾对科德尔·赫尔作了带有几分征兆不祥的申明，他说，日本如果有什么进一步的军事行动的话，那将是美国实行进一步禁运的结果。赫尔争辩道，由于日本已经首先在中国采取了军事行动，因此解铃还须系铃人。赫尔的话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反应。而从日本方面于5月12日提交给赫尔的具体建议看来，日本显然只同意根据他们自己的条件结束中日战争，这些条件包括继续在中国领土上驻军，满洲国独立不受中国管辖，以及在获取日本所需的石油、橡胶、锡、镍和类似的自然资源方面，美国应给予合作。总之，日本想要得到真正胜利的果实，看来从不存在同美国达成协议的真正基础。3月3日，赫尔同意英美专家应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找出办法来把日本和俄国的供应限制在正常和平时期的水平：关于这方面的讨论于4月21日在华盛顿开始，但是，不久又中止了，显然是因为赫尔不愿给日本以指责对它进行包围的口实。尽管如此，美国的出口许可证项目表还是在逐步扩大；5月28日，其范围扩大到包括菲律宾在内的所有美国领地，虽则菲律宾没有立即削减对日的供应；到了6月20日，所有的石油产品都受到出口许可证的限制。在一些少数的事例中，美国完全限制对日出口，而在这些事例中英国也实行同样的限制。但是，经济作战部在1941年6月底认为，各民主国家所实施的限制还没有对日本的经济产生严重的影响。在答复日本的责难时，经济作战部坚称，除了对那些用以帮助德国或者是盟国需用的日本进口货外，都没有背离过英国允许日本进口正常货物数量的政策。经济作战部在9月间估计，除了一些例外，日本已经拥有足以打一年大战的储备。

1941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后，日本并没有立即采取任何行动，在伦敦和华盛顿的日本人暗示，西伯利亚这条路线既已关闭，限制日本进口就失去了正当理由。但是，英美政府认为，只要日本继续顽强地公然站在轴心国一边，就没有理由可以放松他们现行的审慎地施加经济压力的政策。从日本驻英大使馆传出风声，同民主国家比较友好的人士可能会在东京掌权，重光葵可能会出任外相；但是因为这一说法是日本要求提供方便以便从新几内亚进口一万三千吨椰子核的前奏，人们并不信以为真。6月底外间已得知日本正在计划攻占南印度支那，而在7月的前三个星期中，英国远东委员会及国务院也都在审查针对日本这一行动采取报复措施的计划。罗斯福总统7月19日批准了美国的计划，当7月24日收到日本开始占领的消息时，该项计划即已准备就绪。7月25日，美国宣布冻结日本和中国在美国的资产，第二天早上七时，英国政府通过无线电广播宣布了同样的决定。荷兰政府也跟着这样做。冻结中国的资产是照顾到中国的利益，并且是应中国政府的要求做

见《概览，1939—1946年：轴心国的初期胜利》，第8编，第3章。

关于美国准备在1941年进行经济战的情况，没有获得美国方面的系统材料。但是，菲斯（《通向珍珠港之路》，第198—199页，第227—239页，第242—262页，第268—269页）根据国务院的档案以及第一手资料，提供了有价值的细节。D·L·戈登和R·丹杰菲尔德[《隐蔽的武器》（D.L.Gordon and R.Daltgerfield:The Hidden Weapon），纽约，哈珀，1947年版，第43—44页]作了概略的介绍。

的。

美国的意图不仅是日本，而且也是其他大国所大惑不解的。在施加经济压力方面，罗斯福总统准备做到哪一步，同时，其他一些大国在依靠美国支持他们对付日本采取的措施或报复手段方面又能达到何种程度，这些在7月份都是一点也不清楚的。美国仍然没有保证，如果日本决定进攻英国或荷兰的领地，它就会参战。英国知道，萨姆纳·韦尔斯早在7月就已建议总统，如果必要的话，对日本实行全面的经济封锁，外间还有传说，要以“无情的冻结”作为对日本进一步侵略的回答；但是，其他一些说法则明白表示，决不会考虑类似完全中止日美贸易的问题。冻结命令下达后，人们立即明白，总统所持的观点是，如果英国、荷兰及美国政府完全切断石油及其他商品的供应，很可能会把日本推向战争；因此不能这么做。目前阶段的意图是对石油、棉花及其他美国出口货签发出出口许可证，付款记入冻结的帐户的借方，对菲律宾与日本之间所有的通常贸易则立即颁发一张总的出口许可证。这一切都使英国政府十分为难。英国政府曾把冻结命令看作是用经济压力使日本就范的一种重要尝试。现在看来，这种势必会引起危险的政策将不会被采用。如果英国和荷兰采取这种政策的话，那只有他们自己将会卷入战争的旋涡。

因此，8月初英国政府在得到国务院打算颁发许可证的有关贸易的确切细节后，就为日本与英联邦之间进行相同数量的贸易作出了安排。美国确定每月对日输出六十万美元的棉花，在各种条件的限制下，石油可以按比例出口；以美元支付自日本进口的美国所需物品的申请将予以考虑，而所得的美元得用以作为经营准许出口货物的周转资金。英国的安排规定，凡在冻结前所批准的应予履行合约的交易均发给许可证，并规定为在半易货基础上的贸易发许可证，如果从日本的进口货是很重要的话。这种交易的付款将记入一个专用的结算帐户上，并可用来偿付联合王国或英国殖民地的出口货。鉴于美国对棉花所作出的决定，印度政府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来限制他们自己的棉花和印度椰子纤维出口，这一种安排同时也向各自治领政府推荐采用。

要是伦敦和华盛顿贯彻了上述这些措施，冻结命令的效果就会大大减弱。但是，国务院如此严厉地执行了这些命令，以致事实上无法进行贸易。在某些事例中答应了发给出口许可证，但是，由于各种理由，日本请求发放所需的资金，却遭到了拒绝。一个理由是：鉴于横滨硬币银行在美国刚要公布冻结命令之前提走了二百万美元的现钞这个事实，日本现在需要资金是令人怀疑的。国务院提出一个条件，如果日本要获得任何许可证，就得根据冻结命令，将两百万美元重新存进银行，理由是这笔款项是以一万元票面的美钞提取的，而美国政府则希望把它从流通中收回，因为这些钞票曾被绑票犯使用过。日本人没有同意，于是陷入僵局。政府这一行动致使日美贸易陷于停顿这一事实，英国政府到8月20日才第一次知道。在随后的几周中，国务院认识到，这使它几乎是意外地发现了一种对日宣布经济战的真正有效手段。于是科德尔·赫尔作出了决不放松这种压力的重大决定。鉴于美国作出这个决定，9月21日，艾登代表英国政府也宣布采取同样的停止对日贸易的做法。

日本人千方百计想摆脱冻结命令所造成的后果。他们向一些英国商行提出易货贸易的建议，可是遭到了拒绝。9月底以后，为了从南美洲、泰国、印度支那及其他地方采购物资，日本花了越来越多的黄金。但是，一般认为，日本拥有可供此用途的黄金至多也不过是一亿五千万美元。日本扣留了各种

出口到英美港口的物资以示报复。荷属东印度和日本的贸易到 11 月也陷于停顿。与此同时，赫尔与野村的外交会谈已进入最后阶段；国务院里似乎在日本究竟会对这种经济压力作出多大程度的有利反应的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但对放松压力将鼓励主战分子这一点一般都是同意的。很清楚对日本实施彻底的经济制裁，已为时太晚，不能实际限制它的作战能力，但是，显然还是能及时地使日本认识到，要想走只是进攻英国和荷兰领地的这条捷径，将是战略上的一个错误。

到了 1941 年 12 月。德国和意大利正面临着经济战的新局势，在新局势中它们早先拥有的优势将一去不复返了。管制非洲和美洲的货源，关闭横贯西伯利亚的路线，以及德国未能夺到伊比利亚半岛和中东，终于切断了轴心国的除从海外走私运进数量有限的补给品之外的全部供应来源。持续的激烈战斗已经开始显示出库存和生产能力的限度了。大规模空中轰炸很快将给后方造成严重的伤亡。迄今为止，盟国经济战攻势是否已证明了在这方面的努力卓有成效呢？它肯定没有使德国屈膝，但这并不是说，即使不存在封锁的话，德国的情况也不会好得多。除了切断德国正常的进口之外——这一具有持久和必然性质的优点往往为批评盟国计划的那些人所忘怀——盟国还创建了一个高度复杂而灵活的运用经济压力的机构，而这个机构将在战争的后几年里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二章 英美的努力

(1942年1月—1945年6月)

第一节 要塞欧洲：封锁的战略

当新的盟国英国和美国在珍珠港被袭后对决定经济战的基本因素进行重新估价时，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已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主动权，并且他们本身也在经济上受到了打击，其规模远远超过他们迄今所经历过的任何打击。现在的同盟大国中已包括了俄国和美国这一事实，意味着这两个国家将不再是轴心国在欧洲的经济直接的或间接的供应来源了，但是，到了1942年春天，由于日本在远东的胜利，却造成了一种反封锁，达到令人棘手的程度。

在大战的这一阶段，封锁（连同轰炸）仍然是盟国进行经济战的主要武器，而且一般说来确实也是战争的主要武器；经济战的方法，同法国失陷后所采取的那些方法相比并没有什么改变，虽然在政策上有了重大发展，特别是空袭和先买权都已见诸实施了。经济作战部认为，除非等到德国决定性击败了俄国之后，德国的经济状况可能将比它以前任何时期都呆滞和脆弱得多。但是，该部主要关心的是德国对盟国封锁的威胁。

因此，在1942年，经济作战部把防止在德国和日本控制区之间偷越封锁作为它的最重要的目标。到1941年底，对欧洲德占区的海外封锁实际上已完成；除了法属殖民地用维希的船只从法国的北非和西非将它们的产品运抵敌区以外，对中立国的供应商和船主采取了各种管制和施加压力的方法（强制实施的航行证，船舶许可证，以及附设的机构），加上英国海军进行拦截作为最后的关卡，这些就卓有成效地封闭了除维希船只运截的法国北非和西非的殖民地土产到达敌占区以外的所有一切的供应渠道。1941年夏季，曾重新发生过突破封锁的事件，但是，都被英国海军制止了，而且停泊在美洲各港口的敌船都被封住了，从而减少了对于重新出现突破封锁情况的担忧：海军的行动至少也暂时阻止了法国货物通过远东和马达加斯加外流。但是，日本的参战和它随后对各地的征服，造成了一片幅员辽阔、经济丰裕的新敌占区，使日本可以得到大量原料供应，足以弥补它长期匮乏的绝大部分物资以及德国当前主要缺乏的许多物资。于是，封锁问题就从不让一个敌人得到中立国物资变成不让两个敌人之间互相取得对方的产品了。据估计，只要有十二只船的货物就足以解决德国1942年对橡胶、钨、锡、丝、麻和植物油的基本需要；突破封锁的船只很可能给日本带回昂贵的滚珠轴承、精密仪器、机床或者还有技术人员。日本仍然需要取得铝、铜、羊毛和棉花等的供应；它可以在澳大利亚得到铝和羊毛，在缅甸得到铅，在印度得到棉花，在南美各市场得到铜、羊毛和棉花。新加坡失陷后，日本扩大了征服的范围，并直接控制了英帝国这些资源地或通向南美各港口的航线；因此，在经济战的领域里展开了甚至更加可怕的前景。如果日本终于夺取了印度洋各基地，并于盟国在中东受挫后同轴心国家联结在一起从而取得最大成功的话，那么远东和地中海之间就可建立起一条直接的航线。在这些估计中，法国的海外属地和法国舰队成为导致灾难的因素。马达加斯加可以成为新加坡和欧洲之间的一个中间加油站；法属西非、法属北非和北非大西洋各港口可以多少在轴心国的控制下成为集散地。西班牙北部各港也可以用于转运业务。

但是，盟国也得面对一场经济战，其规模不亚于他们自己对德作战的规模。到了1942年春，日本的胜利已使盟国得不到橡胶、锡、铬、钨和石油这些重要物资的供应，如果日本在印度和澳大利亚继续取胜，那么盟国只剩

非洲和美洲各国是它的供应来源了。迄今为止，德国并没有多大兴趣（也由于机会有限）要对盟国的供应来源发动一场经济战，虽然他们在使用潜艇战攻击盟国的船只上一直十分活跃。但是，据认为，日本是完全意识到这种经济战的前景，并且可能会把重要供应品列为它专门攻击的目标。而且预料甚至还会攻击盟国在拉丁美洲的供应来源，在美国国务院中萨姆纳·韦尔斯特别感到这种危险。1942年1月他去参加里约热内卢会议，那时，他已很明白自美国海军在珍珠港受到重创之后，“从加拿大到智利这条太平洋海岸，现在是已处于”日本炮火之下了。甚至也不能完全排除来自达喀尔的直接攻击，但是，主要的危险似乎可能来自某些国家中大批组织完善的少数民族亲敌分子的阻挠和破坏，甚至武装叛乱。国务院的这种关切，并没有因为阿根廷和智利在里约热内卢会议上拒绝放弃完全中立的立场而有所减轻。

这就是盟国在1942年头几个月从经济战中所看到的较为暗淡的方面。但是，在新的国际形势中显然也还存在着比较有希望的方面。1942年底以后，盟国的军事形势稳步好转，这意味着在战争的后期年代里，经济斗争中的优势对比是越来越肯定地有利于盟国了。

首先，一般认为，只要德国被迫集中它的主要军事力量对付俄国，它对欧洲各中立国就不会那么可怕。这些中立国月前已减少至五个小国——土耳其、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和瑞典。这就相应地加强了英国用战争贸易协定、定额配给和先买权等手段以切断敌人供应来源的力量。而且这些中立国现在可能觉得不那么担心德国进攻的危险，而变得越加依赖盟国的海外供应，因此或许更容易被迫接受盟国提出的各种条件。到目前为止，它们已能够从海外中立国供应地得到他们所需的许多重要物品，只需要英国当局发给航行证就行了。随着美国和俄国的参战以及盟国供应计划的精心制订，现在统一使用船只的情况是这样紧张，致使中立国只有在盟国的同意下并在盟国作出牺牲的结果下才能获得它们的进口货。盟国审慎地行使它们的压力，可以达到两种目的，既能切断敌人的供应，又能自己得到这种供应，以此作为向中立国提供它们所需重要物资的交换条件。同时可能就此结束那种荒唐的价格市况，即盟国必须用大大抬高的价格买进，而以自由世界中通行的价格供货。

其次，还有在更大范围内对德国控制的资源进行直接打击的希望。虽然突破封锁的危险有所增加，但是，德国对海上运输和海外供应的依赖也相应有所增加；因此相对说来，敌人的船舶比以前成为更重要的海上和空中攻击的目标。对敌人后方的空袭，迄今还没有什么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夜间轰炸也不很准确，威力也不很大，不足以造成敌方的重大损失。盟国希望空袭的范围和空袭的效力都能加大，也希望能解决白天空袭的问题。还存在这种希望——后来证明是被大大夸张了——整个欧洲被占领国家有组织的抵抗将会提供另一种极为重要的武器。德国占领着面积六倍于大德意志的领土，人口有它自己56的二倍半，由于它越来越依赖这些国家，所以用破坏、政治斗争和其他方式来挑起麻烦的机会应该是很多的。

正是根据经济斗争中这些新的前景和危险的全面形势，伦敦经济作战部

萨姆纳·韦尔斯（Sumner Wells）在《七大决定》（Seven Major Decisions）中描述了他的忧虑和自己的作用（伦敦，哈米什·汉密尔顿，1951年版），第101—125页。

和它在华盛顿的对等机构经济作战委员会 试图估计德国经济的实力和弱点。材料是大量的，并且现在看来，在许多方面是十分准确的；虽然以此为基础的种种希望，都象战争初期那样，常常落了空。看上去德国总象是日益接近一场经济危机，但结果都没有发生。该部原来预料在 1942 年下半年德国生产会严重下降；到了 1942 年夏，它不得不承认，尽管德国在冬季遭到了重大损失，但好象已开始了对俄国的第二年进攻，其使用的部队不论在人数上还是装备上（除了飞机这项重要的例外）都不比它在 1941 年 7 月所拥有的差。据了解，在 1942 年 2 月弗里茨·托特死后继任军备军火部长的阿尔贝特·施佩尔曾经发起了一种“全国工业改组和合理化运动”；经济作战部考虑下来，自我安慰地认为，德国这种不顾一切地集中致力于战时的紧迫需要，只有付出一定的代价才能做到。这就再次使人得出了过分乐观的结论，认为这样耗竭库存、忽视保管、忽视辅助工业、不顾平民生活标准和人民疲惫情况所付出的代价是不可能无限期地支撑下去的。直到 1942 年底，德国因内紧张情况的主要迹象表现在下列几方面：（1）石油、铁矿石、铬、铜、镍、铝、橡胶和纺织品这些原料不同程度的严重匮乏；（2）劳动力问题，主要是缺乏熟练的工人；以及（3）时常发生运输上的困难，虽然这些现象还没有产生任何灾难性的崩溃状况。

盟国估计之所以出现错误的倾向，是由于他们无视德国在制订计划工作中的那种引为自满的因素。毫无疑问，要从德国军事上的周密和政治上的狂热所表现的铁石决心的外表来察觉这一点，即使不是不可能的话，也是有困难的。盟国设想德国必然竭泽而渔地剥削它所能搜刮的经济资源，因此每增加一次紧张或匮乏情况，都必然会使轴心国的经济越来越接近于崩溃点。他们低估了，并且的确大大忽视了第三帝国还能承受得了经济衰退的程度。但是，归根到底，盟国的揣测大体上是正确的；1942 年，德国还没有感受到伦敦所预料的那种紧张程度，因为德国还没有把工业机器开动到极限，然而这意味着它未能事先扩大它的工业基础以应付在战争后期可能和确实向其提出的巨大需求，而到那时候它的经济就表现出坐失良机的悲惨局面了。来自德国的材料表明，战争初期几个月里它的军备生产水平极低，而且直到 1941 年底，在这方面还没有什么重大变化。在 1940 年这一年中，军火生产由于在法国的胜利而下降了，虽然在坦克和潜艇的建造方面有补偿的增加，但是，从 1940 年到 1941 年，军备生产的总量和总值（一百二十亿马克到一百二十一亿马克）几乎一点也没有什么增加。事实是在大战初期的几次战役中，物资损失比较轻，加上认为最后胜利已经在望，似乎使德国觉得其拥有的储存和资源已甚充足，因而没有扩大生产的必要了。德国低估了俄国的军事潜力，而它自己的军火、武器和造船的生产数字，在 1942 年中期以前却一直下降。因此（举几个例子）根据 1941 年 12 月所发表的数字，德国军备生产在俄罗斯战役开始后，在轻武器方面，与 4 月份产量相比，下降了百分

原先是经济保卫局（见原著第 24 页）。

见上文，原著第 25—26 页。

当然在德国国内，在官方宣传和私人出版物中，不断强调德国科学的成就和挫败封锁的决心，如安东·齐施卡著的《发明家破坏封锁》（Anton Zischka：ErfinderbrechendieBlochade），柏林，德国出版局，1941 年版，第 71 页等。关于瑞士的看法见 H.G.托恩多夫著的《工厂之战》（H.G. Tonndorf：Krieg derFabriken），苏黎世，欧罗巴出版社，1943 年版，第 113—116 页等。

之三十八；在大炮方面，与4月份相比，下降了百分之六十七；重武器与8月份相比，下降了约百分之四十九；飞机生产与8月份相比，下降了约百分之三十六；同样地，在弹药生产上，8月份总产值是一亿一千二百三十万马克，而12月份则为九千六百七十万马克。

另一方面，通常预计要在战争中受到损害的消费工业，情况却仍相当令人满意。战争爆发后，由于劳动力转移到战争工业和军队中去，以及某些消费品供应了军队，生产曾经受到一些损失；但由于使用了被占领区的劳动力，这已经部分得到了弥补，可是，另一方面，某些产品却不得不转用到这些新占领区的人口身上。总起来讲或许有理由认为，由于战争，德国民用生产下降了约三分之一。但是在1940年法国沦陷后，就开始为恢复到和平时期的经济作了准备，因此，1941年的净生产数字比1940年高（以价值计算）。甚至在1942年，下列各轻工业品的净产值也比1940年高：木材加工（1940年是十亿零五千万马克；1942年是十一亿马克），玻璃（四亿四千万马克；四亿六千七百万马克），陶器（三亿六千一百万马克；三亿六千八百万马克），皮革（七亿零九百万马克；七亿九千万马克），衣着（九亿九千八百万马克；十亿零九千八百万马克）。所有比较重要的消费品工业的总产值，1940年总计为一百三十七亿七千八百万马克；1941年为一百四十三亿二千六百万马克；1942年为一百三十一亿零三百万马克。1942年的下降甚至没有象这些数字所表示的那样急剧，因为没有把从国外到达德国市场的日益增加的货物数量计算在内。由于未能占领莫斯科和1942年头五个月俄国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反攻，德国官方的自满情绪受到了打击；形势终于清楚表明需要在工业上作更大的努力，部分是因为库存物资迅即出现了惊人的下降，部分则由于这一更广泛的理由，即现在必须预计到战争局面可能要更拖长下去。例如，1941年6月至1942年3月间的炮弹储存由于在前线的大量消耗，就减少到三分之一；1941年7月至11月，轻型和中型大炮的生产与损失尚能平衡，但是，在以后的两个月内损失即大大超过了当时的产量。尽管如此，也仅仅是要求在现存的采购系统内加速生产；看来他们还没有感到除了全力以赴再发动一场闪电战以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外，还需要再做什么。阿尔伯特·施佩尔的任命，本来是要导致在1943年和1944年对德国战时经济进行一次比较根本性的改组，但是在1942年，并不曾指望他为新的战役加速生产之外做更多的事。希特勒的战略胜过了哈尔德、伦斯德、勃劳希契等人关于在俄国西部为德军休整和补充兵员建立一条防线的建议；德军再次以闪电攻势蜂拥前冲，这种进攻实质上是一场巨大的经济战战役，因为它企图切断伏尔加河的交通线，夺取高加索石油。1942年11月，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的败北，说明这一决战的努力失败了，虽然俄国也损失惨重。1942年10月，英国在阿拉曼的胜利和11月7日至8日英美军队在法属北非的登陆，意味着从此以后，德国不得不放弃它那用精锐部队以短暂的、耗费较小的闪电进攻取胜的希望；

这两段文字中的数字均来自施佩尔那个部的计划司统计处处长罗尔夫·瓦根富埃尔博士

(Dr.RolfWagenfuehr)所编制的1945年7月的备忘录。

“施佩尔的职能是作为一个‘促进者’，一个负责特殊计划解决困难的人和一個在生产最急需的武器方面的协调者”[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全部经济影响调查室：《战略轰炸对德国战时经济的影响》(The EffectsofStrategieBombingontheGermanWarEconomy)，1945年，第24页]。关于施佩尔的职能和成就，另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176—177页，第190—193页。

随之而来的将是一种防御战和消耗战，因此德国不得不为适应这种情况而制订作战计划了。这意味着“广度的战备”阶段的结束。虽则施佩尔在 1943 年及 1944 年所作的巨大努力的确成功地提高了生产数字，但是根据可供利用的时间和条件来说，要进行充分的“深度的战备”是不可能的。

鉴于德国和欧洲德占区的形势已有利于——虽然不十分符合盟国所主张的方针——继续使用经济压力，英美两国政府遂开始在所有适当场合下协调他们的行动计划，这样，在大战的后半阶段，他们的行动就明显地分为两大阶段。在 1942 年年底以前，他们一直是在相当不利的情况下作战的，因为那时在欧洲和南美洲的中立国，由于仍然相信德国可能取得胜利而不愿意承担风险。当盟军在 1943 年和 1944 年开始转入进攻时，采取经济攻势就成了可能，于是中立国才相当情愿地逐步缩减他们同轴心国的经济联系。

第二节 海上封锁：英美合作

经济战的传统战场是通往交战国或“毗邻的中立国”港口的海道；其传统使用的武器是以军舰拦截违禁品。自 1939 年 9 月以来，对那些横越大西洋而至欧洲港口、可给德国和意大利供应物资的航路进行监视，一直就是经济作战部的主要目标之一。但自法国沦陷后，皇家海军转而去执行甚至比管制禁运品更为重要的任务，迫使经济作战部不得不在货源基地建立管制禁运品的机构。我们已经知道，这种制度的主要目的是说服中立国的货主，他们如想要从海外市场——譬如说在美洲国家，向某一欧洲港口出口货物，应向出口国家所在地的英国领事申请批准，然后由英国领事发给航行证和船只许可证这两种文件。与此同时，还对欧洲的中立国实行了“强制”的限额政策。航行证根据这种标准发给，它将准许适当的进口以满足国内的消费，但禁止将其再出口与敌方，或囤积大量存货，以致惹起敌人的入侵。这样就建立了一个有效的禁运品管制制度，只是偶尔求助于皇家海军。这种制度之所以获得成功，多半有赖于出口国家的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的默许和积极支持。

当 1941 年 12 月，美国成为交战国之一的时候，英美两国在政策上才有可能取得了完全协调，但是，这只是完成了日本袭击珍珠港之日以前已经走得很远的一个过程而已。早在 1941 年 6 月，美国出口管制局在签发诸如以瑞典、瑞士、葡萄牙为目的地的出口许可证以前，就已经要求美国出口商出示他们所持有的航行证。1941 年 12 月以后，既然没有必要实行两种制度，应该采取的做法显然是以美国的出口许可证立即代替英国的航行证。同时由于 1939 年 12 月实行航行证制度所惹起的为难局面，而且实际上是敌对情绪，也提示了美国政府很可能乐于在 1941 年 12 月立即接管这一制度，用以消除外界关于英国干预美国内部事务的指责。然而，美国方面并没有做出这样的反应，因此很明显，在美国人的眼中早就认为英国的封锁措施是正当的。所以，并没有过分匆忙地把这两个制度结合在一起，而尽量假以时日由华盛顿和伦敦双方之间在行政方面做出仔细的安排。

这些安排应该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必须继续对欧洲一些中立国家强制实行定量配给，并继续维持现行的全球性限额制度（每个季度，不论从哪个产地向这些中文国供应的物资，都限定在固定的数量内）；并且从经济作战部所积累的统计和经验看来，此事在伦敦进行将是最适宜的。最后制定的程

见上文，原著第 21—22 页。

另见《概览，1939—1946 年：轴心国的初期胜利》，第 7 编各处。

序是，华盛顿的经济作战委员会将首先考虑美国方面申请的出口许可证；有些申请者因供应方面的理由或者因为发货人被列入禁运名单上，或是由于其他可疑原因而将遭到拒绝；其余的则都提交伦敦经济作战部处理。该部将同美国大使馆的代表磋商后作出决定，如果结果满足了申请者的要求的话，其数量将从相应的限额中扣除，并及时通知华盛顿。就美国方面来说，英国的“航空执照”和“邮件执照”（这些执照使用与发给以航空或邮包运送的货物的“航行证”相同的制度）也由美国出口管制局接管。这些安排均于 1942 年 4 月 1 日开始实施。

这样，在管制违禁品方面，英美两方的关系在行政管理上并没有不协调之处。但是在管制来自轴心国控制下的出口物资方面，却有发生摩擦的可能。按照国际法规定，交战国无权没收由中立国船只载运的非违禁品的敌国货物；战争的头三个月中，英国政府没有采取这种没收行动。但到 1939 年 12 月，作为对德国布设磁性水雷的 61 一种报复，他们才开始这样做的。当时，美国政府抗议过这种报复敕令。在法国沦陷以后，英国政府颁布了更多的报复命令。美国政府自 1941 年 12 月参战以来，不曾颁布过任何报复命令，这就可能面临在这问题上如何保持一致的进退维谷处境，因为他们当然是不希望看到德国坐收出口贸易兴隆之利的。不过，还是找到了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把管制敌方出口的事务委托英国去管理，而美国政府则同意只派一名代表列席伦敦的敌方出口委员会。

这些安排的重要意义远远不止是阻止了货物从美洲各国点滴地流入或大量地涌进德国。各项管制制度还可用于供应目的，甚至用来从敌方采购货物，并且用来对中立国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1942 年后，凡属联合国所需的稀有商品，均停发航行证，而这些供应不足的货物后来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或作为对它们的对应让步的报答，才允许运往欧洲中立国。不管美国政府对敌人出口总的态度怎样，他们是准备给那些他们认为是共同作战努力所必需的敌方物资发放出口护照的。

在拉丁美洲国家，通常需要由三边做出安排。1942 年期间，巴西和其他拉美国家加入了联合国。这些国家无论是作为积极的盟国，还是作为倾向英美事业、态度友善的前交战国，他们在战争中都起了极其重要的经济作用；这个作用虽然同眼前这个管制禁运品问题决不能完全分开，但却是远远超过了它。美国政府从 1941 年春季起，在拉丁美洲开始实行了一种采购政策，到 1941 年底，这种政策已经解决了许多英国的封锁问题。珍珠港被袭击后，这种政策便成为美国对经济封锁的最重要的贡献。这些采购从一开始就是既为了保证供应，也为了排斥其他国家竞争。1941 年春季以后，美国国务院的目标是要把包括墨西哥在内的拉丁美洲的所有战略物资全部买下来，美国和巴西政府之间于 1941 年 5 月 14 日签订一个协定时，就开始这样做了。根据这个协定，巴西某些商品的出口要受向美国出口和向西半球国家出口相同的许可证限制。接着又同其他许多南美政府签订了协议。这些协议的广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们把战略物资保留给了联合国使用，这样就自然而然地消除了大部分战略物资流入轴心国的可能性。它们还使英国政府不必用他们有限的资金，继续在拉美进行先买权的采购。另一方面，虽然英国政府愿

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 1 章，第 499 页，第 502—503 页，第 507—508 页。参阅兰格和格利森；《不宣之战，1940—1941 年》，第 594 页。

意和美国各使团一起分担签发航行证的责任，但是，英国和美国政府都看到用当地的出口许可证代替在拉美国家所实行的航行证制度，会遭到严重的反对。在 1942 年这一期间，经过许多次试验，在此基础上精心制订了行政管理措施，并成功地完成了这样一个复杂的任务，即把战略物资的采购和出口同其在同盟国和受到优待的中立国用户之间的分配问题联系起来。

因此，美国这个庞大的采购计划同现有的禁运品管制机构的结合，便意味着创立了一种对南美向欧洲出口的双重检查制，而在那些以各种形式保证不把持有航行证的货物重新出口的欧洲中立国家中则还存在着一种第三道检查。尽管如此，一般认为还存在着许多逃避管制的可能性。向轴心国走私已成为有利可图的事业，它连同突破封锁活动及旅客管制问题一起形成了战争时期经济封锁中的主要问题。

在诸如白金、云母、黄金、工业用金刚钻、奎宁、咖啡因、肝精以及胆固醇这些战时价值高而体积小的物资方面，怀疑有走私的情况——但其规模如何从未能得到证实。白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宗货品；德国人需要白金，在生产硝酸时用于促进氨的氧化作用，制造各种磁电机、科学仪器和延时引信，以及其他能确保高度可靠性的类似用途。在 1941 年 6 月以前，德国一向从俄国得到它的供应；在剩下的两个能大量供应的国家中，加拿大自然没有什么可给的，德国就把希望的眼光转向哥伦比亚。直到 1941 年年底，意大利环球航空公司的巴西航线使德国得以从南美进口这些小体积的货物，并以出口药品和药材作为交换。但是，当意大利环球航空公司的业务于 1941 年年底停顿后，德国便主要依靠横渡大西洋的船只来实现他们为大规模的偷运活动一直在精心制订的计划。这些计划是很难破坏的，从此双方勾心斗角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采取预防走私措施起初主要是英国的责任，但是，到 1942 年年底以后，美国当局对这个问题也引起了深刻的注意，有一段时间，还批评了英国的做法。可是，经验表明，要解决同盟国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只能进行偶然的拦截，盟军在北非登陆以后，直布罗陀有段时期不能用来检查船只；已建立的使用航行证和船只许可证制度施加压力的方法收效也不大，因为大多数走私勾当都是由个别海员和旅客在物主、发货人或船长不知情的情况下干的。在 1943 年头六个月期间，英国驻马德里大使塞缪尔·霍尔爵士提出在北非作战的关键时刻不应经常搜查西班牙船只。但是，偶然的拦截，仔细搜查有关个别偷运者的（主要是海员）个人档案材料，以及为了堵塞漏洞在拉丁美洲以先买权采购等做法，倒是富有成果的。从走私的观点来看，从南美到西班牙和葡萄牙经由大西洋的航线是最重要的，但是在 1943 年秋季，人们已知道在工业用金刚钻方面存在着一个大漏洞，它可经由美洲空运到非洲西海岸再从那儿运往伊伯利亚半岛和中东。虽然，在盟国在欧洲的军事胜利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走私问题以前，向东到中东的航线和由北向南的非洲航线，还没有建立起适当的监督制度，但到 1944 年春季，已在英国和法属西非对飞机乘务人员和普通乘客实施了适当的管制和搜查制度。

另一方面，在 1942 年引起盟国特别关注的、在德国和日本之间突破封锁这一更为重大的问题，却在轴心国的初期胜利后，便成功地获得了解决。起先，盟国方面的预防措施几乎是完全不中用的：1942 年上半年，九艘突破封锁线的船只从远东抵达法国港口，运来了大约多到六万至六万五千吨的昂贵货物。1942 年 9 月间，又有一大批普通货船东西来回航行；到 11 月底为止，

获悉有九艘已离开了比斯开的各个海港。三艘突破封锁线的船只，在 11 月也从远东抵达了波尔多（5 月以来第一次），运来了大约一万六千吨货物，其中据信有一半是橡胶。整整这一年，经济作战部一直忙于应付这个问题；它估计，1942 年期间，运抵欧洲的十万吨货载足以满足德国对橡胶、锡、钨和大麻的基本需要；十五万吨的植物油能使德国维持它的油脂定量供应。但是，除了在 1942 年 11 月截获一艘西行的和两艘东行的船只外，盟国在这个阶段为了试图堵塞这一严重漏洞而采取的反措施，证明是十分无效的。因而这促使轴心国扩大了他们的经济合作，并于 1943 年 1 月宣布了这方面的计划。但是，到了这个阶段，盟国当局已准备好以加强空中和海上巡逻的方式实行更有效的反措施。1942 年 11 月到 1943 年 5 月之间，共有十一艘突破封锁线的船被击沉；其中七艘是开往德国的，四艘是开往日本的。另外一些船被击毁而停航；能够通过的为数寥寥无几。此后经过一个时期的间歇，然后就是在 1943 年到 1944 年仲冬的第三个也是最后的一个季度。1943 年 12 月底，德国派了十一艘驱逐舰护航一艘突破封锁线的“阿尔斯特鲁费尔”号，这表明它对所载货物给予的重视。可是，该船于 12 月 26 日在比斯开湾被海岸指挥部的飞机击沉了；第二天，“格拉斯哥”号和“企业”号巡洋舰又击沉了三艘德国驱逐舰，并击伤了其他一些船只。从 1941 年 1 月 3 日到 5 日，又有三艘向内行驶的突破封锁船“韦塞尔兰德”号、“贝尔根兰德”号和“里奥格朗德”号在南大西洋被美军击沉。这就似乎终于迫使往返于远东海面突破封锁的活动暂时敛迹，虽然用潜艇进行突破封锁的活动依然如故。

第三节有条件的援助政策

上一节所谈的管制禁运品机构，它承担的是比较消极方面的封锁职责，但是，在大战第一年以后，这就再也不是盟国经济战的主要特点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具特色的发展，是试图使欧洲中立国摆脱对轴心国经济上的依赖，虽然在战时状态下，这必然牵涉到对中立国政府施加某种形式的压力，但这主要是一种诱导的政策而不是压制的政策。“有条件的援助”在这个意义上，在西班牙获得了最大的成功，正当法国沦陷，战争处于危急阶段时，英国政府给西班牙提供了英镑援助和航行证，使它获得小麦、棉花、煤和橡胶等主要物资的供应。这样，西班牙的贫困经济就得以维持而不必依赖德国，而佛朗哥将军也可以更容易地抑制自己（他显然也想这样做）不去同轴心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积极合作。对土耳其，英国也竭力给予经济上和其他方面的援助。因此，到 1941 年夏季，这项工作已使英国得以成功地取代了德国，成为土耳其的主要市场和供应者。瑞士和瑞典虽然实质上已断绝了与盟国各种形式的正常接触，也准予（在得到轴心国的许可下）通过盟国的封锁继续进行若干进口。于是，到了 1941 年底，英国政府能够说：他们已经通过经济援助，为在这些国家内保持一种独立自主的精神做了一些工作；并且送给它们的这些供应品也使它们能以与德国在比较平等的条件下进行讨价还价。在军事上，这些中立国都是极其脆弱的，而且在大战的这个阶段，除了根据他们在大战第一个冬天以各种形式向英国提出的保证，要求他们在“正常供应”的基础上保持表面上的中立以外，再要对他们提出什么奢求，也是无济于事的。

美国的参战，并不需要对这计划作出任何根本的改变，因为 1941 年美国

的政策，特别是对维希法国方面，一直奉行着类似的方针。可是，在对欧洲中立国执行一个共同的经济政策上，这两个国家的看法并不总是一致的。他们之间主要的分歧是，在某些情况下，美国政府官员期望并相信，中立国对待盟国的态度会比英国认为可以做到的更为顺从些。这种观点上的矛盾也许并不严重妨碍行动，除了盟国对法属北非的政策以外，在 1942 年也没有产生任何十分明显的齟齬，因为那时盟国的处境是不利于对中立国采取强硬态度的。的确，在法属北非，正是英国而不是美国赞成采取比较冷淡和威胁的态度，在大战后期，这两派思想在华盛顿和伦敦都有他们的代表性，所以很难一概而论。有些美国人认为，英国人也许已经养成默认中立国同德国交易的习惯，也许在 1942 年以后；还不能充分体会到战争在朝着有利于盟国的方向发展所达到的程度。正象一个美国评论家所指出的，“他们也许还怀有某种不满情绪，认为美国应邀来分担管理封锁的责任后，非但不充分尊重比他们更有经验的伙伴的意见，而又急于想当决策的领导。”英国官员似乎肯定认为，美国在某些场合未免过于乐观，而在其他一些场合又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而且他们往往总是傲慢地对待处理中立国的权利问题。整个看来，似乎英国对采取压力政策之所以有时不那么热心，主要是由于他们怀疑这样一种计划是否切实可行，而不是由于他们对这种政策的后果有何不快。

正是在先买权方面，美国政府初次获得了对于中立国的讨价还价本领的经验。先买权——采购中立国物资以防止其被敌国所用——是经济战的一种武器，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没有得到真正的发展，而自那时以来，在 66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却有过一段有些曲折的历史。英国政府在运用这种武器中受到了限制，部分由于他们外汇资源的贫乏，部分由于欧洲事态发展的瞬息万变。这一星期一个卓有成效的先买政策，在下一星期可能就毫无用处了；挪威的沦陷，破坏了在西班牙对硫化矿的优先购买，德国掠夺法国和低地国家的锡储存，使得好几个月优先购买的葡萄牙的锡成为多余之举；而入侵南斯拉夫则又使德国得到足够的铝，以致先买西班牙的产品也归于徒劳。但是，美国人的出场，大大地增强了同盟国的联合采购能力，在 1942 年头三个且期间，制订了一个联合行动的计划以夺走德国取自西班牙、葡萄牙和土耳其的最重要产品。1941 年 10 月，经济作战部建立了一个先买委员会，这是由美国 and 英国商业公司代表重新组成的，并建立了一个美国公司即美国商业公司。英国和美国政府双方同意从 1942 年 1 月 1 日开始，共同分担所有在执行先买权上的损失。

最重要的先买的项目是（葡萄牙的）锡和（土耳其的）铬。其他一些表列商品有土耳其的橄榄油、山羊毛、羊毛、壳斗，葡萄牙的羊皮和西班牙的羊毛。另外还有各种商品由于后来日益具有重要性也列入了购货单；有些商品的采购，象土耳其的干果，西班牙的橘子和葡萄牙的沙丁鱼之类，主要是为了供应市场，而且只附带地具有先买的价值。由于中立国越来越坚持要以他们的出口货来交换货物而不要英镑，所以寻求采购货物的外汇日益困难，从而增加了盟国的困难。盟国和德国之间的竞争，把诸如钨和铬等重要物资的价格抬到了很高的水平。在葡萄牙，钨的价格到 1941 年底上涨到每吨六千英镑这个大得难以相信的数字（战前大约三百英镑）。在 1942 年间，土耳其

有关美国观点的概略见戈登和丹杰菲尔德：《隐蔽的武器》，第 70—71 页。
同上书，第 72 页。

还拒绝供给德国铬，但是，根据克洛迪乌斯条约，德国在 1943 年和 1944 年该得到大量的铬，作为交换德国军用物资的条件。其他由于其先买重要性增加而列入先买计划中的商品有硫酸脘、萤石、酸晶石、锡、铜、锑、云母、丝茧、废丝、大麻，亚麻、鱼油和亚麻子。最惊人的发展之一是加速采购寒衣运动；当盟国一知道德国在俄国作战的第一个冬天严重缺乏寒衣的情况后，就开始大规模地采购寒衣。在 1942 年中，以一千万英镑的价值买进了总数近二万五千吨的物资，采购范围从羊皮外套和羊皮衬里的手套到羊毛旧衣和牛毛。德国抢购这些商品被认为是它的储存减少，处境日益困难的明证。经济作战部的意见是，虽然在它早先对德国物资匮乏情况所作的估计有时过于乐观，但无疑已发现这时德国在对俄战役中的衣着供应上是真正穷于应付了。

那些想对中立国采取更强硬政策的人们（到 1942 年春天，华盛顿和伦敦的政界人士，在这一问题上，呼声日高），在 1942 年夏季以后，不得不根据联合参谋部会议的建议行事：即有关经济战的考虑必须从属于即将到来的北非战役的军事需要。在法属北非，这意味着经济作战部最后放弃其堵塞所谓封锁中的最大漏洞（德俄战争爆发后）的努力；在西班牙，这意味着，避免施加任何可能促使西班牙自愿或不自愿地倒向轴心国的压力。虽然对葡萄牙不那么担忧，但是，避免施加一种可能被称为只是虚张声势的压力，也被认为是很重要的。

美国在法属北非的政策是受 1942 年 2 月 26 日墨菲—魏刚协定所节制的；根据该协定，代表维希政府的魏刚将军同意了从美国所进口的供应品应接受美国观察员的监督，并且不应导致剩余存货的积累或导致这些货物或类似产品的再出口。美国曾希望通过这项安排来激励维希对轴心国压力的抵抗，并保留那些能供给经济和军事情报的观察员。英国政府在 1941 年有点勉强地接受了这个计划，因为他们不相信法国具有抗拒德国各种要求的能力，在协定中又看不出有任何抗拒这些要求的意志的迹象，并且知道法国继续通过它的非洲—地中海北部港口从它的海外领地得到大量的粮食和原料进口。来自多方面的报告说，输入马赛的食品，有百分之八十都流到德国和意大利。但是，英国政府不准备在美国总统已下决心的问题上同美国政府发生抵触，而且英国军方的意见看来也有些赞同美国派遣观察员。然而，1941 年夏秋两季，在英美商讨过程中，经济作战部确信美国国务院不想为船上所载货物的性质和数量问题而过分操心；结果是，输入到北非的货物或者其相等品如燃料油之类甚至全都被用于资助在利比亚的轴心国部队。可是，1941 年 10 月 18 日，魏刚被解职了，20 日，美国也暂停了所有对北非的援助。1942 年上半年间，这项供应计划成了国务院和在华盛顿的经济作战委员会之间争执的主题，英国官方的看法也多少有些分歧，但是比较倾向于后者。1941 年 12 月，美国参战以后，美国政府决定重新恢复货运，但必须有适当保证，而要取得这种保证是困难的，因此，有一段时间提出讨论了经济作战部长休·多尔顿所拟的一项有关法美易货方案。简单他说，这份计划就是由美国购买突

见下文，原著第 82 页。

见上文，原著第 34 页。

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 1 章，第 564 页。兰格在叫《我们对维希的孤注一掷》第 7 章中，大多从政府部门的角度而不是从经济作战委员会的角度论述了 1942 年美国对法属北非的政策。

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全部可以出口的剩余物资；并供应这些国家以保持其经济繁荣所需的货物。过了一些时候，国务院断定这个方案是行不通的，可是，经济作战委员会继续支持这个计划直到 1942 年秋季。在这期间、各方面纷纷传来有关法国以卡车、小麦、机动运输工具和汽车、酒及石油等供应给利比亚的报道。维希方面的解释丝毫不能使人信服；但是，美国政府觉得保持观察员和防止发生严重的灾难是符合盟国利益的，因此在 1942 年 3 月决定批准有限地恢复货运。英国始终并不反对输送有限数量的供应品，但是，要设法使这些供应品不致造成危害；尤其是他们发现石油的情况不能令人满意，因此认为应当保持其严重短缺现状，作为阻止其资助轴心国部队的唯一手段。不过，事实证明无法说服华盛顿认真对待这一问题，而且它也不准备把供应问题同法国 1942 年 3 月决定把所有英国居民从摩洛哥沿海地区迁到内地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但是，由于赖伐尔 4 月 14 日重新掌权，导致了进一步的（虽然是部分的）暂停货运并导致了举行进一步的英美会谈。7 月份货运又重新开始了，英国反对再运石油，但无效果。7 月 29 日，罗斯福总统指示，今后应该继续不停地对北非进行供应，英国方面觉得，鉴于总 6 统的干预，最好还是让美国人去自由行事。在北非进行一场战争的可能性，随后几周就会证明这项进一步的供应计划作为一种安抚的姿态是有道理的，但在英国专家们看来，这项计划总好象忽略了对封锁方面的考虑，而且似乎早在发生北非登陆问题之前，就已经具体确定下来。经济作战委员会十分赞同英国的观点，而且在某些特殊问题上能够坚持它们的立场。以下数字说明了输入地中海各港口的某些物资的范围（以公吨计算）。这些数字是以经济作战部 1942 年年底所得的情报为根据的，大致相当于 1941 年进口的百分之七十五到百分之八十。至于 1942 年那些数字，据信大致上是正确的。

这些数字表明 1942 年头八个月法国的进口量大概 70 是高于 1941 年的数字，并有助于说明英美封锁当局——

经济作成都和经济作战委员会对这一漏洞的关注。

兰格；《我们对维希的孤注一掷》，第 266 页。

兰格：《我们对维希的孤注一掷》，第 268—270 页。论述了国务院和经济作战委员会之间在这一问题上的紧张关系；他严厉地谴责后者，同时承认“完全有可能关于美国政策的根本目的，经济作战委员会没有得到足够的指导”。不过，他认为委员会官员们自己应该能推断出已在部署一次进攻，并且他们应当放弃坚持要法国严格遵守议定的计划。这种论点两面都说得通。假如委员会所争执的货物是次要的，那么也许他们所能赢得的好感也就相应地有限了。

由勃兰特（Brandt）和其他人写的《德占区与其他要塞欧洲的农业和粮食的管理》

（Management of Agriculture and Food in German-occupied and other Areas of Fortress Europe）第 25 章，根据德国文献对德国在法国需要粮食的情况作了很有用的论述，但是并没有反映出从北非和通过北非进口的重要性。

兰格教授（《我们对维希的孤注一掷》，第 265—266 页）谈到：他们所能看到的一切就是北非是轴心国的一个重要的原料来源地，我们可以运去的任何东西只能使法国更容易地耗尽已经在那里的东西。从经济上讲，这种论点无疑是正确的。德国依赖北非为它供应磷化吧。德国所必需的钴大约百分之六十要依靠法属摩洛哥供应，而且它还非常需要北非的优质无磷铁矿砂。1941 年间，这些大量的原料被运到了马赛，进口到法国的大部分原料都落入了轴心国的手中。一些运货去法国的用只返航到突尼斯对，装载着供隆美尔的利比亚部队使用的军用物资。毫无疑问，北非是英国封锁中的一个主要漏洞。”很清楚它也是（在 1942 年）英美封锁的一个主要漏洞。这段引文的第一句话表明了国务院对英国（或许是对经济作战委员会）政策的目的缺乏了解。英国政府是愿意向北非运送货物以维持那里平民的，尤其是本地人民的生活的；而不

第四节加紧封锁

早在 1942 年底，盟国就在瑞典和瑞士企图利用它们在斯大林格勒和阿拉曼获得胜利后时运好转的机会。

瑞典同英国的经济关系是以 1939 年 9 月 7 日的战时贸易协定为基础的。这个协定在德国占领挪威后仍然有效，它规定了瑞典对德国出口的水平。一年后，英瑞“哥德堡协定”允许瑞典每个月可以有四艘船出入哥德堡港口，条件是这些船只必须携有航行证并听从英国海军部的航行指挥，并且绝对不得屈从德国的禁运品管制。在这样的安排下，输入瑞典的货物当然必须受英国配给定额的限制。出港的船只，应携有瑞典产地的证明书（以杜绝德国货的出口）。在伦敦，普遍认为瑞典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大体上是遵守了战时贸易协定的精神的，虽然在某些情况下，看来肯定也对德国的要求作了一些让步。事实上似乎德国倒并不象英国所想象的那样坚持不让；那种到头来把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引向毁灭的得意忘形心情，使得最高统治集团根本没有时间顾及经济压力方面的细节。而且德国在对外贸易方面一如其在国内准备一样，也未能最充分和最无情地利用它的各种经济机会。不消说，这并不意味着瑞典有任何值得自满的理由；然而，总的讲来，他们并没有受到欺侮或过分的威胁，而且德国 71 方面主持经济商谈的都是一些长期任职的官员，他们可以说是按照贸易谈判的正常标准行事的。

美国参战，使得瑞典与各交战国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化了。在 1942 年间，一种日益成为正常的谈判过程在继续进行着——瑞典试图取得更多的进口，而英国则不时埋怨瑞典增加对德国的出口。但是，一方面也存在着瑞典可能使两个同盟国鹬蚌相争借以从中坐收渔利的危险；另一方面，美国的非正统思想又有可能要求采取一些戏剧性的、也许是不明智的新方法。因此，1942 年 9 月，当经济作战部发觉，美国已被说服允许瑞典除了配给定额以外，另从旅顺港进口一万四千吨石油时，不禁大为不悦；而另一方面，瑞典从 1942 年春起就一直在抱怨难以获得从美国出口货物的许可证。产生后一种困难大部分是因为美国人决定向德国的经济战措施进行报复的缘故。1942 年 1 月，德国不准瑞典将任何具有战争价值的货物向美洲国家出口；3 月，修改了这一点，允许瑞典向阿根廷和智利出口纸浆。后来，又禁止瑞典船只进入美国港口，德国人还禁止瑞典的出口品输入除了阿根廷和智利以外的所有美洲国家，因为阿根廷和智利这两个拉丁美洲国家仍然保持中立，而且也没有禁止瑞典的进口。美国当局起初倾向于采取强硬路线，他们争辩说，必须“平等对待”瑞典的出口品，部分是因为不应该让阿根廷利用它的中立来占其他美洲国家的便宜，部分是因为联合国不应该默许瑞典屈服于德国的压力。英国对此回答说，瑞典无疑同任何人一样非常憎恨德国的压制（而且在这点上也不需别人的推动），但是，他们要是公然反抗德国的话，他们的船只肯定会被击沉：如果盟国阻止其对阿根廷出口，结果不是瑞典向美洲的所有出口都将停止，那些船只只有空舱出海，就是哥德堡的交通将被中断。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对联合国不利，第一种可能情况将意味着轴心国会得到更多的瑞典货物，“而瑞典在经济上也将比以往更加依靠轴心国；第二种可能情

愿意运送物资去维持一个作为德国供应来源地的基本生产力，或使其生产过剩从而导致德国加强对其出口品需求的压力。参阅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 1 章，第 582—583 页。戈登和丹杰菲尔德：《隐蔽的武器》一书中一概没有提到法属北非部分。

况是，瑞典的经济将受到严重损害从而削弱了其抗御德国的力量。

起初，由于美国军事当局的毫不妥协的反对，所以这些争论没有引起美国在政策上作出任何修改；在华盛顿的其他部门，包括海军部和经济作战委员会，显然十分愿意同意保持与瑞典的贸易关系。1942年底，美国政府提议给瑞典一份照会，建议其向阿根廷和智利出口应只限于白报纸、纸浆和人造纤维纸浆，并提出即使是这些货物也必须只运给那些得到美国当局批准的收货人。美国当局特别希望瑞典停止钢铁的出口，因为巴两对他们享受不到阿根廷享有的便利表示不满。但是英国政府不愿意参与这一行动；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这样做，因为它与瑞典订有战时贸易协定，并且他们也不准备使用封锁这种方法强迫一个中立国。不管阿根廷的中立使联合国家感到怎么烦恼，它似乎还不是一个适合进行经济战的问题。

1942年以所有三方面都彼此大为不悦而告终。美国政府内部的看法存在分歧，人们强烈要求断绝美洲的供应，以迫使瑞典也相应地断绝对德国的供应。瑞典坚称，自从1939年与英国签订战时贸易协定以来，情况已大大改变了；他们后来同意以对德国出口实行某种限制来换取从海外进口的某些便利，但是，由于德国占领了欧洲，对进出口的限制变得更为广泛了；瑞典对德国的出口，特别是铁砂必须继续保持下去，以使它能够获得象煤之类的必需品进口。英国人觉得，瑞典对石油限额所采取的行动，以及瑞典人在伦敦所发“无益”的牢骚，对英国在华盛顿为支持瑞典获取合理供应的要求所作的努力并没有起什么促进作用。瑞典人为什么不设法使美国人相信他们的要求是合理的呢？最后，三方面一致同意就签订一个把美国也拉进来的和适应新形势的新贸易协定举行谈判。与此同时，美国仍然对瑞典和阿根廷之间的贸易感到不安，虽然它这时准备采用谈判而不是强制的手段。在谈判开始前，有过一些初步的小争论。瑞典和美国在关于战时贸易谈判的范围上，有一度意见不能取得一致。英国政府只是勉强同意了讨论瑞典同阿根廷的贸易问题，他们希望能使瑞典当局早日释放“莱昂内尔”号和“迪克托”号两艘盟国船只，俾使这两艘船能利用良好的气候条件装载贵重的货物（滚珠轴承和机器）冲破德国的封锁。1943年1月，瑞典政府在盟国扬言要切断哥德堡的交通后勉强同意释放这两艘船：德国及时得到了警告，因此这73两艘船未能启航。但是，德国人却自行把哥德堡的交通封闭了几个月。一直到1943年5月10日，才开始举行战时贸易谈判；而在经过一些危机和濒于出现僵局后，才于9月23日正式签订了一项协定。不过在6月19日就已达成了草约，并在6月30日到9月23日这段期间就按；照一项“君子协定”执行这个草约。

由于战争趋势日益有利于盟国，这项新协定使盟国在外交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瑞典人应允：除了在一个有限范围内给芬兰信贷外，不再给敌方任何信贷；保持他们对敌方出口的一般价格水平；削减1943年对敌方输出的总值，至少要比1942年少一亿三千万克朗，并在这项削减中，包括一定数量的为盟国所重视的商品。1944年还要作更大幅度的削减：铁矿砂的出口量一年只限七百五十万吨，其比例是每从敌方进口一吨煤或焦炭，输出的铁矿砂不得超过二吨；1944年除了锌和硫化矿以及一定限量的硅铁以外，其他所有的矿砂和铁合金一律禁止向敌方出口。在1944年，各种其他商品的出口数量将限制在1942年的百分之七十五。有四十种指定的出口物资，其中包括工具钢、高速钢、不锈钢和滚珠轴承，也将明确规定限额。为了换取这些和其他一些让步，英国和美国政府同意瑞典可按基本定额进口，还同意每月来往于

哥德堡港的船只可从五艘增加到六艘。关于瑞典和阿根廷的贸易还订有一项特别条款，规定在瑞典能够自由向拉丁美洲各国出口以前，瑞典应将它向阿根廷的出口限制在纸张、造纸用的木纸浆和人造纤维纸浆这些商品上，而且必须运交给经英国和美国认可的收货人。倘若阿根廷当局采取报复行动削减对瑞典的出口，盟国答应要尽最大的努力，在别处设法提供这些商品或重新考虑这一形势。另外还规定，在联合常务委员会中，美、英、瑞三国应占有同等的席位。

结果表明这项协定是对盟国立场的一种讨好的表现；瑞典人之所以作出让步，是预计盟国将会战胜德国，然而过了两年之久这一胜利并没有实现。因此，瑞典人 74 有一段时间不象 1943 年夏季那样，对盟国的压力俯首帖耳，且在 1944 年上半年中，双方都有过直言不讳的情况。1943 年，瑞典当局一再作出保证该年的铁矿砂出口量决不超出正常的贸易额，盟国将此数计算为九百九十万吨，瑞典则认为是一千万吨。但是，事实上，1943 年的数字超过了一千零二十四万一千七百三十七万吨。1943 年 11 月发现瑞典当局没有遵守这个诺言：停止颁发克纳本矿所需的机器或维修机器的出口许可证。瑞典在 1943 年 10 月 1 日曾答应不再让德国经过瑞典向芬兰（和挪威）输送人员和材料，结果却发现德国还是在继续通过波的尼亚湾向外出口，瑞典人认为这条路线的运输量不属于盟国所坚持的每年十二万吨（非军用过境运输）的最高限额之内。但最主要的还是滚珠轴承问题。

瑞典政府及时地对盟国的一些这种指责作了答复，但从不接受盟国对于事实的一般解释。1944 年 1 月 11 日签订的德瑞贸易协定规定，瑞典对德国的结算支付总数约为七十万克朗，其中四十五万克朗将由各种不同商品的出口额来抵补：后一个数字比得上 1943 年的五十五万克朗。差额将由无形输出和贷款偿付补足。铁矿砂出口量将限制为七百万吨而不是一千万吨；滚珠轴承的出口限值为二千一百万克朗而不是四千五百万克朗；伦敦方面获悉，其他项目都是根据伦敦协定办理的。据悉瑞典还拒绝了德国为其提供的大量军需物资。所有这些事实表明，瑞典人虽然准备承认盟国终将获胜，但是，他们还是在相当细心地调整它与交战国的关系，这使得盟国对于它们应该采取什么策略最妥产生了怀疑。1944 年 1 月，盟国要瑞典政府作出保证，在 1944 年第一季度中，每月的铁矿砂出口，将不超过二十万吨，第一季度的总数，不超过四十八万吨。正如势所难免的，瑞典拒绝了这个要求，虽然它答应今后将不过分加快交付铁矿砂。与此同时，华盛顿的后勤部门又重新对允许供应品运到欧洲中立国特别是运到瑞典的政策提出了它们早先的反对意见，而其主要反对目标是瑞典每年十二万吨的石油分配定额。英国经济作战部强烈反对这些意见，理由是，根据三国的经济协定，这项石油定额是作为瑞典对盟国所作出的并且为盟国所不希望失掉的重大让步的主要报酬。国务院虽然也有这种看法，还是觉得不得不向瑞典政府枕有关瑞典违约问题提出异议。英国也参与了施加压力，但有些怀疑这种做法是否明智。战争到了这一阶段，提出一些不能行之有效的要求似乎也不是得当的。4 月份瑞典政府在回答 3 月 17 日盟国提出的一份联合的抗议照会时，坚决否认曾经违反过经济协定。看来肯定英国政府认为争论是无益的。而美国官方意见也有分歧。

然而，英美两国政府在滚珠轴承问题上却是完全一致的。整个战争期间，

无形输出：指出口贸易以外的运费、保险费等国际支付。——译者

盟国都在寻找敌方经济上的致命弱点，虽然盟国的计划不得不以制造德国全面匮乏为基础，他们一直希望能创造或发现可以使整个德国工业体系陷于停顿的特殊困难或明显短缺的情况。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盟国在战争初期就满怀希望地着眼于石油、铁合金和冬季服装材料上面。在 1943—1944 年的冬季，似乎滚珠轴承能够解决这一问题，于是计划开展一个运动，来把一切适当的压力手段协调起来。滚珠轴承是制造飞机不可少的东西，它确实能为进行这种打击提供一个机会，因为德国的供应来源有限，而这些来源全部可以在有利的情形下由盟国加以堵塞。瑞典是国外供应来源一个最重要的国家。滚珠轴承是瑞典人发明的，瑞典轴承公司是主要的生产者，此外还有它的一些联合商行。在德国，轴承生产都集中在少数几个中心，其中施魏因富特是最重要的中心，它占德国生产总量的百分之七十五。因此在 1943 年的后几个月里，盟国协力搞了一个运动，谋求利用先买权切断瑞典对德国的供应，并集中轰炸来使德国的工业停顿。这一企图失败了，这倒不是因为基本的概念错了——德国在这方面是危险地依靠着集中的生产——而是因为盟国无法进行一场十分强大的、足以全面获胜的空袭。1943 年对施魏因富特、埃尔克纳、坎斯培特和斯太尔的轰炸是极其厉害的；阿尔伯特·施佩尔后来说，如果盟国随后能迅速持续不断地轰炸下去，德国的这项工业可能会被摧毁。1943 年春季，轴承每月平均产量九百六十五万六千六百九十四个；1943 年 3 月，降至六百八十一万一千九百个。然而，德国采取了猛烈的反措施，就在这个时刻挽回了局势。盟国在这些空袭中遭到了极其惨重的损失，最终在 1943 年 10 月 14 日对施魏因富特的那次空袭中达到了顶点，证明盟国的空中力量无法继续保持同样程度的压力了。到了 1944 年春，德国疏散了一些工厂，又修复了一些工厂，从而使这项工业免于全部毁灭。在瑞典，先买权并未能阻止各种类型的轴承的继续出口，这些轴承被认为对德国是特别重要的。必须附带说一下，德国人使用滚珠轴承一直是大手大脚的，并且发现他们能够大大缩减使用轴承而并不严重影响效率。因此到 1944 年春，当开始对瑞典施加重大压力时，可能就已在这方面失去了给德国以真正的致命打击的机会了。4 月初，驻斯德哥尔摩的美国公使，在他的英国僚的支持下，要求停止向轴心国出口滚珠轴承；这项要求遭到了瑞典政府的拒绝，于是这个问题就交给瑞典轴承公司同为此而委派的英美专家去谈判。从 5 月 13 日到 6 月 8 日，在谈判正在进行的同时，轴承的出口暂时停止，英国和美国终于能够以威胁加上财政上的诱惑同瑞典缔结了一项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从 6 月 8 日到 10 月 12 日瑞典每月运交德国的货物要从价值二百万克朗减至四十七万克朗；每月给卫星国和被占领国的货物从四十万克朗减至二十九万八千克朗。

到了 1944 年秋，战争的形势很明显地日益朝着有利于盟国的方向发展，因此，瑞典政府觉得应该逐渐减少他们对德国的出口，虽然他们在这样做时十分慎重，使得伦敦和华盛顿有点不耐烦起来。但是，德国和瑞典之间的所有贸易到 1945 年 1 月终于停止了。

瑞士的境况也同瑞典相仿：由于法国沦陷，它与盟国的一切直接联系都被切断了。出于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双重原因，它觉得不得不同轴心国的经济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从法国沦陷到 1942 年年底这一整个黑暗时期，伦敦一直认为，权衡得失，同瑞士保持经济联系是有利的；即使在这种

情况下，有条件的援助政策表明收获有限，但也从未完全放弃希望。因为在经济战领域以外还存在着其他一些有利因素：譬如瑞士可以很方便地作为一个战俘的交换所，各种德国情报的来源地，以及通过各种秘密渠道运抵盟国的小量贵重物资的供应者。因此，切断同瑞士的经济联系，并把它列入对轴心国的封锁范围内的建议，虽然经常在考虑中，但总是搁置起来了。至于瑞士方面，它坚持要求通过封锁线运送物资，争辩说否则就将使他们完全丧失同德国人与奥地利人讨价还价的力量。

1941年7月，在瑞士和德国签订了新贸易协定后，英国决定采取一些措施以有效地阻止瑞士工业为轴心国生产服务，而又不至于使瑞士人民迁怒于盟国，或削弱瑞士军队的抗战意志，或促使瑞士当局与盟国断绝外交关系。1941年，德国曾同意预支四亿法郎给瑞士的制造商，1942年又预支了四亿法郎，以使它们能继续为德国生产那些德国在结算时财力感到缺乏的货品。因此，英国决定，在继续供应现行的粮食和饲料定量的同时，通过封锁对凡能有助于敌人作战力量的一切工业原料和其他物资全面禁止进口。这个决定引起了瑞士方面很大的骚动，瑞士公众和报界似乎认为他们的国家仍然能按同等条件同双方交战国进行贸易；因此，英国的封锁措施受到了批评，虽然某些政界人士似乎也知道，他们的政府是在自我麻烦。在伯尔尼，瑞士政府力争至少要对部分工业原料解除禁运，并提出派遣一个代表团去伦敦商谈；伦敦方面说，英国政府可以开始举行谈判，不过条件是瑞士方面要从轴心国那里获得更多的便利以出口有利于盟国事业的物资。谈判没有取得真正的进展达几个月之久，1942年1月，由于瑞士允许德国居民搜集和寄发衣服、靴子、雪橇等到东线去的行径，暂时停发了棉、毛纺织品的航行证。后来，在3月份，一个以汉斯·苏尔泽博士为首包括凯勒教授（他以前参加过1940年至1941年的谈判）在内的瑞士贸易代表团到达伦敦，坐下来进行了一场漫长而无结果的谈判，一直持续到年底。

从一个角度看来，这种毫无进展的情况正是盟国在1942年处境的真实反映。瑞士政府并不觉得有必要改变他们的政策而明显地偏袒盟国。“但是，不久就很清楚原来瑞士政府之所以决定采取这种政策方针，不只是考虑到他们在中立法律上的种种细节，或者甚至是出自对德刚报复的正常的恐惧。虽然这些考虑确实是重要的，但是，除此之外，还有瑞士的制造商的很大的政治影响问题，因为这些制造商正在同战时德国进行十分有利可图的贸易。因此，讨价还价采取了越来越多的斗智的方式，在这些斗智中盟国不得不解除封锁，而没有在损害德国78上取得任何补偿。至于盟国方面，到1942年春天，他们在许多重点物资方面已经不再象1941年那样依赖瑞士人；而英美两国的供应当局也不情愿输送任何稀有原料去瑞士了。1942年年底的形势是瑞士与盟国准备同意进行一项“补偿交易”，在瑞士与联合王国和美国之间将以价值为二百五十万瑞士法郎的货物相互交换，并在1942年12月14日签订了一项根据这些原则的协定，但是，它一方面必须得到德国的同意，另一方面瑞士必须接受盟国一项重大的要求，即逐步削减向德国输出武器与机械。这两个条件无论哪一个都不可能实现。虽然德国人同意作为一项临时措施，

在 H.E. 杜特维勒的《海战和中立国的经济政策》（H. E. Duttwyler: Der Seekrieg und die wirtschaftspolitik des neutralen Staat-es），苏黎世，复制出版社，1945年版，第201—214页，有关于大战后半期瑞士航运问题的叙述。

允许瑞士对联合国作有限的出口，但提出要以缔结一项新的瑞士—德国协定作为同意进行补偿交易的条件。瑞士显然确曾竭力争取德国人同意削减输往德国的货物；在瑞士达不到这个目的时，谈判就在 1943 年 1 月中旬破裂了，于是瑞士停止了在 1941 年 7 月给予德国人的信贷便利。在此期间瑞德贸易继续在一种零星解决的基础上进行下去，结果瑞士放慢了向德国的出口，这是英美两国政府觉得颇力满意的一种形势。接着，在 1943 年 3 月，瑞士又同德国重新开始谈判了；瑞士方面同意允许德国人根据旧协定使用结算贷款的余额，但作为交换条件必须保证根据协定补足尚未完成的交煤尾数，他们还提议允许按照新交的煤的比例给予进一步的结算贷款。自从 1 月中旬以来，盟国所认为满意的瑞士对德国出口的趋势，如今开始出现逆转；这使他们大失所望，接着便采取了惩罚性措施，临时禁止发放给瑞士一切货物的航行证和出口许可证，粮食也包括在内。

这些压力或许起到了一些作用，虽然，瑞士和德国在 1943 年 6 月所签订的临时协定，将其中盟国感兴趣的若干关税项目数字削减到 1942 年的百分之二十，但显然并没有排除瑞士根据煤的交付情况进一步给予德国信贷便利的可能。无论如何，盟国要求瑞士进一步削减其不利于盟国的出口货品，当瑞士政府表示接受其中某些要求时，盟国同意从 8 月中旬起开放粮食的一半定额。盟国还同意在伦敦接待一个瑞士代表团，讨论进一步阻止瑞士与德国的贸易和其他一些事项。后来，他们经受了另一次震惊，因为发现 1943 年 5、6、7 三个月间瑞士的出口数字中，在不利于盟国的出口货方面显示出非常大的增长。盟国决定暂不撤销最近的让步；但是把即将到来的伦敦会谈的议程提交给瑞士方面时，提出了要瑞士作出比它们迄今所打算提出的更为苛刻得多的让步。

盟国最有效的武器是黑名单。在瑞士，就同在瑞典一样，黑名单在战争发展到这个阶段，其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使人害怕被排斥于战后市场之外，而且由于盟国的最后胜利已越来越指日可待，中立国一些商行对可能被列入黑名单的反应，成了他们估计战争变化前途的一种可靠标志。于是产生了一种要对德国所施压力采取更大胆的方针的相应倾向，部分是因为害怕报复的心理已有所减轻，部分是想避免吃被打败了的主顾的倒帐。在 1943 年头几个月里，已有几家瑞士商行作了一些试探性的查询，问到被列入名单的商行在战后是否会遭到歧视。6 月，一批瑞士商行同意将他们向德国输出的导火线限制在以前供应量的百分之二十五，以换取从法定名单上除名，及准予出口新式电动缝纫机的便利。1943 年上半年期间，英国当局考虑到补偿协定，并希望瑞士政府能自己限制手表和冶金工业产品对德出口，因之没有把瑞士的手表和冶金工业的商行列进法定名单。等到这种希望破灭后，便又对这些商行重新施加压力，而那份伦敦会谈的议程倒有点象一份最后通牒了。提供讨论的建议包括停止向轴心国贷款，进一步削减武器和机械的出口，敌方使用瑞士铁路，瑞士银行的业务活动问题，以及在不直接由英美控制的地区内如何协调瑞士的采购和联合国的采购等问题。

盟国在要求苏尔泽兄弟公司这一重要商行作出保证将它的绝大部分出口限制在战前的水平时，表明了盟国确实是当真的，这一要求和伴随而来的列入黑名单的威胁颇具有一种戏剧性的特色，因为这个商行的首脑汉斯·苏尔

或许是因为几个月前瑞上当局已向一些较重要的商百发出了可能将实施出口限制的警告。

泽博士曾经在 1942 年率领过一个代表团去伦敦，而且他是政界中一个受人尊敬的颇有势力的人物；再说，这家商行也是瑞士柴油机和其他重型机械的制造厂家。撇开这家或其他商行可能起到的任何个人影响不谈，形势对于瑞士政府说来，是日益困难了：由于英国和 80 美国的压力诱使瑞士的企业接二连三地各自作出了限制同德国进行贸易的保证，瑞士政府面临着他们的经济将会陷于混乱，同德国进行顺利的经济交易的可能性将会遭到破坏这样一个前景。这一高潮在 11 月初到来了。10 月间，瑞士力促盟国放弃其寻找个人保证的做法，但属徒劳；而盟国也同样徒劳地继续在谋取苏尔泽兄弟公司的保证。瑞士提出的反建议被认为没有多大价值。因此，1943 年 10 月 30 日，苏尔泽的名字被列入英国法定名单和美国公布的名单上，11 月 4 日，瑞士联邦议会发布了一项法令，禁止瑞士商行就他们的出口业务对任何其他外国政府作出保证。但是，盟国显然已处于主动地位。凡禁止粮食进口而没有获得的东西现在都已迅速得到许可了。凯勒教授被派往伦敦，并在 1943 年 12 月 19 日的互换信件中很快商定了令人满意的条款。

盟国以恢复粮食和饲料限额并修改黑名单的政策作为交换条件，取得了瑞士同意大大削减其输往欧洲敌占区的武器和机械。由于自 1942 年以来价格上升，这样削减的结果使瑞士在 1944 年上半年中的出口比 1942 年少了近一半。这是把武器、弹药、轴承、工作母机、导火线和无线电设备这些重要物资的出口都算在内的。此外对加工与维修的交易也实行了限制。

同瑞士进行的战时谈判，还要经历另一个阶段。12 月的协议曾规定就 1944 年 7 月 1 日以后限制瑞士出口的范围进行讨论，其限制范围不得小于新协议所规定的。现在时机已日趋成熟，可以象对瑞典那样要求瑞士也同德国断绝一切联系了。瑞士代表团于 1944 年 2 月到达伦敦，在一段时间内讨论只限于解决 12 月协议中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5 月份，英美两国政府要求全面禁止轴承、武器，弹药以及导火线的出口，并要求大幅度减少其他项目的出口。由于盟国攻进法国，以及法国交通线的混乱状况，使谈判中断了一段时间，但是，在把谈判一度移到伯尔尼举行之后，就在 7 月将瑞士的建议送往伦敦。盟国在瑞士的边界没有打通以前，不愿意向其运送工业原料，瑞士则不愿意中断这段运输线路（从德国经过瑞士），而这条运输线，对于盟国在那漫长而使人疲惫；的意大利战役中，却似乎是非常重要的。8 月 14 日，双方交换了一些多少没有结论的信件，约定延长 1943 年 12 月 19 日协议的期限，进一步削减运往敌方的瑞士出口；但是，盟国仍旧不准备重新开放工业原料的限额，并预先通知瑞士说，希望它能作出进一步的让步。盟国不久又重新施加压力了。1944 年 10 月 1 日，瑞士完全禁止了武器、弹药、飞机零件、轴承、导火线及其他军用物资的出口，但没有禁止盟国所提出的那张长长的单子上规定的运输车辆。10 月底，瑞士又禁止了使用辛普龙隧道作转运路线，但不禁止使用戈特哈德路线。但是，现在形势正在迅速变得对盟国有利，而且由于切断了德国至瑞士的干线，瑞士不得不考虑唯一的一个急迫问题，即它同胜利在握的盟国的将来关系。1945 年 1 月，盟国方面接受了派一个代表团去伯尔尼的邀请，4 月，盟国的所有要求都在伯尔尼达成的一项协议中得到了满足；负责谈判的是经济作战部的丁格尔·富特和罗斯福总

根据戈登和丹杰菲尔德的《隐蔽的武器》，第 93 页，汉斯·苏尔泽曾“小心谨慎地造成‘亲盟国’的名望”。

统助理劳克林·柯里。这项协议禁止把煤、铁、废铁和钢从德国运往意大利；把其他的运输量削减到微不足道的数额；把瑞士对德国的总出口量，削减到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数字；并规定切断输往德国的电力。其他一些条款都是有关将来的。战利品的问题在一条条款中得到了解决，这条条款规定瑞士政府将阻止利用瑞士的领土来处理、隐藏和接收那些在战争期间可能是非法或用强制手段取得的资产。瑞士已经颁布的一项冻结德国资金的法令继续有效。瑞士还答应，除了外交开支所需的数量，包括作为保护国所必不可少的开支以外，不再购买德国的黄金。作为交换条件，瑞士被通知，除了那些短缺货物以外，不再以任何封锁的理由来限制他们的进口。

土耳其和葡萄牙是英国两个非交战国的盟友，他们在政治上的同情以及与盟军的接触，本可以鼓励他们采取比瑞士和瑞典更大胆的立场来抗衡轴心国的压力。但是，上述两国，情况却完全相反：在德国人眼里，这两个政府似乎很想用一种妥协的经济政策来弥补他们的政治从属关系，其次，由于两个国家都拥有一种为人所急需的矿藏——葡萄牙的锰矿，土耳其的铬矿，为了这个目的，外来的压力是不会少的。在战争中期，这两个国家都采取了在双方交战国之间平均分配战略物资的做法，从而能以他们不偏不倚与现实主义的态度为理由，为他们的行动作辩护。由于德国对供应问题比考虑经济战更感兴趣得多，它对这一情况要比各大盟国更感到满意。

土耳其在 1940 年 1 月 8 日的经济协定中，同意在 1942 年 1 月 8 日前，给英国和法国以采购土耳其铬的权利，并且可以再延期一年。但是，英国的谈判代表拒绝接受较长时间的束缚，后来情况证明这样做是不明智的。这时，土耳其政府认为它们的军备力量不足以参战（英国也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还认为盟国应补偿他们在同德国断绝正常贸易后所受到的任何损失（这是英国政府不得不表示一定程度的异议的）。法国沦陷后，英国政府继续努力使土耳其摆脱对德国经济的依赖，而且到了 1941 年春，成功地取代了德国，成为土耳其最好的主顾和供应者。但是英国仍未能在军备方面满足土耳其的需要，后来德国进入了巴尔干各国，使土耳其不得不在秋天对德国作了很大的让步。因此，克洛迪乌斯博士得以在 1941 年 10 月 9 日同土耳其签订了一项协定，根据这项协定，两国保证在今后的十八个月中，各自互相供应价值一亿里拉的各种商品，此外，土耳其还答应在 1943 年和 1944 年，每年供应德国九万吨铬，以抵偿德国以前运交的一千八百万里拉货值的战争物资。从这时起，美国就联合英国政府一起加入了这场讨价还价，并且倾向于采用强有力的方式。1941 年 9 月，当时还弄不清楚德国是否会在 1942 年得到铬的供应，作为战争物资的主要供应者的美国政府就威胁说要停止给土耳其战争物资，如果它不继续供应铬的话。这原可能驱使土耳其投靠德国的，英国政府对他们得到了土耳其的同意将协定延长到 1943 年 1 月 8 日很感高兴。经济作战部把这一采购 1942 年剩余物资的机会看作是迄今为止所达成的最重要的优先购买的交易。菲律宾沦陷后，美国的铬供应问题变得严重了，据估计，1942 年它将需要四十万吨。1942 年 2 月，美国政府同意包购土耳其 1942 年全年主产的铬，估计有二十三万三千吨，并帮助提供必要的航运工具。除了盟国的供应需要以外，最为重要的一事就是不让土耳其在 1943 年 1 月 8 日还

有关德国的资产问题一直要到 1946 年 5 月方才最后得到解决（见下文，原著第 227 页）。

见上文：原著第 30 页。

保存一点点它在 1941 年或 1942 年生产的铬，83 因为看来土耳其只用 1943 年的产量未必就能满足德国的需要。但是，运输问题仍是盟国所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要完成把所有存货都运走这项工作，土耳其的铁路和港口设施是不够用的。尽管如此，这一年里，实际上还是运走了十二万多吨的货物，其中优先装运的是高级矿砂。

盟国也多次考虑过削减对德国供应其他物品的问题，在 1942 年问，以先买权买得这些商品的结果似乎是相当令人满意的。根据这个时期英国的采购和土耳其出口德国的吨位的净减少情况来判断，证明这种看法是有些道理的，但是尽管如此，形势对盟国的真正成功并不有利。1941 年，经济作战部决定用它有限的采购力量来购买羊毛、橄榄油、壳斗、山羊毛和硼砂五种货物；1941—1942 年冬季开展的筹借寒衣运动需要采购羊毛和山羊毛，幸亏土耳其政府在这个阶段禁止羊毛出口，山羊毛就一度成了优先购买的最重要的货品。不过要真正推翻克洛迪乌斯的协定证明是不可能的。土耳其政府不准备发给英国买主大多的出口许可证，以致影响对德的交货。当时固然可以在公开市场上购买而无需申请出口，但是认为这样做会损害同土耳其当局的关系，是不明智的。英国政府还可以限制向轴心国出口供土耳其用作出口包装材料黄麻和白铁皮；他们在这方面是处于强有力的地位的，因为黄麻是从英镑地区进口的。整个 1941 年，禁止向土耳其出口黄麻，并且扬言要把土耳其的商行列入黑名单。因此，土耳其当局在 1942 年 12 月同意，土耳其的出口商必须从他们的外国主顾取得包装材料；在这件事上，经济作战部是有力量对土耳其当局施加一些压力的。但在铜的问题上，情况正相反。出现了一种很不合理的局面：根据英土军备协定，英国政府提供了一笔军事贷款，并答应为土耳其的军工厂和防务计划供应包括制铜和电解铜在内的主要设备；而同时，土耳其却在大量生产粗铜，而大都是运往德国以换取制成品的。经济作战部自然极其主张应该说服土耳其要么把等量的粗铜交还英国，要么禁止向德国出口。但是外交部不同意在英国销售业务中附带任何这样的条件，理由是在军事贷款的条款中，并未要求土耳其用实物来偿还它的进口物资，况且任何这种规定都将与不能拒绝给土耳其任何可以加强它的对德防务计划的东西这一既定政策相抵触。因此，土耳其继续从英国进口铜产品，而同时又把铜向它的敌人出口。

正是这种封锁政策从属于政治策略上的考虑的不合理情况，才使得削减土耳其向轴心国出口的这一妥协措施一直推迟到 1944 年。1942 年底后盟国形势的好转，导致了盟国以日益强硬的态度要求土耳其更加积极地和盟国合作。但是一般认为，最明智的方法是通过说服而不是采用压力。卡萨布兰卡会议以后，丘吉尔同土耳其总统于 1943 年 1 月 30—31 日在阿达纳举行了会谈，讨论的范围涉及到整个军事和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在英国的计划中再次强调了向土耳其提供援助可以帮助他们加强防务安全的重要性。据信他们得到了土耳其友好的表示，因此，通过坦率的商谈将有可能取得结果。可是情况证明并非如此。从盟国的观点来看，有关铬的供应这件事仍然是令人不满的。土耳其政府在 1942 年 12 月同意盟国以高价采购 1943 年 1 月 8 日前生产的全部的铬，1943 年又同意英国采购现有合约以外的全部的铬。他们不同意如果克洛迪乌斯协定的条件在 1943 年 3 月 31 日以前得不到履行时，德国

对铬的要求就应失效。因为在 1943 年 3 月 31 日以前，德国只提供了答应提供的价值一千八百万里拉军事物资的一部分，因此，德国得到的也只是相应的一部分铬；根据协定，土耳其政府本来可以拒绝进一步供应，但是，1943 年 4 月 18 日却又签订了另一个土德协议，将克洛迪乌斯协定延长到 1943 年 12 月 31 日。盟国获悉这个协定的详细情况后，他们发现，德国所需要的具体数量的土耳其货物都为他们保留下来，并将肯定被用来换取土耳其所需要的物资。根据经济作战部在 1944 年春季收集的数字，德国在 1943 年实际得到的数量（公吨）如下：到了 1943 年夏，经济作战部已经得出了悲观的结论，认为进一步以先买权进行购买是徒劳的，它只有在土耳其政府允许盟国购买其可以出口的剩余，而且其比例要大到足以影响德国的计划时才有价值。唯一可以选择的方法是进行非官方的购买，但是，英国方面又认为这将危及土耳其对盟国的友好。最初有人建议再次向土耳其政府提出新的呼吁，要他们表明他们的诚意，缩短战争的 85、愿望，以及对供给军事物资的感激。但是，美国政府并不完全同意英国这种悲观的看法，因而在 1943 年 7 月决定不放弃先买权，而准备开展一场新的运动。因此，在 8 月底，授权驻安卡拉的英国大使动用二百二十五万英镑，美国也提供了同样数目的款项；由英、美各组织通过英美采购委员会共同进行采购。在整个那年冬季中，这种代价高昂的尝试一直继续下去，但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实效。

盟国最后在 1944 年 2 月采取了坚决的行动。1944 年 2 月 6 日，突然从安卡拉召回了英国军事代表团，并中止了武器的出口。盟国一致同意今后对土耳其的供应必须要便于行使先买权；例如，向土耳其提出了警告，除非土耳其同意送回所欠的全部粗铜，否则联合王国将不再输出电解铜和铜制品。当时没有立即得到回音。但是，到了 2 月，土耳其同意偿还其所属全部欠联合王国商业公司的大量债务；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债务长期拖欠已严重妨碍了英国的采购。4 月，土耳其政府接到通知，继续向德国供应重要的战争物资将迫使盟国对土耳其实行封锁；4 月 20 日土耳其政府宣布完全停止向德国装运铬。5 月 24 日，丘吉尔在下院严厉批评了土耳其的行为；6 月，当土耳其违反蒙特勒公约，允许德国船只经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爱琴海时，盟国又提出了抗议。接着，土耳其外长在 6 月 15 日辞职。同一天双方宣布已签订了一项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土耳其将把对德国的出口削 86 减至 1943 年总额的百分之五十，并将作进一步的削减，以换取盟国等量物资的供应。从这以后，土耳其清楚地表明它愿意除了参战以外，对盟国提供一切援助。它终于在 1944 年 8 月 2 日同轴心国断绝了一切关系。这样尽管盟国采购上耗费了大量的金钱，但从全盘看来，盟国经济战的种种措施在土耳其是失败了。它的所以失败，是因为政治上的考虑压倒了一切，以致他们不能运用有效的压力手段。虽然德国在某些方面未能得到它根据合约所订购的一切东西，但是，这更多地还是由于土耳其政府的政策，而不是由于盟国的压力或反采购措施而使市场脱销的缘故，因为土耳其政府是决心要从德国得到它的交换品的。在破坏土耳其与德国的贸易协定这一点上，盟国无疑是失败了；而那种总的说来德国的境况也并不见得好些，因为德国也必须要交换供应品

下院辩论，第 5 辑，第 400 卷，第 764—766 栏。

见下文，原著第 361—362 页。

见下文：原著第 362 页。

的论点，当然不能使盟国封锁当局信服。轴心国和盟国是在伊比利亚半岛以大抵相等的条件展开了经济战的，但却存在着这种颇为矛盾的复杂情况，盟国从轴心国的非交战国盟友西班牙得到的东西比从英国的非交战国朋友葡萄牙得到的东西要多。在葡萄牙就象在土耳其一样，政治上的考虑（特别是1943年签订的亚速尔协定）限制了施加经济压力的可能性，但是，这还不能完全解释这种差别的原因所在。葡萄牙供应的钨锰矿对轴心国极为重要，而且这是很有利可图的，也是葡萄牙无论怎样都不能拒绝供应而不引起对德国干涉的严重担心：另一方面，西班牙对轴心国提不出这样显著有利的条件，它很想避免战争，而且到了1941年年底（即使不是在这以前），佛朗哥将军似乎已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经济上依赖盟国比依赖轴心国会更容易保持它的非交战国的地位。盟国确实除了期望或要求其真正保守中立以外，别无他求，但是，他们能够提供物资，并希望在战机变得有利于他们时，政治上的中立将不妨碍他们在经济领域中获得更多的好处。

因此，西班牙可以同双方进行交易，并在一定限度内也可以抗拒压力。但是，由于以外长塞拉诺·苏内为代表的长枪党分子不愿做任何可以促进西班牙摆脱轴心国影响的事情，因而形势变得复杂了。在美国，那里的政治情绪大部分是对佛朗哥政权抱有强烈的恶感的，虽然给西班牙运送物资和给法属摩洛哥运送物资情况类似，且至少同样有理，但是英国政府要说服美国使其相信如果试图用停止供应的办法来压制西班牙，就会自食其果，却是不容易的。但是这个分歧是容易消除的，如果说每个民主国家都有它自己的法西斯保护人，也都有它自己的反法西斯的人，如果说英国不愿为维希政权及其殖民地提供物资，正如同美国不愿意在西班牙冒险一样。但是看来英国对这两方的态度是一致的，而且是取决于条件是否有利的。维希政权和马德里政府对德国的立场表明，前者不能，而后者却可以借经济援助来帮助它获得更多的政治和经济自主。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对这两方的态度却都有分歧。经济作战委员会（后来的对外经济管理署）一直怀疑运往西班牙或摩洛哥的供应品都可能落到轴心国手中；国务院的一些部门无疑比较乐意在摩洛哥冒险，而对西班牙，则好几次回到使用高压手段。而英国方面鉴于西班牙的心理状态和盟国处于比较软弱的讨价还价地位，认为这种高压手段是拙劣的策略。

在美国参战前夕，形势是这样的：紧接着佛朗哥在1941年7月17日和18日发表的讲话及塞拉诺·苏内与韦德尔（当时的美国驻马德里大使）之间的争吵之后，有一段时间西美关系异常紧张，结果美国放慢了向西班牙装运石油的速度；伴随而来的是西班牙工业贸易部向美方建议愿意增加西班牙和美国之间的经济往来。秋季，由于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字（错误地）表明最近有大量航空汽油和润滑油运往西班牙，因而引起国内激进的新闻界掀起一场反对美国向西班牙供应石油的运动。1941年11月29日，经过国务院内的多次辩论和在口头上的妥协，提出了美国的条件。美国将供应基本数量的

见下文，原著第336页以后。

见下文。原著第285页，第290—291页。

有关1940年运往西班牙的石油问题，见下文，原著第287页。

赫伯特·菲斯：《西班牙史话，佛朗哥和交战国》（*The Spanish Story, Franco and the Nations at War*），纽约，诺夫，1948年版，第149页。

石油，美国能够匀得出来而是西班牙所缺乏的货物和西班牙能在美国市场上自由买到的其他美国产品。作为交换条件，石油的分配和用途必须受美国代理人的监督；石油和对轴心国具有价值的其他进口货物不得出口，西班牙必须准备帮助美国取得钨砂、软木、水银、锌、铝、萤石和其他西班牙产品。如今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当时美国的强硬态度在一定限度内是不起作用的；但是英国当局下述的看法似乎也是对的，即认为西班牙人的脾气、政府内部各种力量的不平衡以及佛朗哥尚拥有很大的讨价还价能力，使得单纯运用高压手段未必能很好地贯彻盟国的计划。这些讨价还价的武器是什么呢？一种是英镑。在 1941 年夏季，由于英国的采购，西班牙早已积累了大量英镑结余，可以提出满足它的进口需要的要求了。另一种武器是钨。直到那时为止，西班牙的钨产量很小，但是由于割断了横贯西伯利亚的路线，伊比利亚半岛就成为德国可以取得供应的主要来源；有充分理由可以相信，它将迅速增加它在西班牙的采购。1941 年底，几乎那里的全部产量，可能有八百吨早已在德国手中。西班牙还拥有另一种讨价还价的武器，那就是它在同轴心国保持密切政治联系的同时，愿意把自己纳入盟国的经济轨道。在英国人看来，西班牙的行径实在令人气愤，足以证明国务院的强硬方针是正确的。然而，西班牙的地位具有很大的力量，采用高压政策也并不适宜。到了 1941 年年底，由于德国不能向西班牙供应货物。一时积累了很多无用的德国马克，西班牙就拒绝发给某些出口德国的物资的许可证；因此，他们准备迎合英国的计划，进入市场，按当时与德国类似的条件来采购各类货物。但是要使这个计划获得成功，必须不断由英美来源提供供应。

从 1941 年 11 月到 1942 年 2 月，西班牙和盟国一直在讨论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经济协作的问题。美国在此期间继续停止供应石油，部分地是由于错误地认为，只有施加这种压力的结果才能使西班牙就范。英国希望从西班牙进口价值三百万英镑的西班牙产品，包括钾碱、锌、铝、毛纺织品、汞和钨。西班牙则要二千吨橡胶和六百吨锡，加上其他一些产品——主要是美国的小麦和石油，同时继续拒绝发给英国所要求的货物出口许可证。2 月初，美国政府终于同意放行三艘油船，并加入英国对西班牙的联合采购计划。从这一点开始双方才能够制订出详细的供应和采购计划来了。虽然国务院勉强地承认有此需要，89 相信“为了对付绥靖主义的论点。必须从这两个国家争取尽可能多的东西”。部分由于西班牙采取了一种乱七八糟而缺乏诚意的方针，给美国的批评家们以可乘之机，因此，在 1942 年 5 月到 9 月间的石油谈判中又出现了一个时期半僵持的局面。西班牙各省在 4 月的第三周正式奉到通知：将自 5 月 1 日起对石油实行极端严格的限制；同时，西班牙政府也准备搞一场声势浩大的反美宣传运动。4 月 28 日，正好放行一艘油船，及时制止了这次危机。此后一段时间，情况就比较顺利了，虽然在 1942 年 7 月又发生了一次危机，当时，国务院未经与英国政府商量就参照他们自己在马德里的石油代表所提出的六十三万七千吨的数字，决定把西班牙进口削减到一年四十万吨。但是，在英国大使的强烈抗议下，美国同意西班牙可以进口到其油船吨位的最高定量，即每年约四十九万吨。所有这些困难都妨碍了盟国的采购和出口。象上面已提到的，就是在这段时间，人们认为国务院应该注意避免采取任何将会驱使西班牙投入轴心国怀抱的行动。1942 年 11 月，在北非战斗开始时，丘吉尔和罗斯福向佛朗哥将军提出了友好的保证；1943 年 1 月，总参谋长曾指示，那些凡是为维持合理的战时经济所必需的物资，应该在采

取一切适当的安全措施的前提下，供应给西班牙，但这并没有带来任何迹象表明国务院的态度有所软化。在葡萄牙，为钨的斗争当时正达到顶点，盟国不久就发现，在这场钨的争夺战中，他们必须把伊比利亚半岛看作一个整体。如前所述，在葡萄牙，钨的价格到 1941 年底已经上涨到六千英镑一吨的惊人数字。葡萄牙政府终于恐慌起来了，于是，在 1942 年 2 月建立了一种由政府专利的制度，规定所有产品包括出口税在内，都应以每吨一千五百英镑的价格出售给政府的金属贸易管理委员会。__接下来便同盟国进行了几个月的谈判，但是葡萄牙政府的讨价还价能力受到了如下事实的限制，那就是萨拉查在 1942 年 1 月 24 日已同德国人签订了一个秘密协定，保证他们可以得到二千八百吨钨的出口许可证。这个协定无疑有利于德国，因为德国所控制的矿比英国少，而且大部分要靠从独立的小生产国家那里采购。到了 6 月，葡萄牙政府设立了金属贸易管理委员会以收购这项矿产，并 90 随即制订了有关交售与该委员会的钨在各交战国之间进行分配的计划。1942 年 8 月 24 日，英国被迫同意了葡方规定的这些条件，虽然他们相信这对他们是严重的歧视。盟国要钨，有谋取供应和优先购买这两方面的原因；由于来自中国的供应切断，以及美国 and 英国（在某些项目上）军备生产的大幅度增长，盟国的储备减少了。8 月 24 日协定的主要条款是：应为英、美签发数达四千吨钨的出口许可证；“自由买卖”的钨则应按百分之七十五的比例分配给德国，百分之二十五分配给盟国；英国、美国 and 德国所控制的矿，其生产的钨应按每吨八百英镑的价格卖给金属贸易管理委员会，而再以每吨一千二百英镑的价格买回，至于“自由买卖”的钨，其买进和卖出价格都是每吨一千二百英镑（一百二十埃斯库多）。据说理由是“自由买卖”的钨生产成本较高。协定还承认英国拥有七处矿的开采特许权，美国拥有一处，并承认在 1941 年有九百四十五吨产量记录的五家德国公司。上述双方都必须每吨付出三百英镑的出口税。配给德国百分之七十五比例的钨是一种表示中立的姿态，据辩解说，鉴于盟国控制的矿比德国的多，这样分配是公平的（这是一种和北欧中立国所奉行的“正常战前供应”原则很不相同的中立原则）。1943 年期间，盟国更有理由对这种状况感到不满。据悉 1943 年 5 月 8 日，萨拉查又一次向德国人承担义务，答应再向德国提供二千一百吨，而没有通知盟国，当时他正在同盟国就签订供货协定一事进行谈判。美国政府立即开始谈论要采取报复措施，但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这个计划被认为是不相宜的。萨拉查抱怨盟国耽误了货物的交运；然而，看来他要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是有点感到为难的。他于是答应给盟国分配了百分之五十的“自由买卖”的钨。1943 年中，全部钨的产量下降了，而由于官方所订的价格低，运交到贮存库的数量也比预期的少了。但有充分的材料证明，收购来的产品都在用以保证德国人获得其全部配额，以致盟国所得到的甚至比原来所许诺的份额还少。盟国还确信，他们所得到的都是低级的货色，而且当德国人对某些矿山提出所有权的要求都得到了承认，盟国提出的类似的要求却遭到了拒绝。

在西班牙，钨的问题却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那是由于西班牙政府允许各交战国自由采购。1941 年底，英国断定先买权是一件紧急的事；德国人也很快表示，他们准备 91 不惜一切地进行角逐作为回答。从 1942 年 1 月起，联合王国商业公司奉命买下一切可以到手的钨，因而价格迅速上涨，结果生产也突飞猛进；然而，整个看来，价格的上涨并没有使盟国感到不快，因为它逐步地把德国人挤出了市场。价格从 1941 年 2 月的每吨六百七十五英镑上

涨到 1942 年 3 月的每吨四千零六十三英镑。于是，西班牙政府把钨的价格定为每公斤一百八十比塞塔（即每吨四千五百英镑），包括产品税一百比塞塔，后来减少到五十比塞塔。在 1942 年的前几个月间，联合王国商业公司实际上没有遇到很强的竞争；轴心国和瑞士在第一季度平均每月购买十五吨，在第二季度每月购买二十九吨；到 8 月份，联合王国商业公司所购买的已占西班牙整个销售量的百分之七十五。但是，这时，一度被排斥于市场外的德国人又卷土重来，在 9 月份购买了九十五吨，10 月份买了一百十五吨。到 1942 年底，他们一年买进了一千五百吨。双方为了使所采购的钨运出西班牙，都需要弄到出口许可证，而西班牙政府通过商务部，越来越强调坚持要以必要的进口作为发给出口许可证的条件。由于整个夏季一直存在着阻碍盟国提供石油和橡胶的种种困难，因此导致了西班牙相应地停发钨的出口许可证。西班牙的工业和商务部长卡塞列尔直率地对英国官员说，如果佛朗哥将军能得到足够的橡胶和石油来维持西班牙的经济生活，西班牙将永远不会让德国人进入他们的国家；但是，美国以及罗马和柏林都应该懂得，西班牙决不会因受恫吓而将它的货物割让予人，而不考虑它本国的需要。此后不久，他给盟国现有采购的钨颁发了出口许可证，以换取英国同意提供五百吨橡胶。德国人发现不容易搞到供应品，只得借助于走私，从西班牙搞到一些，还利用种种方法，包括用黄金以及伪造或掳获来的外国纸币，继续采购。由于葡萄牙的限制，西班牙和葡萄牙在这场钨的争夺战中联系在一起了，在西班牙钨可以售得较高价格，这就鼓励了葡萄牙人从事越境走私，盟国有一切理由欢迎这种事态发展，因为葡萄牙的限制使他们比德国人更为恼火，而且他们在西班牙拥有的资金一般也比德国人多。与此同时，到 1942 年底，西班牙钨的生产惊人地增长到每月近二百吨。经济战尔虞我诈的情况从来没有比这场暗中活动的斗争表现得再淋漓尽致了。在这场斗争期间，伊比利亚半岛上爱好和平的独裁者，除了利润以外，对其一切他都熟视无睹。两个交战集团既彼此各显神通以相竞争，又相互模仿。在葡萄牙进行秘密采购，可以从金属委员会手中夺去一定数量的“自由买卖”的钨：双方都可以从对方的矿区盗窃到矿砂；贿赂能够使敌方控制的矿山生产放慢下来或者完全停产。这样得来的钨可以走私到西班牙，或者作为另一种矿产出口，也可能卖给金属贸易管理委员会再转卖给有关方面。施加暴力，收买官员和敌方的代理人，进行破坏与欺诈，当然还有暖昧的魔法和大肆夸张新闻报道部成为这一出闹剧的丰富多采的伴奏。人们永远吃不准，是否因为德国需要钨就可以证明盟国花钱有理；德国为取得供应而进行激烈的争夺的确是盟国进行反击的主要原因。显而易见的是，这里并没有什么简单或便宜的解决方法，虽然美国人从未放弃他们对“大棒”的信念。西班牙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助于盟国的。1943 年，情况已经摆明，德国人打算在西班牙集中全力采购钨，西班牙政府允许盟国可以用其所拥有的比塞塔资金的百分之八十来购买钨，而不用于传统的贸易。结果，到 1943 年秋，德国人就被赶出了西班牙的钨市场。但是，这一胜利确实是付出了代价的：在西班牙的这场斗争达到高潮时，盟国为每吨钨付出了大约七千五百英镑，1943 年中，他们共买进了三千三百三十五吨，而德国人只买到大约九百吨。正如塞缪尔·霍尔爵士所说的，这段故事读起来就象是军事行动的一个篇章。

1944 年故事进入了最后一章：盟国（主要是美国）对佛朗哥施加的压力，以及盟国（主要是英国）对萨拉查施加的压力，使德国从这个半岛获得的钨

供应量被削减得微不足道，虽然这个胜利的取得仅仅是在英美攻入法国，使交通实际上陷于停顿以前不久的事。

对于西班牙钨的供应的最后争夺使英、美在策略问题上的分歧发展到顶点，并在美国人自身中间引起了长期的争论。整个故事涉及到美国政治紧张问题以及国务院里观点的分歧，这些都在本章的主题之外。简单地讲，当时的形势是，美国政府极想满足政治上和情感上的这种愿望，即对西班牙钨向德国出口实行百分之百的禁运。可是佛朗哥不肯这样做，而且由于他自己的威信和政治上的利害关系，也不能走得这么远。然而到了1944年3月，他却准备将这项出口削减到一个象征性的数目，这一数字是英国政府乐意并且实际上很想接受的。到这个时刻，危机已经经过了几个艰难困苦的阶段。1943年11月中，国务院决定对西班牙钨向德国出口强行实施全面禁运，虽然在那一阶段还没有直接以制裁相威胁。及至12月中旬，情况已很清楚，西班牙政府不打算响应美国在这些方面的建议。英国大使支持美方的要求，但认为这不是明智的做法，鉴于盟国已把德国人大部分逐出了西班牙钨市场，况且对西禁运的结果将只会使西班牙的钨转移到葡萄牙去，而在那里美国人此刻还不愿实行类似的禁运。再者，盟国这时正在对西班牙施加压力，提出若干政治要求，并希望在这些谈判中取得有利的结果。根据菲斯的记述，1944年1月12日实施对石油的禁运的决定是由国务院作出的。霍尔的看法是，海斯关于在这时对西班牙采用经济压力是否明智这一点上，还未被说服。不过他要向各有关方面说清楚他的确切主张似乎是有困难的。可是当关于清算西班牙由于内战而欠德国的债款尾数的谈判细节公布后，采用经济制裁的呼声又大大增强了。这笔债款尾数在1941年2月确定为三亿七千二百万德国马克。1943年秋，西班牙决定自俄国前线撤回其“蓝色师团”，并提出了一个反要求，要求支付该师出兵用费和在德国的西班牙工人的工资共计二亿二千万德国马克。可是他们在1943年11月却付给了德国一亿九千九百九十四万德国马克，其

关于国务院的立场，赫伯特·菲斯在《西班牙史话，佛朗哥和交战国》中作了颇为有力的说明，美驻西大使卡尔顿·J·H·海斯说这只是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的片面的、有局限性的观点：这位官员关于美国对西班牙政策的看法，同他的某些同僚是不一致的[《美国与西班牙》(The United States and Spain)，纽约，希德和沃德，1951年版，第197—198页)。国务院的另一个概括的观点，见E·K·林德利和E·温特合写的“我们是如何同两班牙打交道的：1940到1944年美国在马德里的外交”(E·K·Lindley and E·Weintal：“How we Dealt with Spain：American Diplomacy at Madrid，1940—1944”)，载《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1944年12月号，这篇文章没有提到海斯的怀疑。

美国政府正在寻求类似那些给予英国的在亚速尔群岛的军事和空军基地，因此不愿在基地问题解决之前，为钨的问题对萨拉查施加压力(C·J·H·海斯：《战时出使西班牙，1942到1945年》(C·J·H·Hayes：War-time Mission in Spain，1942—1945)，纽约，麦克米伦，1945年版，第200页)。

菲斯：《西班牙史话》，第239页。

海斯在其《战时出使西班牙》一书第209—210页中说道，在1943年12月，他对于使用经济压力是否明智的问题是没有成见的；他打算充分加以使用；他也知道采取这种断然行动没有英国的支持将是无效的。考虑到这点，他才于1943年12月28日向塞缪尔·霍尔讲起此事。他说，他报道霍尔的“怀疑和冷淡”的反应，目的是促使华盛顿推动伦敦采取行动。不过，霍尔在同海斯谈话后发给外交部的电报中则说，海斯并不认为美国对钨的禁运问题上的立场是无懈可击的。

当这个问题由于纳粹德国的崩溃而告解决时，关于西班牙提出的反要求的谈判似乎还在拖拖拉拉地进行着(菲斯：《西班牙史话》，第213—214页)。

中大部分是要用于采购“传统”的货品，而不是用于战略原料。然而 1944 年 1 月中发现西班牙商业部长已作了一项秘密安排，根据这项安排，一亿德国马克，即四亿二千五百万比塞塔全部用于购买钨、水银和纺织品。以及供给德国大使馆作为经费。不仅如此，1 月 25 日还获得这样一个惊人信息，说是如果联合王国商业公司在二十四小时内不同意购买圣卡姆巴钨矿的全部产品，那么它每月一百二十吨的全年产量就要卖给德国人了。霍尔赞同海斯的意见：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最好的办法是在 2 月间中断石油的装运，但既不对外宣布，也不事先向西班牙政府解释。看来西班牙商业界与商务部有联系的人士还在积极努力，要从政府处理这笔四亿二千五百万比塞塔结余中发一票横财。霍尔于 2 月 28 日会见了佛朗哥，在这次重要的会谈中似乎说服了他接受英美所提的条件；但佛朗哥没有作出具体的承诺，只是两次提到关于这笔比塞塔尾数的处理将取决于外交部长，而且他谈话的整个口气似乎暗示钨的问题不久便会得到圆满的解决。不幸，石油禁运的消息当天晚上便“泄漏”给了华盛顿报界，尽管国务院否认泄密的责任。外交部长霍尔达纳将军不得不申明，任何让步现在看来将显得是对美国压力的屈服，而且也是西班牙人自尊心所不能容忍的。但是西班牙政府还是在 2 月初对钨的出口实行禁运，以待最终的解决。

2 月 21 日霍尔达纳提议暂时把对德的钨供应限制在大约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十。但是，危机一直持续到 4 月底，美国坚持要全部禁运，而英国则对拒绝西班牙的建议表现出愈来愈大的不耐烦，而这些建议表明了实质上的胜利。盟国的资金正在迅速地消耗，因为这段危机期间，在美国的坚持下，照常实行对钨的优先购买，以致 4 月 27 日联合王国商业公司与美国商业公司不得不请求它们的大使馆允许它们停止采购。丘吉尔给罗斯福的私人信件帮助结束了一种已经变成有点荒唐可笑的局面。最后达成的协议是，德国到 6 月 30 日为止不应得到多于四十吨的钨，在 1944 年余下的六个月中不应得到多于二百四十吨。

英国为了要葡萄牙禁止钨的出口而对萨拉查博士所 95 施加的压力，也经历了同样令人气忿、虽则不是那么引人注目的过程。盟国参加亚速尔协议的谈判代表把钨的问题记在心头，但考虑到葡萄牙对于德国可能进行报复的关切，并不催逼它作出改变。但是，从 1943 年 11 月起，美国人便力促英国要求葡萄牙至少在 1944 年把对德国的钨供应维持现状，并且提出一些明显的暗示，指出英方出于感情上和其他原因，对葡萄牙人太宽宏大量了，因而美国可能不得不采取报复措施以限制对葡萄牙的供应。实际上，从这一阶段起，英国的压力还在继续，但当时的问题却是通过无休止的讨论，来寻求一个具体的办法，而不是实施制裁，由于葡萄牙在政治范围内是一个同盟者，或至少是一个乐于提供帮助的非交战国，这就排除了对它进行制裁。自然，没有必要急于缔结一项新的供应-采购协定，而且到 1943 年底，人们已经知道，盟国对这一问题的缄默态度正在引起葡萄牙人的忐忑不安。于是在 1944 年最初几个月里，双方进行了冗长而无结果的商谈。有一段时间，萨拉查认为，盟国从未澄清他们自己的立场，而且未能使他们自己或使他信服地证明从葡萄牙输出的钨的数量曾对德国工业有过明显的效应。1944 年 2 月和 3 月英国

海斯：《战时出使西班牙》，第 212 页。

霍尔建议把对德的供应限制在 1913 年的水平，分十二个月交货。

的一些强硬电文，直截了当地表明，英国内阁坚持认为葡萄牙在充当德国货源供应者从而延长战争方面负有责任。萨拉查最初似乎满不在乎，大谈其作为中立者的道义立场。这是建立在下述假定上的一种古怪的立场：即如果他左手帮助了一个交战国，那么他就必须用右手给另一个交战国以相称的帮助。他埋怨英国议会和英国广播公司对他的批评。另一方面，他也对巴西政府的抗议感到震惊。然而到1944年5月底出现了一些退让的迹象，但这些退让却由于葡方又提出全部赔偿和对应让步的要求而复杂化了，而这些要求在6月初大都撤销了。萨拉查在盟军诺曼底登陆前夕才最后同意禁运：于6月12日公布了新的规章。规章禁止钨的提炼、移动、转移和输出，并规定截至这一规定公布日期为止所开采的钨，一律应于6月25日前交给金属贸易管理委员会，由该委员会按当时价格收购。关于钨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盟国在伊比利亚半岛采购了约一万五千吨，总值按一般估计为一亿七千万美元，由英国和美国均摊。正常的市场供应数量可能还不到这一庞大数额的十分之一。

第五节 要塞欧洲：最后的攻击

封锁并没有为盟国赢得战争；当热衷于经济战的人们断言封锁将会赢得战争时，在伦敦和华盛顿一度出现过不恰当的乐观情绪，但是甚至在战争还没有结束以前，封锁就已经落得有点声名狼藉了。阿瑟·哈里斯爵士在1947年总结一种官方的怀疑主义时，写道：“除了人造石油工厂这一仅有的例外——而且这些工厂只是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才成为一个真正的症结——经济专家们的论调一直被证明是谬误的。”可是，事情的真相是，这些批评很容易错误地解释了经济战的整个特性，在谈到经济战时往往有着这样一种倾向，如同许多人在谈到两次大战之间的国际联盟一样，仿佛它是一种已被证明为有效的现成的武器，只要使用它，就有效果：然而，它却象国际联盟一样，只不过是一种七拼八凑起来各自为政的力量的标记。它的使用效果将取决于它应用的范围和技巧。单靠封锁——或者经济制裁——不能造成一个强国的军事瓦解，而这个强国的储备、士气和本国产品都足以使它无限期地继续生存下去，纵使在一个降低的生存水平下。因此，经济战的胜利必须以下述情况为先决条件，进攻者方面必须在经济和其他资源上具有充分的全面优势，俾使他们能用军事进攻的方式使防御国资源枯竭。简单地讲，所谓经济战所包含的意义是，它能够提供消耗敌人或者是最后一击的手段，而不是进攻的主要承担者。

如果我们承认这个假定，即军事行动本身通常必须提供能耗尽交战国经济资源的最有效和迅速的方法，从这点讲来那种特别贴上“经济战”标记的进攻形式就必然是取得胜利的补充和附属的手段，而且只有在敌人基本上由于经济消耗而软化之前就已经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的情况下，才能说这种进攻形式是失败了。因此是否可以说，在这个意义上盟国的经济战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于最后击败轴心国作出了明显的贡献呢？

否定这个结论是由于这样一种假定，即经济战的主要目的是发现敌人的致命弱点，即发现敌人的经济体系中某些主要的脆弱部分，由此可以对其整

参阅戈登和丹杰菲尔德：《隐蔽的武器》，第114页。

阿瑟·哈里斯爵士：《轰炸机的进攻》（Sir Arthur Harris: Bomber Offensive），伦敦：柯林斯，1947年版，第220页。

个体体系给以迅猛致命的一击。这种假定由于其具有引人注目的性质，对于业余的战略家来说，是有吸引力的，而且在战争中，也没有遭到职业战略家们的反对；在各个不同的时期，瑞士铁砂、罗马尼亚石油、铁合金、冬衣、滚珠轴承、德国运输系统以及最后人造石油工厂都被比较乐观正式地一一

提出来作为这种例子。诚然，毫无疑问，如果能用军事行动使德国失去全部的瑞士铁砂供应（只举一个例子），它就不能够进行一场重大的工业战斗。战争初期盟国所有这些企图之所以失败，并不一定是由于专家们对轴心国经济问题有任何严重的误解，而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无论外交压力或者武装部队的直接进攻都不足以达到这个目的。

还有这样的情况，即每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地理位置、军事力量，都在某种程度上彼此互不相同，因而，进行经济战就不可能有一种普遍有效的法则，企图制定这种法则的人往往假定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些偶然事件都是正常的，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在战争中，有一度英国观察家们似乎认为，华盛顿国务院倾向于设想它已发现了施加经济压力的新方法，而且这种方法将来可以通过联合国之间的协议用来作为维持世界秩序的一种手段，而不必诉诸武力。不错，1941年夏秋两季，美国在恪守中立时期，施加经济压力的行动是取得惊人的成效的，当时，它不能援用交战国的权利，而且，当时国内政策使它必须避免作出任何仅仅是为了支持英国作战努力的表现。美国的主要武器一直是控制外国的资金，使得它能够冻结所有轴心国和欧洲中立国的资产。后来，在美国参战后，由于全面使用了黑名单和它的强大的采购政策，从而能够支配西半球的经济生活，再次似乎倾向于认为这些武器（当然这些武器在阻止禁运品从拉丁美洲流入德国和日本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是普遍有效的，甚至可以代替封锁。结果，美国的官员和作家就有这样的一种倾向，在讲到1941年12月以后的封锁时，好象封锁只是英国的事情，甚至是在牺牲美国商人和战争努力本身的利益情况下，保持英国私人贸易利益的一种工具。这就帮助掩盖了这样的事实，即甚至在1941年，封锁不是美国施加经济压力的一种可供选择的新形式，而是美国施加这种压力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并且在封锁的管理机构在伦敦执行职权时，美国向所有的有关委员会均派驻有代表。但是，可以由此得出的总的结论是，要把关于经济战的效力和方法的问题加以概括，或者用任何教科书上的标准来衡量它的成就，是异常困难的；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确实显示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的有趣的讨论，见吴渊沥：《经济战》（Yllan-liWu：Economic Warfare）第2章：“对付一个假想敌人的经济战”（“Economic Warfare against a Hypothetical Enemy”），纽约，普伦蒂斯-霍尔，1952年版。

见吴渊沥：《经济战》一书，第291—300页。

参阅兰格：《我们对维希的孤注一掷》，第226页；勃兰德等人：《德国占领区和欧洲堡垒其他地区的农业和粮食管理》第235页，第364页，第571页；戈登和丹杰菲尔德在《隐蔽的武器》。第188—189页中评论说：“英国人不能对日常的贸易事务置之不顾，因为对他们来说，出口是经济生命的精髓。……因此，如果英国经济战当局有时考虑到贸易部的请求，并在只要可能时承担维护英国商业利益的义务，那就不应该引起什么惊异。……有时……对华盛顿来说，似乎伦敦在凡是涉及英国投资问题时就给以特殊的考虑，哪怕这样的行动并不严格符合封锁政策。……这些例外并没有严重削

关于象开黑名单这些事情有一个正式协议，规定在欧洲应由英国领导，在美洲应由美国领导。在其他方面，这就是双方合作的实际效果（见上文，原著第60页）。

而这个问题只有用本章中所概述的范围极其广泛的临时权宜办法才能得到真正解决。

这是经济作战部的一位官员在战争初期所承认的一个事实，他说“如果德国没有一个在唯一主要地方的致命弱点，它也是脆弱的，如果给它以足够的创伤，也会使它出血致死的。”不过，寻找致命弱点的方法只有在德国从轴心国所控制的领土或邻近的中立国家得到供应时才真正合用，因为不久就很明显，仅仅切断德国的海外正常供应，是不能击败它的。事实上，要对盟国经济战措施的效力作出某些估计，我们必须记住这里有三个方面的行动场所，每个场所都有它自己进攻和防御的问题和机会。

弱封锁；如果这些行动被坦率地承认和接受，而且有时不是直接同美国商人的利益冲突的话，那么它们将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必须说明，根据经济作战部的档案并不能证明以牺牲封锁为代价，偶尔给予英国商人特惠的意见是正当的，而且这些意见忽视了为了战时采购或取得先买权英国对外汇的迫切需要。

首先，是海外德国的供应问题，这方面英国海军可以直接予以拦截或由管制机构在来源地间接加以拦截。在战争的头几个星期里，自然会发生这种切断和平时时期正常的海外进口的情形，因此不论使用经济武器的批评者还是捍卫者往往都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而忘记了它对德国的作战努力是多么巨大和持久的打击。德国人和他们的对手都没有预料到这些物资匮乏的影响会大得无法进行战争，但是它却可以在两个方面影响德国的政策。一方面是把劳动力、技术人员和工作母机等等调转到各种代用品工业中去；另一方面就是完全取消某些行动。例如大家知道，德国在粮食上是能自给自足的；并且第一次大战中由于德国从其土地上抽调过多的劳动力，结果使其国内生产的下降程度大于其国外供应的损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在某些方面能够改善本国人民的粮食供应，因此，到1943年就恢复到战前水平，但这一事实并不一定意味着封锁失败了：它可能而且事实上也的确意味着为了维持国内的士气，德国政府是在把那些本来可以在其他方面更有用地为它的作战努力服务的人力调到农业上去。石油——最后证明是它的致命伤——也因封锁而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且对德国产生了重大的后果。战前，德国（1938年）在其石油总供应量七百七十万吨中，从海外进口了四百四十万吨，这些供应被切断以后，德国不得不拚命迅速地进行安排，用人造产品或者通过向邻近中立国采购来增加供应，而且它在制订它的海陆空作战计划时还不得不经常注意到节约燃料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在整个战争期间德国未能配备一支足够的长距离轰炸机力量的一个原因，即使它可能不是唯一的原因。希特勒相信他自己具有外交手腕和计算时间的天才，因此可能滋长了自满情绪，这使德国在1939年到1942年期间为战争作好工业上的准备受到了限制。他认为，他的政治判断能力和运筹帷幄的技巧有可能通过采用比较经济的闪电战取得胜利。但是，封锁对德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显然是使它必须采用闪电战方法——这种方法可以由于对方相对的措手不及而迅速取胜——的条件之一。

盟国进行经济战的第二个场所就是环绕着德国或轴心国控制的欧洲那些中立国地带。这里，在估计对德国施加经济压力的范围时，必须不仅要考虑

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1章，第47页。

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1章，第33页。

到在象钨这种个别商品上波澜起伏和富有戏剧性的斗争，也要考虑到战前存在的整个形势。中立国会同时受到双方的压力，也会受到威胁利诱；大体上可以这样说，德国在这场斗争中很多于失。当然盟国的封锁迫使中立国不得不中断向德国重新出口，并且不得不放弃了大部分主要依靠进口物资的那些加工生产。另一方面，他们往往坚持要继续对 100 德国至少保持战前的“正常”出口，而且盟国所取得的成就，如 1940 年 1 月同土耳其签订的铬协定，足以抵消战争初期苏德经济协定的影响而有余，当时苏德双方都认为该协定能大大抵消封锁所起的作用。总之，1942 年后，已不能继续垄断土耳其的铬了，但是，盟国坚持不懈的压力加上采用先买权的支付办法和列入战后黑名单的威胁都产生了重大的效果。甚至就在战局比较暗淡的日子里，这些办法也起了限制德国的采购范围的否定作用；由于盟国的地位有所改善，这就导致了那些中立国一个接一个地倒向盟国一方；在某些情况下所造成的物资短缺给德国的生产带来了相当可观的影响。例如，为夺钨战进行辩解的理由是，德国在 1943 年下半年失利后，就不得不在某些方面（如反坦克弹药中的碳化钨芯以及除了用于军火工业以外的切削刀具等）放弃使用钨。它也不不得不在其他方面（如碳素刀具的刀尖）大量减少使用钨。不过，从那些“邻近”中立国的所作所为中，我们必须得出这样一个总的结论，即只有在其他手段已经可以保证击溃德国时，那些中立国才有可能不得不对击败德国作出重要的经济贡献。

最后，给予德国经济以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攻击的还是要塞欧洲本身的力量。甚至在战前经济战这个概念被看作是一种比传统的封锁范围更广的进攻行动，它主要是以尚未尝试过的对德国工业目标进行空袭的可能性为依据的；运输系统也是可能空袭和破坏的一个目标（例如多瑙河上的油船）。经济作战部在 1940 年夏季和其他时机下所作的被认为轻率乐观的估计，从经济角度来看倒是很有道理的。可以辨认出来的目标是存在的，但这些目标都要求三军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能动性和效率，而这在当时又是办不到的。这一点确实也适用于经济作战部的大部分计划。如果盟国的军队能够在 1940 年打赢挪威一役，德国就会失去绝大部分它所不可缺少的铁砂供应，因此也会打输这一场战争。如果皇家海军能够在 1941 年在西地中海采取行动，也就可以切断从法属北非运往法国的货物。但是，从 1942 年开始的对德国目标进行大规模的轰炸就指望有朝一日，空中力量将大大有助于击败轴心国，而在这漫长的空中攻势的过程中，其打击的总目的最后是经济目标而倒不是士气。

这里不想对盟国轰炸机的进攻作出哪怕是最简短的概述。必须记住，除了交替针对经济目标和士气目标以外，盟国轰炸机指挥部还不时地致力于纯粹战略性的进攻。从 1940 年 5 月 15 日到 1941 年 3 月英国对德国轰炸进攻的第一阶段，攻击目标包括石油和铁路；在这个时期的最后几周中，开始了一项在月明之夜猛烈轰炸主要的人造石油工厂的四个月计划。但是，这时轰炸机都被调去援助大西洋战役去了，与此同时，发现在夜间空袭象石油设施这样的特殊目标，造成的破坏是很有限的。1941 年 7 月，重新恢复空袭时，是将民众士气和国内运输作为目标的，但是，不久，就很清楚，对鲁尔铁路中心的夜袭，并不比早期对石油工厂的袭击有效多少。因此第二阶段的轰炸。到了 1942 年底，就大都逐渐停止了，在继 1942 年后的第三阶段中，对德国城市发动的强大攻击主要是为了摧毁士气——总的说来，是平民的士气，特别是产业工人的士气。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也希望这种空袭将能跟着产主

重要的经济影响。然而，尽管包括对科隆、埃森、不来梅、吕贝克和罗斯托克进行了数以千计的轰炸袭击和猛烈的攻击，这一攻势并没有造成德国工业生产的显著下降或者民心的任何涣散。在 1943 年 1 月，卡萨布兰卡指令确定的目标是：逐渐摧毁和搞垮敌人的军事、工业以及经济体系，动摇德国人民的士气，直到他们的武装抵抗能力被致命地削弱为止。但是，1943 年间的经验进一步表明，虽然通过大规模夜袭遭到轰炸的地区可能造成巨大的局部损害，但是，仍不能使德国工业陷于停顿。哪怕使一个工业城镇或地区停止生产，也需要集中可以调动的力量进行长期的攻击，而这又使其他地区得以免于被炸。当少数地区遭到几次毁灭性的轰炸后，攻击又转向他处时，德国当局就会以惊人的效率进行恢复工作，当地居民也表现出勇敢的精神。在施佩尔体制下给予生产的巨大刺激，也有助于抵消由于英国夜间轰炸所造成的严重损失。不过，所有这一切并不能否定哈里斯所称的“万能药贩子”的观点。而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反而使他们的理由更加强了。他们断言存在着“万能药目标”，摧毁这些目标便可使德国经济遭受到比所花代价大得无可比拟的损失，这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如何找到这些目标，然后对这些目标加以打击，并使其无法再行重建。在某些事情上，102 经济专家们是犯了过分乐观的错误的：哈里斯举了挪威克纳本的铝矿为例，据说，它的毁灭证明是对德国整个作战努力的一个重大灾难。它曾被为数不多的“蚊式”飞机炸毁过，经修复后，又在 1943 年下半年被美国第八航空队炸毁。然后，专家们都不能证明德国已被这预料中的灾难搞得走投无路了。但是，夸大某些目标的重要性，并不证明这个主张是错误的：即在其他情况下也许可以找到“公分母”的目标系统，摧毁这些目标将会真正导致整个德国军事工业的停顿。困难的是，即使盟国的情报机构能够找到这些目标，但是，英国轰炸机指挥部由于没有远程战斗机掩护，只限于进行夜间轰炸，因此在技术装备上达不到这种有选择的破坏的目的。阿瑟·哈里斯爵士也加入了万能药贩子的队伍，他在战后指出：假如要求我们去攻击四座工厂，其中三座在德国，一座在法国，它们都生产乙基液体，我们也许就可以省却许多麻烦。……困难的是，我们无法在任何特定时刻找到那些是一般的万能药目标，而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来象埃森和柏林这类目标包含有大量的重要军事工业。

毫无疑问的是，1943 年在飞行堡垒于白天进攻中受到重大损失以后，当美国空军于 1944 年决定要把摧毁德军空军作为它的直接任务时，进行有效打击的技术问题已经解决了。它所用的工具是野马式远程战斗机，从 1944 年初起它就大批地飞翔于德国上空，很快地从德国空军手中夺得了制空权。于是就有可能在白天对经过选择的目标进行长期的准确攻击，其所取得的成果，当然大大得助于英国夜间空袭轰炸所产生的效果，使德国遭到大规模的破坏，并把它最好的飞行员、高射炮和物资调往支援夜战部队。

象我们所指出的，在这种情况下，袭击滚珠轴承工业对德国说来是一个不祥之兆，尽管并没有完全取得成功。虽然这种做法似乎为万能药目标的反对者提供了一个采取捷径的方法无济于事的证明，但它却为那些鼓吹白天轰

哈里斯：《轰炸机的进攻》，第 220—221 页。

同上书，第 233—234 页。

见上文，原著第 75—76 页。

“对于另一个万能药目标，滚珠轴承，目标专家们简直发疯了”（哈里斯前引书，第 221 页）。

炸需要取得空中优势的人助长了声势：美国在 1943 年秋天由于遭到沉重损失，以致不能进行持续的攻击，否则它会不可挽回地摧毁德国这种高度集中的工业。103 随后对这种压力比较地有所放松，使得施佩尔经过极大的努力把滚珠轴承工业疏散开来，以致 1944 年 2 月 24 日进行的巨大联合攻势已失之于为时太晚了，但是这时还存在有对其他一些尚未疏散的目标进行毁灭性打击的手段，这些目标现在就在德国人造石油工业方面找到了，并且还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尽管在 1944 年 9 月前，盟国轰炸机部队的首要任务是支援英美在法国的部队。1944 年 4 月，在攻击开始之前，德国生产十七万五千吨石油燃料，其中德国空军用去了十六万五千吨。美国轰炸机在 5 月间的攻击，使它的产量减至十五万六千吨；6 月中旬，英国轰炸机指挥部参加对鲁尔十个人造石油工厂的袭击，使月产量降到五万三千吨；7 月份下降到二万九千吨，8 月份下降到一万二千吨。虽然从扔下的炸弹的重量和数量来看，这些攻击是猛烈的，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持续不断的攻击；而这正是由于击溃了德国空军才使这种攻击成为可能。

简言之，1944 年秋已创造了条件，使德国经济不可避免地逐渐衰颓下来了，而且这是通过直接攻击德国领土内一些要害部门而取得的，而不是通过我们所知道的，在“封锁”这个词儿下，实行缓慢漫长的掐住进口的做法取得的。希特勒的要塞欧洲有着象阿尔伯特·施佩尔这样能干而果断的人物作为德国经济资源的组织者，并没有很快就崩溃；每经一次破坏性的打击后，就重新大力修复创伤。在施佩尔的指挥下，被特别任命为紧急修理总监的盖伦贝格在暂时修复工作上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在 1944—1945 年初冬期间，德国战斗机部队虽然得到了部分恢复，但是由于 1945 年 1 月和 2 月盟军又对德国的飞机厂和生产中心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恢复工作陷于停顿。1944 年 9 月以后，英国继续对工业中心大大加强轰炸。同时，盟国部队正从东西两方挺进，进展神速，以致到 1945 年 4 月 6 日，总参谋部已可以指示轰炸机指挥部不必再对剩下的工业中心进行攻击了。因为估计在这些攻击可能奏效之前，敌人军事上的崩溃就已在望了。

因此，对于盟国经济战政策的最后定论必须是这样：即在 1944 年和 1945 年情况变化很大的条件下，这一政策确实给了敌人的经济以极其有效的打击，这是英国一些经济战设计者在 1938 年和 1939 年所预言过的；但它只有在海上拦截和外交压力这两种传统的封锁武器辅以史无前例的空中直接打击时，才能对盟国的胜利作出重大的贡献。即使如此，经济战也并非单独能取得胜利的。哪怕在最后阶段，经济战也只是空中绝对优势的副产品，而这种优势由于掩护进攻部队的挺进，就更直接地帮助了盟国获得胜利。甚至在 1945 年春季，德国军队也没有因为经济衰退而虚弱到不能再进行活动的地步。经济战的主要教训是，即使地理位置和经济上自给自足可使一个交战国不至于受到封锁的影响，但是，在空中优势的无情打击下它也很少能找到任何出路。首先概述一下经济战的一些问题，似乎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些问题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立国和轴心国之间最重要的或者不管怎样是最频繁的联系。在以下的几章中，我们将从中立国的国内经济、国内外政策以及

2 月 24 日，美国第八航空队派遣了二百六十六架轰炸机，在战斗机掩护下进行了白天进攻；美国轰炸机指挥部派遣了七百三十四架飞机进行了夜间袭击。参阅丘吉尔，第 5 卷，第 461 页；美国版，第 5 卷，第 522—523 页。

它们与盟国和轴心国之间各自不同的关系这样的角度来讨论这些中立国的种种困难和成就。

第二编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拉丁美洲康斯坦斯·霍华德

第一章袭击珍珠港以前泛美主义的发展

第一节引言

从波兰打响第一枪到日本炸弹在珍珠港爆炸（这一事件最终把战火烧到了西半球）之间所经过的两年里，美洲各国由于面对着共同的危险而明确地携起手来。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美国对其南方邻国政策的改变，使得已由战争而加速增长的泛美合作有可能得到发展。这一时期拉美各国的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并不亚于其他国家。但是，作为较弱的国家，它们也懂得国际合作的需要。自从拉美各国开始成为独立的国家以来，它们就受到了一些较老、较强国家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压力。它们先是担心受欧洲国家的统治，继而又害怕美国的干涉。这种恐惧感助长了拉美各共和国的民族主义精神，同时也导致它们更加意识到需要进行国际合作。对于只有建立一个真正的集体安全体系才能使较弱国家维护独立自主的这种认识，已使许多拉美国家的政治家成为国际联盟的最热心的拥护者。其他一些人对国联的作用虽不那么乐观，但他们觉得，加入国联将是提高其民族威望，并与美国抗衡的一种手段。随着国联的解体和欧洲的混乱状态有增无已，拉美各国表示了更加愿意响应美国为恢复泛美思想而作的各种努力。虽然拉美各国依然害怕美国的经济控制，然而，罗斯福的睦邻政策在消除他们对美国政治干涉的恐惧方面已起了很大作用。再说，尽管拉美各国不想让他们的国家为美国的生活方式所同化，但是他们对希特勒 106 和墨索里尼的极权主义哲学则更是不感兴趣。纳粹蔑视个人自由，迫害天主教，以及他们的雅利安种族优越论，对于崇尚个人主义、大部分信奉天主教和种族混杂的拉美各共和国说来，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虽然拉美许多共和国曾有过独裁政权，然而作为这些政权基础的政治哲学，却与欧洲独裁者的那一套截然不同。拉美独裁主义的传统是带有土生性质的，在那里大多数居民十分贫困，没有文化、政党往往都是腐败不堪，而且缺乏一个稳定的民主政府的悠久传统，所以在这些国家里出现独裁者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因此，1938 年德国公使在评论秘鲁公众思想情感时曾沮丧地提到，尽管秘鲁有一个独裁政府，并且也没有德国分子在那里滋事生端，然而贝纳维德斯政府的支持者对德国的态度并不比别国来得更友好些。

拉美在早些时候由于德国反共而对它所表的同情，这时已大部被忘掉了。德国对和平所造成的更直接的威

胁，使共产主义的危险成为次要问题了。再者，虽然民族主义潮流的日益高涨，使许多拉美国家羡慕德国那种维护独立和改善国家地位的成就，同时却也促使他们对纳粹把拉美各国的德侨组织起来所作出的努力越来越反感。他们反对外国人的学校和组织，认为它们干预了拉美国家的内政，并认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 5 卷，第 619 号。

驻拉美的德国代表们，把拉美反德情绪的高涨和把德国当作战争贩子而对它的不信任，都归咎于美、英两国的压力和宣传。德国驻智利的公使曾把美国的新闻机构——合众社称为第一号公敌（《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 603 号、第 624 号、第 631 号）。

1939 年 6 月 19 日，在柏林外交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驻拉美国家的几个德国外交使团的头头就拉美反纳粹情绪的高涨，作了引人注目的证实。为了讨论如何应付在拉美的德侨中为德国纳粹党招募人员、组织他们进行活动以及在非日耳曼人中间从事宣传所遇到的一些困难，魏茨泽克特召集这些大使与来自拉关的德国纳粹党国外组织代表们会面。根据会议报道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些困难被认为仅仅部分是由于各有关

为是不利于他们同化少数民族的；但是，虽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看法适用于所有外侨，可是，对德国人的不信任感却远较对意大利侨民的为甚。意大利人和他们的东道主之间在心理上和血缘上都有着远为亲密的关系。意大利的法西斯党也没有遭到天主教会象对德国纳粹党那样的坚决反对。总之意大利的法西斯团体与他们德国的同伙团体不一样，并不是为了“斗争”而组织起来的。故前，意大利各个组织主要关心的是在文化和福利事业方面，并不从事政治宣传活动。一些拉美共和国国内潜在的轴心国第五纵队，是拉丁美洲和美国日益忧虑不安的根源。在这些国家里，总是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想要推翻现政府的不满派别可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接受德国的帮助，特别是在1940年之前，纳粹征服世界的危险看来还没有迫在眉睫的时候。担心轴心国可能策动他们进行这种突击，用亲轴心国的政府来取代现政府，从而为它们将来在西半球活动取得一个立足点——这是战争爆发前后支配着美国军事和政治战略上的主要考虑因素之一。欧战一爆发，美洲各自外长就在巴拿马开会，讨论促进西半球安全的措施。拉美各共和国和美国一般都同意国外指望盟国取胜，本国保持中立。当时，这两个目标看上去未必是格格不入的，也不要各国同交战国的这一方或另一方明显结盟。

大约九个月以后，当美洲各共和国在哈瓦那开会时，纳粹看来有可能（即使可能性不大）获胜在即，因而所要讨论的问题具有大不相同的面目。这个问题涉及到在美国的领导下美洲各国为保卫西半球和防止极权主义国家的侵略进行积极合作的问题。可是，许多拉美国家在经济控制的程度上或在它们领土上建立防务设施问题上，都不愿向其北方邻国作出让步，而在美国政策制订者中却有许多人认为，这些条件对保卫西半球是必要的。拉美各国不但害怕美国控制它们的经济和政策，许多国家也担心美国的军事力量在所向披靡的德国面前也许不足以保护它们，因此它们不愿过分触怒希特勒。特别容易接受这种想法的，就是在1940年没有被包括在美国的有效军事援助的范围内，而其经济繁荣则又依赖于对欧贸易的那些南美共和国。在这些国家中，对于同美国紧密合作以反对轴心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其相信的程度不仅根据他们国家的大小、力量的强弱、地理位置以及经济需求而有所不同，而且在各个国家内各种不同的政治集团之间也是互不相同的。激进分子称赞罗斯福是一位维护自由制度和主张改善贫困阶级生活的人，而右翼分子却对美国政府维护民主，坚持美洲国家间进行合作的主张不那么欣赏。虽然哈瓦那会议上所达成的那些协议标志着西半球协调的最小的一致性，但是，这些协议为保卫西半球建立一条共同战线提供了一个切实的基础。

从哈瓦那会议到日本袭击珍珠港之间的那几个月里，国外事态的发展和国内舆论的势头，同样有助于推进美洲各国之间的合作。这时，拉美各国对德国迅将获胜的恐惧业已消减，而纳粹对平民狂轰滥炸，迫害占领国各族人

机构互相竞争的结果（见同上书，第6卷，第509号）。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616号，第620号：第624号。

见《概览，1939—1946年：轴心国的初期胜利》，第7编，散见各处。

关于巴拿马会议（1939年9月23日—10月3日），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39—1940年》，第99页以下及《概览，1939—1946年：轴心国的初期胜利》，第7编，第1章，第1节（1）。

有关哈瓦那会议（1940年7月21—30日），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0—1941年》，第63页以下：以及《概览，1939—1946年：轴心国的初期胜利》，第7编，第2章，第2节（3）。

民以及惨杀人质的所作所为，则进一步激起了拉美各国憎恶希特勒的哲学。但是，轴心国采用了更巧妙的宣传方式，通过着力宣扬拉美各国和美国之间，或者拉美某些个别国家之间不和的因素，力图煽动民族主义的感情，在一些极端的民族主义团体中获得了相当的成功。一般来说，德国采取直接行动是不那么有效的，而且轴心国的阴谋诡计也使大多数拉美国家既感到恐惧，又感到愤怒。

于是，为了控制德国和意大利在西半球的活动，一些拉美国家政府在1940—1941年期间采取了一些措施，以贯彻执行哈瓦那会议的建议。拉美大多数共和国也制定了法律来防止德侨正式组成一个国家社会党，同时对他们在表面上以办理慈善或文化事业为名所建立的别种组织也加以控制。此外，还制订了其他一些措施来确保外侨履行登记手续，控制他们的行动，反击外国的宣传及防止并惩办破坏活动。

在美国的协助下，哥伦比亚、秘鲁、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巴西的政府都采取行动，撤销了由轴心国控制的航空公司，这些航空公司在南美大部分地区上空形成了一个航空网。通过废除合同、没收它们的飞机和财产，以及不断削减对它们润滑油和汽油的供应，逐步排除了这些航空公司，并以拉美和美国经营的航空公司取而代之。到1941年底，继续营业但规模非常有限的轴心国航空公司，只剩下在巴西的意大利环球航空公司和神鹰航空公司这两家了。12月，巴西政府对这两家公司余下的飞机也下令停航。

在军事合作方面美洲国家之间取得了一些进展。哈瓦那会议后，美国政府倡议同拉美各国政府举行陆、海军参谋会议，讨论各国政府如何运用他们拥有的防卫手段以抵御来自国外的进攻或由轴心国通过第五纵队分子策动的国内政变，以及如果美国前来支援时，拉美各国政府将准备如何向美国提供便利的问题。美国先后同一些拉美共和国达成了临时性的协议。美国另外还派出陆、海、空军事使团到其他一些美洲国家以取代撤销了的轴心国使团。华盛顿国会还通过了一项法案，同意接纳一些拉美国家的海军军官到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学习，并作出了在美国训练拉美国家的民航飞行员和机械师的安排。拉美各国急于从美国获得军事装备和财政援助，以便建立他们自己的军队。但是，许多拉美国家都不愿意给美国在它们领土上设立军事基地的特权，这不是因为他们不准备将本国领土租让给外国使用，就是因为深恐得罪紧邻国家，秘鲁便反对厄瓜多尔拟议中的将加拉帕戈斯群岛租借给美国作基地；乌拉圭政府决定接受美国的财政和技术援助，在内格拉湖及临近的海岸上建立一个海空基地，在贯彻这个决定的过程中也遭到了由阿根廷支持的乌拉圭以埃霄拉为首的民族主义集团的激烈反对。在拉美主要国家中，巴西是最积极推行重整军备计划的一个。它的东海岸线的突出部分，距离非洲海岸达喀尔港还不到二千英里，一旦同德国开战，从战略上来说，它的地理位置是在南美各国中最易受到攻击的。事实上，不论在西半球的哪一个防卫计划中，巴西总是占据着关键的位置。尽管在巴西有很多德国和意大利的侨民，但是，巴西的独裁者热图利奥·瓦加斯的政策肯定是反轴心国的。

见威廉·L·兰格和s·埃弗雷特·格利森：《对孤立的挑战》（The Challenge to Isolation），纽约，哈珀为对外关系委员会出版；伦敦，皇家国际事务学会，1952年版，第700页。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139—1140页；《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1—1942年》，第352—354页。

而且，同美国保持紧密关系多年来一直是巴西对外政策中的主要目标之一。在 1941 年间，巴西为建造基地和其他防务项目，接受了美国的援助。它还获得美国的一笔大宗贷款，在沃尔塔牧场建造一座钢铁厂。美国并与巴西达成了一项协议，允许泛美航空公司在美国陆军工程兵监督下扩大其巴西各机场，条件是在战争结束后六个月内应将这些基地移交给巴西。巴西方面则允许美国南大西洋海军利用巴伊亚和累西腓港口加油、补充给养及维修设备，并且允许飞行于美国和西非之间的英美空运公司飞机使用巴西在这条航线上的各机场。1941 年 11 月，美国政府在巴西政府的同意和合作下，接管了对荷属圭亚那的保护，以保卫在那里的有价值的铝土矿。

1941 年，墨西哥与美国政府就军用飞机相互通航及在墨西哥境内建造着陆机场达成了协议。11 月 19 日，两国又达成了一项协议，为墨西哥政府将外国石油公司收归国有这一长期存在的争端提供了解决办法，从而使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同月，墨西哥政府与英国政府恢复了外交关系。1941 年，巴拿马总统阿里亚斯博士下台，这对美国为保卫极其重要的巴拿马运河所采取的措施是有利的。据称，阿里亚斯同情轴心国，曾阻挠履行在运河区以外的巴拿马领土上为美国提供空军基地和其他设施的协议。他还禁止对不下八十三艘悬挂巴拿马国旗但属于美国航运界所有的商船进行武装。早在 1941 年 10 月，当阿 111 里亚斯访问哈瓦那不在国内时，他的政敌们发动了一次宫廷革命。他们利用总统没得到预先授权不准离开国家这一宪法上的技术细节，宣布阿里亚斯已丧失了其总统职位，并另选里卡多·阿道弗·德拉瓜迪亚为总统。

新总统主张大陆防务工作应与美国紧密合作，撤销了关于武装商船的禁令，并答应对美国提出的海、空军基地的任何要求给予优惠考虑。美国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步骤，在 1940 年和 1941 年，先后同多米尼加、海地共和国达成协议，改善了和这两国的关系，从而放松了对这两个岛屿共和国的金融管制。

第二节 经济合作

美国政府的目的在于创建一个坚固的经济基础，以便在此基础上能建立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1—1942 年》，第 354—356 页。

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海军作战史》，第 1 卷：《大西洋之战，1939 年 9 月—1943 年 5 月》（Samuel Eliot Mor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the World War II, vol. I: The Battle of the Atlantic, September 1939—May 1943），波士顿，利特尔—布朗，1947 年版，第 379 页；美国陆军部：《美国陆军参谋部长两年度报告，1911 年 7 月 1 日至 1943 年 6 月 30 日》（Bieunial Report of the Chief of Staff of the United States Army, July 1, 1941 to June 30, 1943），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3 年版，第 39 页（以后称为《两年度报告》）。

莫里森：前引书，第 1 卷，第 378 页。

小爱德华·R·斯退丁纽斯：《租借法：取得胜利的武器》（Edward R. Stettinius, Jr.: Lend—Lease: Weapon for Victory），纽约，麦克米伦，1944 年版，第 147 页。

赫尔：《回忆录》，第 2 卷，第 1051 页。

同上书，第 2 卷，第 1423 页。

同上书，第 2 卷：第 1140 页。有关没收石油公司而引起的争端，见《概览，1938 年》，第 1 编，第 668 页。

同上书，第 2 卷，第 1048 页。

一条美洲大陆的共同防御阵线。在 1940 年至 1941 年期间，这项政策是通过进出口银行和其他政府机构向拉美各共和国提供信贷和借款而得到贯彻的。这些贷款的目的是用以资助各共和国稳定经济，增加生产，尤其是增加战略物资的生产。

在 1940 年 7 月举行哈瓦那会议时，拉美国家所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它们已失去了在欧洲的出口市场，因而选成了剩余商品的积压和外汇的短缺。为了提供必需的美元以购买美国进口货，通过进出口银行曾给予拉美国家以巨额贷款。但是，由于拉美各国向美国迅速扩大了出口，他们对此类信贷的需求便很快地减少了。美国政府在开始其扩大防务计划后所提出的要求，给拉美各共和国所产的大部分原料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市场。此外，美国为了不让轴心国取得主要原料的可熊货源，于 1941 年同一些拉美国家签订了独占性的采购协定。同英国也签订了类似上述的协定。因此，嗣后美国的借款和信贷，主要是通过改进生产设施及发掘新的或其他供应来源，用以增加拉美国内主要原料的生产。各共和国也接受来自美国的技术援助，以推进这些目标。虽然到 1941 年拉美国家才头一遭在对美贸易中获得了大量的顺差，但是它们还有其他问题要对付。尽管大多数共和国目前有能力支付它们所需要的进口品，但是，它们发现，要想获得这些进口品是越来越困难了。这些共和国所需要的物品，从欧洲多半是得不到的，而且由于美国逐渐集中力量于拨备物资的生产，所以这些物品当时在美国也是很紧张的。美国政府所采用的优先考虑的制度，证明是不济事的，因为它并没有使拉美国家获得所需要的进口品。珍珠港被袭击后不久，美国就代之以一种分配制度。进口情况国船舶短少而进一步恶化。大多数共和国几乎全部要仰赖外国船只来经营它们的贸易。由于战争的缘故，原先承担美洲国家间贸易业务一半以上的英国船只和悬挂其他欧洲国家国旗的船只都被调走，而可以获得的美国吨位又不足弥补它们的损失。因此，为了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在美国建立了一个美洲国家间航运委员会，来安排美洲国家之间产品的运输，同时，美国和其他美洲共和国作出了决定，由它们接管一直闲置在它们各港口的轴心国船只。在同英国政府就拟议中改变所有权的问题达成协议之后，美洲国家间财政经济咨询委员会于 1941 年 8 月 28 日通过了一个有关这些船只的调度和使用计划。

第三节拉丁美洲国家间的关系

哈瓦那会议到日本袭击珍珠港这段时期，不单标志着为增进美国同拉美国家合作所采取的措施——主要出自美国的倡导——的一个巨大进展，而且也出现了拉美各国政府通过缔结双边和区域性协定以改善拉美内部的政治和经济关系所作出的不断努力。

各国之间在政治方面的种种争端，要末是已经解决了，要末是在解决的过程中。1941 年 3 月，阿根廷同智利签订了一项协议，解决了它们对南极洲

见萨姆纳·韦尔斯于 1941 年 7 月 17 日和 12 月 5 日向美洲国家间财政经济咨询委员会所作的声明（《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1—1942 年》，第 384—389 年）。

由于国内运输系统不完备，中美洲和南美洲大部分的贸易都由海运承担。

该委员会是在 1939 年巴拿马会议上通过成立的，并在 1940 年的哈瓦那会议上扩大了它的职责范围。

见约翰·C·德怀尔德：“美洲国家战时经济合作”，《外交政策报告》（John C.deWilde：“Wartime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the Americas”，Foreign Policy Reports），1942 年，第 294—295 页。原文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1—1942 年》，第 403—405 页。

有争议的要求。4月，一项久悬未决的领土纠纷由于委内瑞拉同哥伦比亚签订了一项边界条约而告终结。接着在5月，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也效法了它们的榜样。遗憾的是，秘鲁和厄瓜多尔之间的边界争端始终未获解决，并且于1941年7月爆发了战争。尽管阿根廷、巴西、乌拉圭、萨尔瓦多和美国在战争开始前后都曾出面从中调停，但时发时止的战斗仍一直持续到珍珠港事件以后。

使拉美各国之间的关系接近起来与签订区域性协议这种趋势，在某些政府和集团看来（例如巴西），它与泛美体制是相辅相成的，但其他一些国家则把它看作是另一种可取的途径。这一情况在阿根廷方面最为明显。它的政府谋求创立一个在政治和经济上不依赖美国的南方集团。在阿根廷的倡议下，1941年2月在里维拉召开了普拉塔河国家会议，旨在建立一个区域性贸易集团。阿根廷提出的关于关税同盟的建议遭到了其他国家代表的反对，因为它们担心阿根廷把持一切。虽然会议上所达成的总协议并不具有很大的重要性，但是在会上和会后，与会各国还是签订了各种不同的双边协定和三边协定。

两个月后，在第三次加勒比会议上，墨西哥代表提出了一项关于建立一个加勒比同盟的计划。显然，这样一种性质的计划是充满着政治火药味的，经过一些讨论和删去“同盟”这一词儿之后，计划的其余部分便委交给几个政府去作进一步的考虑。

许多深信不疑地支持美洲国家防备合作计划的拉丁美洲人，看到了美国逐渐转向战争感到忧心忡忡。美国没有经过同它的南方邻邦商量就放弃了它的中立政策，它们担心美国现在采取的方针将在它们没有任何发言权的情况下使西半球卷入对德的战火中。因此，这场战争乃是由于一个不得人心的东方强国无端启衅而不是由于美国在大西洋对德采取作战行动所引起而最终蔓延到西半球这一事实，对于拉丁美洲对战争的态度有着深远的影响。

阿根廷、巴西、乌拉圭、玻利维亚和巴拉圭。

见阿瑟·惠特克编《美洲国家间的事务：年度概览 第1号，1941年》（Arthur P. Whitaker ed. *Inter-American Affairs: an Annual Survey* No. 1, 1941），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第59-60页。

这是轴心国宣传的主要课题之一，也是西班牙主义运动的主要课题之一，它主张拉丁美洲团结，反对泛美团结。

第二章战火蔓延到西半球，里约热内卢会议

(1942年1月15—28日)

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美国珍珠港基地，促使美洲各共和国根据1940年7月哈瓦那会议上通过的相互援助和防御合作宣言，举行了一次代表会议。该宣言不仅规定了在发生危险时各国应进行磋商，而且还声明“一个非美洲国家破坏一个美洲国家的领土的完整或其不可侵犯性、主权或政治独立的任何企图，将被认为是对宣言签署国的一种侵略行为”。这种情况这时已出现了。

珍珠港被袭击后两天，美国政府即向美洲各国政府发出照会，要求尽速召开一次外长会议，并提醒它们上述保证。同日，智利政府也要求召开会议。12月15日，泛美联盟执行理事会发出邀请，定于1942年1月15日在里约热内卢举行会议，两天后该联盟执行理事会批准了会议的议程。

九个拉丁美洲国家已向日本及其欧洲盟国宣战。这些立即对轴心国宣战的共和国都是中美洲国家，或是加勒比海的岛国，它们在经济上和战略上无不依赖美国。另外三个加勒比海沿岸国家，墨西哥、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在12月底以前，同轴心国断绝了外交关系。距离较远的那些共和国宣布非交战国的权利适用于已宣战的美洲国家，并肯定了它们之间的团结。它们不准备采取更具体的行动，如果得不到它们的邻国关于其将采取行动的某些保证的话。除了阿根廷以外，各国几乎都一致希望召开一次美洲国家会议，来讨论西半球面临这一新威胁所必须采取的步骤，并准备制定一项共同对策，尽管当时对需要采取的行动，各国的侧重点和意见必然还存在着分歧。美国政府热望西半球应该组成一条坚强的经济和战略阵线，以便对轴心国进行作战。美国并不认为二十个拉美共和国都有必要或者真的需要对轴心国宣战。但是美国确实要求它们应同敌国断绝外交关系以及所有一切商务和财政上的交往。对西半球的团结很不幸的是，阿根廷政府明确表示反对采取任何强烈的反轴心国行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利马和哈瓦那的历次泛美会议上，诚然，阿根廷政府接受了维护西半球团结的原则和旨在促进西半球安全和防止轴心国侵略而制定的措施。但是，阿根廷政府仅仅是勉为其难地接受了这些义务。美国建议加强西半球团结的政策，在每个场合总是遭到了阿根廷代表的反对，即使已经取得同意的措施，也只是代表了最小限度的一致意见。阿根廷政府害怕美国在美洲大陆上称霸比害怕轴心国获胜还厉害。阿根廷在历史上、文化上和经济上主要是与欧洲联结在一起的。阿根廷只有维持同欧洲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1—1942年》，第279—280页；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143页。

哥斯达黎加、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马和萨尔瓦多在1941年12月8日至10日对日宣战，并于12月11日至13日对德国、意大利宣战。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在12月8日至31日同日本断交，在12月19日至31日同德国、意大利断交。《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1—1942年》，第337—340页。

即它们宣布不把已宣战的美国及其他美洲共和国当作交战国，因此对它们将不采用中立法。

见萨姆纳·韦尔斯：《决定的时刻》（The Time for Decision），纽约，哈珀，1944年版，第225—226页。美国军事首脑担心，这些国家一宣战，可能使美国本身的军事力量卷入他们至今还不准备承担的责任中去。这还意味着要对早已供不应求的军需品提出额外的要求。

有关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和利马会议的情况，见《概览，1936年》。第804页以下；和《概览，1938年》，第1卷，第677—686页。

的贸易，才能保持它的经济地位，并相信从而才能保持它政治上的独立，实现它领导南美大陆的野心。1941年至1942年，阿根廷政府领导人深信轴心国将会获胜并在经济上控制欧洲。因此，在他们看来，阿根廷有必要保持同希特勒的友好关系。阿根廷人民大部分同情盟国，所以不支持政府严守中立的政策和对泛美合作所持的保留态度。但是，卡斯蒂略政府置公众舆论于不顾，采取了愈益强硬的行动来压制持不同政见者。阿根廷外交部长鲁伊斯·吉尼亚苏博士在启程前往里约热内卢参加会议之前，试图劝说玻利维亚、巴拉圭、乌拉圭和智利的外长共同组成一个南方集团，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反对美国的政策。乌拉圭外长阿尔维托·瓜尼博士断然拒绝考虑对本国政府业已决定的同轴心国立即断交的政策作任何变更。巴拉圭和玻利维亚外长不表态；只有智利准备支持阿根廷政府。

当时智利处境困难。阿吉雷·塞尔达总统于1941年10月猝然去世，因此必须进行一次大选，由激进党领袖孔拉多·里奥斯·加利亚多和支持独裁观点（即使不是法西斯思想）的卡洛斯·伊瓦涅斯将军两人竞选总统。智利所处的战略地位，使它更不便于对轴心国采取强硬行动：它的海陆军部队根本不足以保卫它那长达二千六百英里的太平洋海岸线，或者保护它的沿海航运。玻利维亚人民和巴拉圭人民对他们两国之间那场残酷的查科战争记忆犹新，他们反对任何可能再次将他们卷入战争的行动。秘鲁和厄瓜多尔正忙于彼此间的战争，在没有结束这场战争之前，无意参加任何其他外面的争端。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巴西的态度是举足轻重的。巴西准备同美国进行合作，这一点在珍珠港被袭击以前就很清楚。不过，巴西不乐意采取任何可能将它和阿根廷置于敌对阵营的行动。

在里约热内卢会议上，阿根廷政府拒绝接受一项要求各国同轴心国断交的决议。阿根廷政府决心恪守中立，并得到了智利代表的支持；这位代表不准备放弃中立，除非他能够从美国得到保证将慷慨给智利以财政援助与军用和民用物资。最后，经过冗长的谈判，美国代表团团长萨姆纳·韦尔斯同意接受一项妥协方案。1942年1月28日，拉美所有共和国通过了一项修订的决议，决议申明：“美洲各共和国根据本国的法律程序和符合每个国家在美洲大陆的当前争端中所处的地位及环境的条件下，建议同日本、德国和意大利断绝外交关系。”

韦尔斯为了保持美洲各国外表上的团结，向阿根廷作出让步的决定，引起了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以及美国新闻界和公众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宁可使美洲的统一发生破裂也比采取妥协方式要好，因为这种方式他们看作

有关卡斯蒂略的上台，见下文，原著第133页，注（即本书第203页注——译者）。

1941年10月10日，阿根廷政府下令解散布宜诺斯艾利斯民主市议会；11月，由亲盟国的阿根廷行动党主办的约三千多次集会均被取缔。12月16日，副总统拉蒙·卡斯蒂略宣布阿根廷处于戒严状态，宪法保障暂时无效，严禁有关时论国内外政策的集会，并警告新闻界不准评论总统的行动和方针或政府的中立政策。11—12月间，还采取了步骤，以确保保守党在各省选举中占多数。

见韦尔斯：《决定的时刻》，第230页。

见韦尔斯：《决定的时刻》，第231—234页；劳伦斯·达根：《美洲国家》（Laurence Duggan：The Americas），纽约·霍尔特，1949年版，第87—88页。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1—1942年》，第293页。

是向阿根廷投降。并且，他们相信阿根廷在外交上的失败将造成它的孤立，其结果会鼓舞阿根廷国内的自由主义者和亲盟国的分子起来决心反对卡斯蒂略。这些批评家显然以为可能除了智利以外，所有其他拉美共和国将会跟着美国走。他们还忽视了这一点，即阿根廷人民对于凡是他们认为美国企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主权国家的作法，都必然会产生反感。美国政府后来对阿根廷施加压力的尝试在拉丁美洲所产生的结果表明，韦尔斯是正确的，因为他拒绝了用迫使南美各共和国在支持美国或阿根廷两者之间作出抉择的方法来强行解决这个问题。

尽管韦尔斯认为同轴心国断交是会议的首要问题、但是，许多拉美代表更为关心的却是经济问题。到 1941 年底，美国已成为拉美各国的主要市场和主要供应来源。由于战火蔓延到西半球，拉美各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靠美国来解决它们的经济问题。它们极其渴望得到的一些保证，就是美国将采取步骤以确保它们本国的必需进口物资以及实现美国为本大陆制订的工业动员计划的长期效果。它们担心美国的购买只是一种暂时现象，战争结束后就不需要它们的原料了。

会议最终通过了关于在西半球实行经济动员的建议，这些建议多半是以美国代表团提出的计划为基础的。它们旨在大幅度增加生产为进行战争所必需的战略物资，并促进这些战略物资的自由流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还要采取其他措施来改进国内运输工具，调整航运事业，并简化汇兑问题。拉美各国在美国的帮助下，将增加生产其基本物资和战略物资。作为报答，美国将竭尽全力使南方各邻国能维持它们的国内经济。美国政府保证与拉美各国签订长期合同，并对所提供的原料保证给予公平价格，美国还将参加制订战后经济调整措施的工作。韦尔斯在致开幕词时对拉美代表们许诺说，美国将对拉美各国人民的需要和美国人民的需要给予“平等、相称的”考虑。那些还没有这样做的国家，将成立特别委员会来制定经济动员计划。各个国家的计划将由美洲国家间财政及经济咨询委员会加以协调。这个咨询委员会的职权也扩大了，以便使其能够执行他们的新职责。

其他建议是有关对轴心国实行经济战的措施。首先，和同轴心国断交的建议并行不悖的是，建议美洲各国应当断绝同轴心国所有一切财政和商务关系，并应当监督和管制境内轴心国侨民的活动和财产。

在政治战方面，会议建议各国采取新的更有力的措施，防止间谍和破坏活动以及颠覆性的宣传。会议规定建立一个政治防卫紧急咨询委员会，以研究和协调这些措施，并为 5 月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美洲国家警察与司法当局会议作好准备。为了消除一个庞大而臃肿的委员会可能造成的种种延误和困难，会议同意政治防卫委员会应由选出的七名代表所有美洲共和国的成员组成。会议还就建立一个美洲国家间防务委员会达成了协议。

见赫尔：《回忆录》，第 2 卷，第 1144 页，第 1149 页。

见下文：原著第 162 页以下。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1—1942 年》，第 285 页。

关于里约热内卢会议的最后法案和决议的文本，见上书，第 290 页以下。

第三章履行里约热内卢协定

(1942—1943年)

第一节 军事和经济动员

1942年3月30日，美洲国家间防务委员会在华盛顿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参加者有来自拉美共和国的全体代表。会议主席是美国陆军中将S·D·恩比克。这次会议马歇尔将军把它说成是“一个明确制订军事计划的防务集团”。它的内容是有关西半球防务协作，向美洲国家供应物资，以及统一管理与保护美洲国家间航运的计划等事宜。

但是，有关美国和拉美国家间军事合作的措施，主要是通过双边谈判和协定而逐步制订出来的。墨西哥—美国联合防务委员会于1942年1月12日宣告成立，巴拿马—美国联合防务委员会则于同年8月宣告成立。由于同加勒比海沿岸国家所签订的协定，美同海军和军事前哨已遍布加勒比海整个地区。厄瓜多尔同意让美国在加拉帕戈斯群岛和圣埃伦娜半岛建立空军和海军基地。3月，厄瓜多尔政府宣布美国已获准在这个半岛上建立一个海空军基地，美军一直在岛上从事修建防御工事六个星期之久。9月，厄瓜多尔政府将让与美国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基地之事予以公布。1943年春，为了加强拉美军事力量和防务设施，美国同所有其他美洲国家（巴拿马和阿根廷除外）都签署了租借协定。由于阿根廷没有同西半球其他国家合作反抗极权主义大国，所以它没有资格得到军用物资，而巴拿马则根据保护运河区的特殊安排取得了美国援助。美国在1941年8月同其他美洲国家首先达成的协议是同多米尼加共和国签订的，而最后是在1943年3月（即智利同轴心国断交以后）同智利签订的一项协定。根据这些协定，美国承诺提供一定数量的军需用品给其他美洲国家，而这些国家则依次答应向美国提供它们所能提供的一切防务物品、服务或情报。美洲各共和国给美国所提供的服务，包括维持反潜艇巡逻，允许美国在它们的国土上建立陆、海、空军基地，使用港口和机场，和美国军用飞机飞越它们的领空。美国和其他美洲共和国缔结的租借协定，规定了以现金偿还的方式来转让军用品，应偿还的数目由谈判后达成的协议决定。里约热内卢会议后，有关加速美洲大陆经济动员的各项措施愈益有力地得到了贯彻。1942年3月和4月，为了落实里约热内卢计划，在美国和巴西、墨西哥以及秘鲁之间都达成了一些重要的协议。

虽然巴西、墨西哥和秘鲁协定是在1942年签订的主要双边协定，美国还同玻利维亚等其他美洲国家缔结120项了一些协定。4月23日和秘鲁签订的那

《泛美联盟公报》(Bulletin of the Pan American Union)，1942年6月

见下文，原著第125页。

《总统向国会所作的第十四次关于租借法工作的报告》(Fourteenth Report to Congress by the President on Lend-Lease Operations)，1943年12月31日(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3年)。

见下文，原著第132页。

美国助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1943年2月3日的声明(《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2—1943年》，第364—366页)。

《向国会所作的第十一次(和第十四次)关于租借法工作的报告》，日期分别为1943年7月31日和12月31日。

见下文，原著第129页。

见下文，原著第127页。

个协定，尽管在细节上与其他协定不同，但在当时所作出的这一类安排中仍是很典型的。该协定规定由秘鲁负责建立秘鲁亚马孙公司来发展野生橡胶，美国保证在五年内购买秘鲁橡胶的几乎全部产品。美国还要收购秘鲁全部过剩的棉花，并提供价值二千五百万美元的信贷，用来资助发展有益的公共事业、农业、矿业和工业计划，并由美国专家在这些领域方面给予帮助。秘鲁方面，同意采取一些措施，对轴心国侨民在商业上和财政上的活动加以管制。

马来亚的沦陷导致美国政府加紧努力，用刺激现有生产来源和寻找新来源的方法来充分发挥拉丁美洲的橡胶资源能力。在这些计划中规模最大的和最雄心勃勃的一个计划，就是在亚马孙河流域发展橡胶生产。美国通过橡胶储备公司同巴西、玻利维亚、秘鲁、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巴拿马、墨西哥以及萨尔瓦多订立了独家采购合同。此外还同生产矿物、纤维、油脂和药材等多种战略物资的一些最重要的国家进行过关于全面采购的谈判。

第二节 政治战和经济战

1942年，大多数的拉丁美洲共和国都采取了步骤。把在里约热内卢商定的措施付诸实施。在里约热内卢会议结束前，除阿根廷和智利外，其余的共和国都同轴心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在大多数的共和国，轴心国的资金部被冻结了。然而，要执行这些建议，同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完全断绝所有的经济和财政关系，包括监督与管制轴心国侨民在各该国内的所有这一切活动，困难是相当大的。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政府不情愿面对由于过激地解释美国所主张的决议而使本国经济陷于混乱。1942年6月30日，在华盛顿召开的美洲经济与财政管制制度会议上，讨论了有关的各种问题，同时通过了关于程序和行动。21方面的一些协议。最后，大多数的拉丁美洲政府采取了在程度上和效率上各不相同的措施，来管制出口并接管或限制由轴心国侨民和轴心国同情者所经营的商业和银行业。

1942年2月25日，泛美联盟执行理事会选定蒙得维的亚作为政治防卫紧急咨询委员会（或称为政治防卫委员会）的所在地，并邀请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美国和委内瑞拉指派代表参加委员会工作。鉴于这七名委员会成员不仅仅代表本国，同时也代表泛美联盟的二十一个成员国，所以要求各共和国政府指派特别联络员，以便与委员会保持密切联系。此外，为了促进同个别政府直接进行磋商，委员会受权指派它的一名或一名以上成员访问各个不同的国家。

委员会建议，所有尚未这样做的美洲政府，应即建立各国的政治防卫委员会，以协商现有的负责反政治侵略的部门的工作。委员会还建议在必要的时候召开美洲各共和国官员全体会议或区域性的会议。从1942年5月27

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1941—1942年》，第371—372页。

s·l·罗森曼编，《富兰克林·D·罗斯福公开发表的文件和讲话》（The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 Roosevelt, compiled by S.I. Rosenman），伦敦，麦克米伦，1941年版；纽约，哈珀，1950年版[以后称为罗斯福：文件]，1942年卷，第381页。

关于美国从拉美获得的各种战略物资的进口比率，见达根：《美洲国家》，第99页。

同上书，第92页。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1—1942年》，第398页以后。

政治防卫紧急咨询委员会：《提交给美洲各共和国政府的年度报告，1943年7月》（Annual Reports submitted

日到6月9日期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美洲国家间警察和司法当局会议，就划入了这一类会议，虽然这一会议是早在政治防卫委员会成立之前就已经定下来的。

1942年期间，这个委员会为了管制外国危险分子而建议的措施，包括通过一些法律和规章，规定所有外国人都必须登记，以便以后对他们进行监督，并对违反这些规章者给予适当的处罚。委员会提议在战争期间拘留外国危险分子。外国危险分子的定义就是指那些犯有“图谋破坏任何一个美洲共和国的防务和安全，或坚决地同情三国协定成员国的政治观念”的行为的人。委员会提出的其他措施有：限制受轴心国侨民指导和支持的组织，对122出入国境线实行管制，保护船舶、港口、工厂和其他侨民的财产免遭破坏，以及检查所有国际通讯工具。为贯彻执行这些建议，各共和国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一些措施：不是强化了现行的法律规章，就是颁布了新的法律规章。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制定的法律到了执行时就有很大的差距。执行时的松弛现象，在某些情况下是由于负责人对实施这些法令漫不经心，但更常见的是大多数的共和国行政机构不能尽责所造成的。此外，还是遇到许多必须加以克服的自然困难。例如，在人口稀少的偏僻地区，要把所有轴心国侨民都兜捕起来，就很困难，要把真正亲轴心国的个人和组织与当地的民族主义集团区分开来，也是很困难的。在巴西等国，有大量德国和意大利后裔的公民，要区别其中的忠诚分子与不忠分子，也不总是很容易的事。有组织的特种警察部队多半是不具备的，同时也缺少建造集中营的各种设备和管理人员。

然而，由于拉丁美洲政府采取了措施，加上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协助，到1942年秋，德国人进行颠覆活动的机会大大地受到限制。墨西哥和巴西两国政府于1942年5月和8月相继参战，这就促使上述两国对轴心国侨民和其同情者便于采取严厉行动。巴西在8月22日宣战后，政治防卫委员会在巴西的要求下，召开了一次拉普拉塔河国家会议，讨论如何控制轴心国谍报人员偷渡国境线的问题。会议不仅关心到如何防止轴心国难民从巴西逃往毗邻各国，而且也关心到假如边境两方当局没有建立适当的保安设施，那么，阿根廷境内亲轴心国的德国人与定居巴西南部的大量德国人就有可能暗中勾结起来，狼狈为奸。这次会议之所以大部分没有取得成功，主要是由于阿根廷代表采取了不合作态度的缘故，他不愿意采取任何将会触犯德国的行动，因而拒绝接受有关反对敌国侨民的措施。阿根廷的代表们，在5月和6月召开的美洲国家间警察和司法当局会议上，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

到了秋天，轴心国就只剩下了两个搞阴谋活动的中心：阿根廷和智利。只有在这两个国家里，轴心国和他们的123支持者才有可能在外交豁免权掩护下搞颠覆活动。美国和其他政府收集的情报表明，迄今仍在拉丁美洲活动的各谍报小组，都是由驻在智利和阿根廷的外交官员负责组织、指导、协调

to the Governments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s, July 1943), 蒙得维的亚, 泛美联盟, 1943年版, 第9—23页和附录, 第257—286页。

有关《委员会的最后法令》(Final Act of the Conference)的文本, 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1942—1943年》, 第366页以下。

政治防卫紧急咨询委员会: 《年度报告, 1943年7月》, 第22—42页和附录, 第49—256页。

见下文, 原著第127页, 第129—130页。

政治防卫紧急咨询委员会: 《年度报告, 1943年7月》, 第156—176页。

并提供经费的，并且除了秘密电台之外。还利用外交渠道传递情报。从截获的由瓦尔帕莱索的秘密电台发给汉堡的电文中曾得到大量证据，证明德国间谍系统在美洲进行活动。6月30日，美国政府提交给智利政府的一份备忘录，列举了在智利的德国间谍活动的详细情况、并点了一些间谍头子的名。同月，美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奉命提交给阿根廷政府一份关于他们境内轴心国间谍活动的照会；11月初，又连续提交了一批备忘录，提供更多的有关德国间谍和宣传活动的情报。

1942年10月8日，韦尔斯在波士顿的一次演说中说，两个美洲共和国未能执行在里约热内卢一致商定的同轴心国断交的协议，而且至今还允许它们的领土“被轴心国的官员和搞颠覆活动分子利用，来作为对它们的邻国从事敌对活动的基地”，对此他表示遗憾，他说，由于这些间谍送出了有关盟国船只活动的情报，结果使许多美国人丧生。他希望这两个共和国（阿根廷和智利）不再允许在它们境内活动的轴心国间谍从背后暗算它们的美洲兄弟的邻邦。

韦尔斯的演说轰动了整个拉丁美洲。一般地说，这次演说并没有被认为美国触犯了弱小邻国的尊严和主权而引起它们的愤慨。一些评论家只批评了这一演说的态度，但几乎无人对它的实质有何异议，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同美国的观点是一致的，希望结成反对轴心国的统一战线。11月30日，政治防卫委员会同意公开发表美国在6月30日暗地提交给智利的备忘录。这一决定以五票赞同，一票（智利）反对，一票（阿根廷）弃权而获得通过。智利总统里奥斯立即推迟了早已接受邀请的对华盛顿的访问。虽然，由于美国副国务卿公开嘲笑智利，从而124伤害了该国的自尊心，但是，韦尔斯的演说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智利内阁和国内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分歧达到顶点的导火线。公众舆论强烈地表示支持总统，但不支持外交部长埃内斯托·巴罗斯·哈尔帕，他对事态的处理引起了人们的不信任。10月20日内阁辞职，重新组阁时埃内斯托·巴罗斯·哈尔帕由一名新的外交部长接替了他的职务。

这时智利政府才采取强硬措施，摧毁了轴心国的谍报网。德国间谍，包括领事官员，有的被捕，有的拘留，有的则驱逐出境。11月23日国会提出了一份关于国家外部安全的法案。1943年1月20日，智利同轴心国断绝了外交关系。

虽然给阿根廷施加压力，要它同轴心国断交并取缔轴心国间谍活动，但是收效甚微。美国在11月提出备忘最后，阿根廷政府逮捕了一些德国间谍，但没有真心诚意地采取措施，肃清轴心国的颠覆活动。所以，在1月22日，政治防卫委员会同意发表美国政府1月4日提交给阿根廷的一份详述轴心国间谍在阿根廷活动的备忘录。在提出的证据中，有一张主要间谍的名单，其中最主要的是德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馆海军武官迪特里希·尼布尔上校，以及已经发往德国最高司令部的有关盟国作战努力和西半球防卫措施的情报的抄本。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80—1382页。

原文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2—1943年》，第16页以下。

原文见政治防卫紧急咨询委员会：《年度报告，1943年7月》，第85页以下。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82—1383页。

政治防卫紧急咨询委员会：《年度报告，1943年7月》，第107页以下。

阿根廷通过发表公报进行反驳，详细叙述阿根廷政府和司法当局早已采取的步骤，并指出已要求德国政府召回它的海军武官。鉴于这一行动，阿根廷政府声称，备忘录的发表“带有偏见而且是多余的”。

第三节墨西哥与阿根廷、巴西、智利

前文已简单地回顾了从里约热内卢会议到 1943 年初这个时期内在西半球合作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至今，两个较重要的拉美共和国，巴西和墨西哥已经参战，第三个 125 国家智利则同轴心国断绝了关系。在美洲国家中，唯有阿根廷仍顽固地坚守中立。下文将比较详细地叙述一下决定上述四个国家政策发展的那些国内外事件。

（一）墨西哥

日本袭击珍珠港后，墨西哥外长埃塞基耶尔·帕迪利亚立即发表声明，宣布墨西哥同美国共同捍卫民主，将不遗余力，来显示它与美国的团结和亲密友谊。两天后，1941 年 12 月 9 日，曼努埃尔·阿维拉·卡马乔总统在向全国广播时，进一步阐明了墨西哥政府的态度。总统指出，美国的事就是美洲的事。他说，墨西哥受到了直接威胁。如果需要的话，墨西哥武装部队将履行他们的职责，但全国当前的任务是大力发展军工生产。墨西哥政府决心与美国团结一致的表示，立即付诸行动。同轴心国断绝了外交关系，敌国资金被冻结。1942 年 1 月 12 日，墨西哥政府宣布已成立了墨美联合防务委员会，来协调两国间陆、海、空三军的防务工作。参战两院和备效不同政治色彩的组织都纷纷发表声明和宣言，表示支持政府同美国积极合作和反对轴心国的政策。

墨西哥政府与人民对于进攻美国所作出的反应——这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两国的关系形成鲜明对照——是卡德纳斯总统在 1940 年提出的并由他的继任者阿维拉·卡马乔执行的政策的必然结果。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的紧密合作，虽然是出于战时两国在经济上和战略上的需要，但是，它之所以能得到实现，完全要归功于两国总统和外长在前几年中所显示的明智。

1939 年 9 月，当战争在欧洲爆发时，墨西哥人的情绪虽然是普遍反纳粹的，但也是强烈反美和反英的。除了过去两国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对美国干涉的恐惧感，此外，由于继墨西哥政府 1938 年没收外国石油公司之后而发生的石油争端，近来两国关系就更加恶化了。此外，那些继承墨西哥革命的各政党，自然都是反帝的、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的。1940 年夏，西方民主国家初遭挫 126 败后，墨西哥的政治领袖们开始领悟到，孤立和中立都是不可靠的防御武器。鉴于墨西哥的安全已受到威胁，那就再不能把对外政策建立在政治思想的爱惜上，或者把它主要用作为促进国内各政党利益的基础了。因此，在珍珠港事件的前几个月里，墨西哥公众对政府同美国合作的政策的支持日益增强。

日本进攻西半球所引起的震惊，一度几乎使墨西哥所有各党派都联合起来一致支持政府。左派方面，拉丁美洲最有影响的劳工领袖隆巴多·托莱达诺，及墨西哥劳工联盟，热烈支持实行征兵制，以及同美国合作的其他广泛的防御措施。虽然极左派早期的一些政策和声明看来是不一致的，但它们却表明了一种一贯支持那些抵抗德国侵略的国家的倾向。它德国人获得 1940

赫尔：《回忆录》，第 2 卷，第 1383 页。另见下文，原著第 135 页。

见上文，原著第 110 页。

年的胜利后，隆巴多·托莱达诺向拉丁美洲工人联合会指出，工人们的首要职责就是同法西斯主义成斗，而且同美国的友谊正在增强。1941年期间，墨西哥劳工联盟和它的机关报《人民报》又一次强调，抗击轴心国的侵略是拉丁美洲所有国家的职责，但同时又把这场战争称之为与美洲利益不相干的反人民的战争，是同墨西哥毫无关系的、相互敌对的帝国主义之间的一场斗争。德国入侵俄国后，隆巴多才指出，这场以帝国主义相互搏斗开始的战争，现已上升为全世界反纳粹法西斯战线这一庄严任务，并号召工人们组成反法西斯的民族阵线。但与此同时，他继续攻击了美国佬的经济帝国主义。日本袭击珍珠港后的翌日，隆巴多代表拉丁美洲工人向罗斯福总统发去了支持电。他称这场战争是一场反对野蛮的神圣战争。墨西哥和四大国站在一起。

在极右派方面，辛那基全国联盟和国家行动党两组织的同情态度却不那么明确。隆巴多·托莱达诺和墨西哥劳工联合会扬言，这些组织是同纳粹有密切联系，并勾结纳粹分子一起搞地下活动的。毫无疑问，纳粹在极端分子中确实有一些同盟者。这两个组织都是反革命、反民主的，而且是反美的，但这并不就使它们一定成为亲纳粹的。它们的大多数成员，就象整个拉丁美洲的西班牙主义运动的大多数拥护者那样，指望西班牙作他们文化上和精神上的先导，但并不接受要同纳粹合作的那种极端的127长枪党纲领。害怕佛朗哥可能站到希特勒一边参战，是西班牙文明第一主义的鼓吹者普遍感到不安的一个根源。

1942年期间，墨西哥政府采取了其他一些步骤，同美国合作来加强本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防卫力量。3月，帕迪利亚和财政部副部长访问了华盛顿，共同商讨有关发展墨西哥的经济生活和增加生产盟国作战需要的物资的措施。4月8日，帕迪利亚和书尔斯共同宣布，已一致同意就签订一项互惠通商条约，以及两国在墨西哥合作建立一系列基础工业，以满足墨西哥的消费需要和提供美国作战需要的物资等问题开始谈判。他们还进一步同意考虑采取某些办法，来发展墨西哥的铁路网，在墨西哥船厂中建造货船，以及兴建一座生产高辛烷汽油的炼油厂。

墨美联合防务委员会于1942年1月宣告成立，然后双方于1942年3月签署了一项租借协定，由美国向墨西哥武装部队提供所需的其他军事装备。

5月，墨西哥政府在损失了两艘油船之后，决定向轴心国宣战。5月30日，宣战书经参议院和众议院一致通过。国会也同时批准一项法令，即暂停行使受到宪法保证的一些权利，授予总统以广泛权力，以便根据国防需要而采取必要行动。这就使总统有权对劳工和企业进行管制。阿维拉·卡马乔向工人许诺，紧急状态将不会被用作一种中断革命纲领的借口。授予总统的其他那些权力，使他能够为解决墨西哥的敌侨问题采取更为坚决的行动。

某些轴心国侨民被逮捕了。余者则被迁离沿海和边境地区，属于敌侨的

例如：《人民报》（El Popular），1941年2月25日，4月11日。

同上，1941年7月7日，15日，31日。

《至上报》（Excelsior），1941年12月8日。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1—1942年》，第361—362页。

同上书，1942—1943年，第364页。

《国民报》（Nacional），1942年5月30日。

财产都被置于一个为此目的而设立的行政机构管制之下。为了反间谍活动，新成立了一支联邦秘密警察部队。管理墨西哥的经济生活和发展生产的其他附属机构也都建立了，其中包括一个协调与发展生产委员会，由一名对财政、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拥有广泛权力的主任领导。9月1日，阿维拉·卡马乔任命前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为其内阁的国防部长，这对解除左派担心阿维拉·卡马乔过分偏袒右派利益的顾虑，起了很大作用。

8月19日，两年前通过的征兵法令付诸实施。10月，同古巴签订了彼此相互使用海、空基地的防务协定。

（二）巴西

1942年上半年期间，巴西所持的态度是同战时美国及其他国家进行合作，但不参战。巴西断绝了同轴心国的外交、商务和金融关系，禁止了亲轴心国的刊物出版，封闭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新向通讯社，并大力制止了颠覆性的活动。

2月，巴西当局采取了严厉的行动，粉碎了一个一直在巴西境内活动的间谍网。德网特务有的被捕了，有的则越过国境逃跑了。为了遏制巴西境内大量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侨民当中潜在的第五纵队分子，巴西采取了更为强有力的措施。

巴西当局把陆军预备役军人都召集起来，并实行了强制性的民防制度。巴西的海军部队与美国的海军沿着巴西的海岸联合进行巡逻。巴西的军事当局尽管有点勉强，但还是允许美国的空军和海军陆战队驻扎在巴西各基地上。巴西对轴心国的立场，事实上是一种不宣布的敌对态度；这跟美国在珍珠港遭到袭击之前的立场并没有什么两样。

当时，巴西政府仍竭尽全力建立他们自己的武装部队。但是武器仍很缺乏。1942年3月3日，巴西同美国就增加军需用品达成了协议。然而，据报道，巴西政府对美国拖延提供先前协议承诺的武器感到失望。《民族报》写道，在萨姆纳·韦尔斯访问里约热内卢时，人们就告诉他缺乏武器，正在拖大陆防务计划的后腿。

在2月和3月间，同美国通商的几艘巴西商船被击沉。公众进行了游行示威并袭击了轴心国的机构，以示愤慨。3月12日，瓦加斯总统颁布一项法令，宣布没收轴心国在巴西侨民的资产，以赔偿巴西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迄今为止，政府以及人民都还不准备进行全面参战，但是，如果德国曾想威吓巴西政府使其取消同美国的海上贸易，那么，这种希望是落了空了。同美国通商对于巴西来说是生死攸关的。根据1942年3月3日签订的一系列协议，美国将获得重要的战略物资，而这也就能使巴西在其经济和工业发展上大踏步前进。瓦加斯在他确定的亲联合国家和反轴心国的方针方面是阻挡不了的。在春季和夏初期间，不时发生船只被击沉事件；同时，德国通过报刊和电台发动了一场宣传战，企图以此影响巴西人民起来反对其本国政府的政策。德国宣传遵循其通常的方针，企图使巴西人民相信他们的领导人正在

在战争年代，美国根据租借法案计划，给拉美共和国提供军需用品，其中巴西获得了总数的三分之二。见《向国会所作的第二十一次关于租借法工作的报告》，1945年9月30日。

《民族报》（Nacion），1942年2月10日。

《商业日报》（Jornal do Comercio），1942年3月13日。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1—1942年》，第364—367页。

把祖国“出卖”给美国，并且威胁着说，如果继续“迫害”在巴西的德国团体，德国就将进行报复。可是，这样做法仍然无法制止事态的发展，而其主要结果只是激起了巴西人民的义愤，加深同仇敌忾而已。防卫措施正在稳步地实施着。6月，又召集了预备役军人，采取了各种措施来扩展空军，诸如除了从美国取得供给外，也在巴西制造飞机，以及提供额外的训练设备。美国的军事和技术人员，在巴西人的帮助下，正在防卫基地和各种装置方面努力工作。到德国准备在南大西洋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潜艇战时，在沿海地区建造系统的基地工程已取得了相当可观的进展。

1942年6月15日，希特勒决定对巴西发动一次集中的潜艇攻击，结果巴西在8月15日至16日的夜间损失了五艘商船。这次对巴西船只的攻击，使巴西人义愤填膺，惊骇万状。反对轴心国的游行示威遍及全国，并在里约热内卢和其他一些中心地区发生了骚乱。8月22日，瓦加斯宣布同德国和意大利处于交战状态。同时，他宣布封闭国内所有的港口，命令所有商船全部进港。直到美国南大西洋舰队司令乔纳斯·H·英格拉姆海军上将答应提供更多的护航舰之后，才取消上述禁令，恢复航运。宣战标志着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对政府的支持，其中130包括昔日的反对派和政治流放犯。颁布了几条扩大总统管辖权的法令。根据这些法令，政府对全国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拥有广泛的权力。

9月，政府下令总动员；整编了巴西的海军，将北方空军大队置于英格拉姆海军上将作战指挥之下。同时还通过了沿海地区海空军联合作战计划。巴西的海军军官被派往美国在基韦斯特和迈阿密的海军学校，接受有关反潜艇成的训练。美国还给巴西海军提供了其他巡逻机和猎潜舰艇。

1942年至1943年的冬天，在巴西沿海，商船不断遭到重大损失，因此，美国海军决定加紧组织护航舰队。1942年12月，当巴伊亚—特立尼达的护航舰队终于建成时，巴西海军参加了护航工作，承担位于巴伊亚和累西腓之间航线最南一段的护航任务。在北非登陆的盟军解除了巴西再受侵略的危险以后，瓦加斯开始考虑调派巴西军队到海外去。巴西沿海的各基地对于非洲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1943年1月，罗斯福从卡萨布兰卡返回途中，曾在巴西海岸的纳塔尔逗留，同瓦加斯讨论了美国同巴西的合作问题，并将盟国进一步的行动计划告知了瓦加斯。在罗斯福访问后，巴西空军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紧接着在累西腓举行了会议。

1943年2月6日，巴西政府奉示恪守联合国宣言。

（三）智利

1942年2月1日，胡安·安东尼奥·里奥斯当选为智利总统。在他施展政治策略的一个时期以后，里奥斯得到了从极左派、中间派到几个保守集团各党派的支持竞选总统。虽然支持他的各集团彼此间的观点决不是一致的，实际上也决不是全都赞同里奥斯，但是，他们却一致反对极权主义的前独裁主义者伊瓦涅斯。伊瓦涅斯的主要支持来自各民族主义的党派。因此，里奥

莫里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海军作战史》，第1卷，第379页。

英国海军部：《关于海军事务的德国元首会议，1939年（—1945年）》[Fuhrer Conferences on Naval Affairs 1939（—1945）]，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7—1948年版，共八卷，油印本，1942年卷：第45—46页（以后简称《元首会议》）。

莫里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海军作战史》，第1卷，第382—336页。

斯的当选意味着已故总统阿吉雷·塞尔达领导下的人民阵线政府的外交政策的连续性格不会出现明显的中断。里奥斯的的支持者把他这次当选说成是对民主与反极权主义情绪的 131 肯定。可是，人们一下子就很清楚地看到，这决不意味着智利政府准备去实现里约热内卢的同轴心国断交的建议，或者采取坚决行动去镇压轴心国与第五纵队的活动。1942 年的上半年，盟国在轴心国手下遭到了挫折，特别是美国海军在西半球水域对德国潜艇掠夺商船的活动未能采取有效反击，这使智利政府和人民深信，小心即大勇。智利人不准备采取任何可能会开罪轴心国并有损他们保守中立的行动。他们争辩说，当智利承认美国享有非交战国的权利时，智利已表现出了它的团结一致态度，而且，通过保持中立与促进美国作战所需原料的生产，智利将能对西半球防务作出最有益的贡献。里奥斯在 4 月 2 日的就职演说中说，他的政府将在履行本大陆团结的的同时，同其他国家保持睦邻的关系，而且，只有在符合民族愿望的情况下才能对外交政策作出重大变更。当时，阿根廷外长鲁伊斯·吉尼亚苏正访问智利参加总统就职典礼，受到了热烈欢迎。接踵而来访问智利的是阿根廷贸易代表团，它渴望就两国之间的关税同盟问题进行磋商。在这个时期，共产党是唯一有组织地支持同轴心国绝交的政党，它的这个提议在 5 月 9 日参议院的表决中，以十八票对三票遭到否决。里奥斯将其主要注意力放在国家所面临的经济问题上，由于欧战而变得更为严重的经济不平衡，使智利遇到了困难，而日本袭击珍珠港后又失去了对日贸易，使困难愈益严重了。智利需要新的出口市场与供应来源。它也需要筹措开发资源的资金，但是，智利人对他们过去视为美国资本家的剥削行径还有着痛苦的记忆。然而，在 1942 年，智利眼前明摆着的经济要求，只有增加它对美国的依赖才能得到解决。

随着这一年的进展，智利人民日益意识到，他们不能模棱两可地继续他们那种搞平衡的做法，要同轴心国保持友好关系，那就不能同美国保持亲善，也得不到除了阿根廷以外的拉美邻邦的尊重。那年夏季期间，在支持政府的各党派中，有一种日益增长的倾向，主张同轴心国绝交。早在 6 月 21 日，由新成立的民族民主阵线组织了一次 132 群众性示威运动，通过决议要求同轴心国绝交、承认苏联，以及采取严厉行动镇压第五纵队。这些要求都被里奥斯及其外长巴罗斯·哈尔帕所拒绝。后者大概是利用民族主义思想感情与反美情绪压制了这种倾向的，因此政府的外交政策得以在 6 月 24 日的一次参议院的秘密会议上以三十四票对二票通过。可是，8 月 22 日巴西的参战，给了反对里奥斯“审慎的”中立政策运动以一种新的动力。韦尔斯 10 月 8 日对智利步调不一致的严厉批评，于是便落到了一个在外交政策方面早已争论不休的政府和国家身上，并加速了前已谈到的智利政府内部的危机。在以后几个月中，要求里奥斯同轴心国断交的压力增加了。为配合左翼力量而成立的民主联盟，与在墨西哥劳工领袖隆巴多·托莱达诺赞助下的智利工人同盟联合组织了多次示威和集会。里奥斯虽然不愿承担责任，但还是对国会说，如

见《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42 年 4 月 8 日。

见《法兰西报》(France)，1942 年 5 月 9 日。

见《信使报》(Mercurio)，1942 年 6 月 26 日。

见上文，原著第 123 页。

见上文，原著第 123—124 页。

果在他所促成的措施证明不足以保卫大陆的话，他将同轴心国断绝关系。可是，他又补充道，决不能让外国军队驻在智利境内，而保卫智利海岸的本国力量由于缺乏资金和设备严重地受到了限制。很有影响的内政部长劳尔·莫拉莱斯·贝尔特拉米，于12月访问了华盛顿。在他回国以后，参议院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对外交政策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

最后，在1943年1月19日，莫拉莱斯宣布总统已决定同轴心国断绝关系。这个决定在参议院以三十票对十票获得通过，并在1月20日正式宣布断绝外交关系。

（四）阿根廷

1942年1月底，阿根廷代表团非常满意地从里约热内卢会议回国。虽然他们未能说服其他南美国家组成一个集团来对抗美国那个动员西半球反对德国的政策，但还是成功地使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听任他们继续实行中立政策。阿根廷政府衷心相信，这项政策在他们看来是一项最符合他们国家利益的政策。另外还有一个动机，即这也是一项最能促进他们的党派目的的政策。继续使133保守联盟党掌权，是卡斯蒂略及其支持者的主要目的。在反政府的自由派和左翼分子以及一些主要的报纸中，可以找到主张同美国合作以反对轴心国的主要鼓吹者。政府在1941年12月16日宣布戒严状态后，报界很难积极进行活动以支持一项政府所反对的亲盟国的政策。再说，赞同合作的那些政治力量，由于他们团结涣散和内部争吵而受到了掣肘。主要由反对派组成的激进党，曾经在1940年众议院的选举中获得了多数，但是由于保守党和参议院所施展的策略，使他们未能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激进党为他们的处境忿忿不平，于是就采取了使国会程序趋于无效的手段。

民众对激进党的领导和效能失去信任，在1942年3月众议院的选举中表现出来了。这次选举结果，保守党集团在各省取得了巨大的收获，跟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选举情况不同，那里选出了十二名社会党议员和六名激进党议员。在新的国会中，政府联盟党是唯一的最大的党，但未能取得有效的大多数。可是，说到头，议院的组成对制定外交政策只起很小的作用，因为每当议院的观点同卡斯蒂略和他的外交部长不一致时，它们就会被置之不理，而且也不可能动员舆论来支持这些观点。卡斯蒂略压制自由发表意见的政策，阻塞了持反对政府政策意见的人们的言路。因此，公众大多数都赞成中立政策，他们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立为阿根廷带来繁荣的历史将会重演。

虽然阿根廷政府决心严守中立，拒绝参加大西洋海上护航警卫的计划，但是，他们却非常想要从美国取得军火，为此于1941年12月派遣了一个军事代表团前往华盛顿。美国政府指出，既然阿根廷在本半球的防务方面拒绝和其他美洲国家合作，甚至还没有同轴心国断绝外交关系，所以它不能指望从为数有限的军事物资中分享一杯羹，这些物资是将分派给那些帮助抵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1942年11月24日。

1930年的一场革命，把从1916年至1930年统治阿根廷的激进党赶下了台，保守党寡头集团重新掌权。自1930年以来，他们一直是用多少有点专横的手段来进行统治的。1938年罗伯特·奥尔蒂斯继任总统，虽然奥尔蒂斯是由保守党集团提名的，但他有激进倾向，并且被认为怀有恢复到一个比较民主的政府体制的愿望。1940年奥尔蒂斯因病不得不委托其副总统，一个反动的政客，拉蒙·卡斯蒂略将军代行职权。1942年6月，即在他逝世前一个月，奥尔蒂斯辞去了总统职务，卡斯蒂略就此成为法律上和事实上的总统了。

抗轴心国侵略的国家的。

阿根廷政府同德国政府继续保持友好关系的决心，在他们对德潜艇袭击阿根廷商船事件的反应中进一步显示出来。这两艘阿根廷商船在 1942 年 4 月和 6 月先后被击沉。德国政府在答复阿根廷政府的抗议时表示歉意并愿提供赔款。德国政府还答应，如果阿根廷船只把航行时间和路线通知他们，德国保证它们安全航行到达海湾地区指定的港口。

当时，主张同轴心国断绝关系的决议在众议院被提了出来；人们在报刊上要求采取有力的措施镇压第五纵队的活动和宣传。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未控制颠覆活动，但总的看来，政府用这些措施来反对所谓的共产党，要比反对纳粹分子显得劲头更大。7 月，国会在 1940 年成立的调查第五纵队活动委员会的领导成员达蒙特·塔沃尔达，由于委员会的工作正在受到政府和军事当局的阻挠，愤而辞职。这个委员会以一个社会党人为主席，重新进行了改组，并根据它的调查结果，于 1942 年 9 月和 10 月发表了另外一些报告。这些报告揭露了以下这些事实：已被政府宣布为非法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在德意志联邦福利文化协会的伪装下，正在继续他们的活动；在德国人的学校里，仍在进行着纳粹宣传的教育；德国领事和外交官员还在从事组织颠覆性宣传和德国间谍的工作。委员会要求召回那些有直接牵连的德国海军武官和文化参赞。9 月 29 日，众议院以微弱的多数，通过了主张同轴心国断绝关系的决议和批准里约热内卢的协定。卡斯蒂略反驳说对外政策是总统的特权。于是，众议院宣布休会，任凭卡斯蒂略以法令自由行事，一直到 1943 年 5 月复会时为止。

在 1942 年夏秋期间，美国政府继续努力说服阿根廷政府去执行在里约热内卢所达成的协议。美国通过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使和驻华盛顿的阿根廷大使费 135 利佩·埃斯皮尔提出他们的意见。10 月，赫尔接见了回国休假后返任的埃斯皮尔，并向他指出：在反对轴心国的战争中，阿根廷的不合作政策可能损害它战后的利益。埃斯皮尔回答说，阿根廷的政策是根据轴心国和联合国同样都可能取胜的这一假设制订出来的。同月，韦尔斯公开批评阿根廷资敌，并在 11 月向阿根廷政府递交了列有纳粹间谍活动证据的照会。

虽然政府不能忽视国内外越来越多地批评他们的政策这个事实，但是，他们仍然无意改变这个政策，以迎合一个不受欢迎的国外强国和国内政敌的要求。在阿根廷国内，他们采取了日益严厉的措施来压制批评；更多的集会和报刊都被查禁，并从 1942 年 12 月 4 日起，宣布戒严状态无限期地延长下去。

当时曾企图声称英国赞成阿根廷中立为理由来抵制美国的批评。阿根廷的英国商人所提出有关这方面的言论被举出作为反映英国政府的意见。12 月

赫尔：《回忆录》，第 2 卷，第 1378—1379 页。另见韦尔斯有关他在里约热内卢会议同鲁伊斯·吉尼亚苏的会晤记载（《决定的时刻》，第 228—229 页）。

《纽约时报》，1942 年 7 月 16 日。

同上，1942 年 7 月 3 日、16 日。

五份列有颠覆活动证据的报告，已在 1941 年发表。

赫尔：《回忆录》，第 2 卷，第 1381—1382 页。

见上文，原著第 123—124 页。

31日，为了响应美国国务院的建议，英国外交部发表了一个公告，对阿根廷未能同轴心国断绝关系表示遗憾。与此同时，英国大使向卡斯蒂略指出，如果他的政府不能采取更有效的步骤来阻止德国潜艇获取盟国船只的活动情报，那么，英国就不可能继续购买阿根廷的物资。因为英国是阿根廷牛肉的主要市场，所以英国的照会是十分不愉快的事。政府为了制止一些比较露骨的轴心国间谍活动又采取了一些措施。通讯设备受到了限制；有几个德国人被逮捕；最高法院要求那个因有牵连而受到指控的海军武官应递解法院受审。德国政府拒绝了这一要求以后，阿根廷政府于1943年1月11日要求把这个武官召回。

美国和其他美洲国家都希望，这些步骤将是阿根廷政府采取更为有力的行动以反对轴心国的先声。因此，政治防卫委员会始终扣住美国有关德国在阿根廷的间谍活动的备忘录不予发表，一直到智利同轴心国断交以后，希望阿根廷也会仿效智利的榜样。

智利同轴心国断交以后，剩下了阿根廷成为唯一的136同其他美洲国家分道扬镳的国家。它在拉丁美洲丧失了威信，它的政策受到了美国和英国的批评。虽然政府由于他们陷于孤立的境地而感到不安，但是，他们仍然不相信一致行动会带来什么好处。1943年2月，卡斯蒂略宣布，他的政府将继续恪守中立政策。

第四章紧张与压力

(1943—1944年)

第一节阿根廷军事独裁的兴起

1943年春季，阿根廷的政府联盟党积极致力于巩固他们的地位，准备迎接9月的总统选举。国会此时正在休会，公众态度冷淡。政府通过操纵及在操纵不成时通过直接干预而使激进党未能得势。由于激进党内部意见不和，缺少一个杰出的领袖，又不愿意同社会党进行合作，政府得以顺利地进行他们的工作。政府联盟党满怀信心地期待着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获胜，而正在这时，即在选举前三个月，他们冷不防受到了政变的袭击。

6月4日，阿图罗·罗森和佩德罗·拉米雷斯两将军率领军队开进了首都。卡斯蒂略被迫签字辞职，宣布了军事管制法，建立主要由海军和陆军官员组成的临时政府，由罗森将军担任代理总统。6月7日，拉米雷斯代替罗森当上总统。6月9日，解除军事管制法，但是仍保持戒严状态，解散了国会，9月份的总统选举也被取消。

政变以最少的流血获得成功，起初受到报刊和公众的普遍赞扬。因为他们看到现有各政党的腐败无能而完全失去了希望，相信新政权会提供比较诚实和有能力的政府。国内外对阿根廷外交政策的批评家都希望新政府放弃他们孤立的立场，代以同其他美洲国家及其盟国合作的立场。事实上，一些政变策动者是赞成同轴心国断交的，因为他们相信这将会使他们能同美国在武器的供应方面达成协议。他们看到由于巴西同美国合作所引起的南美洲力量均势的变化而感到恐慌，这使巴西不仅在军事力量上而且在经济潜力上都获得了巨大增长。曾于1942—1943年冬访问过华盛顿的阿根廷军事使团，再次未能获得美国的供应品。同样的要求同样地碰了壁。只有那些正在履行里约热内卢会议商定的大陆防卫义务的国家，才能享受租借法案的援助。

6月9日，拉米雷斯政府得到阿根廷最邻近的一些国家的承认，并在6月11日得到美国和英国的承认。拉米雷斯和他的外交部长塞贡多·斯托尼海军上将向美国大使担保，他们打算在适当的时候同轴心国断绝关系，最晚可能在8月，但是他们又说他们国家必须首先作好充分准备。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美国政府继续给阿根廷政府施加压力，要后者按他们已作出的保证对轴心国采取行动。

也许斯托尼和拉米雷斯已经准备同轴心国断交，但是他们不能当家作主，总统背后的实权操在一批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独裁主义观点的青年军官手中。胡安·庇隆在这个“上校集团”中是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人物。于是，在国内推行了一项逐渐加强压制和整肃的政策，进行了大清洗，被清洗的官员均换上了海军和陆军军官以及文官中的民族主义者。

政府在外交上趑趄不前。8月5日，斯托尼给赫尔一封长信，抱怨阿根廷的中立被人们所误解了。他列举了阿根廷为盟国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并声明其中包括专门卖给盟国的出口物资。但是，他接着说，阿根廷人民不准备突然改变它的外交政策；同正面临失败的轴心国断绝关系是不符合阿根廷骑士精神的，将会受到与意大利在1940年背后暗害法国时一样的批评。他在信的末尾请求提供武器和机器，以使阿根廷恢复到同其他美洲国家相平衡的地

萨姆纳·韦尔斯：《我们走向何方？》（Sumner Wells：Where Are We Heading？），纽约，哈珀，1945年版，第193—194页。

位。赫尔用严厉的驳斥回敬了这一异乎寻常的外交文件。不过，同时，他又阻止了财政部长企图说服罗斯福用冻结阿根廷在美国的信贷的办法来进行报复。9月8日，赫尔的信在阿根廷报纸上一发表，就激起了民族主义情绪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斯托尼受到了猛烈 138 的攻击，因为是他使阿根廷成为受赫尔公开谴责的对象，给国家带来了耻辱。在拉米雷斯急忙否认事先曾知道斯托尼的外交新方针之后，外交部长只好辞职，别无其他选随后一个月，一些美洲国家的政府呼吁阿根廷政府采取真正的团结政策，同其他美洲国家结盟。在国内《新闻报》、《民族报》和一百五十名著名人士，于10月15日发表了一个声明，要求修改阿根廷的中立政策，政府诬蔑签名的人都是“异己分子”、“叛国分子”和“共产分子”，并下令开除在声明上签名的所有公务员和大学教授。埃德尔米罗·法雷尔将军，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在10月被任命填补副总统的空缺，改组了内阁，其余的温和派都被好战的民族主义分子所取代。12月1日，原任陆军部次长的庇隆兼任新成立的全国劳工部部长一职。庇隆上校原已得到军队给他支持的保证，这时遂着手扩大支持他的社会基础，把工人阶级也包括在内。12月30日，颁布了一个命令解散所有政党。

1943年12月21日，玻利维亚政府为暴力所推翻。而这次政变又证明与阿根廷有牵连，这就进一步加剧了西半球政治的紧张气氛。华盛顿深感不安。罗斯福和赫尔担心阿根廷政府会试图在其他邻国煽动政变，借以用亲轴心国的政府来取代与盟国友好的政府。美国于是又增加配给了巴西一批武器，其南大西洋舰队并访问了蒙得维的亚。阿根廷外交部长获悉，美国政府打算发表声明指责阿根廷同玻利维亚的革命有牵连，并且是对邻国政府搞颠覆活动的基地。美国准备着手冻结阿根廷在美国的资产，除非阿根廷政府准备同轴心国断绝关系，并采取有力行动来取缔纳粹间谍和他们在阿根廷的民族主义的支持者。

拉米雷斯面对这种情况决定依顺美国。1944年1月26日，他同德国和日本断绝了关系，并答应在国内进行全面清洗。为了付诸实施，采取了一些尝试性的步骤，然而，上校集团无意让拉米雷斯改变阿根廷的外交政策。于是当副总统法雷尔离开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时，双方发生了破裂。2月25日，庇隆上校发动了第二次政变，废黜了拉米雷斯，以更听话的法雷尔取而代之。

赫尔对此深为恼火。他要求反轴心国的国家组成统一战线，来反对法雷尔政权。除了智利、巴拉圭和玻利维亚这些与阿根廷接壤的国家以外，其他美洲国家都被说服不承认这个新政府。3月4日，斯退丁纽斯以代理国务卿的身份发表了一项声明，指出鉴于拉米雷斯已被反对西半球防卫合作的集团所推翻，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美国大使已奉命在事态进一步发展之前，同新政权进行官方联系。第二天，艾登在下院说，鉴于围绕拉米雷斯将军将权

原文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1944年》，第525—534页。

见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83—1388页。

见下文，原著第140页以下。

见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90—1392页。

达根：《美洲国家》。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1944年》，第540—541页。

力委托给副总统这一问题的情况不明，英国大使已奉命同阿根廷政府的联系仅仅限于例行公事方面。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法雷尔政权的一些行动使人们更有理由表示关注。政府加紧推行了按照极权主义的方针来改组国家的一些步骤。他们没有采取任何反对轴心国及其支持者的行动。他们愈来愈敌视外国人的企业，并强调加紧重整军备的重要性。6月10日在拉普拉塔大学主持一次国防讲座的仪式上，庇隆说，使用武力作为达到本国目标的一种手段是正当的。阿根廷事态的发展使赫尔深信有必要采取更坚强的行动。6月22日，美国给其他美洲国家和英国递交了备忘录，声称法雷尔众所周知地公开给予了联合国家的敌人以周密的援助。并通知它们美国大使正被召回，要求它们采取类似的行动。7月26日，国务院发布了一份对阿根廷的公开指控书，详细阐述了它6月22日的秘密备忘录以及在7月20日发出的第二份备忘录。

当时，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政府，除了已承认法雷尔政权者外，同意了召回它们的大使进行磋商，尽管其中有一些国家是很勉强的。英国政府也采取了相同的行动。

阿根廷之能以对美国奉行独立的政策，多半是因为它在财政贸易上同英国有着密切联系的缘故。因此，在过140去的这一年中，赫尔曾多次试图劝说英国政府一起对阿根廷政府施加强大压力。可是，英国政府鉴于它在阿根廷有大量投资和战时要依靠来自阿根廷的进口货，不愿意同阿根廷的友好关系疏远。而且，英国早已处于定量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少得可怜的肉类供应有三分之二要仰给于阿根廷。因此，在1943年12月至1944年1月期间，在拉米雷斯同意与轴心国断绝关系之前，对赫尔提出的参加对阿根廷的经济制裁或召回大使的呼吁，英国政府是抵制的。在法雷尔政变之后，美国又企图劝说英国政府同美国一起对阿根廷新政府采取共同行动。英国政府本想与法雷尔政权达成一项协议，而极不愿意召回大使以加深两国之间的裂痕。虽然这样，在6月30日赫尔说服罗斯福亲自向丘吉尔提出过这个问题之后，英国首相才勉强地同意召回大使戴维·凯利爵士。与此同时，丘吉尔明确表示他完全不赞成美国的政策。英国政府不顾赫尔的压力，硬是不肯走得比这更远一些。赫尔这时对阿根廷越发恼怒，而且对国内外凡不准备同意他的高压政策的人都不耐烦了。8月16日，阿根廷在美国剩下的黄金储备被冻结；9月，美国商船被禁止驶往阿根廷港口。

美国国务院的强硬政策，虽然受到美国大多数报纸和公众的鼓励，但却遭到了萨姆纳·韦尔斯的强烈反对。他争辩说，不干涉内政是睦邻政策的基本原则。韦尔斯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宣称，一个国家的民主不可能由外国人强加给它，高压政策只会加强法雷尔政权，使其他美洲共和国惶惑不安，并且很可能导致美洲国家体系的瓦解。

第二节玻利维亚的军事政变

1944年3月5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97卷，第2028栏。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97页。

同上书，第1400页。原文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1945年》，第776—783页。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410页以下。

《纽约时报》，1944年8月17日。

同上，1944年9月26日。

1943年12月的玻利维亚军事政变，虽然被归咎于阿根廷政府和纳粹的影响，但它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玻利维亚政局不稳定已有很长的历史了，考虑到它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极不平衡状况，那是不足为奇的。它的人民大众贫困不堪，没有文化。玻利维亚的矿产占全国出口的百分之九十，给政府提供它的岁入的三分之二以上。因此，玻利维亚政府对采矿业中所发生的事件极为敏感。不满本国现状的玻利维亚民族主义者，倾向于把这些情况 141 归罪于外国资本家对他们矿产财富的剥削。

1940年同美国政府达成一项协定，根据这项协定，美国答应向玻利维亚购买尚未被英国抢先弄走的全部的锡。1941年进一步达成的协定，规定美国将购买玻利维亚全部的钨和大部分的铜。美国还同意向玻利维亚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以开发它的矿产和其他资源，并改善运输设施。同时，双方约定要解决玻利维亚政府和美孚油公司之间由来已久的争端。

恩里克·佩尼亚兰达总统希望，这个玻利维亚矿产的可靠市场和北美的财政技术援助，将有助于他把玻利维亚的经济生活置于比较稳固的基础之上。但由于玻利维亚的落后和战时势必造成的匮乏，这些希望多半成了泡影。玻利维亚人对他们用战略上极为宝贵的矿产所换来的东西普遍表示不满。由于进口价格上涨，出口价格又受美国控制，美国因之备受指责。玻利维亚人对分配给他们的机器和其他供应品的数量也感到不满。反对党指责政府没有充分利用对方需要玻利维亚原料的这个良机，同时为了美国而牺牲了玻利维亚的利益。

玻利维亚锡矿业虽然在1942年顺利地提高了锡的价格，但是矿工们并未得到相应的好处。他们工资一般都很低，劳动条件极为悲惨。物价的飞涨超过了工资的增长。在矿工和其他工人中，罢工和怠工的次数日益增多，而政府却把这些情况以及印第安人中的骚动，都归因于纳粹第五纵队分子和左翼煽动者。虽然极端主义者并不是造成不满情绪的人，但毫无疑问，他们确实利用过这块沃土来制造麻烦。各矿的骚乱以1942年底在卡塔维的帕蒂尼奥锡矿爆发的一次罢工达到了顶点，结果，政府实施了军事管制法，并使一些矿工遭到伤亡。由于卡塔维的“屠杀”给反对派提供了有力的炮弹，以致从1940年就职以来，仅仅维持一种朝不保夕的统治的佩尼亚兰达政府进一步遭到了打击。1943年4月，佩尼亚兰达为玻利维亚进入与轴心国交战状态颁布了一条法令；5月5日访问华盛顿时，他在联合国家宣言上签了字。但是，直到12月4日，在议会批准玻利维亚赞同联合国家宣言后，才正式宣战。宣战后，随即制定了一项安全法令，使政府能以对在拉巴斯的德国俱乐部和民族主义者团体——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党报采取行动。佩尼亚兰达的这一行动，促进了显然本已在策划中的同5月大选相配合的军事政变。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帕斯·埃斯登索罗，对阿根廷的独裁制度颇为向往，并得到阿根廷领导人的鼓励和支持，后者对巴西和北美势力在玻利维亚的扩张深感不安，因为他们一向把玻利维亚视为自己的禁裔。

12月20日，帕斯·埃斯登索罗在他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同伙和下级军官的支持下，发动了军事政变。他们占领了总统府，逮捕了佩尼亚兰达和他

据官方估计，死亡人数是十九人，非官方（政府的反对派）估计有四百人。

帕斯·埃斯登索罗曾与由玻利维亚驻柏林空军军官贝尔蒙特和德国驻拉巴斯公使在1941年策划的一次推翻玻利维亚政府的未遂政变有牵连。

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者，组成了由瓜尔维托·比利亚罗埃尔少校担任总统的临时政府。

第二天，新政府发表了一项声明，宣布玻利维亚仍将继续忠于联合国家，并忠实履行它对美洲国家的承诺。鉴于民族主义革命运动领导者的人所共知的政见，以及他们同阿根廷的密切关系，美洲国家对这个声明是有怀疑的。赫尔立即表示，在新政府的组成中确实证明与反联合国家分子无牵连之前，美国不准备承认它。他们还向其他美洲国家政府散发了一份强硬的备忘录，断言这次革命的领导人在观点上是极权主义者，在革命前就同纳粹间谍和阿根廷军事独裁当局有接触。

政治防卫委员会很快通过了一项声明，建议凡是在战时使用武力成立的新政府，在没有经过商讨确定它是否准备承担西半球防务的责任以及是否纯粹出于民族激情之前，都不应予以承认。除了阿根廷以外，其余的美洲国家尽管有所保留，但都接受了这项声明。¹⁴³ 虽然比利亚罗埃尔坚决表示他准备履行玻利维亚的国际承诺，但是，拉美国家都赞同追随美国，拒绝承认新政府。玻利维亚政府直到下一年的6月才被承认接纳。在这期间的几个月中，比利亚罗埃尔通过逐步清除他政府中属于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成员的部长，表现出他渴望承认的心情。民族主义者的外交部长，已由一个旧社会党党员巴尔迪维索所接替，后者对报社记者发表了一项安定人心的声明，重申他忠于西半球团结这一原则和反对组织区域性集团。7月2日公布了国民议会的选举法，并宣布实行政治大赦。与此同时，一些美洲国家的政府表达了他们日益增长的急切愿望，想与玻利维亚实现关系正常化。但是，赫尔似乎仍不相信这样给予承认是明智的，国务院照会各探询国家的政府，说玻利维亚必须首先用具体的行动来证明它已改变主意。据此，玻利维亚政府在5月19日逮捕了由联邦调查局查出的八十七名轴心国间谍，并用飞机引渡到美国。经过美洲各国政府进一步交换意见，才于1944年6月23日宣布承认玻利维亚政府。

第三节目前的困难和未来的担忧

在1943年和1944年间，令人忧心忡忡的最大原因，固然是由阿根廷和玻利维亚所导致，然而，西半球关系日益紧张的其他迹象并不能归因于美国同阿根廷的对抗及其对美洲大陆其余国家所产生的影响。

美洲各共和国对于当前的形势普遍感到不满，对于未来则十分担心。1941年至1942年，它们已准备为了取得美国的保护和经济援助付出必要的代价。随着盟国开始转入攻势，来自轴心国的危险减少，旧日的忧虑和不满就又抬头了。经济上的太平盛世依然可望而不可即。作为它们向联合国家出售原料的交换条件，拉丁美洲各国政府曾希望获得发展它们国家经济并使之多样化的机会。虽然一些组织较好、实力较强的国家（特别是巴西），相当顺利地达到了这个目的，但其他国家则相形见绌。当地工业的发展，因工业国不能提供必需的机器设备而受到阻碍。在进口物资继续短缺的情况下，日益增长的购买力导致通货膨胀以及随之而引起的祸害。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政府，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88页。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1944年》，第497—498页。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98—1399页；达根：《美洲国家》，第106—107页。

都未能采取适当的步骤以控制物价，或保证公平分配供应紧张的商品。因此，由于物价暴涨，工资不能相应提高，致使不满情绪与日俱增。

这种不满情绪，势所必然地把矛头指向现政府，同时也指向美国。拉美人动辄把他们的经济苦难归咎于外国资本家的剥削。因此，美国为了拉美人的困难境遇而日益受到责难，特别是受到现政府的反对派的责备。他们声称，那些不得人心的政府只是通过得自北美的支持，才使它门得以违反民意，继续维持他们的统治。美国政府自然不愿看到这些政府内部经常易手，因为美国为了努力促进本大陆的防务与经济动员，必须同这些政府打交道。同时，美国政府通过改进粮食生产、教育、保健和卫生等计划，也设法帮助拉美政府改善它们人民的生活条件。美国的政策难免带有复杂的动机。要想在许多拉美国家中现存的混乱情况下能有稳定的政府，显然是不可能的；而如果周围有一些繁荣自足的邻邦，这才符合美国的利益。尽管这样，在为了改善拉美状况所作的努力中，还是有着很多真正的利他主义的。美国的使团在拉美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在执行各项计划有关的官员中，有许多人是满腔热情，充满善意，并做了许多有价值的工作。遗憾的是，在拉美工作的各个组织之间，配合协作不够。这些计划很多是仓促构想出来的，并不能很好地适合拉美的条件和拉美人的感情。在拉美计划中最成功的，并且最受欣赏的，就是那些与粮食生产合作以及有关保健的计划。有些拉美人除了对当前形势不满（这种不满常被各党派所利用）以外，还为他们的战后地位日益感到不安。在战争的岁月里，由于美国从事战争所提供的原料市场，他们的经济即使不曾改革，也还支撑下来了。拉美人担心战争一旦结束，他们的原料市场便会中断。他们一方面担心美国控制他们的经济，同时又存在着一种矛盾的心理，唯恐美国对西半球已在失去兴趣。由于临近 1943 年年底所发生的几个事件，对美国意图日益不安的情绪随之加剧了。8 月底，美国国务院内部发生了风波，结果萨姆纳·韦尔斯辞职。韦尔斯曾把他的大部分外交生涯贡献于改善美国同拉美的关系，他受到了拉美人普遍的尊敬与信任。与此同时，亨利·华莱士在 1943 年春天周游拉美期间，阐述了他的一个普通人世纪的理想，从而唤起了受压迫者的希望，因此他被解除了经济作战委员会内的职务。11 月，参议员巴特勒在周游拉美从事调查美国政府的开支时，给在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写了一份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激烈地攻击了美国政府的睦邻政策和一些有关的邻邦。巴特勒把美国政府的政策描述成为丝毫不能博得拉美国家好感的一种西半球“施舍”。他说，拉美人不信任北方的经济巨人，他们只是急想从美国国库获得尽可能多的金钱。巴特勒指责美国在拉美的计划是浪费的、低能的，是用以增强拉美工业的竞争能力，而使美国工业蒙受其害的。至于拉美国家方面，他谴责它们忘恩负义、敲诈勒索、贪污腐败以及法西斯化。他说，美国政府正在拉美鼓励着他们在别处加以讨伐的那一类独裁者。

巴特勒对于睦邻政策的攻击，不仅立即遭到了民主党的反驳，而且也遭到了他自己所属的共和党领袖们的驳斥。虽然拉美国家认为那位参议员所说的大部分是出于党派政治的需要，但是，在他相当露骨的言论中，存在着鳞半爪的实情，这是不容忽视的。再说，不管共和党领袖们怎样表示异议，拉美国家还是担心：这位参议员的话是一种迹象，表明如果共和党在 1944

年下一届大选获胜的话，睦邻政策有可能修改。拉美国家之所以深感不安，还由于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所提出的建议，认为美国应该采取步骤使它在战后能使用拉美的一些战时基地，特别是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所修建的那些基地。拉美国家经常担忧的，是他们相信美国可能想要保留它曾被允许为战时防御所建立的那些基地。在1943年3月6日美国国务院所发表的一个声明中，韦尔斯坚决否认美国政府有过任何这样的意图，但是，自这个声明发表以来的146几个月中，已发生了许多风云变幻。韦尔斯不再供职了；本半球的关系恶化了；陆军部和海军部对美国拉美政策的影响无疑正在增加。拉美国家对此的敏感可从下列这一事实中得到说明，当共同使用巴西空运基地的战后协定最后达成的时候，瓦加斯坚持这种安排必须是保密性质的。

1944年间，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发生的反叛与革命，标志着人们对当时形势的不满。继1943年12月的玻利维亚革命之后，就发生了1月在巴拉圭反对执政的独裁者莫里尼戈一次未遂的阴谋活动。莫里尼戈的统治具有暴君苛政的全部烙印，包括对新闻出版的严厉检查，似及对反对派的残酷镇压。在这种气氛下，蓄谋叛乱在巴拉圭是屡见不鲜的一个特点。

在厄瓜多尔，阿罗约·德尔里奥总统的政府于1944年5月底被前总统贝拉斯科·伊瓦拉的党徒们所推翻。厄瓜多尔民主同盟，包括所有左派政党在内，提出了贝拉斯科作为即将到来的总统竞选的候选人。贝拉斯科从1940年起即流亡在外，暂居在正在边界那边的哥伦比亚境内。从这个有利的地点，他能够同他在厄瓜多尔的支持者保持紧密联系。他除了获得了几乎所有反对现政府的政治团体的必要支持之外，还得到了军队的支持。1942年在里约热内卢同秘鲁所达成的有关解决战争的协议，由于其中某些条款对厄瓜多尔很不利，阿罗约·德尔里奥受到了责难。由于1944年5月公布了有关解决尚存争议的条款（其中包括放弃对厄瓜多尔人认为理应属于他们的领土的要求），军队和人民的愤怒情绪高涨起来了。不到一星期，阿罗约·德尔里奥即被迫解职，成立了一个由贝拉斯科·伊瓦拉担任总统的临时政府。这位自命“左”派的新总统宣布，他不想做一个独裁者，并说立宪会议的选举将在7月举行。与此同时，他还宣称他准备维持同秘鲁业经达成的边界协定。

在邻国哥伦比亚——这个国家具有一个执行民主方针的稳定政府的远为良好的记录——1944年7月，洛佩斯总统和他的随行人员在去参加军事演习的途中被叛乱分子逮捕了。由自命为总统的希尔上校为首所发起的这次叛乱，组织既差，又缺少支持，因此在首都的政府的拥戴者和大多数仍然忠于洛佩斯的军队，迅速采取了行动。7月11日，在总统被捕后的第三天就被释放了，而希尔上校则被捕了。

1944年上半年，中美洲各国因罢工和叛乱的浪潮而焦虑不安。虽然中美洲各共和国向联合国出售商品获得好处，但是，这些增加的财富老百姓并没有分到手。短缺物资分配不均，不是由于政府的无能，就是由于贪污所造成。象其他地方一样，物价上升使人们普遍的不满情绪火上加油。一些中美洲的“独裁者”之所以能够安然度过风暴，不是因为向左派让步，就是因为

参阅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航空小组委员会公布的梅里特报告（见A·P·惠特克编：《美洲国家间的事务……1943年》，第41—42页）。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2—1943年》，第361页。

达根：《美洲国家》，第181—183页。

对刚露头的叛乱采取了强硬措施加以镇压。例如，在尼加拉瓜，索摩查总统在面临人民日益反对的情况下，撤销了他修改宪法的计划，借以延长他的任期，并答应在两年内举行自由选举。他还答应实行给工人增加福利的新的劳工法规。紧接着，洪都拉斯总统卡里亚斯则采取了第二种方式，宣布军事管制，禁止一切公众集会，制止了1944年5月发生的骚动。后来的骚动都被政府的部队有效地镇压下去了。

当索摩查和卡里亚斯在遏制革命方面取得成功的时候，1944年，长期统治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独裁者被推翻了。首先倒台的是萨尔瓦多的马丁内斯将军。4月2日，一个针对他的叛乱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是，处决叛乱军官和血腥的警察镇压并不能恢复总统的权力。紧接着叛乱之后，在圣萨尔瓦多爆发了一场有社会各阶层参加的大罢工，使这个首都的生活陷于瘫痪状态。5月9日，马丁内斯被迫辞职，把权力移交给了国防部长和一个许诺举行自由选举的委员会。一个月以后，自1930年担任总统以来，一直用铁腕控制着危地马拉的拉美独裁者、资格最老的乌维科将军，被迫把他的权力让给了一个小小的军政府。在未举行选举之前，庞塞将军被任命为临时总统。

第四节 战后计划

拉丁美洲国家所关心的问题，既有它们在战后世界中作为个别国家的地位问题，又有涉及即将建立的未来世界组织的美洲国家体系的地位问题。

考虑建立区域性集团的倾向，反映了加强拉美国家地位的愿望的一个方面。创建一个在阿根廷领导下的南方集团，是阿根廷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虽然阿根廷在加强它同邻国的经济联系中取得了成功，但是它对于南方集团作为阿根廷的一个势力范围在同美国以及巴西对峙中所起作用的想法，并不特别吸引其他南方共和国。在南美洲北部存在着一些企图组织博利瓦尔或者大哥伦比亚集团的说法。1943年7月至8月，委内瑞拉总统对其他博利瓦尔共和国——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和巴拿马的访问，在某些地区被认为是企图在这些国家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可是，这样一个集团显然存在内在困难，因而重点转到了创建一个由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组成的大哥伦比亚集团。8月，哥伦比亚外交部长在向国会所作的年度报告中强调了这三个国家的共同利益。他说，这些国家注定要建立“大哥伦比亚人民的联合”。但是，这种联合的性质与其说是一种实际的计划，倒不如说仅仅是哥伦比亚的设想。年度报告也谈到“和平将带来的严重问题”，并且宣布政府已邀请七个非交战国一起商讨战后的问题，以及他们作为联合国家的联系国家的地位。1943年年底，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宣布参战，它们的邻国认为这是由于它们希望在谈判桌上取得有利的发言权才促使它们这样做的。

拉丁美洲国家在更大的范围内普遍渴望保存地区性的泛美体制，同时它们又希望看到建立起一个强大的世界组织。美洲国家间司法委员会在1942

乌维科虽已引退，但这次叛乱的煽动者对这一结局并不感到满意。那时普遍认为庞塞将军会取消他许诺过的选举，自任危地马拉总统。1944年10月又一次的叛乱，把庞塞赶下了台，由较年轻的人组成了一个三人小组。1944年11月至12月的新总统和新议会的选举结果，民主分子以压倒优势获胜，为制订“体现革命的基本原则”的新宪法作了准备。在萨尔瓦多，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更为复杂了，而民主分子则更不满意。继马丁内斯被推翻后发生了一系列的危机。最终发展到1945年年底，在危地马拉成立了一个流亡政府，同萨尔瓦多的以奥斯明·阿吉雷上校为首的军人政府相对立。

年底发表的临时报告中表明了这种观点。报告谈到了新的组织“必须这样组成，使成员资格普遍性的原则能与依据自然结合以及共同利害关系而形成的地区性集团的存在相一致。”在里约热内卢会议上，司法委员会受托制订应付战后问题 149 的计划，包括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安全组织。为了使得出的结论能在下一次的外长会议上获得通过，委员会要求美洲各国政府向委员会提出它们的观点，然后委员会再将它的建议轮流递交给各国政府。在 1943 年中，由于必要的法定人数不足五名，委员会没有举行正式会议。直到 1944 年，当会议同意四个成员国就可构成法定人数，而不需原来要求的五名时，才重新召开了正式会议。因而，在 1943 年中，美洲国家没有普遍地交换对于和平问题的看法，虽然除了阿根廷以外，其他拉丁美洲共和国都参加了联合国关于经济问题的专门机构会议。1944 年，当胜利似乎更加指日可望时，拉美国家对于它们在战后世界中地位的担忧增加了，对于美国已对西半球失去了兴趣的忧虑也加重了。赫尔自莫斯科会议结束回国后，1943 年 11 月 18 日在国会的讲话更加深了这些国家对于较小国家的地位以及美洲体系的前途的忧心忡忡。赫尔在那次讲话中说，一旦成立了在关于普遍安全的四国宣言中所规划的国际组织，就不需要势力范围，或者任何其他方面的特殊安排了，而以往各国是通过这些安排试图保障它们的安全并促进他们的利益的。赫尔在 1944 年 4 月 9 日所作的对外政策广播讲话中强调了四大国在即将成立的国际组织中将起主要的作用，这并没有减轻拉丁美洲国家的忧虑。诚然，他在同一篇讲话中也指出，国际组织的计划显然必须是为国外和美国国会以及公众所能接受的。赫尔一门心思都在取得他所需要的国会对他计划的支持上面，所以无暇顾到拉美国家的意愿和感情。5 月底，拉美国家从赫尔向报界发表的声明中获悉，赫尔在同一部分参议员会谈后，准备首先同大不列颠、苏联和中国，然后同其他国家政府继续进行有关战后安全组织问题的非正式讨论。6 月 1 日，赫尔又发表了再次保证小国参加的声明。

6 月 15 日，罗斯福发表了这份拟议的计划的简短提纲，这份提纲包括由四大强国和“适当数量的其他国家”组成安全理事会的规定。7 月 11 日，驻拉美各国的美国代表奉命通知他们所驻国家的政府，四大国正在举行会议，交换对于战后组织的意见，并且随后将尽快地同其他联合国成员以及联系国家交换意见。

但是，拉美国家所担忧的已不仅仅是那些在达成主要决议后作出保证的

在里约热内卢会议后，这个委员会接管了在巴拿马会议上成立的美洲国家中立委员会的职权。巴拿马会议者恰好是在欧洲爆发战争后召开的。在这个会议上，美洲国家的外交部长发表了保持中立的声明（《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1—1912 年》，第 327 页）。

见鲁思·马斯特斯：《美洲各国国际组织手册》（Ruth D.Master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Americas），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1945 年版，第 165 页。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1944 年》，第 14 页。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1944 年》，第 25 页以下。

美国国务院：《战后对外政策的准备工作，1939—1945 年》（Post-war Foreign Policy Preparation，1939—1945），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9 年版，第 265 页。

同上书，第 266—267 页；《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1944 年》，第 35—36 页。

《战后对外政策的准备工作，1939—1945 年》，第 325—326 页。

赫尔：《回忆录》，第 2 卷，第 1709 页。

声明，或者对进行磋商所作的那些允诺。它们要求召开一次美洲国家会议，讨论战后问题以及泛美体系同世界组织的关系。自从 1942 年 1 月召开的里约热内卢会议后一直没有召开过外长会议。在 1944 年中，墨西哥政府几次提出要召开会议的提议，但都被赫尔所拒绝。因为赫尔担心承认阿根廷法雷尔政府将会在美洲国家中导致甚至发生公开争执。

1944 年 8 月 21 日至 10 月 7 日，当四大国在敦巴顿橡树园开会时，赫尔会见了拉美各国派驻美国的代表，企图再次作出保证，大国不会忽视中小国家的权利。美国国务院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后安排的会晤，既没有消除拉美国家的担忧，也没有平息它们烦恼的情绪。其中许多国家认为会谈是以大国自居，并且是草率从事的。它们还认为美国官员隐瞒了重要的消息。 —

赫尔：《回忆录》，第 2 卷，第 1403—1404 页；韦尔斯：《我们走向何方？》，第 205 页。

赫尔：《回忆录》，第 2 卷，第 1710 页；有关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见《概览，1939—1946 年：美国、英国和俄国》（*America, Britain, and Russia*），第 501—511 页。

第五章墨西哥城会议和旧金山会议

第一节引言

1944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战争更接近尾声，拉丁美洲各国对它们这个大陆四分五裂情况的关心也与日俱增。它们在战后世界中地位的捉摸不定，使它们更加渴望恢复这个半球已遭破坏了的团结。在阿根廷和美国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阿根廷急想在战胜国的折冲樽俎中取得自己的地位。美国领导人认为，他们这一国家不应在和平谈判桌上以一个分崩离析的大陆领袖的身份出现，是必要的。睦邻政策的支持者对此感到大大不安，他们指责这是国务院的单方面政策，它正在迅速离间同拉美国家的亲善关系，而睦邻政策则意味着美国通过同它的弱小邻邦进行磋商合作来建立它在这个大陆的领导地位。

虽然阿根廷作为目前这个饥饿世界所需粮食的输出国在经济上处于相当强大的地位，但是，它生怕如果它被排斥在外而不能参加制订战后组织和重建的各种计划，那么，不但它的威望而且它的利益都将受到损失。1943—1944年间召开的各种国际会议阿根廷都被排斥交外，这就标志着它在政治上的孤立。因此，阿根廷政府于1944年10月27日发了一份照会给泛美联盟，要求召开一次外长会议，在会议上将提出承认阿根廷的问题。

阿根廷对召开会议的要求，使国务院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赫尔是不想忘记和宽恕旧嫌的。另一方面，巴西、智利、秘鲁通知美国国务院，由于在这次会议上它们可能要被迫明确表态是站在美国一边，还是站在阿根廷一边，它们不愿意参加这一会议。召开会议的要求暂时束之高阁了。这时赫尔由于身体欠佳不得已辞掉了他的国务卿职务。在他的继承人斯退丁纽斯和负责拉丁美洲关系的助理国务卿纳尔逊·A·洛克菲勒的领导下，一种较为和解的态度占了上风。经人提出召开一次“在战争努力中合作的美洲联合国家和联系国家”特别会议的一项建议，解决了邀请阿根廷参加的难题。最后，一致同意会议应于1945年1月在墨西哥城召开。还达成了默契，在这次会议上将做出某种安排，俾使这匹害群之马能重新回到它的大集体中来。事实上会议前夕，美国已派了一个代表团赴布宜诺斯艾利斯，同庇隆和其他阿根廷首脑进行了秘密磋商，并且应承，只要阿根廷同意在行将召开的会议上的提案，美国就收回它不承认阿根廷的主张，并取消已经强加给它的限制性经济措施。

第二节美洲国家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会议

(1945年2月21日—3月8日)

1945年2月21日墨西哥城会议议程计有：

1. 继续进行俄争的进一步合作措施；
2. 国际组织：
 - (1) 世界组织；

达根：《美洲国家》，第105—106页。

部分原文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1945年》，第700页以下。完整资料见泛美联盟：《美洲国家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会议，墨西哥城1945年2月21日至3月8日：理事长递交泛美联盟理事会的报告》（Inter-American Conference on Problems of War and Peace Mexico City, February 21—March 8, 1945: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Governing Board of the Pan American Union by the Director-General），国会与会议丛书第47辑（华盛顿，泛美联盟，1945年版）。

(2) 美洲国家间体系及其与世界组织的合作，

3. 拉丁美洲经济和社会问题；

4. 考虑阿根廷关于讨论它同其他美洲共和国的关系问题的请求。出席这次会议的拉美共和国代表都渴望得到一些保证，使它们不但在遭到外来的侵略时，而且在这大陆内部之间发生侵略行径时也能获得美国的援助。毫无疑问，对这问题的担心主要是害怕阿根廷的侵略。这个被宣告为不合法的政府已一再讲到了重整军备的重要性，庇隆也表示过：如果需要的话，他准备诉诸武力来贯彻他的政策。此外还有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说法，主张重新统一原先属于拉普拉特总督管辖的各地区。但是美洲大陆上其他部分的国家也有所担忧，它们唯恐军备的增加将导致一些拉美国家政府试图去清算老帐和满足领土上的野心，这种军备的增加是由于作为这个半球防卫政策一部分的租借法案的援助所造成的。巴西、乌拉圭、哥伦比亚三国根据在哈瓦那会议上达成的协议，提出了几项决议：扩大互相援助的承诺，使之适用于一个拉美国家侵略另一个拉美国家的情况，这项决议的精神最终体现在查普尔特佩克决议中。侵略行为的定义概括言之就是对一个美洲国家领土的完整或不可侵犯性，或对其主权或政治独立的任何侵犯；而更具体地讲来就是：“凡一国的武装部队越过根据条约建立和划分的边界线非法侵入另一国家的领土就是侵略。”缔约国同意开会就处罚措施包括经济制裁和使用武力问题进行磋商。条约中对于处罚 153 措施的协议将只在战争期间适用，因为交这期间美国总统和其他美洲国家政府首脑将根据赋予的应付紧急情况的权力行事。但是会议同意美洲各国政府考虑签订一项战后条约，使这些战时义务永久化。大会还同意把应付紧急情况的美洲国家间防务理事会改为常设机构。

会议通过的其他决议是旨在通过机构的改组及协作来加强美洲国家体系。决议包括赋予泛美联盟理事会以政治权力。在以往的会议上，由于拉美国家害怕美国控制这个理事会，所以它们都反对这种主张。在墨西哥城会议上才达成了协议，今后拉美各国政府得专门委派代表参加理事会，而不是象以前那样由驻华盛顿的外交使节兼代表，主席一职应由各国轮流担任（过去一向是由美国国务卿担任此职）。会议进一步商定美洲国家间的国际会议每四年举行一次，各国外长将在全体会议休会期间每年碰头一次。泛美联盟理事会的任务是负责为下届 1946 年在波哥大召开的美洲国际会议准备制订改组泛美体系的宪章。

在经济领域方面讨论的问题既多又复杂。出席会议的拉美各国政府代表特别渴望重新得到美国在两个主要方面的保证。最关键的问题是继续保证它们的原料市场，这些原料的生产，特别是矿产和橡胶的生产，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已有所扩大。它们担心欧洲和远东出产的较廉价的货源一旦重新有供应时，对拉丁美洲原料的需求就会减少。它们也渴望获得一些保证，俾使它们能够得到资本货物、工具、机器和设备等方面必需的供应，以发展它们在

见上文，原著第 139 页。

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和玻利维亚。

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1945 年》，第 717 页以下。

会议后来推迟到 1948 年 3 月在波哥大召开。见《概览，1947—1948 年》，第 473—476 页。

见奥利夫·霍姆斯：“拉丁美洲能建立一种新经济吗？”（Olive Holmes：“Can Latin America build a New Economy？”），《外交政策报告》，1945 年 4 月 1 日。

战争年代建立起来的或扩展了的工业。

美国助理国务卿威廉·L·克莱顿许诺说，他的政府将 154 通过执行一项逐步削减对于战略物资采购的政策，以及尽可能提早通知采购物资合同的终止期，尽力为拉美国国家减轻过渡时期的困难。虽然人们预期不久将在欧洲战场取胜，但普遍认为要打败日本则需要较长的时间。克莱顿说，在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前，还不大可能大量削减战争物资的采购合同，他希望美国国会到时候会批准一个战后储存战略和紧张物资的法案。他承认，在供应拉美国国家发展经济所需要的资本货物方面可能存在困难，但是他答应，只要现行的管制办法继续有效，美国就一定会使他们得到应得的份额。会议通过了几项建议和一个为了促进下列三个目标而制定的美洲经济宪章：1. 继续动员美洲的经济资源直至全面胜利；2. 使美洲的经济生命有条不紊地从战争状况过渡到和平状况；以及 3. 使美洲共和国的战后经济得到发展。

经济宪章的原则宣言只表达了一系列的愿望而不是一个纲领，而将原则变为实际行动的措施还有待于通过。此外，在宪章通过之前的讨论期间，显然拉美各共和国决没有全部同意美国代表提出的关于促进战后世界经济福利所需的所有条件。例如：它们不相信北美代表提倡的自由贸易与自由经营原则会对它们有益。它们所切望的是依靠特惠关税和其他特殊安排来保护它们年轻的工业不受到大工业国的竞争。许多拉美国国家政府相信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管理的经济对它们说来将是必要的。

会议一致同意，美洲国家政府应准备有关它们的经济、金融、货币方面的资料以供提交给预定 6 月份在华盛顿召开的美洲国家间技术经济会议。另经商定，战时的美洲国家间金融和经济咨询委员会应代之以常设的美洲国家间经济和社会理事会。

拉丁美洲代表们也急想讨论成立世界性组织的计划以及这半球安全体系同将在旧金山会议上成立的世界安全体系之间的关系问题。

拉美国国家对接受在敦巴顿橡树园起草的世界组织大 155 纲没有什么多大热情。它们觉得世界组织并没有给小国提供它们想要而且应有的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地位。在墨西哥城会议上拉美国国家提出的建议与批评都整理汇编成六十页的文件。这些建议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增加大会的权力和确保在安全理事会中享有较多的代表权来加强小国在与三个大国的关系中的地位。拉美国国家提议在安全理事会中它们应分配到三个非常任理事的位置，而其中之一应享有常任理事席位。它们也表示宁愿通过拉丁美洲体系来解决地区性问题，而不需将它们提交世界组织。但是美国政府代表团不愿延长讨论，因为这样一来可能使美国政府要承担一些义务，从而限制他们在旧金山会议上的行动自由。再则，代表团成员本身之间在这半球体系与世界组织关系的问题上也存在着分歧。有一些象阿道夫·伯利这样的人不相信世界组织应有权力

克莱顿讲话原文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1945 年》，第 702 页以下。

同上书，第 737 页以下。

A.P.惠特克编：《美洲国家间的事务……1945 年》，第 111 页以下。

见奥利夫·霍姆斯：“墨西哥城会议和区域安全”（“The Mexico City Conference and Regional Security”），《外交政策报告》，1945 年 5 月 1 日。

巴西希望获得一个常任席位。事实上赫尔在敦巴顿橡树园提出过这个建议，但遭到苏联和英国的反对（赫尔；《回忆录》，第 2 卷，第 1678 页）。

不让美洲国家安全体系对西半球的一个侵略者采取行动。对立派的成员包括勒奥·帕斯沃尔斯基则相信一切权力都应赋予世界组织。他在拟订国务院的关于世界安全体系的计划时曾起了主要的作用。在墨西哥城会议上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在三个月后的旧金山会议上它便成了主要的障碍来源。

虽然承认法雷尔的阿根廷政府是最后讨论的问题，但它在大多数拉丁美洲代表的心目中或许是最为重要的问题。最终一致通过的协议是以一项决议的形式出现的，这项决议表示希望阿根廷将能证明它具有在联合国内占有席位的资格；并声明一旦它履行义务，就欢迎它在墨西哥城会议最后通过的决议上签字。3月27日阿根廷政府向德、日两国宣战，并接受邀请，同意遵守在墨西哥城达成的各项决议，其中包括查普尔特佩克决议。他们也答应实施遏制轴心国活动所需的各项措施。美国和其他美洲国家政府于4月9日承认了法雷尔政府。

显然，斯退丁纽斯答应了阿根廷代表美国政府将运用它的影响，使阿根廷得以进入联合国，这样它就能到一定时候在世界组织内占一席位。这时其他的拉美国家都已是联合国成员，并且都以此身份被邀请参加3月5日的旧金山会议。这个世界组织的创始成员国问题早已成为最高级谈判中的一个十分激烈的讨价还价的课题。这个问题最初是在1944年敦巴顿橡树园会谈时提出的。美国希望它包括战时的联合国家和八个没有宣战但曾帮助过盟国的战争努力的联系国家。这八个国家是：

冰岛、埃及和六个拉丁美洲国家。苏联则反对接纳除了那些已经宣战并在联合国宣言上签了字的以外的任何国家，并要求它的十六个加盟共和国都分别享有代表权。

美国政府处境尴尬，因为它起先曾劝阻一些拉美国家不要宣战。而罗斯福在1945年1月前往参加雅尔塔会议之前，却写信给六个拉丁美洲共和国建议说，宣战对它们将是可取的。由于这些接到通知的政府不知道美国政府所以突然改变态度的实际原因，它们感到恼火是可以理解的。

敦巴顿橡树园会谈结束时没有得到解决的创始成员国问题，在雅尔塔会议上由三个大国再次提了出来。虽然斯大林对于小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发表了一些极为尖刻的观点，但是罗斯福顺利地征得了斯大林的同意，所有在1945年3月1日前宣战的联系国家都应被邀请参加6月份的旧金山会议，由其制订战后安全机构的宪章。

斯大林认为小国只能列席而不能有发言权，这一点特别适用于拉丁美洲各共和国。他想要剥夺它们的投票权，这是因为他把它们只看作是按照美国的愿望而进行投票的卫星国。此外个别他讲起来，苏联的这位统治者对大多数的共和国都是没有好感的。一般来说，这些政府都具有一种强烈反苏

见詹姆斯·B·赖斯顿：“批评家成了演员”，《外交》季刊（James B. Reston：“The Critic Turns Actor”，*Foreign Affairs*），1945年10月，第24卷，第55期。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1945年》，第752页以下。

韦尔斯：《我们走向何方？》，第207页。

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506页，第509页，第552—555页，第577页。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678—1679页。

小爱德华·R·斯退丁纽斯：《罗斯福与俄国人》（*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伦敦，凯普，1950年版，第179—180页。

反共的偏见。大多数国家甚至还未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虽然在 1942 年 10 月到 1944 年底之间它们中的七个国家先后承认了苏联政府而且同意互派代表。斯大林后来作出了让步，答应邀请在 3 月 1 日以前宣战的联系国家，但其中当然不包括阿根廷在内。当被问及它的地位时，罗斯福回答说：阿根廷当然不属于正在讨论的是否有资格接受邀请参加旧金山会议的国家之列。阿根廷既不是战时的联合国成员，也不是曾经帮助盟国取胜的联系国家。再早在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发表意见说，阿根廷不与盟国合作应受到惩罚，他并补充说，如果它是在苏联范围之内，那他早就要这样做了。

至于英美方面，罗斯福和丘吉尔一致同意，当苏联在下次会议上提出关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分别享有联合国席位的要求时给予支持。

所有的拉丁美洲共和国直到墨西哥城会议结束以后方才得知有关联合国将接纳两个苏联加盟共和国为成员国的协议。罗斯福总统始终坚持这项协议应予以高度保密，直到 1945 年 3 月 28 日经报纸泄露后，他才被迫在 3 月 29 日与 4 月 3 日公开宣布这一协议。这一问题的揭晓和其揭晓的方式增加了拉美国家的忐忑不安。据萨姆纳·韦尔斯说，它们同意只有在阿根廷同时被接纳的条件下，才肯支持美国所作出的承诺。

第三节旧金山会议

（1945 年 4 月 25 日——6 月 26 日）

当苏联坚持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应被邀参加这次会议时，纠纷进一步发生了。主要拉美国家巴西、智利和墨西哥的外交部长虽表示了同意，但条件也是要邀请阿根廷参加。这时，莫洛托夫却又反驳，提出也应邀请苏联扶植的波兰政府参加的要求。拉丁美洲各国政府勉强地同意 158 投票表决是否让苏联的两个共和国参加，但是莫洛托夫仍然坚持拒绝支持阿根廷，除非也把卢布林政府包括在内。虽然美国政府根据他们对拉美代表所许下的诺言，为阿根廷争取到参加权，但是莫洛托夫对阿根廷的责难还是博得了绝大部分美国及盟国公众舆论的同情。他们感到愤慨的是，美国政府方面在他们看来十分没有必要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美国报界对阿根廷的猛烈抨击，使两国间已经存在的恶感更加深了。

会议一开始情况就不妙。苏联毫不妥协的做法以及莫洛托夫对拉美代表的态度，使得拉美代表更坚定了他们的决心，不仅要为小国的权力而斗争，而且不无自相矛盾的是还要为区域体系更大的自治权而斗争。在一个强大的区域体系下，他们无疑要蒙受美国统治的危险，但是他们准备面对这种危险，要是这样做能使他们避免欧洲（即苏联）干涉他们的事务的话。

古巴、墨西哥、乌拉圭、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智利和尼加拉瓜。

斯退丁纽斯：《罗斯福与俄国人》，第 108 页，第 180 页。

同上书，原著第 161—163 页，第 170 页，第 177—178 页，第 188 页。

斯退丁纽斯：《罗斯福与俄国人》，第 248 页以下。很明显，罗斯福极想尽可能久地对此项协议保密，因为他害怕国会和美国公众会作出反应。宣布此项协议的原文见《对外关系文件，1944—1945 年》，第 361—341 页。

韦尔斯：《我们走向何方？》，第 211 页。

有关旧金山会议的详细介绍，见《概览，1939—1946 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 591—606 页。

韦尔斯：《我们走向何方？》，第 211—212 页。

因此，按照以往历史来看，多少带有讽刺意味的是，拉美代表为了保持一个美洲安全体系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甚至还乞灵于门罗主义来支持他们的立场，而美国代表为了同苏联和英国达成协议，则一时似乎准备放弃它的立场。但是，拉丁美洲的立场得到两个美国代表——参议员康纳利和范登堡——的大力支持。终于达成了一项妥协方案，根据这一方案，区域体系有权在遇到紧急情况时立即采取全面行动，虽然最终仍要由联合国组织作出裁决。

例如，在成立国际联盟时，拉丁美洲国家就表示了这种意见，认为国联对于任何有关地区性的安排问题应拥有最高权力。当时拉丁美洲的态度是出自担心美国对门罗主义所作的解释。

威尔斯：前引书，第 214 页；达根：《美洲国家》，第 119 页以下。

第六章大战的结束及其后果（1945—1946年）

第一节 阿根廷

（一）庇隆对布雷登

在墨西哥城会议和旧金山会议上，美国 and 阿根廷两国政府双方都心照不宣地一致同意保留两国的分歧，俾使西半球在战后世界的组织中能以一个统一的战线出现。可是，两国政府的基本目标依然如故，因此，它们截然不同的观点不久就引起了后来的麻烦。阿根廷政府无意调整它自己的事务去迎合美国的要求，因为它已经获得了其所想望的东西：得到其他美洲国家的承认，并加入了联合国组织。至于美国，它正全神贯注于远东战争、欧洲的政治问题以及与苏联政府日趋恶化的关系，因而无暇顾及西半球事务。紧接着旧金山会议之后，前参议员詹姆斯·F·贝尔纳斯继斯退丁纽斯出任国务卿。由于贝尔纳斯卷入了世界风云之中，所以没有时间分心在同拉丁美洲的关系上。事实上他在这方面既没有丰富的经验也没有渊博的知识。1945年8月美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斯普鲁伊尔·布雷登被任命为助理国务卿，负责处理同拉丁美洲的关系。他在1945年5月被派往布宜诺斯艾利斯供职。在阿根廷供职期间，他以热情见称，但谨慎不足。他毫不掩饰他对阿根廷军事独裁的厌恶情绪，和希望看到它被推翻的愿望。

布雷登在1945年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时，庇隆在阿根廷各上校集团之间权力的角逐中已明显地赢得了优势。他担任了副总统，兼国防部长和劳工部长的职务。作为劳工福利部长，庇隆成功地赢得了大部分工人阶级的支持。军事独裁以前时期的旧工会和工会头目已经被效忠于庇隆的新劳工工团代替。庇隆对工人阶级作了一些让步，提高了他们的工资并颁布了有关社会救济金法令。

1945年2月9日，法雷尔总统发表声明，宣称阿根廷目前已到了选举前的组织阶段，它将最终引导国家回到“宪法常态”。5月18日内务部长宣布政府将废止取缔政治活动的法令，颁布新的政党法，并设立一个选举法庭。

5月底公布了组织政党的新条例。

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与国会选举促使法雷尔—庇隆政权的反对派更加积极行动起来，虽然他们的活动受到防止有组织的反抗的戒严措施所阻挠。这时那些反对政 160 府限定价格政策的大实业家和大商人以及大部分大地主和畜牧主也纷纷加入了自由党和反对党左翼分子的队伍，扩大了他们的阵营。

7月6日当法雷尔总统宣布年底以前要召开选举大会的时候，选举的形势更为明朗了。因为阿根廷的大选通常在召开大会后九十天举行，所以大选大致在1946年3月举行。法雷尔说，“将没有官方支持的总统候选人。”就在法雷尔宣布后的六天内，劳工群众大会在首都发动了庇隆的竞选运动。7月24日激进党的分裂派公开举行示威游行，邀请庇隆作他们一派的候选人。

尽管庇隆没有公开承认自己准备接受总统提名，而且的确他也认为由他自己于4月份宣布无意接受总统提名是较策略的，但是几乎没有人怀疑庇隆会接

《纽约时报》，1945年2月11日。

《纽约先驱论坛报》，1945年5月19日。

《纽约时报》，1945年7月11日。

《纽约先驱论坛报》，1945年7月13日。

同上，1945年7月26日。

受他长期梦寐以求的总统提名。

反对党得到美国大使布雷登的全力支持。他把恢复民主制度，推翻军事独裁视为自己使命的主要目标。他不甘心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来实现这个目标。在公开的演讲中，这位大使抨击阿根廷政府奉行独裁主义的法西斯政策，以友未能兑现自己的诺言，采取行动以打击受轴心国控制的商行。布雷登在启程赴华盛顿就任代理国务卿之前的一次接见采访者时表示，他将不会改变对阿根廷的政策，相反，新的职位却将给他提供贯彻这项政策的更大的可能性。布雷登说，两国的正式关系将视未来事态的发展而决定，言外之意要看选举的结果如何。

8月6日戒严状态解除后，相互对立的各派之间就开始了激烈的冲突。9月26日政府利用罗森将军策动的未遂政变再次实行了戒严，并逮捕和监禁了大批政府的对立派。

10月9日，内务部长宣布庇隆已经辞去所有的政府职务，这个消息震惊了全国。事实上是一批陆军军官逼迫庇隆辞职的，否则他们就要向首都武装进军。虽然庇隆被迫接受军官们的最后通牒，但他并没有失去信心。他在一次告别演说中宣称，他将不辞劳苦地为人民服务。他谴责布雷登干涉了阿根廷内政并“煽动了叛乱”。庇隆还说，在辞去劳工部长之前，他已经签署了一项法令，提高所有阿根廷工人的工资，并让他们分享利润。12日庇隆被捕，由法雷尔总统组成临时政府。

五天之后，庇隆胜利而归。搞政变的海军、陆军以及文官中的煽动者和支持者对组织新政府未能取得意见一致，而法雷尔则仍然忠于庇隆。庇隆主义的劳工团体组织了广泛的示威和罢工，大声疾呼要求庇隆归来，结果发生了骚乱。10月17日法雷尔向参加集会的群众宣布，临时内阁将由一个由庇隆的支持者组成的新内阁代替。当庇隆在玫瑰宫阳台上站在总统的身旁时，他受到了人群狂热的欢呼。10月22日政府答应在武装部队保护的各投票站进行光明正大的自由选举。31日颁布了允许各政党恢复活动的法令。

各旧政党以民主联盟的名义组成了一个广泛的联合阵线反对庇隆，他们选激进派政客坦博里尼为总统候选人。一个新工党成立了，它则为争取庇隆当选而开展活动。庇隆的纲领包括一项改革农业、工业和社会的五年计划。在答应要改革的项目中，包括把土地归还给工人，改善劳动条件以及为阿根廷在工业上自给自足制定的各项计划。

庇隆的主要支持者来自穷苦阶级，他们自称为无衫汉，但其中也包括民族主义分子。庇隆还自称得到罗马天主教主教团的支持，因为在11月16日给教区教友的一封信中主教命令罗马天主教徒不要投那些鼓吹宗教与教育分离、国家与教会分离以及合法离婚的候选人的票。人所周知，民主联盟中的

《纽约先驱论坛报》，1945年8月27日。

同上，1945年8月17日。

《纽约时报》，1945年9月27日。

《纽约先驱论坛报》、《纽约时报》，1945年10月11日。

《泰晤士报》，1945年10月18日。

《纽约时报》，1945年10月23日。

《泰晤士报》，1945年11月1日。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45年11月27日。

大部分政党是反对在学校里实行义务宗教教育的，而这一制度在军政府 1943 年掌权后就已经颁布法令实行了。

整个大陆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这场选举。尽管精神抖擞，生气勃勃而富有魅力的庇隆与才貌平庸的坦博里尼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但民主联盟仍然相信他们会获胜，如果选举是公正举行的话。虽然仍旧保持戒严状态，但报章杂志却获准几乎可以完全自由地发表意见和提出批评，所有的政党均准予举行集会。可是许多民主党派的集会却被庇隆派的武装人员所驱散，而亲庇隆的警察部队则袖手旁观，不作公正的处置。

与此同时，身为华盛顿代理国务卿的布雷登，为了忠于自己的诺言，继续攻击庇隆是西半球和平与团结的威胁。同时他还试图争取其他美洲政府的支持。选举原定在 1946 年 2 月 24 日举行，在举行前二星期左右的时候，布雷登断定这已到了采取更直接行动的时刻。2 月 11 日，一份通常称作蓝皮书的备忘录递交给了其他美洲国家的代表。十二小时后，这份备忘录就公布于世了。蓝皮书的内容是根据轴心国在阿根廷活动的情况汇报，包括盟国占领德国后发现的情报。阿根廷政府被控在大战期间曾给德国以援助，并在自己的国家里给纳粹团体继续提供庇护。庇隆被点名为主要通敌者之一。

在大部分选举活动期间，庇隆一直主要强调，他在反对贪婪的地主和资本主义寡头政治的运动中作为贫穷受压迫者的一名战士所起的作用。他慷慨地向工人们许下了诺言，并发布了法令，立即给工人们切实的好处。布雷登的公开干涉反而给庇隆提供了新鲜的武器，使他成为拥护阿根廷自由和独立以摆脱美国佬蓄谋控制的人。庇隆声称，阿根廷的选民们必须在 2 月 24 日投票，要未选布雷登，要未选庇隆。

同过去标志竞选运动时的恫吓和派系斗争的情况形成对照，那天的投票却是平静而井井有条，完全实现了武装部队将能保证选举公正举行的许诺。统计票数的工作花了六个星期，但到 3 月中旬已很清楚，庇隆的胜利已成定局，除非在尚未计票的几个选区内形势突然转向。最后的选举结果表明：庇隆已经赢得了绝大多数选票。他的党在十四个省政府中获胜了十三个，在国会里也取得了胜利。庇隆支持者之所以赢得胜利，实得力于反对党派内部的分裂，而它们的党派休战只限于选出一名共同的总统候选人而已。

（二）阿根廷选举在美洲大陆产生的反响

庇隆的胜利使美国政府中的拉丁美洲政策制订者陷于进退维谷的处境。布雷登和国务院曾寄希望于庇隆为 163 民主派人士所击败。他们可能在理论上采取三条政策中的一条：（1）承认新政府和同阿根廷建立正常关系；（2）不承认和公开反对；或（3）承认，但保持疏远和不友好的关系。他们不准备考虑第一条政策。第二条是排除在外的，除非美国准备单独行事。不论英国政府还是主要的拉丁美洲政府都不想要孤立阿根廷。

《纽约先驱论坛报》，1945 年 11 月 19 日。

例如，见 1 月 19 日的讲话（《纽约时报》，1946 年 1 月 20 日）。

见下文，原着第 164—165 页。

见美国国务院：《美洲共和国间关于阿根廷形势的会商》（Consul-tation among the American Republics With respect to the Argentine Situation），出版物编号 2473（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6 年版）。

《泰晤士报》，1946 年 2 月 14 日。

据《纽约先驱论坛报》驻布宜诺斯艾利斯记者约瑟夫·纽曼的报道，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拒绝

拉丁美洲国家不安地看到，曾经一度在墨西哥城和旧金山弥合了的美国 and 阿根廷之间的争执又死灰复燃了。虽然多数的美洲政府并不比美国政府对法雷尔—庇隆政权更有好感，但公开与之决裂是不符合它们的利益的。况且，美国的高压行径更引起了它们早先对北美的干涉和霸权的担忧。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愈加坚持它们早先的防卫手段，即不干涉和步调一致的原则。看来似乎越来越清楚了，美国是准备抛弃这两项原则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制订者公开地宣称，在外交事务上不干涉的政策，并不意味着赞同当地的暴政，并且呼吁拉丁美洲国家联合起来同法西斯政府进行斗争。

拉丁美洲政府对于对不干涉原则的任何修改的态度，在它们对乌拉圭于1945年10月提出的建议的反应中清楚地显示出来了。乌拉圭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拉雷塔，在一封致其他美洲共和国的照会中提议，采取集体行动以对付侵犯了包含基本人权在内的民主原则的政府。虽然，这提议当然并未提及阿根廷，但显而易见，法雷尔—庇隆的军事独裁是属于这种性质的政府。实际上还有其他几个拉丁美洲政府也是如此。

贝尔纳斯立即宣布美国政府“无条件地赞同”乌拉圭的提议。相反，大多数的拉丁美洲国家不是在外交上不作肯定表态，就是反对这个提议。它们不准备接受对它们内部事务的干涉，不论这种干涉是单方面的或是多方面的。

此外，它们害怕虽然干涉表面上可能是多方面的，但美国可能利用它的军事上和经济上的优势，对一些弱小国家施加压力，以提供它所需要的支持其进行干涉的多数票。这些国家的疑虑由于国务院官员的声明而更加深了，声明指出，要在美洲国家间的协议中取得完全一致是一种做不到的想法，决议只应该由真正的多数表决通过。

当时在讨论中最重要的一项美洲国家间的协定是取代查普尔特佩克决议的西半球防务条约。经一致同意美洲各政府应于1945年10月底在里约热内卢集会讨论这个条约。在会议预定召开日期前不久，美国国务院通知东道国巴西政府说，国务院希望推迟会期，因为美国政府不想与阿根廷现政权商谈防御条约。其他拉丁美洲政府在作出这项决定后才被告知，因此对事先没有和它们商量就采取这一重大步骤感到不满和不安。虽然，美洲政府间关于缔结条约的谈判继续下去了，但如果包括阿根廷政府在内，美国政府就不打算商订条约，因此是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的，而主要的拉美国家则反对把阿根廷排除在任何谈判之外。

布雷登不仅未能说服大多数拉美政府支持美国对阿根廷政府采取一项坚定政策是符合它们的利益的，而且他的强硬政策还遭到了美国国内一部分人士的反对。他的敌手包括睦邻政策的支持者和不干涉主义者，害怕英国在阿

了贝尔纳斯发表一份作为共同文件的蓝皮书的商请，除非美国能保证英国的肉类供应(《纽约先驱论坛报》，1946年3月27日)。

例如，见1945年10月31日贝尔纳斯的致词：《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1946年》，第763—765页。达根：《美洲国家》，第203—205页。

例如：见1945年12月20日美国国务院美洲共和国事务办公室主任的讲话：《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1946年》，第765—768页。

韦尔斯：《我们走向何方？》，第224—225页。

韦尔斯是不干涉主义者的主要代言人。

根廷竞争的商业界以及日益增多的持这种观点的一批人，即认为来自西半球纳粹的危险比起共产主义的威胁来，是无足轻重的。他们切望所有美洲国家联合起来抵制这种新的危险。

在这种处境下，布雷登见风转舵了。1946年3月27日，他说，与布宜诺斯艾利斯新政府的外交关系将予以保持，但他重申美国政府不准备签订任何将包括阿根廷在内的西半球军事协议。显然他仍旧希望同其他美洲国家或它们中的大多数国家达成一项协议而把阿根廷排除于外，但已愈来愈明显，任何这样的希望注定是要落空的。美国政府关于蓝皮书中所揭露的问题采取相应行动一事，165曾向巴西和其他主要南美国家发出函件，到4月初才迟迟收到它们的答复。大体上他们同意巴西的观点，这一观点发表在4月4日的一份备忘录中。巴西外交部长实际上说，大战已结束，阿根廷新政府已经过自由选举产生，巴西政府极想签订一项互助条约，但认为，这样一项条约除非包括阿根廷在内的所有美洲国家都参加签署，将是一纸空文。由于拉丁美洲的答复以及美洲各国间进一步协商的结果，美国国务院更改了它的立场，发表了一项声明，指出美国政府准备考虑让阿根廷参加防务条约，倘若阿根廷政府在肃清轴心国影响方面履行其义务的话。整个1946年，斗争一直在继续着。布雷登在几条战线上进行了一场英勇但不能取胜的战斗。布雷登在国内的最强大的敌手是新任美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乔治·梅塞史密斯和陆军部。美国军事计划制订者都渴望在制订西半球防御计划方面与拉丁美洲政府达成一项协议。他们的防御计划包括所有美洲共和国的训练、组织以及装备的标准化。1945年10月美洲国家间防务委员会提出了一份调整军事力量的报告，1946年5月杜鲁门提交国会一项美洲国家军事合作法案，这个法案体现了防务委员会的许多建议。这个议案如果通过的话，将能通过以美国的现代军备交换拉丁美洲现有不标准的装备而使装备达到标准化。陆军部担心如果不允许阿根廷政府从美国得到武器，则他们将从英国或俄国得到。6月份，前阿根廷陆军参谋长范德贝克将军为争取得到军需用品访问了华盛顿。代理国务卿告知阿根廷使者，在阿根廷履行它肃清轴心国影响的义务以前，美国政府不准备出卖武器给他的政府。

在夏季的几个月中阿根廷做出了几个和解姿态。8月，查普尔特佩克决议和联合国宪章都在阿根廷国会两院被批准了。同月，据报道，庇隆已告诉众议院，在另一166场战争中人们将会看到阿根廷同美国结盟。遗留下来的德国学校被关闭了，并对在蓝皮书中提到的几个德国人采取了行动。但是，政府未能将几名被指控的较著名人物加以驱逐，其中包括庇隆的亲密私友路德维希·弗洛伊德。他经阿根廷联邦法院宣布免除其被控的共谋罪。

6月，阿根廷在美国的冻结资金被解冻了。然而，到年底，华盛顿政府内部关于把阿根廷也包括在西半球军事条约之内并向庇隆提供武器是否明智问题的争论仍未决定，而为拟订防御条约的里约热内卢会议则已一再延期召

《纽约时报》，1946年3月28日。

《纽约时报》，1946年4月5日、7日、8日、9日；《泰晤士报》，1946年4月9日。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1946年》，第775—777页。

《纽约时报》，1946年8月31日。

同上，1946年12月24日。

开了。

（三）英阿会谈

发现庇隆总统在谈判中是一个极难对付的人物的，不仅仅是美国政府。如我们所知道的，阿根廷在美洲之所以能实行一种独立政策，多半是由于它同英国有着密切的财政和经济关系。庇隆按照自己的经济自给自足的民族主义政策，极想减轻自己国家对英国的依赖。1946年6月至7月，英国代表团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商讨有关财政和经济问题，包括续订1936年的商业条约，但他们发现谈判非常难于进行。

谈判的要点是：关于战争期间阿根廷在英国所积累的大量冻结英镑的余额问题，英国在阿根廷拥有的铁路的前途问题，肉类供应和续订英阿商业条约问题。英国渴望在这些问题上获得一个全面的解决。但是，阿根廷政府由于英国需要它的牛肉而处于优越地位，因而在它们被冻结的英镑余额问题没有得到满意解决之前，不准备在其他几个问题上签订协议。

最后，在英国就冻结英镑和提高肉类价格的问题作了让步之后，才在9月17日达成了一项协议。这项协议解决了阿根廷英镑余额、肉类购买合同和英国在阿拥有的铁路问题。双方进一步同意应立刻开始讨论，为签订一项新的贸易条约作准备，以及在这些讨论尚未得出结论之前，旧条约中各项条款的有效期应延长至该年年底。

第二节 拉丁美洲的政治趋势

在巴西，1945年这一年标志着已统治该国十五年的热图利奥·瓦加斯威信的部分衰落。自从1937年解散国会和建立新政府以来，瓦加斯实行了完全的独裁。当时通过的宪法中的主要条款，从来就没有付诸实施。但是，瓦加斯的独裁大体上说来还是宽容的，大多数巴西人起先还愿意接受对他们行动自由的种种限制，作为恢复法治的必要代价。在战争年代里，他们再次忍受了瓦加斯权力的扩张，认为有必要这样以确保国家的安全。

随着战争接近尾声，不满情绪日益滋长。瓦加斯在维护他的独裁统治的同时，想以许诺战后在和平安定的适当环境下举行大选的办法来制止批评。虽然瓦加斯认识到在巴西恢复较为民主做法的需要，但是，他所想象的民主形式，并不是西方民主国家所实行的放任自由的十九世纪式的民主，而这种曾包含在1891年巴西宪法上的民主结果只造成了这个国家的政治腐败和一片混乱。

1937年的宪法是遵循独裁主义和民族主义路线的。它所规定的条款使政府有权管理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瓦加斯认为，没有经济民主，政治民主是不可能的。他很想为他的国家取得更多的经济独立：并且认为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由国家来计划和指导国民经济，而且，必须对外国资本和企业实行严格控制。在战争年代里，瓦加斯意识到在军事和经济领域里同美国紧密

里约热内卢会议最后于1947年1月召开了。有关1947年至1948年美洲国家间关系的论述，见《概览，1947—1948年》，第467—476页。

《泰晤士报》，6月24日、7月19日、9月14日、18日；《金融时报》，7月3日、20日、8月20日、29日；《纽约时报》，1946年9月18日。有关协议文本见英国外交部：《联合王国同阿根廷政府之间的经济协定，布宜诺斯艾利斯，1946年9月17日》（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Economic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Argentine Government, Buenos Aires, 17 September 1946），敕令第6953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6年）。

合作的必要。这种合作必然意味着允许美国在指导巴西内部事务方面有相当的决定权。巴西人尽管切望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但现在感到，由巴西重新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刻已到来了。随着和平在望，他们很想重新控制他们的空军 168 基地并送走北美的“占领军”。他们相信巴西增高的威望和地位，使它足有资格在处理大陆事务中起主导作用。尤其是在对阿根廷的政策中，他们并不打算接受美国的指示，因为他们确信，同他们南面的邻邦恢复良好关系是很必要的。在这些情况下，1944 年夏天，瓦加斯决定撤掉他的外交部长奥斯瓦尔多·阿拉纳的职务。因为阿拉纳是一位主张同美国密切合作的强烈鼓吹者，并且被许多巴西人看作是一个受北美影响太深的人物。无疑，在瓦加斯看来，阿拉纳有可能成为他的政治对手这一事实也有一定的影响。阿拉纳是平民党的领导人，他相信在巴西应当恢复自由民主，并反对瓦加斯的政治观点。1944 年底瓦加斯判定，实现他诺言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在除夕的一篇演说中，他宣布了举行大选的意图；1945 年 2 月 22 日，放宽了新闻检查；3 月，解除了 1937 年实施的关于政党的禁令。另外还对自由做了许多让步，包括释放共产党领袖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在内的被监禁的政治犯。5 月 28 日，颁布了新的选举法，并且定于 1945 年 12 月 2 日举行总统和国会选举。被选出的国民议会将负责起草一部新的宪法或者修改 1937 年的宪法。

联合起来的各反对党组成了一个全国民主联盟。推举戈麦斯将军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戈麦斯的支持者网罗了各色人等、包括大多数报界人物、自由主义者、知识分子和瓦加斯政权前的幸存者。戈麦斯还得到了希望在经济上保持殖民地式经济的咖啡种植者的支持。在这种经济下，巴西人可用主要出口作物换取进口产品，因此这些人能从戈麦斯的低税政策中得到好处。另一位竞争的候选人杜特拉将军则主张高税政策和继续瓦加斯的鼓励民族工业的政策。这两位候选人都具有保守的思想，并且都主张加强巴西的军事力量。

瓦加斯声明不竞选总统，并希望他的支持者投杜特拉的票。然而他仍然被怀疑暗中打算继续留任。他对杜特拉的支持被许多人看成是一种分化反对派的一时权宜之计。一群瓦加斯的崇拜者结合起来了，取名为克雷米矫塔，他们大声疾呼地要求他们的英雄竞选第三任总统。

他们还竭力主张，选举应限于选出一个制宪会议来起草一部新的宪法，而总统选举则应推迟到新宪法制订之后。

当然，这将意味着暂时延长了瓦加斯的任期。普列斯特斯也主张推迟总统选举，他在工人和联邦雇员中间颇有影响。事实上，一般都认为，瓦加斯同普列斯特斯已订有密约。这段时期政治气温迅速上升，而且并没有因为 9 月美国大使在里约热内卢发表讲话，表示选举应该按原来计划进行而冷静下来。

10 月 29 日，瓦加斯撤换了警察总局长，代之以自己的兄弟。不管瓦加斯怎样设法继续当政，三军首脑是并不想袖手旁观的。10 月 29 日，他们提出了一项最后通牒，要求瓦加斯辞职，而由最高法院院长暂时行使总统职权。第二天瓦加斯宣布辞职，安详地告老回乡了。选举于 12 月 2 日按时举行，结

来源于“Queremo Getulio”（我们要热图利奥）。

关于选举运动的开始各阶段，见奥利夫·霍姆斯：《巴西：美洲新兴的国家》（“Brazil：Rising Power in the Americas”），《外交政策报告》，1945 年 10 月 15 日。

果杜特拉将军取得决定性胜利。瓦加斯由工党提名，又回到里约热内卢，出任他家乡南里奥格兰德州的参议员。新的国会成立之后立即开始工作，从事起草一部新宪法，这部宪法在1946年9月18日正式公布。它是1891年自由色彩的宪法和1937年宪法之间的折衷产物。后者的极权主义性质经过修改，给了国会更大权力，但同时许多有关劳工和民族主义的条款仍被保留下来了。

战争结束使其他许多拉美国家的政府发生了变动。战争年代中的趋向是由当政政府继续掌权，原封不动。1945年至1946年发生的那些变动则是通过不同的手段实现的，有些是和平的，有些是革命的。它们在程度上也各不相同，有的引起了政府的政治色彩的明显变化，而有的只限于重点和人物的改变。

1945年，秘鲁和委内瑞拉的执政政府都被具有比较自由倾向的新政府所代替，虽然他们取得政权的方法有所不同。在委内瑞拉，由梅迪纳政府安排的选举被民主行动党成员发动的革命所遏制，因为他们知道，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他们要与政府机器相颉颃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叛乱在10月15日爆发，并在首都进行了几次战斗后，以革命者胜利而告终。梅迪纳总统和他的政治僚属们被放逐，在一位文职人员，罗慕洛·贝坦科尔特领导下成立了170一个七人政权机构，他宣布该机构只是临时性的，即将尽速进行制宪议会的选举。

在秘鲁，选举在1945年6月10日如期举行。当选的总统候选人何塞·路易斯·布斯塔门特得到了主要由自由主义和左翼集团组成的联合阵线的支持，其中包括由阿亚·德拉托雷领导的受人欢迎的美洲革命人侵同盟。

1946年期间在几乎所有其余的拉美共和国中（阿根廷、哥伦比亚、墨西哥、智利和乌拉圭）都举行了大选。在后面三个国家中，发生的变化都是在重点方面，而不是在政党方面，而在哥伦比亚情形却正好相反。

在智利，里奥斯总统在任内去世，随即进行了总统选举，冈萨雷斯·魏地拉当选总统。和里奥斯一样，魏地拉也是激进党的一名成员，但是远比他的前任左倾一些。

墨西哥的选举结果以米格尔·阿莱曼获胜，他得到了退休总统阿维拉·卡马乔和组织革命党的支持，该党前称墨西哥革命党，除名称之外，在其他方面没有改变。阿莱曼遭到了1945年已被解职的卡马乔政府的外交部长帕迪利亚的反对。如同其他许多拉美国家一样，战争的结束在墨西哥引起了人们向美国重新提出民族独立要求的愿望。帕迪利亚因为过分的亲美受到了指责。他还由于在墨西哥城和旧金山支持姑息阿根廷而招致了人们的不满。在乌拉圭，自由主义者的科洛拉多重新当权。

5月哥伦比亚的选举，使得长期在野的保守党重新上台了。自从1930年以来一直执政的自由党，由于分裂致使保守党有可能取得了胜利。当选的总统候选人奥斯卡·佩雷斯和他的自由党对手并无显著的不同，也是一位具有温和观点的人物。

在玻利维亚，政府再次被革命推翻。比利亚罗埃尔总统不是由于他的倾向性就是由于环境所迫，显然未能履行建立一个比较民主的政府的诺言，这个诺言是他在1944年这个政府被其他拉美国家政府承认之前就作出的。在以后的几年中，他实行了压迫与恐怖日增的统治。大批反对者遭到屠杀、监禁和流放。1946年6月的一次暴动失败之后，接着一个月后在拉巴斯又发生了

一次群众革命。人群袭击了首都的主要建筑物和政府机关。比利亚罗埃尔被追赶到地下室，跌倒在地，叛乱者把他遍体枪痕的尸体从窗口扔到外面的人群中。

第三编中立国与非交战盟国

第一章瑞典艾格尼斯·H·希克斯

第一节 1939年9月瑞典所处的地位

要对瑞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政策作出评价，就必须考虑到这一政策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瑞典力图（但也并非总是成功地）尽可能地严守中立政策；另一方面，瑞典一开始就实行了一项积极的政策，即向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国家提供慷慨的援助——这种援助并非总是局限于人道主义范畴的。

大战爆发时，瑞典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对国联的效能感到失望。国联的破产向人们发出了最后的警告：如果一旦有此需要，这一国际组织在保护瑞典免遭外来袭击上也将证明同样是无能为力的。正由于认清了这一点，瑞典才把它的对外政策建立在“只能依靠自己”这一设想的基础之上，同时它愈益集中精力于自身的防务上面。然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才能赶上形势的需要，而大战爆发时瑞典的防务形势虽有所改善，但离要求则还有很大差距。

1937年3月，瑞典想要借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联盟来加强自己地位的希望，在隆德遭到了挫折，因为那时有关订立这样一个盟约的建议被当时的丹麦首相托尔瓦尔德·斯陶宁所拒绝了，其理由是丹麦并不觉得自己已受到威胁，因而不必如此小心警戒。从此以后，瑞典对它东边和南边的邻国——苏联和德国的态度一直是小心翼翼而又焦虑不安。一方面，它力图避免触犯它们，另一方面，力图表明它有权执行一项严格的中立政策。为了证实这后一点，它在1939年拒绝了希特勒提出的订立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同时也反对英、法、苏三国提出的关于全面保证芬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独立的提议。

国联于1938年成立的所谓“二十八人委员会”中的瑞典代表厄斯顿·恩顿在1938年1月1日对于瑞典在盟约下的义务作了明确的解释。国际制裁的制度事实上已名存实亡了；国联已变成这样一个团体：它的每个成员国都各自有权决定它想要参加实施制裁的程度。当二十八人委员会的报告在国联第十七次一般性会议上提出的时候，瑞典的代表理查德·散德勒重申了瑞典的意见：采取制裁实际上已变为了一桩任人选择的事情，并由国联成员国自由作出决定。“据此说来，某些国家——我很荣幸地代表其中之一——可能决定奉行的一种中立政策就应当被认为完全符合于对国联成员国的义务所作出的忠实解释。”这一声明发给了所有国联成员国传阅，但对此官方或非官方都没有作任何评论，这样，瑞典和其他有关国家的这一立场就因此取得了默认。

就在大战爆发前夕，瑞典政府于1939年9月3日采取步骤以使它国家的中立政策充分生效。据著名军事作家奥洛夫·宋德尔陆军上校写道，当时瑞典的防务地位是极不稳固的。9月1日，国王不经议会同意即发布敕令：必

瑞典南部城市。——译者

见《概览·1939—1946年：大战前夕，1939年》，（Survey for 1939—46: The Eve of War, 1939）：第5编，第5章及第7章。

埃里克·约·林德：《瑞典的中立政策》（Erik Hj. Linder: Sveriges neutralitetspolitik），斯德哥尔摩，外交政策研究所，1943年版，第4—5页。

同上书，第5页。瑞典从未真正退出过国联，但在1940年8月16日，瑞典议会一致同意，在瑞典看来，国联已不再存在，因而瑞典对其承担的捐款也应中止。

见奥洛夫·宋德尔：《4月9日》（Olof Sundell: 9 april），斯德哥尔摩，索尔曼，1948年版。

须按照先前所作的某些规定，加强防务准备；这一命令将从9月3日起生效。当天召开的内阁特别会议决定，所有有关执行瑞典中立的规定不仅应适用于目前正处于战争中的国家，而且也适用于可能卷入战争的任何其他国家。此外，瑞典政府还决定同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国家一起分别于9月1日、3日和19日宣告中立。而且，瑞典也参加了比利时国王发出请柬邀请交战国进行谈判的行动。9月9日，议会开会，国王又在开幕式上演说中表示瑞典决心置身于战争之外，同时强调必须大大增加军备费用。

在以后几个月的时间里，瑞典便致力于加强国防，并同所有交战国建立了关系。它从几个大国那里得到保证：不但它的中立将受到尊重，而且这种尊重将体现在做到尽可能地不干扰它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关系。然而，瑞典的商船队还是深深感到大战给它们造成的影响。瑞典船只不得不屈从德、英两国的管制，而早在1939年9月17日的第三周，就已有几艘瑞典船只被德国鱼雷击沉。瑞典当时即向柏林提出抗议。11月25日，瑞典又抗议德国在厄勒海峡南部布雷，这是根据瑞典的四公里海域要求提出的。此外，瑞典还因德国军用飞机越过国境提出了抗议。

第二节 苏芬战争

1939年10月19日，由于苏联邀请芬兰就某些具体的政治问题进行谈判，斯堪的纳维亚各国首脑在古斯塔夫国王的提议下，在斯德哥尔摩会见了芬兰总统。会见时讨论了与阿兰群岛的防务有关的对芬兰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可是，没有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准备提供军事援助，尽管当时的瑞典外交大臣散德勒赞同进行这种干涉！但他的政府却坦率地宣称：瑞典不能派遣军队，因为这一步骤可能会使瑞典最终卷入战争的漩涡。有人曾说，这一决定是受到了瑞典当时脆弱的防务地位以及瑞典政府忽视了立即动员其工业资源这一事实的影响；这后一步骤直到1940年1月之后才被采取。不过，瑞典已作出允诺，只要芬兰需要，它将给予军事以外的援助。10月7日和9日，瑞典政府分别对柏林、伦敦、巴黎、罗马和华盛顿采取了外交步骤，以期说服这些国家拯救芬兰摆脱威胁着它的危险。此外，瑞典又于10月12日会同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国家对莫斯科采取了一项外交步骤，强调了芬兰同北方国家的团结；政府还训令它在柏林、伦敦、巴黎、马德里、罗马、东京和华盛顿的使节，倘若被人问到此事，则应申明芬兰和俄国的冲突将会在瑞典造成严重局势。10月23日，散德勒告诉俄国驻斯德哥尔摩的公使科隆泰夫人，瑞典把芬兰的亲北方倾向及中立视为波罗的海的一个均衡要素，因之如果苏联使芬兰的这种地位发生任何变化，则将影响到俄国同瑞典关系的基础。11月2日，向莫斯科递交了一份关于这一内容的官方政府公报。

在苏芬战争爆发的时候，瑞典的中立第一次经受了174十分严峻的考验。对阿兰群岛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已被否决。至于瑞典的总的态度，对“中

关于这些谈判以及随后发生的芬兰和苏联的“冬季战争”，均可见《概览，1939—1946年：轴心国的初期胜利》，第2编，第3章。

后来散德勒从外交部告退，其直接原因即他在这一重大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

奥克·特尔斯特吕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瑞典对外政策》（Ake Thulstrup :Svenskutrikespolitik under andra världskriget），斯德哥尔摩·邦尼埃，1950年版，第9页。

林德：《瑞典的中立政策》，第13页。

立”这一字眼的使用是小心回避的。“尚未发生任何情况使我们要改变开始以来所采取的态度。”但是人们感到，国际局势使瑞典有必要建立一个更加稳定的政府，于是，在12月14日，一个由各主要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宣告成立。在那天之前，外交大臣散德勒因反对瑞典在阿兰群岛的政策而辞职，受命继任他的遗缺的是一位职业外交家克里斯田·根瑟。新政府在向瑞典人民发布的一项公报中提到了苏芬战争的爆发，并对芬兰所处的困境表示深切的关注。但是，他们同时又强调说：“我们在言论和行动中要遵守必要的审慎态度，以免给政府的工作带来更多的困难和危险，”这是“我们大家和每个人的民族义务。”这一“精神上中立”的要求，是重申首相于10月12日发出的呼吁，同时也显示了对德国人的种种要求无可奈何的屈从，德国人的种种要求在战前即已开始，而在大战爆发后则压力越发加剧了。必须说明，大多数瑞典人民在整个大战期间对于政府的这一要求是始终服从的，其结果正如特尔斯特吕普所写的：“早就出现有一种远离现实的、不健全的中立空想，它提出这样的意见，譬如说战争实际上与我们毫不相干，中立国在道义上远远胜过那些卷入战争的大国。”当一些报纸不理睬这一“完全中立”的要求时，政府却还是设法强制实施它。此外，对一些以“攻击口吻”表示反对“一个外国强权”的报纸，政府提出了几起诉讼。起初，这类诉讼的矛头只是指向共产党报纸；但是，1939年12月，著名新闻记者蒂尔·内尔曼由于在民主报纸《挑战报》上发表了攻击希特勒的文章而被判监禁三个月。1940年，政府草拟了一项在战时或在有战争危险的时期严重影响新闻自由的法令；按照该项法令，一些违禁的个别报纸有时被没收了。这项法令于1944年废除，关于废除该项法令的决定于1945年得到了次届议会的批准。然而，瑞典政府尽管忧心忡忡，想避免发生任何可能得罪某个大国的事情，但并未使他们停止向芬兰提供一切军事以外的援助。12月7日，瑞典和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国家一起公开发表声明，鼓吹国联应当采取措施以促成苏联和芬兰间的和平谈判。但是，“当国联于12月14日谴责俄国对芬兰的行动时，瑞典代表恩顿却在代表全体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发言时发表了一项宣言，对于可能采取制裁的问题表示有所保留。可是，与此同时，由于国联宣布俄国为侵略国的决议，并指令向芬兰提供那种符合瑞典人民自然倾向的援助，瑞典援助芬兰——特别是在人道主义范畴——的愿望却得到了加强。事实上，要求站在芬兰一边进行积极干预的呼声到处可以听到，但德国马上就毫不含糊地指出，这种做法将被看作是对德国的敌对行动。因此，瑞典政府不得不将其采取的政策局限于所谓的那种“非交战国的干涉主义”的范围内。瑞典罄其所

同上书，第14—15页。

P·A·汉逊（P·A·Hansson），1939年12月1日在诺尔彻平的讲话。

特尔斯特吕普：《瑞典对外政策》，第15—16页。

同上。

特尔斯特吕普：《瑞典对外政策》，第7—8页。

因为这一法令影响到宪法基本法中的一条，因此必须由连续两届议会通过。

一些报纸，包括《哥德堡商务报》（GoteborgsHandelstidningen），因刊载了详细描写德国在挪威的暴行的文章而被没收。

林德：《瑞典的中立政策》，第16页。

布里塔·斯科特斯堡-奥曼：“斯堪的纳维亚对外政策今昔”，《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斯堪的纳维亚》

有的武器弹药供给芬兰使用，准许芬兰招募志愿军（这样便为芬兰的防务增加了约九千名全副武装的军事人员）：并于1940年1月，象挪威一样，同意了盟国提出伪准许战争物资过境运往芬兰的要求。如果需要证明的话，从全国老百姓所搜集的衣物和货币足以证明芬兰的事业确实就是整个瑞典的事业。事实上，瑞典在第一次苏芬战争中的态度可以公道地说足以同在1940年到1941年间美国大力支持英国时的非正式参与全面战争相比拟。瑞典也采取了某些加强防务的措施，譬如，1939年12月2日，加派部队开往北方、哥得兰以及沿岸的筑垒地区；同时在一些领海水域内布雷。

俄国于1940年1月就瑞典报纸和人民的正式抗议遭到了坚决的拒绝，其主要理由是：苏芬冲突已在瑞典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瑞典无论在历史上或文化上都和芬兰有着千丝万缕的亲善联系，瑞典自由独立的新闻界也反映了芬兰应继续保持一个自由而独立的芬兰这一普遍的愿望，瑞典的照会也说，俄国人向瑞典向芬兰主动提供援助的范围所提出的异议是过分夸大176了，照会并拒绝接受另外一些关于向芬兰出口物品等所提出的抗议，认为是不合理的。不过，事实上瑞典那时对芬兰的援助至少就军备而言已达到了这种程度，在专家们看来都认为已危及到瑞典本国的安全。瑞典在战争爆发前就开始向芬兰提供军需物资，而到1940年3月13日，又提供了价值四亿克朗的赠品和借款，交给芬兰使用仍然而，并没有丝毫可能性会使这种援助发展成为军事援助，任何要向这方面发展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1940年2月，当芬兰的形势恶化，芬兰政府请求派遣军队的时候，瑞典内阁拒绝了。双方所交换的意见于2月16日公布于众，三天之后，国王亲自声明说，对苏芬斗争的任何官方干涉都将把瑞典拖入全面战争，“在那种情况下，我国将不再能向芬兰提供它目前所得到的、而又迫切需要的那种并非少量的援助。”当芬兰政府因此而向伦敦与巴黎求助，和盟国于3月2日就盟军可能要假道挪威和瑞典一事分别试探奥斯陆和斯德哥尔摩的态度时，两国政府的回答都是毫不含糊的：“不行”。不过，这一回答必须根据下述事实来加以评判，即瑞典政府当时关于苏芬停战谈判一事是知道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曾充当过调解人。谈判是1月底开始的，而在1939年12月底，根瑟和俄国公使科隆泰夫人进行会谈期间，就已显示出有可能为它们找到一个谈判的基础。

虽然盟国考虑到不顾瑞典和挪威的抗拒向斯堪的纳维亚北部渗入的可能性，但它们并不准备这样做，除非芬兰直接向它们求援，从而为其后果承担责任。尽管根瑟强烈反对这一主张，但他以乎并未明确说过如果盟国军队试图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通过瑞典国境，他们将遭到瑞典军队的抗击；而如果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也不过是要捣毁那条通往铁矿的铁路线而已。然而芬兰并不要求援助，部分是由于等这种援助到达将为时太晚了。但在3月11日，即在缔结苏芬和平条约的前夕，芬兰向瑞典政府提出了两个迫切的问题：（1）瑞典对盟国部队假道行军抱什么态度？（2）瑞典政府是否准备考虑在战后和

（Brita Skottsberg-Ahman：“scandinavian Foreign Policy, Past and Present”，Scandinavia between East and West），亨宁·弗里斯编，纽约，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第277页。

特尔斯特吕普：《瑞典对外政策》，第11页。

特尔斯特吕普：《瑞典对外政策》，第12页

特尔斯特吕普，前引书，第14页。

芬兰订立一项防守同盟？瑞典拒绝了第一个提议而赞同第二个。苏芬和平条约是于1940年3月12日签订的。4月17日，芬兰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代办向古斯塔夫国王致谢说：“瑞典对芬兰的援助已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对它所提供的援助，并大大促进了芬兰为自由和独立所进行的。孤立而艰巨的斗争。”3月25日，瑞典首相回顾了瑞典在苏芬战争时期的政策，并提到了拟议的防守同盟问题。可是，这一主张因遭苏联的反对而被搁置起来了。1940年秋，一种试图恢复这一主张的尝试——这一次是出自瑞典——受到苏联同样的待遇；而且，德国也表示“这太不合时宜”，芬兰自己虽承认对此感兴趣，却又指出“这一问题显然必须暂搁一下再说”。从此，这一主张就永远没有下文了。

第三节 瑞典与封锁

瑞典航运业所蒙受的最严重的损失是由德国造成的，但是英国和俄国也对其中某些部分负有责任。1940年2月21日，瑞典外交大臣根瑟对德国袭击瑞典船只提出抗议，然而由于他说，如不提出抗议就意味着不中立，因而使他的抗议成了一纸空文。瑞典当时的损失已达二万二千吨左右，到1940年9月，这一数字上升到六万三千吨，及至1941年6月底则又上升到四十万吨。德国于1940年春季所实行的封锁切断了瑞典同它将近一半的海外船只的联系，但其结果却有利于盟国。因为瑞典就把这一部分商船队租给了盟国；而这样一来便构成了一种对盟国有利的非中立行为。许多瑞典商船因试图向英国和法国港口装运禁运品而被德国人没收。1940年夏季，发生了一起事件，使瑞典和英国之间的关系暂时略呈紧张：6月20日，一支英国海军部队在法罗群岛附近扣押了六艘瑞典船只，其中有向意大利买来的两艘重型驱逐舰和两艘轻型驱逐舰，它们正在驶往哥德堡。英国政府不久释放了这些船只，并表示愿意赔偿因英国的行动给瑞典造成的任何损失。但是，当这些船只在驶往哥德堡途中，却又遭到了一架英国轰炸机的袭击（尽管没有命中）。瑞典在就这一事件发表的一项公报中强调了下述事实，即“德国海军当局曾为这次航行提供方便，譬如，他们指明了通过因布雷而变得危险和无法通行的那些地区的途径”。瑞典早在初夏就开始同交战国双方就后来凭所谓“航行证”通行178的问题进行了谈判，但只是到了1940年底，第一艘瑞典船只才根据这样的安排抵达哥德堡。1941年4月，由于德国宣布英国和冰岛之间的水域为战争区，“航行证”通行中断了。7月，所有的管理规章都加紧了，这种通行又告恢复，到了1942年它起了很重要的作用。1942年冬到1943年初，因美国对瑞典货船的最终目的地表示怀疑，“航行证”通行又一次中断了。经过漫长而又艰难的谈判，这种通行才于1943年初再次恢复，但不久以后又被取消，直至1943年5月乃又重新恢复。持有航行证航行的瑞典船只装载着各种必需的物资，如面粉、油脂、水果、棉花、毛羊、皮革、毛皮、发动机部件和矿物油。1941年至1944年间，瑞典进口了价值约十四亿克朗、

林德：《瑞典的中立政策》，第27—28页。

同上书，第30页。

林德：《瑞典的中立政策》，第33页。

关于航行证制度，见上文，原著第21页以下。关于英国扣瑞典于1939年12月7日签署的战争贸易协定，见上文，原著第9—10页，第70页。

见上文，原著第71—73页以下。

重达一百五十万吨的货物，其中三十七万一千吨是矿物油。

经过纳尔维克继续向德国提供铁砂一事引起了盟国的极大关注，并成为争论纷坛的问题。英国于1940年1月6日就此问题向挪威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同时也通知了瑞典。不久瑞典就与挪威联合一道对此事提出抗议。结果是，英国政府所建议采取的阻止矿砂运往德国的措施未能得到实行。1月19日，哈里法克斯勋爵质问瑞典驻伦敦的公使布约恩·普吕茨：瑞典政府究竟打算采取什么措施以减少这种运输？因为，否则的话，盟国将被迫对纳尔维克实行封锁。他指出，盟国已准备就帮助瑞典抗御德国和俄国的袭击同瑞典政府进行磋商，但由于瑞典人害怕德国人进行报复，所以盟国的建议遭到了拒绝。哈里法克斯强调说，现在已到了这样一个时刻，即“瑞典和其他中立国政府应把心思用于考虑最好的办法去援助一个它们所愿看到其失败的事业，而不是去考虑阻碍这个事业”。他指出了德国为保证瑞典铁砂供应而答应给它“保护”的危险性。他臆度这种保护将遭到拒绝，而瑞典将求助于盟国。盟国将会给予这种帮助，但这种帮助很难做到能象事先有所准备并通过交换意见而商定的79那样有效。1940年3月2日，英法两国就这一问题联合向瑞典和挪威发出照会，但得到的是否定的答复。虽然这些谈判没有取得具体结果，矿砂仍在继续装运，但瑞典人并没有扩大这种装运，相反却多方托辞予以减少。

第四节 德国侵入丹麦和挪威

苏芬战争的结束使瑞典有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但盟国还是继续指出由此得出的教训。因此在3月19日，张伯伦一方面承认“我们应当对这两个国家（瑞典和挪威）的地位寄予同情”，一方面又说：这两国的中立确实是以这一错误看法为基础的，即无论做什么，也要比卷入德国和盟国的战争来得好，而这一看法转过来则又是以另一种看法为依据，即“战争的结局不管是德国获胜还是盟国获胜，对这些中立的小国来说都是一桩无关紧要的事情。……除了坚决自卫，并同那些乐于帮助他们进行防卫的其他国家联合起来，没有别的办法将会或能够拯救他们的国家。”这些呼吁都无非是枉费心机。但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之间还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军事合作。军事情报组织联合起来了，这种协作在1939年到1940年的冬季仍在继续，并得到了增强。各情报部门的首脑不时碰头，交流情报，1940年3月召开了一个参谋会议，讨论了瑞典和挪威军队在一旦中立遭到严重侵犯的情况下如何进行协调的问题。但是，瑞典在国防准备上没有把一场“面对西方的战争”考虑进去，以致在德国人侵入挪威时（这需要在瑞典的整个西部边境上设防），便发现瑞典是毫无准备的。

在4月初几天里，不仅是丹麦、挪威政府，就连瑞典政府也收到了驻柏

又见《概览，1939—1946年：轴心国的初期胜利》，第3编，第2章。

瑞典外交部：《1940年4月9日德国进攻丹麦、挪威的序幕》（Swe-den, Foreign Ministry : Forspelet till det Tyska angreppet pa Dan-mark och Norgeden 9 april 1940），斯德哥尔摩，诺尔斯特德，1947年版，文件第13—15号、第17号、第20号、第21号、第23号、第24号、第26号（该书以后简称《序幕》）。

《序幕》，第24号；参阅宋德尔：《4月9日》，第45—46页。

《序幕》，第72—74号。

下院辩论，第5辑，第358卷，第1842—1843栏。

宋德尔：《4月9日》，第87—88页。

林使馆发来的关于德国正在集结兵力的惊人警报，这种集结兵力显然是打算对北部进行突然袭击，而纳尔维克便是想到的第一个目标。瑞典并没有把德国这种准备看作是在任何方面蕴藏着对它自身的一种威胁，而只把它看作是德国为防万一英国对挪威领土进行威胁时而采取的预防措施；根瑟在给瑞典驻柏林公使阿尔维德·里凯特的信中极度低估了这种假想的可能性。他说，“对于巴黎和伦敦有什么计划和决定，我们的消息是十分灵通的，因此我们不必认真考虑有人会从那一方面对挪威或瑞典的领土采取任何突然行动。”尽管如此，瑞典政府还是于4月2日对德国外交部采取了一项新的外交步骤，它警告德国政府：瑞典在北部还保持有相当数量的兵力，它能抗击来自西部的袭击。事实证明，这一声明无非是虚张声势，德国人对此是一清二楚的。而且，总司令特尔内尔将军在4月初提出的关于实行总动员或者增加瑞典军备的建议在4月6日几乎完全被否决了：而征集令又被限制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倘若观察员注意到有军舰驶向瑞典南部或西部港口时，准备接待它们的也只有警察和海关人员。”根瑟后来在一次解释中说：据认为加强瑞典南部的防务（这或许要影响到北部的防务）是没有用处的，因为如果德国人想要发动一次进攻的话，这样做并不能阻挡他们，同时却可能会给他们这样一种印象，盟国正在这一防线的幕后集结兵力。

4月9日（即德国侵入丹麦和挪威的日子）清晨，德国驻斯德哥尔摩公使维德亲王向根瑟递交了一份照会，表示希望瑞典将继续严守中立。政府答复说：他们打算保持中立，但要求“有完全自由采取那些我们认为有必要维护我们的中立的措施”。同日，瑞典首相通知全国：这就是政府的政策；并通知挪威，瑞典既不能以武器援助挪威（就象它曾援助芬兰一样），也不能允许向挪威出口武器或弹药。4月19日至24日，古斯塔夫国王就瑞典中立问题同希特勒交换了一些信件。挪威作出了一项决定。即不向瑞典提出任何可能使这个国家偏离中立立场的要求，这是为了帮助瑞典解脱其困难处境。4月13日，挪威外交大臣哈尔夫丹·科特将这一点以指令下达给挪威驻斯德哥尔摩公使延斯·布尔，不久，挪威在斯德哥尔摩开设了一个特别机构（挪威公使馆B部），负责处理在战争中发生的问题。但是，当挪威政府发

《序幕》，第131—190号。

宋德尔：《4月9日》，第99页，第112—113页，第138页。

特尔斯特吕普：《瑞典对外政策》，第18页。

同上书，第19页。

特尔斯特吕普：《瑞典对外政策》，第19—20页。

挪威外交部：《1940—1945年战争期间挪威同瑞典的关系》[Nor-way, Foreign Ministry :Norgesforhold til Sverige underkrigen1940—45, 三卷本（以后简称《挪威同瑞典的关系》），奥斯陆，挪威于伦达尔出版社，1950年版]，第1卷，文件第162—164号；瑞典外交部：《瑞典在战争期间同丹麦和挪威的关系》（Sverigesforhallande tillDanmarkoehNorgeunderkrigsdren（以后简称《瑞典同丹麦和挪威的关系》），斯德哥尔摩，诺尔斯特德，1945年版），第23—24页。

林德：《瑞典的中立政策》，第35—38页。

外交政策研究所（斯德哥尔摩）：《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瑞典对外政策》[UtrikespolitiskaInstitutet (Stockholm) :Svensk utrikespolitikun-derandravardskriget]，斯德哥尔摩，邦尼埃，1946年版，第318页。德国通讯社，1940年5月6日；林德：前引书，第38页。

《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1卷，第8页及文件第9号。

觉瑞典错误地倾向 181 于过分的谨慎，因而在起初间接地帮了德国的忙，便于 4 月 24 日向瑞典发出了一份措词严厉的抗议照会。尽管如此，科特还是继续支持这样一种意见，即瑞典不应该被迫参与战争，这一点对挪威是至关重要的。即使瑞典加入了盟国，也可能给挪威带来不利，因为苏俄曾警告挪威政府，它不会容忍一个外国列强——尤其是英国——在挪威北部获得政治势力。

人们曾提出过许多理论来解释希特勒为什么并不想占领瑞典，有一种假设看来似乎颇为合理，即希特勒认为这样做既不可取，也无必要。若这样做的话，瑞典将会拼命进行自卫，从而间接加强挪威的抵抗：宝贵的铁砂供应也将因此中断：而且，占领了挪威和丹麦便切断了盟国对瑞典的援助，这也就使瑞典无论如何实际上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但德国的这一决定无疑也受到了莫洛托夫于 4 月 9 日向德国驻莫斯科大使提出的下述警告的影响，即保持瑞典中立符合俄国人的利益的。4 月 12 日，当盟国向瑞典保证一旦德国袭击瑞典即予以支援时，瑞典答复说，对于任何试图侵入瑞典领土的企图，它都准备进行武装抗击。同日，首相在向全国广播时强调说：“允许交战国之一利用瑞典的领土来达到它的目的，是和严守中立的原则不相符的。幸而没有一个国家向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倘若有人提出这种要求，就只能遭到驳斥。”其实，瑞典已得到英国政府的保证：英国军队不会违反瑞典政府的意愿越过瑞典国境。

就在同一天，瑞典不得不断然作出一项重大决定。科特从利莱博海关打来电话，询问可否准许哈康国王在瑞典逗留；如果准许的话，是否允许他随时任意离开，也就是说他们是否要将他拘留，瑞典在第一次回答中答复说，哈康国王及其随行人员“当然”可以进入瑞典境内，但瑞典不能就有关拘留的问题作任何诺言。两小时后的第二次回答中对国王及其一行表示欢迎，但又指出：按国际法规定，国王在待在外国境内期间，将不得行使他的皇室权力，瑞典政府也不能“事先”就他离开瑞典的问题作出承诺。哈康国王一收到第一次回答便越境进入了瑞典，但在半小时后又返回挪威国土。当天，科特和其他两名政府官员也越过了国境，并于 14 日同其中一名官员回到挪威。这里顺便提一下，挪威的一份白皮书写道：瑞典驻奥斯陆公使馆秘书道格拉

同上，文件第 6 号。

同上，文件第 9 号，第 21 页。

同上，第 22 页。

塔斯社，1940 年 5 月 4 日；《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 1 卷，文件第 172 号；参阅《纳粹—苏维埃的关系》（Nazi-Soviet Relations），第 140 页。

《序幕》，第 198—219 号。

林德：《瑞典的中立政策》，第 36 页；瑞典外交部：《过境运输问题及其他有关问题，1940 年 4 月至 6 月》[Sweden, Foreign Ministry: Transiter-ingsfregor och darmed sammenhangande sporsmal, april-juni 1940 (以后简称《过境运输问题，1940 年 4 月至 6 月》)，斯德哥尔摩，诺尔斯特德，1947 年版]，第 12 号。

同上，第 16 号。

瑞典外交部：《1940—1943 年同挪威境内的挪威政府联系的问题》（Sweden, Foreign Ministry: Fragor i samband med Norska regerin-gens vistelse utanfor Norge 1940—1943），斯德哥尔摩，诺尔斯特德，1948 年版，第 9 页以后，文件第 2 号；及附录 A, B，第 152 页，第 154 页。

《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 2 卷，第 7 编。

斯伯爵为了帮助挪威政府，在其上司弗里黑尔·约翰·贝克-弗里斯暂时不在奥斯陆的一段时间里曾做了他力所能及的一切工作，并且尽可能同瑞典政府保持接触，甚至还跟随国王到哈马尔去。贝克-弗里斯不久也留在奥斯陆，并在那里按同样的精神行事，拒不接纳吉斯林的官员，直至大约7月中旬，德国人宣布他们再也不能容忍瑞典的外交代表驻在挪威，他才不得不离开奥斯陆。但是，瑞典公使从未正式撤退。哈康国王离开挪威以后，在他那个王朝的命运吉凶未卜的时候，古斯塔夫国王于1940年6月16日通过瑞典驻柏林公使告知希特勒：任何旨在废黜挪威王朝的步骤必将引起瑞典最广泛各界人士的严重反感。他劝告希特勒要以最大的宽厚态度去对待哈康国王和挪威人民。他的电报迄未得到任何回音，但我们现在知道，这份电报当时曾惹得希特勒暴跳如雷。7月24日，古斯塔夫国王也警告哈康国王：在瑞典寻求避难的挪威女王储及她的子女们所拟议的美国之行可能会危及挪威王朝的前途；但哈康国王在7月27日却答复说，他仍希望他们得以成行。在挪威战役接近尾声时，瑞典政府和挪威政府之间讨论了纳尔维克地区中立化的问题，建议这一地区应由瑞典军队来占领，希望挪威借此可以继续保持对它最北部地区的控制。瑞典是非常乐意赞同这一计划以证明他们对挪威的同情，但是当盟国在挪威的局势日趋不利时，德国人对这建议就不感兴趣了；6月7日，挪威政府通知瑞典政府，这一计划已不得不予以放弃。

第五节 德国过境运输问题

应戈林通过比尔格·达勒鲁斯所发出的邀请，一个瑞典代表团于4月14日前往柏林。代表团由塔姆海军上将率领，成员除了达勒鲁斯本人外，包括外交部商务司司长贡纳尔·黑格勒夫、情报部大臣特恩堡教授。4月15日和16日，他们会见了戈林，塔姆海军上将于16日拜会了希特勒，此后，古斯塔夫国王和希特勒互致函件，确认了瑞典的中立。代表团拒绝了向他们提出的各种请求，霍格勒夫在这方面显得尤为坚持。4月22日，瑞典外交部正式宣布：德国人提出的假道瑞典把军用交通工具运往别处的任何要求将不会得到同意。当战斗仍在挪威进行着的时候，瑞典不顾德国人屡次企图对它进行威胁，拒绝了一切类似的要求。并且，由于德国飞机侵犯了它的主权，瑞典不但随即向柏林提出了强烈抗议，而且还在这段时间内迫使三十九架德机降落境内。瑞典的国防进一步得到了加强，至5月为止已有将近四十万人武装起来；他们士气旺盛，但装备不良。当德国人发觉瑞典坚决不准他们军队和军用物品过境时，德国人便改变了他们的话题，提出应该让红十字会人

瑞典外交部：《同挪威境内的挪威政府联系的问题》，第13号，第17页。

同上，第9页及文件第53号，第54号，第64号。

《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1卷，第190页以下。

《过境运输问题，1940年4月至6月》，第303号。

关于达勒鲁斯于1939年为促使德国和其他国家间的争论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所作的努力，在《概览，1939—1946年：大战前夕，1939年》一书中有所记述。

《过境运输问题，1940年4月至6月》，第33号，第29页。

同上，第78号，第90页。

《过境运输问题，1940年4月至6月》，第7—8页；1945年6月1日《晨报》（Morgentidningen）中根瑟的文章。

特尔斯特吕普：《瑞典对外政策》，第24页。

员和医药用品运送过境。这一“人道主义观点”占了上风，因之得到了许可。

可是，瑞典也采取了一些步骤，以保证这一让步不致被滥用，规定所有运输都要受瑞典的监督管制。据说一部分红十字会人员后来参加了作战，但是，整个这一批人员还不超过二百九十人，因此即使发生了这种情况，也没有什么实际影响。

当挪威的战事停息，而盟国又在法国遭到重大挫折的时候，瑞典对德国的态度显而易见地有了改变。现在它已十分孤立，处于暴露的地位，只好完全依靠德国为其供应主要物资。在瑞典所做的让步当中肯定可称违反中立的一项就是，允许德国一艘被击沉的驱逐舰上的船员由纳尔维克取道瑞典返回德国，借以避免海上旅行的风险。另一方面，瑞典的一份白皮书也提供了许多事实证明：在瑞典的局势尚未因盟国的挫败而变得那般岌岌可危之前，德国人为诱使它允许军需物资假道运往挪威和作出其他违背中立的让步，曾百般讨好，但瑞典对之都进行了抵制。而与此同时，即从4月9日至6月10日，却将一些战争物资和食品运往挪威以援助挪威军队。由于瑞典已完全处于德国和苏联的包围之中，又亲眼目睹了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国家的命运，因而终于屈服于德国的压力，于1940年7月8日同德国缔结了一项有关过境运输问题的正式协定。其实，6月份就已经允许过境，并在当月21日议会举行的秘密会议上相应地通知了议会。报界也接到了通知，但不许发表这一消息。7月5日，外交大臣宣布了这一协定。德国休假士兵将被允许经越瑞典国境。军队和军需物资可以经由瑞典从挪威的一处运往另一处的所谓“马蹄形运输”也包括在这一协定之内。而且，这一协定也适用于那些先前被禁运的货物，虽然军需物资的运输还须取得特别许可。休假士兵应搭乘专车，并卸去武装，往返方向的人数必须均等。在缔结这一协定之前，德国已在取得瑞典的同意下，在厄勒海峡的瑞典领海内布下了潜艇网，这一事实除了那些最初参与其事者外对任何人都一直是个秘密，直至1946年4月13日经《哥德堡商报》加以披露后，方才真相大白。

对德国假道过境作出让步的消息在瑞典遭到了严厉的批评，特别是因为人们担心这些让步事实上可能会比所承认的范围更为广泛。当时，的确还有其他许多迹象表明瑞典对德国的卑躬屈膝。7月，瑞典从德国占领地区撤回了它的公使馆人员，仅保留了享有领事职权的官员。挪威政府自出亡在外之后，曾多次要求瑞典向其设在伦敦的政府派出一名使节，但瑞典却拒绝这样做（表面上，或许是正确的），其理由是：这样做会使德国要求瑞典撤回其在奥斯陆的总领事，反而会妨碍瑞典为援助挪威人民所作的努力。因此，两国仍是通过瑞典派驻英国的公使馆来保持联系的。同时，瑞典也拒不同意德国占领地区向它派遣使节，例如它拒绝接纳因前任公使逝世而由挪威于1940年10月派驻斯德哥尔摩的公使布尔，但在1943年11月8日，瑞典还是同意了对布尔的派遣。7月7日，瑞典首相佩尔·阿尔宾·汉逊对政府缔结过境

《过境运输问题，1940年4月至6月》，第6页及第76号，第81号，第106—107号，第114号，第125—126号，第212号。

同上，第8页。

《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1卷，文件第75号。

瑞典外交部：《过境运输问题，1940年6月至12月》，斯德哥尔摩，诺尔斯特德，1947年版，第55号。

《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2卷，文件第286号，第288号，第289号。

运输协定的理由公开作了解释说：这一协定不再严重影响到挪威或全面战争，“它还有利于我们的兄弟邻邦恢复与外界的联系。”与此同时，他也公布了签订瑞挪贸易条约的消息。汉逊在发表这一声明之前，还对英国驻斯德哥尔摩公使以及瑞典驻伦敦公使普吕茨作了某些解释，6月20日，两位公使都得到通知：可以预期德国军需物资即将假道瑞典过境。6月26日，哈利法克斯将英国对此事的态度告诉普吕茨：英国十分体谅瑞典的困难，不过瑞典在困境中保持均衡时未免向德国靠拢得太近了。英国外交大臣警告普吕茨：英国可能不再会允许将美国飞机运往瑞典，并提醒说，美国也许为了使英国得益而自动放弃对它们的所有权。实际上，美国政府不久就征用了瑞典政府前已订购的六十架单座战斗机和五十架单座轰炸机。10月18日，美国国务卿在答复瑞典提出的抗议时作了解释说：第一，美国的国防利益迫使它不能允许发给向瑞典出口军需物资的许可证；第二，美国陆军部征用了那些飞机，这是因为美国空军为了进行训练迫切需要它们。

但是，当时无论英国还是挪威都没有半点心意要使瑞典陷入无法克服的困难境地，也不愿把它拖入战争的漩涡，而它作为一个情报监听哨所实在是太有用了。因而，对于过境运输协定，除于7月20日提出了强烈的官方抗议外，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当然，这项过境运输毕竟成了一种永久的麻烦，瑞典的政治家们强调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困难迫使它不得不保持这些让步。譬如根瑟在8月16日就解释道：从实际作用来说，国联已寿终正寝，因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所能做到的一切只是“使我们自己尽可能不让压迫者轻易地吞噬下去”。他在12月又谈到了瑞典的地位跟在苏芬战争时有所不同：德国对挪威和丹麦的占领已形成了全面战争的一个明显部分，因而瑞典就必须保持中立。到1940年8月底为止，由挪威送出的德国士兵约有二万三千人，送往挪威的有一万二千四百五十人。总的说来，并没有超过约定的人数。8、9月间，德国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两国于9月14日互换了有关订立一个新的协定的照会，根据这一协定，从特雷勒堡到里克斯格兰森（通向纳尔维克的北部铁路线），每周应86分分别有两列火车对开行驶。该协定同时还规定了要大量增加特雷勒堡和科尔斯耶（挪威南部）之间铁路线的北向运行，并对有关武器的规定做了修改；凡经确定称作轮换部队的士兵现在允许携带武器。事实上，在1940年秋季，装载德国士兵经瑞典从特雷勒堡开往里克斯格兰森到挪威的列车不是每周两班，而是每周三班。德国士兵南来北往的人数比例也有所变动，9月至11月间，送往北部的人数达八万六千零二十八人，而送返德国的则为七万三千零九十八人。此外，德国人还利用了允许输送军需物资的许可证制度的便利。第一次申请是在1940年9月7日提出的，及至同年12月底，已有四百五十辆载有军需物资的大货车驶过瑞典。

然而，瑞典政府还是继续试图保留某些独立的象征，并继续不遗余力地抗拒德国人的压力。1940年10月，德国人要求允许一支由一万五千人组成携有军用物资的分遣队假道过境，并要求在原则上允许那些既非前往度假，

特尔斯特吕普：《瑞典对外政策》，第25页。

参阅《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0—1941年》，第746—748页。

见弗朗西斯·拉吕什：《瑞典的中立：执行这一政策的十年》（Francis La Ruche: La Neutralité de la Suède: dix années d'une politique），巴黎，1953年新拉丁版，第114—116页。

又非销假返防的德国士兵过境，这两个要求最初都遭到了拒绝。但在12月5日，在现有的协定上又附加了一份备忘录，规定增加准许假道过境的士兵人数，并把他们称作“主要是休假的”士兵。就这样，到那年年底，经由挪威送返德国的总人数即达十三万三千一百三十五人，送往挪威的达十二万九千一百零五人；但有一点看来很明白，即由挪威送返德国的士兵，其中较大一部分是度圣诞节休假。1941年上半年期间，每月往返的人数各增加到三万至三万五千人；而在这六个月里，南下的人数逐渐下降了。因此，根瑟于3月1日抗议说：过境运输的发展情况明确显示出德国是在向挪威调兵遣将，而这是与协定不符合的。德国人接着提出了种种借口，因而瑞典又于3月10日再次提出抗议。德国公使维德亲王被告知说，瑞典不能接受这种局面：要么立即进行纠正，以恢复正常的均衡状态，要么废除协定。德国政府在答复时采用了威胁口吻，通知瑞典：过境运输必须暂时原封不动地继续下去，倘若瑞典反对这样做，“则将造成十分危险的局势。”不过，3月23日，过境运输已大致减少到正常范围。可是，更坏的事情却接踵而至。在苏德战争（芬兰卷入了这场战争）爆发时，瑞典政府于1941年6月25日宣布了一项影响187更大、但却是“仅此一次”的让步——入境特许，准许整个一师的德国士兵假道瑞典由挪威开往芬兰。这支德国部队要不停留地通过瑞典，而且，在瑞典境内时每列火车都得听从瑞典的指挥。作为这次让步的理由，瑞典指出了它和芬兰的特殊关系，以及德国政府和芬兰政府都提出了这一要求的事实。在我们对这种特殊让步进行评价时，必须记住当时德国政府是决心要使这场战争被看作代表整个欧洲对苏联进行的一次圣战的，因此便依据这一原则给瑞典政府施加了特殊压力。同时，也必须考虑到德国军队在那一时期节节获胜，及瑞典自身所处完全孤立的境地。盟国可以对它的非中立行为提出抗议；但倘若一旦瑞典被卷入战争，他们却无法有效地助其一臂之力。尽管如此，瑞典政府决非心甘情愿地屈服于德国人的要求，据了解，在商讨如何对付这项要求的内阁秘密会议上，就有过明显的意见分歧。当时不断谣传，说什么国王本人也切望这一让步能获得批准，他甚至威胁要退位，如果内阁拒绝同意德国人的要求的话。（当时的财政大臣厄恩斯特·韦福斯在回忆录中曾提到了德国驻瑞典公使给希特勒的一份报告，在这报告中维德亲王写道：国王告诉他，为了说服内阁同意恩格尔布雷希特师过境，他曾被迫“谈到了退位的问题”。在韦福斯的书出版以后，战争时期的瑞典外交大臣根瑟接见了该书作者，他在会见时宣称：

在内阁会议上国王并未实际用过“退位”这一字眼，而他实际使用的言词也不大可能被解释为含有这种意思。至于被引述的国王对维德亲王的讲话，当时根瑟不在场，他认为，国王可能使用过这样的言辞是为了促使德国

《过境运输问题，1940年6月至12月》，第156—157号。

同上书，第198页。

《瑞典同丹麦、挪威的关系》，第71页。

该师通常被称为恩格尔布雷希特师。

1947年1月7日的《哥德堡商务报》援引了社会事务大臣古斯塔夫·默勒叙述有关这次内阁秘密会议详情的一篇文章，1947年1月29日的《每日新闻报》（Dagens Nyheter）也就此文展开了讨论。

见厄恩斯特·韦福斯：《回忆录，1914—（1949）年》〔Ernst Wig-forss：Minnen，1914（—1949）〕，三卷本，斯德哥尔摩，时代，1950—1954年版，第3卷，第169页。

公使意识到瑞典反对德军过境的严重性。1955年11月12日，瑞典外交部未加评论地全文公布了维德亲王发送给里宾特洛甫的那份报告。）

不论议会还是全国上下对于宣布内阁这项决定的反应情况清楚地说明，再要进一步作出类似的让步而不引起188起严重的反响是不可能的了。不知是由于这些反应的缘故呢，还是因为政府内部反对对德让步的情绪日益增强，瑞典政府曾明白表示：这是仅此一次的让步；而当德国报纸竭力对瑞典的行动作出不同解释的时候，瑞典外交部立即用官方公报的形式坚决加以否认。德军过境自6月27日开始，持续了约两星期之久，约一万五千二百名德国士兵就这样由挪威调到芬兰。那些把这个师称作“增援部队”，并声称已有更多德国士兵被输送过境的谣传后来都被否认了。随后又提出的关于德军假道瑞典开往芬兰的要求都遭到了坚决的拒绝。

1941年夏天，瑞典对过境运输问题又作了一次让步（但这一让步至少在理论上讲并不只限于对一个交战国而言），规定了如下安排：允许“信使机”飞越瑞典国境，并在瑞典领土上着陆。不过这些飞机必须在固定的航线上航行，并在确定的机场上降落；而且作为这次让步的一项条件，这些飞机应卸除武器，机组人员应为民间乘务员，也不得携带武器并应持有民用通行证。但是德国人并不总是严格遵守这些规定，他们比盟国在更大的范围内利用了这种许可，而整个这种安排都是由于德国人施加压力的结果；然而盟国（特别是英国，但也有美国）的飞机也在英国和瑞典之间的高空中经常往返。还有一点不应该忘记的是，按照瑞典和英国之间关于由打破封锁的英国快速汽船组成的所谓“吕塞基尔”运输规定，许多货物包括瑞典的滚珠轴承和其他贵重战争物资在年都曾运往盟国。此外，还有一千八百四十九名适役年龄的挪威人在通知了瑞典政府并得到其同意的情况下被从瑞典送往英国，而且他们也知道，降落在瑞典的盟国飞机的人员通常是被遣送回国的。

随着盟国的形势有所好转，瑞典政府乃认真地考虑结束过境运输的问题，到1943年，这就仅仅是个决定它应于何时停止的问题了。尽管德国局势每况愈下使得作出这种决定对于瑞典来说已没有多大危险性，但政府还是在1943年7月征召了额外的士兵。以对付德国人可能进行的报复。7月24日，德国预先得到通知：过境运输必须“在几个星期内”停止；8月5日，正式宣告停止。瑞典18给德国的照会正文虽未予公布，但挪威驻斯德哥尔摩公使布尔则已获悉此事。不过，在过境运输停止以后，普通货物及旅客还是准许继续通行。8月6日，瑞典报纸公布了挪威政府发表的一项公告，声称：由于停止了德国休假士兵的假道通行，瑞典已排除了“在我们两国之间友好关系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同时，瑞典也逐渐削减了对德国的出口，并对盟国作出了一些有利于它们的让步。

《周报》（Vecko-Journalen），1954年9月12—18日。

《泰晤士报》，1955年11月14日。

伯特尔·屈耶尔堡与约阿奇姆·伊伦：《邻人之间》（Bertil Kugelberg and Joakim Ihlen：Grannaremellan），斯德哥尔摩，瓦爾斯特与威斯特兰德，1945年版，第43页，第44页。

德国人往往恣意滥用这一让步；譬如在1943年2月的“莱克瓦滕”事件中便是如此。（《邻人之间》，第55页）。

《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1卷，文件第100号，第101号，第103号以下。

拉吕什：《瑞典的中立》，第165—175页。又见上文，原著第73页。

第六节 瑞典在第二次苏芬战争中的政策

尽管瑞典对于恩格尔布雷希特师的让步间接地有利于作为德国盟邦的芬兰，但总的说来，瑞典政府对芬兰在其第二次对苏作战中的态度已有了显著的改变。1941年7月2日，瑞典“促进国防委员会”决定：不再象在第一次苏芬战争时那样成立一个援助芬兰的志愿军组织，但对于自愿加入芬兰军队的个人则不加以任何限制。这一次（根据推理），芬兰由于成为德国的一个盟友，在参与这场全面战争，因而不能指望瑞典采取象它以前在对苏孤军作战时所曾采取过的同样态度。1941年夏季发生了两起严重破坏案件（这两起案件的起因虽然从未得到圆满的解释，但都被怀疑是共产党人所策动的），它们似乎证明了就连瑞典这种已经有所改变的态度也引起了社会某些方面的极度不满。7月，当一列有五节车厢载有瑞典炸药的瑞典货运火车在克吕尔博爆炸时，光是国家铁路的损失就达约五百万克朗。9月17日，瑞典海军又遭到了一场灾难：停泊在斯德哥尔摩附近一个港口的三艘驱逐舰忽然被炸毁，船只沉没，伤亡严重。但在人道主义方面，无论瑞典政府和人民都仍继续向芬兰人民提供最慷慨的援助。在第二次苏芬战争时期所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便是为四万五千名芬兰儿童筹办了收容所，以拯救这些孩子免受战争的苦难，并保证他们能在正常和健康的环境中成长。

1944年9月，苏芬停战协定签订了，于是芬兰便从苏德战争中退出。继之，瑞典和芬兰缔结了一个贸易协议，按照这一协议，瑞典向芬兰除了提供钢铁、纺织品、化学90制品、若干工业产品、煤和焦炭之外，还提供了主要食品。瑞典政府还给了芬兰一项一亿五千万克朗的建设贷款，以便芬兰能够用以偿付这些货价。

第七节 瑞典在德国占领挪威、丹麦时期的政策

（一）瑞典对挪威的援助

在挪威被德国人占领期间，瑞典在减轻挪威人民的疾苦方面所能做的事情实在少得可怜。瑞典的政策不得不在以下两个方面之间维持平衡：一方面，通过强烈的抗议，努力防止或减轻纳粹党的某些过分惨无人道的暴行；另一方面，极其小心谨慎，避免做出任何事情，它们可能会促使德国人阻止在挪威的挪威公民和在德国集中营的挪威犯人得到瑞典所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

伦敦对瑞典的这种左右为难的处境是完全理解的，这一点在1942年10月英国首相同后来出任瑞典驻英国大使的埃里克·博赫曼所举行的会谈中顺带地得到了证实（当时博赫曼被派驻英国任职是为了设法获取一些瑞典国防所迫切需要的石油供货）。博赫曼说，在第一次会谈中丘吉尔曾对他说：“你们需要石油来进行自卫，我也觉得你们应该得到石油。我劝你们要进行武装，武装，再武装。我们不希望再有一个德国人的牺牲品；我们所要求的一切便是：你们在一旦遭到袭击时能够捍卫自己，不再作出任何不必要的让步，而且能够尽快撤销那些已经作出的让步。”在伦敦的挪威政府也很理解瑞典的难处，因而不向瑞典要求提供任何可被德国人认为是“非中立”的援助。

又见马尔科姆·芒思：《甜蜜的战争》（Malcolm Munthe：Sweet is War），伦敦，达克沃思，1954年版，第151页。

《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3卷，第22编。

然而，瑞典政府有时还是甘愿冒德国人实行报复的危险，譬如在 1943 年 11 月，奥斯陆大学纳粹化的斗争达到最高潮时，大学的一部分大楼被学生纵火焚烧，纳粹分子宣称要把教师和学生部放逐到德国去。瑞典就马上向德国驻斯德哥尔摩公使和柏林外交部提出抗议，瑞典外交大臣并就这一问题发表了一项正式公报。德国人干脆地答复瑞典，叫它不要干涉德国和挪威间的事务，但是瑞典根据下述理由再次提出抗议：瑞典政府不能接受瑞典无权提出有关挪威问题的观点。在伦敦的挪威政府对瑞典的这种干涉表示感谢，但示意瑞典应该用停止对德国出口钢铁的威胁作为抗议的后盾，但瑞典人拒绝了这样做，因为他们唯恐采取这一步骤会导致德国人中断对瑞典至为重要的煤的出口，甚至把它拖入战争。然而，挪威学生的命运吉凶仍是瑞典人最为关切的事情之一，他们一直在为营救那些学生而努力，直至 1944 年 11 月 2 日，德国才同意把他们遣送回国，以此作为交换那些在芬兰重伤的德国士兵回国的条件。

1942 年秋，挪威驻斯德哥尔摩公使提出了在瑞典训练挪威警察部队的问题；但是，在 1943 年 4 月之前，一直未能为此采取具体的步骤，因为瑞典政府直到 1943 年 4 月才声明他们不反对这项计划，甚至还愿协助实施该项计划。挪威政府乃于 5 月 12 日正式批准了这项计划，当月月底，瑞典社会事务大臣古斯塔夫·默勒口头上表示同意。由此建立起来的职业警察部队将从在瑞典的挪威难民中招募，名额限于一千五百人，包括官员和管理人员。这一安排被看作完全是一项民间事务，丝毫不抵触到瑞典法律和国际法。然而有趣的是：训练的课程却包括传授和练习使用瓦斯、烟幕弹和炸药以备应付现行的破坏活动及防止破坏活动。1943 年 11 月 2 日，瑞典政府同意将另一支人数限于八千人的部队训练成一支警察预备队。这支预备队将具有更多的军队性质，而且将受陆军军官的指挥。1944 年秋，这支预备队的实力已增长到一万二千人，瑞典政府也同意预备队应在实战条件下进行演习。德国公使就这种“军事训练”提出的非正式抗议遭到了拒绝。1944 年 10 月，当苏联军队越过挪威—芬兰边境时，挪威政府力主挪威警察部队应尽快进入挪威北部解放区。瑞典同意了这一要求，并表示愿意为这些警察部队配备必要的武器和给养。挪威白皮书就这一点指出：“瑞典政府官员，不论军官或文官，都为挪威的事业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但另一方面，瑞典又在 4 月 19 日拒绝了挪威提出的下述要求：为了防止挪威北部全部遭到德军的破坏，瑞典政府应向柏林提出抗议，并辅之以可能进行军事干涉的威胁，这些要求在 1945 年 4 月 17 日再次遭到拒绝，因为瑞典政府考虑到，以相对不流血的方式解决德军对挪威的占领的前景已相当好，而加以军事干涉相威

同上，文件第 518 号；《瑞典同丹麦、挪威的关系》，第 213—214 页。

《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 3 卷：文件第 523 号及第 525—526 号。

同上，文件第 553 号。

《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 268—271 页及文件第 483 号。

同上，第 274—275 页；《瑞典同丹麦、挪威的关系》，第 270 页。

《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 3 卷，第 270 页；又见《挪威政府的活动》（Den Norske Regjeringens virksomhet），奥斯陆，1948 年版，第 1 卷，第 189 页以后，第 4 卷，第 56 页以后；以及哈吕·塞德曼：《瑞典的警察部队》（Harry Södermann: Politroppene i Sverige），奥斯陆，1946 年版。

胁，可能会招致德国人的愤怒而加强抵抗。这一答复使挪威人大为不满。

在挪威被占领的初期阶段，瑞典红十字会为帮助在德国的挪威平民囚犯所作的种种努力都遇到了简直是无法克服的困难，因为这些努力不属于 1929 年 7 月 27 日日内瓦公约条款范围之内，而德国人对这项公约是大体尊重的。因而，要对这些犯人提供任何帮助，就得完全取决于德国人的善意；瑞典红十字会也试图获得关于政治犯的情况，但这一要求一开始就遭到了拒绝，其理由是：在德国监狱里的所有挪威人都是普通犯人（习惯法的囚犯）。当德国在 1942 年 2 月 1 日拒绝承认瑞典继续代表挪威利益的权利时，瑞典为帮助这些挪威犯人所作的努力进一步遇到了障碍。尽管如此，瑞典驻柏林大使馆仍继续为这些犯人进行努力，瑞典红十字会和瑞典基督教青年会都向这些犯人寄去了装有食品和医药用品等的包裹，红十字会一直为此承担着全部费用，直到名为“支援挪威”的组织接管了这件事为止。1943 年秋天，德国禁止投寄这类包裹，于是在 1944 年夏天就有大约一万五千件五公斤的包裹存放在柏林和德国其他适当的中心区，由瑞典大使馆在犯人中进行了分配。根据挪威白皮书所载，瑞典当局和瑞典公民继续给了他们以最大的帮助，并竭尽全力，使个别犯人免遭处决或获得释放。“但是，”白皮书写道，“当然，不论是挪威方面还是个别瑞典人对这些事情的奔走营救或主动帮助，其结果如何都是不大可能在挪威档案中找到文献证明的。”

在德国集中营里不仅挪威犯人，还有其他国家的犯人被遣送回国这件事上，瑞典所起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无需在本章里加以详述。因为，在挪威白皮书中以及贝纳多特伯爵和瑞典、挪威的一些作家的著作里对此都已有过详尽的论述。在贝纳多特伯爵代表他的政府和瑞典红十字会对德进行的艰难谈判过程中，据说报界始终保持着一种令人钦佩的束制态度，避不做任何评论，以免可能因此触怒德国人而使得谈判即使不致夭折也要更加困难。1945 年 5 月 1 日，贝纳多特伯爵从德国归来能够向政府和红十字会汇报：已有一万五千名犯人（其中七千名妇女）获得了营救。这些犯人大部分是属于挪威或丹麦籍的，但女犯中也包括法国、波兰、荷兰、捷克、英国、美国，甚至阿根廷的公民。

（二）瑞典对丹麦的援助

在丹麦被德国占领的初期，德国人把这个国家当作“希特勒的保护国的样板”，因此，在那个时期，丹麦人并不象挪威人那样迫切需要援助。可是，

《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 3 卷，文件第 582 号。

同上，第 347 页。

见下文，原著第 195 页。

《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 3 卷，第 350 页。

同上书，文件第 547 号以下。

福尔克·贝纳多特：《结论》（Folke Bernadotte : Slutet），斯德哥尔摩，诺尔斯特德，1945 年版。又见《克斯顿回忆录》（The Kersten Me-moirs），伦敦，哈钦森，1956 年版；以及瑞典外交部：《1945 年瑞典派遣到德国的救护队》（1945 ars Svenska hjälpepedition till Tyskland），斯德哥尔摩，诺尔斯特德，1956 年版。

斯文·弗吕克曼：《派往德国的红十字会救护队》（Sven Fryk-man : Roda Kors-expeditionen till Tyskland），斯德哥尔摩，1946 年版；D. A. 塞普：“挪威学生是怎样得救的”（D. A. Seip : “Hvordom de Norske studenter ble reddet”），1948 年 11 月 17 日《瑞典日报》（Svenska Dagbladet）；以及其他作品。

从长远说来，他们对于这种“优待”并不领情，他们的反抗开始越来越激烈，而德国对丹麦的压迫也日益变本加厉起来。从那以后，瑞典便向丹麦和挪威一视同仁地提供援助。1943年9月23日，瑞典获悉：德国人打算把所有丹麦籍犹太人驱逐出境：第二天，瑞典就向德国提出一份正式照会，表示愿意收容那些犹太人，而且，如果德国人有这种要求的话，甚至可以在战争期间把他们拘留起来，从而防止他们进行反德活动。瑞典方面没有得到答复。但是，当得悉那些犹太人已于10月1日至2日夜间接被兜捕起来的消息时，瑞典政府又提出接收全部犹太儿童的要求。这一提议也被置之不理。但是瑞典人终于设法在德国人的许可下撤走了那些同非犹太人通婚的犹太人，甚至一些半犹太人和四分之一犹太人也连同撤出。并且，在丹麦地下运动组织的帮助下，另有一大批丹麦籍和无国籍犹太人也成功地迁徙到瑞典。在有些情况下，瑞典政府给予这些犹太人以瑞典公民权，驻哥本哈根大使馆还发给他们临时护照。瑞典还帮助在丹麦船上建造了适宜的隐蔽处所，这不仅是为了运载这些非法的旅客，而且是为了把那些丹麦抵抗运动所迫切需要的补给品装回丹麦。从1944年8月起，在瑞典当局的帮助下，武器、弹药和炸药也通过这种途径被偷运到丹麦。在10月的上半月内，平均每天有四百二十七名丹麦人或无国籍犹太人都设法逃出了，在特别成功的一两天中，这个数字曾超过一千五百人。到战争结束时，瑞典有一万八千丹麦人。丹麦公使馆为此特在斯德哥尔摩开设了一个与瑞典政府合办的难民事务所。难民的安置费用由国家负担，虽则同时也组织了多次募集私人捐款的活动。1943年12月，应丹麦提出的请求，为五百名丹麦难民组成的一支警察部队进行训练，大体上按照训练挪威警察部队的同样原则办理。这支警察部队的人数不久就增加到三千零五十人。

第八节 战争期间的人道主义活动

必须记住：瑞典虽然逃避了战争，幸免于流血，但它却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分担了因正常的国际贸易关系中断而造成的苦难。早在1940年春季，瑞典便实行了定量配给的办法，当时配给的范围包括除肉类外的绝大部分重要食品，肉类到1941年方才实行定量配给。从1941年开始实行衣物定量配给，直至1947年一直没有间断过。私人用的汽油在整个战争期间始终是无法获得的。由此可见，瑞典是牺牲了自己国内需要的食品而用来向别国提供援助的。

同时，瑞典还与盟国合作，向遭受战祸的其他欧洲国家提供了援助。它把它的船只交给盟国调遣使用，运送食品等货物给希腊，同时负责照料及管理这些补给品的分配。这些船只须得悬挂中立国的旗帜，为此，瑞典红十字会于1942年租用了八艘瑞典船只，载重量共五万吨；其中两艘于1944年在大海中沉没。

从一开始，瑞典的公民和官方组织就渴望能帮助那些来到瑞典的挪威老百姓和流亡者。1940年7月，应设在伦敦的挪威流亡政府的要求，挪威公使馆临时时代办在斯德哥尔摩设立了一个办事处，以沟通国外对挪威的救济工

这一情形在《瑞典同丹麦、挪威的关系》第238—252页及第282—291页中有详尽的描述。

见佩尔·阿耳宾·汉逊关于瑞典对挪、丹援助的概述：《1945年国会常委会议记录：下议院》（Riksdagens Protokollvid Lagtima RiksmotetAr1945: AndraKammeren）：第4卷，会议记录第29号，1945年6月16日。

阿尔内·布约恩堡：《瑞典的紧急措施》（ArneBjornberg：Svenskkrishusha lling），学生会编印的小册子，第463号，斯德哥尔摩，邦尼埃，1944年版。

作；11月5日，又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挪威全国支援会瑞典委员会”即所谓“斯德哥尔摩委员会”，以集中其他团体的救援事宜。这个委员会并不自己出面去募集资金，而是得到了瑞典的一些人道主义组织的协作，诸如救济中心、红十字会、“儿童救济会”、“瑞典北方协会”、“支援芬兰全国委员会”以及其他组织。关于支援芬兰19全国委员会，挪威白皮书曾说到：在该团体所募集的二千七百三十三万零一百八十五克朗的总数中，共有四百万克朗用于挪威人。瑞典国家铁路准许让所有作为赠品寄给挪威的包裹免税运往边境。1941年9月德国国家全权代表特博文解散了“挪威全国支援会”在挪威的活动，“挪威全国支援会”在斯德哥尔摩的分部与各救济组织和挪威之间充当中间人，并在1942年6月20日缔结了一个所谓“捐款人协定”。根据这一协定，成立了一个瑞典—挪威—美国捐款人委员会。该委员会多次提出要在瑞典收留挪威儿童，却一再遭到在挪威德国当局的拒绝；其理由是：这些孩子们在挪威养育得很好，无需到瑞典度假。但问题很清楚。主要原因是德国人唯恐这些孩子会在政治上受到熏染。

英国政府在1941年4月12日的一份照会中虽然原则上同意瑞典把食品送给被占领国家的人民，却又规定供给食品的数量必须是在目前和这些国家签署的贸易协定的范围之内，而且，由此产生的问题应提交伦敦解决。1943年，当瑞典未经事先通知盟国向挪威运送一批蔬菜的时候，瑞典向阿根廷出口的豆类定额就被削减了一倍于它运给挪威的数量。1943年9月以后，这些规定稍有放松。瑞典人民曾受到警告：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不要太大量地向挪威寄送包裹物资，免得遭受被占领军没收的危险，因而瑞典就改在挪威逐渐开设了一些食堂，这些食堂主要是为儿童和没钱的老人开设的。为了筹措必要的基金，另一瑞典组织“瑞典支援挪威会”在瑞典工会联合会（瑞典工联）的鼓励下，和在几个经济、文化组织、红十字会、儿童救济会和其他组织以及三十个工会的协助下，于1942年8月宣告成立。该组织在一个月中就募集了一百万克朗，其中大部分来自该组织内部，但很大一部分也来自私人捐赠。全部行政费用均由瑞典工会联合会负担，而雇主协会则支付巨额的广告宣传费用。据认为必须广泛宣传瑞典支援挪威会的活动情况，因为这样可以防止德国人从中渔利。援助并不仅限于供给食品196和衣物。1943年期间，瑞典红十字会在奥斯陆开办了一所医院，因为挪威所有的医院都被武装部队占用了。这所医院由瑞典提供经费，并受捐款人委员会管辖，但其中工作人员全是挪威人。1945年，德国人在从挪威北部撤退时，对该地区大肆摧残，挪威红十字会请求瑞典让妇女和儿童从这地区经由瑞典疏散到挪威中部和南部。瑞典政府有意答应这一要求，但挪威外交大臣特吕格夫·赖伊却反对这一提议，认为是行不通的；他提议，瑞典要么就地提供援助，要么将这些疏散者收留在瑞典，直到战争结束，那时就可以把他们遣返家园。于

《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3卷，第477—487页。

同上书，第478页。

同上书，第502页。

同上书，第503页。

瑞典支援挪威会：《活动报告》（Svenska Norgehjälpen : En Redogörelse för verksamheten, 1951年8月）。挪威白皮书也以大量的篇幅叙述了有关瑞典给予挪威市民的援助（《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3卷，第475—540页）。

是，瑞典支援挪威会推广了供食办法，有时候仅特罗姆瑟一处每天就有一万二千人得到了食物的供应。

对那些已越过瑞典边境的挪威人提供援助虽然不及对那些在挪威境内的挪威人提供援助那么复杂，但也需要做大量的组织工作。这些难民的待遇是根据 1937 年 6 月 11 日颁布的法律规定，由社会事务部统一管理。1912 年和 1943 年对该法律作了少许的修改。按官方手续说来，对斯堪的纳维亚难民的待遇是加严了，入境签证成为不可少的东西，但事实上，驻扎瑞典边境的瑞典官员授权发放临时签证。同时，瑞典当局还同挪威公使馆开设的难民局取得了合作关系。挪威政府的官方观点是这样的：那些越境进入瑞典的挪威人既然在这一点上已违反了挪威的德国当局所制定的一系列规定，那么他们可以要求被当作政治难民看待。不过，挪威政府也承认有这样的危险：即有个别反社会分子甚至罪犯会潜越国境，因而瑞典政府有权采取措施以防止这种可能性。在挪威偶尔有这样的说法，在对逃亡者的经历进行的初步调查过程中，某些瑞典警察对待他们过分苛刻。这种事例无疑是发生过的，但挪威驻斯德哥尔摩公使馆承认，经过深入查核，所谓苛待难民的那些怨言往往言过其实。另一方面，每逢占领国借口挪威逃亡者犯有普通罪行试图说服瑞典当局交出这些逃亡者 197 时，瑞典当局总是一概加以拒绝的。到了德国人对挪威的占领告终，已有约四万三千挪威人在瑞典找到了避难处。

第九节为战后援助和重建而作的准备

当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在瑞典人中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情绪：瑞典应该竭尽全力帮助重建被毁坏了的欧洲，特别要帮助挪威和丹麦进行重建。1944 年 3 月 10 日，当一个名为国家重建委员会的组织在斯德哥尔摩成立的时候，上述要求便具体表达了出来。该委员会的第一个任务便是估计那些国家需要多少援助，以及在预算中应为此提供多少资金。起先共拨款一亿克朗，但很快就增加到五亿五千万克朗。5 月 1 日，瑞典首相佩尔·阿尔宾·汉逊在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中激励瑞典人民应尽最大努力帮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进行重建。1944 年 6 月，瑞典给予丹麦驻斯德哥尔摩公使馆一笔高达七千五百万克朗的贷款，以供丹麦购买即将于解放后立即运送到丹麦的琳典货物。同年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6 日间，瑞典、挪威两国外交大臣根瑟和特吕格夫·赖伊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了会谈，双方一致同意，为了双方共同的目的，应将大量主要食品在瑞典贮藏起来，同时瑞典政府给予挪威一亿克朗的无息贷款，以此供作这项安排的资金。瑞典在大战期间和战后在救济工作方面所做的全部努力估计共耗费十三亿克朗，或者说约占战争结束前后几年中任何一年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其中将近六亿克朗来源于私人，其余都来自政府拨款。只要考查一下 1939—1940 年间到 1949—1950 年间的概算，便可看出一年用于救济方面的费用从 1939—1940 年间的一百七十三万七千克朗，到 1949—1950 年间增加为六千三百七十四万克朗，1945—1946 年间则达到了最高总额

《瑞典同丹麦、挪威的关系》，第 263 页以下。

《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 1 卷，第 28 页。

同上书，第 3 卷，第 181 页及文件第 447 号，第 214 页。

《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 181—182 页及文件第 447 号，第 213 页。

贡纳尔·塞德斯基厄尔德：《瑞典的背叛》（Gunnar Cederschiold：Sviker Sverige），斯德哥尔摩，大自然与文化社，1943 年版。

三亿零二百四十八万八千四百二十二克朗，而当时还勾销了给予挪威和丹麦的一笔共计二亿克朗的贷款。瑞典国际救济委员会曾多次坚持：在请求政府拨款之前，为某项事业所需要的款项中应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由私人捐献。用于文化方面救济事业的全部费用超过了二千万克朗，其中就有四分之三是由私人捐助的。这笔金额的三分之二系用于重新建造教育机关和医院，重新为其提供设备，以及在挪威对医生和护士进行实际训练和理论指导。芬兰也从非正式的瑞典来源获取了这种类型的援助；瑞典红十字会和儿童救济会还花了将近二百万克朗的代价在德国建造了十二个设备齐全的学徒培训所。在欧洲大陆，瑞典 198 从 1946 年开始对在奥地利和匈牙利以及西德、柏林的学生和教师提供伙食，并延续了许多年。

大部分的救济工作自然采取运送食品、医药用品和衣物的形式。四十多万吨食品就是这样装运到挪威、芬兰、希腊及荷兰的，其中二十六万五千吨是做面包的各物，根据当时实行的定量配给制，这个数目相当于瑞典国内一年需要量的百分之四十。1945 年到 1948 年，瑞典为在挪威、芬兰和其他许多欧洲国家的三十万儿童每天安排一餐热饭，这种救济在其中某些国家一直持续到 1949 年。

到瑞典寻求避难的人数故后还在继续增加，至 1945 年底达到了三十万人左右。这一总数包括从德国集中营救出来的三万名犯人，其中大部分人需要进行治疗，许多人需要送入医院疗养。瑞典政府为照料这些难民和最后把他们遣送回国共拨款了一亿二千五百万克朗。瑞典竭尽了一切可能，替他们重新装备起来，以便开始新的生活。瑞典政府还为他们举办了各种课程以满足他们文化上和精神上的需要。并将瑞典的教科书译成他们所需要的文字。一些资历合格的难民被推荐到政府机关或科研部门供职。他们在那些地方，有机会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并领取和他们同等地位的瑞典同事一样的薪金。为了使在其他国家的大约四百名科学工作者能够迎头赶上在战争年代里他们所从事的专业的发展，政府作了安排，让他们到瑞典参观访问两个月，费用由政府负担。此外，政府还安排了其他课程，让一些主要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人们得以研究一些专业性和社会学问题，以及对教育的民主态度问题。

瑞典还给予其他国家数量十分可观的贷款，这些贷款或则是财政性质的，或则主要是商业性质的。就后一种贷款说来，它最终必然是对瑞典自身有利，因为它的经济前途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国际贸易的迅速恢复。但这样的考虑并不影响到财政贷款。这些贷款中有支援挪威、丹麦和荷兰进行重建的贷款。它们是由瑞典单方面提供给这些国家自由使用而不发生任何物物交换的问题。在多数情况下，对偿还贷款日期都不作规定，这样就不致因需要考虑具体的偿还计划而妨碍重建。至于挪威方面，其主要用于训练警察部队和救济难民的一亿五千万克朗 199 的贷款，则最后经瑞典议会予以勾销了。

另见上文，原著第 197 页。

对于丹麦、挪威期限是五年。

第二章瑞士（1939—1946年）康斯坦斯·霍华德

第一节大战爆发前的对外政策和防御措施

1939年在瑞士是节日年。苏黎世的全国博览会集中展示了瑞士人民的勤劳、效能和智慧。在那些偶尔前来参观博览会并在瑞士各地旅游的客人眼中，瑞士人民正无忧无虑地从事日常的工作，或者熙熙攘攘地涌向博览会和夏季休假日盛行的各种庆祝集会，怡然自得，似乎对面临一场欧洲战争的危险和它位于各交战国之间的险恶地位，无动于衷。然而，这种推论是大大错误的。虽然，瑞士人民作为一个以通情达理著称的民族，仍然希望理智将能取胜，战争将能避免，但是联邦委员会和联邦议会，在得到国民的赞同和支持下，前几年中就采取了若干步骤来加强国家的军事、经济和政治防务以备万一发生战争。

（一）中立

瑞士政府明确表示，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将一如既往奉行国家传统的武装中立政策。1920年瑞士参加国联时，曾一度放弃了它历史悠久的绝对中立，而代之以有条件的中立。作为一个国联成员国，它接受了参加对破坏盟约的国家采取非军事行动制裁的义务。

由于集体安全陷于全面崩溃，例如国联成员国意大利侵略并征服了另一成员国阿比西尼亚，希特勒恣意重新武装莱茵兰并吞并奥地利，使瑞士政府相信它只有恢复200复昔日的绝对中立的政策，才是它避免卷入全面战争的唯一希望。1938年5月14日，国联行政院成员国采纳了瑞士这项决定，同意今后不再要求瑞士参与执行盟约规定的制裁。瑞士政府也急于想得到各轴心国国家对它恢复以往绝对中立地位的正式承认，但德国却迟迟不肯宣布尊重瑞士的中立，它想用此作为一种手段首先取得瑞士政府在有关瑞士—德国关系的各种问题上的让步，特别是关于取缔瑞士报刊的反德情绪以及影响德国国社党组织在瑞士的地位的措施等问题。

1938年6月9日，希特勒对瑞士新任驻柏林公使弗勒利歇尔说，德国决定尊重瑞士的中立；二星期后，瑞士政府收到了德国和意大利政府有关这个决定的正式声明。1939年初通过的一项英法决议宣布，德国对荷兰、比利时或瑞士的入侵都将成为英法宣战的理由。瑞士政府对这一决议的反应显示了它要以绝对的中立来谋求安全的决心。驻巴黎的瑞士公使沃尔特·斯塔基在3月21日接到法国外交部的通知：法国和英国政府将保证他的国家不遭侵犯。他回答道，瑞士并不要求这样一种担保，它自己会决定什么时候需要外

见 A.J. 托因比：《和平会议后的世界》（A.J. Toynbee: The World after the Peace Conference），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26年版，第37—38页。

见《概览，1939—1946年：1939年3月的世界》，（Survey for 1939—46: The world in March 1939），第151页以下。

希特勒在1937年2月23日把这种意思告诉了前联邦院代表舒尔泰斯，他又在2月26日把这顶声明转达给瑞士联邦委员会（《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384号）。希特勒声明的原文见《阿道夫·希特勒演讲集，1922年4月—1939年8月》（The Speeches of Adolf Hitler April 1922—August 1939），N·H·贝恩斯编（N·H·Baynes），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42年版，第2卷，第1349页。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515—526号。

有关这项决议的记述可见《概览，1939—1946年：大战前夕，1939年》，第2编，第1章。

国的援助。英法企图插手西欧各中立国的消息传到了纳粹分子的耳中，德国政府就向瑞士提出这个问题。瑞士外交部长朱泽培·莫塔在4月11日把斯培基3月21日的答复告诉了德国驻帕尔尼公使，并表示他认为斯培基的态度完全正确，而且既然那些关心维持瑞士中立的各大国肯定会在紧急时刻对它加以援助，因此，在任何情况下这类保证都将是多余的。但这并未使德国人感到满意。5月24日，莫塔被告知，两个大国提供这种特别保证和德国关于中立的概念是格格不相入的，瑞士的态度在柏林已产生了一种“非常不利”的201影响。几个月后，在莫斯科举行的英、法、苏会谈期间，保证瑞士和其他小国的安全问题被提出来并成了欧洲和美国报纸的评论主题。7月7日，瑞士联邦委员会发布了一项公报，声明瑞士的中立是绝对的和无可讨论的；但德国仍感到不满。魏茨泽克在7月13日对瑞士驻柏林公使说，他的政府的声明并不十分明确，瑞士必须“恢复平衡”，并“回到中立的正中”。这一外交行动促使联邦政府发出一份照会，由瑞士公使在7月20日递交给魏茨泽克。照会声明，当其他大国宣布一旦瑞士受到攻击将给它提供援助时，联邦政府不曾作任何评论，因为它不愿接受那种只有在侵犯它的中立时才能适用的诺言。政府认为，他们在遇到这类事件时请求外援的权利是不容争议的，但是又强调说，如果第三国未经请求而进行介入，这将被视作是对中立的破坏。同时，瑞士人民也认识到，发表一个没有捍卫中立的决心和力量为后盾的声明只能招致麻烦。1939年3月，在捷克斯洛伐克遭到侵略后，当时瑞士联邦主席菲利普·埃特发表了一篇有关国际形势的广播讲话，谈到瑞士人民捍卫独立和中立的决心。二天前。经济部长赫尔曼·奥布雷赫特曾用更为坚定有力的语调告诫说，任何国家如果袭击或侵犯瑞士的领土和独立，那它就要面对一场战争。3月20日，联邦议会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重申上一年所作的关于全民族决心保卫中立和独立的声明。

（二）军事措施

1933年到1939年间，瑞士全力以赴建立军事防务。这是瑞士和其他一些爱好和平的民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平静岁月里曾忽视过的事情。1933年，当希特勒在德国执政后，瑞士为了增加军用物资的储备，武装并配备它的军队，表决通过了第一批的拨款。武装部总司令鲁道夫·明格亲自周游全国各地作政治演说，以唤起入侵的觉悟，认识到国家重整军备的需要。最初，这曾遭到社会党人和其他左翼集团的竭力反对。

1936年，瑞士通过了一项军队整编的法令，在东北和北部边境及阿尔卑斯战略据点建立了新的防御工事，并对旧的设施进行了加固。为了筹措这项庞大防务计划所需的额外资金，政府在1936年发行了第一批国家防卫公债。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109号，第129号，第181号，第384号。

同上书，第646号。

同上书，第666号。

同上书，第692号。

联邦主席，即联邦议会议长，由联邦议会选出，任期仅一年。

埃特在1939年3月18日的广播声明，（《泰晤士报》，1939年3月19日）。

1939年3月16日在巴塞尔的讲话（同上，1939年3月18日）。

见皮埃尔·贝甘：《欧洲观望》（Pierre Beguin：Le Balcon sur l'Europe），纳沙特尔，巴孔尼埃山出版社，1951年版，第68—69页。

公众响应认购的公债达三亿三千二百万法郎，大大超过了政府所要求的数目。奥布雷赫特在 1939 年 4 月 30 日说，已为国防编制了一项特别预算，并在最近几年里用去了十亿法郎（五千万英镑）。

辅助部队的义务服役年龄从四十八岁提高到六十岁。1939 年初，议会以九十六票对二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延长初期训练的时间，并授权政府继续保留受训部队的服役期限。1939 年进一步授权政府在紧急情况下毋需等待议会批准即可征召军队。

慕尼黑危机期间，瑞士边境上的道路、桥梁和隧道部敷设了地雷，并作了长期戒备的部署。1939 年 3 月，德国在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后不久，曾有一个企图吞并列支敦士登的流产计划，一家法国通讯社在日内瓦的分社也刊载了一则报道，说德国在拉尔贝格集结了七十万兵力。3 月 24 日，瑞士联邦委员会批准了政府征召军队以加强边防警卫的提案；加紧进行了莱茵河边防的工事，并对 1938 年 9 月所布的地雷重新装置。当德国驻伯尔尼公使奥托·克歇尔在 4 月 11 日要求莫塔对此作解释时，莫塔否认这是受某一大国的煽动，并说他们已撤除了部分设施。瑞士的防务体制是为了保持最大的灵活性而计划出 203 来的。当入侵军突破边境防御工事和第二道防线、经过崎岖山区向前推进时，势必遭到扼守着山路要隘的英勇的瑞士民兵的阻击。除了在康斯坦茨湖和日内瓦湖之间的所谓瑞士高原最易受到攻击外，瑞士的地形是不适于庞大的机械化部队或重型坦克及大炮通行的。

（三）经济措施

由于地理环境为瑞士的防卫提供了天然的屏障，瑞士亦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做了各项准备。因此只有出于一种迫不得已的需要，才会使一个交战国值得费力气来啃这个虽小而难吃的果子。从经济上说来，瑞士的地位是脆弱得多，因为它的繁荣是依靠它作为一个国际工场的地位。它幅员狭小，自然资源贫乏，其工业生产所必需的煤、铁和其他原料均须依赖进口，同时还要进口相当比例的粮食来满足人民口粮和牲畜饲料的需求。这些必要的进口物资是用出口优质制成品来偿付的。瑞士也是一个重要的金融中心。在就业的二百万人口中，只有百分之二十务农，而从事工业、商业和金融业的人却占百分之五十二。农业工人的收入仅占整个国民收入总值的百分之九。因此，如果瑞士人民要保持他们的生活水平，关键就在维护他们的对外贸易。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中获得教训的瑞士政府，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就采用了一个限制养牛业和制酪业，以增加各种作物的方案。为推行这

瑞士联合银行：《1939—1945 年间瑞士的经济形势》（Swiss Bank Corporation：The Economic Situation of Switzerland, 1939—1945），1945 年 9 月（无出版地点和日期），第 6 页。

《泰晤士报》，1939 年 5 月 1 日。

《泰晤士报》、《法兰克福日报》，1939 年 2 月 3 日。瑞士的军队是一支民兵队伍。唯一拥有的常规部队是由教导员、军长狮长、一支空军特种兵和另外一支保卫瑞士堡垒的部队组成。凡年在 19—48 岁之间者均有义务服役，初期训练（根据 1989 年法律）为期一百十六天，在以后几年中进行周期性的短期训练。乔治·绍泽尔-哈尔：《瑞士的政治制度》（George Sau-ser-Hall：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Switzerland），苏黎世，瑞士国家旅游局，1946 年版，第 6 章。

《泰晤士报》、《时报》，1939 年 3 月 26 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

瑞士联合银行：《1939—1945 年间瑞士的经济形势》，第 5 页。

项计划而采取的措施，包括 1929 年的谷物条例，这个条例规定了粮食谷物的必要储备和政府对增产的补助。国产小麦的高价得到了保障，并给为自己家用研磨谷物的生产者以奖励。同时还采取措施提高本国甜菜制糖的生产，和限制向国外的进口。尽管 1939 年粮食谷物的产量比 1932 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七，但是每年本国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巨大 204 差距仍有待于拉平。

当战云密布时，瑞士政府就筹划建立一个一旦战争爆发就能付诸实施的全面的战时经济。1938 年 4 月 1 日通过的法令授权政府进行初步必要的准备，这项法令的制定，目的在于“在经济封锁或战争事变中，保证国家对最紧要的必需品的供应……”在以后的十八个月中，依据这条法令采取的措施包括：附有一份土质情况详细分析的可耕土地的农业调查统计以及进一步削减畜牧生产以增加耕作的步骤。根据一项全面的储备计划，进行了对现有必要物资的库存盘点工作，并建立了贮存以应紧急事变。

库存是按不同阶层来进行的。在基础方面，要求进口商手头都要保持一定量的物资储存。1939 年 4 月，要求人民对急需食品保持“铁一般似的”坚实库存以维持两个月的需要。政府宣布，一旦发生非常事件，在实行定量配给制之前，暂停两个月出售这类货物。又公布了一个拟定的配给数量表，同时劝导人民设法贮存其他包括肥皂、蜡烛、燃料和衣着等的必需品。由于公众的购买，零售商和批发商就可补进存货，这转过来促使进口商为了保证他们应有的储备不得不安排进一步的定货。正是通过这些方法，货物的贮存遍及了全国。

（四）政治措施

瑞士为了保卫自由所作的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努力，是那些为了加强国内防线，以抵御外来思想和活动而进行的工作。瑞士的两个最强大的邻国——德国和意大利在独裁者的操纵下所标榜的思想意识和瑞士的观念是格格不入的。但不管怎样，瑞士人民对危险的来源所在是毫无疑问的。尽管提契诺地方发生了纠纷，而意大利又存在领土收复主义，但瑞士人民对墨索里尼的战争叫嚣并不十分在意。加之，他们也意识到在意大利和德国之间保持一个缓冲国是符合意大利的利益的。虽然瑞士人民亦考虑到墨索里尼的观点可能不适于瑞士，但他们很高兴地看到在意大利恢复了正常秩序，遏制了共产主义。对大部分瑞士人来说，共产主义甚至比法西斯主义更令人憎恶。他们对于墨索里尼应有的常识做了过高的估计，以致他们没有预见到他竟会利令智昏地不顾保持欧洲力量均势的一切古老的准则而采取了一种势必使他的国家沦为德国附庸的政策。

瑞士人对待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态度截然不同。他们大多数人对墨索里尼是宽容的；对于希特勒则又恨又怕。大多数团体由于宗教、政治和文化上的理由对纳粹德国是抱有反感的。即使与德国人民享有一份共同文化遗产的

谷物条款是作为联邦宪法的修正案，由民众投票表决通过的。

瑞士在 1914 年粮食谷物的供应只能满足三个月的需要，而据估计 1939 年本国生产量和储藏量至少可满足十二个月的需求。

见 J·罗森：《瑞士食品在战时的发展》（J.Rsen：WartimeFoodDevelopmentsinSwitzerland），斯坦福大学食物调查研究所，1947 年版，第 2 章，第 3 章。

有关于意大利对提契诺的要求和法西斯政权初期在边境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见《概览，1924 年》，第 405—407 页；《概览，1927 年》，第 146 页。

操德语的瑞士人也对希特勒的背叛德国理想极为不满。德国驻伯尔尼公使在1937年11月发往德国的一份叙述瑞士社会舆论不友好态度的备忘录中写道：“大部分的瑞士人反对我们的对外政策和德国国内的事态发展。”他还说反德情绪在边境地区尤为显著，有时且引起激烈的反德示威。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不同，他丝毫也不想迁就瑞士人。相反，纳粹恣意抨击瑞士的组织机构；并试图通过宣传和怂恿在瑞士的颠覆活动来破坏瑞士人的民主政体。

1938年的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加深了瑞士人民在1937年时对纳粹德国的恐惧和厌恶之感。慕尼黑危机期间，德国驻伯尔尼公使指控说，德国侨民受到侮辱，德国商人遭到瑞士居民的抵制。1938年12月1日在和瑞士外交部长莫塔的一次长时间会见中，德国公使再一次抗议瑞士的反德舆论和宣传，并强调如果瑞士政府不能约束新闻界，势将危及德国—瑞士关系。同时，德国报刊也加紧了反瑞士的宣传。德国报纸声称，瑞士报刊对纳粹德国的批评，及瑞士藏匿犹太人、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反对国家社会主义政权者是违背瑞士政府公布的中立政策的。特别是在1939年1月的《国家社会主义月刊》上博克霍夫写的一篇文章，把瑞士的中立概念引伸到超过了政府的言行范畴而包括个人和团体的态度在内，这就使得瑞士政府担心，如果不承认这个扩大的中立概念（人民中立），那么，德国可能认为他们有权无视其所做过的在一切情况下都将尊重瑞士中立的诺言。1939年1月，当瑞士驻柏林公使向德国政府提出这个问题时，魏茨泽克说，希特勒的声明，即德国打算尊重瑞士的中立是一条公认的准则；但是，他又说这不是德国单方面的义务，它的先决条件是瑞士必须保持真正的中立作为报答。魏茨泽克再一次提请瑞士公使注意约束新闻报道对维持良好关系的必要性。虽然莫塔拒绝了柏林提出的订立一个势必限制瑞士报纸言论自由的新闻协定的建议，但他认为，应当采取步骤来制止敌视德国的言论。尽管当局实行了若干限制，德国还是继续进行攻击，瑞士政府不得不在夏季再一次向德国政府提出抗议。

反颠覆活动的问题有着双重性质。对瑞士自由及民主制度的威胁既来自瑞士的德国国社党组织，也来自受了纳粹思想影响的本国团体。甚至在希特勒掌权以前，德国国社党就已开始在瑞士活动。1933年后，他们的活动就成了瑞士政府和人民日益不安的根源，而第五纵队在奥地利和苏台德所起的作用，则使这种不安更加剧了。

瑞士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和附属于它的多种组织如运动团体、学生团体、希特勒青年团、德国少女队及其他等等都直接受德国国内的国社党控制，它们对所有侨居瑞士的德国人施加强大压力，迫使他们参加一个或几个这样的团体。显而易见，这些纳粹组织的目的是有损于瑞士宪法规定的民主，即使不是真的有损于瑞士的独立。不管希特勒怎样矢口否认，许多人依然担心他的目标是要把瑞士并入他的“大德意志帝国”。联邦议会虽曾建议取缔在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507号。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531号。

《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1月3日；《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 Zeitung），1939年1月15日，20日。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534号。

魏茨泽克在1939年5月2日向瑞士驻柏林公使抗议瑞士报纸此任何其他国家的报刊都更为恶意地报道希特勒4月28日的讲话（《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310号）。

瑞士的国社党组织，但瑞士当局却不能采取这一步骤，因为这很明显地会被德国政府视作一种不友好的行动。

况且德国人基本上已是谨慎小心，不使他们的宣传和其他活动越出瑞士法律许可的范围的。瑞士政府唯一可行的就是加强治安法令，密切注视着任何不法的活动。1935年6月颁布了一项保卫国内安全的综合措施。为了确保更有效地对付颠覆性的宣传，于1938年5月27日通过一条法令。为了镇压破坏联邦独立的阴谋活动，1936年10月8日的法令授权政府采取行动来取缔领土收复主义者。这些新的比较严厉的法令使政府得以建立一支联邦政治警察特种部队，行使搜查权，并检查、没收流入国内的颠覆性刊物和取缔从事危险性宣传的报纸。对新闻的控制也是为了防止发表那些可能危及瑞士外交关系的抨击外国列强的文章。德国团体，尤其是学生团体的个别成员被驱逐出境，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停止换发其居住许可证。联邦、州和区的警察之间保持密切的联系。由于他们活动的成果，关于国内国外的国家社会主义组织的情况都积累了大量材料。根据这些材料及奥地利和苏台德的前车之鉴，1938年12月5日又通过了一条法令，以镇压违反公共秩序的行动和捍卫民主。反对这些措施的不只是那些害怕受到制裁的极端分子，其他的一些人亦唯恐如果接受这些措施，那么，瑞士本身就是采取极权主义，而极权主义将有害于他们旨在捍卫的自由。

1938—1939年，国内主要的国家社会主义组织是民族阵线、瑞士极权主义民主联盟和忠诚誓愿同志联盟，他们的领导人分别是托布勒博士、厄恩斯特·莱奥纳特脱少校和赞德博士。瑞士拉丁语区也有自己的团体，主要是民族联盟。虽然这些组织没有一个拥有大批会员，但他们和德国同伙联合起来，其可能捣蛋的潜力是很大的。尽管1935年9月26日的法令禁止外国政治团体同瑞士各政党或者同除由他们本国人组成者外的一切组织发生关系，但在国内与德国组织之间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38年秋进行了一次初步调查，结果取得了充分证据足以使联邦检察官在1939年夏天对忠诚誓愿同志联盟和其他两个国内的国家社会主义团体的领导和成员提出起诉。被告被指控为德国政府和国社党收集包括外国大使馆和领事馆成员在内的有关人士的情报及德国关心的政治和军事情况。许多被告经查明有罪，被判处监禁和褫夺公民权。

第二节 大战爆发到法国沦陷

(1939—1940年)

虽然1939年3月21日公布的苏德条约已发出了危险的信号，但许多瑞士人始终抱着战争可能避免的希望。莫塔在8月30日表示他相信战争不会发生。和他一样，许多瑞士人仍旧希望在德国，比较理智的人将战胜极端主义者，墨索里尼可能再一次成功他说服希特勒接受调停。

尽管如此，政府在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终于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来贯彻早已准备就绪的保卫瑞士的措施。8月28日征集了边境部队，停止了出售粮食。29日宣布全国处于服现役状态，联邦议会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接着，议会授与联邦委员会全权，选出了瓦得州法语区的亨利·吉桑将军为瑞士武

有关第五纵队的活动见瑞士：《联邦委员会和联邦议会关于瑞士人和外国人在1939—1945年间进行的反民主活动的报告》，1945年12月28日（无出版地点和日期），第1编，第3页以下。〔以后简称“报告”〕。

见贝甘：《欧洲观望》，第85—86页。

装部队总司令。

8月31日，联邦委员会通知欧洲列强，如遇发生武装冲突的事情时，瑞士将保持中立。德国公使于五天前拜会莫塔，重申德国保证尊重瑞士的中立。8月31日，意大利公使作了一个类似的保证，答应瑞士可以任意利用意大利的港口进口必需品。9月2日，政府下令瑞士军从进行总动员。在波兰遭到入侵后，接踵而来的是一系列的命令，包括暂时禁止出口，16—65岁的男子和16—60岁的女子有义务参加强制劳动，并由经济部长奥布雷赫特负责筹建战时经济机构。规定由政府控制瑞士的进出口贸易，对任何逃避管制命令的人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还成立了一个由政府代表和工业代表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在苏尔泽委员长（一个杰出的实业家）领导下监督进出口业务。209 为了维护国家安全、镇压间谍活动和管制报纸及其他新闻机构所颁布的法令使军事当局在这些领域中享有广泛的权力以履行他们的职责。

“假战争”期间，给了政府和军事指挥部一个喘息的机会用来巩固和加强瑞士的防务。修订了军事计划，加强了防御工事，对军队进行了紧张训练。由于在瑞士边境附近并未发生什么军事行动，因此9月份动员起来的许多部队得以返回各自的日常工作岗位，但还保留了约二十万名的武装部队。1940年为现役军人制订了补偿方案。为补偿现役军人在工资和其他收入方面的损失所需的资金是从向所有屈佣劳动者和雇主强派捐款并向联邦和州政府筹集得来的。

1939年11月1日第一批发行的定量配给卡只对一部分食品有所限制，且对定量日用品的分配是很充裕的。由于意大利的中立和友谊，瑞士人得以进口了大量的货物来充实他们的物资储备。尽管在战争开始的几个月中进出口贸易都大幅度下降，但随后几个月却飞速回升，特别是进口，不单在价值上而且在实际重量上也超过了往常年份。在这段时间里，和德国的贸易尚少纠葛，因为德国认定采取放宽出口的方针对它有利。瑞士经济上的主要麻烦来自英国，原因是英国的战时经济迫使其拒不履行战前签订的有关奢侈品和半奢侈品的订货合约，也由于封锁关系给中立贸易带来了许多大有影响的限制。经过几个月的三边会谈，终于在1940年4月25日同英国和法国达成了一项全面的战时贸易协定，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封锁对进出口的影响。不过，只有某些种类的货物可以在指定的情况下再出口到敌国或中立国，而其他货物包括贵重原料则必须持有一张保证不将这类货物再出口的执照，才能获准通过盟国的禁运品管制关卡。许多瑞士人相信或希望在西线长时间的寂静意味着双方都不准备最后一决雌雄，德国将不至于冒险直接进攻法国。有些人甚至引用德国入侵远处欧洲边缘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这一事作为这种

见上文，原著第204页。

见《陆军总参谋部首脑作的关于1939—1945年陆军高级将领活动的报告》（BerichtdesGeneralstabesderArmeean denOberbefehlshaberderArmee (berdenAktivdenst1939—1945)），2卷本（无出版地点和日期），附录1，2，第433页以后。

罗森：《瑞士食品在战时的发展》，第70页。

《泰晤士报》，1940年2月3日；《时报》，1940年2月4日，8日。

《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1939年11月19日。

《泰晤士报》，1940年4月27日。另见贝甘：《欧洲观望》，第126—127页和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223页以后。

理论的依据。其他比较不那么一相情愿的人则正确地看到，德国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侵略正是一场暴风雨来临的前奏。无论如何，有两点是再清楚不过的：没有一支常备不懈的防卫部队作后盾，“正确”的中立作为一种保障是无效的；在一个漫不经心或悠然自得的国家里第五纵队的活动是危险的。2月中旬，瑞士联邦议会国民院的议长瓦洛东曾从魏茨泽克得到他的私下保证，德国殷切希望不让瑞士卷入战争，然而这当然不能把它视作一种承诺而寄以任何信赖。4月28日，由1940年的联邦主席马塞尔·皮莱-戈拉和吉桑将军签署了一项公告，指示休假的士兵和公民在一旦敌人进犯时应该做的事情，并告诫人民不要盲从失败主义者的宣传。与此同时，还增强了边防部队。

瑞士人害怕德国在向马其诺防线以北的中立国家发动进攻时，可能企图强行通过瑞士的南端。因此，当德国在5月3日侵入低地国家后，瑞士紧接着在5月10日就对武装部队进行总动员。少年和年老体弱、不适服现役的男子都组织起来成为地方防卫力量以协助打击空降兵和第五纵队。所有重要的战略点和交通要道都布置了警戒。

在提防第五纵队的一些额外防卫措施中包括了对外国侨民实行更严格的控制。5月11日，下令所有拥有火器的外国人都要立刻把武器上缴警察局。

5月20日，司法部和警察又奉命立即驱逐所有“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出境。5月28日的一项联邦法令将刑事军事法典中的规定扩大适用于在服役期中的平民。这表明，迄今为止仅适用于战时的死刑将同样用于犯有进行叛国、间谍、破坏活动罪行的人和散布假消息的造谣者。

5月14—15日夜晚，当入侵被认为迫在眉睫时，瑞士人的恐慌心理达到了顶点。大批德国部队在瑞士北部边境的黑森林中集结。虽然瑞士军队在吉桑将军的鼓舞下，照常沉着镇定，但在平民中间相当广泛存在着惊恐不安的情绪。在北部城镇，在庸人自扰的谣言和失败主义者的宣传影响下，引起了成千上万的人仓皇出逃，到南方各州和伯尔尼州的奥贝兰去寻找安身之所。战争爆发以来这些地区的旅馆和公寓的外国光顾者逃跑一空，现在则又被从巴塞尔、苏黎世和伯尔尼纷纷逃来的人挤得满满的。

第三节 在希特勒欧洲中的瑞士

(1940—1944年)

(一) 瑞士对德国胜利的反应

意大利的参战和法国的投降完全改变了瑞士的形势。除了一条由日内瓦通往法国未被占领区的狭窄走廊之外，瑞士完全处在轴心国本土和其占领区的包围中。不言而喻，它奉行独立自主的经济和外交政策的可能性是有限的。大不列颠不久也可能被击败或被迫投降，听凭一个得意洋洋、胜利在握的德

见贝甘：《欧洲观望》，第139—140页。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610号。魏茨泽克对瓦洛东强烈表示，当他私下提到这项保证时，决不能作为一种正式“声明”加以引用。

《新闻纪事报》(News Chronicle)，1940年4月19日。

《每日邮报》(Daily Mail)，1940年5月15日。

《纽约时报》，1940年5月12日。

《泰晤士报》，1940年5月29日。

见亨利·吉桑将军：《1939—1945年联邦议会活动报告》(General Henri Guisan: Bericht an die Bundesversammlung über den Aktivdienst 1939—1945)，第27页，第203—204页。

国随心所欲地巩固它对欧洲的统治。在这种形势下，那么，有一部分人觉得瑞士应该改弦易辙，调整它的政治和经济，以便在希特勒的新欧洲谋取一个较有利的地位，是不足为奇的了。1940年夏季的几个月中，公众和报刊都对更新和调整瑞士的制度和政策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议论。6月25日，皮莱-戈拉在对人民的一次广播讲话中提到了经济调整的必要性。他告诫他的同胞将必须接受他们在生活上的改变。他们应该放弃安乐享受，更加团结。另外，政府今后将不可能再把它决策向公众解释理由。皮莱-戈拉多少有点模棱两可的讲话后来成了许多人批评攻击的目标。自然，要判定他真正的意图是困难的，但可以肯定，他的话并不是在这一场合所需要的鼓舞人心的号召。

古代瑞士爱国者号召人民起来用生命来捍卫独立的这种历史性任务落到了吉桑将军的肩上。吉桑受到军民的一致爱戴。7月25日，他在吕特利草地上召集了一次高级军官会议。在激动人心的讲话中，将军呼吁大家丢掉失败主义情绪，要有不屈不挠的抵抗决心。吉桑相信，即使军队不得不撤离到山中据点，把城镇和村庄放弃给敌人，瑞士一定能拒不投降也决不会投降。为了这一目的，以哥达、扎尔甘所和圣草里斯等天然堡垒为基地建筑了一座“民族碉堡”。各级军官把有关最高指挥部的抵抗计划逐级传达给士兵，并由参谋部的“军民联络处”传达给平民。

设立这个部门最初是为了鼓动军队的士气，但它的工作范围后来扩大到包括组织讲课和情报课程对平民进行教育。虽然最终并未号召瑞士人民在屈膝投降和不惜牺牲他们的大部外国土继续抵抗这两者之间作出严峻的抉择，但是不借任何代价抗战到底的决定大大提高了全国的士气。决心抗敌的意志和高昂的士气对维护国家政治主权的完整是十分重要的条件。为胜利所煽动的天生狂妄自大的纳粹分子，他们的气焰愈益嚣张，认为无法再容忍这个处于他们新欧洲心脏的民主中立的蕞尔小国。他们强烈攻击瑞士大报纸夜报道英国战役中有所偏袒，纳粹报纸声称这是瑞士明显地违反中立。德国人所指责的一事就是瑞士把英国的作战公报与德国的公报并列发表。瑞士报刊被禁止刊登敌视甚至带有不适当批评性质的文章和评论，因为这都可能导致对德关系的进一步紧张。

尽管瑞士为了安抚轴心国家，限制了言论自由，但德国和它的意大利同伙仍然是心怀不满。意大利参战后，德国报纸声嘶力竭的叫嚷与盖达、法西斯报纸、电台调门更尖的漫骂此呼彼应，表明他们对任何认为意大利武装部队在巴尔干半岛和非洲并未取得完全胜利的暗示是格外敏感的。

1941年夏季，德国入侵苏联后，轴心国家鉴于瑞士虽厌恶共产主义，但它竟未能被说服改变其中立立场，加入德国现在把它称作征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圣战而深感失望。一位作者在1941年6月的《巴塞尔新闻》上恰如其分地表达了瑞士的态度，他写道：反对苏联的战争并不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圣战，至多不过是一次冒险的战争。当着瑞士人民决心维护他们的政治独立，保卫中立时，政府不得不对德国和意大利作出了一些让步。例如，他们接受了德国的要求，交出在法国被击败后属于被拘留的波兰和法国士兵的军用物资。1941年春天，瑞士联邦委员会向英国政府提出正式抗议，要求停止对瑞士的

《巴塞尔新闻》，1940年7月29日。另见贝甘：《欧洲观望》，第171—176页；吉桑：《联邦议会活动报告》，第37页以下，第210—213页，第217页以下。

《曼彻斯特卫报》，1940年8月27日。

新闻简报广播。同意在瑞士实行灯火管制是对轴心国的再一次让步。迄今为止，瑞士从未中断供电。这不仅是作为一个中立国家应享的主权，而且城镇和乡村的照明能使交战中的飞行员辨明中立国的疆域，使它避免误被轰炸。可是从1940年夏季起，仍有英国轰炸机多次飞越瑞士领土，空袭意大利北部的城镇。而且尽管瑞士政府频频提出抗议，英国飞行员依然不断侵犯瑞士的领空。意大利人指责瑞士的照明不公道地为英国轰炸机机员寻找意大利北部的目标提供了方便。

1941年7月，联邦政府感到有必要颁布一项命令将某些法律付诸实施，借以防止发生侮辱外国使节或政府首脑、国旗、国徽，甚至由于国籍关系侮辱外国人的事情。违法的人将受到荣押或罚款的惩处。在同一月中，一位瑞士代表出席了一次由轴心国控制的国际电影协会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阻止放映协会某些成员所不欢喜的影片。宣布瑞士代表在协会章程上签字一事遭到了许多人的批评，随后政府就加以否认。

（二）与第五纵队作斗争

瑞士故国家社会主义分子被德国的节节胜利壮大了胆子，企图向政府施加压力允许他们自由无阻地继续进行活动。1940年9月10日会见了皮莱-戈拉主席以后，瑞士国家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发表一份公告说，会见结果表明双方已朝着圆满解决瑞士政治问题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这项声明立即激起了公众的义愤。虽然皮莱-戈拉解释说他没有授权公开他的名字，而且这次接见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了解情况，但许多人都批评他所采取的是一种姑息政策。1940年11月15日，国家主义者发表了三天前写给皮莱-戈拉的一封信，要求保障他们继续宣传他们新的政治和社会观点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集会自由，撤销对他们出版刊物的禁令，以及释放前被捕的成员并发给赔偿金。这次，联邦政府的回答非常明确。9月19日，政府命令解散这个团体，取缔它的报纸，严禁以任何别的名义重新组织起来。违反这条法令的人将受到军事法庭的审讯。同时遭到取缔的还有类似的组织，共产党也在其内。

在发布解散国家主义运动命令时，它大约拥有二千二百二十个国家主义分子，分散在一百六十二个城镇和乡村中。这个组织在五个月前刚刚成立。它是那些先前被取缔或由于受到警察的虎视眈眈，认为自行解散是上策的那些组织的后继者。它的追随者是那部分以前并不属于极端主义者集团，但看到德国胜利在握，认为瑞士最好能同战胜者结盟的人。1940年底对国家主义运动和其他组织采取的行动当然并不意味着国家社会主义在瑞士活动的结束，特别是1941年，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和它在瑞士的追随者都把德国的胜利看作是势所必然的事，根信剩下要做的事只是去摘取胜利的果实罢了。不过，这些行动却实际意味着，他们只能在新的秘密组织里或者通过其他暂时还未受到政府取缔的“更新”组织进行非法活动。

他们的目的是用暴力推翻政府，代之以极权统治。但是对于瑞士在新欧洲应立足于何处的问题，他们的看法有分歧。尽管大多数人深愿在德国的庇护下，欧洲能改组成为一个日耳曼民族的联邦，而让那些在边缘的国家在本

《新苏黎世报》（NeueZurcherZeitung），11月6—7日，《纽约时报》，1940年11月7日。

《每日电讯报》（DallyTelegraph），1941年1月30日。

《新苏黎世报》，1940年9月12日。

《纽约时报》，1940年11月16日。

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政府控制下享有一些政治自治权，但也有一些人希望看到瑞士并入大德意志帝国。在德国也存在这两种分歧的意见。1941年，一个处理有关日耳曼民族问题的组织党卫军司令部日耳曼民族指导部，是由瑞士出生的弗朗茨·里德韦格博士负责的。他就是第一种所谓组织解决办法的鼓吹者。德国驻苏黎世领事馆的艾什顿博士和格罗勃尔博士是其在瑞士的主要联络215代表。

早在1941年，里德韦格就委托一个瑞士的国家社会主义分子比埃莱在瑞士组织一个类似德国党卫队的准军事部队。同时，在一个瑞士的德国侨民施泰格的领导下，由格罗勃尔组织了一个新的秘密社团，良称为“德国的朋友”。这个社团的成员在全国各地，组成为小组织。他们在未接到德国发出信号之前，是不得采取什么公开行动的。这些国内组织的种种活动，暗中都受到了瑞士当局的严密监视。在1941年6月的一次大搜查中，警察逮捕了一百三十一人，被控诉的一些人受到联邦和军事法庭的审判。到1941年底。颠覆活动虽然继续发生，但这些国内组织的骨干力量全被粉碎了。一些最活跃的人被逮捕或监禁，其余则被拘留或逃到德国避难。再有那些虽未牵连到叛国和背叛罪行之中、但涉有嫌疑的分子，由于受到密切监视，他们潜伏的危险也大大地受到了限制。

在战争年代中，瑞士政府面临的一个更为棘手得多的问题是如何控制瑞士的德国侨民中高度组织起来的第五纵队。战争爆发以后，德国人积极努力来扩大他们在瑞士的这些组织的规模和效力。战前，虽有来自祖国的压力，但也只有极少数德国侨民参加了这些纳粹组织中的一个组织。1939年和1940年在德国取得胜利后，登记入会的人增加很快，而且有增无已。虽然增加的速度逐渐减慢，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2年。许多人是在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感的动机鼓舞下参加到纳粹队伍中来的，而其余的则是为了通过表示对元首的忠诚和支持来保障自己的前途。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德国对于这支第五纵队的重视。在战争爆发后，相对说来只有很小一部分留居瑞士的德国人被征集到德国军队服役，而在这些人中也只有很少几个是知名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工作人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热忱的纳粹分子后来从前线撤回，被派到瑞士的党组织中担任了重要的工作。

川流不息的代言人从德国涌向瑞士，在数不胜数的集会和会议上开导和激励他们的同胞。随着德国国社党216组织成员的扩增，这种集会的次数日趋频繁，规模也日益扩大。瑞士政府无法禁止这种集会，只得就力所能及管理它们。1940年7月，根据通过的一条法令，凡组织政治集会的人必须取得瑞士当局的批准。可是德国人并不情愿接受这些对他们的活动和演讲的束缚。他们照样举行未经批准的集会，而演讲的人也信口开河，超出限定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最直言不讳的宣传鼓动者被撤销允许他们在集会上讲话的权利。1942年10月4日由省长博勒主持的一次规模特大、挑衅性特

后来主张瑞士并入德国的德国人似乎占了上风，瑞士应当失去独立，成为德国的一个省（见《报告》，第83—90页）。

格罗勃尔博士是一个冲锋队大队长，他在德奥合并前，在奥地利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报告》，第122页）。

关于瑞士国家社会主义者在战争后几年的活动，见下文，原著第220页。

有关瑞士极端主义者的活动见《报告》，第2编，第2章，第53页以下。

强的集会，激起了瑞士公众极大的愤慨，因此联邦委员会禁止外国组织今后举行大型集会。可是德国从这时起正转向防御阶段：虽然德国仍然主宰着欧洲大陆，但越来越可能的是，这种统治将不会长久保持下去了。

在整个战争中，瑞士人民还必须同间谍、破坏分子和告密者的活动作斗争。德国情报机关精心组织了一个遍及整个瑞士的情报网。它的要害地点是设在德国公使馆和领事馆。在那儿，最高统帅郎的国外情报处和党卫队保安处为这项工作安插了特务人员。德国人既利用叛国的瑞士人，也利用留居瑞士的德国侨民，但一般主要的特务是从德国国内派遣去的。此外，为了获取详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情报，通过合法和非法的途径把特务派入到瑞士。所搜集到的情报则凭借外交信使传递到德国，但也利用秘密的无线电收发机和使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把文件、计划和照片偷送出国境。瑞士当局无法采取坚决的行动来对付在公使馆和领事馆中进行这些活动的唆使者，因为他们享有外交豁免权，同时也害怕因此惹恼德国。

（三）经济上的调整

除了少数狂热分子和失败主义者外，瑞士人民是决意维护他们政治上的独立的。尽管如此，在经济方面，他们却不得不更加紧密地同希特勒的欧洲合作。法国沦陷后，轴心国实际上控制了瑞士所有的商品进出口通道，所以瑞士的经济完全要受轴心国的摆布。在1940年8月9日达成的一项贸易局协议中，德国同意供应瑞士一定数量的原料，其中最重要的是煤和铁。作为交换条件，瑞士工业必须供应德国在其作战中所需要的货物，并为它和意大利交换货物提供运输便利。另外，瑞士政府被迫缔结了一项汇划结算协定，允许给德国贷款一亿五千万瑞士法郎及由德国控制它的出口物资。只有在一张经严格限制的货单上的货物才可以不需要德国的通行证出口。

在以后的几个月中，为了迫使瑞士加紧密切同德国的经济联系，德国又进一步向瑞士人施加压力。当他们表示不肯屈服时，德国人就威胁要中止煤和铁的供应，吊销允许瑞士进行有限的出口贸易的执照。1941年春，德国一度将这一威胁付诸实施，吊销了一些出口执照。面对这种压力，在与德国达成的一项新的贸易协定中，瑞士政府同意将1941年2月德国的结算信贷增加到三亿一千七百万，7月再增加到三亿五千万瑞士法郎。

英国政府对瑞士向德国在经济上让步做出的反应是加强了对瑞士的封锁。法国沦陷后，由于1940年4月双方缔结的战时贸易协定在事态演变中已经失效，瑞士贸易部长凯勒博士为了商谈一项工作协议访问了伦敦。

瑞士代表申辩说，允许瑞士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将是对英国有利的，否则它将不可避免地要完全陷于德国的经济控制之下。可是，不难理解，英国是不愿意允许瑞士通过轴心国控制地区进口货物的，因为，这些货物很可能

有关德国第五纵队的活动见《报告》，第2编，第1章，第28页以下。

另见下文，原著第220—222页。有关间谍、破坏分子和告密者的活动，见《报告》，第2编，第4章，第102页以下和《总参谋部首脑的报告》，第473页以下。德国当然不是唯一在瑞士境内进行谍报和宣传活动的国家，但是其活动的范围和企图是和别国不同的。事实上，德国是唯一直接威胁到瑞士独立的国家。

《新苏黎世报》，1940年8月12—13日。

《泰晤士报》，1940年10月9日。

虽然战时贸易协定已不再符合现实情况，而且事实上双方也都不再承担义务，但是在7月，双方还是一致同意暂不废除这个协议，而保留它作为今后联系的基础。

被轴心国劫走。他们还生怕德国会对瑞士施加压力，迫使他们交出为自己使用而进口的货物。经过长时间的商讨，终于在 1940 年 10 月 15 日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者，英国同意当瑞士的库存不超过只二个月的需要量时，即放松封锁，以便让瑞士进口一些必要日用品。但 218 是，假如日后发现瑞士屈从于德国的压力而把进口货物再出口，或者货物在途中被意大利或维希政府截留，这项特许权就要作废。英国还同意再发还一些在法国沦陷后被英国扣留的瑞士租赁的船只，并允许用它们通过意大利港口装运煤、铁和粮食。但由于 1941 年瑞士对德国做出进一步的让步，英国就加强了对它的封锁措施。

在国内，瑞士政府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步骤以谋解决今后面临日益增长的不可避免的匮乏，并使它能保持一定程度的经济独立。在法国沦陷后，瑞士对食物和燃料实行了更加严格的定量配给，它还采取了定量配给措施借以保存现有储藏物资，减少消费，及大幅度地增加国产食品的数量。政府的战时农业政策是以一位第一流的农业学家 F·T·瓦伦制订的综合性计划为基础的。这个计划在 1940 年 11 月 15 日由它的设计者在对瑞士农民协会的讲话中公布于众。假如由于战事的发展和经济封锁瑞士需要自给的话，那么瓦伦的计划就是为了使它能以实现这一目的。瓦伦精确地核算了人们所需消耗的热量及利用本国土地资源来满足这些需求的方法。要达到自给，就须大幅度增加粮食谷物、糖和植物油的生产，并严格限制家畜的饲养。虽然并没有发生必须要严格地实施这个计划的情形，但它对于在战争余年和其后果中所采取的步骤起了很可贵的指导作用。耕地的面积逐渐增加了。1941 年 10 月又公布了一项法令，勒令所有非农业居民都要种植自用的土豆和蔬菜，各区将为之拨出一部分土地。随着耕地面积扩大而需要的额外劳动力，和由于服役而被抽走的大量人力则通过征集志愿的和义务劳动的人来补充。

虽然随着战争的发展和进口的逐步下降，某些食品，尤其是脂肪、油类和糖的供应日益短缺，但是多亏政府富有远见的政策，使瑞士人民尚能维持一个相当过得去的饮食水平。

到 1942 年，几乎除了土豆、其他蔬菜和水果外，所有 219 食品都实行定量配给。迄今所有各类居民一律实行相同的配给，只在 1942 年 7 月 1 日才改行有区别的配给。

（四）瑞士对战争扩大化的反应

将近 1941 年底时，在瑞士一种焦虑不安和灰心丧气的情绪与日俱增。德国对俄国的夏季攻势和德军部队在东线的集结暂时解除了武装入侵的危险。到 1941 年底，瑞士动员起来的兵员从 1940 年夏季的五十多万减少到约七万一千。没有人知道战争将在什么时候结束，怎样结束。与此同时，瑞士人民不得不忍受一个国家在战争状态下的许多不便，包括食物和燃料的缺乏、夜间的灯火管制、政府对他们日常生活的控制和干涉，但又得不到象一个交战国人民那种激昂慷慨的精神上的补偿。这种灰心丧气的情绪明尿地表现在人们中间的相当广泛的不满以及社会党和独立的党派对政府的批评的加剧上面。他们抱怨在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缺乏联系，致使彼此互不信任。

《金融报》，(Financial News) 10 月 16 日，《每日电讯报》，1940 年 12 月 7 日。瑞士同英国和德国协商的报道见贝甘：《欧洲观望》，第 187 页以下，和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 585 页以下。

见上文，原著第 77 页。

1941 年底，美国和日本相继参战从而使交战双方列强的均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虽然 1942 年底，德国的胜利势头刚刚开始衰退，但它对俄国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加以它的新对手美国又有无穷潜力——尽管大部分尚未发挥出来——已可很清楚看到战争将旷日持久地继续下去。而且，当前形势对德国的最后赢得胜利也开始变得不利了。不过，与此同时，美国的参战却给瑞士增添了不少困难，特别是在经济方面。瑞士的问题在于如何在希特勒被迫放松其对欧洲的控制前，维持它的中立和政治独立。瑞士国家这只船在惊涛骇浪中航行，如果要想在狂风暴雨平息之前完整地幸存下来，需要高度的技能和谨慎。它必须见风使舵，并在紧急情况下抛弃掉它船上的一些货载。它还须给瑞士人民惯于珍视的权利和自由加上新的束缚。

新主席菲利普·埃特在 1942 年 1 月 1 日的一次对全国的广播讲话中，呼吁人民在工作中要发扬遵守纪律和与政府密切合作的精神。埃特说，联邦和州政府的一切政策和活动都是旨在保证食物的供应和人民的工作，使国家能够在这风雨如磐的年代里自由和光荣地坚持下去。但是许多人感到政府正在努力设法避免开罪于德国方面，不必要地做得太过分了。1941 年 7 月和德国缔结的贸易协定在议会中遭到了强烈的批评。新教牧师和左翼分子尤其激烈地抨击了政府的政策，指出，对德国的一味恭顺并未使其他中立国家在德国认为有利向其进攻时幸免于难。他们说政府的检查政策、专断独行和针对团体和个人的法令以及专靠法令来管理国家的日益增长的趋势正在破坏人民的团结，而这种团结恰恰是他们如要坚持到底的话所不可少的条件。其余的人则拥护政府的立场。他们反驳说，恢复自由将只能给反民主分子以可乘之机。维护对外的自由比维护对内的自由更为重要，因为恢复国内自由要容易得多。

1942—1943 年一些案件审讯的结果表明保持常备不懈和采取专断措施是必要的。几个被告，包括瑞士军队中的军官和其他军衔的人，犯有把机密出卖给德国的罪行，他们被判处死刑或监禁。第一次死刑是在 1942 年宣判的。1942 年 8 月 4 日联邦委员会通过一项法令以强化现行的各项条款，防止有损于国家安全的行动，并更严厉地惩处那些违法的人。条款还规定允许在监禁的判决中附加预防性的拘留。后面的条款是为了防止瑞士国家社会主义分子扩大其力量。这部分人是听从德国的指挥，他们的活动包括在瑞士发表和散发宣传叛国的文件，征集支愿者组成一支瑞士党卫队与德国军队并肩作战及：进行一种迫使住在国外的瑞士侨民加入纳粹阵营的运动。早在 1943 年，政府就采取了一个额外措施来对付国外的瑞士国家社会主义者。当时发布了一条法令授权司法部和警察，如发现在国外的瑞士人犯有严重损害国家尊严和政治经济独立的行为时，得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在国内，更多的国家社会主义性质的团体则遭到了取缔。

（五）来自德国的新威胁以及时 英美关系上的一些困难

无论如何瑞士此时还不能采取激烈行动来对付叛国 21 活动的总根源—

《新苏黎世报》，1942 年 1 月 2 日。

在战时由军事法庭宣判的案件中，有十九人被判处死刑，三十二人无期徒刑。

《新苏黎世报》，1942 年 8 月 4 日；《报告》，第 68—69 页。

关于德国的瑞士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活动，见同上书，第 81 页以下。

——在瑞士的德国组织和公使馆。盟国的节节胜利并不意味着欧洲被占领国家和中立国的地位即时有了改善。恰恰相反，它只更加加强了希特勒控制欧洲的决心。还存在的中立国家又受到了更严重的威胁。因而，纳粹报纸在 1942 年公开提醒瑞士说它本来就是德国的一部分。瑞士的态度被比作一条癞皮狗的态度。此刻，德国人在百忙中还没有余暇来顾及此事，但是稍后，他们将着手对付在欧洲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局外人。戈培尔说，瑞士和瑞典对它们民族的安全和未来的生存缺少最基本的认识。希特勒提到在战争中不能幸存的资产阶级国家。德国外交部的新闻司长保罗·施密特以威胁的口吻警告那些强硬的瑞士编辑和新闻工作者说；在德国占领瑞士后将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或加以消灭。他还用俾斯麦的话来提醒瑞士政府，“政府时常必须为它们的新闻记者所打碎的窗玻璃付出赔偿。”1943 年，瑞士政府有理由担心德国的威吓将可能真的变为行动。迄今为止，希特勒虽然也因瑞士继续保持独立和中立而大不耐烦，但很明显，从侵占和征服瑞士所能攫取的好处是得不偿失的。德国人知道，任何进攻将遭到瑞士人民的坚决抵抗。他们防卫的第一步就是炸毁圣哥达和辛普龙隧道，而这两隧道是德国把物资和武器运往意大利的主要通路。修复隧道的工作，即使在顺利的条件下也是一个旷日持久的工程。隐藏在山区地堡中的瑞士军队可以开展游击战进行骚扰，这会使修复隧道工程给征服者带来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此外，瑞士的经济和金融主要的资产也将全部摧毁。既无原料和剩余食品的战利品可资补偿，一个破坏无遗、贫乏枯竭的瑞士将是一个负担而不是资产。然而在 1942—1943 年，一种新的考虑使德国人相信，这些不利条件比在他们准备保卫的欧洲堡垒中存在一个独立国家的危险可能还是略胜一筹。德国人害怕一旦盟国侵入欧洲时，同情他们的瑞士人会允许他们自由通过它的领土。联邦政府从瑞士军队情报 222 处得知了德国最高统帅部正在考虑一个预防性的占领计划后，重申了它的保证：瑞士将捍卫它的中立，抗击一切来犯者。同时，吉桑将军和德自党卫队的司令官舍伦贝格于 1943 年 3 月在埃门塔尔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显然，吉桑将军成功地使舍伦贝格相信，瑞士决心在任何情况下捍卫中立，因为在这会议后不久，瑞士就获悉德军最高统帅部已决定放弃这个方案。

虽然对瑞士中立的主要威胁来自德国，但是它同对立阵营的关系也不是融洽无问的。尽管几度向英国和美国政府提出抗议，盟国空军还是继续侵犯瑞士的领空。1943 年 7 月，英国和美国政府请求瑞士政府拒绝收容墨索里尼和其他要求避难的属于“战犯”的重要法西斯分子。盟国说，收容他们的行为是不符合联合国为之而战斗的原则的。瑞士认为，如果默认了盟国的要求就是同意削弱它的主权独立，也就是和中立政策不相容的。在他们的答复中，瑞士政府声明，假如有必要为政治避难问题作出决定时，他们将遵循公

见上文，原著第 213—216 页。

《每日电讯报》，1942 年 6 月 4 日。

1942 年 9 月 8 日在体育场的讲话，（《人民观察家报》、《法兰克福报》，1942 年 10 月 2 日）。

《芝加哥每日新闻》（ChicagoDailyNews），1942 年 10 月 17 日。

见贝甘：《欧洲观望》，第 251—252 页；吉桑：《联邦议会的活动报告》，第 49—53 页，尽管希姆莱和党卫队急于想向瑞士开战，但遭到了希特勒的经济顾问和德国将领们的反对（《陆军总参谋部首脑的报告》，第 18 页）。

认的国际法原则办事。不过这些毕竟是些小波折。经济关系方面的困难则是严重得多而且长期不能解决。作为一个中立小国，瑞士的处境日趋艰难。盟国日益强大的力量使他们得以加强其反德的经济战。他们越来越不愿容忍瑞士对敌国的援助。1941年夏季以后，盟国对瑞士施加经济压力的经过情况在前一章中已有一些详细的记述，这里就不需再重复了。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尽管曾发生过一些困难，但盟国对瑞士的要求并没有象对其他一些中立国家的要求那么苛刻。他们意识到有必要避免提出极端的要求，否则将可能导致外交上的破裂，甚至会促使德国进攻瑞士。瑞士既承担了作为盟国在轴心国权益的外交代表的职责，而且通过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它还负责照管在轴心国家里千百万战俘的福利，因此，瑞士的独立对盟国²²³是极可宝贵的。何况瑞士还是欧洲大陆中心留下的唯一对外开放的窗口，盟国通过他们在伯尔尼的公使馆可以获得有夫德国的宝贵情报。

(六) 瑞士对战后欧洲的看法

1942年期间。纳粹胜利的前景已趋暗淡，于是那些“更新”和“调整”的鼓吹者失去了市场，这并不全是出于政治策略和机会主义的原因。对许多瑞士人来说，建立一个更有秩序、更为团结的欧洲的想法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作为由三个操不同语言的不同民族组成联盟这样一种国家的瑞士人民，认为上述想法在更大范围内行之于欧洲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希特勒在欧洲的言行清楚地表明他所设想的那种统一不是他们甘愿接受的一种统一。瑞士改组欧洲的概念是建立一个其各成员国能比较自由地进行贸易的自由国家的联盟。而纳粹的由德国一个主宰种族来统治一些劣等民族的概念则不是酷爱自由的瑞士人所向往的。同样，纳粹关于改组欧洲经济的计划也是不得人心的。德国设想的计划是，把工业集中在出产必要原材料的地区，而那些不具备这些有利条件的国家，象瑞士就得转而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纳粹对待占领区人民惨无人道的残暴行径排除了他们在战争结束时他们能心甘情愿地同德国进行合作的任何希望。

1943年瑞士对于建立欧洲新秩序的专心致志的关注大都转移到对盟国胜利后解决战后世界问题的推测上，虽然他们认为战后的前景总比纳粹的胜利要好得多，它在瑞士人的眼中并不显得特别美妙。德国人的残暴行径所遗留在人们心里的仇恨可能会带来比凡尔赛和约还不满人意的和平。盟国设计的未来的世界组织是一个由强国控制的组织，而珍惜独立的小国很少有发言权。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瑞士对将由英、美、苏统辖欧洲的前景并不热心。而且，一般说来，瑞士对于美国和英国认为苏联将会向民主转化并以一个抱合作和守法态度的国家跻身于战后欧洲所寄予明显的信任也有不同看法。担心俄国会企图使欧洲布尔什维克化的思想依然存在。瑞士²²⁴对苏联政府究竟在准备放弃他们的领土和意识形态上的扩张主义以及同西方大国合作方面走得有多远满腹狐疑。只是在1943年11月底的德黑兰会议后，他们对于苏联和英美之间有可能达成战后协议一点才稍微乐观一些。尽管如此，他

见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61—1362页。关于避难权问题后来的进展，见下文，原著第225—226页。

见上文，原著第76—81页。

见贝甘：《欧洲观望》，第244—247页和253—256页；赫尔：《回忆录》，第2章，第1349—1350页。

见上文，原著第211页。

们还是不能无视欧洲将会被分成两个互不信任的势力范围这一可能性。瑞士人作为一个中立国家的人民，虽然并不象盟国的人民那样轻于相信苏联将真心转变的说法而受蛊惑，但也不是对引起这种希望的激情无动于衷。1943年秋，瑞士的选举标志着它明显的向左转。社会党获得了十一席，他们要求，并第一次在联邦委员会中获得了一个席位。主要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党比其他政党更倾向于相信苏联政府的道义。它的党员尖锐地批评联邦委员会对德国的绥靖政策，并抱怨政府把紧急时期的权力更多地用来镇压左翼团体而不是用来对付右翼极端主义者。在对外关系上，这个党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瑞士和苏联之间建立正常关系。

第四节 欧洲的解放及其后果

(1944—1946年)

(一) 瑞士同西方国家的关系

1944年夏季，盟国期待已久的对欧洲大陆的大举反攻已经成熟，这时瑞士被禁铜在希特勒欧洲内的日期已屈指可数了。但同时，眼前的困难问题既未消除，新的忧虑又接踵而来。随着战斗再一次向瑞士国境逼近，他们生怕撤退或前进的部队会侵入他们的领土。甚至在盟国地面部队到达以前，瑞士也未能免于受到军事行动的影响。自从法国沦陷以来，意外事件屡见不鲜。先是英国，后是美国的空军曾搞错目标把炸弹投在瑞士的领土上，造成破坏和伤亡。1944年间，这些失误在次数和程度上都加剧了。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1944年4月1日由一支美国解放者空军编队对沙夫豪森的轰炸，把这个城镇的大部分地区都毁坏了。9月，瑞士战斗机在白天打信号命令美国轰炸机着陆的时候遭到了袭击，火车遭到机枪的扫射。

瑞士人民对接二连三发生的事件深感不安，他们感到这些事情之所以产生不只是由于美国飞行员缺乏地理知识和训练，而且也表明美国人对国际法保护下的中立国家的权利的厌烦和漠视。为了减少这类事件的危害，联邦委员会在1944年9月12日授权解除在瑞士的灯火管制。德国人这时已无力再来反对这项措施。边区各州政府奉令保持公用和私人的照明通宵达旦。在那些日子里，为了使瑞士的边界白天内更便于认清，在车站和高耸建筑物的屋顶上都醒目地悬挂了瑞士国旗。尽管有这种预防措施和瑞士空军的警戒，类似事件还是不断发生，造成更大的损失，并有更多的人丧生。

侥幸的是，瑞士所担忧的它的边境有可能受到地面部队的侵犯，证明是没有根据的。盟国发起总攻之日后，吉桑将军想要召集大量的增援部队，但联邦委员会经过紧急讨论，认为这种动员将会影响粮食生产，决定只征召数目有限的一支边防部队。当盟国于8月15日在法国南部登陆以后，又宣布了再次部分动员令。

8月28日，美国前锋部队到达了瑞士的边境，瑞士和外界恢复了联系。自从意大利投降，使德国封闭了它在瑞士边境周围的包围圈后，瑞士就几乎完全与世隔绝了。

瑞士政府在这期间所遭遇的另一个麻烦是避难权的问题。自从络绎不绝的逃亡者涌入瑞士寻求避难以来，难民问题即成了他们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不

《新苏黎世报》，1944年9月12日、13日。

见贝甘：《欧洲观望》，第264—265页；《新苏黎世报》，1946年6月25日，吉桑：《联邦议会的活动报告》，第59页以下。

得不加以处理的一个问题。1940年的法国士兵、1943年的意大利士兵、各国的逃亡者、川流不息的犹太人和其他德国占领区的平民越过国境到中立的瑞士以逃避追捕、死亡、饥饿和拷打。虽然大批人不得已从国境折回，但许多人则被收容下来。1944年，德国的失败已经在望，看来很可能有另一批新的逃难者来敲瑞士的大门，这次将是德国人来寻求庇护，借以逃避胜利者的报复。盟国再一次要求瑞士政府保证不再收容那些畏罪逃来瑞士寻找庇护的战犯。瑞士坚持认为伦敦和华盛顿的惶惶不安是没有必要的。尽管庇护权是瑞士公认的原则，但这种权利并非无条件的。关于允许难民入境的规章规定，那些由于早先不正当的行为不配收容的和其举止有损瑞士利益的外国人将被拒绝入境。可是，他们确实感到，无论如何应该由瑞士自己作出以公认的法律为基础的决定而不能以胜利者专横武断的决定为准。例如煽动战争不是一种公认的罪状，但是轴心国首脑由于其他原因显然是不受欢迎的。瑞士政府在1944年11月15日联邦会议的一份声明中，表述了自己的立场如下：根据维护瑞士尊严的一系列先例，联邦委员会打算行使一个主权国家公认的权利，对于那些值得考虑的逃亡者给予庇护。但是由于难民集集已造成了人满之患，因此，即使是在可能造成死亡的情况下，它也不愿不经过审查就批准所有要求避难的人进入瑞士。很显然，特别对那些曾对瑞士表现出不友好态度的人、那些犯有违反战争法令罪行的人或过去的经历证明其观念与法律和人道的基本传统不相符的人，一概不能收容。在和非轴心国世界恢复联系后，瑞士使须同法国重建关系，在瑞士被隔绝期间，这种联系大部分已经中断。1945年2月21日，当戴高乐同意选派伯克哈特教授为驻巴黎的瑞士公使后，瑞士即同法国临时政府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法国解放后，在瑞士，人们怀着最大的兴趣和同情注视着戴高乐使法国重新站起来所做的努力。瑞士希望法国能成功地恢复它先前的地位，并在胜利者的会议席上，为维护欧洲和欧洲较小国家的利益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在同戴高乐政府建立良好关系之前，还存在许多严重障碍有待克服。戴高乐未尝忘怀，直到德国占领维希法国时为止，瑞士政府还在与贝当元帅和维希政府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另外，法国人强调瑞士银行保存有大量属于“劫夺来”的黄金，原是德国从法国窃取的。因此，在完全恢复两国在战前的密切关系前，必须消除许多隔阂。227 在战后时期，关于如何处理德国在瑞士的财产问题上的争议，阴挠了瑞士恢复和盟国之间的正常经济关系。盟国声称有权获得德国在中立国家所拥有的资产作为赔款。这批财产在清理时应用于曾受战祸的国家的善后和重建事业。瑞士否认盟国对这笔财产拥有任何合法权利。在有关德国财产的数额上也有分歧。瑞士估计大约是二亿五千万美元（十亿法郎），而美国宣称总额是这个数字的三至四倍。他们还认为瑞士在挖掘隐匿的敌产方面不肯合作，他们急想能让盟国代表前去进行调查。除非等到德国的财产问题获得圆满解决之后，美国当局拒绝撤销针对瑞士商行的黑名单或解除1941年在美国的大量瑞士存款的冻结。瑞大在英国的存款也被冻结。

见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62—1363页。赫尔补充说瑞士在11月14日对收容战犯问题曾作“肯定的保证”。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14—1945年》，第254—255页。

关于1945年4月在战利品问题上和盟国达成的协议，见上文，原著第81页。

《纽约时报》，1946年1月18日；《泰晤士报》，1916年3月23日；《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1946年3月，以沃尔特·斯塔基博士为首的一个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前往华盛顿同美国政府和英、法代表进行谈判。除了有关德国在瑞士的资产这一总的问题之外，还提出了瑞士国家银行拥有的资产问题。盟国声称那是被德国掠夺的黄金，应移交到一个黄金储备库，以便归还原有国家。

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后，终于在1946年5月21日达成了一项协议。协议为清算德国境内的德国人在瑞士的存款作了规容。属于住在瑞士的德侨的财产不予没收。清算工作由瑞士赔偿清理处负责办理，并与由三个盟国政府和瑞士组成的联合委员会保持密切联系。结算后的一半收益将由瑞士保留，以抵消德国对它的欠款，另一半则移交给盟国以资进行重建和救济工作。有关掠夺的黄金的争论，根据盟国的要求，白瑞士付出了二亿五千万法郎作为最后解决。美国同意撤销对瑞士存款的冻结，而盟国也答应取消瑞士商行的黑名单。

双方的让步在各自国内都引起了舆论反对，特别是228在瑞士，华盛顿协议在议会中被描述成是盟国指定的条款、强权战胜了公理及对公认的国际法原则的违反。为了替这个协议辩护，斯塔基博士说，在华盛顿那场“斗争”中，盟国掌握了全部王牌。他们拒绝解除瑞士在美国的财产的冻结和撤销黑名单，除非瑞士同意移交出德国故资产。斯塔基还提醒他的批评者，瑞士是要依靠盟国供应煤和小麦的。国民院在6月28日批准了这项协议，次日，联邦院也予以批准。

（二）瑞士同苏联的关系

我们已经看到战争结束时，瑞士作为一个中立国家在调整它和得胜的英、美及法国的关系中，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尽管这些国家都是它的老朋友，且在许多地方都是与瑞士类似的民主政体。而同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的苏联建立关系则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是，显而易见瑞士在调整它的政策以适应战后世界形势时是不能再把这个俄国巨人掉以轻心了。1923年，当一名俄国官员在瑞士被谋杀后，两国就断绝了外交关系。瑞士并不掩饰它对苏联政体的厌恶，莫塔就反对过苏联加入国际联盟。

1944年期间，在联邦、州议会和报界都对同俄国调整关系是否恰当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成立了许多委员会鼓吹恢复关系，尤其是贸易关系。确实，与苏联妥协的愿望大部分是出于经济上的动机。由于苏联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和德国的暂时没落，瑞士急想能在恢复和平后同苏联进行贸易。1944年3月29日，国民院的一名社会党议员提出一项决议案，要求联邦委员会竭尽全力与苏联恢复正常关系。皮莱一戈拉在回答时向议院保证，政府准备考

1946年4月1日。

《泰晤士报》，1946年6月18日；《新闻纪事报》，1946年6月20日。协议和附件的正文见《国务院公报》，1946年6月30日，第1101—1102页，第1121—1124页。

《泰晤士报》，1946年6月27日。

《金融时报》，1946年6月18日。

《泰晤士报》，1946年6月27日；《纽约时报》，1946年6月28日。

见《概览，1924年》，第258—259页。

战前，德国曾是瑞士最大的主顾和供给者。

1910年1月莫塔逝世后，皮莱一戈拉在联邦委员会中继任主管外交事务的委员。

虑复交。驻伦敦的瑞士公使奉命与苏联大使就此事进行商讨。由于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10月10日瑞士向伦敦的苏联大使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提议重新建立正常关系。对签订协议来说，那时似乎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不料因为瑞士和其他据称仇视苏联的国家将会出席在芝加哥举行的民航会议，苏联拒绝参加。几天后，在11月5日，联邦委员会向苏联提出建交请求时竟遭到拒绝，理由是瑞士政府多年来一贯“追随一种敌视苏联的亲法西斯政策，而迄今为止，从没有放弃过这种政策”。

瑞士人对苏联态度的反应是不胜惊异与愤慨。人们把受到苏联无理拒绝的屈辱心情都发泄在皮莱-戈拉身上，重新对他进行抨击；许多人把这种局面的形成归罪于他。社会党人大声疾呼要他下台。虽然那些比较不太极端的分子并不相信苏联的答复仅仅是由于对皮莱-戈拉的厌恶引起的，但普遍感到他在战时认为必须追随德国的那种政策并不能帮助瑞士同胜利的国家重建友好关系。联邦委员会在11月10日接受了皮莱-戈拉的辞职，选出了纳沙特尔的律师马克斯·彼蒂彼爱（以往没有任过公使）作他的继承者。

在194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瑞士和俄国之间的关系光甚进展，俄国报纸和电台不断攻击瑞士帮助德国，并扬言瑞士只有期待联合国家对它亲法西斯政策的惩罚。瑞士还被指责包庇法西斯罪犯、虐待在瑞士的俄国战俘和避难者。从俄国占领区遣返瑞士平民的工作中止了。

瑞士拒绝移交来自波罗的海国家和苏联占领区的避难者也招来了麻烦。1945年春天，出现了第一次缓和，当时俄国接受了彼蒂彼爱的邀请，派遣一个调查团对俄国拘留犯提出的抗议进行调查。同时也为遣返瑞士拘留的俄国人与俄国占领区内的瑞士平民作了安排。1946年初，驻贝尔格莱德的瑞士公使奉命为重建外交关系一事与苏联大使进行协商，这次洽谈成功了。3月19日，瑞士政治部宣布，苏联政府已同意恢复外交关系，并互派使节。8月，新的瑞士公使到莫斯科上任，一个月后，苏联公使和全体工作人员到达伯尔尼。虽然在1946年还未签订一项全面的贸易协定。但是俄国为许多瑞士出口物资提供了市场。瑞士与其卫星国波兰和匈牙利都订立了协定，保证它煤、铁和原料的供应。根据与匈牙利的协议，瑞士得到了制铝工业所需的矾土，并用机器换取了粮食。

到1946年底，瑞士使自己适应于战后世界的努力取得了普遍的成功。和俄国的关系正常化了，与英、美、法重建了友好的联系。虽然物价昂贵，粮食和燃料仍然实行严格配给，但总的说米国家繁荣昌盛。没有遭到战争触动的瑞士工厂的出口业务大为兴旺。同时，国家强大的金融地位使它能给国外买主以优惠的信贷。

《新苏黎世报》，1944年3月29日。

《新苏黎世报》，1945年1月10日。

同上，1945年6月4日、13日、20日。

第三章爱尔兰

康斯坦斯·霍华德。

第一节战争爆发前与联合王国的关系

爱尔兰在战争爆发时和整个战争时期一直遵循的政策，只有对照它的历史背景和它为摆脱英国统治而进行的长期斗争情况来考虑才能有所理解。显然，要在这寥寥几页中复述爱尔兰动乱的全部历史，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但是，由于爱尔兰战时政策这一条线是由中立和分裂这两股不可分的绳索拧成的，因此，就需要回顾一下战争即将开始前那一时期的事态发展。有关事态对于这两个问题有着直接的关系，并使得德·瓦勒拉在战争爆发时能执行一项中立的政策。1932年，埃蒙·德·瓦勒拉重新掌权时，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与英联邦保持联系的统一的爱尔兰共和国——但不是英联邦成员；承认英王为该联盟的元首——但不是爱尔兰的国王。到1937年底，德·瓦勒拉已经朝着实现这个目标的一部分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他拒不承认1921年条约解决办法中所规定的若干条款，包括效忠宣誓，向枢密院上诉，以及总督的职责，最后还有总督的职位。君王称号在这自由邦的国内宪法上被取消了，但在对外关系法令中还保留着微弱的联系，规定为了任命外交官员和缔结国际协定英王有权代表爱尔兰自由邦政府行事。

这些步骤使德·瓦勒拉得以放手为制订新宪法作好准备，他向人民保证，这部宪法将完完全全是“爱尔兰的”。1937年这部宪法通过了，它重申了爱尔兰民族拥有选择它自己的政府形式和决定它同其他国家的关系的主权。它进一步宣告：“国家领土是由整个爱尔兰岛、它的各个岛屿和领海听组成”，但补充声明，“在国家领土重新统一以前”，宪法所确定的政府管辖范围即是以前自由邦政府所管辖的范围。宪法宣布国名定为爱尔兰自由邦或在英文中称为爱尔兰。

英国政府有保留地接受了这部新宪法。他们不承认爱尔兰对构成联合王国整体一部分的北爱尔兰的六个郡拥有管辖权的要求。因此，他们认为在这方面使用爱尔兰自由邦或爱尔兰这一名称只是指迄今被叫做爱尔兰自由邦的那一区域而言。英国政府还宣布。按照与其他自治领相一致的情况，他们将不把这部新宪法当作根本改变了爱尔兰作为一个英联邦成员国的地位来看待。

本章讲的是关于爱尔兰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了个中立国家的历史。它作为英联邦成员之一的颇为独特的地位，基思·汉考克爵士在其所著的《英联邦事务概览》，（Sir Keith Hancock: Survey of British Commonwealth Affairs, 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37—1942年版）一书中有过详尽的论述，本书将只在涉及到它对爱尔兰战时政策以及同包括北爱尔兰在内的联合王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关系的影响时提到这个问题。

条约正文见英国：《英国与爱尔兰之间的条约的议定条款》（Articles of Agreement for a Treaty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敕令第1560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21年版）。

见英国外交部：《英国与外国政府文件（1936年）》（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 1936），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8年版，第137页。

见汉考克：《英联邦事务概览》，第1卷，第6章和附录第629—630页。

爱尔兰三十二个郡之中的二十六个。

正文见《宪法草案》（Draft Constitution），都柏林文书局，1937年版，以及英国外交部：《英国与外国政府文件，1937年》（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50年版），第584页以下。

英国政府的声明发表在《泰晤士报》，1937年7月17日。

尽管如此，爱尔兰与英联邦在宪法上保持的唯一联系就是对外关系法案上所规定的很微弱的联系。德·瓦勒拉显然不准备割断这一最后的联系。他的理由是什么？他真的希望²³²保持同英联邦的联系？是他意识到爱尔兰的经济要依靠联合王国，因而怕过分地触怒了后者？还是他希望通过保持这种联系，他便能更容易说服北爱尔兰与二十六个郡同呼吸共命运，从而实现他为之奋斗终身的建立一个自由、统一的爱尔兰的目标呢？或许，所有这些考虑和其他的考虑一样，都有他们的作用。但是，如果德·瓦勒拉真的希望北爱尔兰人会接受一个幻影作为实物，那么，看来他一直是在沉湎于一种一相情愿的梦想中了。正如许多英国人不能理解，为什么爱尔兰人不愿成为英国的一部分那样，德·瓦勒拉及其支持者也不能或不想理解，为什么北爱尔兰人不喜欢成为他们谋求建立的爱尔兰中的一个少数民族的想法，并努力使他们自己相信，使爱尔兰一分为二的基本上是英国人一手造成的，而不是北爱尔兰人。

尽管爱尔兰人当时在理论上拥有对这二十六个郡的主权，但他们仍然没有取得实际上的主权。根据1921年条约的规定，大不列颠仍旧享有占据贝雷哈文郡和科布郡（昆斯敦郡）的港口以及斯维利海湾，并在战时或者与国外某大国关系紧张时，使用它们来进行防御的权利。再说，这些条约港口问题和分裂问题并不是造成两国不和的仅有的争端。英国同爱尔兰之间的关系由于1932年德·瓦勒拉决定拒付土地年金后接着发生的“经济战”，就进一步恶化了。为了补偿这一争执中的金额，英国政府对爱尔兰的产品实行征收进口税。而爱尔兰政府作为回报，也对英国货物征收了报复关税。一般说来，当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欧洲战争终将不可避免，但国际局势显已岌岌可危了：英国和爱尔兰两国政府都渴望解决那些造成它们两国对立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德·瓦勒拉意识到，只要英国还占有着爱尔兰的港口，战时保持中立就是不可能的，而英国人则关心着在他们侧翼出现一个敌对国家将会引起的防务问题。爱尔兰人也希望达到他们建立一个统一的爱尔兰的目的。在张伯伦这方面，他的确急想同爱尔兰建立良好的关系，使两国之间捐弃前嫌，重归于好。1937年秋冬几个月时间内，德·瓦勒拉和英国自治领事务大臣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在日内瓦和伦敦就两国政府举行谈判的可能性做了非正式的探索。由于双方会谈的结果，德·瓦勒拉于1938年1月12日在众议院宣布，已经作好了安排，由爱尔兰和英国政府的代表于1月17日在伦敦举行会谈，以便就影响两国关系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商讨。德·瓦勒拉和其他的爱尔兰代表希望，把爱尔兰分裂问题放在谈判的首位。他们坚持说，是英国政府造成了爱尔兰的分裂，如果英国情愿的话，他们是能够恢复爱尔兰的统一的。张伯伦则明确表示说，虽然英国政府并不反对爱尔兰统一，但是，这个月的只能通过爱尔兰和北爱尔兰政府之间自由协商来达到。英国政府不准备强迫这六个郡，因为他们已在1938年2月10日的普选中重申了他们要继续作为联合王国整体一部分的决心。英国人迫切希望就防务问题达成协议。他们本来希望香到，伴随着他们放弃在爱尔兰港口的权利，能达成一项有关防卫联

汉考克：《英联邦事务概览》，第1卷，第339页以下。

见德·瓦勒拉1938年4月29日在众议院的讲话（1938年4月30日的《泰晤士报》）以及张伯伦5月5日在下院的讲话（下院辩论，第5辑，第335卷，第1073栏）。

同上。

盟的协议，或取得一项保证，允许他们在战时使用这些港口。但是，在爱尔兰分裂问题还未解决之前，德·瓦勒拉是不准备就防务合作进行任何商谈的。

然而，尽管双方未能就这些问题达成任何协议，但德·瓦勒拉和张伯伦还是决定继续会谈以期解决那些尚存的其他分歧。谈判结果，终于成功地达成了三项协定，并在1938年4月25日正式签署。第一项协定废除了1921年条约的下列有关条款，这些条款规定，对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海上防务应由英国军队负责，为此目的允许英国军队在指定的口岸使用港口和其他设施。英国同意把在贝雷哈文郡和科布郡（昆斯敦郡）的港口以及斯维利海湾的所有海军指挥部和产权在1938年底以前全部移交给爱尔兰政府。第二项（财政）协定中，关于年金支付上的争论，也以由英国政府接受爱尔兰政府付清一笔一千万英镑的金额作为英方全部财政要求的最后解决而告终。第三项协定是一项综合性的贸易协定，内容类似大不列颠和自治领之间曾在渥太华签订的协定。

1938年5月17日；“联合王国在乎爱尔兰协定确定法案”中批准了这些协定，并得到王室的同意；爱尔兰也在1938年4月29日，经过众议院三大辩论后，在一份确认决议上批准通过了这些协定。当4月27日的辩论开始时，德·瓦勒拉发表讲话说，对移交基地这项协定的重要意义无论怎样估价都不会过高，因为它意味着最终确立了爱尔兰对二十六个郡的主权。港口是无条件地移交的。

德·瓦勒拉保证，爱尔兰政府将不允许它的领土被用来作为进攻英国的基地。他说，这些协定总的来说已解除了除了分裂这一问题以外的所有一切主要争端。可是，从一开始德·瓦勒拉就坚持说，只要爱尔兰还继续保持分裂，两国之间就不会有最后的和解。

在大不列颠，人们对于张伯伦交出英国在爱尔兰港口权利的决定是多少感到惶惑不安的。在下院，这个决定遭到了丘吉尔的强烈反对，他说，如果德·瓦勒拉决定一旦发生战争时保持中立的话，那么，这些港口——它们对英国的供应线是至关重要的——在英国需要的时候就可能不让它使用。英国政府是在为虚无缥缈的幻影和安宁而抛弃了保障安全和生存的真正重要的手段。可是，张伯伦却认为，战时在英国的侧翼有一个友好的爱尔兰比保留“名义”上的港口权要重要得多。根据参谋长的建议，通过了这项决议，理由是为了要确保海军能够使用这些港口，就有必要军事占领那可能成为敌对的内陆。他们估计，这将需要为每一港口配备一师带有防空设备的兵力。而鉴于英国军队的薄弱力量和英国在欧洲大陆承担的义务，这些师的兵力是抽调不出来的。皇家海军认为，有法国为盟友，他们就能够保护英国海上的贸易航

见英国自治领事务部：《联合王国和爱尔兰政府在1938年4月25日于伦敦签订的协定》

（AgreemntsbetweentheUnitedKingdomandtheGovernmentofEiresignedatLondonon25thApril,1938），敕令第5728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38年版）以及《文件，1938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177—185页。

《众议院辩论》，1938年4月27日，第32—47栏；《文件，1938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186页以下；参阅《曼彻斯特卫报》，1938年4月28日

下院辩论，1938年5月5日，第5辑，第335卷，第1094—1105栏。

同上，第1077栏。

线而不需借助于爱尔兰的基地。再者，张伯伦——一个对外事务的乐观主义者——也希望，假如爱尔兰对英国的积怨能够平息的话，它对联合防御问题最终将会采取一个较为合作的态度。张伯伦把放弃英国的防卫权利描述为一种“诚意的行动”。

不幸的是，爱尔兰的主要愤懑，国家的分裂，依然存在，甚而在协定签署后的数月间，一场反对继续保持分裂 35 的运动又变本加厉地展开了。1938 年 10 月 17 日，德·瓦勒拉在接见一位英国报社记者时就他准备为那六个郡提出的条件作了重要的声明。这些条件是：地方事务实行自治以及把英国议会保留的权力移交给都柏林的一个全爱尔兰的议会。保留的权力是指那些有关防务、对外关系和关税及货物税的权力。当问到在防御措施和同英联邦关系问题上，一个统一的爱尔兰将采取什么政策时，德·瓦勒拉没有明确表态。他认为同英联邦之间或许将会保持某种形式的联系，并且“可以设想，如果将来出现危急情况时，一个统一的爱尔兰将愿同英国合作一起来抗击对他们的共同进攻”。但是他接着说道，“一旦欧洲战争爆发，而爱尔兰的分裂依然如故的话，那么，这种合作的可能性便非常非常少了。倘若这场战争发生，而英国军队仍占领着爱尔兰的任何部分，那么，爱尔兰人对不论什，么合作，肯定都将抱敌对情绪的。”在第二年期间，1939 年 2 月及 4 月，德·瓦勒拉一再明确表示，如果战争爆发，那时爱尔兰的政策将是中立政策。“政府政策的目的是保持并维护我们的中立。”

虽然德·瓦勒拉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独立的爱尔兰，但他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达到这一目标。这种态度对爱尔兰共和军的极端分子是格格不入的，他们于 1 月 15 日发表声明，要求英国从整个爱尔兰撤出“它的军队、它的民政官员和机构，以及所有各类代表”。同时，他们以一份最后通牒送交给了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要求在四天内撤走全部英国军队，并威胁说，如果这个要求不予照办的话，就要进行报复。爱尔兰共和军“宣战”后不久，接着就在英格兰接连发生了几起炸弹爆炸事件。在爱尔兰，德·瓦勒拉迅速采取了行动来对付爱尔兰共和军对他权力的威胁。1939 年 2 月 8 日，向众议院提出了一项使政府有权即时对反叛者采取行动的法案。5 月 30

查德菲尔德勋爵：《它或许再会发生》（Lord Chatfield：It Might Happen Again），伦敦，海涅曼，1947 年版；第 126—127 页。

见基思·法伊林：《内维尔·张伯伦传》（Keith Feiling：The Life of Neville Chamberlain），伦敦，麦克米伦：1946 年版，第 310 页。

下院辩论，1938 年 5 月 5 日，第 5 辑，第 335 卷，第 1077 栏。

见多纳尔·奥沙利文：《爱尔兰自由邦及其参议院》（Donal O'Sullivan：The Irish Free State and its Senate），伦敦，费伯，1940 年版，第 584 页以下。

当问到克雷加文勋爵（当时的北爱尔兰首相）对德·瓦勒拉讲话的反应时，他说：“我只能重申北爱尔兰的老战斗口号，那就是‘不屈服’”（《曼彻斯特卫报》，1938 年 10 月 18 日）。

《旗帜晚报》（Evening Standard），1938 年 10 月 17 日。

德·瓦勒拉 1939 年 4 月 16 日在克莱尔郡的思尼斯的一篇讲话。

七名第二届议会的残留成员于 12 月 8 日把他们的“权力”移交给了爱尔兰共和军的委员会。这七名人员曾拒绝接受 1921 年的条约，并宣称他们是爱尔兰共和国的合法政府。

《泰晤士报》，1939 年 1 月 17 日。

1939 年 7 月 24 日，下院辩论，第 5 辑，第 350 卷，第 1047 栏。

日颁布了一条惩处叛国法令，准许对叛国罪犯处以死刑，6月14日又通过了危害国家法案。第二项 236 法案授权政府得以宣布一个组织为非法，并设立特别刑事法庭。基于这些权力政府就在 6 月 23 日宣布爱尔兰共和军为非法。8 月 23 日，又发布两项公告，宣布法令的补充条款生效。这些条款使政府有权不经审讯径行拘留嫌疑分子，并设立一个由五名陆军军官主持的特别刑事法庭。

然而，尽管爱尔兰政府准备采取这样严厉的手段自己来对付爱尔兰共和军的作乱分子——并在以后的岁月里也这样做了——但是，当一名遇难者在考文垂市的一次炸弹爆炸事件中丧生后，英国法庭对荫名被指控犯有杀人罪的爱尔兰人判处死刑时，还是立刻激起了爱尔兰人的民族义愤。为了争取缓刑，爱尔兰政府通过他们驻伦敦的高级专员杜兰蒂，并直接由德·瓦勒拉出面求情作了巨大的努力，但都归徒劳。爱尔兰人民把行刑的那一天定为一个哀悼日来作纪念。

1939 年春，爱尔兰和大不列颠之间关系的改善，又因英国政府做出的一项决定而受到威胁，那是 4 月 26 日张伯伦在下院宣布的在联合王国包括北爱尔兰实行征兵制的决定。强制征兵本会遭到六郡的少数民族主义者的激烈抵制，他们会得到来自边界南部的道义上还可能是物质上的支持。而这一计划更被北爱尔兰的天主教统治集团诬蔑为“一个侵犯我们民族权利的行动”，4 月 27 日，德·瓦勒拉在众议院宣布，鉴于“昨天发生的一些严重事态”，他取消了原定在 4 月 28 日的对美国的访问。5 月 2 日，他声明“他已就英国威胁将在我国北部实行征兵一事提出最强烈的抗议”。爱尔兰对北爱尔兰的主权要求虽没有被接受，但设在威斯敏斯特的政府认识到，对隶属于联合王国的少数民族主义者，违背他们的意愿强制征兵既不公平，也是最不明智的做法。北爱尔兰首相克雷加文勋爵希望在六郡实行征兵，但到 5 月 4 日当张伯伦在国会提议对军训法案进行二读时，他又宣布，义务兵役制将不在北爱尔兰推行。5 月 26 日，该法案颁布后，德·瓦勒拉向英国政府进一步提出抗议，反对在英国的爱尔兰公民有服兵役的义务。但是，由于法律上爱尔兰还是英联邦的一个成员，它在英国的公民就具有和英国公民同等的身份，享有同样的权利，负有同样的义务。因此，抗议被置之不理。

第二节从战争爆发到袭击珍珠港

（一）同英国和美国的关系

紧接德国入侵波兰之后，爱尔兰政府当即采取一些步骤，来贯彻执行德·瓦勒拉早先所宣布的中立政策。为了制定授予政府采取紧急措施权力的法律，9 月 2 日众议院召开了会议。德·瓦勒拉强调说，他的政府决心坚持爱尔兰的中立，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但他保证，将尽一切努力来保卫爱尔兰的利益，和不使任何交战国对爱尔兰的中立产生任何怀疑或找到任何正当的抗议理由。这项授予政府以广泛战时权力的法案获得了全体的一致通过。

奥沙利文：《爱尔兰自由邦及其参议院》，第 590—592 页。

下院辩论，第 5 辑，第 346 卷，第 1150—1154 栏。

奥沙利文，前引书，第 587 页。

《泰晤士报》，1939 年 4 月 28 日。

《众议院辩论》，1939 年 5 月 2 日，第 1415 栏；参阅《曼彻斯特卫报》，1939 年 5 月 3 日。

下院辩论，第 5 辑，第 346 卷，第 2103—2105 栏。

在两院的辩论表明，议员们以压倒之势赞同政府的中立政策。甚至象参议员麦克德莫特和约翰·基恩爵士那样曾希望看到爱尔兰和英联邦并肩作战的人也都会体会到，鉴于绝大多数人民的心情，中立是唯一可行的政策。

许多因素促使爱尔兰决定保持中立。这些因素包括：

一是不愿卷入一场英格兰的战争中去，二是相信坚守它的中立，爱尔兰正在证明它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

其他因素是政治上的不团结和缺乏任何防御设施。如果决定投入英国一边参战，即将在国内引起严重的骚乱，而且，很可能导致内战。除了这些因素外，当国联无力解决阿比西尼亚危机时，德·瓦勒拉从中所得到的教训也使他确信，中立是一个小国的唯一政策。国联成立时，爱尔兰——和其他小国一样——曾对国际法和集体安全体制的发展寄予莫大的希望，希望这将使它们摆脱纯属大国棋盘上的小卒这样的地位。德·瓦勒拉在意大利—阿比西尼亚争端中是支持对意大利实行国际制裁的。各大国不肯冒各种风险促进国际法，或实行那些看来不是对它们切身有利的政策，使德·瓦勒拉得出了这一结论，即：爱尔兰的最好出路在于保持孤立。德·瓦勒拉在1936年7月国联大会上的讲话中对于爱尔兰今后如可能时打算扮演什么角色并没有明确说明。当时对意大利实行的制裁政策又最终被取消了，而墨索里尼对阿比西尼亚的并吞也被默认了。德·瓦勒拉说：尽管我们在这里法律上是平等的，但对象欧洲和平这类的事来说，小国是无能为力的。我已说过，和平是取决于大国的意志。如果大国的政治家们不能履行他们的职责，那末小国所能做的，就是下定决心使自己不成为任何大国的工具；并尽他们一切可能发挥的力量抵抗大国想要硬把他们拖入一场违背其意愿的战争的一切企图。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先是面对着英国的压力，后来还面对着美帝的更大的压力，德·瓦勒拉始终顽强地坚持了这项决心。

维护爱尔兰中立的措施立即付诸实施。军队都动员起来了，政府号召更多的人志愿参军。严格的新闻检查制也实行了，并随着战争的进展而日益严厉。数百名爱尔兰共和军成员遭到了兜捕和拘禁。

“假战争”期间，爱尔兰并未受到战争很大的影响，尽管有许多公民为了参加英国军队而偷越了国境。爱尔兰保持中立的权利得到了承认，德·瓦勒拉就把全部力量都集中于消除分裂这一问题上，为了推进这个目标，他作了多方努力以争取美国的同情和支持。1939年末，德·瓦勒拉在对美国圣诞节广播讲话中，强烈要求参战国的领袖们举行会议，来商定和平问题，与此同时，他还呼吁美国帮助结束爱尔兰的分裂。1940年6月法国沦陷，爱尔兰比较安全的局面猝然告终。从那以后，它就敞开着受到德国自其占领下法国北岸入侵的威胁。而且，由于一个敌国控制了海峡港口，更使英国对它在1938年所放弃的那些爱尔兰港口的需要大大增加。因此，似乎很有可能，英国政府将决定，他们不再能尊重爱尔兰的中立了。面临着这些威胁，德·瓦勒拉于5月18日通过美国驻都柏林公使戴维·格雷，向美国政府求助。他要罗罗斯福宣布，鉴于爱尔兰控制着大西洋海空交通要道的战略位置，维持爱

《泰晤士报》与《曼彻斯特卫报》，1939年9月4日。

见《概览，1935年》，第2卷，第503页；参阅同书第188页，注。

《纽约时报》，1939年12月26日。

关于德国的入侵计划，见下文，原著第243—344页，

爱尔兰的现状 239 对美国的利益是至关重要的。美届政府答复说，他们不能按照这一原则采取什么行动，因为这不符美国对欧洲事务的传统政策。然而，德·瓦勒拉并未动摇，他决心不惜任何代价维护爱尔兰的中立，以及用武力来抵抗任何侵犯它领土的国家。他不准备允许英国派遣部队为防御上的目的而进入爱尔兰，也不准备让英国海军使用它的港口。爱尔兰人担心，如果英国人一旦重新占领他们的港口，那未要在战争结束后再请他们撤走的话，大概是不可能的。一个更直接的危险是，如果英国被允许在爱尔兰获得立足点的话，德国人势将采取报复行动。还有一个第三种危险，那就是：英国军队出现在爱尔兰将会遭到爱尔兰极端分子的反对，很可能因此而造成内战，并且必然会导致爱尔兰统一的破裂。

1940 年夏季期间，试图说服爱尔兰和北爱尔兰加入一个全民族防御联盟所作的努力，结果也证明是失败了。双方政府都只准备按照他们各自的条件，缔结这一类的协定。在 6 月 30 日的一次演说中，克雷加文公开发表了他对防务合作的条件。这些条件是，放弃爱尔兰的中立，驱逐都柏林的轴心国代表，并保证在战争期间不提出宪法上的争端（如分裂问题）。当然，这些条件是德·瓦勒拉所不能接受的，他只准备在六郡并入一个统一、中立的爱尔兰的基础上，才进行合作。7 月 4 日，他发表声明重申，他的政府无意背离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将捍卫中立的政策。

与此同时，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加强爱尔兰的薄弱的防御工事。正规军的后备队和第一线的志愿兵被征入伍，为了征召更多的志愿兵员，开始展开全国性的动员。另外又招收了一支地方保安部队从事巡逻和侦察工作。都柏林和其他的中心地区都建立了防御工事，并在公路和飞机可能降落的地段设置了路障。海岸巡逻加强了，都柏林、科克和其他重要的口岸都实行了军管。6 月 7 日通过了一项防务法案，授予总统以广泛的紧急应变权力。反对党都保证在这危急关头支持德·瓦勒拉，并于 5 月 28 日成立了一个由三个主要政党的成员组成的国防委员会，以便捍卫爱尔兰的中立和镇压叛国活动。在这三大 10 前，德·瓦勒拉向爱尔兰共和军的极端分子提出了进一步警告。他说，看来有一个小集团正在策划叛国，这种事态是不能容忍的：“他们不是爱国者，他们只会做卖国贼的事。”伴随着警告而来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对犯有搞颠覆活动嫌疑的人进行了搜捕。

当 1940 年即将过去，英国愈来愈多的人提出要求，应对爱尔兰政府施加压力，要它让出那些港口。9 月，在希特勒决定推迟入侵英国后，德国人便把全部力量都集中于试图切断英国的供应线来把它困死。秋冬两季中，英因损失的船只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而它在对抗德国潜艇威胁方面的努力却因它不能使用爱尔兰的港口而受到严重的阻碍。11 月 5 日，在下院的一次战局审议会上，丘吉尔公开表示，他对爱尔兰的态度表示遗憾。“事实是，我们无法利用爱尔兰的南部和西部海岸来为我们的舰队和飞机加油，从而保护我们和爱尔兰赖以生存的贸易，这是不应该由我们肩负的一副非常沉重和难于忍

赫尔：《回忆录》，第 2 卷，第 1351—1352 页。

《泰晤士报》，1940 年 7 月 1 日。

德·瓦勒拉在一次接待记者时的讲话。刊载于 1940 年 7 月 6 日的《纽约时报》。

《泰晤士报》，1940 年 7 月 5 日。

《纽约时报》，1940 年 5 月 26 日。

受的担子。”

德·瓦勒拉对丘吉尔首相的讲话立即作了毫不妥协的回答。11月7日，在众议院发言时他说，只要爱尔兰保持着中立，就谈不到港口的让渡，他还补充说：“任何交战国——英国——想对我们施加压力的任何企图都只会导致流血。”德·瓦勒拉说，他本不想评论丘吉尔首相关于爱尔兰港口的讲话，如果不是由于英国普遍掀起的要求转让港口运动已引起了“美国舆论的响应的话”。11月20日，德·瓦勒拉特地接见了一位美国有权威的记者华莱士·卡罗尔，说明了他拒绝放弃这些基地的理由：“这个问题是牵涉到我们国家主权和我们人民意愿的一个问题，它也是牵涉到我国人民的安全的一个问题。”要把港口转交给英国，就将使相对来说没有设防的爱尔兰城市受到德国报复性空袭的恐怖威胁。在问到他是否准备拿爱尔兰的中立作为结束爱尔兰分裂的交换条件时，德·瓦勒拉回答说，爱尔兰既有统一的权利，也有自由选择战与和的权利。

12月8日，罗斯福再次当选总统后的一个月，丘吉尔给他寄去了一封长信，强调美国的援助对赢得大西洋战役胜利的重要性。丘吉尔建议，美国能以帮助的办法之一就是为英国获取爱尔兰的基地施加它的影响。他又说，尽管要由英国政府强迫北爱尔兰违反它的意愿与爱尔兰合并将是不可能的，但他毫不怀疑，如果爱尔兰政府在这危急时刻表示它与讲英语世界的民主国家团结一致的话，那末，就能够建立一个全爱尔兰的防务委员会，而这很可能导向战后在这个岛上实现某种形式的统一。五天后，在第二封信中，丘吉尔告诉罗斯福，由于缺少船只和爱尔兰的不合作态度，英国内阁决定，再也不能接济爱尔兰以饲料和肥料了。

这样，到1941年初，爱尔兰的处境就变得越发困难了。爱尔兰又受到压力，要它放弃港口，用以给爱尔兰输送供应品的英国船只大大减少了，而它自己的小商船队也因战争开始以来损毁了九艘而减少了。此外，显而易见，美国政府和人民对爱尔兰的态度是越来越感到不耐烦了。他们支持英国和抗击轴心国的政策，声势迅速增大：1月，政府提出了租借法案并在两个月后获得了通过。因此，爱尔兰政府的不偏不倚的中立政策以及由于英国不能使用爱尔兰基地而使船只越过大西洋的护航工作危险频增，大大地激怒了美国。而且，美国已经在制订在大西洋上给英国以海军支援的计划，并将不等到美国参战就要见于行动。英美参谋会议上（1941年1月到3月）所商讨的计划，拟订由美国海军对横渡大西洋的船队进行护航。美国海军代表被派往不列颠诸岛，在苏格兰和爱尔兰选择可供美国军舰和飞机运用的基地。他们为说服德·瓦勒拉允许他们使用在多尼戈尔郡的斯维利海湾而作的努力显然

下院辩论，第5辑，第365卷，第1243栏。

《纽约时报》，1940年11月8日。

《曼彻斯特卫报》，1940年11月21日。

丘吉尔，第2卷，第494—501页；美国版，第2卷，第558—567页。

同上书：第535—536页；美国版，第606—607页。

国防部长弗兰克·艾肯在1941年4月23日的声明（《纽约时报》，1941年4月24日）。

这份有关美国海军支援的计划后来由1941年夏季执行的计划所代替。详情见《概览，1939—1946年：轴心国的初期胜利》，第7编，第3章，第3节。

没有成功。

在这种形势下，当爱尔兰的国防部长弗兰克·艾肯于1941年春对美国访问时受到多少有些冷淡的接待，就242毫不奇怪了。而由于艾肯强烈的反英倾向和他显然没有了解到美国对爱英争端的态度上的转变，因此选他作为使节也就说不上是一个什么特别适当的人选。3月17日，艾肯携带着德·瓦勒拉的亲笔信到了美国。他的直接任务是购买小麦、武器和船舶。1941年间，在美国，船舶和军用品的出售都必须取得政府的许可。4月7日，罗斯福总统接见了艾肯，4月11日，赫尔也接见了。在六个星期的逗留期间，他还同美国政府的其他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并在美爱协会所组织的集会上发表了讲话。4月25日，在一次由爱尔兰中立的美国朋友协会安排的会议上，艾肯否认当时流传的关于美国政府曾提出要爱尔兰允许英国使用其港口作为条件才能供给它所需要的武器和其他补给品的报道，说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还说，“无论是经济压力，还是军事入侵的威胁，或是对在战后建立一个爱尔兰乌托邦的承诺”，这些都不能诱使他们改变自己的立场。美国人也否认他们曾要求过爱尔兰向英国提供基地。然而，很明显，艾肯和德·瓦勒拉对于美国政府在这件事上的愿望，是完全清楚的了。赫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有过这样的记述：4月25日，他指示格雷向德·瓦勒拉转告美国政府对他的要求的答复。格雷应当告诉他，美国政府愿意设法让出两条船用来从美国装运粮食到爱尔兰。但是他们不准备比这走得更远了。美国驻都柏林大使奉命向德·瓦勒拉指出，爱尔兰政府的态度似乎完全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爱尔兰的安全是取决于英国的胜利的。美国政府认为英国的胜利对所有一切民主国家的安全是休戚相关的，所以任何可以提供的武器都将送往英国和其他正在抵抗轴心国侵略的国家。因此，他们不能接济爱尔兰以任何武器，除非它“对那些国家的作战努力表现出一种更为合作的态度”。

德·瓦勒拉就美国派出技术人员和工人帮助北爱尔兰修建基地一事质询美国政府的“目的……和……意图何在”，美国政府在其所作的简短答复中，再次表露出他们对爱尔兰的态度的不耐烦。11月18日爱尔兰驻华盛顿公使罗伯特·布伦南被通知说，由于查询之事涉及到的领土是属于得到美国承认的联合王国的一部分，因此他的政府最好是直接去向联合王国政府交涉。

（二）同德国的关系

1939年9月4日，德国驻都柏林公使爱德华·黑姆佩尔拜访了德·瓦勒拉，向他保证说，如果爱尔兰坚持中立的话，德国将尊重它的中立。德·瓦勒拉回答说，爱尔兰政府希望与德国和所有其他国家和平相处。整个战争期间，爱尔兰政府对德始终小心翼翼地恪守着他们作为一个中立国的义务。当然，德国人却是准备侵犯爱尔兰的中立的，无论是直接的入侵，或是通过煽动爱尔兰国内的叛乱，如果这样做似乎对德国有利的话。

莫里森：《美国海军作战史》，第1卷，第49—54页。

见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52—1353页。

《纽约时报》：1941年4月26日。

赫尔在1941年4月16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讲话。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53—1354页。

同上书，第1354页。

《泰晤士报》，1939年9月4日。

爱尔兰想同准备与德国人合作的一小部分极端分子建立有益的联系而作的尝试未能取得成效。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爱尔兰政府在 1939 年到 1940 年即拘捕了爱尔兰共和军的大部分领导成员，同时对其他搞颠覆活动的嫌疑分子则加以严密监视。在北爱尔兰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德国情报机构的拉豪森将军在 1945 年于纽伦堡的一次对新闻记者采访的谈话中，提到了德国在 1940 年密谋勾结爱尔兰共和军的失败。拉豪森说，德国的计划——称为“鸽子行动计划”——分为两部分，一是与爱尔兰共和军协作在爱尔兰组织一次暴动，与入侵英国同时并举，另一是建立一个从事破坏活动的基地。主要的特务为肖恩·拉萨尔，一名从美国途经意大利被护送到德国的爱尔兰共和军的领导人，他死在把他载往爱尔兰的潜艇上。其他人则在爱尔兰被捕，而少数几个由爱尔兰顺利逃到英格兰的也被捕获。

从德国军事文件中看来，在推迟进攻入侵英国的“海狮行动计划”以后，希特勒并不考虑在 1940 年秋天以前入侵爱尔兰。在判定在英国登陆的必要条件尚未具备以后，希特勒和他的最高统帅部又重新研究了开辟另外的战场，爱尔兰也包括在内。海军参谋人员受命研究入侵爱尔兰的可能性。关于入侵可能性的报告于 1940 年 12 月 3 日由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呈给希特勒。雷德尔极力劝阻希特勒不要采取这一行动。他说，即使爱尔兰情愿向 244 德国军队开放他们的港口，但要使一支远征军登陆还是极其困难的，并且，鉴于爱尔兰的地理位置和德国缺少控制海上通路的海军优势，要在登陆后维持它的供应线也是不可能的。雷德尔说，只要英国同爱尔兰之间不处于战争状态，而且爱尔兰愿意合作，就有可能在冬季月份中偶尔将载有武器和军用品的船只偷越封锁线开进爱尔兰的港口和海湾。

希特勒不甘心放弃这个计划：爱尔兰作为一个从空中袭击英国西北部港口的基地，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希特勒认为，占领爱尔兰可能导致结束战争。但他承认，在爱尔兰登陆只能在德·瓦勒拉的同意下才能进行。为此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并给德国驻都柏林的全权公使发出指示，令其查明德·瓦勒拉是否希望得到支援。与此同时，德国的宣传机器企图使爱尔兰人相信，英国正在准备入侵爱尔兰。这时还不清楚，提出英国入侵迫在眉睫的警告是希望用以吓唬爱尔兰接受德国的援助，还是希望用以作为德国进行“保护性占领”的一种借口。德·瓦勒拉拒不允许任何外国军队插足爱尔兰领土一事无疑使那些仍按 1916 年时代的方法思想的人为之失望，特别是从 12 月 3 日的元首会议报告中，可以清楚看到，德国人竟会天真到相信德·瓦勒拉可能愿意接受德国的援助。爱尔兰政府的态度，以及雷德尔从海军角度力陈入侵是不可能的报告，估计一定已使希特勒被说服入侵是行不通的，尽管有关爱尔兰的详细地图和情报已在 1940 年到 1941 年间准备好了。加以，到 1941 年春，德国的全部资源都已被用来准备进攻俄国和援助它在地中海的意大利

见《德国外文政策文件》，第 8 卷，第 216 号，第 355 号，第 401 号，第 465 号。

卡尔·H·阿布斯哈根：《卡纳里斯》（Karl H. Abshagen: Canaris），斯图加特，德意志联邦出版公司协会，1949 年版，第 277—278 页。

《元首会议，1940 年》，第 130—133 页。

同上书。

1944 年在德国人撤离布鲁塞尔后，发现了一套地图和文件，这套地图和文件提供了有关英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的军事地理数据。最初印刷的日期是 1940 年和 1941 年（《曼彻斯特卫报》，1944 年 10 月 18 日）。

盟友。

虽然德国入侵的危险实际上已经过去了，但是还存在德国进行空袭报复的危险，如果爱尔兰允许英国使用它的港口的话。1941年1月，继而在5月，都柏林和爱尔兰的其他地方连续遭到轰炸，所投下的炸弹经查明是来自德国的。1月6日和6月4日，爱尔兰政府就这种侵犯中立领土的行径向德国政府提出抗议。对这两次事件德国人都提出，应由英国飞机负责，但是他们最后承认说，不能排除5月31日有一架德国飞机偶然地在都柏林误投炸弹的可能性。德国政府同意赔偿这一事件所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炸弹都是偶然地误投在爱尔兰的这种解释，似乎是很站不住脚的。那末德国人当时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它是不是想通过使爱尔兰人相信炸弹是英国飞机投的而挑起爱尔兰同英国的纠纷呢？还是想吓唬住爱尔兰人使其采取更为合作的态度？或者是——这似乎是最可能的——打算用炸弹作为一种警告，如果爱尔兰对英国实行让步，将会出现什么事情。无疑，空袭在这方面是有些作用的。爱尔兰几乎没有防空工事，对未设防的城镇遭到空袭的恐怖确实加深了爱尔兰人严守中立的决心，虽然采取和坚持这个政策主要是出于其他原因。

到1941年年中，德国人一定已明白，他们所能期望从爱尔兰得到的好处，莫过于爱尔兰严守中立，因而拒绝让盟国染指它的港口，与保留德国在都柏林的代表，在那里他们可以获得有关盟军军事活动的重要情报。

如果爱尔兰在战时的态度，对英国和美国来说，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那末它对希望看到爱尔兰再发生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更大规模动乱的纳粹政府来说，无疑也是同样如此。

第三节 袭击珍珠港到盟国总攻日：与盟国的关系以及中立的经济后果

（一）美国参战的影响

由于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和12月11日德国及意大利的宣战，美国也于1941年12月加入了交战国行列。美国人可能曾抱有希望，爱尔兰将会因他们的参战而改变它的政策，这种希望很快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12月14日，德·瓦勒拉在科克的一次演讲中说，国家的政策将保持不变，即友好的中立政策。尽管如此，罗斯福仍然决定吁请德·瓦勒拉重新考虑他的决定。罗斯福在12月22日发出的一份备忘录中说，如果要维护自由和自主，那就必须由所有的自由国家一起来捍卫它。他表示确信，爱尔兰政府和人民在目前形势下会懂得应该怎样负起他们的责任。1942年1月27日，德·瓦勒拉发表一项声明抗议美军在这前一天在北爱尔兰登陆。他说，无论是英国

《泰晤士报》，1941年1月8日。

《曼彻斯特卫报》，1941年6月6日。

《泰晤士报》，1941年6月20日。

见下文，原著第248—249页。

《纽约时报》，1941年12月15日；参阅同日的《泰晤士报》。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54—1355页。

《泰晤士报》，1942年1月28日。1942年1月26日到达北爱尔兰的军队，是根据1941年1月至3月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一期英美参谋长会议上制订的英美联合战略方案开赴欧洲战区的第一梯队。1941年秋天德·瓦勒拉所指责的那些美国技术人员和工人可能在从事开拓那些美国武装部队在参战后所需要的基地。自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在华盛顿召开的阿卡迪亚会议上，决定即刻着手派遣一支小型的象征性部队

政府还是美国政府都未就此同爱尔兰政府进行过协商。爱尔兰对它整个领土统一的权利要求将不因美国远征军的到来而受到影响。他最后说：“继续保持爱尔兰的分裂就如同侵略所有国家一样是不能原谅的，而结束侵略别国正是英国和美国在这场战争中信誓旦旦公开宣布的目的。”2月6日，当布伦南向美国政府递交这一声明书时说，爱尔兰政府和人民把美国军队的到来看作是对分裂的认可。他们还担心，美军可能被用来以武力占领基地。副国务卿韦尔斯向布伦南保证说，美国无意侵犯爱尔兰的中立。罗斯福在2月26日写给德·瓦勒拉的一封信中，又进一步作了保证。同时罗斯福还告诉他，若当媾和时机到来时，爱尔兰还继续坚持孤立政策，那它的地位就将遭到损害。4月26日，在答复罗斯福盼信中，德·瓦勒拉重申他反对美国军队在爱尔兰登陆，并要求为它提供武器，以便使爱尔兰能进行自卫。美国政府没有予以答复。

德·瓦勒拉不允许由于美国参战而偏离他的严格中立路线的决心，得到了国内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人们对J·M·狄龙鼓吹与大不列颠和美国积极合作的演说所作的反应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1942年2月10日，在反对党“爱尔兰统一”党的年会上，当时该党的副主席狄龙说，爱尔兰之获得独立是由于美国人民的支持。爱尔兰247作为报答，就应该向美国人民奉献出它所有的一切，并不让自己被德国的威胁所吓倒。狄龙的态度给他的党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结果他辞了职。“爱尔兰统一”党主席威廉·科斯特格雷夫在接受他的副手辞职时说，党不相信狄龙所主张的那条路线符合国家的利益。

在这同时，德·瓦勒拉和供应部长肖恩·勒马斯告诫他们的国民说，如果他们希望保持中立，就必须准备为之努力工作，需要的话，并为之而战斗。更多的人应当自愿接受军训，生产必须得到发展，如果他们要避免被困死的话。德·瓦勒拉2月3日在纳斯说：“爱尔兰很可能越来越陷于与外界隔绝，对我们的威胁也将越来越大。”

（二）中立的经济后果

1942年和战争的余年中，对爱尔兰经济生活的最严重威胁是燃料和肥料的匮乏，而这两样东西，爱尔兰大部分是要靠从国外进口的。在政府实施强制耕作政策之下，土地迫切需要肥料。战前，德·瓦勒拉为了推行他的经济自给自足政策，采取了各种措施来提高国内谷物和其他作物的产量。战争年代中，在强制耕作制下，土地的面积逐渐有所增加。到了1942年，由于政府实行这项政策的结果，爱尔兰生产了大约四分之三本国人民所需的小麦。可是，1942年初，在新谷尚未收割以及为填补当时供求之间的差距而从国外进

赴北爱尔兰，即所谓的“磁铁行动计划”《二年一度的报告》，第16页；罗伯特·E·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珍闻秘史》（Roosevelt and Hopkins: an Intimate History），纽约，哈珀，1948年版，第459—460页；英国版：《哈里·L·霍普金斯的白宫文件》（The White House Papers of Harry L. Hopkins），两卷集，伦敦，艾尔斯波蒂斯伍德，1948—1949年版，第1卷，第472页。

原文见《纽约时报》。1942年1月28日；另见同日的《泰晤士报》。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65页。两年后发表的罗斯福于2月26日写的原信全文，见1944年3月12日《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1942年2月11日；参阅同日的《泰晤士报》。

《泰晤士报》，1942年2月20日。

《每日电讯报》，1942年2月4日；参阅同日的《泰晤士报》。

口的小麦尚未运到之前，政府迫不得已将面包供应量削减百分之二十，并禁止磨制精白面粉。来自伦敦的游客在此所获得的关于它是一个富足国家的印象大部分是令人产生误会的。都柏林的旅馆固然供应丰富多采，有大量的肉、蛋、糖和奶油。但是由于价格高涨和工资管制，大多数的这些食品对于较为贫困的人们来说，是买不起的。对许多爱尔兰人来说，马铃薯是唯一可供代替面包的食品，1942年的小麦短缺确实使收入较低的阶层遭受到莫大的苦难。茶叶的缺少——整个战争时期都是如此——这对一个有大量饮茶嗜好的人的国度来说，也是深有切身之感的。每人每星期只定量配给半个盎司到一个盎司的茶叶，在黑市上则卖价极高。1942年6月，实行了服装的定量供应；那一年里，燃料煤和汽油的短缺也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为了应付物资匮乏，政府雇佣了許多人从沼泽地里挖掘泥炭，泥炭堆遍及全国，连都柏林的长生鸟公园里也堆起了两座巨大的泥炭堆。泥炭是家庭用户所使用的主要热源：没有煤可供使用，而煤气和电力又都受到严格的限制。点灯用的石蜡和蜡烛也供应不足。1942年5月1日起，禁止向私人汽车主出售汽油，并减削了公共汽车和电车的服务。马路和街道上，自行车和马拉的车辆取代了汽车。爱尔兰久已是骡马之乡；旧的双轮轻便马车和短途游览车被拉出马厩和院落，掸去尘土，再一次奔驰在路上。1942年和战争的余年中，燃料短缺所造成的最严重局面是它对公共运输和工业的影响。国家的运输系统大部分脱节了。有限的火车班次，由于机车烧的是木柴、泥炭和少量的劣等煤屑，因而行驶缓慢且不准点。煤和其他原料短缺的结果，使许多行业被迫关闭了它们的工厂和车间，或者只留下最低限度的人员维持门面。国家全靠把大批的青年男女外迁，到英国的军火工厂去工作，才免于造成普遍失业的现象。除了那些在国外从事文职工作者外，在海外的大批爱尔兰人参加了英国军队。在国内大约有二十五万人参加了爱尔兰军队，另外许多本来要失业的人则从事挖掘泥炭的工作。

（三）同美国关系的恶化

1943年间，爱尔兰与盟国的关系没有什么重大进展。尽管美国政府和人民感到难以理解或同意爱尔兰一心要继续置身事外的那种最后决定，但他们并未试图迫使爱尔兰政府放弃他们的中立政策。美国政府和人民既已放弃了他们自己的中立而投入到对轴心国的战斗中去，他们决心以他们独特的高度热情把它进行到底，因而每当他们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障碍时，就按捺不住性子。再加，在战争的头两年间，他们总认为爱尔兰拒绝出让它249的基地的主要原因，在于它对英国的厌恶和不信任。因此，在美国参战后，德·瓦勒拉还继续拒不让盟国使用它的港口这件事，不但使他们感到失望，而且大为恼火。1943年夏，美国政府考虑到，为了促使爱尔兰租让港口并驱逐在都柏林的轴心国代表，对爱尔兰政府施加更直接的压力是可取的。有人建议，如果德·瓦勒拉拒绝满足他们的要求，美国和大不列颠便可运用经济制裁手段。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魁北克和开罗会议上，就按照上述方针处理基地问题

由勒马斯在2月19日一次广播讲话中宣布的，（《泰晤士报》，1942年2月20日）。

德·瓦勒拉在1945年10月18日众议院的一次声明中说，在1940年至1945年间，有十二万四千五百名男人和五万八千七百名妇女在英国和北爱尔兰找到了职业（《每日邮报》，1945年10月19日）。

参加英国军队的爱尔兰人民的确切数字不得而知。高夫将军在1914年8月提供的数字是最近亲属在爱尔兰有地址的人为十六万五千名，

进行了商讨。1943年12月22日，在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致美国国务院的一份照会中，表达了英国政府对于此事的观点。艾登说，英国政府认为，拟议中的处理方法将只会引起更为严重的困难，因为这样一来德·瓦勒拉很可能避免表示直接拒绝而设法借口提出分裂问题来混淆事端。因此，美国政府同意把这件事暂搁起来。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于爱尔兰政府所提出的准其购买美国船舶的申请，就不倾向于给以善意的考虑了。1944年1月6日，格雷向德·瓦勒拉递交了一份照会指出，两艘由爱尔兰政府包租的美国商船于1941年被德国潜艇击沉，而爱尔兰政府竟没有提出任何抗议。假如更多的船只移交给爱尔兰，它们很可能会遭到同样的命运。爱尔兰政府通过他们驻华盛顿公使布伦南提出抗议说，美国的照会是毫无理由的，因为没有证据可以表明，这两艘船的损失确是由于德国的行动所致，但是从此就没有更多的船给它用了。

随着盟军总攻日的迫近，轴心国间谍在爱尔兰的存在和爱尔兰的地理位置为他们提供监视和报告盟军军事活动的良好机会，引起了美国 and 英国越来越大的不安。美国政府决定这是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时候了。于是在1944年2月21日，在与英国政府协商后，美国以一份命令式的照会由格雷递交给德·瓦勒拉，要求他安排撤走在都柏林的德国和日本代表。美国政府表示希望爱尔兰政府的行动将采取断绝一切外交关系的形式，但要求“最低限度是无条件地撤销这些轴心国代表，因为他们在爱尔兰的存在肯定将披看作构成对美国士兵的生命和对盟军作战胜利的一种威胁”。第二天，驻爱尔兰的英国代表约翰·马非爵士（后为拉格比勋爵）递交了英国的照会，声明联合王国政府欢迎美国要求撤销轴心国代表的倡议，并说这一倡议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

德·瓦勒拉告诉格雷说，要他答应美国的要求是不可能的。同时他立即采取步骤以捍卫这个国家的中立。军队奉命处于戒备状态，并取消一切休假；边防哨所和战略要地都配备了人员，桥梁埋置了地雷。但是，与此同时，爱尔兰驻华盛顿公使得到美国政府的保证，说它无意也不打算入侵爱尔兰以求满足他们自己的要求。2月29日，美国驻都柏林公使也对德·瓦勒拉作了同样的保证。

在对盟国的要求正式答复以前，德·瓦勒拉呼吁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首相从中斡旋，促使英美两国撤回这种照会。但是，这两位首相通知他说，由于他们完全同意美国政府所提的要求目标，所以请他们调解是爱莫能助的。南非和新西兰首相也表示他们支持美国的要求。

3月7日，德·瓦勒拉向美国政府发出一份很长的照会，确认了他在2月21日口头上对格雷所作的拒绝。他写道，爱尔兰政府对美国竟向他们发出一份如此严峻的备忘录深表震惊。并否认美国所称爱尔兰的中立是为轴心国

见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56—1357页。

有关1944年3月12日在美国发表的美照会和布伦南的复信的原文，见当天的《纽约时报》。

照会原文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1944年》，第675—676页。

原文见同上书，第678—679页。

见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58页。

《纽约时报》，1944年3月14日；《曼彻斯特卫报》，1944年3月22日。

《泰晤士报》，1944年8月16日。

谋利益这一指责。从战争一开始，爱尔兰就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来防止泄漏任何可能危及英国安全和危及后来的美军安全的情报。德·瓦勒拉提到了曾经采取的一些措施，包括对新闻和通讯的严密检查，以及开展一个广泛的反间谍运动。德国驻都柏林公使的无线电发报机被没收了。五名空投的敌特被逮捕监禁。包括伞兵在内的十二名间谍嫌疑分子在同一天内下狱。德·瓦勒拉又说，英国政府尊重爱尔兰的战时中立对于改变爱尔兰人民对英国的感情已做了很大贡献。如果这种“可喜的结果”如今因任何一点小事而遭破坏的话，那将是很遗憾的。接受美国的要求，并要德国召回它的代表就意味着放弃爱尔兰的中立，朝战争迈出了第一步。

1944年3月11日公布了美国的要求和德·瓦勒拉表示拒绝的答复。在3月17日的一次记者采访时，布伦南把美国的照会形容为“几乎是一份最后通牒”，他说，这个消息公布时，就好象是“对爱尔兰人民投下了一颗炸弹”。

对入侵的恐慌虽然是短暂的，但爱尔兰始终惴惴不安的是，唯恐美国和大不列颠将诉诸于经济战。1944年3月14日，丘吉尔在下院的讲话并不令人放心。当有人问到丘吉尔，英国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来对付因轴心国使团呆在都柏林从而使德国得以刺探盟军行动的危险时，首相说，前一天已经宣布，禁止在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之间的所有旅行，接下来就将进一步采取措施以贯彻这一政策，“那就是在目前即将来临的危机时期，使大不列颠和南爱尔兰隔绝开来，同时也使南爱尔兰和外界隔绝开来”。他又说，他很遗憾，由于有大批爱尔兰人在英国部队中作故，因此有必要采取这些措施。隔离爱尔兰的措施，包括禁止船舶和飞机离开它的海岸开往外国港口或机场，撤销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之间的电话通讯，以及中断伦敦一部柏林航线。英国和美国政府不准备再对爱尔兰政府作出将继续向其供应各种必需品的保证，因为他们希望，爱尔兰的政治家们可能惧于经济制裁而采取一个较为合作的态度。

美国政府建议就都柏林的轴心国代表问题向德·瓦勒拉发出第二份更强硬的照会。可是，当时爱尔兰政府已经表示，他们愿意采取另外措施来满足盟国的愿望，丘吉尔认为，鉴于有了这些保证和爱尔兰政府已经采取的步骤，再发一份照会是不必要了。美国政府接受了丘吉尔的意见，同意把此事搁置起来。

面对着外界的反对，国内所有政党乃一齐团结起来支持德·瓦勒拉。1944年3月15日，在众议院进行的一场三小时的辩论中，德·瓦勒拉拒绝美国要

有关1944年3月10日发表的照会的原文，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1944年》，第676—678页。《纽约时报》，1944年3月18日。

批评德·瓦勒拉的人声称，德·瓦勒拉为了本国内部的利益夸大了这一危机，目的是想以爱尔兰中立的捍卫者们身份为他的党派博得更多的支持。

下院辩论，第5辑，第398卷，第36—37栏。

1944年3月19日丘吉尔给罗斯福的信（见丘吉尔，第5卷，第614—615页；美国版，第5卷，第700—701页）。

同上。

令人感兴趣而注意的是，美国和英国在对待爱尔兰问题上传统扮演的角色在战争后期竟颠倒过来。在这时期，1943—1944年，坚决主张采取较强硬行动的反而是美国，而英国却一般地建议保持克制态度。

求的行动得到了所有各种色彩的党派发言人的支持。两个月后，5月31日大选的结果，确认了公众对德·瓦勒拉捍卫爱尔兰中立政策的支持，那天，自主党因获得了大幅度增加的选票而重新掌权。

第四节爱尔兰与战后世界

对许多爱尔兰人来说，中立政策成了一项与统一同等重要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战争结束前发生的两件事清楚地证明德·瓦勒拉决心要把中立政策坚持到底。第一件事就是他拒绝作出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将不允许轴心国战犯到爱尔兰来寻求避难。1944年9月21日，美国政府就此提出异议，10月9日，德·瓦勒拉回答说，他不能作出拒绝给任何人避难的保证，只要“公道、仁爱、国家的荣誉和国家的利益需要这样做的话”。但是，他指出：

从目前这场战争开始以来，爱尔兰政府的一贯做法就是，对于所有那些外国人，只要他们的出现与爱尔兰的中立政策相违背，或者对爱尔兰人民不利，或者是与爱尔兰人民希望避免损害友好国家利益的愿望不相符时，都一概不允许其入境。

第二件较难理解的事是，在获悉希特勒死去后，德·瓦勒拉决定去德国驻都柏林大使馆吊唁。毫无疑问，这种礼节性访问是符合外交惯例的，但对许多愤怒的旁观者来说——爱尔兰人也包括在内——却好象是对联合国的一种平白无故的侮辱。德·瓦勒拉的行动说明，他和许多爱尔兰人已经在多大程度上绪纯粹是权宜之计的中立政策加上了一种近乎神圣的内容。中立应该有的礼节必须遵守，哪怕是因此而违反了世人的良心，并使爱尔兰失去世界的同情。

欧洲胜利日以后，大多数从开战以来一直束缚着爱尔兰的种种限制被废除了。1945年5月11日，战时检查制度取消了。爱尔兰市民第一次能够从他们的报纸上看到轰炸伦敦的情景，读到有关德国惨无人道的集中营的报道。也是第一次在报纸上能够发表关于英军中的爱尔兰253人因建立功勋而荣获七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事迹，以及其他有关表彰英勇行动的嘉奖。战争期间禁演的战争影片和新闻片在爱尔兰影院上映了。6月11日，英国政府解除了关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之间旅行的禁令。数百名在战争期间被拘禁的爱尔兰共和军成员获得了释放。但是，此后不久，由于被开释的那些人又重新策划阴谋和进行其他非法活动，爱尔兰政府不得不又重新拘捕了爱尔兰共和军的“参谋长”麦卡蒂和该组织的其他成员。7月6日，德·瓦勒拉向议会要求延长政府的紫急应变的权力。7月24日，政府宣布援引危害国家法令第四条，可以不需经过审讯就拘禁任何嫌疑分子。

战争结束时，爱尔兰政府迫切希望恢复他们在各种国际会议中的地位。1943年11月，德·瓦勒拉说，爱尔兰准备参加“任何国际组织，只要它是在大国与小国之间一律享有主权平等的基础上，以实现集体安全和维护和平为宗旨的”。但是，爱尔兰不准备付出那些交战国所索取的代价，即放弃它

《国务院公报》，1944年11月19日。

德·瓦勒拉在1945年7月19日的一次众议院的会议上说：“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它可能被误解了。我将在这个国家里执行我的职责，并作为一个外交部长尽到应有的礼节，即使我不得不面对误解，或者我们的国家也因此而不得不受到误解”（《泰晤士报》，1945年7月20日）。

《泰晤士报》，1945年7月25日。

《众议院辩论》，1943年11月11日。

的中立，或者仿效其他一些中立国。在最后一刻，为了猎取联合国会员国的资格，而赶上潮流。因此，爱尔兰没有被邀参加 1945 年 6 月举行的讨论建立联合国组织的旧金山会议。7 月 18 日，德·瓦勒拉在众议院中批评了在这次会议上所同意的联合国组织，因为在这个组织里，小国将只有极小的影响。

象其他小国的领导人一样，德·瓦勒拉带着厌恶和不安的心情估量着这个战后的世界组织，在这个组织中，所有主要的决议表面上将是山四五个大国作出的，但实际上，是由三个大国美国、苏联和英国作出的，因为法兰西和中国仅仅是名义上的大国。而且，在这共管国际中两个主要大国之一是苏联。共产主义及无神论的俄国是德·瓦勒拉和他的天主教及保守的同胞所诅咒的对象。对苏维埃政府的恐惧和不信任可能是德·瓦勒拉在战前和战后制定其大部分政策的关键所在。国联破产后，企图把俄国拉进到一个反希特勒集团的努力，无疑增强了德·瓦勒拉的决心，要在一旦发生战争时继续保持中立。在战争 254 后期年代里，德·瓦勒拉对德国人的政策——这使普通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感到十分困惑不解——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苏联的恐惧。德·瓦勒拉原想看到一个对德国宽容的乃至妥协的和平，为的是在战争结束时可以保持一些表面上的欧洲均势，以与俄国抗衡。如果德·瓦勒拉希望能使盟国相信这一政策是可取的话，那末爱尔兰继续保持同德国的联系，显然是有利的。鉴于后来事态的发展，可以证明在这个观点上德·瓦勒拉是正确的。但是，在当时所处的情况下，任何这样的愿望看来都是不现实的。在从前由职业军队为极其有限的目标而进行的战争中，那倒或许是有可能的。但在四十年代，若说民主政府的领导人能说服他们的人民——即使他们愿意这样做的话——相信曾被当作是讨伐邪恶的十字军的一场战争却应当在优待恶人的基础上结束，便简直难以想象了。况且这样一种企图，也是决不会受到曾在德国占领下的西欧国家的欢迎的。罗斯福和美国的主要的政策制定者们，以及许多英国人都认为，均势是一种过时了的概念。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世界组织上，而这个组织要能成功的话，就必须包括俄国在内。这样，一种妥协的和平就将意味着放弃他们所有的那些希望，即建立一个更好和更合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俄国将按国际大家庭的礼让，作为一个理所当然的成员取得它的席位。离开这一点，就意味着大不列颠和美国将不得不自食其对俄国作出的他们不会对德单独媾和的诺言。

鉴于爱尔兰的历史和它的领土分裂仍未消除的状态，中立大概是德·瓦勒拉在战争开始时所能采取的唯一政策。不过，他曾经那样毫无妥协余地坚持中立的态度，是否显示出他在政治上的明智，这倒是值得怀疑的。当战争结束时，他的确维护了爱尔兰在选择战与和上的主权，但他为此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分裂问题已被搞得越来越难解决了。北爱尔兰人已下定决心不同他们的南方邻居联盟。而且，他们现在又得到了英国支持的保证。1945 年 5 月 13 日，丘吉尔开了第一炮，在一次英国战史评论广播会上，首相抛掉了他在战争时期对爱尔兰表现过的政治家的克制风度，猛烈地攻击德·瓦勒拉拒绝英国使用爱尔兰的港口。爱尔兰政府被谴责与轴心国代表“调情”。丘吉

雅尔塔会议一致同意，只有那些对任一轴心国宣过战的，并不迟于 1945 年 3 月 1 日遵守联合国宣言的国家才有资格参加旧金山会议。在 1945 年头几周内，有若干国家履行了这些条件。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45 年 7 月 20 日。

尔说，如果不是出于北爱尔兰的效忠，英国为了确保它自己的生存早就应该把爱尔兰的中立置于度外了。5月16日，德·瓦勒粒以委婉的语气作了答复，但他重申了爱尔兰的中立权利，以及在继续保持分裂的情况下，爱尔兰不能奉行任何其他政策的论点。

争取美国积极支持结束分裂局面的机会也已经错过了。在英国人和美国人的眼里，爱尔兰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以致不允许他们默认一个政府可以无条件地管辖这整个岛，因为在一场他们所投入的战争中，这个政府可能再次坚持中立。德·瓦勒粒显然不准备对一项与英国共同防御的政策承担义务，虽然他表示，如果爱尔兰能够统一的话，是有可能达致某种安排的。在7月19日的一次关于对外事务的辩论中，他说，英国由于它帝国本身的利益，很可能被卷入一场与爱尔兰无失的战争。要制定一项只有当爱尔兰的利益被明显涉及时才适用的防御政策，即使对于一个统一的爱尔兰来说也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两天前，德·瓦勒粒就阐明了爱尔兰对英联邦的立场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我们对外事务的政策上与英联邦国家联合一道”。他说，他准备坚持这一政策。这样，虽然德·瓦勒粒不愿意作任何让步，但他还是渴望把门半开着。在这两岛上主张英爱合作的支持者们努力证明爱尔兰的中立，事实上是在一定程度上被看作为有利于英国的，这就证明，他们希望在两国之间保持友好的关系。他们指出，英国已经由于爱尔兰为其供应粮食和在英国及北爱尔兰工厂工作的爱尔兰移民为其提供额外劳动力而受益。这两项贡献主要都是出自经济需要方面的考虑，因此不能完全把它看作是同情盟国的证据。不过，成千上万的爱尔兰男女确曾站在英国一边。除了那些在军队中服役者外，在英国故时活动的每一领域中，在英格兰和海外，都可以看到许多爱尔兰的男人和妇女。在爱尔兰，对盟国的同情表现在许多方面。迫降在爱尔兰的英国和美国飞行员，爱尔兰人把他们隐藏起来，并帮助他们越境进入北爱尔兰。对在训练或非作战飞行中飞机失事的驾驶员没有加以拘留，且为他们提供修理飞机的各种便利，只要他们在适当的时间内就起飞的话。

传说有一支爱尔兰军的分遣队曾被派出去用炸药炸毁一排树，因为否则这些树木就会妨碍一架英国飞机在预定时间内起飞。来自英国危险地带的难民都受到欢迎。

遗憾的是，爱尔兰在战争年代里的孤立地位，给国内外部带来了一定的影响。爱尔兰政府始终不渝地坚持了一项不偏不倚的中立政策，在国内又实施了严格的检查制度，从而使爱尔兰人民与外部世界思想感情的潮流隔绝起来。曾鼓励爱尔兰人在经济上、文化上和精神上培养起一种自信心。爱尔兰宛如一株经过大力修剪的树木，唯一留下可自由成长的嫩枝只是爱尔兰民族主义的枝茎，簇拥着一枝独立、统一的盖尔人的爱尔兰的花朵。在这个凯尔特族人的黄昏图景中，只能隐隐约约地分辨出外部世界的轮廓。对很多人来说，这种幻梦已显得比当今世界的严酷事实更为真实了。

《泰晤士报》，1945年5月14日。

《泰晤士报》，1945年5月17日。

同上，1945年7月20日。

同上，1945年7月18日。

见上文，原著第248页注（即本书第384页注——译者）。

第四章 介于盟国和轴心国间的西班牙

凯瑟琳·达夫

第一节 1939年9月的形势

(一) 内战的后果

西班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已经持续进行了三年的内战（1936年7月至1939年3月）。这场内战同时又是一场宗教的、阶级与阶级间的、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间的、地方主义与中央集权间的战争，双方都进行了残酷的鏖战。据说，在这三年内，在战场前线，由于处决和屠杀或是由于饥馑、疾病和空袭，约有一百万西班牙人丧生。获得胜利的国家主义者对于共和主义者始终仇视，共和主义者中有二十五万人依然被监禁着，大部分人在等待审讯。几千名共和主义者已被枪杀，十万以上的人被放逐，社会秩序全靠警察国家的方法来维持。许多歹徒和游击队依然逍遥法外，不参加这两大派间的政治斗争的大部分人民的最大希望是西班牙不再回到1936年至1939年的恐怖时代中去。

国家主义者政府似乎不致有遭到推翻之危险，除非西班牙因卷入一场全面战争而陷于混乱，或者建立起来的支持这个政府的不稳定的联盟趋于瓦解。人们已可清楚地看到了内部的不和与猜忌，特别是在那些由军队、地主、商人、极端的天主教传统主义者和支持唐胡安王子的不太反动的君主主义者组成的较守旧的右翼集团，以及那些原来是一种二十世纪“国家社会主义”式运动的长枪党之间，他们把信仰经济与社会激进主义同憎恨马克思主义与蔑视资产阶级民主结合起来。而长枪党和教会之间的关系也并非是完全协调的。在内战期间，长枪党运动在数量和实力上已迅速增长，它当时在由所有

见《概览，1937年》，第2卷；《概览，1938年》，第1卷，第3编，以及《概览，1939—1946年：1939年3月的世界》，第138—151页。

托马斯·汉密尔顿：《绥靖的产儿，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Thomas J. Hamilton: *Appeasement's Child, the Franco Regime in Spain*），纽约诺夫，1943年版，第36—37页，第43页。经官方统计局的许可引用了这一数字，但尚未明了的是，这个数字究竟包括多少被国家主义者以半官方形式谋杀或处决的共和主义者。

据说，在西班牙监狱中被拘留的或许包括非政治罪犯在内的人数，在1940年1月1日已达二十七万零七百十九名，1941年1月1日为二十三万三千名，1944年1月1日七万四千名。1952年2月21日包括各种囚犯在内的数字为三万零一百三十人，自1936年以来，其中有七百九十三人因是“马克思主义叛乱分子”而被囚禁的，四千五百八十二名是政治犯。“马克思主义叛乱分子”这一罪名，或许并不包括被指控犯有非政治性罪行的共和主义者。至1952年，甚至还有一些共和主义者未经审讯而被监禁着。最初，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在1946年和1947年大批释放囚犯前，实际上一直没有改善过（反对集中营制度的国际委员会：《关于西班牙监狱制度的白皮书》）

西班牙内战结束时，约有四十五万共和主义者逃入法国，甚至在1939年年底，法国政府还一直在供养着五万一千四百名平民和七万一千三百名军人〔《国际劳工局年鉴，1939—1940年》（*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Yearbook. 1939—40*），第227—228页〕。据1940年2月一次法国官方的估计，难民总数为十四万人。原已离开法国的三十万人中大多数已返回西班牙：二万至二万五千名已返回拉丁美洲〔尤金·M·库利彻：《欧洲人口的流离》（*Eugene M. Kulischer: The Displacement of Population in Europe*），研究和报道，第15集（移民），第8号，蒙特利尔，国际劳工局，1943年版，第44页〕。

关于这一时期的政治形势见艾利森·皮尔斯：《黯淡的西班牙，1937—1943年》（*E. Allison Peers: Spain in Eclipse. 1937—1943*），伦敦，梅休因，1943年版，第101页以下，第130—132页。

各国家主义政治党派于 1937 年 4 月合并成的单一政党中已居统治地位。在 1939 年 3 月重新组阁时，长枪党党员又使传统主义者吃亏而获得了胜利；他们在首都和各省市的政府机关内占据了要津；他们的领袖中有一个名叫拉蒙·塞拉诺·苏内的，他是内政部长，长枪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又是佛朗哥的妻弟，因而他很有资格成为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文职人员。这个野心勃勃和目空一切的塞拉诺·苏内直到 1937 年方才成为长枪党党员，他与其说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倒不如说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他在外交事务上已经大量插手，因此，他要取代最近被任命为外交部长的贝格贝德尔上校的职务，看来只是时间问题。他一直在竭力发展同轴心国的合作，但是他实际上很害怕德国的侵入，这种恐惧心理他在 1939 年 6 月罗马的一次宴会上所作的演说中显露出来。然而对于法国和英国，他却表示了根深蒂固的敌视，据说是因为这些国家驻马德里的使馆曾在 1936 年拒绝给他的兄弟们以避难权。

虽然长枪党已变得很有势力，但陆军依然是西班牙 258 最强大的力量，身任总司令、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党魁四职的佛朗哥将军，自 1936 年 10 月以来，一直以他的沉着顽强的毅力保持了地位，而正是他的这种沉着顽强的毅力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安然无恙。他向他敌对的国家主义者集团所作的让步都摆得四平八稳。譬如，他在 1939 年 8 月任命了几名新的长枪党部长后，就又任命了一名陆军军官为该党的书记。有一年多的时间，该政府几乎在名义上有两个外交部长，而每逢两个敌对的集团中的一方有一名主要的代表被解职时，一般地跟着就会有另一方集团中的一名主要代表被解职。联合政府就是采用这种方针取得了稳定，尽管效率很差，而由于各党支部同正规政府各部门之间的重床叠架，事情就搞得愈来愈糟了，另一方面，不久之后又建立起来一种由国家—辛迪加公司组成的统治集团，更加剧了这一混乱状况。另外不幸的是，许多原来在这样的时期满可对国家做出有益贡献的人，死的死，流放的流放，监禁的监禁，或者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不予任用。无疑国家在社会服务方面是做了一些工作的，但总的说来，这个政权腐败而又无能，并充满着勾心斗角，对于它那些怀有更大理想的拥护者是惨痛的失望。

行政管理上的混乱以及倾向于自给自足与管制经济的长枪党同具有较正统观点的其他一些国家主义者之间的不协调，使这个因社会革命和战争而遭到蹂躏和破坏的贫穷国家的经济建设更加困难重重。由于缺乏国外进口的原材料，经济生活几乎陷于停顿状态。不光需要进口大量食品，而且也必须进口为国家主义者打算实施的发展计划所需的各种设备。按照西班牙政府缺少

这个新党被命名为西班牙传统主义者和 JONS 的长枪党（Falange Española Tradicionalista y de las JONS）；JoXS 这一名词则又是另一个运动，即进攻性的国家工团主义委员会（“Juntas de Ofensiva Nacional-sindicalista”）的缩写。

塞拉诺·苏内有一个译名叫“大舅子”，即西文中的“el Cunadísimo”，以针对佛朗哥“大元帅”（Generalísimo）的称呼。有关苏内自己生平的记载，见他的回忆录《在昂代与直布罗陀之间》（Entre Hendaia y Gibraltar），马德里，西班牙出版发行公司，1947 年版。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 3 卷，第 805 号。

有关国家—辛迪加组织，见皮尔斯：《黯淡的西班牙》，第 121—122 页。

杰拉尔德·布伦南：《西班牙的面貌》（Gerald Brenan: The Face of Spain），伦敦，特恩斯蒂尔出版社，1900 年版，第 Xiii，35—40 页。

黄金和国外资产的情况，要偿付所有这些进口物资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因此，在这初期恢复阶段，向国外政府要求信贷就至关重要了。

（二）外交政策及其与西方大国的关系

国家主义者压根儿无意专心致力于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一开始他们就坚持西班牙“志在”海外“帝国”。他们所渴望掌握的领导权，一部分是在“精神”和文化方面。259 西班牙在国际大家庭中的影响，是要通过同有血缘关系的西属美洲各国建立较密切的联系以得到增强，同时它也对阿拉伯世界表示了一种友好姿态，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是比西班牙更有资格赢得同穆斯林人的相互谅解的。另一方面，西班牙准备全面扩充其陆、海、空三军，并准备建造四艘三万五千吨的战舰，民族主义者也对收复直布罗陀以及扩张其非洲的领土表示了兴趣。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说到要把葡萄牙并入他们的新帝国内。据暗示，西班牙在下一场战争中将不大可能保持中立，而且不应该忽视上帝已赐给他们的战略优势。当时还是外交部长的霍尔达纳伯爵，在1939年4或5月间对新任命的英国大使莫里斯·彼得森爵士说，西班牙无意染指直布罗陀海峡，但是，塞拉诺·苏内接着在6月访问罗马时不但要求直布罗陀，而且还要求法属摩洛哥，可是，他又明确表示，西班牙在二、三年内将决不会从事战争。佛朗哥在齐亚诺于7月拜访他时，坚持要保持不少于

见阿瑟·洛夫德：《世界大战在西班牙》（Arthur F.Loveday：worldWarin Spain），伦敦，默里，1939年版，第184—185页（长枪党纲领第1条至第5条）；弗朗西斯科·佛朗哥：《领袖言论集》（General Francisco Franco：PalabrasdelCaudillo），巴塞罗那，忠诚出版社，1939年版，第299—300页，第310—314页；卡米洛·巴尔西亚·特雷列斯：《西班牙国际政策的要点》（CamiloBarciaTrelles：Puntoscardinales de la politicainternacional espanola），巴塞罗那，忠诚出版社，1939年版，散见各处；何塞·佩马尔廷：《新的是什么？》（JosePemartin：Que eslonuevo？），圣塞瓦斯蒂安，西班牙文化社，1938年版，第8章和第428页。

《新的是什么？》，第137—138页；另见佛朗哥接见《意大利人民报》（Popolod'Italia）的采访记（1938年5月15日）。

佛朗哥：《领袖言论集》，第316—314页，以及1938年5月15日《意大利人民报》的采访。

加里亚佐·齐亚诺：《走向悲剧的欧洲》（GaleazzoCiano：L'Euro pa verso la catastrofe），米兰，蒙达多里，1948年版，第441页；《齐亚诺的外交文件集》，马尔科姆·马格里奇（MaloolmMuggeridge）编，斯图尔特·胡德（Stuart Hood）译，伦敦，奥德汉斯出版社，1948年版，第291—292页。（该书和英译本以后简称为齐亚诺：《欧洲》和英译本。）

有关1940年正式提出的领土要求，见下文，原著第273页，至于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和西班牙在摩洛哥问题上相互的关系，见下文，原着第311—313页。众所周知，国家主人者还曾对同加泰罗尼亚接壤的鲁西荣部分法属地区提出过领土要求。据说最近青年运动的机关报《青年报》（Juventud）把西班牙的领土要求归纳为以下几项：恢复西班牙对直布罗陀的主权；将丹吉尔及摩洛哥的某些法属地区划归西班牙范围；在奥兰地区以及法国南部某些地区设立专门政权机关，因为大量西班牙人居住在那里；扩大西属几内亚和在撒哈拉的西属地区；改变西班牙拥有利益和权力的大西洋上某些岛屿的法律地位[《黎明报》（Dawn），卡拉其，1952年8月21日]。

《概览，1939—1946年：1939年3月的世界》，第143页。

巴尔西亚·特雷列斯：《要点》，第474—476页；参阅佛朗哥：《领袖言论集》，第312页。

莫里斯·彼得森爵士：《帷幕的两侧》（SirMaurice Peterson：BothSides of the Curtain），伦敦，康斯特布尔，1950年版，第181—182页。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6月5日，6日，7日。

五年的和平，他对于这一点，比对于西班牙到头来将难免被卷入一场全面战争一点尤其更为强调。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佛朗哥还提醒德国情报机关西班牙没有作战准备。国家主义者的外交政策和重整军备工作，很受害怕共产主义俄国和国内“共产主义”的动乱的影响。如果我们只要记住这一点，即对西班牙政府和许多决非极端国家主义者或轴心国的拥护者的西班牙人来说，这个文明世界的真正敌人是俄国而不是德国，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班牙的态度就不难理解了。一旦这一设想成立的话，西方大国和轴心国之间的这场战争看来可能只不过是强权政治的一次灾难性转变，或者充其量不过是一场为俄国人火中取栗而被引入歧途的十字军运动罢了。这一时期西班牙同英国、法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是很不友好的，除了西班牙对这三个国家中的二个有领土要求之外，还有其他若干原因，诸如：国家主义者对西方自由主义的仇恨，他们把西班牙之所以被挤出大国行列的责任归咎于西方这种自由主义；他们认为无论英国和法国都不情愿容忍一个强大的西班牙控制海峡；他们对不干涉政策以及共和主义者从这三个国家非正式得到的支持，至少是在法国的人民阵线政府的默许下的支持感到不满；他们害怕西方民主国家目前正力图颠覆国家主义者的政权；他们希望推翻英美的“经济帝国主义”；他们同美国争夺在拉丁美洲的领导权。但是，所有这些敌意并不是针对一方面的，因为在所有这三国中，始终都存在着反国家主义的情绪，而在美国尤其如此，因为它后来在大战年代里的政策上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同美国和英国的贸易能为西班牙提供其迫切需要的原材料、粮食和信贷，而且也可能使它不必过分地依赖德国。英国为谋求重新开放贸易所进行的试探在大战爆发之前一直没有得到西班牙的响应，但是，早在1939年5月，西班牙却已要求美国为它购买棉花给予进出口银行的信贷。美国政府当时提出了某些条件——保证美国商业界获得公平的待遇，撤销扣押美国国家电话公司的资产，释放在为共和主义部队服务期间被俘虏的美国公民——虽然这些条件并未能完全得到满足，美国还是于1939年8月提供了一笔一千三百七十七万美元 261 的信贷，为卡塔兰棉织厂供给一年的棉花。在电话公司的争端问题解决之前，美国政府不想签订一项贸易协定，但是，他

齐亚诺：《欧洲》，第 441 页；英译本，第 291 页。

意大利外交部：《意大利外文文件，第 8 集，1935—1939 年》（IDo- cumenti diplomatiei italiani, ottava serie：1935—1939），罗马，国家图书局，1952—1953 年版，第 12 卷，第 648 号。

譬如，许多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没有站在共和主义者一边的英国侨民遭到监禁，被逐出西班牙，要不然就受到迫害〔罗伯特·霍奇森爵士：《西班牙的复苏》（Sir Robert Hodgson：Spain Resurgent）〕，伦敦，哈钦森，1943 年版，第 172—173 页；彼得森：《帷幕的两侧》，第 184 页，第 186—190 页；坦普尔伍德子爵（塞缪尔·霍尔爵士）：《负有特殊使命的大使》〔Viscount Templewood（Sir Samuel Hoare）：Ambassador on Special Mission〕，伦敦，柯林斯，1946 年版，第 79—81 页，第 201 页，第 223—225 页。据说反法情绪在较下层阶级最为强烈，而反英情绪则在上层阶级最为强烈〔胡安·安东尼奥·安萨尔多：《一个西班牙君主主义者的回忆录》（Juan Antonio Ansaldo：Mémoires d'un monarchiste espagnol）〕，摩纳哥，罗切尔出版社，1953 年版，第 109 页。

巴尔西亚·特雷列斯：《要点》，第 472 页。

彼得森：《帷幕的两侧》，第 213 页。

菲斯：《西班牙史话》，第 9—16 页。

们对于私人贸易并未加以阻止。

（三）西班牙与轴心国

国家主义者之所以必然倒向德国和意大利，是因为他们具有反民主的政体，害怕共和主义者的反攻，以及对西方大国的不满与要求。此外，西班牙的矿产资源，尤其是它的地理位置，使它在经济和战略上都处于对轴心国大大有利的地位。但是，这些关系远远不如当时在西方通常所想象的那样密切，而且，这三个大国的利益在许多地方都是互相冲突的。佛朗哥在内战期间谨慎小心的领导已引起了他的支持者的恼怒，同时，西班牙人既害怕德国的经济渗透，又不能忽视纳粹对天主教会的态度。尽管德国人孜孜不倦地拉拢长枪党党员，并在某些地方颇有成效，但是长枪党党员中的许多人甚至还宁愿把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作为他们的典范。建立一个借以同德国优势相抗衡的“罗马—马德里轴心”的想法，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都得到了人们的拥护，尽管这一想法犹如墨索里尼用以约束极权国家的乱七八糟的其他方法那样，还不外乎是一种幻想，可是，西班牙人并没有忽视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机会。轴心国彼此间的关系照例是交替使用两面三刀的欺骗或谨小慎微的改正的手法，根据他们天生的敌对情况和希特勒吹嘘的“独裁者弟兄”而摇摆不定。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虽则不时进行磋商，但这两国政府的行动却远远不是步调一致的。

当时西班牙政府尚未与德国或意大利缔结任何一类的军事同盟。他们一直在恪守 1939 年 3 月 27 日签署的反共协定，并在 1936 年 11 月 28 日与意大利，1939 年 3 月 31 日与德国分别缔结了秘密条约（与德国的条约代替了 1937 年 3 月 20 日签订的议定书）。这两项协议都规定了双方要进行磋商和合作，而且一旦在双方中任一方卷入战争时要保持善意的中立；双方中任何一方都保证不缔结旨在针对另一方的条约。意西协定甚至还规定，那些可能还有这种作用的现有条约应置之不顾，而且，万一发生战争，中立的一方应在供应方面帮助交战的一方，并允许其使用港口、航空系统和其他运输工具，同时对条约签订国的敌方拒绝提供任何这方面的方便。意大利在 1936 年 11 月似乎就已考虑到缔结这个协定在使自己不受到集体制裁上是划算的。但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或其后不久，意大利要求使用巴利阿里群岛上的基地时，却遭到了拒绝。

同上书，第 25 页。国家电话公司是在 1940 年解除政府管制的（见下文，原著第 269 页）。战后西班牙政府买下了美国在该公司的全部股权（海斯：《在西班牙的战时使命》，第 274—276 页）。

例如，见佩马尔廷：《新的是什么？》，散见各处。

《概览，1938 年》，第 1 卷，第 355 页；议定书文本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 3 卷，第 768 号。

文本见《文件，1939—1946 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 1 卷，第 5—7 页。405@毯 05@

1937 年的议定书文本和 1939 年条约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 3 卷，第 234 号，第 773 号。

海斯：《战时使命》，第 63 页，根据意大利驻马德里大使保卢奇·德卡尔博利（Paulucci de Calboli）。意大利人的要求可能迟至 1939—1940 年间的冬季才提出[何塞·多西纳格：《西班牙做得有道理，1939—1946 年》（José M. Doussinague：Espana tenía razón，1939—46），马德里，埃斯帕萨-卡尔佩，1949 年版，第 19—21 页]。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这里所涉及到的有关西班牙的资料《西班牙做得有道理》一书。这本书是按照西班牙一位高级外交官的观点对西班牙在内战期间的对外关系所作的全面论述。多西纳格根据西班牙和其他官方材料，提出了很多有趣的证据，但是，他在证明“西班牙是正确的”方面未免过分肯定，所以在阅读本书时需抱慎重态度。

1938年9月国家主义政府宣布，如果战争爆发，他们将恪守中立。事实上，英国政府已警告他们，如果他们不恪守中立，那么法国人就要侵入他们在西班牙和摩洛哥拥有的领土。西班牙人在战前对英国和法国所显示出来的意图，使柏林和罗马感到不快，但他们也承认国家主义者在西班牙内战持续期间并没有任何其他可供选择的途径；而且也可预计到国家主义的西班牙虽然在名义上是中立的，将仍会给轴心国作出有用的贡献。

墨索里尼可能念念不忘“罗马—马德里轴心”，深信内战一结束便能订立同盟，但是，塞拉诺·苏内于1939年6月访问罗马时就已明确表示，时间尚未成熟。德国人之所以没有以前那样急躁，可能与纳粹党要再等三四年之后再向英法挑战的想法有些关系。总之，希特勒充分意识到一个友好的非交战国的价值，无论是它在外交上的支持，还是在牵制敌人的力量方面。预料在不远的将来，德国和西班牙之间将以交换军官、实行军备标准化以及由德国帮助装备军火和飞机工厂的方式进行军事合作。1939年1月24日的文化协定规定除其他事项外要开办德国人的学校，但这个协定始终未获批准，因为它遭到了梵蒂冈、西班牙教士们和传统主义者的反对；可是第三帝国的新闻宣传部已经在积极活动，这使德国驻马德里大使埃贝哈德·冯·施托雷尔很不愉快，他无法控制该部派到那里的人员。一个警察代表团被派驻西班牙公安部内工作，并在1938年6月签订了一项警察协定，但是直到1939年4月德国大使馆迄未接到有关此事的通知。在内战时期，给西班牙供应武器和给德国供应战略物资分别由在西班牙的“伊斯马”（西班牙—摩洛哥运输有限公司）和在德国的“罗瓦克”（原料和物品采购公司）经办。“伊斯马”和“罗瓦克”两公司都受戈林的四年计划组织的控制，而且“伊斯马”的主要组建人约翰内斯·伯恩哈特是一名纳粹国外组织的高级官员，他为自己确立了牢固的地位，同样不受大使馆的管辖。国家主义政府以及西班牙和德国的私商部反对“伊斯马—罗瓦克”仗着他们对武器供应和结算交易的控制所享受的实际上的垄断权，然而德国政府决不愿意取消这种制度而代之以

见下文，原著第264页。

加里亚佐·齐亚诺：《日记，1937—1938年》（波伦亚，卡佩利，1948年版），1938年9月26日，27日；施托雷尔（德国驻马德里大使）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年9月16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2卷，第504号）；德国外交部韦尔曼的备忘录和会议记录，1938年9月26日，27日，28日，10月3日（同上书，第2卷，第622号，第638号，第659号；第3卷，第673号）；魏茨泽克的会议记录，1938年9月26日（同上书，第2卷，第624号）；马肯森（德国驻马德里大使）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年9月27日（同上书，第641号）。

同上书，第659号。关于战争爆发前德国所作的安排，见下文，原著第266—267页。

齐亚诺：《日记，1939—1942年》，1939年1月8日。

同上，1939年6月5日，6日，7日；塞拉诺·苏内：《在昂代与直布罗陀之间》，第102—103页；另见上文，原著第257页。

参阅《希特勒与墨索里尼：信件与文件》，津孔编（Hitlere Musso-lini :lettere e documenti ,ed.V.Zincone），米兰，里佐利，1946年版，第5—8号，以及《概览，1939—1946年：1939年3月的世界》，第145页注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3卷，第716号。

同上书，第529号，第594页和第786号，第896页

关于德国经济关系以及与西班牙有关的德国官方团体间的纷争，见周上书，散见各处。

较正常的贸易和支付协定，甚至在西班牙的要求下，于 1939 年 6 月开始谈判时，还没有达成明确的协议。德国人通过伊斯马公司获得了大量的铁砂、硫化矿、铜、锰、钨、废钢铁、羊毛、皮革直至橄榄油、其他农产品和鱼类。不过，德国由于运交了许多武器而积余了许多比塞塔，伊斯马公司用这笔钱开始投资于矿业。西班牙政府试图加以阻止，想取消 1936 年 6 月以来所批准的所有开采权，并把任何矿业公司的外国投资额限制在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但是德国人以中断军火供应相威胁，迫使西班牙不得不把这个限制扩大到百分之四十，并在某些情况下全部取消这种限制，同时，即使限制仍旧保持下来，德国人还想通过西班牙代理人来逃避这种限制。德国人控制的矿业公司以及各种经营生产和销售的公司都被并入名叫索芬杜斯的控股公司。德国人还希望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计划中发挥他们的作用，从而在长远的基础上建立起他们的贸易关系和影响，而这些计划在当时大部分还悬而未决。在他们无法从财政上对工业实行控制的地方，他们就用出卖生产加工技术和专利权，以及提供厂房、顾问和技术人员的方法来扩大他们的影响。

意大利也想在西班牙的工业中投资，1939 年后，意大利的斯尼亚·韦斯科萨和蒙泰卡蒂尼两家公司在意西合营的条件下兴建了一些工厂。意大利矿业界因扩大了对阿尔马登矿区的控制而获利不少，意大利还能进口一定数量的铁砂、铜、锰、羊毛、皮革以及（或许是为了再出口）橄榄油和其他制品。然而，意大利并不象德国那样，从未成为西班牙的主要市场或供应者。因为两因的产品太相似了，而且西班牙又已高度工业化，不需要意大利的纺织品和其他的轻工业产品。虽然曾建议在建造西班牙新战舰中使用意大利的图纸和技术人员，但实际工作还是在西班牙的造船厂中进行的。

第二节 大战的第一个冬天

大战刚要爆发之前，佛朗哥就告诉墨索里尼，他准备竭尽全力使欧洲深信发动一场全面战争是无意义的。9 月 3 日佛朗哥公开呼吁支持使战争局部化。在 9 月 4 日的一项法令中西班牙宣布了中立。7 月 27 日和 8 月 21 日西班牙即已向法国通知了对于恪守中立的保证，同时也口头上通知了英国大使。随后的六个月都比较平静地过去了。人们一如既往仍把共产党俄国看作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 809 号。

伯恩哈特也计划在农业耕地上投资，虽然第三帝国外交部和粮食农业部都不赞成这种想法，但是，这两个部还是在塞维利亚附近获得了地产，并由德国人经营管理（同上，第 926—927 页）。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 3 卷，第 809 号，从 1939 年年底起，索芬杜斯也取代了伊斯马。

英国商务部：《西班牙，1951 年 5 月》（Spain, May 1951），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52 年版，第 40 页，第 44 页，第 49 页，第 51 页，第 58 页。

1944 年 2 月 3 日，下院辩论，第 5 辑，第 396 卷，第 1431 栏。

齐亚诺：《欧洲》，第 441 页；英译本，第 291—292 页；《意大利外交文件》，第 8 集，第 13 卷，第 443—444 页。

1939 年 8 月 21 日（《意大利外交文件》，第 128 号）。

同上书，第 642 号；英文文本刊于《国务院公报》，1939 年 9 月 2 日，第 183 页。

中立条例禁止西班牙战舰在交战国港口结关（彼得森：《帷幕的两侧》，第 191 页）。

乔治·博内：《欧洲的末日》（Georges Bonnet：Fin d'une Europe），日内瓦，飞马出版社，1948 年版，第 260 页；霍奇森：《西班牙的复苏》，第 165 页。

彼得森：《帷幕的两侧》，第 194 页。

是真正的危险。施托雷尔在报告中说到佛朗哥曾对苏联的威胁表示关注，并认为波兰作为缓冲国可能有助于保卫西方。佛朗哥在新年前夕讲话的主题首先是，如果国家主义者宏伟的建设计划要加以实现的话，西班牙本身也需要和平；其次是，西班牙愿意和梵蒂冈、意大利以及其他国家 265 联合起来，商讨结束这场战争，因为如果这场战争打到底，就可能导致亚洲式的野蛮残暴。据说，西班牙政府为了这一目的曾征求过萨姆纳·韦尔斯（美国副国务卿）的意见，但碰了钉子。

国家主义者对法国的态度仍然是十分仇视，但对英国则稍好一些。尽管 1939 年 11 月开始的英西贸易谈判在某些方面存在着相当阻挠，但结果还是在 1940 年 3 月 18 日达成了几项协议。其中一项规定一种汇划结算制方式，并且商定了按照该方式偿还从西班牙内战开始前就拖欠下来的商务债款。另一项协议为西班牙在英镑地区进行采购提供二百万英镑以内的贷款。第三项协议允许西班牙通过盟国禁运品管制法进口某些商品，如果这些商品未经盟国同意不再出口的话。英国表示的另一个友好姿态，就是对把食品从阿根廷尽可能快地通过盟国管制区，运到西班牙做出了安排。

轴心国也在致力于改善它们的地位。意大利坚持不懈地努力培植国家主义者的友谊，但同往常一样，并没有比它的更强大的伙伴收到更大的效果。新意大利环球航空公司（LATI）获准使用西属摩洛哥的塞维利亚和锡兹内罗斯城作为通向南美的中间站，此外在 1940 年 5 月 8 日还签订了几个经济协定。其中有一项协定把西班牙内战时的债款（业已拖欠）从七十五亿里拉减到五十亿里拉（合五千五百万英镑），从 1942 年起在二十五年内还清。另一项协定规定双方的贸易额各增加到三亿七千万里拉，改善铁路、海上和空中的交通运输，全部付清商务欠款以及意大利在发展西班牙工业中所占的份额。

德西贸易协定经过多年的拖延，终于在 1939 年 12 月 32 日签订了，这一协定由于双方的种种保留受到了束缚，未能使德国心满意足。然而西班牙还是在原则上同意了出口那些德国所需要的货品，除非这些货品是供国内消费或用于在其他国家获取外汇所需要的。为了防止封锁，西班牙的出口和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 8 卷，第 173 号。

多西纳格：《西班牙做得有道理》，第 14—15 页。

同上书，第 30—35 页。

英国外交部：《联合王国与西班牙政府贸易和付款协定，1940 年 3 月 18 日，马德里》

（Trade and Payments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Spanish Government, Madrid, March 18, 1940），敕令第 6229 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0 年版）。

英国外交部：《联合王国与西班牙政府贷款协定，1940 年 3 月 18 日，马德里》（Loan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Spanish Government, Madrid, March 18, 1940），敕令第 6230 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0 年版）。

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 1 章，第 56 页，第 510 页；彼得森：《帷幕的两侧》，第 211 页。

有关意大利环球航空公司的情况，见上文，原著第 62 页，第 109 页。

《意大利日报》（Giornale d' Italia），1940 年 5 月 16 日；《曼彻斯特卫报》，1940 年 8 月 16 日；《泰晤士报》，1940 年 5 月 10 日，8 月 6 日。另见《西班牙政府公报》（Boletín oficial Español），1942 年 2 月 5 日；《意大利外交文件》，第 8 集，第 13 卷，第 19 号，第 34 号。

《意大利日报》，1940 年 5 月 15 日，16 日。

再出口商品均取道意大利运往德国，同时德国的小批高价的出口商品则靠意大利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经西班牙空运到南美洲。

第三节 轴心国在西班牙和加那利群岛的活动

当德国漫无限制地采用潜艇战的时候，西班牙被列入四个友好的中立国之内，这些中立国家的船只是不受攻击的。在对德国方面，西班牙奉行中立所表现的善意，除了提供通过封锁的途径外，还采取了另外一些形式。西班牙外交部长把从外交报告中得来的情报定期提供给德国大使馆。轴心国的宣传充斥了西班牙的报纸。那些到过警察局和检查机关的英国公民，确实无误地看到了德国人在那里任职。甚至直到英国大使提出抗议时为止，伊伯利亚航空公司还雇佣了一些德国驾驶员，使他们得以在这些航线上观察到盟国的航运。从盟国的观点看来，更危险的还是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在补给他们的军舰、摧毁盟国的航运以及保持情报网等方面能做到 267 的程度。这些活动在大战爆发前都作好了准备。1939 年 4 月凯特尔就向意大利驻柏林的武官谈到了德国的兴趣在于确立伊伯利亚海岸上的供应点，或者至少是要防止英国和法国采取同样步骤。到了 8 月份，佛朗哥同意德国在桑坦德、维戈、加的斯和摩洛哥建立供应点。——1939 年 10 月，德国潜水艇便在西班牙海岸外游弋，据约德尔 1940 年 2 月 2 日的日记所载，西班牙人曾经补给了一艘潜艇，并为一条商船从毕尔巴鄂护航到桑坦德。起初，英国和法国舰队尚能牵制德国的这些活动，而西班牙政府对它们这样随意进入他们的领海予以默认，并未提出什么严重抗议；然而，法国的沦陷却使轴心国的活动自由大为增加。

德国供应船“贝塞尔”号和两艘油船本来就可通过法国领海安全地返航，但它们却仍一直停泊在维戈；当经过三年的抗议无效后，英国大使馆振振有词地声称，一艘被俘获的潜水艇上水手已供认三天前曾在维戈加油并得到给养，于是西班牙当局才把油船弄走，并在船上派驻警卫，但仍让“贝塞尔”号留在原地。1940 年秋德国又同西班牙政府作出了安排，让德国的油船开到遥远的抛锚地给驱逐舰加油。——

加那利群岛是给潜水艇加油的一个最有用地点，特别是在 1941 年 12 月

《元首会议，1939 年》，第 40 页。

施托雷尔于 1939 年 10 月 19 日给德国外交部长的报告（《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 8 卷，第 284 号）。

彼得森：《帷幕的两侧》，第 191—194 页。

关于盟国在这方面的不满情形的概述，见坦普尔伍德：《负有特殊使命的大使》，第 197—201 页，第 251—255 页。在战争后期，据称育某些西班牙空军军官吹嘘说曾给德国人提供了有关一支英国护航队冲破封锁于 1942 年到达马耳他的情报（安萨尔多：《一个西班牙君主主义者的回忆录》，第 170 页）。

《意大利外交文件》，第 8 集，第 13 卷，第 423 页。

《元首会议，1939 年》，第 20 页，第 25 页。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主要战犯的审判，1945—1946 年》（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Nuremberg, 1945—1946）。审讯记录和作证文件，共四十二卷（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1947—1949 年版），第 28 卷，第 399 页（1809—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

（Nazi Conspiracy and Aggression）（美国 and 英国检察厅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所搜集的证明文件和指导材料），共八卷，附“意见和裁决”及附录 1 与 2（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6—1947 年版），第 4 卷，第 379 页。（这两个文件以后简称《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纳粹的阴谋与侵略》。）

菲斯：《西班牙史话》，第 31 页。

“乳牛”，即补给潜水艇服役以前。

为应付盟国的抗议，德国油船“科里特斯”号和“夏洛特施利曼”号——后者据称于1941年曾单独为十八艘潜艇加过油——转移到拉斯帕马的内港里，但是后来“科里特斯”号又开出港口。1940年5、6月间，也正是从加那利群岛那里一艘补给油船为德国的商船袭击艇“奥里恩”号加268油。盟国也抱怨：当德国和意大利潜艇应该被扣留的时候，却允许它们离开西班牙港口或允许它们超过国际法所许可的修理期限；允许潜艇换防船员通过西班牙去旅行；一艘不能修复的德国潜水艇上的船员，未被扣留而释放了。

德国和意大利在西班牙、摩洛哥、巴利阿里群岛都发展了情报网，并且在直布罗陀海峡两侧建立了观察站和无线电发射台。意大利的一个主要观察站设在阿尔赫西拉斯的玛利亚·克里斯蒂娜旅馆，就在英国领事馆同一幢房子内。丹吉尔是轴心国间谍和破坏分子的另一个重要活动中心，1940年被西班牙占领后不久，德国人就在那里开设了一个总领事馆，并且，德国人在加利西亚还设有若干气象观察站。

轴心国停泊在西班牙港口的商船，在加的斯的“富尔戈”号，在阿尔赫西亚的“奥尔特雷”号，在韦尔瓦的“盖塔”号（全都是意大利的），和在卡塔赫纳的德国商船“利帕里”号，均被用来作为进行破坏活动的补给修理船，而就在意大利投降前不久，意大利破坏分子开始在巴塞罗那进行活动。在直布罗陀海峡曾凿沉七万五千吨船只的意大利“蛙人”，便是从“富尔戈”号、“奥尔特雷”号以及阿尔赫西拉斯海湾的维拉卡梅拉出发活动的。有时候，他们由潜水艇带到“富尔戈”号，有时候由意大利环球航空公司空运或由陆路偷入西班牙境内。大多数体积都很庞大的一千吨以上的破坏装置，通过西班牙源源而入；供应品则也由西班牙一只军舰带给“富尔戈”号，并且公开在“奥尔特雷”号上进行装配水雷，甚至船上还有一名西班牙士兵在护卫着。不管英国屡次提出了明确的抗议，并点了许多轴心国特务的名，西班牙政府经常还是要等几个月甚至几年才采取行动对付他们，或者假托已采取行动，而实际上却允许他们在别的地方恢复活动。

菲斯：《西班牙史话》，第146—147页；莫里森：《美国海军作战史》，第1卷，第129页，第150—151页，第320—321页；罗斯基尔：《海上之战，1939—1945年》，第1卷，第479页，第480页；坦普尔伍德：《负有特殊使命的大使》，第198页。

罗斯基尔·前引书，第282—283页。

《德国外交部的秘密文件》（Documents secrets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Allemagne）。梅德琳和米歇尔·埃里斯托夫（Ma-deleine and Michel Eristov）译自俄文〔以后简称《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巴黎，保罗·杜邦出版社，1947年版，第3卷（西班牙），第33号，第38号；《西班牙政府和轴心国》，第15号，第36页，第38页。

见下文，原著第314页。

1940—1941年西班牙驻巴黎和伦敦的空军武官安萨尔多上校声称，当地于1940年应英国政府邀请前往英国访问时，他奉命为德国搜集情报：在他返国时受到了德国情报机关官员的盘问。1941年12月，空军大臣比贡将军希望他重访伦敦做同样的工作，而他认为那是对英国人殷勤好客的背信弃义，所以拒绝了这一使命，结果他因此而丢了官（安萨尔多：《一个西班牙君主主义者的回忆录》，第119—121页，第148—150页，第151页）。

关于意大利情报机关、破坏活动和蛙人，参见瓦莱里·博尔盖塞：《增加十分之一的小舰队》（J. Valerio Borghese：Decima Flottiglia Mas），米兰，加尔赞蒂，1950年版，和弗兰科·莫格里上将：《从

第四节 1940—1941 年濒临

参战的西班牙

(一) 1940 年之夏

德国对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的侵略使西班牙处于一个崭新的地位。德军似乎极有可能越过比利牛斯山，横跨西班牙以攻击直布罗陀和北非。假使他们这样做的话，西班牙政府会不会予以抵抗还是与之合作呢？或者佛朗哥是否在等待机会亲自发动一场战争呢？英法两国政府对这两种危险性都十分注意。不管德军假道西班牙进攻还是西班牙军队在摩洛哥发动攻击，其可能性都在很大程度上使贝当政府不想迁往北非，并促使诺盖将军放弃在那里进行抵抗。就英国而言，要他们守住直布罗陀原是很难的事。近几年来英国并没有在那里加筑过什么工事，因为他们在依靠着同法国结成的同盟以保卫西地中海门户，英国甚至还怀疑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是否值得保留这块地方作为基地。再说，假如德国人控制了半岛与摩洛哥的各港口以及直布罗陀，那么，英国海军就将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

5 月间国家主义政府迅速改变了他们的态度。据报，他们在 4 月 28 日或以前已通知了英、法、意政府，西班牙对于任何入侵的企图都将加以抵抗，而且在 5 月的第一个星期里，无论在公开场合或私下他们依然重申西班牙严守中立的政策。5 月 15 日，塞拉诺·苏内和美国国家电话公司签订了一项协议，5 月 15 日和 24 日，在马德里和华盛顿就一笔一亿五千万至二亿美元的信贷进行了接洽。在西班牙保持中立的条件下，如果能按某种方式使用这笔信贷而不致激怒公众舆论的话，国务院是愿意提供这笔款子的。

随着德国人的节节进犯，国家主义政府对信贷失去了兴趣，长枪党徒举行示威游行，开始对直布罗陀、摩洛哥、丹吉尔和阿尔及利亚提出了领土要求。6 月 12 日，意大利对英法的宣战宛如发出了信号，西班牙已从中立转变为非交战状态；14 日，丹吉尔“暂时”被占领了。国家主义政府同时为取得摩洛哥领土的转让，已在向法国提出协商。当美国大使亚历克山大·韦

耻辱的灰烬中重生》（Admiral Franco Maugeri：From the Ashes of Disgrace），纽约，雷纳尔和希契科克，1948 年版，第 33 页，第 34 页，第 61—69 页。关于德国的活动，见保罗·莱弗尔金：《德国军事情报》（Pauli Leverkuehn：German Military Intelligence），伦敦，韦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1954 年版，第 128 页，第 129—132 页。

夏尔·鲁：《外交事务上惨痛的五个月，1940 年 5 月 21 日—11 月 1 日》（Charles-Roux：Cinq mois tragiques aux Affaires Etrangères，21 mai-1er novembre 1940），巴黎，普隆，1949 年版，第 37—39 页；《贝当元帅受审记：速写记录》（Le procès du Maréchal Pétain：compte rendu stenographique），现代诉讼大全：巴黎，阿尔班·米歇尔，1945 年版，第 304 页，城防司令勒罗克的证词。

坦普尔伍德：《负有特殊使命的大使》，第 93 页，第 167—160 页。

海军上将汤姆·菲利普斯爵士曾告诉塞缪尔·霍尔爵士说，他不知道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英国皇家海军将如何才能坚持下去（同上书，第 15—16 页）。

多西纳格：《西班牙做得有道理》，第 39 页。

齐亚诺：《日记（1939—1943 年）》，1940 年 5 月 3 日；《消息日报》（Diario de Noticias），里斯本，1940 年 5 月 4 日。

菲斯：《西班牙史话》，第 26—31 页。

有关公告原文，见霍奇森：《西班牙的复苏》，第 151 页；另见下文，原著第 314 页。

夏尔·鲁：《惨痛的五个月》，第 193 页；另见下文，原著第 311 页。

德尔于6月22日在西班牙会晤塞拉诺·苏内和佛朗哥时，苏内否认同美国国家电话公司签订过协议，而佛朗哥则把非交战状态描绘为是对轴心国民族同情心的一种表示，他显然满意地期待德国获得胜利，接着英法帝国自将趋于崩溃。同一天，佛朗哥还对英国新任西班牙大使塞缪尔·霍尔说，虽然置身于战争之外依然是西班牙总的方针政策，但西班牙不能不显示出，在新形势下它的直接利益所在，并做好准备，以应付一切紧急事态，他还表示对英国处于绝望的情况下仍要继续战斗感到惊讶。7月17日他在国家主义者起义纪念日的讲话中，以前所未有的大胆宣布了西班牙对直布罗陀和向非洲扩张的要求。在次日的阅兵式中，人们对着霍尔大声喊叫“直布罗陀—西班牙”。

当时，德国军队在昂代向西班牙的驻防部队交朋友，但由于他们惯于大量越入西班牙境内购买食品，以致遭到人们很大的反感。如果不是因为霍尔对此提出抗议，德国人或许还会被允许在圣塞瓦斯蒂安和西班牙北部的一些其他城镇举行军事游行。

对英美两国说来，眼下看来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要么佛朗哥一有机会就抓住用他自己的部队尽可能多地攫取领土，要么就是看准时机加入轴心国，为在和谈会议中赢得一席。也许当时英美两国政府还估计不透的是，西班牙在采取这种行动选择时间上的困难，以及万一失败时会遭到的惩罚。如果国家主义政府一味守株待兔，那么，他们的种种要求可能因错过良机而付诸东流，而且，轴心国家也可能捷足先登占领摩洛哥，乃至直布罗陀和丹吉尔；或者德国可能在不需订立任何盟约的情况下踏入西班牙，并使西班牙成为另一个挪威。可是，另一方面，过早介入的危险或许甚而更大。佛朗哥一向是一个非常谨慎的谋略家，他只需从西班牙内战中就可找到一个例子，说明在似乎绝望的处境下，交战双方中的较弱者会如何不仅一次而且再次地重振旗鼓，结果使原来预料只能支撑几天或者至多几星期的战斗竟能拖好几年之久。如果西班牙现在就参战的话，英国人依然能够进行报复。据认271为他们可能会占领加那利群岛、巴利阿里群岛或西属几内亚，或者在西班牙本土上漫长而又没有设防的海岸某地，可能在北方，进行登陆。在那里他们可能同阿斯图里亚斯的共产党取得联系；或者他们还可能唆使法属摩洛哥入侵西属摩洛哥。他们肯定会切断西班牙的海外供应，而且不久就证明，美国人将要帮助他们采取这一行动。不管轴心国的胜利是如何肯定无疑，但西班牙是不能在不冒经济崩溃和共和主义者可能叛乱的风险的情况下再干下去的。

某些国家主义的显要无疑是希望马上参战，而另一些人（据说其中包括佛朗哥的某些军事顾问）则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另一方面，外交部长贝格贝德尔上校异乎寻常地使霍尔相信他是憎恨德国人的，他认为英国最终会打败他们。可是，他同样处处以种种让步和保证来姑息德国人，但不管他可能是

菲斯：《西班牙史话》，第33—34页。

有关霍尔的任命，见下文，原著第286页。

坦普尔伍德：《负有特殊使命的大使》，第48页，第49页。

塞拉诺·苏内：《在昂代与直布罗陀之间》，第293页；坦普尔伍德，前引书，第38—39页。

见下文，原著第293页。

《西班牙政府和轴心国》，第1号和第4号。

见下文，原著第286页以下。

怎样热诚地渴望同大不列颠取得和解，他必定已经意识到可能在非常有利于西班牙的条件下谈判建立这样一种和解。他曾在摩洛哥荣获战功，所以对摩洛哥深感兴趣，他机智地把西班牙侵占丹吉尔一事掩饰了过去。从9月底前不久他给霍尔提出的建议中多少可以看出，如果他能留任更长一段时期，他的政策是会怎样发展下去的，这个建议的内容是：为了抵制德国人谴责英国拖延战争的宣传，英国政府应该播送一篇能满足西班牙人愿望的声明，以使他们相信他们可指望在大陆集团之外还有一个光辉的前途。他并没有谈到期望英国将做些什么，但他指出，德国正在把直布罗陀、摩洛哥奉送给西班牙，并在给西班牙提供经济上安全的保证；他还谈到最终要成立英—西—葡的联盟，并竭力建议霍尔应立刻回伦敦和政府商讨这些重要问题。霍尔是赞成由英国发表同情西班牙的公开声明，而丘吉尔1940年10月8日在下院的最精采的几段演说中也谈到了西班牙民族迫切需要和平，“以便他们能幸福光荣地重建他们尊严、统一的民族生活”，他接着说，西班牙不应该“成为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的供应渠道”，但除此以外，就不存在封锁问题，以使英国政府不会“以最真挚的愿望为满足西班牙的需要和帮助它复兴而加以研究”。英国政府也没有任何干涉西班牙内政的意图。英国的利益和政策是建立在以西班牙独立和统一为基础的。英国政府希望能看到“西班牙获得它的合法地位，不仅作为一个伟大的地中海大国，而且成为欧洲和基督教家庭中一个主要和显赫的一员。”

但是，对大多数国家主义来说，德国在国际舞台上居统治地位，而且在1940年6月间，西班牙就为参战一事同德国进行过具体接触。在6月3日，佛朗哥向希特勒提议，西班牙愿意以任何最适合于德国的形式进行合作。16日，西班牙空军部长比贡将军在德国西线司令部里会晤了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告诉他们佛朗哥有意进攻直布罗陀。同时，他提醒他们说，没有来自海外的食物供应，西班牙将无法生存，而美国部队可能在摩洛哥或葡驻议会外交部次官巴特勒，曾于1940年7月4日告诉阿尔瓦公爵说，英国

见下文，原着第314页。

坦普尔伍德：《负有特殊使命的大使》，第67—71页。

下院辩论，第5辑，第365卷，第302栏。据报道或时时有谣传说，自1940年夏以后，英国已提议谈判有关直布罗陀问题，或者立即割让，或者答应支持西班牙对法属摩洛哥的要求。战后这个问题又被重新提出来了，举例来说，丘吉尔曾向下院保证，战时英国从来也没有答应割让直布罗陀，而且，英国政府方面也从未失信过。就在这后一天，即1954年5月21日，西班牙向英方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上面记载着英国在1940年和1942年间所做的承诺（见1954年5月22日《泰晤士报》）。西班牙提出的指控如下：1、丘吉尔在1940年6月26日曾发给哈利法克斯一份会者记录，这份记录说明英国如果在大战结束时提出讨论直布罗陀问题是不会得到什么好处的。英国若是打赢了这场战争，这种讨论不会有什么成果；若是输了，也就没有必要讨论了；何况西班牙人已充分了解这一点，所以任何要求讨论的建议只会是一种虚弱的表现（这份记录的部分原文发表在丘吉尔，第2卷，第564页；美国版，第2卷，第640页，全文见下院辩论，第5辑，第527卷，第2290栏）。

菲斯：《西班牙史话》，第67页以下，其中从德国档案里摘引了未曾公开过的文件。不过，西班牙在这时写给轴心国政府的信件是非常模棱两可的。他们再三答应参战，只要是在可能的时候，因此，为西班牙的政策辩护的人声称道，政府主要关心的是争取时间，与避免得罪德国。然而，他们拿不出证据来证明这一阶段德国确实是在迫使西班牙采取行动。墨索里尼和齐亚诺倒是在这样做的，但是他们的告诫并不起什么作用。

政府以后愿意考虑西班牙的一切问题和愿望包括直布罗陀在内，并且说一个强大而独立的西班牙的存在对大家都有好处。

3、劳埃德勋爵在任殖民地事务大臣时曾告诉阿尔瓦说，他一直在劝说丘吉尔，要鼓励西班牙占领法属摩洛哥。

4、在1940年10月8日的一次下院秘密会议中，丘吉尔曾说，关于封锁问题，英国所企望的一切就是西班牙不应当成为给它宿敌供应物品的渠道，并说，一旦达成这一条件时，英国政府出于有助于西班牙利益和它的复兴的真诚愿望，对任何问题都愿加以仔细考虑。

5、在1941年10月2日西班牙大使馆艾登和霍尔也都在场的一次午餐上，丘吉尔曾告诉阿尔瓦说，战后，英国将有可能对法国施加压力，使其满足西班牙在北非的正当要求。

6、丘吉尔曾于1942年11月26日告诉阿尔瓦说，法国和意大利将由于这场战争而受到削弱，可是西班牙的地位将会提高到几世纪所未有过的地步，并说，使西班牙昌盛、幸福是他唯一的愿望。

在上述这些所谓的诺许中，第1条完全排除了谈判的可能性，第4条和第6条只不过是一般性的亲善言词；而且，第4条则是对上面所提到的丘吉尔讲话的歪曲篡改，丘吉尔的话并不是在一次秘密会议上讲的，并且他所提议讨论的问题不是什么西班牙的民族愿望而是封锁的问题。塞拉诺·苏内关于第5条的说法是这样的：有三个英国的主要政治家其中包括霍尔，在西班牙的大使馆共进午餐，是他们中间最重要的人物做的那个讲话。但是，苏内并没有提到丘吉尔的名字（《在昂代与直布罗陀之间》，第210—211页）。

葡萄牙登陆。希特勒答应帮助西班牙夺取直布罗陀，他并没有对西班牙的非洲领土要求问题作何表态，虽则里宾特洛甫断然否认德国对地中海抱有任何兴趣。

最后，西班牙在7月19日给德国的一份备忘录中向德国人保证，西班牙准备在下列两个条件下参战：（1）西班牙应获得直布罗陀、法属摩洛哥和西部阿尔及利亚的奥兰省（借口这地方是由西班牙首先开拓的，并且它的绝大多数欧洲居民仍然是西班牙人），并要“扩大里奥德奥罗和在几内亚海港的殖民地”；（2）西班牙应能指望得到作为一个交战国所需要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然而几个星期过去了，希特勒并没有邀请西班牙参战，也没有对摩洛哥和奥兰作任何明显的许诺。轴心国的北非计划最初是对西班牙有利的。1940年6月18日至19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慕尼黑举行的会议上，虽然意大利人也提到了他们需要通过北非西非以到达大西洋，但双方还是一致同意西班牙占有摩洛哥和奥兰。当场里宾特洛甫虽然也提到了德国自己对摩洛哥“历史性的要求”，但是他也建议，西班牙的要求应该予以满足，因为那样它就可能是在维持和平的解决办法上与轴心国联合一致。

甚至在此时，希特勒仍然小心翼翼，不想使法国有理由担心面临一种迦太基式的和平而激起它进一步抵抗；再者由于形势越来越清楚，他既还未能

在《西班牙政府和轴心国》，第1号中，有这方面的摘要。另见兰格和格林森：《对孤立的挑战》，第558—559页。

迦太基位于现在北非的突尼斯。公元前264年，它同地中海上另一个强国罗马因争夺西西里而发生战争。在先后两次战争中，迦太基均以失败而告终，被迫求和，和约的规定对迦太基十分苛刻。从此迦太基

把英国搞掉，也就越来越渴望取得维希政府的合作从而阻止北非落于自由法国或英国之手。为了这一目的，希特勒是充分准备牺牲西班牙甚至意大利的领土要求，而特别注意避免过早地作出承诺。据说，当他在昂代等候佛朗哥时曾告诉过里宾特洛甫，如果西班牙人得到了任何书面的东西的话，“拉丁人的流言蜚语”迟早会把这项承诺泄露出去，其结果整个法国殖民地将会立刻向戴高乐投诚。

另一方面，如果大不列颠不准备响应他的和平建议，那么，希特勒就指望把西班牙作为轴心国这场赌博中的一张最有用的牌来打。而当他的反英联盟从北海岬一直扩展到摩洛哥，或者甚至从西班牙远达日本的时候，这个联盟就会显得更加声势赫赫了。因此，他建议对西班牙（联合俄国和日本一道）“采取外交步骤”，“只要世界不再坐等新的奇迹出现”的话。他本人工打算进攻直布罗陀，并表示出他对加那利群岛的兴趣达到了这种浓厚程度，以致提议愿以法属摩洛哥从西班牙手中换取该群岛中的一个较小的岛屿。到了9月，希特勒又建议，德国空军应占领加那利群岛，但须征得西班牙的同意。

虽然德国海军参谋部意识到占领加那利群岛后，在补给上会遇到困难，但他们还是并继续坚决地赞成对直布罗陀和加那利群岛采取行动。雷德尔建议把这次行动作为对英国采取的一次主要打击，结合一次全力以赴的努力将英国从地中海两端驱逐出去，并竭力主张德国必须在美国占领该群岛之前立即动手。雷德尔还劝希特勒用这种办法来扩大地中海战线，而不要从西部进犯俄国。甚至连一般倾向于低估地中海战线重要性的希特勒的军事顾问们，也一度持有这种看法，即如果在1940年不能攻入大不列颠，那么仅有的选择就是攻占直布罗陀、埃及和勒旺岛。

根据一些现存的记录判断，但可惜它们主要是有关海军方面的，无论是德国人还是西班牙政府和军队在最初似乎都有总把攻占直布罗陀这一战役单纯由西班牙来负责，而德国则提供武器装备、空军援助和一小支特种突击部队。将令人很感兴趣的事是，要了解到德国陆军认为他们可能需要多大规模的一支部队来对付游击队的抵抗或盟军的登陆，并且不但要保持同直布罗陀，而且还要保持同拟议中德国在加的斯和费罗尔海军基地的通讯联系。从

便失去了海上霸主的地位，罗马成了西地中海的霸主。——译者

《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288—291页。

见下文，原著第280页。

施密特：《外交舞台上不开口的演员》，第500页。

齐亚诺：《欧洲》，第568页；英译本，第376页

兰格和格利森：《对孤立的挑战》，第659页，摘引自哈尔德日记；齐亚诺：《欧洲》，第602页，第605页，英译本，第400页，第402页，参阅希特勒在1940年11月13日对莫洛托夫的谈话（《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58页）。

《元首会议，1940年》，第72页。

同上书，第81页。

同上书，第65—66页

同上书，第93页，第94页，第104—105页，第107页。

同上书。

兰格和格利森，前引书，第659页，摘引自哈尔德1940年6月30日的日记。

补给和通讯联系的角度来看，而这是希特勒在计划 275 一场战役时十分注意的一个方面，在西班牙的作战将不是轻而易举的。就拿一件事来说，除非德国能说服或者迫使维希政府允许德军通过比利牛斯山的其他山路，否则德军就只有依靠仅有的一条通过昂代的铁路，而且只要希特勒还希望法国与之合作，那么他可能不愿走得这么远。另一个问题，在冬季期间将被反复提出的问题是，德军究竟应该首先进攻直布罗陀和大西洋群岛，还是应该首先进攻苏伊士。

1940 年夏末，德国专家对西班牙进攻直布罗陀时的各种需求进行了调查，这些专家包括了国防情报局局长、海军上将卡纳里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西班牙组织间谍和破坏工作，由于他在西班牙内战时期的积极活动，深受佛朗哥和他的某些将军的信任。但是，这时候，同样是这个曾经很快引起希特勒对西班牙产生兴趣的形势，却已开始使国家主义者对于进行一场短促而又有利的战争的信念发生动摇。英国决心抵抗的意志和力量的表现，尤其是在 7 月 3 日对奥兰的法国军舰的攻击，对国家主义者说来记忆犹新。英美两国联合实施经济刺激和压力的政策也开始发生作用。但西班牙还远不想放弃同轴心国的合作。据说在 7 月份和 8 月份之间，贝格贝德和塞拉诺·苏内不止一次地确认了西班牙 7 月 19 日附有条件的提议；佛朗哥在 8 月 15 日还写信给墨索里尼，谋求意大利支持西班牙的要求；但是，墨索里尼在 8 月 25 日的复信中，虽然充分地答应给予支持，但同时提出：如果西班牙在战争结束前还不参战，意大利就没有道义上的理由来使这些要求得到满足，而希特勒和他的顾问们也都在注视着西班牙，并越来越怀疑国家主义者已失去参战的热情。判中所起的作用，虽说是奇怪的，但不是不可能的，如果他在这里和其他地方都蓄意把造成德国失败作为最终推翻纳粹政权的手段这件事是真的话。

（二）塞拉诺·苏内访问柏林

1940 年 9 月 13 日，塞拉诺·苏内率领了一个包括各经济代表的代表团离开马德里赴柏林。据说，这一次访 276 问是苏内首先提出的，他只是在通

B·H·利德尔·哈特：《小山的另一边》（B.H.Lidell Hart：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增订版和修订版，伦敦，卡斯尔，1951 年版，第 230 页，以斯图登特将军为据。

《元首会议，1940 年》，第 95 页。

《西班牙政府和轴心国》，第 4 号，第 11 页。关于卡纳里斯，见拉豪森上校在纽伦堡的证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 2 卷，第 442 页以下；阿布斯哈根：《卡纳里斯》；伊恩·科尔文：《情报头目》（Ian Colvin：Chief of Intelligence），伦敦，高兰兹，1951 年版。据书中的描述，卡纳里斯在同佛朗哥谈

夏尔·鲁：《惨痛的五个月》，第 144 页。有关这一事件的记述，可见《概览，1939—1946 年：轴心国的初期胜利》，第 3 编，第 5 章，第 2 节（3）。

见下文，原著第 286 页以下。

《西班牙政府和轴心国》，第 1 号。另见菲斯：《西班牙史话》，第 73 页。

同上书，第 2 号。

同上书，第 3 号。

关于塞拉诺·苏内的访问。见齐亚诺：《日记（1939—1943 年）》。1940 年 9 月 20 日，27 日；齐亚诺：《欧洲》，第 589 页，第 595 页，第 597 页；英译本，第 391 页，第 396 页，第 397 页；施密特：《外交舞台上不开口的演员》，第 496 - 497 页；塞拉诺·苏内：《在昂代与直布罗陀之间》，第 10 章；《西班牙政府和轴心国》，第 4—7 号。

过施托雷尔做好安排之后，才把他的计划告诉了多少有些踌躇的佛朗哥。他同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的会谈是在里宾特洛甫就缔结三国条约一事访问罗马的前后进行的，柏林的主人在会谈间歇期间安排他去参观了在法国和佛兰德的战场。他对这次访问的个人记述同官方浮夸的报道成了鲜明的对照。根据官方报道，希特勒是以冷漠和猜疑的态度迎接他的，里宾特洛甫的态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抱怨西班牙忘恩负义和模棱两可的政策，声称某个部长（可能指贝格贝德）一定是受英国雇用的，他甚至暗示，德国可能会感到有必要占领西班牙。可是，齐亚诺描写里宾特洛甫是怀着极其乐观的心情到达罗马的，扬言好象西班牙实际上已参战了，并且宣布德国最高统帅部将在一个月之内准备采取行动。——

9月17日，塞拉诺·苏内在同希特勒的首次会谈中，向他保证“西班牙对德国的态度丝毫也没有改变”。他宣称，西班牙并不想修改它的对外政策，而只不过是澄清一下西班牙参战的条件，一旦它能指望得到食品和战争物资的供应，它就立即准备介入。他提到英国有可能在坎塔布连沿岸登陆的危险，并特别请求德国拨给十门38厘米口径的大炮用以轰击直布罗陀。希特勒拒绝了这个要求，坚称由于这种重炮难于运输，并且需要三到四个月的时间才能安装起来，所以可以用俯冲式轰炸机和小口径大炮代替。但是，德国将提供一支配备有特殊的“炸碉堡”大炮的小型攻击部队，并派遣俯冲式轰炸机扫除海峡上的英国战舰。

在这首次会谈后，希特勒写信给佛朗哥，提议他们在西班牙边境附近会晤。但是，如果他象里宾特洛甫一样，一直期待着西班牙参战，那他就错了。柏林会谈本身揭示了德国对摩洛哥以及其他西班牙属地的意图，这就引起佛朗哥和塞拉诺·苏内重新畏缩不前的动机。在给佛朗哥的信中，据说希特勒曾答应“承认西班牙对摩洛哥的领土要求，但须附带一个限制条件，即它须通过缔结有利的商务协定以保证德国得到这个地区的一部分原料”，然而，里宾特洛甫在同塞拉诺·苏内的以前几次会谈过程中，则已要求由德国永久占领在摩加多尔和阿加迪尔的271飞地。但是，里宾特洛甫并不满足于这一要求，从罗马回国后，他又要求在里奥德奥罗的沿岸和费尔南多波岛上建立潜水艇基地，而如果塞拉诺·苏内可以信赖的话，里宾特洛甫还要求在加那利群岛上建立一个永久基地。在他们首次会谈中，希特勒显然向塞拉诺·苏内提供了关于岛上防务重点的一些建议，苏内回答说，“欧非地区的防务……必须在三国军事同盟的体制内实行”；但就在这饶有趣味的节骨眼，为这次会谈记录摄制的微型胶卷据说却看不清楚了。”佛朗哥在他9月22日接受

菲斯：《西班牙史话》，第73页。

《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285页。

转引自佛朗哥给希特勒的复信，1940年9月22日（《西班牙政府和轴心国》，第5号）。

根据菲斯的《西班牙史话》，第81—82页，塞拉诺·苏内断然拒绝了这些要求，劝说德国人使用马德拉群岛来代替。

《西班牙政府和轴心国》，第4号，第13页。

据说德国外交部曾建议应明确地答应西班牙拥有直布罗陀、奥兰以及大部分的法属摩洛哥，但德国应该控制摩洛哥的两个港口以及矿产和其他经济资源。德国也应在西班牙半岛上享有经济特权，并继承英国和法国在那儿的利益。

希特勒邀请召开会议的复信中，指望俯冲式轰炸机能飞到拉斯帕尔马斯来，并解释了他如何正在进行大量工作以加强岛上的防务，但对于德国对那里的基地要求却只字未提。他一口答应了德国要求获得摩洛哥的原料一事，然而却坚决拒绝出让甚至在阿加迪尔和摩加多尔的暂时性基地。有了德国的装备和空中支持，佛朗哥深信能够在几天内占领直布罗陀，但他提请希特勒注意轴心国在西地中海的行动自由以及西班牙供应困难问题的解除，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取决于意大利在亚历山大和苏伊士的胜利。至于重炮，他认为其中一定是有些差错，因为他实际上要求的是 20 厘米左右的一些小型机动炮。至于参战问题，他在信中指出西班牙的态度没有改变。这仍然是“在我们能够的时候，我们将乐于参加”。

随同塞拉诺·苏内的经济代表们同他们的德国对手之间的讨论，同样显示出了德国希望在贸易、开发自然资源以及在经济和财政建设方面的合作上在西班牙和摩洛哥享有特权地位的愿望。唯一构成德国这优越地位的例外情况的就是那些将来可能会给予意大利的一些让步。西班牙首席代表德梅特里奥·卡塞列你坦率地告诉德国代表，既然西班牙人将为结束外国统治而战斗着，他们就不希望看到德国取代英国的位置；事实上，他宁可让摩洛哥被德国完全吞并，而不情愿为了德国独占的利益而由西班牙来加以管理。在应该给予西班牙多少经济援助的问题上产生了困难。西班牙要求八十万吨石油产品，八 278 十万吨小麦，十万吨棉花，二万五千吨橡胶，以及六十二万五千吨肥料，但是，德国只同意供应其中的一部分。他们也不准备立刻运交其中的任何东西。

当齐亚诺于 9 月 27 日抵达柏林签订三国条约的时候，塞拉诺·苏内确实已不受欢迎了。23 日，希特勒告诉齐亚诺，如果没有“具体细致的协定”，同西班牙人是没有什么交道可打的。如果没有意大利和德国的帮助，“今天就没有佛朗哥”，然而，国家主义的西班牙还在要求用于进攻直布罗陀的大量的食物、燃料和武器，而作为交换条件的除了“友谊”之外却别无他物。希特勒也提到了关于对摩洛哥所作的承诺可能泄露到法国人耳中的危险，其结果可能使德国在空中基地方面处于巨大不利的情况下，不得不自己出兵占领北非，并且，还有充分的理由担心西班牙这座横跨欧非两陆的“靠不住的桥梁”在战争中途将会恢复中立。希特勒明显地受到了近来在达喀尔发生的几起事件的影响，因此他认为只要法国还存在保住摩洛哥的任何希望，他们就会比西班牙人更有效地抵抗英国，因为西班牙人将只会按他们“打内战的速度”而作战。西班牙问题以及同佛朗哥即将举行的会谈，就是希特勒提议

《西班牙政府和轴心国》，第 5 号。

据认为，对重炮的要求是为了阻碍谈判而蓄意提出来的（科尔文：《情报头目》，第 196—131 页）。

菲斯：《西班牙史话》，第 76—77 页，第 82—84 页，第 89 页。菲斯认为西班牙人提出一系列他们知道会被拒绝的要求，就象意大利人在 1939 年 8 月所做的那样〔见《概览，1939—1916 年：大战前夕，1939 年》，第 6 编，第 4 章（三）〕。但是，他们要求的小麦比不久以后英国人准许他们在一年内通过封锁进口的数量要少得多，要求的石油也较少。当然，他们可能坚持（正如意大利大使在 1939 年曾做过的那样）要立即大量运交那些运输系统无力承运的货物（同上书）。

关于击退英国—自由法国 1940 年 9 月对达喀尔的远征，见《概览，1939—1946 年：希特勒的欧洲》，第 442 页，第 444 页，第 448—451 页。

关于 1940 年 9 月 28 日的会谈，见《西班牙政府和轴心国》，第 6 号。另见齐亚诺：《日记（1939—1943

要同墨索里尼在勃伦纳举行另一次会谈的一些主要原因。

很可能希特勒的意思是想暗暗地警告不要让塞拉诺·苏内在罗马得到大多的支持，因为苏内在10月1日到达罗马后曾对德国的缺乏机变满腹牢骚地发表了一通批评，而这些批评在有关他同墨索里尼会谈的官方报告中却被小心谨慎地删掉了。苏内看来已向意大利人请求过援助，意大利人虽答应给予空中支援，但是，并不奇怪，他们却没有多余的小麦可以分给西班牙。墨索里尼建议西班牙应该加快它的军事准备，并且，在最合宜的时机来临时，应由双方对参战共同作出决定。塞拉诺·苏内汇报说，他是明确表示了反对西班牙在那个279时候参战的，但是，如果的确是这样的话，那么，他的观点自8月以来一定有了很大的变化。

在10月4日的勃伦纳会议上，希特勒重申了他反对允许西班牙占有北非任何领土的理由，并且表明了他打算取得“可能设在卡萨布兰卡或阿加迪尔”的摩洛哥基地，作为德国及其未来的西非殖民地之间一种必不可少的环节的意向。会议记录上没有记载墨索里尼对有关威胁到他自己进入大西洋的希望一事的任何评论。另一方面，希特勒同意了墨索里尼的这一建议，即有必要（理由是，如果西班牙不被接纳入轴心国势力范围的话，它的民主的和亲英的倾向也许会受到鼓励）（1）告诉塞拉诺·苏内，在原则上西班牙扩大其在摩洛哥的领土的要求将会立即得到同意，但是，只有在签订了和平条款之后才能确定下来：（2）在供应和增援部队方面尽可能地给西班牙以支援；以及（3）接受佛朗哥关于举行会议的邀请，但时间和地点以后再行决定。

由于这些建议远远没有满足他的要求，塞拉诺·苏内乃百般拖延时间。苏内在10月10日从马德里写信给里宾特洛甫说，他的政府期待不久就提出有关经济援助以及同德国和意大利订立一项十年军事联盟的具体反建议；但是，他建议谈判应在最大限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只能通过佛朗哥和希特勒之间的通信以及他和里宾特洛甫之间的接触来进行，这样西班牙才可以尽可能长期从海外获取小麦和石油。同时希特勒也不急于进入西班牙。10月，最高统帅部提出的观点是，首先应该从苏伊士着手，因为东地中海是更重要的目标，而且存在有盟国在加那利群岛或马德拉群岛采取报复行动的危险。

年)》，1940年9月27日。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40年10月1日，2日，5日；齐亚诺：《欧洲》，第592—594页；英译本，第393—394页；塞拉诺·苏内：《在吕代与直布罗陀之间》，第195—198页。

同上书，第196页。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40年10月4日，5日；齐亚诺：《欧洲》，第595—596页，第597—598页；英译本，第396页，第397页；施密特：《外交舞台上不开口的演员》，第498—499页。

希特勒已告诉齐亚诺，佛朗哥已发出了邀请。

《西班牙政府和轴心国》，第7号。

现有的文件并没有清楚地表明究竟这个联盟是在什么时候，或由什么人提出的。在勃伦纳会议上，希特勒告诉墨索里尼说，西班牙人提出一个草案，根据这个草案，德国将答应提供物资，作为交换条件，西班牙答应一旦军事准备就绪就立即参战。但是，无论是9月22日佛朗哥的信，还是塞拉诺·苏内在柏林的会谈记录，都没有提及这个问题。

参阅由最高统帅部的一个参谋在1940年10月29日所作的备忘录〔《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5卷，第392页—393页（376—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239页〕。

莱翁纳多·西蒙内（笔名）：《贝尔利诺：意大利大使》（Berlino：Ambasciata ditalia），罗马，米利阿

10 月份带来的一些事态发展可以被解释为是西班牙向轴心国靠拢的动向。希特勒对马德里进行了一次正式访问；10 月 17 日，佛朗哥突然免去了贝格贝德尔，这使塞拉诺·苏内想任外交部长的野心如愿以偿，由于没有指派任何人继塞拉诺·苏内任内政部长，因此他继续掌握内政大权（因而也控制了报界），在这个时刻，可以说 280 他的官运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由于佛朗哥接管了他的政治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因而苏内在党内的权力有所削减。佛朗哥另又指派卡塞列尔继路易斯·阿拉尔孔·德拉·拉斯特拉任商业和工业部长，这一任命最初被认为是一种更靠拢轴心国的迹象。

（三）昂代会议和佛朗哥将军的决定

10 月 23 日，希特勒和佛朗哥在昂代举行会谈，塞拉诺·苏内和里宾特洛甫当时也在场。这次会谈是夹在法德在蒙特瓦尔的会谈中间进行的。它的主要争论的一个议题是西班牙究竟应该对法国提出达到什么程度的要求。塞拉诺·苏内在 6 月份提出的一览表上增加了“法属加泰罗尼亚”和改变比利牛斯山脉的边界这两项。但是，苏内从里宾特洛甫那里获悉，要满足这些要求中的任何一项，须视英国赔偿给法国领土的情况而定，希特勒满怀信心地期望，一旦英国和戴高乐不再掣肘时，法国就会被迫接受轴心国的要求，可是，希特勒坚持必须不使北非落到戴高乐派、英国人或者美国人的掌中，而且，要建立一个包括法国在内的反英的强大联盟，以期缩短战争。希特勒声称这是昂代会议的主要目的，他在前一天同赖伐尔的谈话中表示了同样的观点，但当时他丝毫没有流露出想改变战后领土的意图。据保罗·施密特的说法，希特勒曾就直布罗陀问题向佛朗哥作了明确的允诺，但是，有关非洲的领土要求问题却回答得含糊其词。此外，希特勒对军事形势的观察使人有充分的理由推测战事至少要持续到第二年的春天。佛朗哥（在会议开始一个半小时后才姗姗来迟，并在饭后进行了他平日的午睡）详尽地谈到了西班牙的经济困难，以及英国可能报复的危险性；同时，他再一次地要求获得重炮。佛朗哥还提出了一项条约，可是附带作了太多的保留，以致不能适合德国人的胃口。佛朗哥的低沉的声调——施密特说，“就象一个阿拉伯人在祈祷一样”，并 281 补充道，身披带有包头巾的白色斗篷的佛朗哥看上去也更惟妙惟肖了——对希特勒起了象水滴那样慢慢折磨的作用。希特勒后来告诉墨索里尼，他宁愿拔掉三、四颗牙齿也不愿意再受那种苦恼。半夜，当佛朗哥离开昂代以后，里宾特洛甫就对西班牙代表团进行了威吓，结果起草了一份遵守意德同盟和三国公约的议定书。该议定书规定西班牙在参战前要进行协商，但是，

雷西，1946 年版，1940 年 10 月 13 日，第 173 页。

谈话记录〔不完全〕（《西班牙政府和轴心国》，第 9 号）；另见齐亚诺：《欧洲》，第 600 页，第 603—604 页，第 607 页；英译本，第 399 页，第 401—402 页，第 404 页；施密特：《外交舞台上不开口的演员》，第 500—503 页。

《概览，1939—1946 年：希特勒的欧洲》，第 360—366 页。1940 年 10 月 24 日的蒙特瓦尔草案〔《文件，1936—1946 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 2 卷：《希特勒的欧洲》，第 125 页〕规定了重新划分非洲殖民地，主要由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来占领，同时也载入记录，凡需要法国方面做出的任何让步，都应以英国领土来抵偿。据说在蒙特瓦尔会议后不久，德国大使就告诉了赖伐尔，希特勒已拒绝了佛朗哥对法属摩洛哥一部分领土的要求。

齐亚诺：《欧洲》，第 604 页；英译本，第 401—402 页。

齐亚诺：《欧洲》，第 604 页；英译本，第 402 页。

并没有把德国的援助作为参战条件。议定书第五条包括了几项关于领土要求的规定。据报道，该议定书随后这三方面都签署了，可能是在维也纳。

意大利对希腊损失惨重的进犯，加上他们在埃及的裹足不前，不久就使希特勒改变了他有关地中海的计划。希特勒在11月12日的第18号指令中宣布，即将采取政治上的步骤，使西班牙参战，为“菲立克斯行动计划”作准备，该计划打算攻占直布罗陀，以防止英国在半岛或各岛屿上获得一个立足点。加那利群岛的防务应由德国—西班牙共同承担，但是，对占领直布罗陀则将完全由德国负责，与此同时，为了保证轴心国在摧毁直布罗陀的现有防御工事以后能够守住它，希特勒现在提议，德国应该控制住海峡两边轴心国的防御工事。于是，在汝拉着手训练突击队：一支由五十名军官组成的侦察部队被派往西班牙；11月18—20日，塞拉诺·苏内被召往萨尔茨堡，告以西班牙参战的时刻已经来到了。他倾吐了西班牙在经济和其他方面的种种困难；抱怨议定书关于领土方面规定的条文太含糊不清，不能博得公众对一场战争的支持；他还间接提到了西班牙对拿破仑的抗击，并竭力主张轴心国应从攻打苏伊士入手。希特勒是准备让西班牙再考虑一、二个月的，但同时却抛出了一个十分阴险的暗示，即德国有力量消灭那些不忠实的朋友。三个星期后，正当德国还未能赢得英国之战，而意大利又在阿尔巴尼亚受到了新的更为严重的挫折的时候，德国对西班牙采取了下一个行动步骤。卡纳里斯在12月7日拜访了佛朗哥，通知他希特勒希望德国军队能干1月10日进入西班牙。他们不能再这样无限期地等待下去了，因为别的地方还需要他们，并且一旦德国军队越过边境，他们就将开始运送物资。

佛朗哥的答复是十分明白的。西班牙在目前不能参加战争（其原因已为德国所熟知），而如果参战的话，它将282成为它的盟国的一个负担。但他也定不出一个较迟的日期。他将尽一切努力来完成西班牙的各种准备。希特勒并没有进一步行动。除了佛朗哥的暧昧态度外，还得考虑其他一些因素，特别是意大利在阿尔巴尼亚和西部沙漠受挫后迫切需要的军事援助。本来要在“菲立克斯行动计划”中派重要用场的俯冲轰炸机，现在在中地中海却需要它们；而且，德国的远征军不久也就要组成去出征利比亚，甚至暂时先要出征阿尔巴尼亚。最高统帅部12月11日下达命令说，鉴于各种政治条件已起变化，除了已经在进行中的调查研究外，“菲立克斯行动计划”的准备工作将予以中止，德国也将不再派遣炮兵连去保护西班牙的岛屿和海岸。德国的海军依然支持“菲立克斯行动计划”，但是在1941年1月8日至9日召

《元首会议，1940年》，第113页，第122—123页。

同上书，1941年，第2页；另见同上书，1940年，第130页，第131页。

同上书，1940年，第113页。

塞拉诺·苏内：《在昂代与直布罗陀之间》，第233—259页。

塞拉诺·苏内：《在昂代与直布罗陀之间》，第239页，第243页，第244页·第246页。

施托雷尔1940年12月12日致德国外交部长的信（《西班牙政府和轴心国》，第11号）；参阅齐亚诺：《欧洲》，第637页；英译本，第425—426页。据说，卡纳里斯曾故意怂恿佛朗哥拒绝希特勒的要求，并暗示德国人不会冒险强行进入西班牙（科尔文：《情报头目》，第131—132页）。

《元首会议，1941年》，第4页。

《元首会议，1940年》，第135—137页。

开的元首会议上，陆军代表建议推迟这项计划。不过，“菲立克斯行动计划”的某些准备工作似乎还在继续进行着，譬如说，训练突击队，以及命令空降着陆专家施图登特将军于1月间拟订一份将避免侵犯西班牙中立而占领直布罗陀的方案。这位专家报告说，这是不可能的。根据他的说法，戈林在这时期似乎正在设法使希特勒对合并“海狮行动计划”和“菲立克斯行动计划”以代替“巴巴罗萨计划”产生兴趣。

1月份，施托霄尔好几次提出参战问题。希特勒请墨索里尼去了解一下佛朗哥的态度，2月2日希特勒又亲自写信给佛朗哥。希特勒坚称，佛朗哥之所以能够击败共和主义者，只是因为德国和意大利的态度迫使各民主国家谨慎行事，但是为了这个胜利，他是永不会，永不会得到宽恕的，再说，要是德国和意大利不能打赢目前的这场战争，那么“在未来要有一个真正的民族独立的西班牙也是不可能的”。在昂代经一致同意，西班牙将宣布它准备不是在遥远的将来，而是在短期内，就签署三国公约并参加战争。因为英国既不愿意也没有力量来帮助西班牙，所以西班牙依靠国外物资供应的借口是站不住脚的。希特勒同意一旦西班牙答应了具体的参战日期，就马上开始运交谷物，以此来满足佛朗哥12月7日提出的异议之一。而佛朗哥就此又端出另一条新理由，声称1月份进行出征将会有困难。两个月已经白白过去了，“否则将会有助于决定世界的历史”。随后，希特勒又把西班牙的领土要求同德国和意大利所提出的“十分温和的”要求作了对比，并答应，即使西班牙在战争中有许多事情都未能如愿，但在最后解决时，它会充分得到补偿的，因通过最后解决西班牙将能在符合全面解决非洲殖民地方针的条件下尽量地满足它的要求。最后，希特勒向佛朗哥保证，不管英国认为他们能在外围的任何地方取得什么样昙花一现的胜利，但战争是已经决定了。英国在欧洲的力量已垮掉了，而“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机器”已准备好执行任何“新增的任务”。

希特勒没有宣告由于“经济和军事上的需要”要求德国立即占领西班牙，或者是“历史上的需要”要求德国并吞直布罗陀，这多少是一种安慰，但是除此以外，眼前并无任何能满足西班牙经济或领土要求的東西。2月12日，佛朗哥在博迪盖拉会见了墨索里尼，除了因为法国态度起了变化，佛朗哥现在明确提出要求修改维也纳议定书中的第五条外，会谈一无进展。墨索里尼压根儿没有对西班牙的参战竭力施加压力；他后来通知德国政府，西班牙并无打算参战的迹象，而轴心国最多只能把它保持作为一个政治盟国。

佛朗哥在往返博迪盖拉的途中，在蒙彼利埃遇见了贝当，据说他曾请求贝当协助不要让德国军队假道西班牙。佛朗哥返回马德里后，在2月26日发出了一个他称为对希特勒2月2日一封信的“即时的答复”。他指出，德国

《元首会议，1941年》，第11—12页。

西蒙内：《贝尔利诺》，1940年12月30日，第193页。

即入侵英国的计划。

即对俄国的进攻。见利德尔—哈特：《小山的另一边》，第230—231页。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41年1月18日。齐亚诺：《欧洲》，第625—627页；英译本，第417—418页。西蒙内：《贝尔利诺》，1941年1月28日，第208页。《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4卷，第462—471页（124—C）；《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6卷，第939—946页。

《西班牙政府和轴心国》，第12号。

只是刚刚开始履行它的经济援助的诺言；而且，虽然使直布罗陀的炮声沉寂对轴心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西班牙是经不起冒这种风险，除非苏伊士运河也同时关闭。佛朗哥还表示，鉴于西班牙在内战中的重大损失，它对领土的要求一点也不过分，而现在的议定书不但是太含糊不清，而且在现有的情况下是完全“过时的”。

希特勒已经放弃了说服西班牙参战的企图。2月15日，最高统帅部决定把地中海战线上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推迟到秋季，到那时直布罗陀和马耳他都将受到攻击。希特勒预计进攻直布罗陀的困难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变得更加困难，同时他严厉地抨击了西班牙“欺诈的把戏”，以及佛朗哥对轴心国的不忠诚。希特勒感到，只有当战争已经打赢时，西班牙才会表明态度。尽管如此，希特勒以他一贯善于从败局取得好处的才能似乎利用了德国人要进入西班牙的威胁作为一种诱使维希政府签订1941年5月流产的协定而与德国合作的手段，也可能作为德国进攻俄国的一种烟幕。

德国政府要求西班牙同意，在昂代建造另一座铁路桥梁，并改善原来那座旧桥；同时7月25日，希特勒告诉他的海军顾问，只要美国一攻击西班牙或葡萄牙的岛屿，他就马上长驱直入西班牙。然而，就他亲自采取主动行动一点而言，到了秋天他的东方战役依然要由他负责掌握，当塞拉诺·苏内为修订1941年11月签订的反共产国际条约来访问柏林时，他并不坚持要西班牙参战。对于佛朗哥“懦怯的”背信弃义行为，希特勒始终引以为憾，但他下定决心不让轴心国再向西班牙要求比它所能给的更多的东西；他尽量利用国家主义者愿意同德国合作的各种办法——不是出于他们支持轴心国的积极愿望，就是作为因西班牙不参战的政策而对轴心国的一种让步方式。

佛朗哥仍有充足的理由来拖延参战。虽然德国在希腊的克里特岛和俄国的战役取得了惊人的胜利，但是轴心国并没有比他们过去一年更接近于最后胜利；另一方面，如果西班牙去年冬季确实躲过了饥荒，那么，这是由于有了来自国外的供应援助，而不是来自希特勒的欧洲。西班牙国内也可能在酝酿着政治危机，但这并非来自于已失败和被取缔的共和主义者，而是来自君主主义者——他们因最近群众悼念1941年2月28日去世的阿方索十三世的示威运动而受到鼓舞——或者是来自塞拉诺·苏内和强大不可一世的西班牙长枪党。在1941年5月塞拉诺·苏内发表特别好战的演说不久以后所实行的政治改组，其主要特征是，任命佛朗哥信赖的一名陆军军官巴伦廷·加拉尔

《元首会议，1941年》，第33页。齐亚诺：《欧洲》，第646—647页，第650页，第672—673页；英译本，第432—433页，第434—435页，第450页。

1941年6月21日希特勒致墨索里尼的信（《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第44号，第101页）。

兰格：《我们对维希的孤注一掷》，第141—146页；海军上将威廉·D·李海：《我在现场》（Fleet Admiral William D. Leahy: I Was There），伦敦，高兰兹，1950年版，第41页；《贝当元帅受审记》，第479页，第480页。据报道希特勒在1941年5月11—12日就告诉了达尔朗，摩洛哥可能被置于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共管之下（兰格，前引书：第150页）。有关1941年5月德法谈判的记载，可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381—384页。

《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3卷（西班牙），第27号。

《元首会议，1941年》，第94页。

齐亚诺：《欧洲》，第688页；英译本，第461页。

1942年4月29—30日与墨索里尼的会谈（《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第51号，第120—121页）。

萨、莫兰特上校担任政府的内政部长，这个职位自塞拉诺·苏内调任外交部长以来一直是空缺的。从长枪党手中接受了对宣传机构和报刊的控制权，但是经德国大使提出抗议之后，仍交还给了长枪党，而且两名长枪党的极端分子何塞·希龙和何塞·路易斯·德阿雷塞还分别出任了劳工部长和长枪党的书记长（这一职务使他在内阁里也占有一席）。

当德国进攻俄国时，西班牙政府不但在口头上立即表示同情，而且还征召了“蓝色师团”入伍以抗击共同的敌人。在由一万七千人组成的这个师团，和随同他们的由二、三个空军小队组成的空军分队中，有些人是真正的志愿兵，但是许多人都是正规军，或是被迫征来充数的长枪党党员。该师团被派往东线的北端，在那里他们在供应和福利方面受到德国人很苛刻的待遇，而且遭到了重大伤亡。在这种情况下，该师团表现得相当好。英国和美国在有计划的反俄的示威运动中在所难免地受到了波及。6月23日，一群暴徒在塞拉诺·苏内的一篇激烈演说的煽动下，砸碎了英国驻马德里大使馆的玻璃窗，而佛朗哥在7月17日和18日发表的纪念讲演中又以前所未有的态度预言到轴心国的胜利，并竭力对于“富豪民主主义者”以及美国对西班牙的帮助肆意污蔑，他把这种帮助描述为在伪装下干涉了内政。当英美两国大使想谒见佛朗哥和塞拉诺·苏内时，两人在私下里也怀着同样的仇意。施托雷尔报道说，大约就在这个时候，重新得到佛朗哥宠爱的塞拉诺·苏内故意试图通过煽动舆论和对英美两国横加挑衅来强行挑起战争。据施托雷尔说，苏内不能够象齐亚诺极力敦促他去做的那样，直接采取行动，因为将军们对佛朗哥有同样的或者较大的影响，他们都希望西班牙参战，但不到最后可能的时刻不开始行动。在这些将军中，空军部长比贡甚至还要求施托雷尔去说服塞拉诺·苏内不要操之过急。

第五节 西班牙、英国和美国

（1940—1941年）

（一）英西关系和封锁

1940年5月底，英国政府决定派塞缪尔·霍尔赴马德里去尽力设法改善两国关系。英国政府首先建议霍尔应当作为一个特命使节作一次简短的访问，然后，他应当继莫里斯·彼得森爵士之后任大使；但是，认为很有可能轴心国再隔几周就要控制西班牙，所以命令于6月1日载霍尔飞往马德里的那架飞机在那里待命以备再送霍尔回国。然而，霍尔坚持要那架飞机马上回国，自己则搬进去好象要长住下去似地（恰巧就住在德国大使隔壁的一幢

汉密尔顿：《绥靖的产儿》，第126-127页；坦普尔伍德：《负有特殊使命的大使》，第112页。

蓝色是长枪党党员的色彩。

坦普尔伍德，前引书，第138—139页。有关1943年11月蓝色师团的撤退，见下文，原著第302页。

关于这件事，见多西纳格：《西班牙做得有道理》，第53—56页；塞拉诺·苏内：《在昂代与直布罗陀之间》，第294—297页；坦普尔伍德，前引书，第114—116页。

《西班牙》（Espana），1941年7月18日，《维哥的灯塔》（Faro deVigo），1941年7月19日见下文，原著第290—291页。

1941年5月4日和6月3日齐亚诺致塞拉诺·苏内的信（齐亚诺：《欧洲》，第658—659页，第663—664页，第667页；英译本，第440—441页，第443—444页，第446页）。

1941年6月28日施托雷尔致德国外交部长的信〔《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3卷（西班牙），第28号〕。

房子里)，并尽可能地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英国有能力而且也情愿继续战斗下去。

两国间的经济合作这时已朝前迈进了一步。5月22日，哈利法克斯亲自写信给萨拉查，要求他转告西班牙政府，英国愿到6月底在西班牙港口运交十万吨小麦，而且将为西班牙通过英西汇划结算购买葡萄牙殖民地的产品作出安排，同时，要引使西班牙作出中立的保证。6月7日，萨拉查发表声明说，不论是英国提供的援助，还是对西班牙中立的探询都受到了欢迎；到了7月6日，双方就购买什么产品（蓖麻油籽、椰子干核、玉米、花生油、咖啡和西沙尔麻）一事达成了协议；结算手续也通过7月24日的互换照会解决了。最后，准许西班牙采购价值七十二万八千英镑的货物。

不久以后，当英国1940年7月31日的报复法令规定实施强制性航行证和船只执照制度以及向中立国家限制定量进口的时候，在西班牙、葡萄牙及其海外属地之间的贸易问题上作了某些让步。英国企图对西班牙的经济政策采取一种中间路线，既不使西班牙因饥荒而陷入混乱，或同轴心国合作，或采用小动作的政策来疏远它，而另一方面，也不允许它累积足够的资源从而再出口，或用于它自己同英国的作战，或被轴心国入侵者所利用。霍尔建议采取一种机动的政策，视西班牙对这场战争的态度而加以掌握。经济作战部一直在考虑采用大致相同的方针，但是，经济作战部往往批评霍尔和外交部太宽宏大量了，而反过来，它又被谴责为“吹毛求疵存心找岔子”。

西班牙人对这样较严厉的封锁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287反对情绪，国家主义政府的庸碌无能，某些人士方面所表现出的明显恶意，以及怕德国失去耐心，所有这些起先引起了种种困难；另一方面，人们又把实际上是由于西班牙缺乏船只和外汇而造成的迟延归咎于封锁。尽管这样，到1940年年底，在进口限额计划的主要问题还是达成了协议，而在几乎所有其他问题上，甚至在向意大利出口铁、钢和其他物品问题上都达成了协议。新任西班牙商务工业部长的卡塞列尔，虽然曾被称为“讲求实际而又不落俗套的谈判能手”，但他仍迫切希望竭尽所能为西班牙获取更多的经济援助。他以惊人的才干在两者之间挑拨离间以从中牟利，但是，同他还是能够做成生意的，而且不止一次地多亏卡塞列尔的努力，他的政府才不顾塞拉诺·苏内的反对而批准了与盟国合作的建议。

（二）对石油进口的管制

1940年6月14日和16日，法国和英国政府通知美国国务院，发现有不

关于英西间的经济关系，见上文，原著第27—28页；在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1章，第509—510页，第529—548页中，有更详尽的论述。

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513—514页。

见上文，原著第21页以及梅德利科特，前引书，第422—423页，第430页以下，第440页，第441页。同上书，第441页。

坦普尔伍德：《负有特殊使命的大使》，第61—64页。

梅德利科特，前引书，第546页注。

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1章，第531页。“传奇式的人物”是霍尔给卡塞列尔的称呼（《负有特殊使命的大使》，第99页）。

见菲斯：《西班牙史话》，第37—52页，第272—275页；梅德利科特，前引书，第474—475页，第534—538页。

寻常的大量石油正从美国运往西班牙，其中绝大部分是由美国油船装载的。他们有理由相信，其中有部分油是要运给意大利的，或者是运给在加那利群岛的意大利油船的。虽然英国此时对西班牙的石油库存估计达四十万吨，但后来证明这一估计是过高了。据报道，从美国商务部的数字可以看出，6月中从美国输入西班牙的油量几乎达1939年7月到12月这半年输入量的一半，而实际上所有这些石油肯定已在德国突破法国之后运走了，这一事实就说明了贮存可能并非是唯一的目的。

英国政府曾要求美国限制使用美国的油船，也限制美国的润滑油和航空汽油运往西班牙，但美国政府还不准备直接采取这一行动。财政部长摩根索支持这一要求，但是，赫尔希望避免和国会在战争中偏袒哪一方的问题上发生龃龉，因而，采取了一些间接的措施。海事委员会规定美国人拥有的油船如果没有航行证就不许驶向西班牙或葡萄牙，这种航行证当时英国政府正停止发放，财政部扣留了停泊港内的油船进行检查。国务院私下里要求石油公司不要再向西班牙出口比平时更多的油，并注意所有的油都不要再出口到德国或意大利；但国务院对于英国对西班牙、葡萄牙和它们的美国供应商实行一种限额制度也没有提出异议。得克萨斯石油公司租用的挪威油船被挪威政府征用了。

7月16日西班牙向英国申请给它石油规定限额，通过互换照会于9月7日达成了一项协议，为西班牙规定许可进口石油的水平，那就是到12月底将使西班牙的存油从二十二万四千吨减少到十六万吨。这就使西班牙仅能保有大约二个半月的供应量，希望这么一来它便无法再出口油了。英国未能取得西班牙不给敌机加油的保证，但是，1940年3月的战时贸易协定已包括了有关船的加油问题。在该协定一经签订后，美国政府即开始允许美国人拥有的油船悬挂外国旗帜驶往西班牙，并签发了前往西班牙及其殖民地的货运执照。但是，美国的汽油和燃料油的出口从1940年上半年的二百五十六万八千桶降到了下半年的一百二十四万八千桶；而事实上，由于船运方面的困难阻碍了西班牙获得它的全部限额量。

（三）与英国及美国的经济关系

（1940—1941年）

到1940年9月初，西班牙对粮食和原料的需求已变得十分紧张了。例如，一些棉纺织厂每周只开工两天，一场灾荒使这个国家又损失了一百万吨小麦。从轴心国那里，截至此时也还看不到有什么东西运来，而几星期后的柏林会谈却表明了，它加入轴心国之前，德国不会答应给它什么，甚至那时也只能指望得到它所要求的一部分东西。英国政府同时已将西班牙的小麦限额

《经济封锁》，第400页。

菲斯，前引书，第38—39页注。

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1章，第534—538页。

菲斯：《西班牙史话》，第46页注。

关于英美和西班牙在这期间的经济关系，见菲斯：《西班牙史话》，第54—56页，第99—109页；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538—548页；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874—882页。另见上文，原着第86页以下。

菲斯：《西班牙史话》，第53页。

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540页。

扩充到足以购买除了英帝国以外的粮食。9月17日，当经济作战部得知西班牙小麦实际短缺程度之后，才同意让它每月可进口达十万吨的除大米外的各种谷物。

但是，进口物品的运输和资金问题仍有待解决，9月7日西班牙要求美国给与美元贷款。美国国务院对此意见分歧。赫尔怀疑提供给西班牙的物资不管在数量上怎样慷慨，是否就能使西班牙置身事外表示怀疑，并担心一旦这种尝试失败，政府机关势将遭到报界和公众舆论的谴责。有人提议，美国红十字会应动用由国会表决的部分救济基金，购买小麦赠与西班牙，其条件是这批小麦不得再出口，而应由美国红十字会和西班牙红十字会分配给平民；并且，西班牙报界应将这个方案全部予以公布。10月8日佛朗哥接受了美国此项提议，10月12日韦德尔奉命通知佛朗哥，西班牙将获得一笔信用贷款，条件是他必须明确表示不介入战争的意向，而且这笔贷款只能用于真正的经济目的。不过，在过后几星期内，佛朗哥以塞拉诺·苏内接替了贝格贝德，并在昂代会见了希特勒，11月3日西班牙对丹吉尔实行了行政和军事管制。10月31日塞拉诺·苏内向韦德尔保证，不论是希特勒还是墨索里尼都没有暗示过西班牙应该参战，但与此同时，他却大讲起西班牙和轴心国之间现有的团结友好关系。韦德尔依然建议应该继续给予西班牙经济援助，但华盛顿的态度正变得强硬起来，部分是由于最近政治上的一些措施。11月8日国务院给韦德尔的指示是：在佛朗哥公开拒绝西班牙参战前，美国不提供任何援助，甚至红十字会也是如此。

英国政府力促美国国务院不要再坚持提出公开保证，而他们自己去提议讨论给西班牙以二百五十万英镑的贷款，并给西班牙签发这一年内进口一百万吨小麦的航行证。12月1日又签署了一份汇划结算协定，12月5日卡塞列尔在向汽车制造业的代表们的演说中宣称，英国在过去二周内所给的经济援助已经把正被拖入德国同盟阵线的西班牙拯救出来了。谈判拖延了几个星期，这期间英国一直在谋求取得关于丹吉尔的保证，但是尽管塞拉诺·苏内从中阻挠，还是在1941年1月17日签订了小麦合约，从而使得西班牙能立即从英国在阿根廷和北美的库存中购买到七万五千吨小麦。后来当西班牙在1月，从阿根廷购买四十万吨小麦的时候，它也领到了英国的航行证。丘吉尔的指示是“不要推托，要养活他们”。而经济作战部和外交部则持更为小心谨慎的态度。可以把它总结为这样一句话——“打开龙头，但要加以调节并随时准备关掉它。”1941年初，英国作了安排，由法属摩洛哥给西班牙和西属摩洛哥供应一定数量的粮食，作为对英国货品的交换。290 1941年1

同上书，第539—540页。

菲斯（《西班牙史话》，第55页）讲到了一亿美元的贷款，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540页）则讲到一笔二千万美元为购买小麦以外商品的贷款，这些商品西班牙人希望用橄榄油作为交换。据称，韦德尔、赫尔和英国政府都赞成后一种易货方案，于是由英国大使馆协助修改了西班牙的草案，这份草案以前曾为美国提供了比全世界各国总进口量还要多的橄榄油。

见上文，原著第279—280页。

见上文，原著第280—281页。

见下文，原著第314页。

丘吉尔，第2卷：第469页；美国版，第2卷，第529—530页。

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1卷，第543页。

月，经济作战部对进口食用植物油实行禁运，2月23日又将禁运范围扩大到所有一切脂肪和油类。这样做的目的是要阻止西班牙政府再向德国和意大利出口橄榄油，因为西班牙政府已向德意提供了超过其能力范围以内的数量。但是西班牙政府不敢撕毁同轴心国签订的合约，直到4月份发生了斑疹伤寒流行病之后，这才放松了禁运，允许西班牙进口一定限额的牛脂和棕榈油用以制造肥皂。大半由于德国和塞拉诺·苏内竭力阻挠一项关于用水银出口换取小麦和橡胶以获取英镑的附加协定的缘故，以致新的贷款协定在拖延了五个月之后，于4月7日才签订。最后，协定的这一部分没有经过正式手续便付诸实施了。根据1940年11月29日的一项协定已经预支了二百五十万英镑贷款中的三十五万英镑给西班牙，以便其从法属摩洛哥购买磷酸盐、锰和小麦。

第一批食品于1941年1月7日授权由美国红十字会负责装运。价值一百五十万美元的面粉、牛奶、奎宁和医用物品在此后六个月左右内运到了西班牙，但是，国家主义者采取了极不合作的态度，他们远远没有按照美国所希望的那样对这份援助计划加以宣传表示感谢。另一方面，就美国对外的正常出口而言，根据在1941年初美国制订的许可证方案，西班牙是受到较差待遇的国家之一。从3月后半月起，英国政府可能由于从许多报告中获悉德国即将越过比利牛斯山而大为震惊，因此开始力劝美国应该给予西班牙象英国政府所给它的同样援助，但是，从赫尔最终在4月29日给韦德尔的指示看来，美国的援助似乎同以往几无二致，仍然是以保证不参战为条件。无论如何，当这指示到达马德里时，塞拉诺·苏内，因被韦德尔抗议轴心国在报上的宣传一事所激怒，正在阻挠韦德尔晋见佛朗哥的意图，于是谈判陷入僵局。

佛朗哥在7月17日和18日的讲话并未能扭转僵局。艾登评论说，佛朗哥似乎并不渴望经济援助，所以英国的政策须视西班牙政府将来的态度和行动如何而定。英国决定不格外去援助西班牙，虽然如此，还是要继续维持现有的安排，并提供西班牙以各种新的方便，只要这将有利于英国的战争努力。英国日益需求的铁砂、硫化矿类、钾碱、汞和其他战略物资实际上正在造成贸易逆差。西班牙已无需动用第二笔英国贷款中的大半，现在倒是英国没有能力出口足够的东西来支付它的进口了。

美国人一如既往，还是比英国人更想对西班牙施加压力。赫尔在9月13日向西班牙大使表示了他对佛朗哥和塞拉诺·苏内的“粗鲁”、“无礼”态度的不满，他说甚至在世界上最原始落后的国家里，美国也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无礼和轻视。油船的行驶再次被拖延，甚至在佛朗哥7日讲话以前已

见上文，原著第27页。

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1章，第567页，第569—570页；另见上文，原著第28页。

汉密尔顿：《绥靖的产儿》，第298—304页。据说，塞拉诺·苏内已告诉维希大使皮埃特里有关从法属摩洛哥赠送维生素一事，法国的慷慨大度并没有如同美国人那样大声嚷嚷[皮埃特里：《我在西班牙度过的岁月》（*Pietri : Mesanneesd'Espagne*），第57页]。

菲斯：《西班牙史话》，第130—131页，第132页，第134页；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545—547页。

艾登1941年7月24日在下院的讲话（下院辩论，第5辑，第373卷，第1074—1075栏）。

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347—348页。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187页。

是如此，这种施加压力的方式一直持续了整整 7、8、9 三个月之久。卡塞列尔准备谈判，但美国人这次想要换得更具体的东西，而不光是些口头上的亲善友好，他们在 11 月 29 日提出的条款是十分强硬的，这些条款包括要求对石油炼制，石油在西班牙国内的分配以及西班牙在协助购买战略物资方面实行监督。

石油的输送在珍珠港事变后再次耽搁下来了，石油输出的减少情况倘使不是由于英国的抗议的话，可能已变得越发严峻了。甚至当西班牙停止从美国进口石油（由于愤怒的群众袭击了停泊在得克萨斯港的油船），并开始全部依赖委内瑞拉和荷属西印度群岛的供应时，美国政府仍旧能通过私营石油公司来控制石油运输。1942 年 2 月，在特纳利夫岛的炼油厂关闭后，西班牙政府接受了监督，并在 3 月份达成了包括炼油和采购战略物资在内的一项协议。

（四）保护在逃的战俘和难民

1940 年 6 月以后，逃亡的英国和其他盟军的战俘都逃到了西班牙。英国大使馆鼓励这些人偷越比利牛斯山脉，在到达西班牙时，便供给他们食物和衣服，并且安排他们转移。他们这些人落到西班牙当局手中，就被作为非法移民而投入监狱，只是在英国大使馆不顾官僚主义的阻挠一再就诸如此类的事提出交涉之后，西班牙政府才改变了他们的做法，将军官们拘留在旅馆里，其他士兵则关在米朗达德埃布罗的一个特种营房里，那里的条件应当说是属于西班牙的兵营而不是西班牙的监狱的性质。为每一个人申请离境的许可证都必须经过一番交涉，但要是西班牙政府同意把他们作为英国公民来对待的话，他们总是能得到许可的，可是，对取得这项身份的权利却是有各式各样的解释的。据报道，德国人经常要求引渡在逃的战俘和难民，可是，霍尔仅提到过西班牙当局曾两次准备把他们移交给德国人，而每次都由于英国提出抗议才改变了原来的决定。1942 年 11 月以后，凡是来自法国被迫降或因迷航而误降在西班牙境内的盟国飞行员或空运部队都马上移交给了领事馆。也有若干难民进入了西班牙，虽然他们绝大多数是途经西班牙前往葡萄牙的，但其中有些人（大多数是犹太人和无国籍的德国人与奥地利人）是无法再向前走了。这些人也得到了英国大使馆和各流亡盟国政府的代表以及美国慈善机构的援助；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可以得到疏散的。有趣的一例是有关来自萨洛尼卡西班牙籍的犹太人的遣散一事，他们的释放系由霍尔达纳在

见上文，原著第 87—88 页。

赫尔：《回忆录》，第 2 卷，第 1189—1190 页。

见上文，原著第 88—89 页。

海斯：《战时使命》，第 111—126 页，第 176—177 页；坦普尔伍德：《负有特殊使命的大使》，第 77—79 页，第 226—238 页。

1907 年有关陆地战争的海牙公约第 13 条款规定：凡战俘逃入到一个中立国便获得了自由，但如果该中立国允许他们居留，就可给他们指定一个居住地方。关于拘留逃犯是不是中立国的责任的问题，法律学家们意见是不一致的。

有关迟至 1943 年这些生活条件的恶劣情况，见 R·M·普赖尔厄司令官在 1943 年 3 月 28 日下院的演讲（下院辩论，第 5 辑，第 409 卷，第 1450—1451 栏）。

关于把一名法国难民从马德里送回昂代，即送到敌占区一事，见皮埃特里：《我在西班牙度过的岁月》，第 190—191 页。

1943年谈判成功的。1942年到1943年冬季期间源源涌到的成千上万名法国难民首先是由英国大使馆和美国慈善机构负责料理，但是，从1943年2月起美国大使馆就接管了全部责任，后来在阿尔及尔的法兰西国家委员会也捐献了五十万美元作为他们的生活维持费。德国人坚持凡属适役年龄的法国难民一定要作交战国的人员处理，要么加以扣留，要么遣回法国，然而，霍尔达纳同意让美国人把他们经葡萄牙转送到北非去。最初由于德国施加压力，迫使西班牙政府不敢开放西班牙的港口以供遣散难民之用，但是，从1943年10月起，难民得到了允许从马拉加离境。1943年期间，约有二万名法国人就是这样参加了盟国部队。波兰人和其他盟国侨民也得到了遣散。1943年3月底西班牙宣布封闭比利牛斯边界，地方当局且发布了须将难民移交的命令，但是，一经霍尔和海斯对此提出抗议后，霍尔达纳就获准撤销了这新规定，而这新规定原是在作战部长阿森西奥和最新任命的内务部长布拉斯·佩雷斯的影响下发布的。

(五) 关于盟国在西班牙还是在加那利群岛登陆的问题

西班牙长枪党的报纸《向上周刊》在1941年7月31日愤慨地报道说，由米亚哈将军率领的流亡共和主义者访问了美国驻墨西哥城大使馆，以讨论共和主义者对盟国在加那利群岛登陆时给予什么样的帮助。这并不是西班牙报纸第一次指责盟国打算占领加那利群岛，或者入侵伊比利亚半岛，这些指责曾不断见诸报纸，一直到法国获得解放为止。它们是由于受到德国的宣传的影响以及西班牙政府方面真正的惊惶所引起的。至于盟国在西班牙或葡萄牙的登陆，国家主义者对它的恐惧则被大大地夸张了，联合参谋部确曾一度把伊比利亚半岛考虑在可供选择的第二战线之列。然而，罗斯福仍旧执意要优先选择法国。同时在伦敦的计划参谋部急急忙忙地作出了决定不用伊比利亚半岛，可能只是因为该半岛上的公路、铁路及港口设施不便。在战争早些时候，英国最高司令部准备调派六个师去加的斯，这六个师原是他们准备在摩洛哥登陆时用的。但是，这显然只有在西班牙的邀请下才能这样做。加那利群岛眼看就要被占领了。1940年1月，盟国制订了计划，打算在一旦德国人进入西班牙时，即夺取加那利群岛作为代替直布罗陀的一个基地。从1941年5月到7月，调集了一万名远征军（以后增加到二万名）整装待发。但随

海斯：《战时使命》，第123—124页。

同上书，第177页。关于皮埃特里对1942年到1943年难民危机的记述，见《我在西班牙度过的岁月》，第192—212页。

卡尔顿·J·H·海斯于1942年5月接替韦德尔任美国驻西班牙大使。

多西纳格：《西班牙做得有道理》，第64—69页，第92—93页，第225页。这里谈到的这份最富有夸张剧情的计划，即所谓在葡萄牙登陆的“伊莫夫行动计划”，据说这份计划是由一个名叫伊莫夫的外国间谍倡议的。

李海：《我在现场》，第197—198页。李海支持半岛战役的观点可以同海军上将雷德尔和邓尼茨的观点饶有兴趣地加以比较。

费德里克·摩根爵士将军：《霸王计划的序幕》（General Sir Frederick Morgan：Overture to Overlord），伦敦，霍德与斯托顿，1950年版，第139页。

丘吉尔，第2卷，第551—552页；美国版，第2卷，第624页。

同上书，第460页，第552页，第563页；美国版，第519页，第625页，第639页。罗斯基尔：《海

后登陆计划又推迟到 9 月份。丘吉尔一度主张对德国人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而不要等待德国人的行动。此外，虽然甚至在 9 月内盟军实际上并不曾登陆，但这支部队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仍保留在那里待命。可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由英国或更早些时由英美联合发动一次进攻的危险性，似乎比西班牙政府原来推测的要小得多了。

第六节 塞拉诺·苏内的倒台和 盟国在北非的登陆

虽然盟国十分成功地发展了与西班牙的经济关系，但是它们在诸如宣传工具、报界态度及控制轴心国的活动等方面尚未能获得较好的待遇。到 1942 年年中，西班牙官方的态度还是得意洋洋地亲轴心国的，但是佛朗哥 7 月间讲话的调子在这一年中是谨慎得多了，而且正在进行着一项重大的政治改革。开春以来，塞拉诺·苏内的权势已渐衰落，他因间接地被牵连到企图暗杀国防部长巴雷拉将军的事件中，于 9 月 3 日被佛朗哥解除了职务。据说，塞拉诺·苏内的同僚阿雷塞和希龙故意策划了这一暗杀阴谋来把他搞垮，佛朗哥借此机会一箭双雕，既清除了塞拉诺·苏内，又任命了向称亲轴心国的阿森西奥将军接替巴雷拉将军，借以保持平衡。

新任外交部长唐弗朗西斯科·戈麦斯·霍尔达纳将军（霍尔达纳伯爵）过去在 1938 年 1 月至 1939 年 8 月期间即担任过此职。如今盟国代表们觉得能与一位正直、稳健和理智的人打交道感到欣慰。这位部长的主要目标在于不使西班牙被交战双方拖入战争，他也从来没有对轴心国的威胁利诱屈服过。对盟国特别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他的任命恰好是在英美的北非登陆之前。盟国的军事计划者们充分意识到突然发起一次对直布罗陀袭击的危险性，不论它是否经过西班牙同意。确实，正是为了尽量减少这种危险起见，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才选择在卡萨布兰卡（它将提供另一条通往海峡的交通线）而不在波尼登陆，这样就可以使（正如后来情况的发展）盟军有可能在向突尼斯进军的赛跑中抢先到达。不管盟国军队在哪里登陆，舰只集结在直布罗陀总是不免要暴露的，并且大部分盟国空军只有取道直布罗陀机场才能飞抵北非，而该机场只消遭到半小时的轰炸便会失去作用。单就直布罗陀岛本身来说，由于从 1940 年起就挖掘了防御工事，它可能经受得起一次围攻，但作为基地就没有用了。艾森豪威尔在 1942 年 9 月中旬向马歇尔汇报说：如果西班牙人突然发动进攻，那么要在若干日子内使用以北非地面为基地的战斗机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而盟国也完全没有把握能重新使用直布罗陀并控制海峡。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认为：德国人如果没有西班牙的全力支持，它是不会迅速挺进到直布罗陀的，而且无论如何他们运送给养和派遣地勤人员还得需要时间。他还指出：单就德军迄今还没有进入西班牙，尽管控制海峡对他们是非常有利这一事实而言，就可说明他们一定考虑过这一行动将是很困难的。同时，他还向马歇尔报告说：西班牙目前或许仍将保持中立，但是，在

上之战，1939—1945 年》，第 1 卷，第 272—273 页，第 380—381 页。

丘吉尔，第 3 卷，第 388—389 页；美国版，第 3 卷，第 438 页。索姆纳·韦尔斯关于 1941 年 8 月罗斯福—丘吉尔会谈备忘录〔美国国会：《珍珠港事件两院调查委员会意见听取会》（U.S.A, Congress: Hearings before the Joint Committee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Pearl Harbor Attack），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6 年版，第 4 章，第 1785—1786 页〕。

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 101—104 页。

胜利登陆不成问题之前，从海峡那边来的危险依然是他主要担忧的一个问题。

关于登陆时在外交上应做的准备方面，丘吉尔和罗斯福最初商定，英国应负责对付西班牙，而美国则应付在北非的法国人，但是据报霍尔刚从英国回来就给霍尔达纳提出过一些特别保证，英国打算尊重西班牙领土完整，也不干涉西班牙内政。可是事实证明不但英国，而且美国的保证也是必要的。这时，在西班牙有关盟国登陆的谣言已是甚嚣尘上，加上在前一年夏天，美国新闻界和“压力集团”又掀起了一场支持同一个允许轴心国潜艇从加那利群岛获得给养的法西斯政府断绝邦交的运动，西班牙政府似乎已把这种运动看作为美国官方策动的暴行宣传，准备入侵群岛或半岛的序曲。10月间增援部队开到加那利群岛，霍尔达纳几次三番向海斯就反国家主义者的鼓动宣传提出了抗议，并警告他说：盟国在西班牙家门口的军事活动对西班牙将构成严重威胁。海斯自己也为听到有关北非的登陆可能包含有对加那利群岛实行预防性占领的消息而感到震惊，于是，他立即向华盛顿请求否认此事。他在11月2日递给霍尔达纳一份由罗斯福亲自批准的声明，保证尊重西班牙的主权和领土，既注意到西班牙不想卷入战争的愿望，也表示美国政府同在他们国内的反国家主义者的活动毫无关系。另一方面，据说霍尔达纳直到登陆行动开始前几小时，并没有对可能在北非登陆一事向霍尔提出异议，但到那时他也只是要求盟国保证不在西班牙区域内的摩尔人中间惹起动乱而已。

11月8日早晨，霍尔达纳显然如释重负地收到了登陆通知和英美作出的有关此举决不是针对西班牙的保证。佛朗哥对此也持镇静甚至是热忱的态度。在当天晚些时候举行的内阁会议上，阿雷塞、希龙和阿森西奥将军都建议倒向轴心国一边参战，但是由于霍尔达纳坚决反对，就推迟到在第二次会议上才作出了决定，然而到了那时参战的机会已经错过了。在整个法国殖民地披占领后，西班牙于11月12日发布了局部动员命令，但霍尔达纳于12月7日通知海斯说：对于交战双方，西班牙打算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政策，军队严格保持采取守势，但将抵抗任何外国的入侵。盟军当局特别留意防止在摩洛哥与西班牙发生冲突，但同时又令美国第五集团军严阵以待，准

布彻：《我与艾森豪威尔相处的三年》，第163页，第165页，第177页以下。

1942年9月2日罗斯福致丘吉尔的信，引自兰格：《我们对维希的孤注一掷》，第289页；另见赫尔：《回忆录》，第2章，第1190—1192页。

多西纳格：《西班牙做得有道理》，第84—85页。

同上书，第68—64页，第81页以下。

海斯：《战时使命》，第87—88页。

在已公布的证明材料中没有一件能表明在登陆准备阶段有此计划，即使对这计划曾经作过任何考虑的话。

海斯：《战时使命》，第87—88页。

坦普尔伍德：《负有特殊使命的大使》，第176页。

关于英国照会的文本，见同上书，第177—178页；罗斯福给佛朗哥的信的文本，见海斯：《战时使命》，第91页。

坦普尔伍德，前引书，第179—180页

宣言原文见多西纳格：《西班牙做得有道理》，第102页。

海斯：《战时使命》，第93页。

备好对付任何来自西班牙地区的攻击。盟国在北非的代表也作好准备，如果一旦西班牙或法国的殖民政权垮台，就向摩尔人那里寻求援助；并考虑制订一份计划，如果西班牙竟然翻脸，就把流亡的里夫首领阿卜德·卡里姆请回国来领导起义，但因避免引起怀疑，后又放弃了这个计划。但后来情况证明，盟国与那地区之间的关系并未真正造成困难。

至于佛朗哥将军由于默认北非登陆而究竟赢得了盟国多少感谢之情，那又是另一回事了。然而，此刻反对把他国家和政府的命运作为赌注押在参战上面的争论，却比他在两年前拒绝参加“菲立克斯行动计划”时要激烈得多。当然他仍旧不得不考虑德国有可能向西班牙施加压力迫其合作，或者干脆把德军开进西班牙。另一方面，如果佛朗哥继续保持老样子呆在这个油锅里碰运气，而不是有意识地跳进火坑，那么到头来可能不至于发生最坏的结果。此外，虽然西班牙（如果它不能避免被卷入战争的话）作为一个被占领国家要比充当德国的盟国将处于更糟糕的地位，但是，站在轴心国一方介入所带来的危险性实在太大，因此宁可冒着被占领的危险也要比因自愿参战而招297来灾难略胜一筹。多西纳格声称：施托雷尔由于深信盟

国已经选择北非作为第二战线，不止一次地告知霍尔达纳，西班牙政府应该提醒英美两国，西班牙将把英美在法属摩洛哥登陆一举视作宣战理由。此外，施托雷尔在10月27日还说过：如果西班牙在上述地区对盟军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德国就将给予支援。霍尔达纳对此的回答是：这一提议与德国对北非维希部队的态度是不相称的。

霍尔达纳还坚决主张，在没有了解德国的真正意图之前，西班牙不能同德国合作。要弄清楚施托雷尔在提出这些建议时究竟得到德国外交部或希特勒本人多少支持，将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试图通过西班牙的外交活动来影响敌人的心理，这倒很象是希特勒可能惯用的手法。然而，就在那时，从施托雷尔的第一次提议来看，就可以把它理解为德国自己当时并不打算进入西班牙的迹象。

不顾轴心国在西班牙的情报机构所提供的一切情报，纳粹首脑在时间到来时，断定登陆将分别在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塔尼亚举行。当盟军的登出其不意后，纳粹首脑在11月8日决定占领法国南部和突尼斯，而不占领西班牙。据报道，希特勒在慕尼黑召开的轴心国紧急会议上叫嚷道，如果西班牙早就让德国进攻直布罗陀的话，这种事情就压根儿不会发生。所有一切准备工作均已部署就绪，五天之内就能拿下直布罗陀。西班牙竟敢拒绝，简直是发疯。

然而，尽管有些德国人谈到发动奇袭，但希特勒和他的一些主要亲信却只一个劲儿在咒骂西班牙，对他们自己未能把西班牙置干预防性占领之下十分气恼。据记载，希特勒曾表示希望他从突尼斯发动的反击将扩展到西属摩洛

布彻：《我与艾森豪威尔相处的三年》，第109页，第157页，第219页，第283—284页。克拉克：《故意的冒险》，第136—137页，第140—141页，第161—164页。《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3卷（西班牙），第48号，第138页。海斯，前引文；兰格：《我们对维希的孤注一掷》，第341—342页。

同上书，第319—320页。

多西纳格：《西班牙做得有道理》，第98页以下。

西蒙内：《贝尔利诺》，1942年11月9日，第287页。

同上书，1942年11月16日，18日，第292页，第293页。

哥，并迫使西班牙改变态度，但是关于取道比利牛斯进攻西班牙和葡萄牙应采取什么行动问题，他却完全同意雷德尔的观点，即应该先在军事和政治上作好准备，但是非要到盟国的行动迫在眉睫之时，将暂按兵不动，借以避免转移其他地区所需要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邓尼茨接任海军司令后，赞成采取更为大胆的措施。据报道：“吉塞拉行动计划”（占领西班牙北部海岸的计划）到4月份就制订出来了。邓尼茨5月14日在汇报了意大利濒临崩溃的情况后建议说，德国应即占领西班牙和直布罗陀，而不应试图保卫西西里和撒丁。希特勒回答道，德国根本不可能从事这样一次行动，因为它需要第一流的战斗师，此外，没有西班牙的同意也不可能占领它。“西班牙人是拉丁民族中唯一顽强的人民，他们将会在我们的后方打游击。”另外，意味深长的是，希特勒拒绝采纳邓尼茨的另一项用新式空中武器（无线电操纵的滑翔炸弹）奇袭直布罗陀的建议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从政治角度考虑”，飞越西班牙已日益困难。事实上，德国对西班牙政策早在1943年初就已倾向于采取守势。德国人依靠散布谣言和由大使馆在半夜里打电话的方法使西班牙人不断处于外敌可能入侵的恐怖之中；据说，霍尔达纳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把西班牙船“蒙泰·戈贝阿”号在1942年9月19日和“蒙泰·伊盖耳多”号在1943年2月24日先后遭到鱼雷攻击的事看作是对西班牙决不可偏离轴心国太远的警告。但是，德国人最关心的似乎不是西班牙应紧密地与他们合作，而是要西班牙抗拒英美在比利牛斯半岛（包括葡萄牙）或在西班牙海外属地登陆的一切企图。至于西班牙政府方面，除了采取措施向轴心国和盟国再次保证他们恪守中立的意图外，立即抓住抵御盟国侵略这一借口，试图诱使德国履行其提供现代战备物资的诺言。12月13日希特勒接见了蓝色师团司令穆尼奥斯·格朗德斯将军，答应提供武器，其条件是这些武器应用于抵抗盟国的进犯。卡纳里斯99被遣回马德里，从霍尔达纳处获知，西班牙将抵抗任何侵犯其领土的大国。

乌戈·卡瓦列罗：《最高司令部：参谋总长1940—1943年的日记》（Ugo Cavallero：Comando Supremo：diario 1940—43），波伦亚，卡佩利，1948年版，1942年12月18日。

《元首会议，1942年》，第77页。

《元首会议，1943年》，第19页。

《元首会议，1943年》，第38—39页。

见安东尼·马蒂森森：《希特勒和他的海军司令们》（Anthony Martiensen：Hitler and his Admirals），伦敦，塞克-沃伯格，1948年版，第176页。

《元首会议，1943年》，第47页。

多西纳格（《西班牙做得有道理》，第127—131页，第134—138页）甚至声称，大使馆人员中的纳粹极端分子向冯·毛奇虚报丘吉尔和佛朗哥在里斯本举行过一次秘密会议，企图用这种方法来迫使德国出面干涉，推翻佛朗哥。

海斯：《战时使命》，第118页。德国人最后同意对“蒙泰·戈贝阿”号的沉没负责：并赔偿损失。

多西纳格，前引书，第203—204页。

《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3卷（西班牙），第42号，第44号；参阅菲斯：《西班牙史话》，第207页。

阿布斯哈根：《卡纳里斯》，第326—329页。在此书中卡纳里斯因说服了霍尔达纳宣布抵抗任何大国而受到称赞，但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霍尔达纳在星期三前就已向海斯作了同样的保证（多西纳格：《西班牙做得有道理》，第200页）。

通过毛奇（德国新任驻西班牙大使）与西班牙政府进一步的谈判，在1943年2月12日签署了一项会议记录，载明德国运交武器的意向和西班牙抗击英美进攻的决心。双方商定，德国人应训练西班牙军队使用新式武器，但在2月后期，当德国提议举行参谋会谈，特别是为了采取联合行动以保卫葡萄牙时，西班牙政府就开始敷衍搪塞，而等到德国已把武器全部交齐，才最后于6月断然拒绝了德国的这一要求。至于在武器付款问题上的讨价还价则一直拖到8月，且又牵涉到向德国供应钨和履行1942年12月17日签订的经济协定上面。与此同时，西班牙政府一直也在向盟国那里寻求武器。1943年3月驻阿尔及尔盟军司令部收到马德里的一份应付德军由比利牛斯入侵的计划，这份计划提出需要空军支援、防坦克地雷和高射炮，但事先就拒绝了盟国提供任何军队。6月间同美国大使馆进行了多次洽谈，但不论是赫尔或是联合参谋部都不赞成在当时的情况下提供武器。美国大使馆的陆、海军武官奉令只有在必要时，方可以讨论西班牙为了参战而提出的各种需要问题，如此而已。

第七节 西班牙政策的发展 (1943—1944年)

1943年7月23日，当毛奇作为德国大使向佛朗哥呈递国书时，佛朗哥虽然对轴心国表示了通常那样的同情，但却谈到了大战可能要比预期持续更久，况且战争持续愈久，胜利就愈发没有把握，因此，最好要不失时机地考虑如何能使大战结束。三个月之后，毛奇的后任迪克霍夫，怀着同样的目的于4月29日拜会了佛朗哥以后报告说，佛朗哥意识到盟国的力量和西班牙在经济上对盟国的依赖，这使得他平日的谨慎小心扩大发展到怯懦的地步。另一方面，佛朗哥和霍尔达纳内心深处都倍感恐慌，因为他们愈来愈深信西方大国可能联合苏联赢得这300场战争，而这种恐慌起源于反苏而不是亲轴心国。那些象霍尔在1943年1月和2月，与海斯在同年10月为消除西班牙对盟国的恐惧，改变西班牙对盟国的态度所做的特殊努力，丝毫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自从迈伦·泰勒（美国总统在梵蒂冈的私人代表）于1942年9月会见了佛朗哥后，佛朗哥和霍尔达纳一直都在宣称西方大国应该通过谈判求得和平妥协，保持德国作为欧洲抵御共产主义的主力，而不应该坚持全面击溃德国，因为照西班牙政府的观点，这将意味着俄国的全面胜利。如果德

《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3卷（西班牙），第45号，第46号。

同上书，第49号，第50号；菲斯：《西班牙史话》，第209页；《西班牙政府和轴心国》，第14页。
菲斯：《西班牙史话》，第207—212页；另见上文，原著第265页，注（即本书413页，注——译者）。

克拉克：《故意的冒险》，第162页。

菲斯，前引书，第215—216页。海斯：《战时使命》，第150页，第167—168页。

《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3卷（西班牙），第46号。

同上，第55号，

坦普尔伍德：《负有特殊使命的大使》，第184—196页。

林德利和温特尔合编：“我们如何对付西班牙”（E.K.Lindley and E.Weintal：“How We Dealt with Spain”），《哈泼斯》杂志，1944年12月，第31—32页。

多西纳格：《西班牙做得有道理》，第211页。

国不复存在，欧洲还得创造一个。在1943年1月主显节为外交使团所举行的宴会上，佛朗哥向霍尔提出这一方针，霍尔达纳也给霍尔写了一封长信论及此事。

也许值得提一下的是，当佛朗哥在1月23日向毛奇保证愿与轴心国合作时，他表示西班牙当尽力加深英美苏之间的不和，对英国施加影响使其赞同媾和。然而，西班牙政府在1942年到1943年的几个月期间为和平奔走，其背后的真正动机似乎是害怕苏联获胜。1942年10月29日霍尔达纳就向葡萄牙大使建议，中立国尤其是天主教的中立国，应该彼此保持联系，以冀早日促使战争结束，并且在那年的12月，当他访问里斯本时，再次提出了这个建议。1943年最初几个月，对爱尔兰、阿根廷、瑞士和瑞典政府，以及交战国中的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等国政府都进行过洽商，虽然结果并不令人鼓舞，但霍尔达纳在其在巴塞罗那庆祝哥伦布周年纪念会上所作的演说中，和5月9日佛朗哥在阿尔梅里亚所作的演说中，仍旧保持着这种和平攻势。据说，6月15日迪克霍夫曾要求佛朗哥中止这种宣传活动，免得被盟国认为是德国在后面怂恿，可是这种宣传攻势仍继续隐隐约约地出现在官方讲话和报纸上。

英国和美国政府除了对佛朗哥和霍尔达纳对盟国胜利后的可能后果所持的犹如卡珊德拉的态度感到失望³⁰¹外，它们还是认为西班牙的中立对德国过于宽厚，而对盟国却往往视若寇仇。1943年7月29日霍尔在向霍尔达纳提交的“大抗议书”中列举了许多使英国感到不满的事：援助轴心国潜水艇和补给船只；阴谋破坏和间谍活动；遣返被迫降了的飞行员和飞机；德国在丹吉尔建立总领事馆；拒不允许英国在休达建立副领事馆；驱逐和虐待英国臣民；歧视英国的言论宣传而支持德国和蓝色师团。同日，海斯本人也向佛朗哥提交了一份“大抗议书”，坚决要求西班牙应公开放弃非交战国的地位而采取中立政策；长枪党党徒应该停止他们的包括那些同邮政和新闻检查有关的各种非中立活动，以及应即撤回蓝色师团。

在1943年期间，对盟国有时作出了一些让步。特别是在盟国登陆西西里岛之后，报纸上的调子多少有所改善，但并不是没有倒退，而且也没有改善到给双方在宣传上以同等待遇的权利。那些正在协助组织疏散难民的法国国民委员会在阿尔及尔的代表获得了非正式的承认。盟国获准对伊利亚航空公司在丹吉尔与西班牙本土之间的客运实行管制，因为它一直是敌方间谍潜入的一条方便之路。年终前，西班牙政府自称它已不再是非交战国而是中立国

1943年2月22日霍尔达纳致霍尔的信（坦普尔伍德：《负有特殊使命的大使》，第191页）。

《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3卷（西班牙），第46号。

有关西班牙谋求和平的活动，见《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3卷（西班牙），第47号，第51号；多西纳格：《西班牙做得有道理》，第139—149页，第150—179页，第183页以下；海斯：《战时使命》，第129—131页；坦普尔伍德：《负有特殊使命的大使》，第184—196页。

特洛伊的公主，能预卜吉凶。——译者

坦普尔伍德，前引书，第197—304页；多西纳格，前引书，第200页。

见上文，原著第266—268页。

海斯：《战时使命》，第157—162页。

同上书，第104—111页。

同上书，第156页。

了。1943年8月7日霍尔达纳告诉海斯，中立宣言将在最适宜的时机公布，在10月1日“首领日”那天，佛朗哥接见了外交使团，他三年来第一次公开地提到了西班牙的中立。据说，他那天穿的是海军制服，而不是一年以前他所穿的那种长枪党党员的服装，而且，党的代表也没有出席。10月3日发表了一项官方通告。九天以后，经萨拉查事先通知霍尔达纳的亚速尔群岛的占领平安无事地解决了，尽管，即使在这个期间，美国外交人员和领事馆工作人员还得到准备撤离的警告。可是，当人们获悉西班牙政府曾于1943年10月18日对菲律宾群岛的新傀儡总统若斯·洛雷尔宣布成立独立共和国的通告发去一份措辞恳挚的答复时，西班牙和盟国之间关系的改善遇到了一次挫折。关于这一“洛302雷尔事件”，海斯做了一个十分令人信服的说明，即在菲律宾拥有经济利益的一名低级官员诱使霍尔达纳在一个不谨慎的时刻签发了这份信件。这份复信并不具有承认菲律宾独立的含意，然而这却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愤懑，而且立即影响到正在进行的有关钨的谈判。12月15日迪克霍夫同佛朗哥就西班牙对轴心国态度的恶化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而在1944年1月27日，霍尔也就有关盟国尚未获得满意解决的许多问题向他递交了同样全面的抗议。意大利的投降使他们掌握到有关西班牙纵容轴心国活动的许多新证据——最近的例证就是德国阴谋袭击装载着橘子的英国船只——而且，据认为德国间谍迄今依然在行动上享有过分的自由。蓝色师团是另一个恰当的例证。1943年8月底，西班牙政府决定撤回这个师团，在他们与德国关于这事达成协议后，这个师团便于11月12日开始从前线撤回。当时服役于这个师团的一万二千名士兵中许多人被召回西班牙，但空军分队留下来了，在德国指挥下被编入“西班牙军团”的一些志愿兵也同样留下来了，为此，长枪党党员在国内开始招兵，旨在建成一支二千人的军队。

1943年这一年中，盟国方面又有了新的理由提出抗议，其中有些是同意大利的投降有关的。象所有其余的中立大国一样，西班牙政府在德国于9月占领意大利北部后，原与巴多利奥政府保持着关系，但当德国人要求西班牙

同上书，第165页。

菲斯：《西班牙史话》，第213页。

见下文，原著第336—341页。

海斯：《战时使命》，第168—170页。

见《概览，1936—1946年：1942—1946年的远东》（Survey for 1939—46：The Far East，1942—1946），第46—47页。

海斯：《战时使命》，第190页。

见奥本海：《国际法》（L. Oppenheim：International Law），第7版（伦敦，朗曼斯，格林，1948年版），第1卷，第140—143页。

见上文，原著第90页以下。

《西班牙政府和轴心国》，第15号。

坦普尔伍德：《负有特殊使命的大使》，第249—256页。

关于西班牙要求将支付其蓝色师团服没的费用抵偿为协助西班牙内战而向德国所欠下的债款一事，见上文，原著第93页。

海斯：《战时使命》，第178—179页；《西班牙政府和轴心国》，第15号，第37页；坦普尔伍德：《负有特殊使命的大使》，第250—251页，第259页。

接受一名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代表时，佛朗哥在 10 月 5 日同意接受一名非官方的代表。开始这件事不过到此为止，但在 12 月 15 日迪克霍夫第二次提出要求后，西班牙于 1943 年 12 月底或是 1944 年 1 月初，就正式承认了前意大利驻马拉加领事莫雷阿尔作为新法西斯政府的代表。另外还有释放十四艘意大利商船，一艘巡洋舰，三艘水雷驱逐舰与二艘鱼雷艇一事。这十四艘商船原在西班牙的海港避难，而这些舰艇则系被 303 扣留在巴利阿里群岛的马翁港和波连萨港内，因为它们未完成其驶往马耳他投降的航程即中途开入了这两个港口。然而，引起盟国同西班牙之间尖锐摩擦的问题（且不论英美政府之间的摩擦）倒是禁止向德国出口钨砂的问题，这在前面的篇章中谈过了。

第八节 战争的最后一年

西班牙和盟国之间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以后，于 1944 年 4 月 29 日就钨的问题以及其他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达成了协议。5 月 1 日至 2 日，由霍尔达纳与英国和美国大使之间互换函件，正式缔结了这项协议。按照这个协议，西班牙同意关闭德国驻丹吉尔总领事馆，驱逐它的工作人员；同时也驱逐住在丹吉尔的日本武官，并把所有在西班牙任何领土内的德国间谍和从事破坏活动的特务全部驱逐出境；撤回在东线战场上的所有军队，释放所有的意大利商船，只有西班牙政府还要租用一时的两艘除外；并把意大利军舰问题提交仲裁。西班牙的报纸没有披露协议的各项条款，只不过声明协议包括了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特别是商务关系问题，从而有可能使西班牙同英国和美国恢复正常关系。

协议的许多条款都得到了履行，尽管常有拖延，但盟国仍感到满意。西班牙军团的征兵似乎已经结束，意大利的商船被释放了。在意大利的军舰问题上，最终也给予了裁决书，允许意大利的军舰于 1945 年 1 月 14 日至 15 日离开巴利阿里。另一方面，驻在丹吉尔的德国领事馆人员，在总领事馆关闭之后，继续留在那里，驻在西班牙和摩洛哥的许多别的轴心国代表也是如此。到年底，他们中间至少有六十八人仍留在西班牙，或经驱逐之后又返回西班牙，虽然关于这些人的问题，英国大使馆已经警 304 告过西班牙当局。西班牙的外交部长固然十分愿意他们离开，但是警察当局却不大愿意这样做，甚至当中央政府被说服采取行动之后，纳粹分子还能指望在下级官员和当地官员当中找到许多有用的朋友。由于西班牙的行政管理方法是那样颞

海斯：《战时使命》，第 210—211 页。西班牙于 1944 年 3 月又承认了匈牙利斯托亚伊的通敌政府。这件事引起了美国的抗议。但是，数以千计的受到纳粹分子生命威胁的犹太人和其他国民通过西班牙驻布达佩斯大使馆获得保护一事，后来完全证明了西班牙这一行动是正当的。最初应予保护的建议是由美国提出来的，但霍尔达纳和西班牙大使馆很敏捷地把这件事接过去办了（埃米特·约翰·休斯：《来自西班牙的报告》（Emmet John Hughes：Report from Spain），纽约，亨利·霍尔特，1947 年版，第 257—258 页）。

洛多维科·加拉拉蒂·斯科蒂：《意大利的战舰被困在中立的西班牙国里》（Lodovico Gallarati Scotti：L'Internamento di navi da guerra italiane nella Spagna neutrale），米兰，朱夫雷，1948 年版。

见上文，原著第 91—94 页。

坦普尔伍德：《负有特殊使命的大使》，第 263—264 页。

海斯：《战时使命》，第 247 页。

同上书，第 279—282 页。

坦普尔伍德：《负有特殊使命的大使》，第 268—269 页。

无能，因而在 1944 年底前驱逐一百多名特务一事——超过当时大使馆黑名单所列人数一半以上，只是在不断施加压力的情况下才得到办理的。并且有一名纳粹特务迟至 1946 年仍在西班牙逍遥法外，而这个并非一般的人物是索芬杜斯公司的总经理约翰内斯·伯恩哈特。在同年 6 月 24 日下院的一次会上，据说，虽然有二千多名德国人已经遣返，可是到那个时候已列入黑名单的七百三十四名纳粹分子中却仍有五百四十二名留在西班牙。

西班牙与德国之间的交通运输一直由德国航空运输公司保持到 1945 年 4 月 17 日。西班牙政府本来就想停止德国航空运输公司的业务，以作为盟国允许他们对瑞士开辟航线的交换条件。最后西班牙政府同意在由西班牙至瑞士的陆路上建立一条专门运送外交邮件的安全通道。但是，在这一年期间，盟国从西班牙又获得了许多其他有关航空方面的优惠待遇。1944 年 6 月作好了各种安排，允许盟国的飞机飞越西班牙在摩洛哥的领海并在加那利群岛上空周围追击德国潜艇，如果西班牙没有炮火轰击德国潜水艇的话。12 月 2 日同美国签订了航空协定，该协定同意给予美国各航空公司降落的权利。1945 年初，西班牙政府允许美国军运司令部的飞机飞越西班牙并在那里着陆。

盟国意识到德国战犯有可能要在西班牙谋求避难或从西班牙逃越到南美。西班牙是 1943 年 7 月受到警告不要给德国人提供庇护所的中立国之一。1944 年秋，英国和美国政府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也得到了西班牙拒绝给予庇护的保证。结果联合国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从未向西班牙提出引渡主要战犯的要求。可是，1945 年 5 月初，赖伐尔从德国乘飞机到达了巴塞罗那，即被拘禁。盟国之间以及盟国和西班牙之间经过九星期的复杂谈判后，命令他于 7 月底离开西班牙。他飞到了美国在 305 奥地利的占领区，在那儿美国人将他交给了法国人。经过了一次对法国司法来说很不光彩的审讯以后，将他枪决了。西班牙另外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制止纳粹战利品暗中流入西班牙。譬如，伊伦的海关当局在 1944 年 11 月就没收了大量的纳粹战利品，但是，有些纳粹战利品还是有可能暗中受到同纳粹分子一样的保护。根据 1945 年 5 月 5 日的一项法令，西班牙严格执行了布雷顿森林会议决议的第六条，因此，同意采取措施来防止转移和隐匿属于轴心国侨民的财产或被掠夺的财产。5 月 8 日，政府接管了所有德国官方和半官方的房屋和财产，准备把它

菲斯：《西班牙史话》，第 280—282 页；有关索芬杜斯公司，见上文，原著第 264 页。

下院辩论，第 5 辑，第 424 卷，第 670—672 栏。

海斯：《战时使命》，第 264—265 页；休斯：《来自西班牙的报告》，第 247—248 页。

海斯：前引书，第 241 页。

同上书，第 270—272 页。

同上书，第 292 页。

艾登 1944 年 10 月 4 日的声明（下院辩论，第 5 辑，第 403 卷，第 909 栏）；海斯，前引书，第 260 页，第 263 页；联合国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联合国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的历史和战争法的发展》

（U.N. War Crimes Commission: Histo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War Crimes Commiss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ws of War），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为联合国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出版，1948 年版，第 427—428 页。

戴维·汤姆森：《两个法国人：皮埃尔·赖伐尔和夏尔·戴高乐》（David Thomson: Two Frenchmen, Pierre Laval and Charles de Gaulle），伦敦，克雷塞特出版社。1951 年版，第 108—116 页；另见皮埃特里：《我在西班牙度过的岁月》，第 264—266 页。

《西班牙官方通报》，1945 年 5 月 8 日。

们交给日后行使德国主权的任何集团。当盟国着手接管德国资产的时候，他们发觉比较高级的有关官员一般尚能合作，但是，这里也有这种情况，即下级官员却暗中帮助德国人隐匿财产，销毁文件和秘密装备。到 1946 年 5 月，盟国接管了大约估计达四千万美元的官方资产的半数，包括黄金、美元、其他货币、证券、不动产，甚至还有咖啡存货。惟独估计达六千万美元的私人资产却全部不会受到盟军的控制，理由之一是法律上的困难实在太大了。

各种事态的发生都跟法国的解放息息相关，在盟国大规模进攻日之前不久，西班牙政府同意盟国使用巴塞罗那港口撤退伤亡人员，并作为一个自由港，为法国平民提供给养。这些设施虽然压根儿不会真有需要，但假使法国南部不是这样快地获得了解放的话，这些方便就有很大用处。在英国和美国政府的要求下，想逃脱逮捕而翻越比利牛斯山的一千五百名德国人都被拘禁起来了，而进入帕萨黑斯和毕尔巴鄂的德国船只也同样被扣留了。当驻维希的西班牙大使何塞·费利克斯·德莱克里卡继霍尔达纳（在 8 月 3 日他因工作劳累过度，心脏病复发而致死）之后被任命为外交部长时，没人接替他的大使职务。8 月 24 日，德国人将贝当从维希转移到贝尔福，此后外交关系就破裂了。第二天，驻马德里的“自由法国”的代表雅克·特吕埃莱被承认为负责照管整个法国 306 利益的代表。带有很浓的共产主义色彩的法国抵抗运动，它的胜利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摩擦；在马基中间有许多信仰共和主义者的难民，他们成群结集在比利牛斯山中，不时侵入西班牙。由共产党控制的图卢兹广播电台播送了有关入侵和叛乱方面的耸人听闻的报道，但是，虽然这在西班牙一度引起极大的恐慌，入侵的人群为数始终不多，并且轻而易举地就被打跑了。

就在撤销承认维希政府不久，西班牙又采取了一些其他措施以使西班牙的外交关系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莱克里卡正式接见了所有盟国流亡政府代表团的首脑，从而同他们恢复了全面的外交关系。虽然，塞拉诺·苏内不再接见这些政府的代表，但是，他仍然允许他们继续呆在西班牙，而且同意他们与他们的政府进行密码通讯。1945 年 4 月 11 日，西班牙政府抗议日本在菲律宾杀害西班牙人及破坏西班牙财产之后，同日本断绝了外交关系。阿雷塞甚至告诉一名美国大使馆人员说，他将很高兴率领第二个蓝色师团前往太平洋。

1943 年夏，佛朗哥的一位朋友问他，如果盟国赢得了战争，他对于政权可能发生的任何变化是否不致感到恐慌，并在这种情况下，他将采取何种政策，据说，当时他处之泰然地回答道：“我就送上我的帐单。”他深信，仅

休斯：《来自西班牙的报告》，第 248—249 页。

海斯：《战时使命》，第 240—241 页。

休斯，前引书，第 241 页。

海斯：《战时使命》，第 254 页。

海斯：《战时使命》，第 253—254 页；皮埃特里：《我在西班牙度过的岁月》，第 253—256 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抗击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游击队员。——译者

海斯：《战时使命》，第 257—259 页。

同上书，第 33 页。

休斯：《来自西班牙的报告》，第 251 页。

休斯：《来自西班牙的报告》，第 269 页。

仅由于在 1940 年或是在 1942 年 11 月他没有加入轴心国 或者没有自己发动一切战争，他已赢得了盟国永志不忘的感谢。另外，他预计战争一旦结束，欧洲就将陷入来自共产主义的这样一种迫在眉睫的危险之中，致使英国和美国，至少其中的一个将会认为要与西班牙联盟，那么同国家主义政府和睦相处是完全值得的。官方发言人和社论作者从 1943 年以来就开始宣称这个政权是中央集权主义而不是极权主义；它首先关心的是个人的自由，它并不仿效国外任何一种格局，而正在发展成为一个“等级制的，有机的民主政体”，“它既不是自由主义的，也不是极权主义的，或是法西斯主义的”，上述这些宣传或许不单单是为了争取国内温和派的舆论而做的。1944 年 5 月 11 日，佛朗哥在阿利坎特的演讲中对于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和西方文明大国间的冲突这两者加以区别，并进而声称西班牙虽已派了志愿军去与共产主义作战，但是它不得不牺牲自己的理想，以免卷入一场 307 同文明国家的战争中去，而这些国家西班牙与之都保持有友好的关系。早在 1942 年 6 月 9 日，当海斯递交国书的时候，佛朗哥就提出了两场战争的理论，而西班牙只介入其中之一场。到 1943 年 7 月 29 日，他同海斯谈论到的却是三场战争，而不是两场。按照他的说法，西班牙在盟国同轴心国打仗时，对于讲英语的那些国家，是保持善意中立的。西班牙乐于同这些国家合作，共同反对那些野蛮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但是，第三场战争中的敌人共产主义依旧是一个巨大的危险。就在这次对海斯的谈话中，佛朗哥断然否认了“西班牙主义运动”具有任何政治的或反美的目的，并且他建议西班牙、美国和说西班牙语的美洲可相互发展一种三角关系。在一年之后的 7 月 6 日，海斯注意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一些署名的照片已从佛朗哥的办公桌上消失了，只孤零零地留着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的照片，甚至还注意到佛朗哥对共产主义危险的警告，调子也有所降低。从此之后，他一再努力，向盟国求爱，特别是美国。9 月 11 日，佛朗哥告诉海斯，西班牙需要的不是更少的，而是更多的美国投资。莱克里卡在 10 月 8 日的一次演讲中，把西班牙称作“实际上是一个美洲国家”。11 月初，合众社采访了佛朗哥，佛朗哥讲到了西班牙的“有机的民主政体”以及战后恢复君主政体的可能性，还声称西班牙有权参加和平会议。最后，当海斯在 12 月 5 日拜访在马德里的外交部长，宣布他的辞职，并要求西班牙对他的继任者诺曼·阿穆尔予以同意时，莱克里卡强调指出，美国有必要使用西班牙充作欧洲的一座堡垒，他并希望两国之间有可能在经济、军事和政治方面达成特殊的谅解，但他补充说，不能损及英国的利益。莱克里卡承认需要设法克服美国舆论的敌对情绪，他向海斯保证，西班牙的政治制

《向上周刊》，1943 年 8 月 1 日。

同上，1943 年 8 月 28 日。

《西班牙》，引自《向上周刊》，1943 年 12 月 7 日。

《西班牙》，1943 年 11 月 20 日。

美国广播公司，1944 年 5 月 10 日。

海斯：《战时使命》，第 31 页。

同上书，第 161—162 页。

同上书，第 242—244 页。当霍尔于 1944 年 12 月访问普拉多向其告别时：看到葡萄牙总统卡尔莫纳的照片同罗马教皇的照片并列在一起放着。

同上书，第 273 页。

度在一定的时期内将会进行修改。如果美国表示出同西班牙友好的愿望，那么这个修改进程就可能加快。但是，无论如何西班牙将照样能很好地为美国效劳，不管它的政府形式如何。

至于同英国的合作，1944年5月24日，丘吉尔在下院除了表明欢迎月初所签订的协定外，还回顾了西班牙由于没有参战而对盟国事业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特别308是在1942年11月。因而他的演说在西班牙的报刊上获得了齐声赞扬。同时，丘吉尔还期望英西贸易能得到发展，西班牙能对地中海的和平起到强大的影响；他声称英国政府无意干涉西班牙的内政问题；他还把那些认为英国对西政策最好的表达方式就是将佛朗哥将军形象加以丑化的人嘲笑了一番。

可是，佛朗哥对丘吉尔所表现的这种友好姿态还不满意，10月18日，佛朗哥发了一封信给他的驻伦敦大使阿尔瓦公爵，要他转交丘吉尔，内容是有关需要扫除危害两国间友谊的严重障碍问题。他不仅埋怨英国新闻界（包括政府的报刊）、英国广播公司以及官方代表所抱的敌视态度，而且也埋怨英国的宣传和英国特务机关的敌对活动。过去五年间所发现的任何地下活动或不满行动，始终是跟英国特务有关联的。而且，这些特务所获得的情报一直都是来自最不可靠的方面。佛朗哥写道：一旦德国被毁灭，俄国和美国巩固了它们的地位，那时，除了西班牙，英国就再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可以求助了，但是，如果这两个国家对立的分歧不首先克服的话，如果“一个朋友的扩张被有保留地看待”的话，那么，英国和西班牙的友谊即不会富有成果，也不会持久下去。最后佛朗哥警告丘吉尔，大不列颠与共和主义逃亡分子之间的谅解只会使俄国坐收渔利。

丘吉尔在1944年12月初发出的复信，同样是直言不讳的。英国政府不能忽视西班牙政府过去的记录，或长枪党的敌对行为，他们也不准备考虑加入任何反俄集团。在扫除合作障碍之前，英国政府不可能支持西班牙要求参预和平解决的愿望。同样，他也认为西班牙是不大可能被邀请加入将来的世界组织的。最后丘吉尔要外交部起草一封给佛朗哥的复信（他的时间最近多被占用在更重要的一些事务上面），一个理由就是，他认为这样一封信会使斯大林感到高兴，并有助于抵消戴高乐在访问俄国期间可能造成的任何麻烦。丘吉尔依然真诚地相信西班牙为盟国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因而当然不应该把它置于与轴心国的交战成员国同等的地位。

海斯：《战时使命》，第287—288页。

见上文，原著第303页。

下院辩论，第5辑，第400卷：第768—772栏；参阅艾登1944年2月23日在下院的声明（下院辩论，第5辑，第397卷，第933栏）。

坦普尔伍德：《负有特殊使命的大使》，第300—304页。

坦普尔伍德：《负有特殊使命的大使》，第304—306页。

在佛朗哥给阿尔瓦的信发出去的时候，丘吉尔正在莫斯科和斯大林举行谈判（《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493—500页）。

丘吉尔，第6卷。第616—617页；美国版、第6卷，第712—713页。关于戴高乐访问俄国，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530页以及《欧洲的重组》，第498—499页。

但是，有关对佛朗哥的政策褒奖较少的描述，则见丘吉尔，第2卷，第459—461页；美国版，第518—520页。

丘吉尔是最不希望国家主义政体被推翻而代之以自命的革命集团或者直接流亡中产生的无能的温和派。丘吉尔可能对一种有组织的君主复辟另眼看待，最好是经佛朗哥的同意。可是，当时还看不到这一前景，因为，迄今为止，君主主义者还没有足够的胆量向佛朗哥挑战，不是由于怕受镇压就是因为相信最终佛朗哥自己可能会恢复君主政体，并且除了他之外，别无他人能做此事。

当然，有几名丘吉尔的内阁阁员和一部分的公众舆论部极端敌视佛朗哥及其政体，他们觉得，盟国对他没有什么需要感恩报德之处。

佛朗哥对美自的接近也一无所得。在战争的最后一个冬天，美国国务院的态度是希望长枪党的力量能被削弱，而通过和平和有秩序的过渡，建立一个自由主义政体，但决计不为达此目的而进行干预。他们也希望西班牙的资源能用于建设解放的领土，并作出一些令人满意的安排来支持贸易集团，但是，赫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如在他离任前提接纳西班牙进入联合国的问题，他肯定是要反对的。罗斯福则更进了一步。他在1945年10月写给驻马德里的新任大使的信中宣称，西班牙在战争中的表现以及长枪党过去和现在的活动在他的记忆里都不会因为西班牙最近政策的改变而泯没的。干涉别的国家的内政不是美国的习惯做法，除非国际和平受到威胁，但他看不出于建立在法西斯原则基础上的政府在国际大家庭中能有什么地位”。美国政府许多方面，无论是经济上或是其他方面，都可以表示出其对西班牙人民所怀有的友好情意，然而“当美国人的感情是如此强烈反动当前的政权”时，那将毫无办法，因此，美国政府希望，“西班牙可以发挥作用并负起责任的时刻很快就会310到来，而我们认为西班牙是应该在国际合作和国际协商领域中发挥它的作用和负起它的责任来的”。

旧金山会议通过了由墨西哥代表团（据说是在共和主义流亡分子的煽动之下）提出的一项决议，——象其他中立国一样，西班牙未被邀请与会——大意是：“凡是依靠同联合国家作战过的一些国家的武装部队援助而建立起政权的那些国家，只要它们还继续掌权”，就应该将它们从新的世界组织中排除出去。这里所指是显而易见的，因之榜上无名的国家就在波茨坦会议的议事记录上（1945年7月17日—3月2日）给揭晓了。会议宣布，鉴于当前西班牙政府的发源、它的性质、它的经历以及它同侵略国家千丝万缕的关系，三个大国不赞成接受该政府提出的要作为联合国成员的任何申请。如果依斯大林（大约就在这这时，他对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与丹吉尔的地位以及意

安萨尔多：《一个西班牙君主主义者的回忆录》，第136—137页，第146—147页。

见贝文在1945年8月20日下院的讲话。但是贝文也指出，出面干涉很可能会起到与预计相反的结果，他又说，英国政府将好意地看待西班牙政府体制的改变，但决不会鼓励内战（下院辩论，第5辑，第413卷，第296栏）。1945年12月5日，贝文在下院说：“我们的态度……没有改变，我们憎恶这种政体”（同上，第416卷，第2315栏），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34—1335页。

《国务院公报》，1945年9月30日，第466页。

海斯：《美国和西班牙》，第157—158页。

英国外交部：《柏林会议议事记录；柏林，1945年8月2日》（*Protocol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Berlin Conference, Berlin, 2nd August 1945*），敕令第7087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7年版），第12页；《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1946年》，第935页。

大利的北非殖民地表示出出人意料的兴趣)的意愿行事的话,可能连对西班牙国家主义政府外交上的承认也会遭到撤销,但是丘吉尔和杜鲁门反对这样做。大国的敌意没有吓倒佛朗哥,他着手巩固他在国内的地位。1945年5月20日他在巴利阿多里德所作的一次演讲中,主题之一就是,西班牙新的民主政体的优越性乃是来自福音和民族传统,而不是来自七嘴八舌和清规戒律;另一个主题是,应归功于使西班牙置身于世界大战之外的“国家主义运动”的成绩。同样的主题他在“国家主义运动”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中又加以重申。按照他的说法,在一个受尽蹂躏和苦难的欧洲中,西班牙是一块恬静快乐的绿洲,因此,其他一些国家的敌视态度是不会持久的。佛朗哥又回顾了西班牙国家主义政府胜利后不久,世界上差不多所有的国家就都立即主动承认了这个政府。当他把话题转到国内政治时,他提到了在同一天颁布的地方政府法和西班牙的法律大全,即一份关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律。他甚至于提出这一观点。在国家主义运动的领导中,君主政体是他唯一可能的继承者。7月底,佛朗哥又一次改组了他的内阁,由于争取到311天主教行动党的一名领导人马丁·阿塔霍同意出任外交部长,佛朗哥从而清除了至今仍然或多或少独立于“国家主义运动”之外的西班牙这一最强大和有组织的团体的隐患。只有四名长枪党党员得到了任命,但是,这并非仅仅权是因为着主主义者拒绝参加新政府的缘故。阿雷塞没有被重新任命,党务部长一职也被废除了,其后不久,甚至一部分党的民兵队伍也被解散了。现在,国家主义政体的估计寿命甚至似乎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还要好些,这里对于共产党人在欧洲其他各地的作为所产生的恐慌,以及对于国外企图左右西班牙政策而引起的愤慨,这两者可能对它起了帮助作用。“要佛朗哥”,“不要共产主义”已成为最新的口号。经济形势并不象政治那样能轻易地加以控制,但是依靠他的军队和警察,并借助于在野党的无能以及人们普遍的厌战情绪,佛朗哥就能以他特有的镇静态度坐待大同盟的崩溃。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摩洛哥问题上法西关系的说明 1940年6月17日,那时的西班牙外长贝格贝德尔上校指示他的驻法大使何塞·费利克斯·德·莱克利卡,要求改变法属摩洛哥地区和西属摩洛哥地区之间的边界,把西边的贝尼-泽鲁阿勒部落地区和东边的贝尼-斯纳森部落地区划归西

《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615页,第619页。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政治学说本文,1945至1950年的讲话与书稿》(Textos de doctrina política, palabras y escritos de 1945 a 1950),马德里,西班牙语出版社,1951年版,第6—7页。

同上书,第15—25页。

休斯:《来自西班牙的报告》,第68—70页,第85—89页,第98—107页。

夏:一鲁:《惨痛的五个月》,第193页,第194页,第222—248页;皮埃特里:《我在西班牙度过的岁月》,第36—37页,第97—117页。

十九世纪末,西班牙只占有沿摩洛哥北海岸的休达与梅利利亚两个要塞(或军事租借地)。法国于1902年11月5日搞的秘密法西公约草案在规定摩洛哥的势力范围上面,把摩洛哥北部包括非斯城在内的一块地区划给了西班牙,这块地方要比最后由法、西双方在1904年10月3日签订的公约所规定的大些,而且对于摩洛哥南面的里奥德奥罗殖民地所划定的边界,条件也更为有利。西班牙外长拒绝了法国1902年11月提出的建议,因为他认为如果不通知英国,而又没有得到比法国所提供的更为有力的支持,这即签订这样的协定是不明智的。英国政府对西班牙在摩洛哥势力范围所持的态度(那时已通知了西班牙)是,如果摩洛哥的现状一旦崩溃,西班牙在对国际上任何可能做出的新安排上即应有一份发言权,不过此刻讨论这些可能

班牙管辖。在 6 月 23 日，莱克利卡和博杜安（那时的法国外长）会晤之前，贝格贝德你已于 21 日和法驻马德里大使德拉博梅伯爵讨论了这 312 件事。贝格贝德尔争辩说，因为在停战谈判中摩洛哥问题是不可能不提出来的，所以向西班牙让步而不向德国，或就此问题而言，不向意大利让步将会对法国有利，他认为意大利对阿加迪尔居心叵测。贝格贝德尔暗示法国只要能同西班牙立即达成协定，便可事先阻止德国或意大利单方面解决这个问题。据说，事实上空索里尼曾想劝说佛朗哥占领整个摩洛哥，可能的话也占领达喀尔，但是，在意大利驻西班牙大使报告了西班牙政府决不同意这样做的消息以后，墨索里尼便打消了这一念头。然而，意大利大使馆在把报告发回罗马之前是否确已摸清了西班牙外交部的底细则不清楚了。

结果，意法停战条款中并没有包含占领摩洛哥的要求，贝当元帅的政府不愿马上拒绝西班牙提出的要求，唯恐这样会把西班牙推入轴心国的怀抱，或者，西班牙人会在没有任何协定的情况下径自夺取他们想要的领土。他们本来愿在实施总的和平解决办法的范围内把贝尼-泽鲁阿勒部落区划归西班牙管辖，但不想让与贝尼-斯纳森，因为若把贝尼-斯纳森划入西属区，就等于把西班牙区界扩大到奥兰省边境。看来要找到一个使法国驻摩洛哥高级专员诺盖将军和维希政府都满意的解决方案是有困难的，因为维希政府正在为如何不让西班牙有出面干涉的借口而日益焦虑。但是，9 月份，博杜安给莱克利卡一个口头通知，大意是法国打算割让贝尼-泽鲁阿勒部落地区（包括诺盖曾劝阻过无论如何都本应割让的格兹纳尼阿突角和格鲁阿乌盆地），但这个问题须得经过长期研究。十有八九，法国是在塞拉诺·苏内开始他的柏林之行后才作出这个通知的。

9 月底，贝格贝德尔告诉德拉博梅，西班牙对那只让法国和西班牙在摩洛哥行使管辖权的安排表示满意。他接着说西班牙可以谈判法国方面所作的让步，要是贝当的法兰西丧失独立的话，西班牙无疑希望控制整个摩洛哥，不过它不想同德国、意大利一起瓜分摩洛哥，而且这件事甚至在柏林也未提起过。可是，等到塞拉诺·苏内离开柏林时，贝格贝德尔还是不愿把法国提出的应马上开始谈判的建议贯彻下去，这德拉博梅把它归因为对德国的害怕；而塞拉诺·苏内一上任，便于 10 月 23 日向德拉博梅讲明，国家主义运动和西班牙对轴心国的效劳赋予了西班牙以权利和权力来恢复它在非洲所丧失的一切，它需要有摩洛哥来保障伊比利亚半岛的安全，而法西之间的良好关系亦应从属于非洲问题越伪解决。

当维希法国新任驻西班牙大使佛朗索瓦·皮埃特里 12 月 6 日递交国书时，佛朗哥回答他的讲话基调就是，法西之间在能够建立起真正的友谊之前，

发生的事态还为时过早。有关埃及和摩洛哥问题的英法公约在 1904 年 4 月 8 日签订后：法国便不大想对西班牙作什么让步，而 1904 年公约中的条款倘若不是出于美国的调停，很可能比目前情况对西班牙更为不利〔G.P.古齐：《大战之前：外交研究》（G.P.Gooch：Before the War：Studies in Diplomacy），伦敦，朗曼斯，格林，1936 年版，第 1 卷，第 146 页以下）。

摩洛哥西面沿海城市，当时属法占区。——译者

西蒙内：《贝尔利诺》，1940 年 6 月 21 日，第 133 页。

见上文，原著第 275—277 页。

见上文，原著第 279—280 页。

必须纠正许多不公平之处。1941年3月1日，在佛朗哥关于参战之事给希特勒最后答复后不久，塞拉诺·苏内就召见了皮埃特里，目的是想马上开始谈判。皮埃特里成功地回避了为他的政府做任何表态，另外仅有一次的多少带官方性质的接触是由西班牙空军部长比贡将军在1942年初出面同法国进行的。比贡建议，法国和西班牙应当就在北非统一行动的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整个这一时期，西班牙人一直在通过宣传运动，用阿拉伯语广播，以及通过在法国控制的地区（特别是奥兰和卡萨布兰卡）与丹吉尔进行煽动，呼吁人行注意他们的要求。西班牙驻奥兰领事引人注目地参与了宣传鼓动，以致法国人要求召他回国。领土收复主义运动至少持续到了1944年，虽然据报道这个运动在法属北非已变得不那么活跃了。

关于丹吉尔地位的说明（1940—1945年）

丹吉尔港恰恰坐落在直布罗陀海峡通往大西洋的出口处，因而处于相当重要的战略地位，没有一个西方大国愿意看到它落入旁人手中。1940年，它是由按照1923年12月8日公约和1928年7月25日修订的议定书设立的一个复杂形式的国际机构进行共管的。参加这个机构的代表国家都是1906年4月7日阿尔赫西拉斯议定书的签字国，即比利时、法国、英国、意大利、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根据1919—1920年和约，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已被剥夺了在该项法案下的权利。俄国虽签署了该议定书，然而它却不是1923年公约的一个缔约国。法国根据它对摩洛哥素丹的所有领土都拥有保护权这一理由，在丹吉尔享有支配的地位，虽然这样一来它便在西属摩洛哥中形成了一块飞地，而西班牙无疑是希望把它并进去的，况且在这块飞地上三万名欧洲人中共有三分之二是西班牙人。在这样一块方圆仅约二百二十五平方英里的地方实行国际共管是非常麻烦的，而且花钱很多的；因为这个港口位于法、西两国海关边卡之外，³¹⁴所以贸易也受到了影响。按1923年公约规定，这里为永久的中立和非军事区。

1940年6月14日，西班牙外长贝格贝德尔提议法国应当让西班牙军队进入这个地区，以预防意大利人可能计划发动的政变。这个提议是本着这样一种谅解提出的，即它只是一项临时性安全措施，完全不会损害到国际共管体制的本来；法国驻马德里大使德拉博梅同意了在这些条件下让西班牙进占这个地区。但是，在6月14日，当军队在摩洛哥素丹派驻西班牙占领区的代表哈利发名义上的授权下开进了丹吉尔的时候，西班牙报纸马上就欢呼摩洛哥扩张行动的这一开始，并对盟国受辱欣喜若狂，英、法大使馆尽管对此提出了抗议，但无济于事。

此外，1940年11月3日，西班牙驻丹吉尔的指挥官又解散了这一国际

皮埃特里：《我在西班牙度过的岁月》，第36—37页。

原文见《英国与外交公文，1923年》，第117卷，第499—534页。

同上书，1928年，第128卷，第449—467页。

关于丹吉尔特殊政体的由来见《概览，1925年》，第1节，第163—174页。

《英国与外交公文，1905—1906年》，第99卷，第141—171页。

素丹即某些伊斯兰教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译者

R·A·巴特勒在下院的讲话，1940年6月19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61卷，第142栏）；另见夏尔·鲁：《惨痛的五个月》，第22页。

伊斯兰教国家政教合一的领袖的称号。——译者

机构（除混合法庭外），并以总督和西班牙驻摩洛哥高级专员的代表的名义自称。但是事先并未经 1923 年公约的签约国商讨，因此，包括英、法、美在内的大多数签约国都对这个既成事实提出了抗议。经过几星期的交涉，英国政府于 1940 年 12 月 31 日与西班牙达成了一项暂时解决办法的协议，保证不在该地区修筑防御工事，保证英国臣民的权利，包括赔偿那些被解雇的国际机构人员的损失。根据该项协议，英国保留它在 1923 年公约下所有一切权利，但承认西班牙的特殊地位。西班牙 11 月 23 日公布的一项法令规定西属摩洛哥的法律适用于该地区；1941 年 3 月，西班牙当局撵走了索丹的代表“蒙杜勃”，并从他那里接管了有关管理当地居民的各种事务，国际警察也同时被解散。1943 年 1 月，西班牙驻摩洛哥高级专员奥尔加斯将军宣布丹吉尔划入西班牙特区。德国人就在“蒙杜勃”撇下的那幢大楼里开设了一个总领事馆；德国、意大利，甚至日本在这地区的活动引起了盟国的深切关注。据说丹吉尔已经变成 315 煽动法属北非，特别是摩洛哥当地居民暴乱的中心。从这个地区的居民看来，西班牙行政当局的主要功绩在于保持了相当充足的粮食供应。

临到 1945 年 3 月底，据《泰晤士报》报道，英国、法国和美国已开始考虑在该地区恢复国际共管。此后不久，佛朗哥将军于 6 月 12 日向英国发出了一份照会，表示愿意从该地区撤兵，但又提出，迄今业已补充编入当地卫戍部从中的西班牙军队一旦撤出之后，应由哈利发的军队来维持秩序；再则，应当邀请美国政府参加共管。西班牙唯有对法国没有发去照会。而就在此时，另一个大国对丹吉尔表示了兴趣。早在 7 月，当英国、法国、美国代表刚开始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苏联政府便要求参加；波茨坦会议的第一天，丹吉尔问题便是斯大林提出的问题之一。丘吉尔马上坚持必须同法国磋商，因而会议期间没能达成决议。8 月 10 日，当时有苏联代表参加的盟国之间的谈判在巴黎恢复了，31 日签订了一项最后决议案和一项英法协定，这些文件规定，英、法政府应立即责成西班牙撤兵，从 1945 年 11 月起，该地区应暂时按经稍许修改过的 1923 年和 1928 年法案实行共管，并应邀请美、苏政府参加这种临时共管机构；1946 年 1 月 7 日互换了这些文件的批准书。此外，在其他政府同意时亦应邀请意大利参加遵守这项协定，并接受和约规定条款的约束。决议案还建议，该共管机构应当清除那些因搞政治活动或参与违反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团体而被认为不良分子的人。最后决议案还建议，阿尔赫西拉斯决议案各签字国应当在该临时共管机构成立后不迟于六个月之内开会商讨有关该法案的修订事宜。

最后决议案中还追加了两项声明，一项是由苏联政府，另一项是由法、英、美提出的。苏联的声明大意说，在国家主义政权由一个民主政权取代之前不能让西班牙参加这一共管机构。根据记录，另三个国家所持的意见是，

巴特勒在下院的讲话，1940 年 11 月 13 日（下院辩论，第 5 辑，第 365 卷，第 1668—1670 栏）。

1940 年夏·维希政府考虑把法国放弃在丹吉尔的特权作为有关摩洛哥新的法西协定的一部分，也许拿它作为获取伊夫尼领土的交换条件（夏尔一鲁，前引书，第 234 页，第 238—239 页）。

由索丹任命的派驻丹吉尔的代表，专门负责管理在丹吉尔的所有臣民，及主持立法议会。——译者

英国外交部：《关于重建丹吉尔国际共管制会议的最后决议案，巴黎，1945 年 8 月 31 日》（Final Act of Conference Concerning the Re-establish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gime in Tangier, Paris, 31 August 1945），敕令第 6678 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5 年版）。

西班牙的参加决不违反 1945 年 8 月 2 日波茨坦声明 ,而且这才是重视西班牙人民利益的唯一可行的方法 ,因此如若没有西班牙参加 ,任何阿尔赫西拉斯国家会议都不能举行 ;但是 ,另一方面 ,当西班牙现政府还在掌权时 ,邀请它参加会议将是不适宜的。

西班牙政府抗议将其排除在谈判以外 ,但接受了四大国的决定 ,虽则对此也提出了抗议 ,于是国际共管机构终于在 10 月 11 日顺利地恢复了。美国原在丹吉尔已驻有一名总领事 ,这时即由其代表参加 ,可是苏联政府在那里没有领事代表 ,暂时也没有派人参加。

第五章葡萄牙凯瑟琳·达夫

第一节战争爆发时同大国的关系

长久以来，葡萄牙靠同英国结盟来保护它的殖民地，并遏制西班牙妄图并吞整个伊比利亚半岛的野心。但在战前若干年，葡萄牙就一直在扩大它外交政策的基础，不仅加强了同巴西的血缘关系，而且还谋求同西班牙国家主义者政府达成某种谅解。由于萨拉查博士的“新立场”的经济政策以及英国减少饮用红葡萄酒的趋势，英葡贸易受到了影响，而英国对西班牙内战的态度更使得葡萄牙政府及其拥护者深感不安。英国一直没有尽力来设法维持同葡萄牙的良好关系，虽然德国人显然是在试图把葡萄牙纳入到他们的势力范围，但是英、法两国似乎都未能阻止纳粹德国称霸欧洲。

再者，英、德以牺牲葡萄牙的殖民地而进行的交易，也重新引起了葡萄牙的忧惧。希特勒指望哈利法克斯于1937年11月访德时，向他提出的建议中将会有一条是用安哥拉来代替以前德属的某一个殖民地。当英方对此未作表示时，希特勒就亲自提出了安哥拉的问题。他说，撒哈拉或地中海北非的土地是不大可能被接受的。事实上，当时张伯伦愿意商讨割让西非的土地，作为一个总体解决方法的一部分，可能的话就拿安哥拉和比属刚果来取代坦噶尼喀。12月初，报纸上出现了希特勒要求获得安哥拉和比属刚果部分领土的报道，但是当葡萄牙政府就此询问德国外交部时，他们却否认了这个传说。1937年12月21日，艾登在下院也否认存恢复1898年及1912年至1914年谈判的意图。然而，1938年3月3日，英国在向希特勒提出的秘密建议中，还是包括了重新划分南纬五度和赞比西河之间的殖民地，但是，希特勒这时却拒绝以此作为一种归还德国前殖民地的办法，指出比利时和葡萄牙可能认为德国是在要求它无权要求的東西。英国政府和希特勒之间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没有达成什么协议。1937年12月，张伯伦在接见即将前往里斯本的英国新任驻葡萄牙大使沃尔福德·塞尔比爵士（前驻维也纳公使）时，他没有讲到可能同德国解决殖民地的问题，而塞尔比也未带来关于葡萄牙殖民地问题的任何明确保证。但是塞尔比一到任就从他的使馆参赞获悉，当他提交国书时，葡萄牙政府将极其重视他能够作出这种保证。当时，外交部在答复大使的紧急请示时表示，英国的保证不仅仍然有效，而且英国政府无意在有损葡萄牙的情况下同德国达成任何交易。

《概览，1939—1946年：1939年3月的世界》，第142—143页，第147—151页。关于这个时期的葡萄牙外交政策，另见安东尼奥·德奥里维拉·萨拉查：《演讲与政治笔记……1938—1943年》

（AntoniodeOliveirasalazar：Disursos enotas politicas……1938—1943），科英布拉，科英布拉出版社，1944年版，第3卷，第146—152页；英译本，《总统访问殖民地的航行及欧洲危机》（ThePresident's VoyagetothColonies,andtheEuropeanCrisis），里斯本，S.P.N.书店，1944年版，第23—28页。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1卷，第19号，第32页；第31号，第59—60页，第63页，第65页。
法伊林：《尼继尔·张伯伦传》（Feiling：theLifeof-NevilleChamberlain），第333页。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1卷，第50号，第61号，第60号，第61号。
，下院辩论，第5辑，第330卷，第1880—1881栏。

见《概览，1939—1946年：1939年3月的世界》，第165页，第362页及注。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1卷，第138号（第242—243页，第246—247页），第141号。

沃尔福德·塞尔比爵士：《外交曙光，1930—1940年》，（SirWalfordSelby：DiplomaticTwilight，1930—1940），伦敦，默里，1958年版，第87—88页。

1937年至1939年之间，英国方面为改善英葡关系并挽回已经丧失给德国的贸易损失。做了一些工作。早在战前好久，英国驻里斯本大使馆就提出建议，在里斯本和伦敦之间开辟一条航线（当时里斯本已有德国航空运输公司的飞机在通航），但是直至1940年春夏之间还未得到实现。1938年2月，英国向葡萄牙派出了一个军事使团，最后还委派了后勤专员，并且在萨拉查请求之下，陆海军顾问访问了里斯本，对沿海防务提供意见。虽然用这种方法同葡萄牙的武装部队建立了良好关系，并且劝阻了葡萄牙同轴心国签订购买武器合同，但是直到战争爆发后相当时期，英国迄未向葡萄牙提供过武器。德国人除了在商业上所取得的成就之外（这些成就是靠削价和善于推销而获致的）。他们在上层阶级、政府官员、知识分子、青年运动和称做“军团”的官方准军事组织中间也赢得一定的影响；他们还同报界和警察保持着有益的联系。德国人从西班牙内战以及人们对共产主义普遍的憎恨和恐惧中捞到了大量政治资本，他们的技术成就和在欧洲的统治地位使他们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连那些厌恶他们的个人品格和认为他们的政治手段过于野蛮的人也都是如此。法西斯意大利也想发展贸易和航空事业，并以宣传来争取葡萄牙。但是尽管与纳粹主义相比，萨拉查政权是更接近于法西斯主义，可是意大利却缺少可与德国逐鹿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塞拉诺·苏内建议齐亚诺应该在1939年夏天访问西班牙同时也访问葡萄牙，但是葡萄牙政府和意大利政府对此意见都不感兴趣。

第二节 宣布中立以及同交战国的关系 (1939—1940年)

慕尼黑危机时期，英国政府曾明告里斯本，他们希望葡萄牙保持中立，但是在战争爆发前的这段时期内，英国内阁和帝国防务委员会似乎都还没有进一步考虑这个问题。海军部认为，葡萄牙保持善意的中立已经足够了，但是，至于对葡萄牙的善意究竟能够指望其达到什么程度，英内阁从来没有作过任何裁决。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葡萄牙就曾给英国帮了许多忙，包括允许英军通过莫桑比克，英国海军使用马德拉群岛以及英国征用和租借在葡萄牙港口避难的三十六艘德国商船。上述最后的这一行动成了德国对葡萄牙宣战的直接原因。在1939年，轴心国似乎直到最后还拿不准葡萄牙是否将保持中立。根据意大利驻里斯本公使弗朗西斯科·马梅利的说法，葡萄牙当时是焦急地等待着来自伦敦的报告，萨拉查似乎比1938年更加犹豫不决。直至8月31日，他仅仅谈到葡萄牙的态度要取决于什么国家是在交战，和它的殖民地安全等问题，而很大一部分看来要取决于西班牙的态度。在西班牙宣布中立和英、法对德宣战之前，葡萄牙在319月1日的一项官方声明中宣告中立，第二天，报纸上发表了这项声明。10月9日，萨拉查在国民大会所作的演说中吐露，如果葡萄牙保持中立，德国曾表示将尊重史性同盟和友谊为名向葡萄牙提出什么要求迫使它参战——确实，英国政府倒表示了赞同葡萄牙保持中立，认为那是维护两国共同利益的最好方法。

《意大利外交文件》，第8辑第12卷，第400号，第482号。

塞尔比：《外交曙光》，第109—110页。

《意大利外交文件》，第8辑，第13卷，第239号，第430号，第485号，第508号
原文见萨拉查：《演讲》，第3卷，第173—174页；《总统的航行》，第38—35页。
原文分别见上注中的两书，第177—190页，第49—63页。

葡萄牙在9月1日的声明及10月9日萨拉查的演说中提出了它战时政策的基本原则，并且萨拉查于1939年5月20日对国民大会作的那篇较早的演说中也已经有所预示。他重新确认了葡萄牙同英国的友谊和它对英葡同盟的绝对忠诚（在措词上比实际上更符合对于中文的善意解释）；但是，葡萄牙政府宣称他们决心保持中立，直至民族的荣誉、利益和承担的义务使他们放弃它为止。他们宣布，当前欧洲人的真正职责是不要把整个欧洲大陆投入熔炉，而是要创立和巩固和平区。一个伊比利亚和平区将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因此西班牙宣布中立以及佛朗哥将军为使战争局部化所作的努力，都是极受欢迎的。已经说得很明白，在任何试图重建以安全和正义为基础的和平的努力中，葡萄牙是随时准备进行合作的。萨拉查特地称赞了波兰的“英勇牺牲”，并且通过他所谈到的欧洲“拉丁和基督教”文明的价值以及欧洲文明正在经历着的精神危机间接地表明了他对德国的态度。但是，他拒不承认俄国有资格在东欧帮助恢复这些价值。当时，他显然是在考虑国内“新立场”的安全以及它同其他类型国家的关系问题。他对各种意识形态集团的形成和干预一个国家内政表示遗憾，并告诫他的同胞要警惕那些策划从战争的结果中谋取他们自身政治利益的人。几个月之后，当他在1940年2月26日向党的组织人员会议致辞时，甚至更直截了当地提到了那些已被国家法律赶下了台而又希望民主主义者的胜利将会帮助他们东山再起的人，他还把真正受委屈的人同故意，捣乱的反对320者区别开来。萨拉查无意支持纳粹德国，因为他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德国会为重新分配非洲各殖民地而施加压力，但是他也相信，战争所造成的灾难性最重的后果之一，将是共产主义的蔓延。因此，他希望战争不仅将是短暂的，而且不至于以两败俱伤而告终。要扮演既中立又结盟的双重角色，使得所有有关各方都能满意，这并不是容易的。萨拉查（虽然他后来在英国和葡萄牙的利益都迫切需要西班牙不参战时给了英国很有价值的帮助）从一开始对中立就采取了最严格的解释。他一方面采取步骤阻止德国渗透，另一方面却又拒绝答应英国政府所要求的若干让步，并对盟国的封锁采取了一项很坚定的方针。但是，就一般公众来说，官方对民众中表露出来的较为热情洋溢或富于和解精神的感情的限制，并不能阻止。葡萄牙人对于盟国、特别是对于英国表现出无可置疑的同情心。对纳粹主义的某些最强烈的指责（即使不指名，也显然是有意识的）不是来自别人，而正是来自萨拉查的一位亲密老友葡萄牙红衣大主教塞雷热拉。罗马天主教日报《呼声报》就是一家较公开反纳粹的报纸（在允许报纸直言不讳的范围内），然而这也并没有能阻止它对民主国家，特别是对美国的批评。这里。就如在葡萄牙人中间常见的情况那样，又把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都看成是最大的祸害了。英、美的谈判家常常发现，葡萄牙甚至比西班牙更难对付。它的经济地位强得多，而萨拉查本身又是一位非常顽强的人，他动辄在协定似乎已告达成之后又重新提出争议。

第三节 1940年的危机

到目前为止，战争（除了关于封锁之外）只发展到马其诺防线，尚未波

见萨拉查：《演讲》，第3卷，第137—155页；《总统的航行》，第11—30页。

萨拉查：《演讲》，第3卷，第203—206页。

《意大利外交文件》，第8辑，第12卷，第592号

见上文，原著第28页。

及葡萄牙。但随着德国侵入低地国家和法国，所有这些都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变化。从这些国家逃来的难民们吵吵闹闹地要求在葡萄牙容身；有一段、时期，德国军队似乎不管有无西班牙的合作都很可能会翻越比利牛斯山而向前推进，其结果势将使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卷入战争；同时，在葡萄牙也或可能发生内乱。葡萄牙在经过一段时期惊慌失措和忧心忡忡之后，成了希特勒的欧洲和英国与美洲之间留存下来的主要纽带。英、美、德、意都有停靠里斯本的航空线，直至1941年12月，美国出口航运公司一直在载客和载货，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船只在整个战争期间也都在横越大西洋。里斯本是国际红十字会为其遣送的战俘与拘留犯输送救济物资的主要转运港，红十字会租用葡萄牙船只作最后一段的航行。葡萄牙也成了世界上最繁忙的金融黑市之一，投机者们充分利用黄金和外币的自由交易追求暴利。

对来自交战国的旅行者说来，葡萄牙好象是一块令人难以置信的和平和繁荣的绿洲：没有灯火管制；在战争发生多时之前，一直不用配给卡；商店里摆满了食品和奢侈品，供那些有钱买得起的人尽情享受；旅馆里住满了有钱的难民，他们在那儿消磨时光，直至能订到一张泛美快速班机的座票为止；这里又是各交战国间谍（有真的，也有更常常是想象的）的藏身之地。

法国沦陷以后，葡萄牙政府对中立的解释甚至变得更加严格了（如果那样做是可能的话），并且采取了一切能够抵御进攻的预防措施。大约在战争后的第二年中，军队由战前的四万人增加到了约八万人，土著的征兵额还不算在内。这些人绝大多数被派往葡属大西洋诸岛或殖民地，预计假如葡萄牙自东面受到武力入侵，由于不能长久保卫其本土，政府即将移至亚速尔群岛。据报道已有大量的黄金储备运往美国。

在葡萄牙每隔一两个月就会出现到处流传的新谣言，但是待到这些谣言逐渐消失时，葡萄牙人则往往又沉醉于一种天真的信念中，深信他们无懈可击的中立具有保护作用。据认为，交战双方都不想对它进行干预，因为葡萄牙是大有用了。公众对英国的同情比历来都要强烈。1940年6月初，肯特公爵率领特别代表团参加葡萄牙王国建国八百周年和它在被西班牙并吞后恢复独立三百周年的庆典时，受到了热情的欢迎。英国单独作战的决心激起了普遍的赞扬，据报道萨拉查博士也不例外。人们抢着购买喷火式战斗机募款纪念章，是那么踊跃，以致当局认为还是禁止佩戴这些纪念章较妥当些，就象禁止出租汽车司机悬挂小小的英国国旗那样。在德国使馆提322出抗议之后，丘吉尔头像徽章也被禁止了，于是，某个聪明的制造商用一种只有一顶帽子和一支雪茄的图案的徽章垄断了市场。还有更值得记述的是，那么许多的葡萄牙人对英国难民和遭鱼雷攻击的船上幸存者所表现的深情厚意，特别是那些居住在偏僻的渔村里的人民连自己几乎都不得温饱。在那里，天生的

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关于该会活动的报告，1939年9月1日至1947年6月30日》（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on its activiti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1939-june 30, 1947），日内瓦，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1948年版，第3卷，第181—182页，第227—235页。

休·米尔：《欧洲的会合点》（Hugh Muir：Europe at Junction），伦敦，哈拉普，1942年版，第125—126页。

休·米尔：《欧洲的会合点》，第123页。

仁慈心肠甚至超过了党派关系的推动力。

葡萄牙始终如一地对英国抱有同情，尽管德国进行了大力宣传，而这种宣传在强调德国武装部队的威力（远远超过了英国在这方面试图做到的）以及在对知识分子实行特殊诱惑方面都是十分有效的。德国经常致力于挑唆人们对于英国或美国侵略葡属各岛和殖民地的猜疑，人们还认为，德国的宣传是导源于这样一些谣言，即是说英国的胜利对于“新立场”和其他独裁政权同样都是致命的——这些谣言不胫而走，以致1941年1月23日艾登在下院作了一项声明，大意是，英国的胜利将“保证各国按自己的方式生活的权利”。

德国进攻苏联，以及欢迎苏联加入英美大同盟，在葡萄牙引起了相当的不安。从签订了德苏条约那天起，萨拉查就已预料到德国最终会背叛苏联；1941年6月萨拉查政府的政策，正如通过官方支持的《晨报》所表明的，是重申它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和继续遵守最严格的中立的立场。军团（葡萄牙的准军事组织）中的一些人要求志愿服役，在东方战线上抗击俄国人，但是该组织的领导者不主张志愿从军一举，并发表了二项宣言，确认同那些正在和共产主义战斗的人团结一致，同时号召军团成员在思想上作好动员准备，“在这欧洲的西端”一旦有此需要时就立即行动。《晨报》和军团宣言对于共产主义的宣传都作了警告。据说，这种慎重的态度使那些既同情英国而又反共的人（这种人必然是很多的）得到了宽慰。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据说塞雷拉红衣大主教曾指示他的教士们不要把共产主义的异端同俄国人民混为一谈。

第四节 同西班牙的关系

（1939—1945年）

葡萄牙对西班牙的态度已在本《概览》的前面一卷作了描述，这种态度把怕被这个比较强的邻国并吞的恐惧心理和同一个极权主义与反共的伙伴国家团结的愿望交织在一起，这里只需回顾一下这个事实，即除了从1580年至1640年这六十年这段时期外，这两个半岛王国都已各自独立存在了八百年之久，但是在这整个时期内，各个阶层的西班牙人，从国王到无政府主义者，都曾一再被统一伊比利亚半岛的理想所吸引而向往着它。1936年以来，两国关系似乎进入了一种新的局面。西班牙内战时期，葡萄牙人支持国家主义者，并且在1939年3月18日同佛朗哥将军的政府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如果一方面葡萄牙人愿意减少他们对英国联盟的依赖，那末，另一方面西班牙国家主义者就希望把他们从英国势力范围中拉出来。可是，一些比较极端的长枪党党员并没有放弃一个半岛联邦这样的想法；虽然塞拉诺·苏内宣称他已竭尽所能加以抵制，但是巴利阿多里德电台和长枪党日报《向上周刊》

下院辩论.第5辑，第368卷，第322栏。

《意大利外交文件》，第8辑，第13卷，第485页。

《法兰西报》（france），1941年6月26日报道。

米尔：《欧洲的会合点》，第131页。

《概览，1939—1946年：1939年3月的世界》，第142—143页。

文本见何塞·玛丽亚·科尔德罗·托雷斯：《西班牙的对外关系》（Jose MarlaCorderoTorres：BelacioneseAterioresdeEspana），马槽里，运动出版让，1954年版，第309—310页。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6月5日。

所采取的方针却引起了边界那方的关注。西班牙在和葡萄牙缔约之后如此快地加入反共国际同盟也是一个不愉快的意外。

虽然西葡友谊正在精心地培植起来，但是双方在观点上的基本分歧并没有消失。葡萄牙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行往往着重在他们国家的特性（甚至涉及到象音乐和诗歌这样一些显然非政治性的题目），它的悠久的独立传统，以及“半岛二元论”对西班牙自身利益的关系程度等方面。西班牙时事评论员往往倾向于详述两国在历史上的紧密联系以及它们的共同命运。《法兰克福报》驻马德里记者在下述观点上或许是正确的（1940年8月13日出版），即虽然西班牙政府准备尊重葡萄牙的独立，但是他们还希望看到两国对欧洲和拉丁美洲奉行一项共同的外交政策，一项能使葡萄牙保持它的属地，并使西班牙能够扩张它的属地的政策。更加极端的观点也有时表达出来。《星期日》周刊（马德里，1940年8月18日）就宣称，西班牙和葡萄牙共有一个灵魂：“它叫做西班牙主义运动”。同天《向上周刊》声称，“要阻止这种将会改变历史的伟大的西班牙主义……那么必须有人从外部来分裂我们。”1939年11月15日，《布尔戈斯日报》甚至讲得更加一清二楚：“没有英国的干扰，西葡联邦早已就实现了，因为这是地理上的需要。”1939年9月之后，西葡和解的主要里程碑是在12月签订的一项商业协定：1940年3月一个携带着内战战利品的西班牙军事代表团的首次访葡和接着在4月一支西班牙海军分舰队的来访。5月初，葡萄牙向西班牙提供了一万吨小麦、六千吨玉米，西班牙报刊充分报道了这一姿态。但是甚至在法国沦陷之前，葡萄牙人已对西班牙的真正意图日益感到不安。5月1日葡萄牙备报登载了红衣大主教和各大主教写给教区教友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宣称图谋反对上帝法旨的将始终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上帝已为两个半岛国家安排了它们各自的命运。不久，就谣传西班牙到处是德国的“旅游者”，外国军队已进入西班牙向葡萄牙推进，并说，佛朗哥将军将被推翻。在马德里普遍认为，葡萄牙海军基地已被占领，并且正在酝酿一次推翻萨拉查的叛乱。《晨报》（5月21日）在谈到这些谣言时说，有人正蓄意企图毒化西葡关系，借此来扩大战争。5月20日据宣布，萨拉查于前一天接见了最近到达的西班牙大使，大使郑重地重申了他的政府打算加强两国之间友好合作和谅解的意图。报纸报道，萨拉查在回答时也谈到了葡萄牙愿意加强两国政府一直正在奉行的相互信任的政策。在西班牙的报纸上出现了使人宽慰的文章，在葡萄牙举行了“新立场”成立十四周年的庆祝典礼，授予佛朗哥塔与剑勋位大颈章，这成为表现双方更为友好的姿态的好机会。由于西班牙期刊《摄影》在7月13日竟敢说在这半岛团结陷于分裂的三百年纪念日，西班牙应该收复它在1640年失去的东西或许是上帝的意志这样的话，于是官方的报复性惩罚就重重地落到了它身上。但是谣言仍然流传不息，公众通过收音机被正式警告不要去理会关于英国正在要求葡萄牙的基地，乃至已经登陆等的传闻。

1940年夏初，萨拉查在英、西、葡经济协定谈判中所起的作用，上文已经谈过了。为了加强西葡本身的谅解，他也采取了步骤。7月6日，他的驻

《意大利外交文件》，第8辑，第12卷，第592号。

据说，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彼此之间都是惊人地缺乏了解（坦普尔伍德：《负有特殊使命的大使》，第124页）。

见上文，原著第28—29页。

马德里大使提奥多尼欧·佩雷拉博士从佛朗哥那里获得了有关葡萄牙独立以及整个半岛独立的保证，并于29日签订了1939年3月条约的附加议定书。

根据这项者定书，如果出现或者似乎要出现可能危及双方宗主国领土不可侵犯的主权，或可能危及任何一方的安全和独立的情况时，每一方可以请求磋商（为捍卫共同利益和独立）。订约双方宣布，在同别国签订的任何现有的协定中，均无和该议定书相矛盾的条款。一如它造用于德国在西班牙的行动那样，这议定书对英国在葡萄牙的行动也同样适用，从而保障了西班牙能够应付出现德国人突然越过比利牛斯山的紧急情况，而预期这种紧急情况将会发生，使得西班牙政府为之焦虑到大大超过其实际可能发生的程度。

据报道，西班牙外交部长贝格贝德尔上校公然不顾塞拉诺·苏内的反对，坚持签订这份议定书。据说佛朗哥在最初规定的签字仪式时间之后曾对签署该议定书犹豫了几小时，并且推迟发表一项声明，虽然葡萄牙政府已被告知此项声明即将发表。在签字之前贝格贝德尔给霍尔出示了该议定书，但是，据说也通知过德国大使，葡萄牙在签字时口头上已表示同意，假如直布罗陀遭到进攻，葡萄牙将不进行干涉。

第二年左右，就进行友好访问和报纸发表的评论（带有某些轻微错误的）来说，双方还是保持了和解的气氛。1941年5月21日的经济协定进一步促进了贸易，这项协定给予西班牙船只在葡萄牙各港以同等待遇并为西班牙殖民地产品在里斯本起货转口到西班牙提供了便利，不久在该年7月初，又签订了关于殖民地产品的协定。在政治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尽管柏林、罗马和昂代之间举行了会谈，塞拉诺·苏内访问了萨尔茨堡，但是在1940年至1941年秋冬期间，葡萄牙政府并没有援用请求磋商的条款。而据塞拉诺·苏内在通知施托雷尔（德国驻马德里大使）有关1942年2月同萨拉查在塞维利亚会谈经过时所说，这好象还是传达给葡萄牙政府有关德国的要求和西班牙对它们的反应的头一份机密情报。他26说，萨拉查曾经几次问到德国对西班牙施加压力之事，并且不仅高兴而且还以惊奇的心情听取了他们对此事的叙述，好象他曾经从其他方面听到过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似的。的确，西班牙的极端分子并不曾放弃他们的野心。1941年春季局势紧张期间，在马德里的墙上出现了粉笔写的口号，西班牙陆军和空军军官公开谈论入侵葡萄牙的必要性，认为葡萄牙在种族上和地理上都应归属西班牙，它实在太小了，不应该享有在新欧洲生存的权利；只有通过一场战争才能使西班牙摆脱内部的政治纠纷，并使将军们得以掌权。

下一个外交行动似乎是发端于西班牙政府害怕盟国在葡萄牙本土和葡属各岛登陆而产生的。塞拉诺·苏内早先即告诉过施托雷尔，葡萄牙可能不会抵制盟国登陆，而德国政府也曾经考虑如何能帮助它抵御盟国。萨拉查应邀

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1卷，第514页。

文本见科尔德罗·托雷斯；《西班牙的对外关系》，第310—311页。

坦普尔伍德：《员有特殊使命的大使》，第58—59页，第169页。

非斯：《西班牙史话》，第73页注。

见上文，原著第275—281页。

见原著第326页。

《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3卷（西班牙），第30号。

施托雷尔致德国外交部，1941年5月10日（同上，第26号）。

前往塞维利亚，于 1942 年 2 月 17 日在那儿举行了会谈，实际上，为了避免在里约热内卢会议期间给英美造成不良影响，在萨拉查的请求下会谈业已推迟了几天。遗憾的是，可以获得的唯一有关会谈的详细报告仅是由斯托雷尔根据塞拉诺·苏内的所说而作的那份，而撰写这份报告可能是为了适应西班牙政策的眼前策略兼以掩饰塞拉诺·苏内自己地位的开始衰落。但是，似乎西班牙人曾经提出要求，根据 1940 年的议定书就可能入侵葡萄牙问题进行磋商，他们保证，将把这种入侵视作对西班牙自己领土的入侵，并使萨拉查明确知道，假如葡萄牙被迫接受入侵的话，西班牙将会做些什么，萨拉查否认存在任何来自英国或德国的危险，虽然对美国他显得有点不那么有把握。他宣称，葡萄牙将自己保卫自己，以反对任何入侵者。佛朗哥承诺西班牙将提供它所能给的一切援助，但以互惠为条件，如果西班牙遭到攻击的话，他并指出了德国可能会作出的贡献。会议讨论的其他课题是经济关系，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合作和共产主义的威胁。塞拉诺·苏内甚至警告萨拉查，英国正在公开地准备推翻他，对此萨拉查拒不相信。佛朗哥和塞拉诺·苏内还试图说服萨拉查不要担心德国会对葡萄牙进行袭击，不要相信英国能够赢得这场战争，也不要相信盟国的胜利将不如德国的胜利那么可怕。施托雷尔感到，在这一点上塞拉诺·苏内过高估计了他的成就；因此，事实上，塞维利亚会谈是最早的迹象之一，表明苏内的政治影响已今非昔比了。佛朗哥因能讲加里西亚语和卡斯蒂利亚语，故很少给苏内以谈话的机会，因此后来他把这次会谈的成功大部分都归功于自己。

盟国在北非登陆大约两星期之后，佛朗哥决定应不失时机，对葡萄牙进行一次回访，并且安排让他的新任外交部长霍尔达纳将军于 12 月 18 日至 20 日这段时间呆在里斯本。据承认当时提出这种建议的动机是为了表示（因生怕触怒德国，故十分谨慎小心）西班牙希望以靠拢葡萄牙来缩短同伦敦和华盛顿的距离。另外，就是想把“伊比利亚和平区”发展成为一个“伊比利亚集团”，从而在恢复整个欧洲和平中起带头作用，这一点霍尔达纳在他访问期间所做的演讲中特别着重地加以指出。这个想法在葡萄牙受到了欢迎，虽然报纸的评论仍旧坚持认为，合作决不应该损害两国各自的特点。对此，英国官方的反应是完全同情西葡两国政府不想使战争扩大到半岛的愿望；1943 年 1 月 27 日，政府在下院中声明，英国一直在不断从葡萄牙方面获得充分的消息，它不认为英葡的条约关系在任何方面受到了里斯本会谈的影响。1943 年，伊比利亚和平集团也走上了其他中立国谋求和解的道路，因而在整个大战的其余时期，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的关系特别平静无事。

第五节 1940—1942 年希特勒对葡萄牙

关于里约热内卢会议，见上文，原著第 114 页以下。

施托雷尔致德国外交部，1942 年 2 月 19 日〔《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 3 卷（西班牙），第 30 号〕。

多西纳格：《西班牙做得有道理》，第 116 页；塞拉诺·苏内：《在昂代与宣布罗陀之间》，第 267—270 页；坦普尔伍德：《负有特殊使命的大使》，第 141 页。

多西纳格：《西班牙做得有道理》，第 116—124 页。

安萨尔多：《一个西班牙君主主义者的回忆》，第 165 页。

下院辩论，第 5 辑，第 386 卷，第 472—473 栏。

关于 1954 年西班牙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见科尔德罗·托雷斯：《西班牙的对外关系》，第 283—290 页。

和大西洋诸岛的意图

据塞拉诺·苏内说，在战时某个阶段，德国人曾建议西班牙并吞葡萄牙，而两班牙政府立即加以拒绝了。但是在现存有关德国作战计划，或轴心国和西班牙民族主义领导人的会谈和通信的记录中，都没有发现这方面 8 的证据。根据这些情况判断，可见，甚至在 1940 年，葡萄牙在轴心国的各种计划中，除了涉及到它的大西洋诸岛以外，都一点也没有起过什么显著作用。1940 年 9 月，当墨索里尼问及葡萄牙的态度时，里宾特洛甫答道，他们害怕被西班牙并吞，并且还说，当西班牙参战时（他期待这将在几周之内发生）轴心国可能设法把萨拉查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希特勒在计划直布罗陀战役时（这个战役也包括夺取佛得角群岛），他打算，一旦占领了佛得角群岛，就派三个师到葡萄牙边境，以对付葡萄牙方面的任何敌对行动，并且，他要求他的海军顾问们研究有关葡萄牙战略重要性的全部问题。他们答复道，葡萄牙保持中立是对德国有利的，而且完全有理由可以作此指望，因为葡萄牙人充分意识到如果英国人竟想在那儿立足，要把他们驱逐出这个半岛该是多么轻而易举的事。况且，德国如对葡萄牙中立进行任何侵犯，除了会失去美国、巴西和西属美洲各国的公众舆论的支持外，还将意味着英国可能立即占领亚速尔群岛，以及可能还有佛得角群岛和安哥拉。在他们看来，政治压力再加上仅仅军事行动的威胁，就足以使葡萄牙安分守己了。

希特勒对葡萄牙本上的兴趣要比对大西洋各岛的兴趣少得多。在这些群岛中，亚速尔群岛是由北大西洋三群岛组成的。东南面一群的圣米格尔岛距里斯本七百八十英里，距纽约二千八百英里。位于群岛另一端的科尔武岛距纽芬兰的雷斯角一千英里多点。马德拉群岛位于里斯本西南五百三十五英里，距摩洛哥海岸约三百六十英里。再向西南一千英里的佛得角群岛，距离非洲的最西端约三百五十英里，正好在“达喀尔海峡”的北面。如果控制了大西洋各岛，特别是控制了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就将使德国人获得一个前哨基地，从那儿可以进攻横越大西洋或来往于好望角或南美的船只。这些岛屿还可能成为通向西半球的踏脚石。反过来，如果它们在盟国的手中，那就可被用来同样有效地进行反潜战和作为横越大西洋空运的中间站。但是，这些战略上的优点，必须考虑到下列问题来加以权衡，即将需要和能够抽调什么军队，首先用以控制岛上基地，然后给他们供应给养，且不消说敌人还可能进行报复。

早在 1940 年 6 月，西班牙和葡萄牙就谣传，德国不久将试图夺取这些岛屿。因此，美国政府对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表示了深切的关注，并从两国得到了保证，说它们不打算对这些岛屿的地位作任何改变。可是，几个星期之后，希特勒就已经谈到在加那利群岛建文基地之事，9 月 26 日，他同塞拉诺·苏内进行了不满意的会谈之后不久，告诉雷德尔海军上将说，如果他决定同西班牙合作而不同法国合作（总的来说，他喜欢法国），而如果西

《在昂代与直布罗陀之间》，第 79 页。

齐亚诺：《欧洲》，第 591 页；英译本，第 393 页。

《德国元首会议，1940 年》，第 117 页，第 123 页。

兰格和格利森：《对孤立的挑战》，第 738 页。

见上文，原著第 274 页。

见上文，原著第 275—277 页。

班牙也愿意合作的活，他可能空运一支远征军去亚速尔群岛、佛得角群岛和加那利群岛。他确信，一旦他的军队进入西班牙，英国或美国就将占领这些岛屿，他决心先发制人。他还想在亚速尔群岛建立一个空军基地，目的是专门为了威吓美国人——那时他们的东海岸将处于德国最新式战斗机的航程之内——迫使他们把军事工业转到国内防务上面。当希特勒在 11 月 4 日和 14 日再次会见他的海军顾问时，他头脑中首先想到的就是佛得角群岛，他在 11 月 12 日关于直布罗陀战役的指令中，明确指示他的海、空军总司令，研究占领三个群岛中任何一个群岛的计划。德国海军高级将领从一开始就反对这种想法。他们并不认为他们的舰队已强到足以进行这种冒险，他们也不想把舰队从直接攻击英国运输线的主要任务中撤出来。根据他们的意见，派遣一支空运远征队去夺取亚速尔群岛中的一个岛或许还是可能的，但是夺取之后却不能指望海军来维持对它的供应；佛得角群岛只有取得法国的同意才能加以占领；而如果德国控制了达喀尔，那么，盟国占领这些岛屿对德国造成的威胁就不至于达到使它必须不计代价先发制人的地步。至于马德拉群岛，对任何一方都没有用处。雷德尔和他的参谋们很希望获得新的大西洋基地，并打开通向非洲的道路，但是他们建议，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应同法国和西班牙达成谅解，并且他们认为，达喀尔远比这些群岛中的任何岛屿都来得重要。他们竭力使希特勒相信，冒险进入大西洋既行不通也无利可图，但是这并不能打消希特勒对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的梦想。

由于各种原因，在这些群岛登陆的实际计划象进攻直布罗陀的计划一样，从 1940 年 12 月初起就被搁置起来了；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是：佛朗哥反对德军进入西班牙；在赖伐尔倒台之后，法一德间的合作解体；必须支援意大利；以及决定在 1941 年春入侵巴尔干半岛各国和夏初入侵苏联。但是，在 1941 年春，盟国方面则认为德国人更有可能翻越比利牛斯山；如同在西班牙一样，在葡萄牙又一次掀起了惊人的谣传。德国人似乎很可能在鼓动这些谣传，其目的是为了掩盖他们的真实计划，对法国施加压力，并利用葡萄牙和西班牙对英、美侵略伊比利亚半岛和大西洋各岛的恐惧；正如上文已谈到的，当时出现的西班牙民族主义者某些挑衅性的言论也必定在里斯本引起了人们的越发惶恐不安。

然而，希特勒仍然希望一俟他的主要战役能让他腾出手来，他就打算占领亚速尔群岛。1941 年 5 月 22 日他再一次告诉雷德尔，他期望在那里为他的远程轰炸机获得一个基地，而雷德尔却又一次争辩说，虽然控制一二个岛屿或许是可能的，但是德国几乎无法守住它们或者维持它们的供应，即使为了这一目的而把所有的潜艇全从大西洋巡逻任务中撤出来也无济于事。虽然希特勒仍旧不信，但是，无论如何，他是不想在 1941 年夏季采取行动了。他一方面想让你的海军集中力量去攻击英国的供应线，另一方面，他在 1941

见上文，原著第 281 页。

《德国元首会议，1940 年》，第 94—95 页，第 104—106 页，第 107—108 页，第 113—117 页；《德国元首会议，1941 年》，第 2 页，第 39—41 页。

见上文，原著第 281—284 页。

《概览，1989—1946 年：希特勒的欧洲》，第 364—376 页。

同上书，第 295—299 页。

《德国元首会议，1941 年》，第 57 页。

年整个春季和夏初，都在蓄意小心翼翼地不去直接触犯美国。当英国人能够更有效地守住他们西面的各个入口时，德国海军却已把他们的战区转移到更远的大西洋方面去了。对于盟国的船只来说，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现在已完全处于这新的危险区中间，德国潜艇小分队和水面突击舰正在格陵兰以南西经 30 度以外的范围活动，并且就在泛美安全区之内。但是，希特勒相信，只要约束他的海军不对美国船只进行实际的攻击，他就仍能避免同美国摊牌；在全世界都清楚地看到，他的军队在苏联确将取胜无疑，和在来自日本的日益增长的威胁开始迫使美国人缩手之前，他一直是极想这样做的。那时，从亚速尔群岛威胁美国或者甚至进攻美国的时机就到来了；因为希特勒显然被他的新型轰炸机的航程有可能远达纽约的想法给迷住了心窍。同时希特勒也认为美国政府并非决不可能首先发难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便打算立即向西班牙出兵。为了保护亚速尔群岛和马德拉群岛不受盟国侵占，一直迟到 1942 年 6 月，希特勒还仍主张把潜艇从巡逻中撤出来。至于派遣一支军队越过比利牛斯山进行报复一举，希特勒本人亦开始认识到，当着盟国在北非登陆的时候，这已是不再可能了。

第六节 英国、美国与大西洋诸岛

(1940—1941 年)

葡萄牙人本身从来就没有认真料想到德国人会占领任何大西洋岛屿。他们过分相信英国的海军，并且一向也没有把德国看作是一个具有英国海军那种规模的海上强国。引起他们更多忧虑的倒是，英国以及特别是美国占领这些岛屿的可能性。他们早已怀疑美国对亚速尔群岛抱有经济野心乃至领土野心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从 1917 年起，美国就在圣米格尔岛的德尔加达角保持有一个海军和空军基地，1919 年，葡萄牙革命者曾经向当地的美国海军司令邓恩海军上将建议，美国人应该夺取这些岛屿，把它们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这个建议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赞同。葡萄牙人对美国的害怕程度差不多到了随便什么事都可拿来作为借口，例如，甚至荒诞地认为，在美国有六十万亚速尔人后裔的存在，就足以构成美国并吞该群岛的动机。

到 1941 年春，英国和美国对葡属大西洋各岛以及葡萄牙防止德国假道西班牙入侵的防务问题无疑都产生了兴趣。英国曾经计划在葡萄牙的同意下取得对亚速尔群岛的控制权以代替加那利群岛，假如西班牙参战，或者直布罗陀变得不能使用的話。3 月底，丘吉尔预料，德国人不久可能迫使西班牙和葡萄牙同他们合作，或者还可能不经葡萄牙同意径行入侵伊比利亚半岛，于是向罗斯福建议，美国派遣一支分舰队访问亚速尔和里斯本。早在 1 月 30

同上书，第 47 页，第 57 页，第 89—90 页，第 91—92 页。

同上书，第 94 页。

《德国元首会议，1942 年》，第 46—47 页。

米尔：《欧洲的会合点》，第 79 页，第 80 页，第 127 页。

《纽约时报》，1943 年 10 月 13 日。

关于英、美当时同葡萄牙的关系见丘吉尔，第 2 卷，第 552 页；美国版，第 2 卷，第 625 页；第 3 卷，第 123 页以下；美国版，第 3 卷，第 142 页以下；赫尔：《回忆录》，第 2 卷，第 940—941 页；兰格和格利森：《不宣之战，1940—1941 年》，第 364 页，第 366 页以下，第 454—455 页，第 516—519 页，第 572 页，第 587—589 页，第 669—670 页；莫里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海军作战史》，第 1 卷，第 61 页，第 66 页。

日，罗斯福就曾考虑安排由美国海军对里斯本和加的斯作一次访问，但葡萄牙政府担心这种访问恰恰可能给葡萄牙带来本来想保护它们免于遭受的那种危险。同样，在德国人真正侵犯葡萄牙的中立之前，葡萄牙人也是极不愿意在这些岛上给英国人或美国人以任何便利的，而英国和美国政府则宁愿葡萄牙在德国人进入西班牙，或者甚至一旦出现这种迫在眉睫的危险时就接受保护。

4月10日，赫尔指示美国驻里斯本公使伯特·菲什向葡萄牙政府、该国领导人及公众明确表示，美国决心反对侵略国家；18日，赫尔向葡萄牙驻华盛顿公使若奥·比安基保证，不管存在什么与此相反的谣言，他的政府无意作为预防手段先行占领亚速尔群岛，虽然一旦德国动起来，他们即将采取行动。同时，白宫采取了一个对亚速尔群岛有影响的重要决策。罗斯福和他的战时内阁在西经26度处为东西两半球划定了一条中间线，这条线几乎包括了整个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的西端。美国打算在这整个区域内进行巡逻，并将有关德国潜艇或水面突击舰只在该区域内活动的情形向英国护航舰队报警。第二天，罗斯福把这一决定通知了丘吉尔，4月24日，丘吉尔建议，在弗里敦以北航行的盟国船只也应受到美国航空母舰上侦察机的保护，美国军舰也应在亚速尔和佛得角群岛附近巡航，借以阻挡德国人，因为在德国人进入西班牙后，从英国派出的一支远征军也许不能及时到达这些岛屿。但是，罗斯福不愿走得这么远。5月1日，他解释道，美国海军的巡逻将到达亚速尔和佛得角两群岛的西面，但是飞机将不飞越这些岛屿的上空——这是对葡萄牙的担心的一种明显让步。他劝告说，在葡萄牙本身已受进攻，或者德国对这些岛屿的进攻已迫在眉睫之前，不应向这些岛屿出兵，他甚至含蓄地把门罗主义的范围引伸到这些岛屿上，要求丘吉尔（根据罗斯福自己查看地图，这些岛屿极大部分位于西半球之内），如果他真派出英军占领它们的话，那就应该使美国人民确信无疑，葡萄牙如恢复独立时，这些岛屿的主权将交还给它。丘吉尔对此并不拒绝作出承诺，他并建议由美国从中作保证人；他再次提醒罗斯福，存在着德国可能抢在盟国前动手的危险。从5月初起，罗斯福又有新的理由为西欧担忧。美国驻法国维希政府大使海军上将李海发来报告，达尔朗正在同德国人谈判，并且又说，有一切理由可以怀疑达喀尔已供德国军舰和飞机使用。罗斯福首先想到的是向国会提交一份咨文，意在使门罗主义的范围得以引伸至葡属（和西属）大西洋各岛。他希望派一位特使去里斯本，征求萨拉查对此声明的同意。但是，部分由于赫尔的劝告，他决定改为发表一项公开声明，从美国防务观点出发，陈述这些岛屿的重要性。1941年5月27日，罗斯福在无线电广播中宣布“全国无限期地处于紧急状态”，他警告听众，纳粹德国只要高兴，无论何时都有能巨力占领西班牙、

赫尔的《回忆录》（第2卷，第940—941页）中并没有说明他是否说过德国向西班牙或葡萄牙推进。

海军上将金在4月18日第3号作战计划中，把西半球的界限定在包括整个亚速尔群岛在内的约西经26度处，但是没有提到佛得角群岛（莫里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海军作战史》，第1卷，第61页）。又见丘吉尔，第3卷，第122—123页；美国版，第3卷，第142—143页。

分别见丘吉尔，第3卷，第123—125页和美国版，第3卷，第143—145页。

兰格和格利森：《不宣之战》，第s68—369页。

《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381—384页；兰格：《我们对维希的孤注一掷》，第144页，第147—159页；李海：《我在现场》，第42页，第43—44页。

葡萄牙、达喀尔、亚速尔或佛得角群岛；他声称，纳粹德国如果控制了任何一个大西洋岛屿，“那将立即危及南、北大洲部分地区的安全……而最终将危及北美大陆合众国本身的安全”；并且指出，这些岛屿除了为德国在大西洋的战争提供基地之外，可能还会成为德国进攻巴西和其他南美各共和国的“一块跳板”。基于这理由，美国已扩大它在大西洋的海军巡逻活动，并将警惕纳粹在更靠近西半球的地方建立由其控制的基地的任何企图。

罗斯福的无线电广播演说在美国反应良好，但却在葡萄牙人中间激起了愤慨，他们原已由于美国那些干涉内政主义者的报纸发表的文章而感到不安（这些报纸恰恰也是反独裁者的报纸），这些文章强烈主张不必等葡萄牙人同意，就该抢在纳粹之前占领大西洋各岛。1941年5月23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甚至贸然地刊登了“亚速尔人是半美国血统”的副标题。5月6日，在参院辩论中，参议员佩珀极力主张占领亚速尔和佛得角群岛之后，9日萨拉查作了公开声明，大意是说，葡萄牙政府十分了解佩珀的建议（就如美国报纸上提出的其他一些建议一样）并不代表官方政策；且到国前为止，没有一个交战国或第三方曾提出过任何关于使用葡萄牙沿海或者葡属各岛港口的建议：他还声明正在加强所有三组群岛的防务，以抵御来自任何方面的进攻，虽然他并不预期会出现这种事态。

葡萄牙报纸批评了罗斯福的无线电演说，否认存在任何德国进攻的危险，并表示了除其他问题外对美国在西半球扩张领导地位的普遍厌恶。5月30日，葡萄牙向华盛顿提交了一份照会，强调葡萄牙遵守中立是无可指摘的，它决心捍卫中立，并已在各岛上采取了戒备。照会中抱怨罗斯福所阐述的论点没有提到“尊重别国主权的基本原则”，照会中还谋求美国保证罗斯福的话与赫尔先前所作的声明绝不抵触。6月10日，赫尔在答复这份照会时，代表他的政府否认有任何侵略意图，他解释道，美国的政策是基于不可剥夺的自卫权利，而且它所以强调这些岛屿的战略意义，完全是依据在一次进攻西半球时它们的潜在价值而提出来的。

但是，萨拉查并不满意赫尔的回答，要求索姆纳·韦尔斯作出更确切的保证。当时，每隔几周就有船只离开里斯本增援这些岛屿，而且在报纸上，对此也公开予以报道不讳。到1943年春，在亚速尔和佛得角群岛共驻扎了十一个步兵营和十个高射炮中队。1941年7月，由于美国占领了冰岛和在参院外交委员会上参议员惠勒和佩珀进一步提到了这些大西洋岛屿，所以再次引起人们的猜疑，虽然葡萄牙也注意到外委会主席参议员乔治对西属和葡属各岛，与冰岛和格陵兰这两者之间作了明确的区分。7月14日，索姆纳·韦尔斯在记者招待会上申明，大西洋各岛保留在友好国家的手中对美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美国政府渴望葡萄牙主权始终不受侵犯。

事实上，罗斯福已在5月23日命令一支二万五千人的部队在一个月之内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0—1941年》，第51页，第53页，第54页。

例如，1941年3月18日《纽约先驱论坛报》上沃尔特·李普曼的文章：《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11年5月2日，12日。

《泰晤士报》，1941年5月10日；《新闻日报》（DiariodeNoticias），里斯本，1941年5月9日。注释原文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0—1941年》，第426—429页；《晨报》，1941年6月12日。

《泰晤士报》，1943年4月17日。

作好准备，乘船去亚速尔群岛。当时，美国并没有多余的人力和装备在海外进行一场海上的战役。据认为再过一年或多些时间，要解决达喀尔还是一项太艰巨的任务，巴西政府仍不愿意对于一项共同防御的计划承担任何义务。可是，美国陆军部和海军部却怀疑，远征亚速尔群岛应不应该首先动用他们有限的资源，而且虽然丘吉尔不反对美国代替英国远征，但是葡萄牙人则依然坚决反对美国或英国在轴心国侵犯了葡萄牙 335 中立之前登陆。再者，待到 6 月份，罗斯福和丘吉尔也都相信，希特勒的下一步行动将是针对东方，如果他在夏季过去以前成功地击败了俄国人的话，对大西洋各岛的威胁还会重新出现。美国派遣军队前往冰岛也在 6 月份决定。

然而，英、美并没有放弃占领大西洋各岛的念头。在取得瓦加斯总统同意——只是原则上同意，因为巴西将不提供军队——如果葡萄牙要求帮助，巴西准备分担亚速尔群岛的防卫之后，罗斯福发出一封私人信件给萨拉查，于 7 月 21 日提交里斯本，但是，萨拉查所愿从美国接受的唯一帮助只是岛上所需的军用物资，如果这些物资不能从英国得到的话。但是，在 1941 年 8 月 9 日至 12 日的大西洋会议上，丘吉尔获悉，萨拉查曾向罗斯福保证，倘若德国人入侵葡萄牙，葡萄牙政府将迁往亚速尔群岛，依靠英国保护，但如果英国因忙于别处而抽身不开的活，就接受美国的保护。会议一致同意，即使由于英国计划在下个月抢先占领加那利群岛而引起了紧急事变，美国也将负责保护亚速尔群岛，但是，这项计划实际上从来就没有付诸执行。会议要求巴西至少要派一支象征性的军队。会议似乎还作了安排，规定在美国军队登陆期间英国海军应予以支持，并且由于美国尚不能同时从事两场战役；英军应首先占领佛得角群岛。

但是，接着影响葡萄牙的一个重大国际事件倒不是轴心国或盟国为了控制葡萄牙领土而采取的任何行动，而是 1942 年 11 月盟国在北非的登陆。就如同西班牙的情况那样，一开始就建议，英国应该单独负责重新向葡萄牙作出保证，但是在 10 月美国驻里斯本公使却建议说，华盛顿亦应向葡萄牙正式保证尊重其领土完整。11 月 8 日，罗斯福给卡尔莫纳总统写了一封类似给佛朗哥的信，得到了后者的热情接受，但是葡萄牙并没有丝毫 36 放松它恪守中立的立场。例如，1943 年 1 月 15 日，迫降在里斯本机场的十一架美国战斗机就被葡萄牙没收，飞行员亦遭扣留。

第七节 盟国占领亚速尔群岛 (1943—1945 年)

兰格和格利森：《不宜之战》，第 369 页。

同上书，第 572 页。

同上书，第 588—589 页。

兰格和格利森：《不宣之战》，第 689—670 页；丘吉尔，第 3 卷，第 388—389 页；美国版，第 3 卷，第 438 页；索姆纳·韦尔斯 1941 年 8 月 11 日备忘录（美利坚台众国国会：《珍珠港事件两院调查委员会意见听取会》，第 4 篇，第 1785—1786 页）。

《概览，1939—1916 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 201—209 页，第 245—261 页。又见上文，原著第 294 页。

见上文，原著第 296 页。

赫尔：《回忆录》，第 2 卷，第 1186 页，第 1191—1192 页，第 1195 页；罗斯福信件以及卡尔莫纳复信的文本，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2—1943 年》，第 592—593 页。

随着时间的推移，盟国愈来愈需要大西洋中间的基地了。1942年，盟国航运的一个主要危险区是在亚速尔群岛以北，这个地方他们的飞机到达不了，但在该年晚些时候在南大西洋产生的另一个危险区，则飞机尚能从亚速尔群岛或佛得角群岛起飞进行巡逻。从1942年起，德国潜艇就在亚速尔群岛附近同它们的供应潜艇取得了联系，从而使它们的正常巡逻周期能以延长两倍或者三倍；1943年6月，当北大西洋对德国潜艇变得不安全时，它们就移到靠近亚速尔群岛西面的一个新的狩猎场了。盟国的轰炸机在从亚速尔群岛中央的特尔赛拉岛算起八百英里半径内活动，就能够横切以冰岛、格陵兰、直布罗陀和英伦三岛为基地的巡逻区。那便将只需要较少的护航军舰，而护航舰也可向更南游戈，并且能够较容易地截击在比斯开湾执行巡逻往返的德国潜艇。亚速尔群岛的基地还能够用于气象观察、协助航行和海空救援。当时认为，占领这些岛屿之后，由于其缩短了空运路线，每年将为盟国节约一百万吨航运量和一亿加仑航空燃料。

占领亚速尔群岛于是成了联合参谋部在1943年5月制订作战计划的一部分，该月在华盛顿举行的三叉戟会议，决定在英国组织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应在约6月底启程前往，显然不管葡萄牙是否表示同意。但是丘吉尔出席会议回来以后，英国政府决定再次同葡萄牙政府接触。这时，萨拉查方才同意英国使用亚速尔群岛基地，并同意所有盟国军舰和商船在亚速尔群岛加油。但是，除非葡萄牙本身参战，除英国之外，其他同盟国家将不得充分享受这些便利。5月29日，丘吉尔在向罗斯福报告谈判进展时，认为最终或许能劝使葡萄牙放弃这种保留，并且他还认为，由于这项协定既然是以英葡同盟为基础而进行谈判的，那么，它就应该限于英国独享这些便利。丘吉337尔还建议，罗斯福应授权让他担保，如果英葡谈判成功，美国政府将满足葡萄牙人的愿望，使他们得到象英国所给予他们的那些关于葡属殖民地的同样保证。罗斯福和赫尔最初认为，美国只能应允尊重而不是维持葡萄牙对它的殖民地的主权，但是，在英葡协定生效之后不久，葡萄牙又提出了这个问题时，美国于10月25日向葡萄牙作了这项保证，而对亚速尔群岛没有作出任何规定。

6月23日，萨拉查原则上同意借用基地，但是他依然害怕德国从空中对葡萄牙进行报复，或者甚至西班牙入侵葡萄牙，萨拉查要求就协定所牵涉到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含意进一步进行讨论。英国答应给它提供战斗机和高射炮，并保证如果西班牙进攻葡萄牙，盟国将对西班牙宣战。英葡协定在1943年8月17日签订，从10月8日起生效。10月12日，英国军队在亚速尔群岛登陆。

葡萄牙对其所给予的便利限制得很严格。英联邦成员国有权使用特尔赛拉岛上的拉任斯机场，在紧急情况下也可以使用圣米格尔岛上的拉博德佩绍机场，同时船只还可以在法亚尔岛的奥尔塔港加油，进行粮食补给和修理。其他同盟国家则除了护航船只或者执行与护航有关任务的船舶可以得到加油的方便之外，实际上仍然是一无所获。为拉任斯机场运输供应品的非英联邦

关于大西洋各岛当时对盟国的重要性，见丘吉尔，第4卷，第705页，第716页；美国版，第4卷，第789页，第802页；《德国元首会议，1943年》，第41—42页；莫里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海军作战史》，第1卷，第312页，第320—321页；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31—732页；英国版，第2卷，第727页。

船只必须由英联邦军舰和飞机护送。“两国政府注意到，葡萄牙政府在同联合王国……协议的条件下奉行一项中立的政策正是出于两国更高利益的需要”，因此两国政府“根据目前的战略形势，同意把在亚速尔群岛的各种便利减到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但是葡萄牙政府仍然将对提出的在新情况下重新考虑目前协定的最后请求，给予“最友好的考虑”。有关军事安全的补充协定将在以后签订，这些协定包括对轴心国侨民和其他外国人的管制和对通讯特别是对奥尔塔海底电台的管制。协定中没有明文规定何时终止这些便利，但是，10月12日，丘吉尔在下院宣布，这些条款只是暂时性的，它们决不会损害葡萄牙保持其主权；他还宣布一俟战争结束，全部英军就将撤离。

英国政府作为交换条件，向葡萄牙保证，如果该协定导致了对葡萄牙本土的进攻，英国将尽力给予一切军事支援，并且邀请葡萄牙派一代表团立即访问英国，商讨防御计划，对此英国将提供武器和专门技术人员。英国还同意保护葡萄牙商船（这些船只将包括在护航之内）和远洋渔轮，修订战时贸易协定以及供应品购买协定，并且改进运输设施：“以解决国民的供应困难，特别是食品和燃料供应的困难”。10月12日，艾登和萨拉查交换了协定及信件，双方都强调了这些便利的防御性质；同时，丘吉尔宣布，该协定决不影响葡萄牙在欧洲大陆上保持中立的政策（英国政府对此曾宣布表示充分同情），从而维护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和平区。

同一天葡萄牙政府发表声明，引用了丘吉尔声明的要点，宣布葡萄牙的中立一贯是以英国有权援用英葡联盟为条件的，并且向国民保证，葡萄牙对西班牙的义务因英国政府的完全赞同而得到了保证。葡萄牙政府已向西班牙作了充分的解释，而英国驻马德里大使也将确认这些保证。最后，当前对英国所作的让步，由于其加强了英葡联盟，并为再次肯定现有的这些保证提供了一个机会，它既证明了英葡友谊，又保证了这种友谊在未来将变得更加亲切。11月26日，萨拉查向国民大会演说时满意地详述了英国重新肯定的这些保证，特别是因为英国的一些自治领和联合王国一起作出了这项尊重整个葡萄牙帝国主权的保证。萨拉查对美国的保证也表示赞许。根据协定，英国向葡萄牙提供价值约一千五百万英镑的军需物资。这笔物资的代价，以葡萄牙在它的领土上为英国军队提供的物品和服务，包括葡萄牙在拉任斯机场开支的各种费用抵付。11月26日，萨拉查声明，虽然对所提供的这些物品和服务的现金价值无法精确计算，但总起来说，无疑葡萄牙是受益者。他说，由于葡萄牙同时也以“很高的代价”从德国、意大利和瑞典获得军需物资，以致现在葡萄牙已重新武装到一度似属渺茫梦想而今却成了防卫上必不可少的最低要求的程度。甚至在协定签订之前已有大批来自英国的军需物资到达了。在协定生效前这段间隔时期内，也许是为了给国内外敌人造成深刻的印象，葡萄牙政府让全世界都晓得，他们正在重新武装起来，因为最近在那里发生了几起抢粮骚动和罢工事件，特别是在墨索里尼垮台之后。随着协定生效之日接近仍使人感到不仅在亚速尔群岛，而且在帝汶岛，形势越来越

下院辩论：第5辑，第392卷，第716—718栏。

葡萄牙和备交战国之间的经济关系，特别是对葡萄牙钨矿石供应的竞争，已见前面所述（原著第86页，第89—90页，第91—92页，第94—95页）。

紧张了，并且就在前一天即 1943 年 10 月 11 日，进行了军事和民防演习。

然而一切都平静地过去了。德国人也许甚至陷于措手不及，因为 12 日那天威廉街发言人还未能发表任何明确的方针，到 14 日，他才声明，德国将对这种明目张胆违反中立的行为提出抗议，但是鉴于葡萄牙只是在压力下才这样做的，因此或将不致产生政治后果。声明暗示其他中立国还是要警惕被卷入类似的策谋活动中去。德国报界均已接到了指示，宣称英、美方面利用了葡萄牙的一场歉收灾难，威吓它签订该项协定。对于那份“古老的羊皮纸”，1373 年条约，也采取了一条道义上的路线，据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久，这项条约并未能阻止住英国攫取葡萄牙殖民地的阴谋。10 月 15 日，德国在里斯本提交了一份照会，保留由于形势变迁而可能采取任何措施的权利。同天，柏林一则广播讲到了德国有权决定它对葡萄牙的中立承认到什么程度。日本也提出了抗议。但是事情也就到此为止。

亚速尔协定的及时缔结对盟国具有重大价值，虽然若在 1943 年夏季大西洋战争转折点到来之前就签订了这项协定，甚至会有更大的价值。1943 年 8 月，在首次魁北克会议上提出了为美国提供便利的问题，对于该协定的现有内容联合参谋部是并不满意的；显然，赫尔是带着一旦协定生效它将几乎自动延长的印象离开魁北克的。但是，事情并非如此。萨拉查并不反对为从特尔赛拉岛 340 出发进行抵御德国潜艇的海军巡逻队延长提供便利，但直到 1944 年 7 月，他才许可美国在拉任斯机场驻扎一支海上空军中队，纵然这支中队须得置于英国的指挥之下。美国所提出在圣玛利亚岛建造一个空军基地的建议甚至更难获得葡萄牙的同意。原来打算这个空军基地是为葡萄牙政府建造的，同时使盟军能在战时加以使用，战后美国能在那儿享有最惠国权利，并有权用它来作为边沿哨所的供应站。萨拉查经过相当迟疑之后；同意泛美航空公司选择一个地点；美国人希望在同日本决战时充分利用圣玛利亚岛，作为远东空中交通的桥梁，在他们催促之下，1944 年 7 月 22 日，萨拉查才允许建筑材料在该处起卸，但仍不准其开工。

这时，葡萄牙几乎没有估计到德国进行报复，但是对美国甚至在支付空军基地部分费用而暂时使用基地的借口下进行渗透可能依然惴惴不安，而且在多山和人口稠密的岛上征用如此多的平地必然多少也是一个问题；此外，在有关航运和各种供应品上，萨拉查甚而还要求美国政府作出比它所愿意给的更大让步，作为葡萄牙提供便利的报酬。最后，1944 年 10 月，赫尔警告萨拉查，如果他不立即批准征用圣玛利亚基地和开始施工的话，美国政府将中断关于帝汶岛的参谋人员会谈，拒绝对有关经济或其他任何问题的谈判，并且甚至将限制已经提供的经济援助。此后，谈判进展较为迅速，1944 年 11 月 28 日，经过美葡之间互换照会和在同一天达成一项秘密协定，商定空军基地应即开始施工，美国使用该基地将不受限制。在某些情况下，英联邦成员国的飞机也可以使用这个基地。这些便利将在战争结束后六个月之内，或者在同日本签订停战协定后终止。如果这些时间还不够用来从远东撤离人员和物资的话，得允许再延长三个月。在建设基地的费用中，葡萄牙应负担的份额规定不超过二百九十八万五千美元，同时，“所有这一切建筑物一旦可付

见下文。原著第 341—344 页。

《国民双察报》，1943 年 10 月 14 日。

赫尔：《回忆录》，第 2 卷，第 1340 页。

使用时”，将被看作是葡萄牙政府的财产。给予美国的这 341 些便利是作为葡萄牙间接参与收复帝汶工作看待的。

圣玛利亚基地及时完工了，从而可以用来为远东的盟军服务。战争结束后，驻在亚速尔群岛的英美人员就逐步撤退；1946 年 5 月 30 日，英葡和美葡互换照会，规定了 6 月 2 日为把拉任斯和圣玛利亚基地移交给葡萄牙接管的日期，并允许盟国使用拉任斯机场十八个月，以便转移在德国和日本的占领军中服役的飞机。

第八节 澳门和帝汶岛

当战争扩大到太平洋时，葡萄牙特别感到有理由为它在远东的殖民地担忧。澳门位于中国南海岸，就在香港的西面。它已经成为日本占领区中的一块飞地，现在除了无线电之外，它同西方的一切通讯联系都被切断了。但日军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依然平静无事，其后四年期间所产生的主要困难是经济问题。1945 年 1 月 16 日、2 月 25 日、4 月 7 日和 6 月 11 日，美国飞机轰炸了澳门，炸死了一些中国人。美国政府承认负有责任，战后，规定赔偿一百零四万三千七百十四点三五帕塔卡斯（澳门货币），外加利息。

帝汶就不如澳门那样幸运了。随着空军力量的发展，甚至连这个由葡萄牙占领东北部，荷兰占领另一端的迄今为止并不出名的岛屿也具有了料想不到的成略价值，成了澳洲、东印度群岛和欧洲之间的桥梁。葡属帝汶的主要城市帝力有一个良好的水上飞机泊锚地，从达尔文越过阿拉富拉海至该岛只有四百五十英里（1941 年时航程为三小时），位于新加坡东南一千三百英里。

根据 1940 年 12 月 11 日的一项协定，澳大利亚快达帝国航空公司从翌年 1 月开始，获权开辟通往帝力的航线，每两周有一次班机。自 1940 年 7 月以来，日本人一直在同葡萄牙进行谈判，1941 年 10 月 13 日终于签订了一项实际与

美国国务院：《葡萄牙：圣玛利亚岛空军基地，互换照会（和）协定……1944 年 11 月 28 日在里斯本签订（合众国条约及其他国际协定，第 2 卷，第 2 部分：条约及其他国际协定集 2338 号：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52 年版调）[U.S.A.DepartmentofState :Portugal :Air ,Base on San-ta Maria Island. Exchange of notes (and) Agreement..Signed..at Lis-bon , November28 , 1944 (U. S.Treatiesand otberlnternational Agree-ments , vol.2,part2 :TIAS2338)]。关于 1944 年 11 月 28 日英葡互换照会的内容（和美葡互换照会的内容相同），见英国外交部：《关于在亚速尔群岛上提供便利构成协定的文件》，敕令第 6854 号。又见赫尔：《回忆录》，第 2 卷，第 1343 页。

见下文，原著第 344 页。

英国外交部：《关于……亚速尔群岛……文件》，敕令第 6854 号。

美国国务院：《某些战争索赔案件的解决：由互换照会达成的美国和葡萄牙之间的协定……1947 年 10 月 3 日和 1949 年 2 月 21 日，5 月 3 日，5 月 20 日，8 月 4 日》（SettlementofCertainWarClaims :Agreementbetween the U.S.A.and Portugaleffected by Exchangesof Notes..October 3 , 1947 and February 21 , May 3 and 20 , and August 4,1949 ），出版物第 4959 号（《条约及其他国际协定集》，第 2664 号：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53 年版），第 5—6 页。

保罗·麦圭尔：《通向西方的道路：大洋洲的新世界》（PauLMC-Guire , WestwardtheCourese : The New World of Oceania ），纽约，威廉·莫罗，1942 年版，第 177 页，第 184—185 页。

《每日快报》（DailyExpress ），1941 年 12 月 18 日。

英国外交部：《关于在澳大利亚相葡属帝汶之间建立一条航线……互换照会，里斯本，1940 年 12 月 11 日》（ExchangeofNotes..re-gar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ir Service between Australia andPortugeseTimor , Lisbon ! December11 , 1940 ），敕令第 6266 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1 年版）。

上述协定相同的协定，建立了一条从西太平洋的帛琉群岛到帝力两周一次班机的航线。1937年以来，日本的南洋发展公司一直在帝汶的各种植物园投资和收购产品，并试图取得石油开采权。但是澳大利亚怀疑日本开辟这条新航线的目的不是商业性的而是有战略意义的。

葡萄牙1941年10月23日的官方声明否认它是在压力下同日本签订这一协定的，同时也否认这项协定是表明了对有关国外航空业务的政策有所改变。然而，这时，英国、澳大利亚和荷兰政府都已意识到保护帝汶的重要性，因为它是战斗机飞行于澳大利亚和爪哇间一个必不可少的着陆站，虽然在荷属帝汶的古邦已有一个机场，看来要求葡萄牙提供便利是不成问题的。1941年11月4日，英国政府讯问葡萄牙，假如日本人进攻帝汶，它是否愿意接受英国的帮助，并且建议事先应该制订一项共同行动计划。萨拉查根据自己的估计，认为日本发动一次进攻不大可能，他答复说，葡萄牙将抵抗日本人，并且同意讨论防御计划。原来建议在新加坡举行讨论，但是葡萄牙政府不同意荷兰参加，虽然并不反对同英国和荷兰分别进行会谈。

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一天——荷兰驻里斯本代办表示愿意用已在帝汶的澳大利亚军队和荷兰军队援助葡萄牙；但是，接着进行一周谈判的结果是，葡萄牙政府只肯在日本人进攻开始后才接受这种帮助，而盟国却要求一当这种危急迫在眉睫时立即有权采取行动。

当这个困难尚待解决时，据报，日本的潜艇已靠近该岛，在荷属帝汶的盟国军队立即被派往占领帝力。葡属帝汶总督提出了抗议，但是并没有进行唯一可能做到的象征性抵抗。当时，盟国发表一项正式声明，葡萄牙的主权将保持完整，一旦来自日本的危险消逝，盟国军队就将撤离。

葡萄牙政府认为盟军的占领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因此拒绝参加发表一项共同声明。他们除了小心注意避免偏离中立立场，或者激怒日本之外，对于德国可能怎样做出反应或许也很不安。在国民大会的一次特别会议上，萨拉查提出一项不失尊严而又有节制的抗议。其他发言者则不那么克制，据报道，有一位亲德的代表把他比作庞休斯·彼拉多（在萨拉查离开会议厅之后），因为他没有给英国的罪行以应有的惩罚。但这段话从记录中被删去了。可是，国民大会仅只通过了一项决议，对占领表示遗憾，并且表示绝对信任政府，尽管当地的纳粹分子和亲纳粹分子尽力挑起人们的愤懑，并且发生了几起反英示威，但盟军占领帝力这个事件在葡萄牙的情感上并没有留下持久的创痕。

当时葡萄牙政府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应由他们自行派遣足够的增援部队去帝位捍卫他们的中立而无需援助，经过又一个月的谈判之后才最后商定，盟国的军队在这些增援部队到达时即行撤离。但葡萄牙在洛伦索马贵斯所集结的一千一百人的分遣队直到1942年1月底还未启程；而2月20日，当日军已在葡属帝汶和荷属帝汶登陆时，这支部队还正在横渡印度洋呢。除了在

原文见《商业日报》，1941年10月28日。

《呼声报》（A Voz），1941年10月23日。

关于盟国的占领，见荷兰东印度群岛政府声明（《泰晤士报》，1941年12月19日）；英国的声明（《曼彻斯特卫报》：1941年12月23日）；和萨拉查12月19日的演说（全文见1941年12月20日葡萄牙的报纸）。

米尔：《欧洲的会合点》，第132—133页。

山区中残存的盟军进行游击抵抗之外，日本人几天之内即控制了整个岛屿。不久前曾保证尊重葡属帝汶和澳门中立的日本政府，借口出于自卫，他们需要帝汶的这一半来对付另一半，以及葡萄牙政府未能促使盟国撤出帝力等理由为他们的行动辩护。日本人答应一俟他们达到目的，他们就撤退，但条件是葡萄牙应保持中立。

这些辩解受到了萨拉查的公开驳斥，2月21日，他在国民大会演说时谈到了这是对葡萄牙主权的明目张胆和毫无必要的侵犯。他揭露说，日本政府一直获得有关盟军撤退的协定以及葡萄牙的增援部队正从洛伦索马贵斯开拔等情况的充分通知；但他却用了十分不同的言语称赞英国的真挚友好态度，英国（据他揣测）可能对12月事件承担了不公允的一份责任。甚至现在众议员阿尔维 344 若·多斯·雷斯博士还说，好象在这两种占领之间不见得有什么差别，并且突出地对葡萄牙谋求同英国之外其他国家的友谊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许。

最初在帝汶的日军当局行为尚属检点，它承认葡萄牙的主权，并允许葡萄牙总督同里斯本保持接触，但是到5月底，他们关闭了无线电台。葡萄牙政府拒绝了他们发送明码电报的要求，因此除了来自葡萄牙总督的很少几封这类的电报之外，就再没有得到这块殖民地的正式消息了；但是，从走漏到澳大利亚的消息中和从一年多之后被盟国游击队救出的难民口中获悉，当地曾发生过起义，一些葡萄牙人被杀害，种植园也不再经营了。经过两年谈判之后，一位澳门的葡萄牙官员被允许访问帝汶，但是萨拉查极力试图劝说日军撤退所做的努力（或许正如所预料的那样）没有产生任何结果。海军上将邓尼茨在1944年1月就提出了德国应该代葡萄牙出面进行干预的建议——这还是他一贯对伊比利亚半岛在战略上的作用感兴趣的又一迹象——但是，希特勒对这种想法没有多少兴趣。

在谈判亚速尔协定时，萨拉查告诉英国政府，葡萄牙愿意参加重新收复帝汶的任何作战行动，接着他对美国也作了同样的提议。参谋人员讨论会在里斯本开始举行，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葡萄牙参加对日作战问题是和在1944年11月28日协定中所规定的为在亚速尔的盟国军队提供便利一事密切相关的。在那些协定中有一条是保证恢复葡萄牙的全部主权，这就提示了在葡萄牙人心中可能产生的某些忧虑，他们唯恐帝汶会永久陷于它的解放者的手中。但是，在某一时刻（是在1944年11月协定签订之前还是在签订之后不清楚），盟军最高统帅部曾决定，葡萄牙军队将不直接参与作战，除非盟国没有他们就不能达到目的。总之，盟国正计划北向日本推进，留待主要战役结束后再来解决印度尼西亚问题。

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海军作战史》，第3卷：《太平洋中的旭日，1931—1912年4月》（The Rising Sun in the Pacific, 1931—April 1942），波士顿，利特尔-布朗，1948年版，第314—316页。

《泰晤士报》，1942年1月24日。

《泰晤士报》和《晨报》，1942年2月21日。

《德国元首会议，1943年》，第109页。

见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42—1343页和1945年10月7日萨拉查演说的报道（《曼彻斯特卫报》，1945年10月8日）。

见上文，原著第340—341页。

日本把投降决定通知盟国之后不多几天，1945年8月17日东京方面宣布，已作了安排，恢复葡萄牙在帝汶的行政管理权。日本驻军撤到了荷属帝汶，并向澳大利亚345人投降。从9月5日起葡萄牙总督恢复了正常的行政职权，27日第一批葡萄牙军队到达了帝汶。

第六章土耳其 G·E·柯克

第一节大战爆发时土耳其的立场

土耳其是一个约有二千万人口、工业不发达的国家，位于三个大国集团的会合处，西面是轴心国势力笼罩下的巴尔干半岛，北面是苏联，南面是英国及其盟友占统治地位的阿拉伯世界。此外，土耳其还扼制着这些集团之间的交通要道。自从十八世纪俄罗斯崛起成为一个强国以来，关于爱琴海和黑海之间水路的控制权问题，一直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为把巴尔干半岛与中东联接起来而建造的巴格达铁路，曾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因素。自基马尔革命以来土耳其所经历过的一党制政府，其独裁程度并不比过去奥斯曼帝国差多少，不过这个政府成功地唤起并集中了占这个国家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强烈民族感和纪律性。但阿塔图克的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拥护还是消极的承认，是很难讲的。主要的情况是，它毫不含糊是土耳其人的，撵走了外来入侵者，并使国内的少数外国商业巨头在政治上俯首帖耳。虽然土耳其军队还无法应付一场机械化战争，但是在捍卫国土顽强抗敌方面却早已闻名，再加土耳其国内的交通线漫长，质量又差。这些情况加在一起将使任何一个交战国在发动入侵土耳其以前都会趑趄不前，要先考虑能否使用外交手段来至少达到一部分目的，或能否通过一种更间接的渠道来达到其他部分目的。土耳其政府方面则意识到自基马尔革命以来，他们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现代化国家机构时所经历过的艰难痛苦，因而希望不惜任何代价都要保住这个国家机构，不使毁于战火。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使它对强权政治极不信任，虽然他们准备以结盟的方式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他们还是煞费苦心地为自已保留了某种例外条款，以防万一今后出现因缔约而必须承担的义务同国家利益相抵触的事情。他们具有地中海东部民族的那种本领：善于进行长期的讨价还价、善于寻找一些多少说得过去的借口来避免采取不适当的行动，和善于雄辩他说服谈话对手为其想象的自身利益着想，借以转移给他们造成强大压力的争议。

1935—1936年意大利—阿比西尼亚战争的结果，使得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继承了昔日英国的地位成为土耳其共和国最害怕的一个强国。德国并吞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使作为巴尔干协约国成员的土耳其政府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但在1939年上半年，土耳其一直相信西方大国和苏联的结盟，将会保护它的南、北侧翼不致遭到轴心国的侵略，而早在1921年，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就和苏联签署了第一个友好条约。然而，由于1939年8月德、苏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使得土耳其有面临这种左右为难局面的可能，即根据1939年5月和6月的互助声明（土耳其现正准备将这声明改为正式互助条约），土耳其对英、法所承担的义务可能使它卷入与那可怕的北邻对垒的战争。9月，土耳其外交部长萨拉若卢访问了莫斯科，希望同莫洛托夫对即将签订的英、法、土条约取得一致意见，但毫无成果，10月19日，土耳其外长回到安卡拉两天后，英、法、土签署了互助条约。“二号议定书”使土耳其避免

有关里宾特洛甫对土耳其这些策略的不耐烦情绪，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446—447页。

见《概览，1920—1923年》，第370—372页。

有关细节见《概览，1939—1946年：大战前夕，1939年》，第2编，第6章，第1节，第2节。

《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444—445页。

了采取任何估计会同苏联发生冲突的行动。在其他方面，一旦因一个欧洲国家的侵略而发生了地中海地区战争，一旦因英、法给予希腊和罗马尼亚的保证而引起了一场战争，或者一旦欧洲对土耳其采取侵略行动，则土耳其和两个欧洲大国就保证相互给予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

第二节轴心国胜利初期 土耳其的政策

在1939年冬天至1940年期间，土耳其政府首先关心的是试图加强巴尔干协约。在协约国年度会议上（1940年2月2—4日），萨拉若卢提议四个成员国的总参谋部应准备一个共同防务计划；但或许由于南斯拉夫的暧昧态度，此事毫无进展。土耳其和意大利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些改善，土耳其政府急欲避免卷入英、法计划对巴尔干半岛及（或）对俄罗斯的高加索油田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土耳其参谋长就这方面问题向在1940年2月和3月前来参加英、法、土谈判的英国地中海总司令表达了他的意见，即土耳其主要关心的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保持中立，并决心无论如何不受别国的“管束和指挥”。

5月，德国的进攻突破盟国防线以后，土耳其首相于6月2日就对外政策发表了一项重要声明，但该声明只字不提同英、法的条约问题。两天后，一年前被称为“著名反意大利”的《黎明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说，假如交战国意大利把它的战斗行动限制在法国边境，那么，巴尔干地区和东地中海（土耳其的“安全区”）则仍可能保持中立。只是在意大利对西欧盟国宣战后的第三天，土耳其报刊才开始对此客观而不作表态地加以评论。6月13日，英、法大使按照约十天前接到的指示开始行事，他们拜访了萨拉若卢，要求他至少与意大利断交，给予盟国陆、海军以各种便利，并关闭海峡，禁止轴心国船只通行。但是，土耳其外交部长因已接到来自土耳其驻巴黎大使的情报（就在当天巴黎被宣布为开放城市），或许比英、法的来访者更清楚地掌握了这一时期在西方战场发生的灾难348程度。英、法两国政府实在无力供给土耳其以既能满足其需要又能符合其愿望的足够的军事装备，而目前土耳其若严格履行它对英、法承担的条约义务，那就将使它自己遭受轴心国经巴尔干进

英国外交部：《联合王国……法兰西共和国……和土耳其共和国互助条约，1939年10月19日于安卡拉》（Treaty of Mutual Assistance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French Republic, and the Turkish Republic, Ankara, October 19, 1939），敕令第6165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0年版）；参阅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1节，第272页，第275页。有关条约的谈判和条款，另见《概览，1939—1946年：大战前夕，1939年》，第2编，第6章，第4节。

关于在大战爆发前六个月期间扩大和加强巴尔干协议企图的失败，见《概览，1939—1946年：大战前夕，1939年》，第2编，第6章，第3节。

格里戈尔·加芬库：《俄罗斯战役的序幕》（Grigore Gafencu：Prelude to the Russian Campaign），E·弗莱彻·艾伦译〔根据法文原著（Les Préliminaires de la guerre à l'est），1944年于弗里堡出版〕，伦敦，马勒，1945年版，第277页；杰瓦特·阿奇卡林：“土耳其的国际关系”（Cevat Acikalın：“Turkey’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国际事务》，1947年10月，第23卷，第482页；参阅亚历山大·帕帕戈斯将军：《希腊之战，1940—1941年》（General Alexander Papagos：The Battle of Greece, 1940—1941），雅典，斯卡齐基斯，1949年版，第120—139页。

见海军元帅海因德霍普的坎宁安子爵：《一个水兵的漂流记》（Admiral of the Fleet Viscount Cuningham of Hyndhope：A Sailor’s Odyssey），伦敦，哈钦森，1951年版，第212—215页，第218页，第221—223页。参阅《概览，1936—1946年：战时中东》，第446—447页。

犯的风险。依据 1929 年签署的土苏友好条约，土耳其政府不经苏联同意就不得与第三国达成政治协议，因此，他们就其采取的这一立场向俄国人征求意见；但是莫洛托夫的答复是那样“否定的和实在咄咄逼人的”，以致土耳其人决定以 1939 年 10 月英法土条约中的第二号议定书作护身符，俾使他们得免于采取可能与苏联树敌的行动并从而保持其非交战国地位。最后，土耳其总理勒菲克·萨伊达姆于 6 月 26 日宣布了这一政策；7 月 11 日英国外交大臣在上院发表了一项声明，表明伦敦方面不会见怪土耳其拒绝参战的决定。（哈利法克斯勋爵说）英王陛下政府完全了解导致土耳其政府做出这一决定的环境。……同时，我们与土耳其的条约仍旧存在着，而这一条约以之作为基础的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同情也仍旧存在着，这种友谊和同情使这个条约过去是，今后也仍将是我们之间进行建设性合作的有益的基础，不论在战争继续下去时期内，还是在未来的和平岁月里都是如此。

1940 年 10 月 28 日意大利进攻希腊，几乎将战火烧到了土耳其的“安全区”；但是，英国政府马上意识到，现在要求土耳其根据 1939 年 5 月和 6 月声明和同年 10 月的采约履行诺言，并以交战国身份参战，不会有多少好处，或根本没有好处。土耳其无法在不放弃它自己防务的情况下（西欧各国迄今还未能对加强土耳其的防务有所作为），派出一支远征军到希腊，甚至即使能够这样做，英国海军也无法为其提供必要的支援。因此，英国政府决定不要求土耳其采取行动，直到它能给土耳其更多的援助，而要它尽可能在不招致被攻击的危险下保持善意的中立。土耳其确曾帮助过希腊，保证它能够安全地从色雷斯东部边界撤回其军队，并担保如果保加利亚侵犯希腊，它将给予支援。希腊战争爆发后不久，土耳其就向英国大使纳奇布尔-休格森重申了这些保证，这时，英国和土耳其政府都相互发表了忠于 1939 年 10 月条约的声明。11 月 26 日丘吉尔通知他的外交大臣说：“如果德军越过保加利亚，不管是否得到保加利亚军队的协助，土耳其必须在当时当地加以抵抗，这是至关重要的”；但到了 1941 年 1 月底，他才明白……土耳其的处境已是多么危急。……他们没有任何一种现代化武器，而自 1940 年 5 月起这些现代化武器就证明是起决定性作用的。空军也极为落后脆弱得可怜。他们既没有坦克或装甲车辆，又没有制造和供应武器的军火工厂，更缺乏训练有素的人员和官兵使用这些武器。他们几乎没有任何高射炮或反坦克炮。他们的报警系统也十分落后，对雷达一窍不通。他们也缺乏包括接受所有这些现代

上院辩论，第 5 辑，第 116 卷，第 889 栏。

自从意大利参战以来，土耳其的军队已养精蓄锐全部动员，据保加利亚政府于 1940 年年底的估计，在色雷斯东部土耳其驻有 28 个师（赫尔穆特·格赖纳：《国防军的最高指挥，1939—1943 年》（Helmuth Greiner：Die oberste Wehrmachtführung，1939—1943），威士巴登，莱姆斯出版社，1951 年版，第 247 页）。

纳奇布尔-休格森：《和平与战时外交家》，第 167—168 页。11 月 4 日里宾特洛甫和冯·巴本向齐亚诺担保说，土耳其和英国之间的关系正在削弱：一旦通过即将到来的莫洛托夫对柏林的访问，在轴心国和苏联之间达成了协议，那时就能对土耳其施加压力，以便将它拉到轴心国一边来（齐亚诺《欧洲》，第 610—611 页；英译本，第 406—407 页）。德国海军参谋部 11 月 14 日表示意见说，尽管存在种种困难，但取道土耳其进攻是难以避免的；然而希特勒在 4 日却声称：“他并不打算为了达到从东面经叙利亚至苏伊士运河取得突破的目的而对土耳其采取行动，这将是一场漫长持久的战役，并将遇到很大的困难”（《元首会议，1940 年》，第 105 页，第 113 页，第 129 页）；参阅弗朗茨·冯·巴本：《回忆录》，伦敦，安德烈·多伊奇，1952 年版，第 470—471 页。

发展的能力的军事素养。另一方面，德国却把从法国和低地国家缴获到的大量各式各样武器大规模地武装了保加利亚。……在这种情况下，与保加利亚军队相比，色雷斯的土耳其军队处于一种严重的、几乎是绝望的劣势地位。

英国大使一直在对土耳其施加压力，要它设法阻止保加利亚完全投靠德国阵营，土耳其政府要他放心，它已向索非亚提出适当的警告。德国人于1941年1月和2月上旬得到报告说，一旦发现德国有进攻希腊的最早迹象，土耳其就准备参战；但也接到有关土耳其同保加利亚举行会谈表明其不愿卷入的报告。这些会谈的结果，他们于2月17日缔结了一项土保互不侵犯条约。从英国人350看来，这是一件令人“大失所望”的事。

英国外交大臣和帝国总参谋长于1941年2月26日至3月1日访问了安卡拉，他们一致认为英国在目前既无法弥补装备不足，就不能要求土耳其采取军事步骤；但是土耳其首脑们保证，如果他们遭到攻击，或在某一适当的时候，他们将参战；英国拚命企图阻止面临的德国的南进，他们希望一个坚定的土耳其政治和外交立场可能还有某种效果。同时，土耳其对德军进入保加利亚（德军于3月1日侵入）的可能反应引起了德国驻土耳其大使冯·巴本和武官的关注；正是出于他俩的动议，希特勒于3月4日写给土耳其总统伊诺努一封私人信件，向他保证德国对土耳其没有侵略意图，并担保保加利亚境内的德军将与土耳其边界保持六十公里的距离。3月中旬，伊诺努总统的复函坚定了希特勒这一信念，即他可以在4月6日开始进攻南斯拉夫和希腊而不用提防土耳其。结果，土耳其政府明确表示它无意进行干预，并且将它同希腊和巴尔干半岛联结起来的跨越在马里查河上的铁路桥梁炸毁，作为一项预防措施。

土耳其的政治家对希特勒进攻俄罗斯的打算还一无所知，他们同样不知道他们至少可以有几个月的喘息时间。对土耳其来说，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它的欧洲部分以及西部整个（包括两个主要的商业城市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海岸线，都受到了来自被轴心国所占领的巴尔干本土和（希腊陷落后）南至多德卡尼斯群岛的爱琴群岛近在咫尺的威胁，外交部秘书长努曼·梅内门吉奥卢当时告诉英国大使说，他正“绞尽脑汁想知道土耳其怎样才能撑持到秋天”。

出于这种种忧虑，土耳其总统向冯·巴本建议说，假351如德国能提出

丘吉尔，第2卷，第484页；第3卷，第32—33页；美国版，第2卷，第547页；第3卷，第36页。

纳奇布尔-休格森：《和平与战时外交家》，第159—160页；格赖纳：《国防军的最高指挥，1989—1943年》，第252—253页，第262页。

应英国之请，土耳其政府向贝尔格莱德的茨韦特科维奇政府提议，在巴尔干诸国受到严重威胁时采取联合行动，但是，由于南斯拉夫政府极力想保持中立，未能取得任何进展（见纳奇布尔-休格森，前引书：第159—160页；阿奇卡林：“土耳其的国际关系”，《国际事务》，1947年10月，第23卷，第483页；茨维持科维奇在《费加罗报》的文章，1950年4月4日）。

冯·巴本：《回忆录》，第471—473页；格赖纳，前引书，第260—262页；参阅《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第40号，第92页。

阿奇卡林，前引书，第484页。

有关德国在战败苏联后，德国向中东原包括土耳其在内推进的作战计划，见丘吉尔，第3卷，第490页；美国版，第3卷，第553页；《元首会议，1941年》，第91页；格赖纳，前引书，第392页注66。

纳奇布尔-休格森，前引书，第169页。

一些合理的条件，他愿意充当英、德之间的调解人。就在此时，冯·巴本已开始设法说服土耳其外交部同德国缔结一项友好条约。土耳其政府觉得根据1921年土法协议条款，它不得不允许在地中海东部各国的法国维希当局为了支持“伊拉克陆军在5月份同英国作战”而使用土耳其境内巴格达铁路的那一段运送军用物资。但与此同时，土耳其政府却继续将其与冯·巴本的谈判内容通知了英国大使，并抵制了里宾特洛甫的威胁利诱，要他们从拟议的土德条约中将有关他们对英国承担的现有条约义务部分删去。里宾特洛甫虽很恼火，但最终只得放弃这一点；土耳其政府向英国大使作了口头保证（他们不愿写在纸上），他们不会因为同德国于6月18日签订了友好条约而允许德军或军用物资通过土耳其国土。依据此有效期为十年的条约，两国保证互相尊重领土完整，避免相互间直接或间接的对抗和以和平方式解决影响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问题。对有利于英土现行条约所做的保留，意味着英土联盟是置于德土新约之上的。四天后德国进攻苏联，使土耳其稍松了一口气；紧接着，近6月底，当维希法国在抵抗英国—自由法国向地中海东部诸国的进攻中正节节溃败时，土耳其便拒绝允许维希的增援部队假道土耳其，而在一次英国飞机炸沉了一艘停泊在土耳其安塔勒亚港内的维希船只时，土耳其只提出一次正式抗议而已。

在战前，德国就已是土耳其的为军火工业所必需的铬和其他铁矿砂的主要主顾，也是土耳其其他各种原料如皮革、山羊毛、棉花、油脂和烟草等的主要主顾，德国作为交换条件供给土耳其以所需的轻工业和重工业制品。战争爆发以后，英、法与土耳其外交部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艰难的谈判，结果土耳其原来同德国的大部分贸易都转移到了英法一边，从而使英法共同垄断了土耳其的供出352口的剩余铬。德国和盟国之间争夺土耳其铬原料的情况已在前面叙述过了，但只是很有必要在这里叙述一下土耳其政府同德国经济专家克洛迪乌斯于1941年10月9日所签订的一项协议，按照该协议规定在1943年1月之前不得向德国运交铬矿，而且届时交货还要依以下这些条件办理，即德国必须首先交清战前有关军火供应合约中的短欠部分，并且以后还必须继续运交，保持与土耳其运交等价格的同样速度。土耳其还在1941年10月同意德国在伊斯肯德伦（亚历山大勒达）设立副领事馆，一个曾经在叙利亚为维希政权活动过的女间谍，就在那里迅速地展开了她在中东反盟国的活动。然而，总起来应该说是，尽管德国人能在土耳其保持的情报和宣传机

见《巴黎和会史》（A History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of Paris），H·w·V·坦普利编，共6卷（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英国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20—1924年版），第6卷，第33—35页和第53—54页。

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93页。

关于冯·巴本与里宾特洛甫之间就条约谈判来往的短笺，见《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1卷（土耳其），第1—9号；另见冯·巴本：《回忆录》，第477—479页；纳奇布尔-休格森：《和平与战时外交家》，第169—170页。

见上文，原著第30—31页，第81—86页。关于在1939年冬—1940年间冯·巴本就铬的供应与土耳其谈判所遇到困难的报告，见《德国外交文件》，第8卷，第339号，第366号，第390号，第512号，第625号，第674号。

参阅瓦尔特·博斯哈德（Walter Bosshard）在1941年10月29日《新齐尔克尔日报》（Neue Zürcher Zeitung）上所写的文章。

阿瑟·默顿（Arthur Merton）在1941年11月17日《每日电讯报》上的文章；利比亚陆军元帅威尔逊勋

构取得了相当大的战时宣传效果，但盟国在那儿的相应机构，虽没有象德国人的那么众目昭彰，实际上却是得到了土耳其当局的庇助而可能比它们的德国对手还略胜一筹。

第三节土耳其和德苏战争

自从大战爆发以来，我们就已看出，苏联同土耳其由于它们各自同德国和西欧国家签订了条约而处于两个敌对的阵营；虽然它们之间的关系因对德国进入巴尔干半岛共同感到忧虑而多少有所改善，但莫洛托夫—萨拉若卢 1939 年秋的会谈 重又提醒了土耳其对苏联凯觐海峡和外高加索的野心的疑虑，而这种疑虑以后一直没有减轻过。莫洛托夫对土耳其的态度以及不久后苏联对芬兰的入侵都是俄罗斯帝国扩张主义复活的征兆，而这种扩张主义奥斯曼帝国已领教过达两个多世纪之久，直到 1921 年在经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各自国内的革命而国力齐被削弱之后，土耳其共和国和苏联才共同携起手来，互相支持，以对付英、法帝国。1941 年 6 月间，德国方面由于它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进攻苏联前不久把土耳其拉到了它这一边，就它说来，这是一项十分有用的外交上的成 353 就。但那次，希特勒的广播讲话及其披露的上一年 11 月莫洛托夫提出的要求，却证实并加剧了土耳其对苏联的猜疑，因此自那以后的战争期间，虽然英、美大使居中不断斡旋，但土耳其对西方盟国一方面的态度同对苏联一方面的态度之间还是有明显的（若不是反复无常的）不一致。在对俄战争初期阶段，德国进展之迅速给土耳其的政治家们和一部分高级将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6 年蒙特勒公约授权赋予土耳其对通过海峡出入黑海的船只的控制权，很快就引起了摩擦。尽管德国没能在冬季来临之前打垮苏联红军，尽管德国人在“一月和二月将军们”手下遭到了损失（更不用说苏联的冬季反攻了），但在土耳其人看来，似乎在 1942 年大部分日子里，德国还有很大可能在东线赢得一场决定性胜利。因此，在这期间，土耳其的政治家和将军们鉴于德国可能获胜，就有兴趣谋求德国保证给予在苏联的二千余万操土耳其语的穆斯林以独立；这些人，土耳其的安那托利亚人（特别是泛土耳其主义的知识分子）把他们看作是骨肉兄弟。冯·巴本竭尽全力

爵：《海外八年，1939—1947 年》（Field Marshal Lord Wilson of Libya: Eight Years Overseas, 1939—1947），伦敦，哈钦森，1950 年版，第 123 页。

C.L. 苏兹贝格：“德国在中东的准备”（C.L. Sulzberger: “German Prepar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外交》季刊，1942 年 7 月，第 20 卷，第 673—674 页；塞思·阿瑟尼安：“在中东的战时宣传”（Seth Arsenian: “Wartime Propaganda in the Middle East”），《中东杂志》，1948 年 10 月，第 2 卷，第 425—427 页。

关于战时土苏关系较详细的记载，见《概览，1939—1946 年：战时中东》，第 443—466 页。

见上文，原著第 346 页。

克劳德·奥金莱克爵士将军（后为陆军元帅）：《中东的战斗，1941 年 7 月 5 日—1941 年 10 月 31 日》[General (after Field Marshal) Sir Claude Auchinleck: Oper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5 July 1941—31 October 1941]，《伦敦公报》增刊，1946 年 8 月 21 日，第 37695 号，第 14 段。

根据 1936 年蒙特勒公约第 4 款与第 19 款的规定 [《文件》（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在土耳其恪守中立的战争中，交战国的商船虽可以通过海峡，但交战国的军舰则禁止通过，除非是根据国联规章履行义务。可是蒙特勒公约所沿用的 1936 年伦敦海军条约有关军舰的定义，凡 100 吨以下的船只均不包括在内；由于土耳其检查员并不总是经常很警觉的，因此轴心国得以不时地把军舰或辅助舰伪装成商船溜过海峡，以致引起盟国特别是苏联向土耳其政府几次提出抗议。参阅 1946 年 8 月 8 日苏联照会和 8 月 22 日

《概览，1939—1946 年：战时中东》，第 460—461 页。

煽动土耳其政治家们对苏联的恐惧和怀疑；然而尽管德国大使在给柏林的报告中无疑是据实将土耳其表现出的强烈的反苏感情归因于土耳其的政治家们，但他从来没能从1942年8月13日继萨拉若卢后任外长的精明的努曼·梅内门吉奥卢那里，或从现任总理萨拉若卢本人那里获得任何肯定或积极的保证。相反，土耳其却以这样的声明来搪塞冯·巴本，即土耳其保持中立的必要性势必限制土耳其同它的合作，但若合作能被认作是代表土耳其的天然与合法的利益时，就将给这种合作以保证。里宾特洛甫被土耳其这些没完没了的遁词所激怒，于9月12日电告冯·巴本，德国对同土耳其政府进行对话不再感兴趣了。

假如土耳其政府对于东线战事（他们倾向于同情德国一方）仍持不介入态度的话，那么他们就用同样的、外表上注意平衡的姿态来保持“与英国结盟，同德国修好”。当一个土耳其高级官员代表团访问西部沙漠时，另一个在德国人指使下的代表团就访问了东线。新闻界旗帜鲜明地分成亲轴心国和亲盟国两派，并不偏不倚地向交战国双方都派出了新闻使团。当托卜鲁克陷落的消息传来时，伊诺努总统作出一副站在英国大使一边的样子；但是，据说接近1942年8月底，梅内门吉奥卢还曾对瑞士外交部长表示过他确信隆美尔将于深秋开始一路从埃及低地，另一路从塞浦路斯和叙利亚对苏伊士运河发动钳形攻势。

第四节在形势变为有利于盟国后的土耳其政策

现在已到了这一时刻，战争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首先是1942年10月在阿拉曼、紧接着就在斯大林格勒；土耳其舆论的调子也立即顺应这种趋势而改弦易辙了。55 与此同时，尽管土耳其格外谨慎小心，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引起德国怀疑其中立的公开行动，但是，在1942年间西方盟国已能帮土耳其修整港口、公路、铁路和安那托利亚的机场以及给它运进大量军用品

见《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1卷（土耳其），第10—35号。有关土耳其驻德大使在希特勒心中产生的极为良好印象，参阅亨利·皮克尔：《希特勒在元首大本营的餐前谈话，1941—1942年》（Henry Pickelt：Hitlers Tischgespräche im Führerhauptquartier 1941—42），波恩，阿特诺伊姆出版社，1951年版，第104—105页。

关于纳奇布尔-休格森欣赏努曼的才能，见《和平与战时外交家》，第201页。“（他写到）我还从未遇到一个人，具有比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更能当机立断的智力。”

《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前引书，第26号，第86页。第二天萨拉若卢亦是如此（同上书，第27号，第91—92页）。

同上书，第30号，第107—108页。

按照萨拉若卢和梅内门吉奥卢所作的解释（同上书，第29号）。

纳奇布尔-休格森，前引书，第179页。

1942年5月22日英国中东地区总司令声称，他“不能完全肯定”土耳其人的态度如何，但是丘吉尔在12月1日却说：“已无需再对土耳其会自愿为德国开辟一条道路的想法加以考虑了”（丘吉尔，第4卷，第807页；美国版，第4卷，第911页）。在12月1日同一天，土耳其总参谋部代总长在与德国武官的一次会谈中，也严肃地批评了德国的战略[《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前引文，第33号]参阅，德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12月9日的报告（同上书，第35号）[在电讯头上的“9月”是一个错误；参阅目录表，第13页]。

以加强它的力量，准备它可能投入战争。1942年11月，丘吉尔抱着使土耳其政府在来春参战的种种希望，哈里·霍普金斯于1943年1月19日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即注意到丘吉尔曾说，假如土耳其仍执迷不悟，他准备告诉他们除非他们参战，否则他不能答应在达达尼尔海峡问题上约束俄国。这时丘吉尔是急欲同伊诺努总统以及他的部长们举行一次会晤，但是丘吉尔在说服他的包括外交大臣在内的战时内阁阁员为召开这样一个会议已打下了充分基础时遇到了一些困难。丘吉尔提议，塞浦路斯是一个合适的会址，但由于伊诺努总统表示，按照宪法，他不能离开自己的国家，除非他的最后继承人已被指定，而且还要考虑保密问题，因而会址改在土耳其南部邻近阿达纳的地方。会议于1943年1月30—31日召开。会上萨拉若卢表示出对苏联今后政策所一贯怀有的忧虑，后来冯·巴本被告知说，伊诺努总统出于同样的担忧，已向丘吉尔提出是否有可能与冯·巴本讨论迅速结束战争的各种途径。经过这一系列的会谈，丘吉尔于2月2日告知斯大林说，他现在认为土耳其可能在年底前参战，并且在这以前，土耳其可能会答应英、美袭击普洛耶什蒂油田的轰炸机在其境内加油。__阿达纳会议结果，规定英国必须尽可能快地提供给356土耳其军队以一年的军火储备并为防卫土耳其的一些薄弱环节拨给它一支英国战斗机空军和一部分受土耳其指挥的反坦克和空防部队。英国中东地区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奉命先后访问了安卡拉以进行更具体的会谈；可是，当英、土陆军参谋人员2月26日开始对话时，土耳其对它在战争中军用或民用的需要都表示“无法或不愿”提供任何可靠的估计。他们保持缄默的一个原因，是土耳其政府就约在这时从冯·巴本那里已获得了希特勒关于德国对土耳其没有侵略意图的再次保证，对此，土耳其显然答复说他们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会向德宣战。5月5日，当冯·巴本带着更多的信息从德国返回土耳其时，英国谈判人员正遇到一些相当棘手的困难。土耳其人争辩说，德国的夏季战役可能象进攻苏联那样，是针对它的，英国则猜测德国

克劳德·奥金莱克爵士将军（后为陆军元帅）：《中东的战斗，191年11月1日—1942年8月15日》，《伦敦公报》增刊，1948年1月15日，第38177期，第323页；丘吉尔，第4卷，第768页，第769—770页，第788页；美国版，第4卷，第860页，第861页，第892页。关于土耳其对美国大使感到满意的表示，参阅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553页；英国版，第2卷，第557页；另一方面，土耳其在与德国或中立国对话时发现，还是尽量少提美援的重要意义为妙[参阅《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1卷（土耳其），第26号，第87页；第29号，第98页；第31号]。

丘吉尔，第4卷，第623—626页；美国版，第696—699页。

见《概览，1936—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266—273页。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683页；英国版，第2卷，第680页。

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272—273页。另见纳奇布尔-休格森：《和平与战时外交家》，第188—190页。

丘吉尔，第4卷，第626—629页，第635—636页；美国版，第4卷，第700—703页，第709—711页；冯·巴本：《回忆录》，第494—495页。

见H·梅特兰·威尔逊将军（后为利比亚陆军元帅威尔逊勋爵）：《1943年2月16日至1944年1月8日的中东战役》，《伦敦公报》增刊，1946年11月12日，第37786号，第285—298段；以及同一作者的《海外八年》，第155—158页。

关于土耳其政府军在3月初向德国建议如派遣一个合适的代表或许可能在土耳其与纽约的红衣主教斯佩尔曼交换意见一事，见冯·巴本：《回忆录》，第495页；另见同上书，第499—500页。

可能曾以飞机轰炸威胁土耳其，而如果是针对拥有多语种居民的，又大都是木建房屋的伊斯坦布尔，或针对土耳其唯一的宗古尔达克煤矿进行轰炸的话，那将是一场大灾难。因此当艾登 5 月 31 日参加阿尔及尔会议期间，他确信只要盟国一旦能对巴尔干半岛构成一种紧急的威胁，土耳其的态度马上就会好转。但土耳其总参谋部却对英国关于在阿菲翁—卡拉希萨尔（距离伊斯坦布尔以南和伊兹密尔以东一百九十英里，要由地中海的摩西港和伊斯肯德伦港口提供补给）建立前哨基地的提议，从 6 月上旬拖至 8 月，方予答复，而且最终达成的协议还受下述条件的限制，即该工事必须伪装成商业建筑物，并须由土耳其工人建造，除现有的英国监理人员外，不得增加。

1943 年 9 月下半月，当英国在没有获得盟军地中海地区总司令艾森豪威尔的物资支援助情况下，发起了夺取多德卡尼斯群岛的进攻时，土耳其人允许英国动用 357 其一直在土耳其境内积累起来的军需品堆栈来补给多德卡尼斯群岛上的守备部队。在莫斯科召开的“三巨头”外长会议上（1943 年 10 月 18 日—11 月 2 日）又带来了一个新的因素，因为当时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想要盟国“命令”土耳其立即参战，以牵制德军而便于苏军在东线挺进。但英国眼下主要关心的是想获得土耳其空军基地的使用权，以便给予多德卡尼斯群岛上的英国阵地以空军战斗机掩护，由于德国在当地拥有的空中优势，英国的这个阵地正变得愈来愈岌岌可危，莫斯科会议最终一致同意：艾登应要求土耳其允许其立即使用它的空军基地，英、苏两国并将在晚些时候一起“建议”土耳其在 1943 年底参战。艾登邀请梅内门吉奥卢于 1943 年 11 月 4 日至 6 日在开罗同他本人和纳奇布尔-休格森一起进行商讨，梅内门吉奥卢接受了这一邀请，但在会上梅内门吉奥卢强烈拒绝考虑孤立地使用空军基地；如果土耳其卷入战斗，那就必须给它一项明确的任务，而且还须澄清一些政治和军事上的问题。在梅内门吉奥卢回安卡拉向政府汇报会议情况时，他似乎曾对冯·巴本强调过英国正在向他施加巨大压力，要土耳其断绝同轴心国的所有商务关系。然而，到 11 月 17 日，当土耳其政府和议会研究了英国的要求之后，德军已经迫使多德卡尼斯群岛的科斯岛和勒罗斯岛上的英国守军投降了，萨摩斯岛和其他一些小岛上的英军也被迫撤退。英国就在土耳其家门口遭到的这一挫折不能不进一步打消土耳其政府参战的念头。因此，他们在答复英国的要求时所提出的苛刻条件是：坚持英国须提供土耳其

纳奇布尔-休格森：《和平与成时外交家》，第 182—192 页。

见《概览，1939—1946 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 284—285 页。

丘吉尔，第 4 卷，第 738—739 页；美国版，第 4 卷，第 826 页。

威尔逊，前引文。

《概览，1939—1946 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 312—313 页

他们还允许英国用火车将军需品从叙利亚运到萨摩斯岛对面的土耳其库沙达西港，并在晚些时候还同意从萨摩斯岛上撤退的英军和希腊老百姓通过土耳其（威尔逊：《1943 年 2 月 16 日至 1944 年 1 月 8 日的中东战役》，第 213—247 段）。

《概览，1939—1946 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 328—335 页。

丘吉尔，第 5 卷，第 265—266 页；美国版，第 5 卷，第 298 页。

纳奇布尔-休格森：《和平与战时外交家》，第 194—195 页；丘吉尔，第 5 卷，第 346—347 页；美国版，第 5 卷，第 392—393 页。

冯·巴本：《回忆录》，第 506—507 页。

其充分的防御工具以防止德国的大规模进攻，并要为它在巴尔干半岛进行军事合作制定某种方案（最近土耳其的时事评论员一直就在鼓吹重新创建一个更强有力的巴尔干半岛协约国组织来维护各成员国的独立，防止外部的侵略或分裂性渗透）。这时，梅内门吉奥卢似乎还暗示，只有当盟国预期在西欧的登陆实现后两星期并被证实已告成功时，土耳其才可能参战。

在德黑兰会议上（1943年11月28日—12月1日），斯大林联合罗斯福一起反对丘吉尔的主张，坚持要优先在西欧发动进攻，而以在东地中海的战役为辅或干脆予以排除。不过这种想法，当在会议期间伊诺努总统被邀到开罗同罗斯福和丘吉尔会晤时，并没有让土耳其政府知道。和上次召开阿达纳会议之前的情况不同，这一次会晤他并未表示总统出国要受到宪法上的限制；下面这件事或许很能说明土耳其政府的神经过敏：因为就在12月2日，土耳其使团动身去开罗的前一天，美、英驻土耳其大使被告知说土耳其政府决定释放关押在安那托利亚东部拘留营中的一千五百名囚犯，这些囚犯几乎都是基督教徒和犹太人，他们因为逃避缴付国家向他们征收过重的资本税而被送到那里服苦役。从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人的“友谊竞赛”，竞相派出私人飞机去接伊诺努和梅内门吉奥卢到开罗开会这一点上，就可看出在土耳其参战问题上英、美两国的政策分歧。当丘吉尔在会议期间（12月4—6日）继续极力对土耳其施加压力，要它在巴尔干未来的对德战斗中与英国更加紧密合作的当儿，根据官方记录，罗斯福却在一次讲话中说，土耳其政治家们不愿被别人弄得措手不及，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土耳其仍然怀疑英国仅仅是想利用它的国土，而没有充分考虑过其可能给土耳其带来的后果。当会谈似乎已陷入僵局时，丘吉尔本人单独和两位土耳其政治家举行了另一次会议，最终商定由土耳其在使用空军基地问题上迅即作出决定。双方同意，在土耳其政府作出决定以前，在机场应做好包括装置防空雷达在内的各项准备工作；双方还同意应制定一项共同作战计划，并对土耳其作为交战国参战后一般政治上的影响问题进行研究。

与此同时，由于窃取到了安卡拉英国大使馆的文件，冯·巴本对英国人的谈判情况已心中有数，他警告梅内门吉奥卢，如果土耳其依顺英国的要求的话，将“不可避免地招致德国的报复”，而这种报复“最起码的后果将是”

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的“彻底毁灭”。他扬言还知道土耳其政府12月12日给英国的答复，内容大意是由于“给土耳其军队供应的物资根本不够用”，因此他们不能承担义务。为了防止德国空袭土耳其的薄弱地区，英国提出，在安纳托利亚西部建立十八个英国皇家空军中队和十个防空团，1943年12月28日，中东司令部又派出了一个军事使团赴安卡拉，讨论在土耳其实际参战前，使这批英军的大部分进入土耳其的问题；考虑有必要这样做，

纳奇布尔—休格森，前引文，第196—197页；并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457—458页。

在冯·巴本：《回忆录》第512—513页中，他诡诈地引用了纳奇布尔—休格森发给外交部的一份电文。德国驻安卡拉大使通过安插在纳奇布尔—休格森处当仆人的德国间谍之手，开始获得英国大使来往信函的影印本[见L.C.莫于希施：《西塞罗行动计划》（L.C.Moyzisch：OperationCicero），伦敦，温盖特，1950年版，和欧内斯特·贝文的发言，1950年10月18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78卷，第2025—2026栏]。

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353—354页。

丘吉尔，第5卷，第367页；美国版，第5卷，第415页。

是鉴于土耳其的漫长交通线。但是，土耳其人继续利用美、英之间在土耳其合作的重要性方面的意见分歧。他们要求英国加派一倍的皇家空军中队，并要求获得大量武器装备，据估计，就算能办得到的话，这些装备从英国运到土耳其，也将需要四个月时间。1944年1月，谈判陷入僵局，这时，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可能建议过“最好是中断360谈判并断绝友好关系”，对此艾登回答说，此刻不能采取这一步骤，而必须“尽量把这一件难办的事办好”。

英国陆、空军代表团于1944年2月3日离开土耳其。《泰晤士报》驻安卡拉记者9日报道说，盟国中的一些方面近来已开始怀疑，土耳其的这些辩解和要求是否仅仅是“玩弄手法，以逃避”英土联盟所规定的各项义务，与此同时，一位尽职的土耳其新闻记者艾哈迈德·埃明·亚尔曼连忙驳斥说，英国运交土耳其的军火大大低于他们所答应数字，而且，有些是有缺点的；而当3月1日宣布英、美已停止向土耳其供应军火的消息时，一位未来的土耳其外交部长写道：“好象他们以为土耳其为了得到区区几便士的军火就可以指望它会在某一时刻将自己的手脚都捆绑起来，跳入火坑内。……英国难道竟设想土耳其也会扮演它的印度和非洲雇佣军的角色吗？”人们将回想起，根据1941年10月9日克洛迪乌斯协议的规定，德国在履行了向土耳其提供军火的保证情况下，就应从1943年1月15日起自土耳其获得相应比例的铬的供应。德国曾想方设法来履行它在合同中一方的义务，并提供给土耳其一亿马克的补充信贷用来购置军用品。1941年希腊陷落后，由于恐慌而被土耳其炸毁的横跨马里查河通往保加利亚的铁路桥梁，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得到了修复，并于1943年间通车，德国还供给土耳其一些机车和车皮，以便利商品交换。因而到1944年2月底，德国获得了将近六万二千吨的铬，而且交货数量实际上还在增加。关于英、美政府阻止这种交易采取的步骤，已在前面一章里叙述过了。1944年4月14日英、美大使分别递交给土耳其内容相同的照会，警告他们除非停止对德国战略物资的供应（除了铬之外还包括棉361花、铜和铬黄），否则将实行封锁，土耳其政府这时终于屈服了。两

见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70页。

威尔逊：《1943年2月16日至1944年1月8日的中东战役》，第303—314段；参阅同一作者的《海外八年》，第187页。

根据冯·巴本所述，以“西塞罗”文件为依据（《回忆录》，第516页，并参阅第514页），虽然他的记述看来把英国大使在1943年12月置于无法忍受的地位。冯·巴本还将1944年1月中旬土耳其总参谋长费弗齐·查克马克元帅的退休归因于英国的压力（第519—520页）。

《祖国报》（Vatan），1944年2月11日。另一方面，威尔逊将军于1944年2月11日声称，自阿达纳协议签订以来，除了给土耳其三十三万吨货物供其军用和民用之外，中东司令部还运送给它一千三百辆汽车、三百辆坦克、二千三百门大炮以及十万零八千吨补给品；或许土耳其的运输工具无法运输他们所需要的那个数量（《1943年2月16日至1944年1月8日中东的战役》，第308—312段）。

内吉梅丁·萨达克，于1944年3月2日的《晚报》（Aksam）。

见上文，原著第31页，第82页。

1944年4月8日的《泰晤士报》，4月11日的《曼彻斯特卫报》；议会问题，1944年4月18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99卷，第7—8栏）。很难抹煞这种印象，即为了最终防范苏联，土耳其首先是想获得军火，不管其来自什么地方

见上文，原著第82—86页，

据6月11日的报道，德土贸易谈判已达成一项协议，规定将土耳其对德国的铜、棉花、油菜籽和皮革制

天后土耳其政府答复说，他们将在“他们物质资源的可能范围内”协助他们的盟友；但是到了20日，梅内门吉奥卢出人意外地宣布，立即全面中止对轴心国出口铬矿。

土耳其政府现在似乎才意识到了，部分由于苏联巧妙地利用西方盟国之间的意见分歧，从而把盟国从巴尔干地区引开，部分由于土耳其人缺乏胆量采取更有信心的机会主义以取得更大的好处，土耳其实际上就象任何其他中立国一样陷于孤立，在这种困境下，土耳其政府始于5月间试图同他们可怕的邻邦苏联修好，但是碰了一鼻子的灰。

6月初，由于十二艘德国舰只通过海峡自黑海驶往爱琴海（这些船只通过海峡时被解除了轻型武装，事后可以重新装备起来），英土之间又发生了新的摩擦。英国政府认为，由于有关的两种船上具有这种装备，这种船只就应被看作为战舰或辅助舰，根据1936年蒙特勒公约第十九款的规定，此类船只只是禁止通行的。可是，当英国驻土耳其大使抗议土耳其当局只是“草率检查敷衍了事”

时，土耳其政府坚持声称，经过检查他们不能证明这些船只不是商船。因为估计到会有更多的这种德国舰只将通过海峡，英国大使于6月9日进一步就此事提出抗议，指出：“英国政府对于土耳其政府帮助德国政府进行这种明显的军事调动一事深感不安。”伊诺努总统答应重新调查这一整个事件。

土耳其内阁大部分成员主张要对英国让步，但外交部长梅内门吉奥卢似乎曾争辩说，依照蒙特勒公约，这些船只只是准许通过的，他似乎还反对作出任何会在今后用那个条约来贬低土耳其威信的让步。6月15日，梅内门吉奥卢辞职，由萨拉若卢担任临时外交部长。

第五节 土耳其参战

如今第二战场既已开辟，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遂于1944年6月23日要求美国支持它一起来迫使土耳其完全断绝同德国的外交以及经济关系。土耳其政府这时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进行讨价还价，作为与德国断绝关系交换条件，它要求英、美不仅保证为土耳其出口剩余物资提供市场并给它供应必需的进口物资，而且还要求作为一个同等盟邦在和平会议上占一席位。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已获知英国的建议，于是抗议说，这不符合前几年达成的促

品的出口量比前一年减少了一半（《每日电讯报》，1944年6月12日）。

他在议会的发言确是煞费苦心地想“挽回面子”：“1941年底，德国要求享有和英国同样的特权，从而可从土耳其的中立中得到好处。……一个交战国照会一个中立国，要求它不得将这种或那种原料卖给某一国家，这种作法可能会引起有关中立国家的主权问题，并可能引起许多争论。但按照我们在1939年奉行的而且至今仍在贯彻的政策，以及根据我们1939年同英国签署的条约，我们并不是一个中立国家。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把盟国的照会视作不是给一个中立国的，而是给英国及其盟国的一个盟友的”（《泰晤士报》，1944年4月21日）。亚尔曼机敏地附和了梅内门吉奥卢的说法，他写道（《祖国报》，1944年4月21日），土耳其对德国出口铬矿一向是经盟国同意的；“然而，一旦盟国——土耳其的盟友——改变念头并认为铬矿是一种将会刺透盟国士兵心脏的武器，那么对土耳其来说，只有采取一个步骤的可能——就是断绝供应。”

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450—451页。

参阅上文，原著第353页注（即本书第559页注——译者）。

艾登在下院的发言，1915年6月14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00卷，第1986—1988栏）；参阅冯·巴本的报告（《回忆录》，第526—527页）。

使土耳其参战的“三巨头”协议的精神。美国国务院建议，设法明确规定土耳其对德断交仅仅是朝着实际参战迈出的第一步，以此来同苏联政府和解。另一方面，英国则觉得，这样做只会引起关于军事援助问题的没完没了的争论，它建议改为只对土耳其在和平会议上的地位以及给它的经济、军事援助方面作出某些一般性的保证。虽然美国为使苏联赞同他们关于土耳其走向参战前应首先采取断交这一步骤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努力，但是俄国人对这种折衷办法仍然坚决反对，此后，他们对土耳其采取了其独自的政策。1944年8月2日，土耳其国民议会作出决议，与德国断交；但是，冯·巴本声称，在他前一天最后与伊诺努总统会晤时，总统最后提出的建议是由他在这场国际争端中充当调解人。

土耳其新闻界煞费苦心地辩解说，政府是自愿作出这一决定的，并没有任何来自盟国方面的压力，而且除非遭到攻击，土耳其仍将不参战。确实，土耳其政府整整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来下令德国的银行和保险公司清理他们的业务，而且经过美、英政府的一再要求，才使得土耳其在1945年1月6日与日本断绝外交和商务关系。在此时期，苏联红军巩固了它在巴尔干半岛东部各个国家的阵脚，且在1944年12月，共产党又试图在希腊夺取政权，这就促使土耳其新闻界更加极力主张要忠于同英国的联盟和美国的友谊。著名的新闻记者侯赛因·贾希特·亚尔钦写道：

土耳其认为，如果它摒弃英国的友谊和支持，它就将丧失它的独立；但是同样，如果英国中断了它同土耳其的紧密友好关系，它就将失去其在中东的地位。……土耳其在1941—1942年曾坚如磐石般地在纳粹的波涛中砥柱中流，从而拯救了叙利亚、埃及和伊拉克。今天，土耳其准备一如既往，以同样坚强不屈的精神来抵抗目前威胁地中海地区的“托洛茨基”运动。面临这种危险，英国和土耳其必须同生死、共存亡。亚尔钦曾在以前但错误地宣称盟国已决定土耳其应参加和平会议；但是，1945年2月20日，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向土耳其外长转达了“三巨头”最近在雅尔塔作出的决定，只有那些在3月1日以前对轴心国宣过战的国家将被邀请参加即将召开的旧金山会议，讨论未来的世界性组织。一直要休会到3月5日的土耳其议会，为此于2月23日召开了特别会议，会上一致同意政府向轴心国宣战的决议。

第六节战时土耳其政策的得失分析

土耳其实际上一直到战争结束都在不断抵制着要它参战的压力，就象一小块坚硬的物质抵制着周围使它分解和被吸收的一系列活动力量一样。它的这样坚定不屈之所以获得成功是由于这一事实，即虽然轴心国和英美集团都欢迎土耳其加入自己的一方参战，但是想得到它的帮助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而当各交战国所有的资源都被完全用到更重要的战线上去的时候，这种代价无论是哪一方都是无法付出的；土耳其政府非常精明，每当它被轴心国或盟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72—1376页。

冯·巴本：《回忆录》，第527页。

见《概览，1939—1946年：欧洲的重组》，第393—399页。

《黎明报》，1945年1月25日。丘吉尔直接就把希腊的共产主义分子称之为“托洛茨基分子”（1945年1月18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07卷，第405栏）。

《新闻报》（Haber），1944年11月21日。

《概览，1939—1948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554页。

国压得透不过气时，它就不时作出一些权宜性的让步。不论从整个地中海到土耳其自己的国界这个范围来说，土耳其政府都逐步压缩了他们在 1939 年 10 月三国条约中所承担的义务，在这方面他们并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英勇豪迈的气概；然而这样做至少是现实的。

1941 年 4 月，土耳其未能按照巴尔干协约国公约兑现他 364 们的保证，在希腊遭到保加利亚的侵袭时，要给它援助：不过在那个多灾多难的春天里，土耳其对加强巴尔干协约，使之成为抵挡德国的一个有效壁垒这一前景所作的判断则比英国政府更为冷静，它不顾一切地竭力制造某种障碍，俾能遏止预料中的德军进入中东，而无需要有足够的英国军队来使中了催眠术的巴尔干各中立国放心。希腊陷落后，英国政府就不得不两害取其轻而接受土耳其继续保持其中立及同德国的友好条约。但是，土耳其人并无意再对德国人作出任何超过不可避免的最低让步。一旦德国对苏联的入侵给了土耳其以暂时喘息的机会，它就开始向两个大国集团都争取达成有利的交易。它以提供（或答应提供）战略原料和给予（或答应给予）政治上的优待来换取二大集团的军火和其他重、轻工业制品。分析一下，实际上可以肯定，在土耳其以外，英国正是这一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因为在英、美和轴心国之间，土耳其政府一贯是偏爱前者（在当时有利于土耳其的范围内），但是，英—苏联盟使得这个相对来说很简单的推断复杂化了，因为在签订纳粹—苏联互不侵犯条约的二十二个月时间里，毋庸置疑，苏联的政策唤醒了土耳其对苏联传统的、而且是潜在着的疑虑。自 1941 年以来，冯·巴本就一直充分利用了这种怀疑的心理；而且，由于德国相信苏联的溃败实际上已成定局，所以为了在土耳其建立起亲德反苏的感情，它谋求唤起土耳其政治和军事统治者对“解放”在苏联二千万操土耳其语的穆斯林的兴趣。而且，正如这种迹象的趋势所表明的那样，如果苏方的代理人——不论是哪一级的，——真正牵涉到 1942 年 2 月企图炸死冯·巴本的流产事件中去的的话，那么，土耳其政府就又多一条理由，宁可纵容德国外交官的各种活动，也比似乎是苏联大使馆常客所策动的使他们卷入到战火中的企图为好。但是，在这整个危急的一年里，土耳其避免了对德国作出任何明确的保证，而且直到阿拉曼和斯大林格勒的局势转变时为止，土耳其的这种小心谨慎政策始终给受到巨大压力的美国人和俄国人带来好处。

不过，如今土耳其这一显然是自相矛盾的中立政策开始暴露出来了：因为当丘吉尔在获得美国的物力援助下，肃清了在中东的轴心国军队后，他计划把这一战区用作进攻巴尔干半岛的基地，因此，曾经在外交上把冯·巴本蒙混过去从而在危急的岁月里掩护了英国北侧的土耳其，如今却开始在牺牲英国的情况下重施这种蒙混伎俩。

似乎丘吉尔在顺利度过其“开始的结束”后所表现出的高兴情绪，说明他在阿达纳会议上把土耳其的热诚的友谊过分地认为是想当然的事，但并没充分考虑到土耳其谨小慎微的政治特性以及它不愿在基马尔革命的物质成就上冒风险的心理。土耳其决心重建一个独立的巴尔干集团作为遏制苏联

见《概览，1939—1946 年：战时中东》，第 452—454 页。

见丘吉尔，第 4 卷，第 626—636 页；美国版，第 4 卷，第 699—711 页。另见上文，原著第 355 页。

因为他似乎过高估计了在法国陷落后他们对稳定阿拉伯世界的力量（《概览，1939—1946 年：战时中东》，第 7 页，第 238 页和注）。

扩张主义的壁垒。但又不准备冒任何由于将德国从这一地区驱逐出去而引起的风险，__在这一点上，土耳其政府可以说是优柔寡断。但另一方面也应该说，由于没有美国的援助而错误发动的多德卡尼斯行动计划的失败，给了土耳其人以绝好的理由观望不前，而同时他们在开罗会议上的固执态度以及后来提出的关于保护其国内薄弱地区的一系列奢求，也获得了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的公开鼓励。假若盟国在多德卡尼斯岛的坚定立场得以确保，那么，当土耳其人看到了盟国准备利用这一有利地位进一步采取行动的势头后，它原会给盟军以相应的援助和支持的；可是事实上，盟军在它家门口的挫折以及盟国在莫斯科和德黑兰会议上的诡秘行径，进一步加深了土耳其这一病态性的忧虑：即到头来它会成为盟国团结祭坛上（事实上这种团结并不存在）的殉葬品。接着发生了几桩大事：盟国要用封锁来终止土耳其对德国的铬矿出口；对轴心国在海峡内船只问题发生争执；土耳其卑鄙地试图讨好苏联但遭到它傲慢的拒绝：盟国重新对土耳其施加压力迫使它断绝与德国的外交和商务关系；土耳其最后一分钟（和埃及一起）爬上联合国乐队车——所有这些都是前者巧妙地搪塞过冯·巴本后出现的不体面的低潮。如果不是由于苏联对控制海峡提出的毫不让步的要求而引起西方必然的反映的话，土耳其政府在这一阶段的政策可能使它无法对英美战后的援助提出任何要求。土耳其在 1944 年间一再勉强作出的让步，对战争的贡献是相对地这样微小，可以说英国政府坚持迫使土耳其作出这些让步是由于英国对他们的巴尔干计划的破产感到懊恼的缘故。另一方面，英国政府可能预感到战后苏联的野心是想向东地中海方面扩张，因此一心想进行活动，使土耳其能在联合国内取得一席尽可能体面的地位，以便使英国有正当的理由来奉行它支持土耳其控制海峡主权的传统政策，并作出一些经国际同意可能被认为有必要的修改。假使这样的话，结论似乎是，虽然处于地球上的战略要点使象土耳其这样的二等国家要享受到真正中立是困难的，但这还是保证了它不致处于孤立，而这种孤立可能是推行一种极端利己的政策所致。土耳其象一个笨拙的女继承人，不管她于出什么错误行动，只要她在战略上能使人感到兴趣，她将永远是合适的同盟者。

最后，是否土耳其作为一个海峡监护人的战时记录，使蒙特勒公约（最多）必须作出战后根本的修改或（至少）有理由作这样的修改呢？苏联政府战后对这一记录的指控，可能是充分利用了轴心国在土耳其的默许或疏忽的帮助下对蒙特勒公约条款所作的侵犯；但总的来说，这些侵犯似乎并没有给予德国在黑海对付苏联，或在东地中海对付英国的战争努力中以重要的帮助。可是，至于技术性的侵犯，土耳其倒确实为苏联 1946 年 8 月 8 日的照会的拟稿者提供了能掩盖强权政治真正意图的法律上的门面。英、美两国政府已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上同意，经各国批准对蒙特勒公约作某些修改是有必要的，以便为调整各大国的一般世界关系，特别是东地中海地区的关系作好准备；但是，战后不久，当苏联对土耳其和它以前的盟友采用了似乎是挑衅性的不友好的态度时，西方盟国在对苏联继续保持妥协做法失去信心之余，转而支持土耳其反对苏联实际垄断海峡控制权的专横要求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假如迁就苏联这一要求，那就不仅会造成加强苏联自身安全这一无可指摘的结果，而且将不可避免地使它处于这样的地位，可以威胁横贯地中

见《概览，1939—1946 年：1945—1950 年的中东》，第 31—32 页。

海东部地区长期建立起来的海、空战略交通。既然苏联宁愿使用强权政治的手法而不愿采用平等的国际间的谈判方式来处理海峡问题，那么，其他有关的国家也要步苏联后尘采取强权政治立场是在所难免的了。

